



John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JOHN DEW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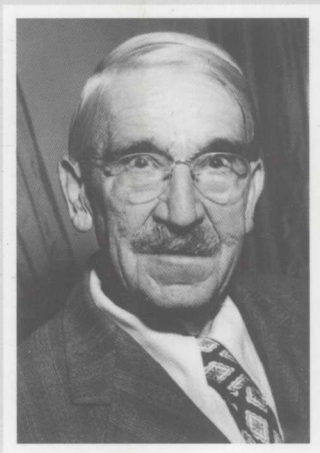
杜威传

(修订版)

简·杜威等◎著 单中惠◎编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ISBN 978-7-5336-5372-9



9 787533 653729 >

定价：58.00 元



John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杜威传

简·杜威 等◎著 单中惠◎编译

APER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传 / 杜威等著; 单中惠编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36-5372-9

I. 杜… II. ①杜…②单… III. 杜威, J. (1859~1952)—传记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2147 号

出版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杨多文

装帧设计: 陈熙颖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天歌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12

字 数: 470 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5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83078

前言

单中惠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从1859到1952年走过了93年的人生道路,他的学术生涯是给人启迪的。杜威从哲学转向教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探索现代教育,构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综观杜威的一生,他对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敏感的,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深远的,他对教育革新的态度是热情的,他的理论基础是广泛的,他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庞大的,他对美国和世界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作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是当之无愧的。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在佛蒙特州柏灵顿市南威兰德街186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是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他喜爱读书,几乎对阅读任何书籍都感兴趣,但对采取死记硬背方法的传统学校教育却感到厌烦。可以说,在杜威所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因此,杜威的女儿简·M·杜威(Jane M. Dewey)在《约翰·杜威传》(Biography of John Dewey)一书中指出:“在形成约翰·杜威教育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当我们解读杜威的漫长人生和学术道路时,不难看出,在他探索现代教育的整个生涯中,在他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在他构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他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起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15岁进入佛蒙特大学起,杜威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确立了研究哲学的志向。这是杜威大学时代的第一阶段。对杜威来说,这是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起点,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这要归功于以哲学为传统的佛蒙特大学的学术环境,更要归功于他的老师特别是托里(H. A. P. Torrey)教授的指导和鼓励。当然,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也开阔了杜威的眼界。

^① Jane M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Paul Arthur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39:9.

告别家乡以及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环境,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这是杜威大学时代的第二阶段。当然,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因为在美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中,杜威受到了更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接触了更多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人,参加了更广泛的学术活动和研究,从而更加坚定了研究哲学的志向。特别是莫里斯(G. S. Morris)教授,对杜威的成长影响和帮助最大,使他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杜威本人后来也这样说:“与黑格尔的结识在他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①

在大学时代结束后,杜威从1884年任教于密执安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教授生涯。除1888—1889学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外,他主要在密执安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在学术研究上逐步走向成熟,不仅表现在哲学上,而且表现在教育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由美国走向世界,不仅成为了美国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尽管杜威在佛蒙特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中学和佛蒙特州夏洛特村莱克维尤高级中学当过老师,但对教育的兴趣却源于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期间对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因此,他不仅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时继续哲学的研究,而且开始对教育感兴趣,并萌发了把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想法。这使杜威有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应该说,这是他探索现代教育的开始。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以马萨诸塞州昆西学校实验为开端,在美国兴起了一次广泛的群众性教育改革运动,史称“进步教育运动”。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在哲学上提出了工具主义理论,在心理学上创立了机能主义心理学派。但是,正是在教育革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史称“杜威学校”,进行了长达8年(1896—1903)的教育实验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使教育理论研究与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早在1896年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开办之际,杜威就明确指出:

^① John Dewey. 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 George P Adams and William P Montagu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21.

“如果哲学要成为一个实验性科学,建立学校就是它的开端。”^①通过这所实验学校活动,杜威所提出的那些教育理论假设得到了检验。在这一意义上,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实验活动显然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蔡尔兹(J. L. Childs)曾指出:“在教育领域中,杜威既是一位实践者,又是一位理论家……他把自己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付诸于这所实验学校的实践。”^②因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对现代教育的探索更加深入,并开始结出一批硕果。这不仅确立了杜威在美国哲学界的地位,而且开始确立他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

哥伦比亚大学是杜威的大学教授生涯中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期,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教育上,杜威都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到1916年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那本最重要的教育著作时,标志着他已初步建构了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杜威自称《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是他的教育哲学‘最完整而又最详尽’的阐述。”^③此后,一直到1952年去世,杜威又撰写了很多论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38年出版的《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书,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以及辩解和修正。一直到去世前,杜威也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教育”的探索。1952年,他撰写了生前最后一篇教育文章:《〈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的引言》(Introduction to 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确立了杜威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使他被誉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为渊博的教育家,并开始成为一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教育家。

作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就对世界教育的广泛影响而言,几乎很少有教育家能与杜威相提并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① 引自: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1).梅祖培,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28.

② J L Childs. John Dewey and Education// Sidley Hook. John Dewe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0:153.

③ William W Brickman. John Dewey's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China-Turkey.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face, 1964:6.

后,杜威曾先后赴一些国家访问讲学和考察,其中包括日本(1919)、中国(1919—1921)、土耳其(1924)、墨西哥(1926)和苏联(1928)等。特别是在中国的访问,对杜威自己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印象。通过自己的讲学和考察,杜威对他亲自访问过的那些国家的教育产生了比对其他国家更大的印象。就杜威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来说,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比之下,杜威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显然要比在哲学方面的影响大。近代中国学者《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译者邹恩润先生就指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①因此,在杜威访华(1919—1921)前后,对杜威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成为了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高潮。

杜威生前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899—1900)、美国哲学学会会长(1905—1906)、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会长(1915)等。1952年6月1日,他去世于纽约市第五大道1158号的住宅。

自1900年杜威的教育著作在国外翻译出版后,至少已被译成35种文字,其中有法文、德文、俄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匈牙利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印地文、朝鲜文、日文和中文等。确实,在世界上,很少有一位教育家能像杜威那样,有那么多著作被译成那么多种文字出版。据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教授安德逊(R. Aderson)和博伊兹顿(J. A. Boydston)汇编的翻译杜威著作的文献目录统计,从1900年到1967年,杜威著作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的文本共有237种。^②通过著作在国外的翻译出版,杜威教育思想在世界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无疑,杜威的哲学和教育著作已成为经典著作,并引起一代又一代学者阅读和研究的兴趣。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教授认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已成为今天所有教育学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③正如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Thomas Berry)所指出的:在杜威的漫长一生中,“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0年的门徒身份,10年的摆脱影响

① 邹恩润. 译者序言//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邹恩润,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② A Harry Oasson. Dewey'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Spring1982.

③ 引自: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王承绪,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78.

和渐露头角,其后50年杜威成了杜威。”^①

毫无疑问,杜威对现代教育探索的过程,也是对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尖锐批判和理性思考的过程。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思考,是杜威探索“现代教育”和构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也正是在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和思考的过程中,杜威构建了他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因此,从杜威的教育论著中,人们同样不难看出,杜威在分析和思考“传统教育”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美国教育家伯杰(M. I. Berger)曾这样指出:“杜威在教育理论方面所做的批判工作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②此外,当杜威致力于现代教育的探索时,一场教育革新运动正在欧洲和美国兴起。作为一位美国教育家,杜威自然对在美国兴起的进步教育运动十分关注。由于进步教育运动的矛头是指向传统教育的,因此,杜威在对它表现出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从进步教育运动中吸收了不少养料。但是,对于进步教育家的一些极端的观点和做法,杜威不仅不同意,而且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教育进行探索的杜威正处在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面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他表现出敏锐的意识和积极的态度。正是在对大转折年代美国社会的思索之后,杜威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教育必须进行完全的变革。杜威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这充分表明杜威认真思索了大转折年代美国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新的挑战 and 新的要求。

从杜威的人生和学术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教育实验活动,没有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没有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没有对大转折年代美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思索,那么杜威也就不可能构建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曾经受到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评论。毫无疑问,人们对杜威及其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在《约翰·杜威与他的影响》(John Dewey and his influence, 1939)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约翰·杜威是典型的最有影响力的

①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现代美国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62.

② William W Brickman and Stanley Lehrer.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New York: Atherton, 1961:235.

美国思想家。”^①美国教育学者德沃金(M. S. Dworkin)在《杜威论教育》(Dewey on Education, 1959)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作为一位著名教育家,杜威的著作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中产生了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影响。”^②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罗素(B. A. W. Russell)在《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55)一书中指出:“一般公认,杜威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③美国教育家、“设计教学法”的创始人克伯屈(W. H. Kilpatrick)在《回忆杜威与他的影响》(Reminiscences of Dewey and his influence, 1961)一文中指出:“在教育哲学史上,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④当代美国教育家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在他们合著的《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Economic Life, 1976)一书中指出:“约翰·杜威无疑是美国眼光最为敏锐的教育哲学家。”^⑤美国南康涅狄克州大学彼得森(F. H. Peterson)教授在《约翰·杜威的哲学改造》(John Dewey's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1987)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美国,在公共教育方面没有一个名字能比约翰·杜威更神圣的了。”^⑥当代美国教育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纳(J. S. Bruner)也写道:为激励人们起来批判和改变传统学校教育的状况,“杜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⑦在美国教育史上以及现代西方教育史上,一位教育家能受到不同年代那么多学者的关注和评论,确实是不多见的。这也清楚地表明杜威作为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在西方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① Paul Arthur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39:477.

② Martin S Dworkin. John Dewey o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face, 1959.

③ 罗素. 西方哲学史. 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78—379.

④ William H Kilpatrick. Reminiscences of Dewey and His Influence.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1961:16.

⑤ 鲍尔斯,金蒂斯. 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 王佩雄,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52.

⑥ Forrest H Peterson. John Dewey's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reface, 1987.

⑦ 布鲁纳. 杜威教育哲学之我见. 伟俊,钟会,译. 外国教育研究,1985(4).

甚至在教育理论上与杜威的观点相左的那些教育家也不得不对杜威刮目相看。美国教育家、要素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巴格莱(W. C. Bagler)不仅把杜威称为“当代杰出的领袖”，而且指出要素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杜威的理论“对教育实践真正有价值的贡献”。^①前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R. M. Hutchins)在《民主社会中的教育冲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1953)一书中虽然批判了杜威，但他同时又承认：“约翰·杜威是最有影响的美国教育家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40年来，他改造了美国教育制度。”^②

人们普遍承认，杜威是20世纪以来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他给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使得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1949年，美国《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在杜威90岁生日前夕刊文写道：“现代美国教育家中还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约翰·杜威的影响。”^③时隔45年之后，1990年，美国《生活》(Life)杂志又把杜威称为“20世纪100个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④。这充分说明美国人对杜威和他的杰出学术成就的重视。

杜威生前和生后是一位经常容易被误解的学者，在受到那么多赞扬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的攻击。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使人们感到惊讶。但是，当人们对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理性的思考时发现，原来的想法既是愚蠢的又是可笑的。早在1966年，美国教育学者沃思(A. G. Wirth)就在《作为教育家的约翰·杜威：他的教育工作设计》(John Dewey as Educator, His Design for Work in Education)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种不平常的喧闹之后，我们可能会准备在约翰·杜威对美国教育的贡献方面去寻求更为理性的评论。”^⑤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 W. Brickman)教授也指出：“杜威被公认为当代努力争取更好的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人们

① 引自：哈恩，查伯特·威廉·查德勒·巴格莱——教师之师//巴格莱. 教育与新人：附录二. 袁桂林，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14.

② Robert M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3: 49.

③ 引自：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5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82.

④ Barbara Levine. 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1995.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1996.

⑤ Arthur G Wirth. John Dewey as Educator, His Design for Work in Edu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Preface, 1966.

可以根本不接受杜威的意见,甚至可以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他根本对立,但是,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杜威的见解是值得注意和有意义的……这就是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在世界上的声望——在世界上几乎很少有教育家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①

教育历史表明,杜威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仍旧被人们所研究。1960年秋天,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建立了“杜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博伊兹顿博士和波洛斯(K. Poulos)在他们1978年合编出版的《有关论述杜威的文章一览》(Checklist of Writings about John Dewey)中就指出:“自从第一篇评论有关杜威和他的工作的文章以来的86年中,共有2200多篇文章问世,平均每年25篇。但是,从1973年1月至1977年1月这四年中就发表了有关杜威的文章平均每年60多篇。仅仅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出对杜威的注意力正在增长的全部情况,有关杜威的研究文章的质量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提高和扩大。”^②确实,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重新表现出对杜威研究的热情,更深入和更理性地反思杜威对现代教育的探索。1991年,美国学者洛克菲勒(S. C. Rockefeller)在《约翰·杜威的宗教信念与民主的人文主义》(John Dewey's Religion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杜威正处于他的生涯的顶峰……然而到50年代,对他的著作早期的广泛的兴趣却在衰退。但是,一种对杜威的更广泛的学术理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里,人们重新意识到经典的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包括对杜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③

对于杜威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来说,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在杜威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上卓有成效的。早在1970年,博伊兹顿博士就主编出版了《约翰·杜威著作指南》(Guide to the Works of John Dewey)一书。1991年,博伊兹顿博士又主编出版了《杜威著作全集》

① A Harry Oasson. Dewey'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Spring, 1982.

② 引自:伯内特. 如何评价杜威? //陈友松. 当代西方教育哲学.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195—196.

③ Steven C 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n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199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共 37 卷。其中包括: 早期著作(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898) 5 卷; 中期著作(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 15 卷; 晚期著作(The Lat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17 卷。杜威研究中心的工作无疑推动了杜威研究的深入。1996 年, 在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希克曼(L. Hickman)的指导下, 莱文(B. Levine)又编辑出版了《有关论述杜威的著作目录(1886—1995)》(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1995)一书。编者指出:“在从 1886 至 1994 年的 108 年里, 有关论述杜威的论著共计 4759 篇, 其中 1977 年以来发表或出版的约 2000 篇; 有关杜威著作的书评共计 91 篇。”编者还指出:“杜威的思想和观念已经影响现代思想整整一个世纪, 它将会继续引起人们的注意。”^①

尽管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本身存在着不足之处, 但作为一种教育思想的流派,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经对美国 and 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讲, 了解和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必将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美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尽管学界对杜威教育思想会持有不同的态度, 或赞扬和肯定, 或攻击和否定, 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那就是: 研究现代美国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思想是离不开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因此,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是现代西方教育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罗思(R. J. Roth)所指出的:“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象, 它在前进中怎样能够不通过杜威。”^②2001 年, 在英国德拉姆大学教授帕尔默(Joy A. Palmer)主编的《五十位主要思想家论教育: 从孔子到杜威》(Fifty Major Thinkers on Education; From Confucius to Dewey)一书中, 美国教育学者阿普尔(Michael W. Apple)在“杜威”一章中这样写道:“约翰·杜威被普遍认为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在其跨越 70 年(他的全集共 37 卷)富有创造力的事业中, 杜威的视线聚焦于范围广阔的问题, 主要是在哲学、教育和政治方面。”尽管对杜威有批评, 但是“杜威仍然作为美国教育、哲学和政治的一个主要人物

^① Barbara Levine. 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1995.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1996.

^② Robert J Roth. John Dewey and Self-realiz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Preface, 1962.

高耸着,他是一个巍然屹立的人物。他的著作因为对直到如今仍然被人们如此关心的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考察,仍然值得人们去阅读。”^①

在杜威的整个生涯中,他追求一种理想的教育。但仔细研读杜威的教育著作,人们自然会发现,要实现这种教育理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对儿童和教师尤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在教育现实中又往往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传统的教育观念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不可能转化为既定的实践形式,而且还有可能引起诸多争议。美国教育学者珀金森(H. J. Perkinson)在《美国教育思想二百年》(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中就这样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所描述的一种学校从未存在过,也许从未能存在过。要实现这样的学校,就要有极好的教师和极好的学生。”^②这段话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确实具有理想主义的特点。

就哲学史或教育史上的一位历史人物研究来说,在研究他的著作的同时,也可以借助他的自传或传记对他的思想发展进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自传或传记是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门户。同样,对杜威的人生和学术活动的了解,无疑会有助于对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的深入的研究。

杜威自己曾这样写道:“肯定地说,我羡慕那些能够用一种统一的形式来撰写他们学术传记的人。”^③然而,使人们感到有点惊讶的是,杜威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虽然十分漫长,但他从未写过自己的人生和学术传记。如果要从杜威的众多论著中寻觅他对自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思想特点进行阐述的文章,那就是他于1930年发表的《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它被杜威的女儿简·M·杜威(Jane M. Dewey)称为杜威本人的“自传性提纲”。这篇文章简要地论述了杜威自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当我1982—198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① 帕尔默. 教育究竟是什么? 100位思想家论教育. 任钟印, 诸惠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26, 230.

^② Henry J Perkinson.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 New York: Mckay, 1976: 125.

^③ John Dewey. 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 George P Adams and William P Montagu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vol. II, 1960: 22.

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我曾就杜威传记的问题请教当今美国杜威研究的著名学者、时任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博伊兹顿博士。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博伊兹顿博士当时给我及时回了信。在1983年10月11日的回信中,他写道:“我给你寄的是《约翰·杜威传》(Biography of John Dewey)的照相复制本,取自《约翰·杜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1939版,这是你想要的材料。在接受这份材料的同时,也请接受我们的问候。”在1983年10月26日的回信中,他又这样写道:“我随信寄去约翰·杜威的《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的复印件,这是他曾经写过的唯一的自传性文章。我寄给你的《约翰·杜威传》取自希尔普(Schilpp)主编的书。一般理解,杜威本人在他的女儿撰写《约翰·杜威传》时提供了素材。因为这个原因,《约翰·杜威传》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广义的杜威‘自传’。我希望这些材料将对你的研究工作有帮助。”《约翰·杜威传》这本书为人们了解杜威的生平和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传记资料。它对杜威的家庭背景、童年时代、学生时期、教师生涯、个人交往和国外访问等进行了简要的论述。由于其作者简·M·杜威的特殊身份,加上杜威本人知道自己女儿在写他的传记并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因此,这本书提供的资料是比较确实的,并为许多研究杜威的学者广泛引用。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大力支持下,《杜威传》一书曾于1987年出版。该书出版后被我国学术界的诸多学者引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杜威传(修订版)》除保留原来的主体资料外,又从传记的角度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使本书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以便更好地为我国教育界和哲学界的学者研究杜威提供参考。全书共分6编,以及附录。

第一编“杜威传记”基本保留原版主体,包括杜威女儿简·M·杜威的《约翰·杜威传》、杜威本人的自传性提纲《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以及美国哲学学者塔利斯的《约翰·杜威是谁》。

第二编“杜威实验学校”,包括我国近代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以及美国教育学者德彭西尔、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英国教育史学家威廉·博伊德和埃德蒙·金的文章。

第三编“杜威与美国教育”,收入我国近代学者胡适先生以及美国杜威研究学者戴克威曾、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美国教育学者格林、美国教育家伯

杰、美国教育学者伯纳特、美国教育学家克伯屈、美国教育学者李尔奇、美国哲学学者培里、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等关于杜威在中学任教、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情况以及杜威与进步教育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影响等方面的文章。

第四编“杜威与世界教育”，收入了杜威夫妇《寄自日本的书信》、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美国教育学者帕苏、美国杜威研究学者戴克威曾、美国学者克利巴德以及苏联教育家沙茨基、土耳其教育学者巴尤克迪文奇、日本教育学者小林繁夫等关于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以及杜威与苏联、土耳其、墨西哥、日本等国的交往等方面的文章。

第五编“杜威与中国教育”，收入杜威夫妇《寄自中国的十封书信》以及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近代学者胡适先生和美国杜威研究学者戴克威曾的、美国哲学学者培里的文章。

第六编“杜威生日庆典”，收入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杜威六十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词以及杜威本人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词、美国教育联谊会主席贝恩、美国工业民主联盟执行董事莱德勒等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祝词。

在“附录”中，包括附录一《约翰·杜威生平年表》以及《约翰·杜威生平示意图》（单中惠编）；附录二《杜威在华活动年表》（黎洁华编）。

作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的人生和学术生涯是值得了解的，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就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①

^① 赵祥麟.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 (2).

1/前言 单中惠

第一编 杜威传记

3/约翰·杜威传 简·M·杜威
45/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 约翰·杜威
57/约翰·杜威是谁 罗伯特·B·塔利斯

第二编 杜威实验学校

67/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艾达·B·德彭西尔
89/杜威实验学校浅析 劳伦斯·A·克雷明
95/杜威和他的实验学校 威廉·博伊德 埃德蒙·金
103/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 陈鹤琴

第三编 杜威与美国教育

109/杜威在中学当老师 乔治·戴克威曾
117/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 乔治·戴克威曾
134/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胡适
143/回忆杜威与他的影响 威廉·赫德·克伯屈
146/杜威唤醒了黑暗中的美国学校 劳伦斯·A·克雷明
155/杜威和美国教育 马辛尼·格林
160/杜威和今日的进步教育 M·I·伯杰
164/究竟对约翰·杜威发生了什么 乔·R·伯内特
178/杜威教育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回顾 弗雷德里克·李尔奇
185/一个创始的心的影响 托马斯·培里
192/杜威教育哲学之我见 杰罗姆·S·布鲁纳

第四编 杜威与世界教育

- 205/世界教育家杜威 威廉·W·布里克曼
212/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 A·亨利·帕苏
227/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 约翰·杜威
269/美国教育家杜威在我们苏联作客 斯坦尼斯拉夫·T·沙茨基
276/杜威与一个意大利男孩子的逸事 H·M·克利巴德
280/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的影响 萨布里·巴尤克迪文奇
288/墨西哥的教育复兴 约翰·杜威
294/杜威的日本之行 乔治·戴克威曾
303/寄自日本的书信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343/日本的“杜威勃兴” 小林繁夫

第五编 杜威与中国教育

- 349/就杜威来华讲学之事致胡适 陶行知
352/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 陶行知
354/杜威的中国之行 乔治·戴克威曾
364/寄自中国的十封书信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378/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
380/杜威在中国 胡适
385/杜威对中国的影响 托马斯·培里

第六编 杜威生日庆典

- 395/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 蔡元培
397/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词 约翰·杜威
399/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演讲 肯尼思·D·贝恩
403/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上 哈里·W·莱德勒等

附录

- 435/附录一 约翰·杜威生平年表 单中惠
442/附录二 约翰·杜威在华活动年表 黎洁华
467/编译后记 单中惠

第一编

杜威传记

约翰·杜威传^①

[美] 简·M·杜威^②

佛蒙特州的柏灵顿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市镇。今天,它与1860年时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同现在一样,当时它也是该州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从那时起,法属加拿大人来到这里,帮助建立了它的工业。它的魅力也开始被来自大城市的有钱人发现,他们在镇上和镇的周围建造了避暑住宅。

由于汽车的使用,使得许多较为富裕的居民从城里搬到它的近郊,并在那里的宽敞场地上盖起了殖民地时期式样的房子。但是,它仍是一个具有新英格兰传统特点的市镇,环境优美,坐落在香普兰湖中耸起的一个丘陵地上。丘陵地的顶部是一块平原,从那里可以看到阿迪龙达克山脉穿过香普兰湖一直往西延伸,视野的尽头是穿过碧绿的田野往东而去的格林山。

1859年10月20日,约翰·杜威(John Dewey)出生在这个镇上。他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4个子女中的第三个儿子。他们的长子在婴儿时就夭折了,而比约翰大一岁半的戴维斯·里琦·杜威(Davis Rich Dewey)和年纪更小的查尔斯·米纳·杜威(Charles Miner Dewey)长大了起来,与约翰一起进了附近的公立学校。这个镇的所有儿童几乎都进这所公立学校读书。他们来自各式各样的家庭,富裕的和贫穷的,美国公民和外国移民。进入私立学校读书的少数人,被大多数孩子看作是“柔弱的”或“傲慢的”。因此,虽然少数上层家庭具有特别显赫的地位,但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是民主的。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说,平等和没有阶层的区分在社区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① 译自:Paul Arthur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39: 3—45. 注释不注明者,均为编者注。

^② 这篇传记是1939年由杜威的女儿简·M·杜威(Jane M. Dewey)根据杜威本人所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可被看作杜威的一篇自传。——原编者注

在杜威家子女的成长中,很难说什么遗传的影响是重要的。但是,假如我们考虑文化上的遗传超过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话,那么,拓荒者时代的背景在他们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父亲阿奇博尔德·斯普雷格·杜威(Archibald Sprague Dewey)1811年出生在佛蒙特州北部。后来,他与几乎比他小20岁的卢西娜·里琦(Lucina Rich)结了婚。当他的孩子出生时,他已经快50岁了。对这些孩子来说,拓荒者时代好像并不遥远,因为他们家族中的人结婚都很迟。大约在1630年至1633年之间,詹姆斯·杜威(Thomas Dewey)就已经定居在马萨诸塞州。在阿奇博尔德与詹姆斯·杜威之间只隔着四代人。阿奇博尔德的父亲出生在独立战争之前。据说,在独立战争中,他的一位叔叔被伪装成印第安人的亲英分子杀害了。阿奇博尔德曾对他的孩子们说,在1812年战争^①的一次战役中,他听到过香普兰湖的舰船上传来的炮声。

对杜威家族来说,在詹姆斯移居美国之前,不同分支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传统。多年来,杜威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一直在美国收集关于这个家族的家谱材料。在因阿德米拉尔·杜威(Admiral Dewey)的功勋而命名的那个家庭的帮助下,他能够印出这份家谱材料。这使得杜威家族中的许多人希望知道,他们自己是怎样与“堂兄乔治”(Cousin George)有关系的。正如他们所期望的,在这本已印出的家谱材料中能提供贵族血统的祖先。可是,这一血统都在女方一边,而杜威一边的血统仍是平民。杜威家族很可能是来自佛兰德斯^②的编织工,他们把精巧的编织技术介绍到英格兰,并得到了杜“威”(草地的意思)这个名字。家族的传说表明,为了逃避阿尔瓦公爵的迫害,詹姆斯·杜威的父母或祖父母离开了佛兰德斯。詹姆斯和他的后裔无疑是自由民世系,即农民、修造车辆的工人、细木工和铁匠。詹姆斯·杜威曾亲眼看到他画了押的证书,他的儿子也在上面签了名;但是,包括阿奇博尔德在内的孙子并没有在签名之列。一直到居住在佛蒙特大学附近时,戴维斯和约翰才受到了大学教育。这是由于学费低和依靠奖学金的帮助,他们才能够进入佛蒙特大学学习。

① 1812年6月18日,美国正式对英国宣战,开始了第二次反英战争(1812—1814)。

② 佛兰德斯(Flanders),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临多佛尔海峡,是13至14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织中心之一。

詹姆斯·杜威是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的一位移民。多尔切斯特是以那里居民中的许多人移居前所居住的那个英国市镇而命名的。他们离开英国的多塞特郡,可能与大约12年前乘“五月花号”(Mayflower)^①离开英国德文郡的人有着同样的原因。多尔切斯特现在是波士顿市地铁网的一个终点站。有一个时期,它曾是新英格兰地区中人口最稠密的市镇。也许詹姆斯发现它对务农兼经商,即大部分移民赖以谋生的行业来说太拥挤了。于是,在1635年10月,他与一些情况相同的移民开始了去康涅狄格州温泽的新的和艰难的旅程。詹姆斯的6个孩子都出生在温泽,并受到了初等教育。他们的后裔后来分散到康涅狄格河周围的村庄居住。约翰·杜威的祖父马丁(Martin)1716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韦斯特菲尔德,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他因娶了他亡妻的妹妹而被开除出教会为止。

约翰的父亲阿奇博尔德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是,他并没有务农而是搬到了柏灵顿做杂货生意。在独立战争中,他曾在一个佛蒙特骑兵团里担任过4年时间的军需官。他通过阅读书籍来补充他仅受过的一点点学校教育。他的文学兴趣显然是古典的。他读过莎士比亚^②和密尔顿^③的著作。这并不是因为文化修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对他们演说的语言和措词感兴趣。在干活时,他常常引用密尔顿的话,得意地反复念着与众不同的和悦耳的句子。在他的孩子们还没有长大时,他就对卡莱尔^④的著作失去了兴趣,但他仍然喜欢查里斯·拉姆^⑤和萨克雷^⑥的著作。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阿奇博尔德学习苏格兰的方言。在给他的孩子们背诵摘自彭斯^⑦诗篇的长句子时,他得到了一些乐趣,并对彭斯的幽默方式感到满意。可能是因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

① “五月花号”,英国第一艘载运为躲避英国国教会迫害的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

②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和诗人。

③ 密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诗人。

④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道德家。

⑤ 查里斯·拉姆(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国评论家和随笔作家,曾用笔名“埃利”(Elia)。

⑥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小说家。英国两本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名利场》和《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的作者。

⑦ 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

和对传统神学尊重的缘故，他不喜欢爱默生^①和霍桑^②的著作。阿奇博尔德本人有演说的天才，他善于利用赞美他人的做法来做广告。在书面印刷还没有被公认为一种技术时，他在自己的地区赢得了名声。有一个广告写着：“火腿与雪茄烟，烟熏的与无烟的。”而他把为一种雪茄烟做广告看作是“为吸烟这种坏习惯寻找适当的借口”。他的记忆力非凡，能够记起一些经历过的事情的细节。他常常告诉他的孩子们，在他童年时代或在他参加战争期间的某一天，他正在做什么。在财政管理上，阿奇博尔德缺乏积聚钱财的本事。据说，他出售的商品比镇上其他任何商人多，而赚的钱却比他们少。

阿奇博尔德的妻子卢西娜·阿特梅西·里琦(Lucina Artemesia Rich)出生于佛蒙特州的肖拉姆。她的家庭大概与杜威一家在同一时期定居在美国。里琦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卢西娜的祖父曾是华盛顿国会的一位议员。她的兄弟都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戴维斯·里琦(Davis Rich)在肖拉姆近郊以“律师”里琦出名，担任了阿迪森县法院的兼职法官，即当地一般称为“陪审”法官。因为戴维斯·里琦公正和具有判断力而带来的声望，使得镇上居民都喜欢请他去对他们的争端作出仲裁。卢西娜年轻的时候，曾去看望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位叔叔。像里琦家的所有人一样，那位叔叔也是一位活跃的宇宙神^③教徒。那位叔叔给卢西娜的父亲写信说，卢西娜曾参加了那里具有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④的集会，他担心卢西娜将成为这个宗教团体的一个“信徒”，除非她父亲出面进行干预。他的预言后来被证实了，卢西娜成了公理会^⑤的一个成员。

卢西娜的性格是比较热情的，对教会的热情超过了她那对教会抱无所谓态度的丈夫。因此，她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并对他们提出更多的具体目标。孩子们之所以摆脱家庭的传统，获得了大学教育，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她的影响。当有人问阿奇博尔德你的孩子准备做什么时，他常常回答说，他希望在孩子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将成为一位技工。两位家长的爱好，有助于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19世纪美国诗人、演说家、随笔作家和哲学家。

②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美国小说家、小故事作家和随笔作家。

③ 宇宙神, 旧哲学名词。它所研究的是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和结构等问题。

④ 福音布道会, 基督教宗派之一。

⑤ 公理会, 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教派别之一, 16世纪后期产生于英国, 由勃朗等人所创。

给孩子们提供范围更广的有益读物,这是那些与他们同样经济状况的家庭所不能相比的。当孩子们还在上学时,一所公共图书馆建立起来了,大学图书馆也增加了一批可供他们借阅的书籍。在一次书籍拍卖中,他们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买了一套钱伯斯^①的《百科全书》和一套《威弗利》^②小说集。后来,他们阅读了这些书籍。

在卢西娜与她丈夫之间,除了年龄和性格上的区别外,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孩子们的生活是简朴的和健康的,但有点脱离他们周围的生活潮流。约翰和戴维斯是喜爱读书的人。约翰是怕羞的,经常表现出随这种性格而来的忸怩状态。对约翰来说,比他大一岁多的表兄约翰·帕克·里琦(John Parker Rich)就像是另一个亲兄弟。当阿奇博尔德·杜威还在军队服役时,年幼的约翰·里琦就失去了他的母亲,于是,卢西娜承担了里琦一家的家务活。他们的亲密朋友和同伴是巴克汉姆^③的两个儿子,年纪比他们稍大一些。这两个孩子是里琦的远房表兄弟。他们的父亲巴克汉姆担任了佛蒙特大学校长。在暑期里,这些孩子常常呆在外祖父里琦的农场里。在农场里,有着舒适的住宅,离开村百货店仅几步路远。在附近被称为“柠檬集市”(Lemon Pair)的莱蒙尔河的一条支流上,坐落着由里琦家族所开办的一个锯木厂和磨坊。孩子们经常好奇地和高兴地在那里呆上好几个小时。在其他时间里,他们还去看望了在佛蒙特州圣阿尔巴斯附近的约翰·里琦的父亲。他在那里经营一个干草冲压的企业和一些石灰窑。这也是把孩子们从书本上吸引过来的源泉。学校使他们感到厌烦,但是,当他们相当轻松地学习时,在精神上也没有很多负担。尽管存在着不很明显的早熟,但他们比年级中的其他孩子更为年轻,并对游戏有一些兴趣。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同学之间任何不愉快的区别,而对学习和游戏中的同伴感到满意。按照今天的看法,道德感情上过多的压力是由于宗教环境而产生的。那时,在他们周围的宗教环境,与其说是福音派教会的,不如说是清教主义^④的。小镇上所有孩子除躲

① 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 1680—1740),英国作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

② 指苏格兰诗人和小说家司各特(Walt Scott, 1771—1832)从1814年到1831年出版的散文小说集。

③ 巴克汉姆(Matthew H. Buckham),佛蒙特大学校长。

④ 清教主义,基督教(新教)中一派的理论,要求“清洗”国教内所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主义。

到对他们敞开着野外去之外，宗教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约翰的母亲对因丈夫在联邦军队里服役而造成的长期分居感到不耐烦，因此，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个冬天，把家搬到了设在佛蒙特州北部的司令部驻地。对当时的一位妇女来说，这几乎是一次传奇式的搬家。这个荒芜地区的贫困状况，给年幼的孩子们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象。

在书籍拍卖中，孩子们所花的钱是他们为《柏灵顿日报》分送下午版，以及在香普兰湖旁堆放场帮忙清点从加拿大运来的木材而挣来的。当家庭还不很贫困时，当然只需要孩子参加一些家务活。在亲戚的农场里，他们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同现在一样，当时佛蒙特州是一个戒酒的大本营，同样有着在禁酒的社区里普遍存在的非法酒店的问题。阿奇博尔德·杜威在痛惜许多“蠢猪”的坏影响的同时，还尽可能去消除这些影响，并遵照严格的法律和以伟大高尚的精神去经营镇上领有执照的药房。他在商业方面富有同情心的逸事，给了孩子们对一个生活侧面的早期一瞥。而这正是那些比较傲慢的母系亲戚所忽视的。

环境独特的自然美，使得人们情不自禁地表示赞美，并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约翰和戴维斯曾穿过阿迪龙达克山脉，徒步到曼斯菲尔德山去旅行。他们还搞到了一条划艇，带着帐篷、羊毛毯和炊具，从头到尾地勘探了香普兰湖。在一些相似的旅行中，他们有时划船到乔治湖去；有时借助于租来运划艇的木制手推车，往下到连接香普兰湖与圣劳伦斯河的河流和运河中去划船；有时沿着法属加拿大的另一条河往上划船到一个美丽的内陆湖去。据他们的印第安人向导说，虽然这次去加拿大的冒险行动被称为一次钓鱼旅行，但“很不幸运”(la lune était trepfaible)^①，他们没有钓到几条鱼。在划船旅行中，他们的伙伴经常是詹姆士·巴克汉姆(James Buckham)和约翰·巴克汉姆(John Buckham)。詹姆士·巴克汉姆对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特别敏感，并把自己全部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森林里。当他长大一些时，他就携带着一支枪，但这仅仅是为有一种借口，以便能在农村里呆上几个小时观察动植物。在去加拿大的旅行中，孩子们练习了在柏灵顿学会的法语，所以，在学校老师教法语以前，他们就已经能阅读从一所新英格兰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法文小

^① 这里的法文，直译为“月亮太弱了”。

说了。

当约翰·杜威是一个孩子时，他在女孩子面前特别害羞。长大一些后，约翰和他的兄弟自然地成为他们所在街区的一个包括男女孩子在内的小组成员。于是，他的怕羞情绪渐渐地消失了。有一次暑假，他们参加了在曼斯菲尔德山山脚下的野营活动。野营活动是在他母亲的照料下举行的，参加野营活动的孩子有8个或10个，其中有两个女孩子，科妮莉亚·恩达伍德(Cornelia Underwood)和她的妹妹维奥拉·恩达伍德(Viola Underwood)。维奥拉就是现在的爱德华·霍伊特(Edward Hoyt)夫人，现仍然住在柏灵顿。

在形成约翰·杜威教育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男孩和一个男青年，他亲眼看到了他所有的亲戚都参加了家务活，并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一方面，年轻人被引导去深入接触简易工农业的整个工作范围。另一方面，学校是一个惹人厌烦的地方，不仅对杜威的同伴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戴维斯和杜威自己来说也是如此。除学校课本外，他们几乎对阅读任何书籍都感兴趣。而且，仅仅由于个别教师鼓励讨论外界问题的谈话，才使学校那惹人厌烦的情况有所缓和。当杜威长大成人并成为一位教师时，城市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与原来对学校教育的有价值的补充发生了抵触。在他的童年时代，这些有价值的补充是通过主动的职业活动以及他个人与各行各业人们的接触而提供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来贫乏和昂贵的阅读材料开始丰富和便宜起来，而且差不多是强加给每一个人的。这就降低了正规学校教育在3R^①中的重要性。而在杜威所成长的土地所有制共和国里，3R在正规学校教育中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应该认识到，一直到杜威上大学时，在他本人所受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外获得的。在杜威的教育工作中，课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职业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致被作为获得真正知识和个人智力训练的最有效方法。毫无疑问，杜威对普通学校中死记硬背方法的愚蠢性所作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对偶尔的令人愉快的课时的回忆。他回忆到，这是由于一些教师并不完全拘于规定课程的缘故。

15岁时，约翰·杜威从中学毕业。这时，他的家仍住在佛蒙特大学附近

① 指读(reading)、写(writing)和算(arithmetic)。

的普罗斯佩克特街上的一座房子里。他的哥哥戴维斯一年前已上了大学,约翰·里琦准备与他的表兄弟一起上大学。因为身体不好,戴维斯休学了一年。因此,1879年,三个孩子一起大学毕业。

当时,大学的规模很小。作为最早的专业学院,农工学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e)开办以来仅有12年的时间。1879年,佛蒙特大学有18名学生毕业。与杜威家的孩子一样,所有选修希腊语的学生与除工程学教授外的其他8位教授都熟悉。所有的科目都是必修的。前两年,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古代史、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三年级时,自然科学占有主要的地位。佩金斯^①教授使用讲演和示范的方法教地理(采用达纳^②的课本)和动物学。他还整理了关于进化论的参考资料。在他那关于动物生命发展的讲演中,他描述了一些早期教父的思想,指出他们并不坚持在上帝直接命令下的刻板的七日创世期。佩金斯教授不顾传统的环境(他是公理会的一个成员)而强调进化论思想,显然引起了一些不满。同年开设的生理学课程,采用了赫胥黎^③所写的课本。这本书描述了活的生物统一体,给约翰·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杜威对事物的一种广泛的学术好奇心,并使得他这个年轻人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大学图书馆订阅了一些英国期刊。这些期刊讨论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新思想。其中,《双周刊》代表了更为激进的科学思想派别;《当代评论》是更为传统观点的一种温和的刊物;而《十九世纪》则走一条中间路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单个论题的联合讨论,以“专题讨论会”(symposia)著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廷德尔(Tyndall)^④和赫胥黎的理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一些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生出于对进化论的好奇心,超过了出于对工艺性质的考虑。可是,对有关进化论的论战来说,这些期刊所讨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个专题。在自然科学和传统观念的关系中,它们处在新兴势力的最前列。反映了新酵素的英国期刊,是约翰·杜威这一时期在学术上的主要刺激物。这些英国期刊对于他的影响,比他所学的系统的哲学课程更为深刻。

① 佩金斯(G. H. Perkins),佛蒙特大学地质学教授。

② 达纳(James Dwight Dana, 1813—1895),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动物学家。

③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

④ 廷德尔(John Tindall,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大学的最后一年,被用来对学生介绍一个更广阔的学术世界。它作为一个“结束学业”的过程,是以哲学为特色的。托里^①教授讲授的心理学,那是建立在诺亚·波特尔^②的《智慧哲学》基础上的一门课程;他还开设了在巴特勒^③《类比》基础上的一门短期课程。四年级学生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从贝恩^④那比较乏味的《修辞学》中,获得了有关英国经验主义的一些知识。巴克汉姆校长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方面的课程,还教基佐^⑤的《文化史》。巴克汉姆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既具有有条理、有逻辑性的思维能力,也具有清楚的表达能力。他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人,但反对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⑥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在四年级之前,没有因纪律问题被他叫去谈话的学生与他接触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他每周一次会见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这种会见名义上是讨论基本的道德问题,但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了解。所讨论到的一些道德问题,并没有给这位未来的哲学家留下持久的印象,但是,杜威却一直受到了在教室里所发生的那件小事的影响。有一次,巴克汉姆校长试图要杜威班上的每个学生能对那一周所要讨论的章节的一般问题进行论述,但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从这之后,在这些学生中,至少有一个人在他自己没有抓住任何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细节前,决心弄明白他将应该阅读什么。

像这时美国多数大学的哲学教学一样,托里教授的哲学教学也是建立在苏格兰学派著作的基础上的。唯心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并不尖锐,而且很少写到或谈到贝克莱^⑦主教。苏格兰哲学家的影响,应该归于他们在介绍德国唯灵论者的唯心主义之前坚持直觉论的主张。直觉论的主张,形成了反对对英国经验主

① 托里(H. A. P. Torrey),佛蒙特大学哲学教授。杜威曾跟他学习哲学史。

② 波特尔(Noah Porter, 1811—1892),美国教育家和辞典编辑。主要著作有《人类的智慧》(1868)。

③ 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④ 贝恩(Alexander Bain, 1818—1903),苏格兰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在心理学研究中应用科学方法而闻名。

⑤ 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法国政治领袖和历史学家。1832—1837年任法国公共教育大臣。主要著作有《文化史》(1828)。

⑥ 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

⑦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853),爱尔兰哲学家和主教。他反对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哲学观点。

义起瓦解作用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的主要学术堡垒。由于坚持从牧师詹姆士·马歇^①教授的教学中得到的思想和论题,而使那颇为枯燥无味的苏格兰思想多少有了点生气。马歇教授是最早不顾德国哲学家的危险名声,而充分地研究和讲授德国哲学思想的美国人之一。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科尔里奇^②的著作而得到了更广泛的介绍,但是,甚至连这种介绍形式也受到了保守的哲学家的怀疑。社会风俗本身带有一种神的含意,以及《圣经》是因为它鼓舞人们而产生的那些思想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托里教授也采用最温和的方式来描述它们。正如马歇的《遗稿》所表明的,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他的一些著作大概首先引起了埃默森对德国思想和它的解释者科尔里奇的注意。

虽然这些学习当时并没有决定杜威的生涯,但是,它们却有助于他决定自己学术兴趣的方向。他的哲学读物是通过在《双周刊》上刊载的弗雷德里克·哈里逊^③的一些文章而得到扩大的。《双周刊》把杜威的注意力引向了孔德^④,并促使他去学习哈丽特·马提诺^⑤编的孔德《实证哲学》的节选本,而不是孔德关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和孔德对新的宗教的解释,使得杜威对孔德特别感兴趣。虽然在杜威自己的哲学思想中,重点是在科学的方法上,而不是在推理的结构上,但是,孔德关于现存社会生活的瓦解和发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必要性的理论,可能在杜威的思想中保持了持久的影响。阅读孔德和他的英国解释者的著作,开始唤起了杜威对社会环境与科学及哲学思想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独特兴趣。当杜威在大学读书时,每一个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要准备作一次介绍性的演讲。最优秀的演讲者将作为他们的代表,在一个公共展览会上演讲。杜威准备的题目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揭示了孔德对

① 马歇(James Marsh, 1894—1842),美国哲学家。1826—1833年任佛蒙特大学校长;1833—1842年任佛蒙特大学哲学教授。

② 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哲学家和评论家。19世纪英国和美国理念论的提倡者之一。

③ 哈里逊(Frederick Harrison, 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伦敦社会学学会创建者之一和英国实证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1880—1905年,曾担任英国实证主义者委员会主席。

④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1839年提出了社会学的名称,在主编的《实证哲学讲义》中,作了社会学系统化的尝试。他曾把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⑤ 马提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英国作家和社会改革家,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追随者。

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学的影响,但他没有去演讲。

杜威毫不费力地学习,但总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四年级的科目激起了他的兴趣,并且竟达到如此的程度,那一年他的学习成绩是大学里任何学生都不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大学二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地区性的大学生联谊会(Delta Psi)。在毕业典礼上,他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荣誉组织(ΦBK联谊会)的一个会员。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是使杜威感到忧虑的一个夏天。像其他一些还没有决定自己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一样,他想得到一个教师职位。由于他年轻和缺乏经验,使得他要找到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他的经济状况又使他感到,找到了一份工作对他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当秋季学校开学时,杜威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担任石油城中学校长的堂兄克莱拉·威尔逊(Clara Wilson)的一封电报,告诉他那里有一个空缺。在石油城任教的两年时间里,杜威教过一些科目,例如,拉丁文、代数和选自斯蒂尔(Steele)《十四周》的自然科学。第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40美元。在这段时期结束时,他的堂兄因为结婚而辞职,他也就离开石油城回到了柏灵顿。在随之而来的冬天里,杜威利用一部分时间在夏洛特镇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①里教书。同时,他又在柏灵顿,在托里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一些哲学名著。托里先生还经常与杜威一起长时间地在森林里散步,更加直接地谈出了他自己在教室里没有讲过的观点,表现了他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在比较适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获得盛名。在大学图书馆所订阅的杂志中,有哈里斯^②编的《思辨哲学杂志》。当哈里斯担任圣路易斯的地方教育长官时,他曾接触过一批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德国流放者。他们是德国哲学思想的热情研究者,特别是对谢林^③和黑格尔^④的思想颇有研究。多年来,哈里斯编的这份不定期出版的杂志,是在美国出版的唯一具有特色的哲学杂志。它成

① 即莱克维尤高级中学。

② 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 1835—1909),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早年对德国文学和哲学产生兴趣,从事黑格尔思想的研究,最后成为美国研究黑格尔的一流学者。1867—1893年,他主办《思辨哲学杂志》。1889—1906年,担任美国教育总署署长。

③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家。

④ 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了这批人的一个喉舌。那时，杜威的思想开始转向把哲学教学作为一种职业。杜威曾怀着担忧和焦虑的心情把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寄给哈里斯博士，并询问哈里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应该从事专业的哲学研究。不久，哈里斯博士就写回信给他说，寄去的那篇文章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哲学见解。在1882年4月那一期的《思辨哲学杂志》(但稍迟一些时间出版)上，刊载了杜威的那篇文章，标题是《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哈里斯博士的鼓励，决定了这位新作者将继续他的哲学研究，并使他写出了另外两篇通过哈里斯博士而发表的文章。根据杜威的慎重看法，所有这三篇文章在纲要的逻辑形式方面比在本质方面更值得注意。

由于托里教授和哈里斯博士的鼓励，1882年秋天，杜威向一位伯母借了500美元，动身去巴尔的摩，进入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一行动表明了杜威永远告别了童年时代的环境。杜威的表兄约翰·里琦经营了他父亲在佛蒙特州的商店；查尔斯·杜威也进入了商业界，而且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西海岸，约翰·杜威也很少能见到他。还在孩提时就对自然界表现出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兴趣的詹姆士·巴克汉姆，有一段时间曾是人们熟悉的和著名的《青年指南》杂志的编辑之一，但他在自己的才华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之前就去世了。当时，约翰·巴克汉姆是太平洋宗教学院的教授，这所宗教学院是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所不分教派的(尽管最初是公理会的)神学院。在约翰·杜威开始第二年学习时，戴维斯·杜威在几年非常成功的中学教学工作之后，也进入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戴维斯去麻省理工学院承担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课程。这些课程是由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沃克^①组织的。在以后的长时间中，戴维斯一直是沃克的亲密助手。在工程管理的研究课程方面，戴维斯进行了实践，并使它得到了发展。这种工程管理专业相当于当今大学里所建立的商学院。他所教的课程是一流的课程或是一流的课程之一，它也是最成功的课程之一。准备为学工程管理的学生开设的课程表明，这些课程是把重点放在实践方面，而不是放在与戴维斯的爱好完全相符的纯经济理论方面。在美国统计学学会(American Statistical Society)中，戴维斯是非常活跃的，编辑学会刊

^① 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 1840—1897), 美国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物,并担任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尽管几年前他已从教学职位上退休了,但年逾八十的戴维斯仍然是《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的编辑。

对约翰·杜威来说,戴维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那些年里,约翰和戴维斯兄弟俩在中小学和佛蒙特大学期间的亲密关系得到了令人愉快的恢复。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两个兄弟密切交往,增强了彼此间的友谊。尽管戴维斯·杜威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比他的弟弟更加保守,但是,在他们身心上的相似之处是很多的。他们俩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顽强精神,去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并具有一种正确的判断力。他们俩也都具有一种非常可爱的性格,能漠视许多使他们恼怒的事情。

当约翰·杜威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该校的研究生院设立已有几年了。吉尔曼^①校长在那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帮助一些研究生为到德国去获得奖学金作准备,以在德国学习符合美国需要的知识。住在大学附近的少数学生被允许在那里进行最后两年的大学本科学习,但是,整个学校的重点都放在研究生院上。吉尔曼校长经常鼓励学生去了解创造性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对大多数年轻学生来说,只有具有一种创新的和令人振奋的思想,才有可能进行新的有创造性的研究。学生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人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他们从前所受过的教育从来没有使他们想到,他们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幸福的人。因此,新的大学环境是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的,这种经验后来几乎不可能被重复。许多学生感到,他们自己能生活在这种学术环境里是极大的幸福。当时,专题讨论会在美国大学中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却是学术生活的中心。有时,吉尔曼校长在他的热情演讲中,也谈到了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在学术上和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历史和政治科学系的教授赫伯特·亚当斯^②非常赞同吉尔曼校长的这种说法。在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杜威曾把历史和政治科学系作为他的“选修科”。学生相互之间很少亲密地交

^① 吉尔曼(Daniel Gilman, 1831—1908),美国教育家。1875年,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该大学提供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模式,获得了国际声望。

^② 赫伯特·B·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 1850—1901),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是美国历史学会的创建者之一,并担任该学会的秘书,一直到1900年。1882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历史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往,也不经常与教师接触。在约翰·杜威的亲密朋友中,除了他哥哥戴维斯外,还有康涅狄格州的耶格^①,后来他是波多黎各的总督;阿瑟·基姆鲍尔^②,曾是杜威的室友,后来他是阿默斯特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哈里·奥斯本^③,他曾在圣保罗附近的汉姆林学院里教过生物学,杜威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的那一年里经常去拜访他;还有,后来成为生理学家的弗雷德里克·S·李^④,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约瑟夫·贾斯特罗和詹姆士·麦克基姆·卡特尔^⑤。卡特尔不仅是杜威的一位亲密朋友,而且是尽力使得他在1904年从芝加哥大学辞职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介绍人。这样的交往对杜威在教室里和图书馆中所得到的教育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补充。

吉尔曼校长分别会见学生,并友好地给予他们鼓励和建议。他不赞成专门从事哲学研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回忆起自己在大学时学哲学的情况,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哲学研究很少能提供教学职位。当时,美国多数大学是由牧师讲授哲学科目的。吉尔曼建议杜威转到其他一些学术领域去,但这并不能使这位满怀热情和崭露头角的哲学家从自己的道路上转过来。吉尔曼并没有因为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不再友好地关心杜威。当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时,这位优秀的校长对杜威的孤僻和书生气进行了告诫,还提供了一笔贷款使杜威能够在欧洲继续自己的学业。

在杜威主修的哲学系里,密执安大学的乔治·S·莫里斯^⑥教了第一学期,然后由G·斯坦利·霍尔^⑦博士教第二学期。霍尔当时刚结束在德国的长期学习回国。与这两个人的交往,特别是与莫里斯教授的交往,在杜威心

① 耶格(Arthur Yager,1857—1941),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的亲密朋友,后来担任波多黎各的总督(1913—1921)。

② 基姆鲍尔(Arthur Lalanne Kimball,1856—1922),美国物理学家。

③ 奥斯本(Harry Osborn),杜威的亲密朋友,后来是汉姆林学院生物学教授。

④ 弗雷德里克·S·李(Frederic Schiller Lee,1859—1939),美国生理学家。

⑤ 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1863—1944),美国心理学家。1888年,任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教授。1900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美国心理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心理学将近30年。1895年,任美国心理学会第一任会长。1929年,当选为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

⑥ 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1840—1889),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

⑦ 霍尔(Grany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心理学最有影响的前驱者之一。1881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1887年,创办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刊物《美国心理学杂志》。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里斯是美国少数不是由牧师担任的哲学教师中的一位,他曾把尤伯威格(Ueberweg)的《哲学史》翻译成英文。在他的全部教学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丰富的背景。作为一个在学术上具有巨大热情的人,莫里斯在教学工作中不仅表现出学术上的理解力,而且也表现出感情上的忠诚。有一个时期,他竭力反对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教育上的宗教传统,并在学术上成为穆勒^①、贝恩等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信徒。在德国,莫里斯曾受到了特伦德伦伯格^②的影响,对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过综合,多少有点像在华莱士^③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里所描述的模式。他也曾与爱德华·凯尔德^④等当代牛津大学的黑格尔主义者通信联系。

在《现代美国哲学》第二卷里刊载的题为《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的论文中,杜威叙述了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吸引力,以及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毫无疑问,他的老师莫里斯那异常的、容易感受到的纯洁以及满腔热情和专心致志的个性对此起了作用,但是,只有记住这位学生的新英格兰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吸引力的影响。杜威名义上承认在他自己成长中曾受过的宗教教育,早年在柏灵顿还加入过怀特街的公理会。他试图相信这个教会的教义,但并没有意识到这需要他的努力;然而他的信仰不是虔诚的,因为这一信仰还不能充分满足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正如莫里斯所说的,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杜威在青年时期得到了感情和智力的融合;他曾依靠童年时代的宗教经验去追求这种融合,但没有成功。在这篇论文中,杜威提到了他“与黑格尔的结识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下面就是他对这种痕迹情况的陈述。

“在个人精神生活的形成中,每个人都依赖于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客

① 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② 特伦德伦伯格(Trien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 1802—1872),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1933年,任柏林大学教授。

③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自然选择学说创立者之一。

④ 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 1835—1908),英国哲学家。英国最有影响的德国理念论的阐述者之一。

观精神’，即文化制度思想。这种思想也带有孔德、孔多塞^①和培根^②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中曾出现的一种绝对精神，即形而上学思想已退了去，而通过文化环境对个人的观念、信仰和学术态度的形成起作用的思想，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着。在形成我关于现成智力在心理学和哲学两方面具有共同设想的信念中，它是一种因素。这种现成智力作为一个没有经验主义支持的客体，是与物质世界相对的。在形成我关于最合理的心理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信念中，它也是一种因素。这种心理学不同于对行为的生物学描述。就更加专门的哲学问题而言，在我早期的辩证法信念被怀疑论所取代之后，黑格尔学派所强调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思想，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我继续产生影响。一直到我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在与黑格尔《逻辑学》的专题讨论会的联系中，我试图用‘重新调整’和‘重新改造’的术语来解释黑格尔的思想范畴。最后，当我完全从黑格尔学派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我逐渐认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述黑格尔的这些原理。”

莫里斯教授的影响是杜威后来对逻辑学理论感兴趣的一个根源。莫里斯热衷于把自己认为跟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有联系的“实证”逻辑与他自己所具有一些肤浅观点的形式逻辑进行对照。杜威在安阿伯与莫里斯交往的那些日子里，形成了一种具有媒介物的逻辑学思想。这种逻辑学既不纯粹是形式的，也不是事物内在结构“真理”的逻辑学，而是通过所得到的知识而进行的那种过程的逻辑学。对穆勒来说，他的逻辑学似乎是在这个方面的一种努力，但是，由于穆勒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感觉论和以单一因素阐明社会复杂现象的心理学，这种努力受到了阻碍并偏离了方向。在缪尔海德的^③《哲学丛书》的前几卷中，曾预告“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博士的《工具逻辑学原理》一书”即将出版。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这种思想的重复，也许能在杜威后来的“工具主义”中找到。当时杜威所列的书名，意味着这是一种思维理论，这种思维理论可作为获得知识的方法或工具，它与宇宙结构

① 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 1743—1794),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②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国哲学家。

③ 缪尔海德(James Fullarton Muirhead, 1853—1934), 编辑。德国人，曾在英国和美国居住过。

真理的理论或“实证”逻辑是有区别的。杜威感到，他的主体思想的发展使他完全离开了与“实证”逻辑有联系的学说，而去研究一些有关经验的问题以及知识与经验的关系问题，这种研究占据了杜威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从各方面来看，与莫里斯的交往对杜威的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莫里斯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回密执安大学时，他把大学本科班第二学期的哲学史课程让给攻读博士学位的杜威去教。这使得杜威在其他人的面前有了自信心，因为直到那时杜威仅仅在写作方面感到有信心。第二年，莫里斯对杜威能够得到一笔奖学金也是有影响的，这使得杜威能够继续学习而不增加自己的债务。1884年的夏天，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结束后，又同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一样，面临着寻找工作的困难。这种情况使得这位新博士开始怀疑他的职业选择是否明智。当莫里斯写信给杜威给他提供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哲学讲师的职位时，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年薪900美元。

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B·安吉尔^①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佛蒙特大学的巴克汉姆。这时，安吉尔正在尽力建设一所著名州立大学，以便能够在州立大学中确立领导地位，并取得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对在他领导之下的所有教师来说，安吉尔校长仍是一位典型的大学校长，但又是一个努力提高学校水平的人。他给师生提供了一种真正民主的环境，并提倡创造性教育所必需的自由权利和个人责任感。他个人的魅力与和蔼形成了一种对新教师和学生普遍友好的气氛，一些教授甚至坚持拜访年轻的讲师。讲师参加每周一次的教师会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有教育意义的过程。这所大学也自然地成为实行男女同校教育的州立教育系统的楷模。这些实际情况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开始形成了以后构成他教育理论的思想链条。虽然杜威童年时代的环境不是以工业和财政上的真正民主为标志的，但是，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民主信念。这使杜威意识到，要把这种信念作为他的许多哲学著作的基础。

杜威在安阿伯的第一个冬天，他与另一位新讲师霍默·金斯莱(Homer Kingsley)住在一幢供膳的寄宿公寓里，有两位“女学生”也住在这个公寓里。

^① 詹姆斯·B·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 1829—1916)，美国教育家。在密执安大学，他第一次开设了“教学艺术和科学讲座”，并制定了评价中学课程和教学工作的计划。

她们中的一位叫艾丽丝·奇普曼^①，比年轻的哲学讲师杜威大几个月。两年以后，即1886年7月，她与杜威结了婚。奇普曼是密执安州本地人，曾教过几年书，以便挣钱完成自己的学业。与杜威的家庭背景一样，她的家庭背景也具有拓荒者的渊源。奇普曼的父亲是一位细木工，童年的时候从佛蒙特州搬到了密执安州。奇普曼和她的妹妹埃丝特(Esther)很早就成了孤儿，由她们的外祖父母弗雷德里克·里格斯(Frederick Riggs)和伊娃林娜·里格斯(Evalina Riggs)抚养长大。里格斯先生是作为赫德森海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的代理商，从纽约州北部来到了这个州的。作为非常早的一批移居者之一，他曾勘测了穿过这个州北部的第一条公路，管理过印第安人的商业邮政，后来又在荒地里从事过农业。在这个家庭里，对拓荒时代的记忆是牢固的，并认为冒险精神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艾丽丝和埃丝特这两个外孙女，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当外祖父里格斯作为毛皮商被介绍到印第安人奇普瓦部落时，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所以印第安人凭他的说话声音简直不能说他是白人。在里格斯的一生中，一些印第安人经常去拜访他。他是恢复他们逐渐消失的权的支持者。他是民主党党员。民主党厌恶战争，对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抱有反感。他是易激动的持异议者，反对既定的惯例；他也是位自由思想家，捐款资助自己家乡芬顿所有教堂的建设；他又是个战争反对者，曾充分利用他的积蓄为应征入伍的朋友和亲戚购买替代人。里格斯患有气喘病，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气候环境，他曾在美国新西部住了几年，其中一段时间住在道奇城。在那里，他担任过一个志愿者法庭的法官。这个法庭曾将一个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边疆居民判处死刑。在其他的冒险行动中，里格斯在科罗拉多州发现了一个金矿，但它因离任何的居民点都太远而无利可图。里格斯的丰富经验，以及灵敏和创造性的精神，大大地补偿了他的学校教育的不足。“总有一天，这些事情将被发现，不仅发现而且能认识它们。”里格斯的这段话，多次被杜威所引用。由于家庭财力的限制，里格斯的外孙女在实现她们的抱负目标时，虽然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影响，但在物质上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帮助。这是因为外祖父母在家里使她们激进的个性能够付诸实际，并把她们的训练主要限于“做任何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对没有经

^① 艾丽丝·奇普曼(Alice Chipman, 1860—1927)，杜威的第一个妻子。曾是密执安大学的学生，后成为专业教育工作者。

验的人来说,这未必是适宜的,但这种训练肯定极大地培养了艾丽丝·奇普曼在学术上的独立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对来自保守的柏灵顿的杜威来说,奇普曼的影响是起激励和振奋作用的。奇普曼具有她外祖父母所信奉的品质,但没有他们的信仰模式,而且增加了一种要求受教育以扩大自己的眼界的强烈愿望。她具有揭穿环境本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卓越才华,把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活力结合起来的灵敏性,以及努力促进个人智力完善的精神,并对所有与她交往的那些人表现出少有的慷慨行为。通过她的外祖父母,奇普曼认识到,对社会环境和不公正行为需要具有一种批判态度。毫无疑问,主要是奇普曼促使了杜威早期的哲学兴趣的扩大,即从评论的和古典的领域扩大到现代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是,杜威通过与她的接触,使以前的一些理论问题获得了对人来说必不可少的和直接的意义。杜威把在所谓情境和人的“直觉”判断中所获得的能力都归功于她。奇普曼具有浓厚的宗教本性,但她从来不接受任何教会的教义。她的丈夫杜威从她那里得到了一种信念,即一种宗教信仰是在自然经验中固有的,神学和教会制度已经僵化,因此不要去提倡它。

杜威在安阿伯与莫里斯交往的那些年里,他的哲学观点最接近德国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时期,是德国人对英国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许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哲学著作对传统的英国哲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些哲学著作求助于德国思想,以便通过一种论述“有机体”关系的哲学,来抵消极端的英国个人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曾对宗教及社会生活和理论的所有方面起着分裂和瓦解的作用。从黑格尔学派的观点来说,爱德华·凯尔德对康德^①的批判性评注修改了康德哲学。凯尔德将否定论学说巧妙地 from 黑格尔学派辩证法的纠缠下解放出来,对杜威的影响特别大。杜威以前是通过格林^②对洛克^③和休谟^④的批判以及格林的《伦理学导论》一书而受到影响的。而杜威在《心理》杂志上的两篇论文和他的《心理学》的一部分,则表明了杜威在这时的观点。除了“工具”逻辑学的作用外,有两种更大的影响逐渐削弱了在杜威头

①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② 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英国哲学家。

③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④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思想的基础。第一种影响是,当杜威被分配教伦理学课程时,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地曾出版了杜威写的2本小册子,供学生使用。它们表明了杜威的观点中因伦理学研究而引起的持续变化。其中,第一本名为《批判的伦理学理论要点》,出版于1891年。它表明了杜威对智慧在具体的人类行动(个人的和社会的)方向中的作用的看法。这与理性在制定行动方案时的一劳永逸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而这种行动方案,是根据理性主义者的理论来陈述的。第二本名为《伦理学研究提纲》,发表于1894年,当时第一本小册子已经卖完。杜威认为,就人们行为的结果而论,智慧是自然冲动的“媒介”。第二本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思想而写成的。这种思想包含了杜威后来的“工具”实用主义的萌芽,与把心理看成一成不变的唯心论观点是不能调和的。

第二种影响是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影响已经在《伦理学研究提纲》的基本思想中看到了。G·斯坦利·霍尔关于心理学论题(实验的和理论的)的海阔天空的讲课,使杜威得到了这样的信念,即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是一种必须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实验推翻了原来与哲学关系的比较陈旧的“理性”心理学,可能有助于形成新的心理学与哲学联合的趋势。这就使杜威的学术活动范围在更大程度上超出了他所认识到的范围。当然,伦理学研究需要有心理学基础。威廉·詹姆士^①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在改变杜威哲学思想的方向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在杜威的第二本伦理学小册子提纲中,明显地突出了心理学的探讨,可能要归功于詹姆士的这本书,詹姆士的这本书是在杜威写完第一本小册子后不久出版的。

詹姆士对杜威认知理论的影响,不是通过在杜威理论已经形成之后出版的《实用主义》一书施加的,而是通过《心理学原理》中的一些论述概念、区别、比较和推论的章节施加的。杜威经常向学生推荐该书的这些章节。这是因为对实用主义认知理论要素的介绍来说,它们比《实用主义》一书更好。詹姆士对杜威的影响,可以从前面曾提及的杜威的自传性提纲^②中了解到在詹姆

^① 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② 即杜威的《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

士的《心理学原理》中存在着两种未取得一致的论调,其中一种源于作为“意识”理论的传统心理学观点,另一种源于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更加客观的心理学理论。关于后者,杜威曾这样写道:“这种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越来越进入了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这个时期,人们正在讨论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杜威也不是很清楚,以致后来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他正在放弃的一些思想,而使他的言论受到了歪曲。这导致了对杜威哲学的一些曲解。对一种建立在最近确立的或者不完全被接受的知识基础上的理论来说,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了其他人比杜威自己赋予这种哲学更加“主观的”含义。1916年,在重版1901年所写的逻辑学论文时,杜威说,虽然他们的心理学文章写于使用那种表达方式之前,但这些文章“是从现在被称为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而写成的”。

当杜威接受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在密执安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断了一年。就在那一年,杜威所尊敬的老师莫里斯教授去世了,于是他又受邀请重新回到安阿伯,主持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工作。在杜威中断密执安大学工作期间,接替他职位的温利^①教授曾写过一本莫里斯传记。那是一个关于美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有价值的文献。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温利重复了杜威在莫里斯去世后所写的一段话。那段话论述了杜威从他的老师和同事莫里斯那里所得到的一切,可能比这里更为详细。在杜威的一生中,无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专业方面,莫里斯的去世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莫里斯一家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了这位年轻的讲师,后来他的妻子也住了进去。与仁慈和好客的莫里斯一家的交往,是杜威社会生活的焦点。

杜威夫妇给他们1893年出生在安阿伯的第三个孩子取名为莫里斯。这个孩子在智力上好像是他们6个子女中最高的,并具有一种与内在的成熟结合起来的特别吸引人的气质。2岁半时,莫里斯因患白喉症而在意大利米兰去世。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杜威夫妇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恢复过来。在去英国的旅途中,与他们同船的一个旅伴在旅途的最后一天说:“假如那个男孩长大的话,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新的宗教。”这句夸张的话,表达了小莫里斯给其他人所留下的印象,以及人们通过他的家庭而体验到的小莫里斯的气

^① 温利(Robert Mark Wenley, 1861—1929),美国教育家。曾任密执安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主任。著有《莫里斯的生平与著作》(1917)。

质。杜威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霍夫^①担任了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当杜威从明尼苏达大学回到密执安大学时,霍夫则被聘请到明尼苏达大学去任教。于是,詹姆士·海顿·塔夫茨^②被聘请去接替霍夫原来在密执安大学的职位。塔夫茨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位毕业生,曾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他通过翻译文德尔班^③的《哲学史》而确立了他自己的学术地位。祖籍新英格兰的塔夫茨那纯朴和粗犷的性格,就如那里的山脉一样。在他呆在安阿伯的短暂时间里,他与杜威在生活上和学术上建立了友谊,并持续了好多年。在芝加哥大学刚开办时,塔夫茨接受了那里的一个职位,这也导致了杜威在1894年时被聘请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合作,在1908年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中结出了果实。该书1932年的新版,就是他们在学术上继续联系的一个证明。这里无须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在塔夫茨离开密执安大学时,需要补充两位哲学教师,以照管日益增多的学生。艾尔弗雷德·H·劳埃德^④和乔治·H·米德^⑤被选上了,他们俩都在哈佛大学念过书。米德还没有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从柏林被聘请来了;而劳埃德则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与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家庭在生活上和学术上的交往,对杜威一家的帮助极大。劳埃德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在用一种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识方面也是颇有才华的,因此,不能确定他属于某一个哲学流派。这可能限制了劳埃德著作的影响,但却加强了他对同事和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激发力。劳埃德那坦率直爽的性格,与他学术上的才华,为他本人在全体教师中占据了一个杰出的地位。在劳埃德去世时,他已经担任了多年的研究生院院长。

在安阿伯时,米德一家与杜威一家是隔壁邻居。搬到芝加哥之后,他们

① 霍夫(Willston Samuel Hough,1860—1912),美国教育家,曾在密执安、明尼苏达等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

② 塔夫茨(James Hayden Tufts,1862—1942),美国大学教授,曾在密执安、芝加哥等大学任教。他曾与杜威合著了《伦理学》(1908)。

③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史家、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曾在苏黎世、弗赖堡、斯特拉斯和海德尔堡等大学任教授。著有《哲学史》(1892)。

④ 劳埃德(Alfred Henry Lloyd,1864—1927),美国大学教授。1894—1925年,在密执安大学任教。

⑤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和现实主义发展两方面,他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杜威有很大的影响。

两家又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两家稍大一些的孩子年龄又差不多。因此，杜威和米德两家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杜威一家曾参观了米德夫人在檀香山出生的城堡式住宅。甚至在杜威一家搬到纽约之后，米德一家仍然是杜威一家最亲密的朋友，一直到米德去世。

因为米德一生中出版的著作不多，所以，他对杜威的影响是通过他们持续了好多年的交谈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往往被低估了。1931年，在米德的葬礼仪式上，杜威说米德具有一流学者的创新精神。这也是怀特海^①在读了米德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之后所公开表示赞同的一种观点。米德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比杜威的学术成就更大。在与杜威交往的那些年里，米德的主要兴趣是在与科学心理学有关的生物学理论上。直到那时，注意到心理现象与人体之间关系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仅仅发现了大脑中的心理物质基础，或者说最多发现了神经系统中的心理物质基础。而这种神经系统是与整个有机体相脱离的，因而也就脱离了有机体与它的环境的关系。相反地，米德是从有机体在环境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出发的。按照这种观点，包括大脑在内的神经系统是一种器官，以调节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与客观的生活环境的关系。于是，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描述包括思维和认知过程在内的心理现象。米德提出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理论，这是在以前确认的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遭到破坏，而新的关系还没有被建立时所出现的陈述；同时，又是一种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本性起源和性质的理论。杜威并没有试图发展这些专门思想，但是，他从米德那里接受了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他后来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米德的影响与詹姆士的影响在杜威身上是同时并存的。米德不断地重复提出他的思想，但他的大部分著作仅仅在他去世后才得到出版。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在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开设了卡鲁斯^②讲座，但是，他没有能写好预备出版的草稿。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对他的手稿以及由他的学生记录的讲演笔记进行了编辑工作，出版了四卷本的《米德文集》。米德的一位研究生在他去世后说过，多

①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他的教育哲学在英国较大的影响。1924年，担任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② 卡鲁斯(Paul Carus, 1852—1919)，美国教育家、哲学家和编辑。

年来,一流作家乔治·米德的论文和书籍不断地得到了出版。

约翰·杜威在密执安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父母与他住在一起。每当他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背叛共和党而感到痛心时,在他的头脑里就想到了要维持家庭的融洽气氛,而他的母亲则因孩子们背离了童年时代的宗教教义而感到伤心。但是,他们俩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充分相信孩子们会保持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两个坚固的链环使密执安大学与州立学校系统联结了起来,并成为州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第一个链环是,在密执安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个教育学讲座。它最初由佩恩^①主持,然后由欣斯戴尔^②主持。一些大学教师还访问了州里的中学,并作中学生如何为大学学习做准备的报告。杜威对普通教育的兴趣,就是通过他对中学的访问而激发起来的。第二个链环是,密执安州教师俱乐部(Schoolmaster Club of Michican)打算通过它的讨论会和委员会,把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杜威曾是这个教师俱乐部的成员。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使他对学习过程进行了研究。杜威在安阿伯的最后几年里,经常在一些教师讲座和教师大会上演讲这样的题目,例如,“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所有的题目都涉及教学和学习。这时,杜威有3个孩子,即生于1887年的弗雷德里克·阿奇博尔德(Frederick Archibald)、1890年生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伊夫琳(Evelyn)和1893年生于安阿伯的莫里斯(Morris)。杜威对自己孩子的观察,加深了他从詹姆士那里得来的天赋倾向重要性的认识,并使他十分重视儿童早期的适当发展。杜威出版了两本供教师训练所使用的书,多伦多大学麦克莱伦(McLellan)教授写了这两本书的实际应用部分。杜威在哲学的社会作用方面的信念,由于一种对抽象推理不满的情绪而得到了加强,并使他感到有必要用实际经验去正确地检验和发展推理思想。杜威逐渐认识到,现在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小学的教育方法,是与儿童正常发展的心理学原理不相协调的。这激起了他创办一所实验学校的愿望。在他看来,实验学校应该把学习心理学的原理与他本人道德研究中的合作交往原理结合起来;同时,也应该使学生从

^① 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 1836—1907),美国教育家。1879年,担任密执安大学教育学教授。1888年,担任皮博迪师范学校校长。1901年,又回到密执安大学任教。

^② 欣斯戴尔(Burke Aaron Hinsdale, 1837—1900),美国大学教授、学院院长。1888年,在密执安大学任教。

杜威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感到的乏味无趣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在学校的直接教育经验中,哲学应该得到它的社会应用,并受到检验。

1894年,杜威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个系里包括了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几年以后,他发现,一批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不同于芝加哥城其他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由于家长们在精神和财力上的支持,在杜威担任系主任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倡导之下,创办了一所初等学校。后来,它被命名为“实验学校”(The Laboratory School),一般以“杜威学校”(Dewey School)著称。大学部允许给这所学校教师的子女免除100美元的学费,除此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在这所学校所存在的7年半时间里,一些朋友和赞助人对它的支持超过了大学部。

这所学校不是今天的实习学校(practice school)或进步学校(progressive school)。它与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关系,是进行自然科学科目的教学实验。这所学校的教师梅休(Katherine Camp Mayhew)和爱德华兹(Anna Camp Edwards)曾全面和有权权威性地论述了杜威学校的工作^①,这里就不作详细叙述了。

在杜威的著作中,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是《学校与社会》,已被译成12种欧洲和东方的语言。这本书是由为实验学校筹集资金而作的一些演讲组成的。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和霍顿·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分别出版的2本教育专题论文集,是这所实验学校工作以及与伊利诺斯州的一些教育家协作的共同成果。杜威在《现代美国哲学》中说,总的看来,在他从唯心主义转到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之后,个人交往对他的思想倾向的影响超过了他读过的那些书本的影响。在芝加哥时建立起来的许多重要的交往中,也包括了通过这所实验学校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交往。可以说,这些年来不同教育思想流派的友好论战,标志着批判美国教育制度的进步教育运动的开始。后来担任芝加哥库克县师范

^① 指凯瑟琳·C·梅休和安娜·C·爱德华兹合著的《杜威学校》(Dewey School, 1936)。——原编者注

学校校长的弗兰西斯·W·帕克^①通过他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工作,表明了公立学校中一个新的教育运动^②的开始。在建立儿童研究协会的过程中,帕克也是积极的。此时,在德国与赖因^③一起工作过的德加莫^④和麦克默里兄弟^⑤,也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方法介绍到了美国。哈里斯是一种教育哲学的积极提倡者。这种带有明显的独创性的教育哲学,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

一种更加密切的个人交往,是杜威与埃拉·弗拉格·杨^⑥的友谊。在杜威呆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杨是城市学校系统中的一位学区督学。杜威把那些年在教育工作中的最大影响归功于杨和他自己的妻子。他把杨女士看作是在学校管理工作上最有见识的人,并利用一些方式与她交往。杨开始是一位级任老师,通过中学的教学工作为自己铺平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道路。她是担任美国大城市学校系统中督学职务的第一个妇女,也是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第一任妇女主席。杨经常思考她的实际经验的含义。她重视个人身上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即道德上的个性和智力上的个性,并通过她自己的经验发展成为一种坚决要求教师考虑学生心理过程完整性的主张,以及一种坚决反对学校管理工作脱离上述思想的主张。这些主张对学校教育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在芝加哥,然后扩大到整个美国。与杨的交往,补充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所缺乏的实际管理方面的经验,并使杜威的民主思想在学校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具体化。

杜威对赫尔社区(Hull House)的兴趣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所以有这种影响,是因为杜威居住在芝加哥,而不是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

① 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 1837—1902),美国教育家。美国“进步教育”的最早提倡者,被称为“进步教育之父”。

② 在美国教育史上,该教育运动一般称为“昆西运动”。

③ 赖因(Wilhelm Rein, 1847—1929),德国教育家。1885—1923年,任耶拿大学教育学教授。曾与德国的齐勒尔(Tuiskon Ziller, 1817—1882)一起,把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的四个教学阶段扩充为五个教学步骤,以“五段教学法”闻名。

④ 德加莫(Charles DeGarmo, 1849—1934),美国教育家。他是赫尔巴特教育哲学的一个拥护者,并把它介绍到美国。曾担任美国赫尔巴特学会第一任主席。

⑤ 麦克默里兄弟(McMurrays),指查理·亚历山大·麦克默里(Charles Alexander McMurry, 1857—1929)和弗兰克·麦克默里(Franke McMurry, 1962—1936),美国教育家。

⑥ 埃拉·F·杨(Ella Flagg Young, 1845—1918),美国教育家。曾在杜威指导下进行研究。190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进步教育运动和社会活动中,杨很活跃。曾担任过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第一任妇女主席(1910—1911)。

所拥有的专业职位。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说,赫尔社区是一个新的社区。在那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具有各种信念和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区。杜威夫妇经常到那里去访问,并与那里的居民,特别是与简·亚当斯^①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杜威夫妇感到,与那里的许多类型的人交往,是他们业余生活中最有趣味的和最具有激励作用的部分。亚当斯小姐深信,通过赫尔社区而建立的交往,不仅对社区周围比较贫穷的居民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出生于经济状况和教育机会上具有更多特权家庭的那些人来说也是重要的。简·亚当斯认为,在那里不存在“设想另外一半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仅仅存在着共同学习怎样在一起生活的问题。她特别强调,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真正有道德的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手段。在必须把“设想另外一半人的生活方式”具体化的时候,杜威成了这个社区的一个理事。但这是简·亚当斯长期以来尽可能要避免的一步,因为她担心这会使社区的生活僵化。由于赫尔社区和简·亚当斯的缘故,杜威那作为教育指导力量的民主信念具有更加激烈和更加深刻的含意。

杜威离开芝加哥时,他与简·亚当斯的亲密交往中断了,但是,他们在相互尊重和影响方面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在战争^②时期,亚当斯小姐仍没有背叛她那公谊会^③教徒的经历和托尔斯泰主义者(Tolstoyan)的不抵抗政策。在战争初期,这样做对她很有帮助。因为当时赫尔社区曾是敌对行动的对象,她自己也是遭受人身侮辱的对象。但杜威则认为,美国应该参战。这个分歧是他们俩感情上产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但是,他们后来的关系仍然是真诚的。1929年,在纽约城举行的杜威70岁诞辰庆祝会上,简·亚当斯曾致词祝贺。前不久,杜威曾在赫尔社区召开的赫尔社区周年纪念庆祝会上发过言。在简·亚当斯去世后,杜威又在纽约附近举行的简·亚当斯追悼会上讲过话。简·亚当斯的去世,结束了她所处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女子的个人生涯。杜威热情支持一切扩大妇女活动自由的事业。他把这种热情大部分归功于他对自己妻子、埃拉·弗拉格·杨和简·亚当斯的性格与智慧的认识。

① 简·亚当斯(Jane Addams, 1860—1935),美国社会活动家。曾建立芝加哥社会福利中心,以赫尔社区闻名。1931年,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 公谊会,亦称“贵格会”或“教友派”。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

在芝加哥的那些年里,杜威曾到阿迪龙达克山区度假。当杜威还在安阿伯时的一个夏天,他全家参加了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在赫雷凯恩山山脚下的格莱莫尔举办的野营和暑期班。实际上,它是康德哲学学校的一个后继者。第二年夏天,在离戴维森的房产不远的地方,杜威家盖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多年来,他们都在那里避暑。他们的房产与格莱莫尔被一条名叫海湾溪的小河隔开,这条小河很深。戴维森说,杜威家之所以选定在“海湾的另一边”生活,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他把暑期班专门用来对那些参加者反复灌输道德原理的计划。戴维森是一个卓越的、博学的和很有主见的人。威廉·詹姆士曾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对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纪念。所有接近过戴维森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冬天,戴维森住在纽约城里。在那里,他把一些没有智力训练机会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并通过他的教学、鼓励和经济上的资助,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了职业生涯。

在赫雷凯恩,杜威与一些具有进取精神的学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哈里斯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耶鲁大学的贝克韦尔^①、哥伦比亚大学的希斯勒普^②和琼斯^③是定期的访问者;史密斯学院的加德纳^④也常常去那里;菲利克斯·阿德勒^⑤是肯尼村另一端的一位避暑者,偶然也访问那里,威廉·詹姆士几乎每年夏天都在那里住一些日子。杜威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詹姆士,詹姆士对杜威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密执安大学校长安吉尔的儿子、杜威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詹姆斯·R·安吉尔^⑥,也经常住在格莱莫尔。

约翰·杜威被聘请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

① 贝克韦尔(Charles Montague Backwell, 1857—1957),美国前国会议员,教育家。曾在加利福尼亚、耶鲁等大学担任哲学教授。1910年,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② 希斯勒普(James Hervey Hyslop, 1854—1920),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895—1902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

③ 琼斯(Adam Leroy Jones, 1873—1934),美国大学哲学教授。曾担任过纽约州考试委员会的成员。

④ 加德纳(Harry Norman Gardiner, 1855—1927),美国学院教授。曾在阿默斯特、史密斯等学院担任哲学教授。

⑤ 阿德勒(Felix Adler, 1851—1933),美国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和作家。他是伦理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并于1876年在纽约创立了伦理文化协会。1902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教授。他在纽约还创立了儿童研究协会,还担任过美国的全国儿童劳动委员会主席(1904—1921)。

⑥ 詹姆斯·R·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 1869—1949),美国心理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创立机能心理学派。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和耶鲁大学校长。

不仅是对他在美国哲学界中已经确立的地位的承认,而且使他以前的教学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密执安大学时,他教的班级大部分是大学本科生;而在芝加哥大学,他从事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这种变化是由于杜威个人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他不仅从许多班级的大量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而且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与一些能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生一起实现自己的计划。全校范围内对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更大重视,导致了对全体教师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刺激。杜威发现他自己处在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环境之中,被由著名人士组成的教授会包围着。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里最亲密和最有影响的交往,是与从密执安大学来的米德和塔夫茨的继续交往。但是,还应该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阿迪生·穆尔^①,他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哲学研究生,后来留在那个系担任教师。他是教师中最有进取心的实用主义者,由于不断患病而过早地去世,妨碍了对他能力的全面认识。另一个是詹姆斯·R·安吉尔。他是心理学教师,以前是密执安大学的本科生,曾在杜威的指导下学习。毕业后,他进了哈佛大学,在詹姆斯·罗伊斯^②和那里一批卓越的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他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尽管那时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验学科,而不再是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门学科的联系还是比现在所想象的更加紧密。这是在詹姆斯·R·安吉尔的老师詹姆斯·罗伊斯的生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一个事实。在机能心理学的发展中,詹姆斯·R·安吉尔成为最活跃的人之一。机能心理学主要是与以康乃尔大学铁钦纳^③为代表的分析学派相对立的。在杜威的逻辑学理论发展中,以及在他的逻辑学理论和道德理论的联系中,机能心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杜威曾在三个冬季学期里分别开设课程,名为“心理伦理学”、“伦理逻辑学”和“社会伦理学”。“心理伦理学”是他在安阿伯出版的《学习》一书中所阐

① 穆尔(Addison Wedster Moore, 1866—1930),美国大学哲学教授。189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1918年,在哈佛大学讲授哲学。1911年,任美国西部诸州哲学协会主席。1917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② 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美国哲学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与威廉·詹姆斯长期共事。

③ 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 1867—1927),英籍美国心理学家。1893年,他从英国到美国,在康乃尔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35年。

述的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它发展了用冲动、习惯、愿望、情感和想象等相互作用的词句来表达的道德理论。这门课程的资料为他许多年以后出版的《人性与行为》一书奠定了基础。“伦理逻辑学”这门课程对目的、标准、原则和职责等范畴进行了分析,并按照解决实际问题的特殊作用来进行分析。这种实际问题是因为不一致的愿望和目的的冲突而产生的。杜威也经常组织已取得申请博士学位资格者的专题讨论会,把一些逻辑学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由于一些唯心主义者的理论在当时的威望,于是,布拉德里^①和博赞克特^②的逻辑学著作与穆勒、维伍(Venn)和杰文斯^③的比较古老的逻辑学一起,特别受到了注意。因为洛采^④把经验的和科学的理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所以,使得他的逻辑学成为最少极端的唯心主义逻辑学理论之一,而被选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进行分析。在庆祝芝加哥大学成立十周年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代表所有系科的专题著作。在这些出版物中,有一本是由哲学研究生写的,书名为《逻辑原理研究》,其中包括杜威撰写的对洛采的逻辑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一系列介绍性文章。但即使在有这本书的大学哲学教师中,它也很可能只引起了少数人的注意;同时,它也没有从威廉·詹姆士那里得到热诚的祝贺。詹姆士曾写过评论文章欢呼“芝加哥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赞成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并按照它的方法进行实验。尽管存在着很多敌意者,但这个学派仍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杜威的文章标志着他与自己早期的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的最后和彻底的决裂,并提出了他的反射弧思想的工具主义理论。

这些出版物中的另一本书,是杜威写的专题著作,书名为《道德理论的科学条件》。他第一次采用简略的方式发表,力图阐述科学探究和道德判断统一的逻辑学原理。虽然这本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一直没有重版,但在研究杜威思想的发展中,它标志了杜威见解的一种决定性变化。

① 布拉德里(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英国哲学家。著有《伦理学研究》(1876)、《逻辑学原理》(1883)等。

② 博赞克特(Bernerd Bosanquet, 1848—1923),英国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他最早的著作《知识与现实》(1885)和《逻辑学》,表现出了德国哲学家洛采的影响。

③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④ 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德国哲学家。在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 20 世纪理念论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杜威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我们怎样思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芝加哥实验的直接成果。他的工作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促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两本著作中融合了起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书中，杜威阐述了哲学本身是“教育的一般理论”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把教育扩大到包括用来构成社会的个人气质、情感、智力和活力的所有因素。

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杜威与芝加哥大学校长^①之间在有关实验学校行政管理问题上的摩擦日益增加。当时，芝加哥学院是训练教师的一所师范学校，并附有一所招收儿童的实习学校。弗兰西斯·帕克建立这所学院是为了继续他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这种政治影响曾在库克县的教育机构中妨碍了帕克的工作。1901年，这所学院并入了芝加哥大学。因为大学与师范学校在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地位不同，所以，当杜威担任系主任的那个系不承担师资训练工作时，这方面不存在什么争论。但在杜威外出短期讲学时，大学校长竟同意把杜威开办的实验学校和与从前的芝加哥学院（即现在的大学教育学院）有联系的实习学校合并起来。这个决定既没有规定要保持在实验学校中已进行的工作模式，也没有规定要支持那些为克服资金困难而提供热诚服务的教师。当教育学院的理事们了解到，大学部作出的合并实验学校的决定并没有同杜威本人商量过，而且杜威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实验学校实际上被抛弃了，他们便自愿对这个合并的决定进行纠正。因此，对实验学校提供财政支持的那些家长和朋友，组成了活跃的家长与教师联谊会（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这个联谊会在美国可能是第一个。他们强烈抗议抛弃这所实验学校的做法，并提供了一笔保证它继续存在的资金。遍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写信给芝加哥大学当局，表示坚决支持实验学校的工作。这时，弗兰西斯·帕克病得很厉害。这正是使得芝加哥学院被并入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原因。于是，制定了一个暂时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但在它生效时帕克上校去世了。这导致了两所学校的合并，归杜威担任院长的教育学院领导。可是，大学校长对这所没有资助的学校的态度仍是那样的冷淡和不友好，因此，杜威在1904年辞去了职务。他的辞职，引起了教育学教授埃拉·弗拉格·杨的辞职。

^① 即哈珀（William R. Harper, 1856—1906），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初级学院”运动的提倡者。1891年，任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

当杜威辞职的时候,他还没有别的职位可以考虑。在他采取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行动之后,他写信给威廉·詹姆士以及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的J·麦克基姆·卡特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们。经过卡特尔的努力,为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同时每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课2小时,作为增加工资的办法。

杜威一家决定到欧洲去度假。在芝加哥时,杜威夫妇又添了3个孩子,即戈登·奇普曼(Gordon Chipman,以他外公的名字取名)、露西·艾丽丝(Lucy Alice)和简·玛丽(Jane Mary,分别以简·亚当斯和她的亲密朋友玛丽·史密斯的名字取名)。他们带着5个孩子一起去欧洲,但是,不幸再一次伴随着他们的欧洲旅行。在他们所乘的从蒙特利尔到利物浦的船上,戈登患了伤寒病。他在一所医院里经过治疗之后,看上去好像已经痊愈了,但在去爱尔兰的旅途中,他因旧病复发而死去。年仅8岁的戈登曾结交了许多朋友。在6岁时,他已表现出一种成熟的个性,但并不是早熟。当戈登去世的消息传到赫尔社区时,那里举行了一个追悼会,简·亚当斯小姐致了悼词。隔了很久,她的悼词被刊印在一本同类的演说集里。对戈登的慈爱和热情的赞扬出现在戈登最亲近的家庭之外,表明了人们所感受到的损失。戈登的死对杜威夫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她从前的活力。但是,她仍然带着其他孩子到欧洲大陆去学习外国语,并表现出特有的勇气。上一年秋天就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杜威,于6月份与他的家人在意大利威尼斯重新碰头。在意大利逗留时,杜威夫妇收养了萨拜诺(Sabino),这使全家感到非常高兴。^①萨拜诺是一个与病死的戈登年龄差不多大的意大利男孩。他那不知疲倦的快乐和不怕重病的勇气,以及生命的活力和交朋友的能力,使他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惹人喜爱的成员,并给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了安慰。更为有趣的是,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后来继续从事杜威夫妇的初等教育工作,成为进步学校的一位教师。他还是教育仪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这些仪器是供学校中的手工活动和科学实验所使用的。在对一些学校进行访问之后,杜威和他的大女儿伊夫琳一起合写了《明日之学校》,以及另一本论述农村教育的书:《适合旧传统的新学校》。伊夫琳长期与教育实验局(Bureau of Educa-

^① 可参见本书第四编中的《杜威与一个意大利男孩的逸事》。

tional Experiments)合作,拟定教育实验的方法,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和作系统的阐述。后来,她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幼儿发展调查报告。

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新的哲学环境之中。到1905年时,唯实论运动处在哲学的最前线。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运动是以伍德布里奇^①为代表的。伍德布里奇完全是一个古典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也是一位有独创性的和使人受到激励的哲学史教师。他赞同和讲授亚里士多德学派模式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与伍德布里奇的交往,使得杜威认识到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模式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这种形而上学理论模式,不承认依赖于没有以经验为根据而证实的一些原理。杜威这种新的交往的结果,充分反映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此书的内容是杜威最初在由卡鲁斯基金会支持的美国哲学学会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伍德布里奇和杜威都承认多元论。多元论是与绝对论相对的,也是与一种把主体和客体作为它的限定词的认识论相对的。他们俩也同样不相信直觉感知理论。所以,这些观点与一些有着分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使得他们在学术上的联系在杜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915年前那个时期,是一元论者和二元论的唯实论者相互激烈地批判和争论的时期(伍德布里奇因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没有公开参加这场争论),也是唯实论者和唯心论者相互激烈地批判和争论的时期。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詹姆士在那里重复作了关于“实用主义”的讲演。在随后的几年里,詹姆士形成了他的“彻底经验论”(radical empiricism)^②。在包括研究生教学工作在内的新的学术环境中,杜威发现他自己的看法完全跟研究生无关,这促使他对自己的全部哲学观点重新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果可以在《哲学的改造》(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讲演)、《经验与自然》和《确定性的寻求》(1929年在英国爱丁堡所作的由吉福德基金会主持的讲演)中看到。杜威到纽约之后所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是由在各种基金会所作的一些讲演发展而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本书,还有《人性与行为》、《公众和它的问题》、《德国哲学和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

① 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ames Eugene Woodbridge, 1867—1940),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1895—1902年,任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从1902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② “彻底经验论”,认为存在即被经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没有任何物质基础或客观内容的纯粹经验所构成的。

和《作为经验的艺术》等。另外，寄给一些哲学期刊的很多稿件，特别是寄给哥伦比亚大学编辑出版的《哲学杂志》的大量稿件，也记录了杜威多年的哲学主张。

杜威的个人交往很多。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蒙塔古^①，在他的认识论和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浓厚兴趣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元论的唯实论理论。这种感觉和认知的效果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论，即新颖的和很有独创性的物活论^②的基础上的。蒙塔古和杜威在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比在专门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更为接近。他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一直是亲密的。杜威夫人由于长期患动脉硬化和心脏病于1927年病逝。在杜威夫人的葬礼仪式上，蒙塔古是主要的致悼词者。

其他短期或长期影响杜威(包括肯定或批判他的主张)的朋友，有洛弗乔伊^③、托尼(Tawney)、谢尔登^④、哈罗德·查普曼·布朗(Harold Chapman Brown)以及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和附近院校教师的一些学生，布什^⑤、施克乃特(Schnide)、兰达尔(Randall)、埃德曼^⑥、克伯屈^⑦、古德塞尔^⑧、蔡尔兹^⑨、伊斯特曼^⑩、胡克^⑪和拉特纳(Ratner)等。在胡克和拉特纳离开纽约之

① 蒙塔古(William Pepperel Montague, 1873—1953), 美国大学教授。1899—1947年, 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曾到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等国讲学。

② 物活论, 亦称“万物有生论”, 认为自然界所有特体都具有生命、精神活动能力的哲学学说。

③ 洛弗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 1873—1962), 美国历史学家。1910—1938年, 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1916—1917年, 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④ 谢尔登(Charles Monroe Sheldon, 1857—1949), 美国公理会牧师。

⑤ 布什(Wendell T. Bush, 1861—1941), 美国大学教授。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以及《哲学杂志》的编辑。

⑥ 埃德曼(Irwin Edman, 1896—1954), 美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把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结合了起来。1935年, 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1945年, 担任该校哲学系主任。

⑦ 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 1871—1955), 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门徒, 曾提出“设计教学法”。1918—1938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授教育哲学, 与杜威长期共事。

⑧ 古德塞尔(Willystine Goodsell, 1870—1962), 美国大学教授和作家。1905—193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

⑨ 蔡尔兹(John Childs, 1889—1985), 美国作家和编辑。1907—1911年,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⑩ 伊斯特曼(Max Eastman, 1883—1969) 美国作家和编辑。1907—1911年,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⑪ 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曾在杜威、蒙塔古等指导下,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1927年起, 在纽约大学任教; 1934年, 任该校哲学系主任; 1949年, 任该校哲学和心理系主任。

后,杜威仍与他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就像他们在纽约时一样。他们俩都与杜威的出版成果有关系。拉特纳收集和编辑了一本杜威关于当代问题的论文选,并出版了一本杜威的哲学著作选,书名为《现代世界中的智慧》,采用一篇叙述性的介绍作为该书的前言。在杜威所有新书出版之前,胡克通读了这些原稿,并提出一些有助于修改的建议。

大约在1915年时,宾夕法尼亚州莫里昂的阿伯特·C·巴恩斯^①博士,由于他的思想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相似,所以参加了杜威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他们在这个讨论会上相识,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巴恩斯是位科学家和学者,他因精心收藏现代绘画而非常出名。他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能够为艺术教育服务,并对艺术教育的方法感兴趣。他的个人经验发展了有辨别力的观察方法。通过这种观察方法,一般能得出对艺术作品和经验的一种更加深刻的鉴赏。与巴恩斯基金会的联系,给杜威以前有点零乱的艺术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形式。巴恩斯把他写的《绘画艺术》一书献给杜威,杜威则把自己的《作为经验的艺术》一书献给巴恩斯。这两本书是他们在学术上合作的证明。

纽约城有一个哲学俱乐部。俱乐部的12至18位成员大多来自纽约的一些院校,最远的来自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多年来,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在这个俱乐部里,彼此之间进行直率的批评,但要把在彼此批评中所阐述的各种哲学观点归纳起来,那是困难的。在俱乐部里,杜威与一些具有激励作用的人进行了交往。例如,联邦神学院的麦克吉法特^②、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亚当斯·布朗^③和利曼(Lyman);伦理文化协会(Ethical Culture Society)的菲利克斯·艾德勒;建筑师、有关美学与心理学的作者亨利·

① 巴恩斯(Albert Coombs Barnes, 1872—1951),美国药品制造商。192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莫里昂创立了“巴恩斯基金会”,资助艺术欣赏教育。1926年,杜威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② 麦克吉法特(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1861—1933),美国神学家。1917—1926年,担任联邦神学院院长。

③ 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 1865—1943),美国长老会牧师,自由神学家和全国基督教运动的领袖。1887年,他参加了联邦神学院。

拉特格斯·马歇尔^①；以及贝克韦尔、谢尔登、法特^②、辛格(Sinser)、寇因^③和德拉格那(dc LaGuna)。还有有过短时期交往的富勒顿^④和凯姆普·史密斯(Kemp Smith)。哲学俱乐部的讨论,使杜威能不断地了解那些具有同样诚意和学术能力的人所持有的各种观点。

杜威在政治领域中的冒险行动,使他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时期处在显著的地位。当他在安阿伯任教时,他开始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在讲课中,他主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天赋人权”论、功利主义、英国的法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在哲学系,这门课程的最显著特点是,按照霍布斯^⑤、洛克和卢梭^⑥的思想讨论了君权问题、法律与政治权利的性质和职责,以及政治思想史。发表在《政治科学季刊》上的评论奥斯丁^⑦君权理论的一篇文章,以及由大学哲学联盟(Philosophical Union of the University)出版的题为《民主的伦理学》的一篇讲稿,表明了杜威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民主的伦理学》一文,把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民主理论的批判与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明确表达的道德解释结合了起来。根据现代观点,在杜威的讲课中,最重要的论述是:没有经济和工业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政治的民主;但是,这种论述还没有开始具有它的现实意义。这种论述很可能直接来自于政治经济系的同事亨利·卡特·亚当斯^⑧。亚当斯经常指出,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是与在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从专制主义和寡头政治到流行的代表制的变化并行的。

杜威的政治哲学,一度发展成为不受他的专门的哲学兴趣所支配的思想准则。这些政治倾向必将逐渐融合在杜威的头脑里。杜威认为,社会舞台对

① 马歇尔(Henry Rutgers Marshall, 1852—1927),美国建筑师。

② 法特(William Benjamin Fite, 1859—1952),美国教育家。1910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数学教授。

③ 寇因(Morris Raphael Cohen, 1880—1947),美国哲学家。1929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④ 富勒顿(George Stuart Fullerton, 1859—1925),美国哲学家。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副校长。从1904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⑤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⑥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⑦ 奥斯丁(John Austin, 1790—1859),英国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认为法是统治者的理论,具有强制力,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

⑧ 亨利·卡特·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 1851—1921),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创立美国经济学会并任主席。曾任美国统计学会的主席。

哲学的影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不知不觉的影响,而且为修改哲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检验的场所。这种融合通过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开设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课程得到了补充。在很早以前,杜威就具有当时极为普通的信念,那就是:美国民主在它的正常发展中,将最终消除经济领域里存在的极不公平的状况。因此,尽管杜威和布莱恩^①在货币银本位^②问题以及人民党运动等其他许多观点上不一致,但杜威能够支持布莱恩当校长。杜威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帝国主义者,但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在人民党运动中所存在的民主复兴的迹象。

早在芝加哥时,杜威的社会信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在纽约城的居住则完成了这种变化。虽然芝加哥的城市生活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但那里的边疆环境有助于在民主的命定说^③中有力地坚持朴实的中西部信念。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纽约,在政治和社会的民主与不承担责任的金融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要忽视这种冲突,那是不可能的。1912年,虽然杜威对西奥多·罗斯福^④的军事和帝国主义的倾向表示怀疑,但他仍积极支持“雄驼鹿”运动(“Bull Moose” Campaign)^⑤。他也参加过1924年的拉福莱特运动(La Follette Campaign)^⑥。杜威长期积极地支持妇女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是建立在这种信念,即妇女具有选举权是政抬民主的一个必要部分的基础上的。杜威曾是人民院外活动集团(The Peoples Lobby)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是在华盛顿由它的精力充沛的干事本·C·马歇(Ben C. Marsh)领导的。多年来,杜威也曾是独立政治行动联盟(The League for Independent Political Action)的主席。

从一些方面来看,杜威本人对学院和大学的民管理感兴趣。杜威曾是

① 布莱恩(Elmer Burritt Bryan, 1865—1934),美国教育家和大学校长。1905—1909年,任富兰克林学院院长。1909—1921年,任科尔格特大学校长。

② 1921年,任俄亥俄大学校长。即银本位制,以白银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制度。

③ 命定说,认为某一民族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

④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7—1919),美国总统(1901—1909)。1901年,当选为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被刺死后,继任总统。

⑤ “雄驼鹿”运动,指1912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在竞选运动中,共和党的党徽是象,民主党的党徽是驴,老罗斯福派的民族进步党则以大公鹿为标记参加竞选,故称之。

⑥ 指拉福莱特进步党运动。1924年,拉福莱特(Robert M. F. La Follette)作为进步党推出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1925年,拉福莱特去世,他所领导的运动不久也随之而消失。

纽约市第一个教师协会(Teachers Union)的创始成员。当这个协会被利用来提倡一种特定的政治观点而不是为教育目的服务时,他带着遗憾的心情退出了协会。这个教师协会的座右铭:“为了民主的教育和教育的民主”,显然是摘自杜威的著作。杜威与他的朋友卡特尔和洛弗乔伊一起,积极地创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杜威还担任了它的第一任主席。

杜威在国外的旅行,在他的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有影响的是去日本和中国的旅行。杜威在安阿伯时就认识了小野(Yegiro Ono)博士。当时,小野是密执安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学生。后来,小野博士在日本的银行界担任了一个高级职位。杜威搬到纽约之后,小野在那里做生意,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友谊。小野博士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教授一起,筹划邀请杜威在1918—1919学年的休假期间到东京帝国大学去作讲演。那个冬季的前一段时间,杜威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讲演;然后,他从那里去日本。在东京时,杜威夫妇拜访了新渡户(I. Nitobe)家。在日本讲学期间,新渡户一家热情地给杜威夫妇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设备齐全的住宅。新渡户是一个公谊会教徒血统的美国人。在新渡户家里住的几个月,加上与东京帝国大学的联系,使杜威夫妇接触了历史悠久的日本文化,包括规模很小的日本男女平等主义者运动。这时,由于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自由主义运动在日本达到了顶峰。杜威甚至被邀请去作关于民主政治的讲演。然而,即使在那时,日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德国的密切联系,以及最有才华的人参加军队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日本讲学时,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去拜访他。他们以刚成立的中国学会(Chinese Society)^①的名义,邀请杜威去中国讲学一年。杜威在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当局的准假许可之后,就乘船去中国讲学访问^②。这次访问后来被延长为两年。

1919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学生运动^③。因为一些大学生进行

① 指尚志学会、新学会等。

② 据1919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4月30日午后,杜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罗茜一行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

③ 指著名的“五四运动”。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亲日的内阁政府而被捕，所以，杜威一行在上海登岸之后，陪同他们到杭州去的那位校长^①就突然回北京去了。杜威一行从开始访问起，就看到了中国学生和教师阶层的力量，因为学生罢课引起了公众的同情，所以，在政府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时，这些被捕学生拒绝离开，直到他们接到了内阁政府的正式道歉。中国现代化的运动是为了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并把名义上的共和国变成真正的民主渠道。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在教育界，就给杜威一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能够第一手地了解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杜威对访问期间的翻译、顾问和向导感到特别满意。其中，最主要的是现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②博士。胡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在“文学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是一个用白话文取代仅仅为专业学者所熟悉的文言文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扩展开来，使运动的一些发起者也感到意外。这个运动同时也为了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教育基础，例如，使用一种连小学生都能熟悉的语言编写教科书，并在有文化的公众之间传播现代思想。

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一些国立大学（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陶行知^③博士在南京当校长）作讲演外，杜威几乎访问了太平洋沿岸从山东到广东的每一个省份的省会，并访问了一些内陆省份的省会。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它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杜威夫人也作讲演，并被授予了金陵女子学院名誉院长的称号。男女同校教育在中国刚刚开始，杜威一行在南京举行暑期讲习班时，女子第一次被允许与男子一样参加这个讲习班。杜威夫人对中国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运动的支持，是值得纪念的。这种纪念采用了传统的仪式。最近，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在纽约给她授予了一枚带有纹章饰带的勋章，以表彰她的服务精神。这是杜威家庭的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当民

① 即蒋梦麟。

②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曾是杜威的学生。1937—1941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

③ 陶行知(1891—1946)，中国近代教育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是杜威的学生。

主思想和民族精神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候,这种奖赏使人回想起中国人接待杜威一行的热情。杜威一行是中国特别邀请的第一批外国讲演者,被允许与中国人进行密切的交往,以了解中国人对国内外一些问题的观点。

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为使它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而斗争。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这就为社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工具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据。杜威 1924 年对土耳其的访问和 1926 年对墨西哥的访问,使他更坚定了在教育的力量和必要性方面的信念,即教育为有益于个人的一种革命性变化提供了保证,所以这种变化不会仅仅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外部形式的变化。

在俄国,杜威主要与教育工作者进行交往。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考察来说,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了。访问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诫他,不要对真实说明形势的一些官员和政治家的才能及愿望表示怀疑。杜威以一个美国教育家访问团^①成员的资格,与一些卓越的俄国男女教师和学生进行了交往。这些俄国人坚信,具有社会目的和合作方法的教育在保证实现革命目标中占有必要的地位。他们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对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兴趣,来自于他们的观念,那就是这场革命将能充分解放所有个人的力量。杜威通过这些交往而得到的印象,是那样的不同于在美国所流行的观念。杜威非常同情地写了一系列希望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平相处的文章。这就使他个人在美国保守的报纸上,被描述成“布尔什维克”和“赤色分子”。

杜威是 1928 年到俄国去访问的。那时,俄国学生因按照教师和教育当局命令去做,而使他们早期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在这之前,俄国已经建立了严密的学校管理制度。虽然在学校里有很多政治宣传,但在一些较好的学校里,还存在着真正促进个人判断和互相合作的办法。在那个强制实施的五

^① 指 1928 年 6 月,在美苏文化协会的主办下,由包括杜威在内的 25 名美国教育家组成的非官方旅行团。

年计划实现之后,杜威收到了一些报告。这些报告表明,苏联的学校管理正日益加强,学校正在成为智力狭窄目标的工具。对此,杜威感到极大的失望。在莫斯科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进行审判之后,杜威断定这种冲突看来像是一些政治派别信念的冲突。他认为,这些政治派别与在基督教教义形成中的那些教派是相似的,只是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而已;在俄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解释为某种教条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作用,而这种社会理论与民主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对照。

杜威在俄国访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极大地扩充了他在苏联问题上的知识。他曾被邀请成为控诉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审判的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harges Against Leon Trotsky at Moscow Trial)的一个成员。在杜威相信每个被告人都有申诉权时,这个信念并没有促使杜威去承兑它。从个人方面来说,杜威感到,这是利用社会活动的原理继续进行他自己的实际教育的一个机会……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公开发表了两卷材料:一卷是在墨西哥城托洛茨基住宅里举行的申诉会的记录报告,另一卷是对两方面证词的分析以及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题为《无罪》的调查结论报告。在左派的文化界中,杜威现在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反动分子,部分保守的报纸则欢迎他成为这种人,但杜威从来就不属于这一种人。杜威的所有政治活动,可以用一种信念来解释。这种信念被称为“美国方式”。它既不是通过战争宣传而支持的“侵略主义”,也不是经济学界的反动分子所赞同的财政和工业政策上的放任主义。现在,这个信念更普遍地以“自由主义”著称,但在解释杜威的活动时,这个词应该包括它的守旧的美国观念。

谈到社会活动和专门哲学的相互作用时,杜威说:“虽然我不是一直,但我最初经常用抽象的形式,尤其经常根据逻辑的或辩证的连贯性,或者根据言词对观念的激发力来坚持一种观念。通过与个人、团体、或(在对外国的访问中)人民的交往而得到的一些个人经验,对赋予这种观念以具体的意义来说是必要的。在本质上有独创性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它通过个人性格作为媒介以及通过个人生活中所特有的一些事情而起作用时,对共同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人的‘心理’,也就是在他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信念,应归功于社会环境与他的天赋素质的相互作用。我参与家庭生活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活动,赋

予了这种观念以具体的个人意义。另一方面,在我的教育活动背后的观念,是有关知与行关系的多少有点抽象的观念。我的学校工作把这种观念转化为一种更加充满活力的形式。在我的思想发展中,我早就建立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确信,在所使用的方法与获得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持久的联系。我想,如果没有我在社会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经验,在社会活动理论方面的观念的力量未必会被我所认识,并在与我的托洛茨基调查委员会成员资格有关的活动中达到了顶点。我的身心理论、协调本性的能动因素的理论以及有关观念在阻止和支配公开行为中地位的理论,需要与F·M·亚历山大^①和后来一些年的兄弟A·R·亚历山大(A. R. Alexander)的工作联系起来。他们兄弟俩曾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因为我的性格的缘故,我的观念倾向于采用一种纲要的形式,其中逻辑的连贯性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但是,在把本质放进这些形式的各种联系方面,我很幸运。对这些事情反应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最初在更专门的哲学研究基础上所唤起的一些观念。我对智慧能继续作为一种重新改造力量的信念,至少是我自己生活和经验的一个如实的记录。”

^① 弗朗兹·M·亚历山大(Franz M. Alexander, 1891—1964),精神分析学家。1891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毕业后,在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1930年到美国,担任芝加哥大学精神分析学客座教授。1932年,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①

[美] 约翰·杜威

19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在新英格兰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学院里,对“选修课程”(electives)还是陌生的。但是,在我进入的佛蒙特大学里,却存在着一种“高年级课程”(senior-year course)的传统。这种课程被看作是使在大学前几年里已建立起来的学术结构更为完善的一种方法,或者至少被看作是拱门上拱顶石的一个插入物。它包括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基佐的)文化史、心理学、伦理学、(以巴特勒《类比》为教材的)宗教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它不包括哲学史,只是附带提一下。我所列举的这些课程名称,可能名不副实。但是,设置这些课程的指导思想,是在三年语言和科学方面有点专业化的学习之后,用最后一年来介绍一些具有广泛和深刻意义的重要学术问题——这是对思想界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课程未必符合所确定的目的;但是,它却满足了我的爱好。我永远感谢我的最后一年的大学教育。然而,在大学的前几年里,有一门能激发起我兴趣的课程,回想起来,它可能被称为“哲学”课程。那是生理学方面的一门相当短的课程,并不进行实验工作。赫胥黎编著的一本书是它的教材。要精确地讲出这么多年前我在学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困难的,但我有一种印象,即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观念。这种统一体观念给从前开始的一些学术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形式,并产生了表现某种事物观点的形态或模式。任何领域的物质都应该符合这种形态或模式。至少,它使得我下意识地期望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在学习赫胥黎的理论之后,我了解到,我所期望的这种生活将具有赫胥黎所描述的人类有机体生活的同样特点。

^① 译自: George P Adams, and William P Montagu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13—27. 注释均为编者注。

总之,从这种学习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刺激,比我从以前的任何学习中所得到的刺激都多。虽然没有什么原因促使我继续学习那门特别的学科,但从这个时候起,我被唤起了对哲学的特有兴趣。

佛蒙特大学颇以它在哲学方面的传统而骄傲。这所大学早期的一位教师马歇博士,差不多是在康德、谢林和黑格尔那纯理论和保守的德国哲学思想的汪洋大海中,无把握地冒险的第一位美国人。当然,这种冒险主要是按照科尔里奇的方法进行的。马歇曾编辑了科尔里奇《思维的辅助物》一书的美国版。这种纯理论概括多少带有合理地说明基督教神学教义要点的明显倾向,其程度甚至在基督教会的鸽棚里造成了一场扰乱。在德意志化的唯理论者与苏格兰思想学派的保守代表之间,特别是与后者在普林斯顿^①的代表之间的一场争论,正在继续进行。尽管从我接触这种材料以来已有很长的时间,但我想,在美国思想史上,如果这场争论不作为一章的话,那它也仍然提供了一部分资料。

虽然佛蒙特大学因为它的先驱者的工作而引以为豪,而且对神学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日子来说,在公理会影响下的大学环境也是“自由的”;但是,这所大学的哲学教学在基调上已变得更受约束,更受仍占有统治地位的苏格兰思想学派的影响。佛蒙特大学教授托里先生是一个真正有见识和有教养的人,对美学具有明显的兴趣和爱好。在那些日子里,在一个比新英格兰北部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托里的做法使得某些事情变得有意义。然而,托里在气质上是胆怯的,他从来没有真正地让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我依稀记得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与托里的一次交谈,他说:“泛神论^②在理智上无疑是形而上学的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但是,它违反了宗教信仰。”我想,这段话表明了托里内心的一种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他的天赋能力不能趋于成熟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他对哲学的兴趣是真诚的,而不是草率的。托里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的成长应该归功于他对我的双分恩惠:一是他使我的思想明确地转向了把哲学研究作为终生的职业;二是在那一年里他用了大量时间对我进行

① 普林斯顿,美国新泽西州一市镇.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

② 泛神论,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宣称神即自然界,神存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曾流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西欧,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斯宾诺莎等。

指导，我开始专心于哲学史方面经典著作的阅读，并学习富有哲理性的德国哲学著作。在那一年里，也就是在我的三年中学教学工作之后，在我们散步时的交谈中，托里更加随便地谈出了他在教室里没有讲到过的见解，而表现出了一种潜力。这种潜力使托里有可能在更自由的美国哲学发展中跻身于领导人中间。但是，这样的时刻并没有到来。

那时，哲学教师与牧师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大多数院所制定的宗教或神学的要求支配了它们的哲学教学。我说不出，苏格兰哲学本身是怎样和为什么那样好地适合于宗教的需要，或许外在的原因超过了内在的原因。但是，不论怎样，在宗教和“直觉”的原因之间已经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在这个时期中，要恢复几乎包围直觉思想的极神圣的气氛，那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知怎么地，所有神圣的和有价值的事情，无论成败，其原因都被认为是由于直觉主义的效力。最重要的争论是在直觉主义与为一切高级的客观实在辩解的感觉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我身上的怀疑论的发展来说，从前是那么的急迫而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这种争论的历史，很可能是一种因素。这种怀疑论完全是与当代争论的程度和范围有关的。许多在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当代争论，在一代人以后将可能降到局部和地方性的位置。在形成哲学史的一种价值观念中，这种争论的历史也曾起了帮助作用。一些人主张，这是研究哲学问题入门的唯一道路，而在我看来，这是指错方向和有害的。但是，在提出与当代争论直接有关的看法和与之相称的观念中，这种争论的历史价值怎么也不可能过高评价。

因为这个神学的和直觉的方面对我自己思想的发展并没有持久的影响，所以，我不想提及它，除非采取否定的态度。我学习了直觉哲学的词汇，但没有学得很深，因为它根本不符合我朦朦胧胧地想得到的东西。我在比较“自由的”福音派新教传统的环境中成长；后来，在接受直觉主义信念与抛弃传统的和固定的教义之间出现的一些斗争，是由于我的个人经验，而不是由于哲学教学的影响。换句话说，在这方面，哲学教学既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影响我——虽然反过来我不能肯定，在“怀疑论”的发展中，巴特勒那具有周密逻辑的和尖锐分析的《类比》一书不是一种因素。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托里教授指导我自学的那一年里，我决定把哲学作为我毕生的研究对象。因此，第二年（1884年）我进入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开始了新的目标:“研究生学习”。这种学习是有一些风险的。学校所提供的学习仅仅表明,对除牧师外的其他人来说,在哲学领域中或许能找到某些自食其力的工作。除了我跟托里教授学习的影响外,还有另一种影响促使我去冒这个风险。在大学毕业后的那些年里,我继续阅读哲学著作,甚至还写了一些文章寄给哈里斯博士。哈里斯博士是一位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也是那时美国唯一的哲学刊物《思辨哲学杂志》的编辑。哈里斯以及与他有来往的一批人,差不多成了献身于哲学研究的唯一的一批世俗人士。他们并不是因为神学的原因而去研究哲学的。在寄文章的同时,我向哈里斯博士征求关于我能否成功地从事哲学研究的看法。哈里斯给我的答复是那样的鼓舞人心。所以,在我决定想把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生涯时,哈里斯的答复是一种突出的因素。

正如我记得的,给哈里斯博士寄去的文章是很简略的和刻板的。这些文章是用直觉主义的语言来表达的。当时,我对黑格尔是不了解的。可以说,我的更大兴趣在那时还没有得到满足。当时,寄去的那些文章的题目仅仅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因此,在与它相符的教材缺乏的情况下,我只能给它们以刻板的阐述。回想起来,我的思想发展主要受到了一种斗争的制约。我的自然倾向是趋于简略的和刻板的逻辑形式的;而这种斗争正是在这种自然倾向与强迫我去考虑实际事物的个人经验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在每一位思想家有意识地明确表达的思想中,很可能存在着对同他的自然倾向恰恰相反的那些事情的一种赘述。对那些事情的强调是与他固有的爱好相反的,所以,他必须为清楚地表述这些观点而斗争;另一方面,一个人的自然倾向也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不管怎样,这种看法也许说明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对具体的、经验的和“实际的”活动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这一性质的考虑。在实际经验影响的压力下,它是对更加自然的倾向的一种反应,并被我用来自反对某些事情。我知道自己的自然倾向是一个弱点。我想,任何人在不适当地牵连到争论时,看起来是直接反对其他人的言论,实际上是涉及他自己内心中正在进行的斗争,那是大家所共知的事实。这种斗争把刻板的理论兴趣的特点与同现实联系的周密的经验材料结合在一起。当然,这种斗争的印象和特征也采用了写作的方式和描述的方法来表现。在纲要方式的兴趣占优势的那个时期里,写作是比较容易的,甚至有人对我的写作

方式的条理清楚表示赞赏；后来，思维和写作成了困难的事情。纲要方式慢慢地让位给一种辩证法论题的发展；然而，具体经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所以，学术上诚实的观念防止了放弃那条道路。但是，刻板的兴趣继续存在着，以致存在着将与智慧技能一致的内心要求，还存在着灵活适应所经验过的事情的具体差异的能力。对一些人来说，要得到适合这两种相对立的（形式的和物质的）要求的统一能力是容易的。但是，我并不在这些中间，那是不言而喻的。无疑地，因为这个原因，我敏锐地意识到，而且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其他一些思想家和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他们通过忽视思维的纯粹过程，而得到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清晰和简明；但对具体经验材料的更大重视，将强加于这种过程之上。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在美国教育史上，这是一件为人们所公认的事情。或许，我们还不宜作这样的评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以及其他一些大学仿效它的范例而建立的研究生院，标志着我们美国文化中的一个转折点。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标志着拓荒者时代的最后结束，以及标志着从南北战争时期进入到新的工业化和商业时期的转折。不论怎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哲学方面的影响，并不归功于已经形成的学校规模。密执安大学的乔治·西尔威斯特·莫里斯教授曾在那里，主持了半年的讲课和专题讨论会的工作。莫里斯相信作为德国理念主义本质的“实证”（他最喜欢的一个词）真理，以及相信它能作为一种有抱负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生活指出方向。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更为真诚和充满活力的人，一个经历过所有的艰难仍保持完整人格的人。尽管我很早以前就背离了莫里斯的哲学信念，但我十分乐意地承认，他的教学精神对我有着持久的影响。

对一位易受影响的和不了解适合于他心灵的某个思想体系的年轻学生来说，他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莫里斯先生那热情和博学的献身精神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使自己在观点上发生一种暂时的变化。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我自己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的唯一来源。在英国思想的发展中，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个新的发酵时期。在这个时期，反对强大的个人主义和感觉经验主义的言论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是托马斯·希尔·格林、凯尔德

和华莱士的时期,也是在后来的霍尔登^①勋爵领导下由一批更年轻的人合作撰写的《哲学批判主义论文集》一书出现的时期。当时,这个运动是哲学方面的一个充满活力和建设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影响,当然符合和加强了莫里斯教授的观点。但是,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区别,我想,这种区别是对莫里斯先生有利的。莫里斯是通过黑格尔而研究康德的,而不是通过康德而研究黑格尔的,因此,他对康德的态度就是黑格尔本人所表述的对康德的批判态度。而且,在有关客观世界存在的极为普通的信念方面,莫里斯保留了他早期的苏格兰哲学教学中的一些东西。他经常嘲笑那些认为客观世界的存在和物质的存在是通过哲学而加以证实的人。对莫里斯来说,唯一的哲学问题是讨论这个存在的含义。他的理念主义完全是客观模式的。像他同时代的人金斯敦^②的约翰·华生^③教授一样,他把一种逻辑的和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与一种唯实论的认识论结合了起来。莫里斯通过他在柏林大学的老师特伦德伦伯格的教导,产生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极大崇敬,毫不费力地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结合在一起。

然而,黑格尔思想之所以对我有吸引力,是有一些“主观”原因的。因为黑格尔思想补充了一种统一要求。这种要求无疑是情绪上的一种强烈渴望,但又仅仅是一种理智化的教材能够适应的渴望。要恢复早期的那种情绪是更加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分裂和分离的观念,作为新英格兰文化传统的一种结果,是通过自我与世界的隔离、灵魂与肉体的隔离、自然界与上帝的隔离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它带来了一种痛苦的压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精神上存在着一种创伤。我那早期的哲学学习曾是一种智力训练的课程。可是,黑格尔关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神与人的综合,并不是纯粹智力公式,而是作为一种巨大的释放——一种解放而起作用的。黑格尔关于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艺术的论述,同样也包括关于消除一些牢固的分隔墙的论述,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我自己能够真诚地接受的观点之间,曾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曾是一种难以处理的个人危机的根源,但任

① 霍尔登(John Scott Haldane, 1860—1936),英国生理学家。

② 金斯敦,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一市镇,与威尔克斯巴勒相对。

③ 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的创始人。

什么时候它都没有构成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这好像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实际上它应归于一种想法,那就是,任何真正正统的宗教经验能够而且应该使它自己适合于任何信念。一个人感到自己在学术上有权利保持的这些信念,起初是一种半意识的信念,但又是一种在以后的一些年里逐步加深而变成基本信仰的信念。因此,我希望,在一些人遭受个人看法变化而痛苦的时候,对那些人表示一定程度的个人同情,而不能把作为一种哲学问题的宗教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就那种感情的作用而言,它最后似乎是无偏见的哲学思考的一种唆使,以适应被指定的但又是人为的一些专门信念倾向的需要。我完全相信,一个人的宗教倾向的深度将使他们自己去适应任何要求的学术变化;我还相信,过早地预言仅仅是什么形成宗教兴趣的是没有好处的(并且很可能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种宗教兴趣将作为正在进行的那种伟大的学术变化的最终结果。我想顺便说一下,由于对宗教问题过分的保留,我经常受到了批评。在我看来,这是许多承认宗教需要普遍性信念的人的极大忧虑。宗教的现状和未来表明,宗教实际上是更多地通过信徒对各个宗教团体的兴趣,而不是通过对宗教经验的兴趣而得到推动的。

不过,在这方面插入这些话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说明一种相反的效果。对我来说,早期的一些社会兴趣和问题具有学术上的吸引力,并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其中许多最初似乎是在宗教问题上发现的。在大学生时代,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哈丽特·马提诺论述孔德的文章。我想不起来,孔德提出的“三个阶段”的法则是不是对我具有特别的影响,但是,他有关近代西方文化因起分裂作用的“个人主义”而瓦解的思想,以及他有关科学综合应该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管理方法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我想起的,我发现,同样的评论与一种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科学综合在黑格尔那里结合了起来。在那些日子里,在我阅读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时,我没有在他那里发现孔德学派思想的起源,我也没有与作为把孔德和黑格尔连接起来的链环孔多塞相识。

在以后的15年里,我渐渐地离开了黑格尔主义。长期以来,“漂流”这个词说明了这种变化运动的缓慢和细微的特征,尽管它没有表明这种变化有着适当的原因。然而,我从来没有想忽视,更不要说去否定,与黑格尔的结识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曾被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偶然

地称为一个新的发现。现在,在我看来,黑格尔体系的形式和系统性的组合是极其矫揉造作的。但是,在他的思想内容中,常常有一种使人惊奇的深度;在他的许多分析中,除去机械的和辩证的装饰之外,还有着一种非凡的敏锐性。如果我可能成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信徒的话,我将仍然相信,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其他任何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那里,有着更加多的财富和更加多样化的见识。不过,当我讲这个问题时,我把柏拉图排除在外,因为柏拉图仍然提供了我最喜爱的哲学读物。在我看来,由于我不能在柏拉图身上发现全面综合的和压倒一切的体系,后来对他的体系进行解释是作为一种暧昧的恩惠。当一些古代怀疑论者把柏拉图当作他们的精神之父时,他们把他思想的另一方面讲得太过分;但是,我想,他们比那些强迫柏拉图刻板地进入一个系统的学说框子里的人更接近真理。虽然我对有时认为归咎于我的体系并不反感,但我对自己达到范围广泛的统一体系的能力是半信半疑的,因此,我很可能对同时代的一些人的这种能力也是半信半疑的。没有什么比“回到柏拉图”运动对现代哲学的探讨更有帮助。但是,这个运动应该回到富有戏剧性、不甚满足和互相合作地探讨柏拉图的《对话集》,不断尝试评论的方式,以发现可以同意的观点;回到他那占主要地位的形而上学总是以社会的和实际的变化而结束的柏拉图那里去,而不是回到一些令人费解的、把柏拉图当作最早的大学教授的评论家所臆造的人工柏拉图那里去。

我不能把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其余部分记录下来,除非更多地沉溺在我不怎么喜欢的虚构之中。到目前为止,我阐述过的观点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所以,我能作为另一种人来谈论自己。而且很多观点已消失了,因此,一些观点显得突出了,而不必强迫它们进入到那突出的地位中去。假如我能对自己使用“哲学家”那个词的话,那么,当我离开了德国理念主义的时候,我便成为哲学家。哲学家是过多地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依然是和依然过多地处在宜于记录的变化过程之中。肯定地说,我羡慕那些能够用一种统一的形式来撰写他们的学术传记的人。相反地,我似乎是不稳定的和经常变化的,并相继屈服于许多各种各样的甚至是不一致的影响。我为吸收来自每一种影响的思想而斗争,但也努力采用了一种方式促使它向前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方式是与从它的前辈那里得来的思想相一致的。总的说来,影响我思想的一些力量来自于人和环境超过了来自于书本——我希望,这是我已

从哲学著作中学到的东西，而不是我还没有从它们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与我遇到的一些经验而被迫思考的东西相比，这些东西只是技术性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坦率地说，我完全羡慕或者非常羡慕我已谈到过的那些人。虽然思考可能是一种防卫反应，但我喜欢思考我被迫走的那条道路所具有的一切烦恼。思考具有补偿的好处，而不产生对经验的一种思想免疫力——经验毕竟还没有被哲学家看作需要增强抵抗力去对付的一种病菌。

我不能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给以叙述，除非给它提供一种实际上没有的连续性外表。与此同时，在我的学术思想发展中，似乎存在着四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教育实际和理论，特别是青年的教育对我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当“高等”教育建立在歪斜的和脆弱的基础上时，我决不能对它的可能性感到很乐观。这种兴趣与在心理学以及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其他可能分离的兴趣融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曾提出，我的思想过多地沉浸于教育方面的兴趣之中。尽管许多年来，我的哲学在题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但我不知道一些与教师不同的哲学评论家是否曾经求助于它。我感到疑惑，这样的事实是否表明，虽然那些哲学家本人常常就是教师，但他们一般不利用他们所想到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教育。实际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想到，哲学研究可能集中在作为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而且，其他的一些问题（宇宙的、道德的和逻辑的问题）在教育中也达到了顶点。总之，这个可利用的机会提供给了后来任何一位可能希望抓住它的评论家。

第二个特点，是在我的研究和思想有所进展时，由于一些人在学术上对我的恶意诽谤，使我变得越来越忧虑。我似乎陷入了当代的和传统的二元论，即在一方面称为“科学”的某种东西与另一方面称为“道德”的某种东西之间的逻辑观点和方法之中。我早就认为，一种逻辑的形成，即一种有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我们在理论上所需要的解决方法和对我们最大的实际需求的补充。它使连续性不会有断裂口，以应用于由科学和道德这两方面词汇所指明的领域。这种信念更多地与我所说的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词，也许把它确定为“工具主义”是更为适合的。

在讲到我没有受到来自书本的非常重要的和充满活力的影响时，第三个特点形成了例外。它涉及威廉·詹姆士对我的影响。就我能发现的来说，詹

姆士的影响是进入我思想中的一种能详细论述的哲学因素,也就是一种赋予我思想新的方向和特性的哲学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它来自于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而不是来自于收集在那本题为《信仰的意志》里的一些文章,以及他的《多元论的宇宙》或《实用主义》。我认为,这是因为在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中存在着两种未取得一致的论调。一种论调是在采用从前的心理学传统的主观宗旨时打下基础的。甚至当那个传统的主要原则在根本上受到批评时,一种潜在的主观主义至少在词汇中被保留了下来。要找到一种将真正清楚地表达新思想的词汇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大概是阻止哲学自然而然发展的最大障碍。我可能引证以“意识之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代替抽象的基本陈述来作为一个例子,在这方面已取得的进展是巨大的。不过,这种观点仍认为,一种意识领域是单独开始的。另一种论调是客观的。它是在讲到《心灵》中的早期生物学概念时打下基础的;但是,一种具有新的力量和意义的回答,应归功于生物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就这种思想的介绍和应用来说,我怀疑,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否开始认识到一切都应归功于威廉·詹姆士。正如我早已指出的,我并不认为,詹姆士本人充分地始终如一地认识到它。但不管怎样,这种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而越来越进入了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

这种生物学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如果是由詹姆士不成熟地强化起来的,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仅仅是以一种系统性的组合代替另一种系统性的组合。但是,它并不是重复詹姆士关于生活观念本身是充满活力的说法。詹姆士对生活范畴和机械范畴之间的差别具有一种深刻的观念,或许起因在艺术和道德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想,有时某个人可能写一篇文章,表现出在他的一般哲学观点中最有特色的因素,例如,多元论、创新、自由、个性等,然而这一切是与他对生活环境特性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有机体的思想,许多哲学家有很多意见要发表,但是,他们只是从结构上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因而也就是静止地来谈论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留给了詹姆士来解决。他从活动中的生物的观点出发,来考虑生活。当心理学在哲学中的作用受到重视时,这个论点以及在詹姆士的思维概念(区别、抽象、观念、概括)中的客观生物学因素的论点,都是十分重要的。后来,它对哲学的影响确实常常被冲淡和歪曲了。但是,那是因为心理学是低劣心理学的缘故。

我并不是说,心理学与哲学最后在理论上的联系,比与其他科学分支在理论上的联系更为密切。从逻辑上来说,心理学坚持在同样程度上与它们联系。但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由詹姆士介绍的那个变革已经具有并仍然具有一种特殊意义。从反面来说,这个变革是重要的,因为就消除对低劣心理学的大量指责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地,在哲学传统中所包括的低劣心理学根本没有被承认为心理学。作为一个例子,我将谈到“感觉材料”(sense data)的问题。在近代的英国思想中,“感觉材料”是如此的重要;但对我的思想来说,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与作为旧的和陈腐的心理学学说的一种残存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论述这个问题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仍在顽固地坚持心理学归属于哲学这个完全枝节的问题。从正面来说,我们具有这种情况的对应面。这种比较新的客观心理学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但在教学方法上却提供了最简便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一种富有成效的思维概念和活动,从而得到更佳的逻辑理论——其规定了思维和逻辑彼此要做的事情。而且,在人的心理现状中,哲学与一些重要的实际经验问题的联系,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结论不断的相互作用而得到促进的。例如,更加抽象的科学、数学和物理学,在传统哲学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与对形式上必然性过分忧虑的联系中,这些更加抽象的学科不止一次地起作用,而使哲学思想与一些具有现实根源的问题分离开来。现在,心理学与这样的抽象观念疏远,而有特色地与人类方面接近,对心理学提出了一种强烈的要求,给予富有同情心的注意。

与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人类方面的联系,形成了第四个特点。詹姆士学派心理学的客观生物学的方法,直接导致了具有特色的社会范畴,特别是交往和参与的重要性的观念。我确信,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的大部分哲学研究需要重新进行;而且,一种完整的综合最终将导致一种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与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际需要相联系的。一个人应该进行一次广泛的调查,在超脱直觉偏见之中去了解今天具有独创性的科学与一些社会学科发展的联系程度。这些社会学科,包括了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和文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在学术意义上,这个运动的两个方面是那么的新的;而且,我们是如此多地涉及它,它又是如此多地涉及我们,以致这种联系没有受到明确的注意。数学在技巧上对哲学的影响是更明

显的。最近几年,在一些自然科学的主导思想和方法中已经发生了伟大的变化,而比社会学科的发展更容易引起注意。这正是因为社会学科对我们的影响甚少。学术上的预言是危险的,但是,假如我们正确地觉察到时代文化的征兆,那么,当社会科学和艺术的意义成为反射性注意的一个对象时,同样地,当过去曾提出一些思考对象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个意义被领会时,在哲学中将紧接着出现一个综合运动。然而,假如我错误地觉察到这些征兆,这段陈述则可以作为在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意义的因素的一个标志。

总之,我想,如果认为哲学将模糊地和间断地出现在两千年欧洲史留给我们的那些问题和体系的范围之中,则标志着想象力令人可悲的灭亡。展望未来,可以看到整个西欧史是一个褊狭的(地方性的)插曲。我并不期望,在我的时代里看到一种真正的思想综合。这种综合是与强迫的和人工的综合不同的。但是,一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不是过分急躁的心理能够获得这样的信念,即这种统一将在适当的时候产生。与此同时,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人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帮助扫除阻塞我们思维道路的无用材料,努力地使它畅通无阻,并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花费 40 年时间,漫游在像现在一样的一片荒野上并不是一种悲哀的命运——除非一个人试图使他自己相信,那片荒野本身终究是有希望的土地。

约翰·杜威是谁^①

[美] 罗伯特·B·塔利斯

尽管有争议,约翰·杜威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说杜威是一位美国哲学家并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地理上的事实,杜威的哲学确实具有一些鲜明的“美国性”。在其有生之年,杜威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在他去世前,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②

在杜威去世的时刻,他以前的学生和亲密的朋友悉尼·胡克这样来描述杜威:

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③

① 选自:罗伯特·B·塔利斯(Robert B. Talisse). 杜威(On Dewey). 彭国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1—11. 略有删节.

② 亨利·科马格. 美国精神.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100. ——原注. 对于没有中译本的著作或论文,为了保持原貌,仍用中文标注. ——编译者注

③ 悉尼·胡克. 关于杜威的一些回忆. //实用主义与生命的悲剧意识. 纽约:贝希克出版公司,1974:101. ——原注

上述赞美之词的存在并不表明杜威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可以想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怀有胡克与科马格那样对杜威的热情。批评家们认为，在杜威的哲学中存在着对科学技术的危险的沉迷以及对绝对民主的激进幻想。一位批评家认为：

杜威的哲学……试图摧毁所有的哲学。杜威使美国丧失了前途，并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内外的领导潜能。^①

虽然杜威生前在美国知识界与政界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但令人吃惊的是，今天在学术圈之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正因为杜威的思想至今仍然对美国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他现在的湮没无闻才是可悲的。因而，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为杜威作一个小传。

约翰·杜威于1859年10月20日生于佛蒙特州柏灵顿镇的一个杂货商家庭。童年的杜威是一个羞涩的孩子，与他善于交际的兄长戴维斯一起生活。虽然兄弟俩都不喜欢学校，但他们都酷爱读书和思考。他们通过派送报纸来赚钱买书。在读书之余，兄弟二人经常到香普兰湖和格林山去探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使他们充满活力。他们通常都在那里露营和垂钓。杜威思想中特有的对自然的强烈敬畏感想必也源自他们早年的这些经历。

杜威于1875年考入佛蒙特大学，那时他即将度过16岁生日。这所大学开的都是传统课程，学生们要修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虽然哲学课直到最后一个学年才开，但为大三学生所开的T·H·赫胥黎的“生理学的要素”这门课程引发了杜威“对哲学的极大兴趣”[《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48]。从赫氏的书中，杜威了解了自然的全景，它强调生物界的有机统一性、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生命的延续性。与杜威所接受的强调“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心灵与肉体的分离、自然与上帝的分离”[《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35]的宗教背景相反，赫胥黎的观点体现了人类智力解放的可能性。杜威这样来描写他与赫氏生理学的相遇：

^① 保罗·K·克鲁瑟. 约翰·杜威的虚无主义. 纽约：哲学图书出版公司，1955：ix. ——原注

……那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它使得以往不健全的智力结构得以成型，同时还创建了一种万物生长的类型或模式……赫胥黎的研究不但展示了人类有机体的图景，而且引导我向往与这种图景有相同特征的世界和生命。[《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47—148]

于是，杜威转向了哲学研究，希望能够发现赫胥黎所展示的世界图景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杜威的这一希望因他自己的哲学而得到了实现：生物学的术语和分类——环境、有机体、互动、延续性——以及对超自然主义和二元论的强烈拒斥在杜威的思想中俯拾皆是。

当杜威首次接触到经院哲学时，这一学科在美国仍然和神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的哲学导师都是教士，因而直觉主义在这里占据了哲学中的统治地位。这一学派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基本信条都可以被人类的“直觉”所把握，而与感官经验无关。显而易见，这一原则必将导致世界观上的二元论。那些可被直觉所把握的原则不同于必须通过感官证实的原则，因而这两类原则所涉及的对象也不同。直觉主义保留了许多典型的哲学二元论的特征，这是杜威所要竭力回避的。在直觉主义者看来，心灵与肉体、经验与直观、事实与价值以及理性和科学都是二分的。

直觉主义与教士的亲近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宗教都蔚成于不同类型的二元论这一事实，而且因为直觉主义者将涉及上帝和心灵的神学教义都归纳到人类直觉所把握的自明性的真理之中。于是，这些教义便无可置疑，游离于经验主义所培育的科学怀疑主义的探究领域之外。而在后者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感官经验得来的。在提到赫胥黎所提供的丰富的统一图景时，杜威也回忆了自己“对直觉论术语的学习”，但他认为“这种学习并不深入，而且绝没有满足自己朦胧的追求”。[《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49]

毕业之后，杜威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的一所高中谋得了一个教职。他在那里呆了2年，讲授拉丁文、代数和科学，月薪为40美元。虽然杜威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学训练，但他大学阶段所学的课程为他从事教学作了良好的准备。在石油城的日子，杜威如饥似渴地读着哲学著作。他对生理学的兴趣

使他关注着围绕进化论的哲学内涵所展开的辩论,甚至是有关形而上学的辩论。^①

在1881年下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杜威写了一篇名为《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的论文(《杜威早期著作集》第1卷)。他将该论文投给了《思辨哲学杂志》的编辑W·T·哈里斯,并附信要求哈里斯对作者的哲学天赋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杜威于1881年6月返回柏灵顿,在莱克维尤高级中学(Lake View Seminary Academy)短期任职,并等待哈里斯的回音。在重归柏灵顿的日子里,杜威与他大学时的哲学老师H·A·P·托里重新建立了联系。在托里的指导下,杜威学习了古典哲学及德语。在托里的鼓励以及哈里斯回信的褒奖下——后者促成了杜威论文的发表^②——杜威决定以哲学为职业。1882年9月,他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在霍普金斯大学,杜威深受乔治·S·莫里斯教授的影响,后者来自密执安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莫里斯向杜威介绍了德国哲学家W·F·黑格尔(1770—1831)的绝对唯心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上的二元论在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统一中只是短暂的一个环节。那种被黑格尔称为“精神”的广泛的统一,是在历史中实现的。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完全是反二元论的,他从精神的发展中来理解生命、观念与自然。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强调综合与延续性,因而与杜威在佛蒙特大学所学的直觉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批。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杜威发现了他从大学时代以来一直“朦胧向往”的东西。是黑格尔使得杜威因先前的教育导致的“内伤”得以愈合,绝对唯心论满足了杜威对延续性之哲学表述的“强烈的感情追求”[《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53]。虽然杜威最终放弃了黑格尔主义的深奥术语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并建立了自己的“经验自然主义”[《经验与自然》(1925),《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卷:10]或“实验主义”,但与黑格尔的神交的他的思想中还是“留下了永久印迹”。[《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54]

① 形而上学是研究实在的基本要素问题的哲学领域。——原注

② 《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一文发表于1882年6月的《思辨哲学杂志》,杜威的第二篇文章《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发表于同年7月的该杂志上。——原注

1884年,杜威以一篇名为《康德的心理学》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①他受莫里斯之邀,来到位于安阿伯(Ann Arbor)的密执安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在密执安大学,杜威讲授了伦理学、哲学史、逻辑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1887年,杜威的《心理学》(《杜威早期著作集》第2卷)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杜威试图表明,科学心理学的发现证实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虽然该书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它使杜威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杜威的第二本书于次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的著作。^②

由于他的著作带来的影响,杜威于1888年应邀到明尼苏达大学任精神哲学与道德哲学教授。他于该年秋天来到明尼苏达,但只在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1889年,他重返安阿伯以接任哲学系教授职位,该职位在1888年莫里斯死后一直空缺。^③杜威来密执安之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聘用一名哲学助教。他选择了詹姆斯·海顿·塔夫茨,后者与杜威合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伦理学教科书,并成为一名有名的哲学家。^④

在密执安居住的第二个时期,杜威的思想坚决地脱离了黑格尔主义。这一转变源自杜威对威廉·詹姆士出版于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这部经典著作的研读。与杜威一样,詹姆士也拒绝接受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范畴。然而,与杜威不同的是,詹姆士并不求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反,他通过蕴涵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功能主义来解释延续性。在1891年的研究生班上,杜威使用了詹姆士的课本。在杜威看来,《心理学原理》一书为他的思想导出“新的方向和品性”。[《旧个人主义和新个人主义》(1930),《杜威晚期著作集》第5卷:153]杜威发表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著作无不受到詹姆士的影响。^⑤

① 该论文从未发表且已遗失。人们相信,写于1884年的《康德与哲学方法》(《杜威早期著作集》第1卷)一文反映了杜威博士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原注

② 该书的书名为《莱布尼茨的〈人类理解新论〉》(《杜威中期著作集》第5卷),1932年出了修订版(《杜威晚期著作集》第7卷)。——原注

③ 参见杜威的回忆文章《晚年的莫里斯教授》(《杜威早期著作集》第3卷)。莫里斯教授的去世对杜威的影甚大。——原注

④ 杜威与塔夫茨合写的《伦理学》一书于1908年出版(《杜威中期著作集》第5卷),于1932年再版(《杜威晚期著作集》第7卷)。——原注

⑤ 参见杜威写于1894年的论文《情感论》(《杜威早期著作集》第4卷)。——原注

在塔夫茨(此人于1893年离开密执安来到芝加哥)的推荐下,杜威于1894年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担任首席哲学教授。在芝加哥的10年意义重大,它是杜威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杜威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在芝加哥,杜威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就以前没有充分探讨过的许多领域如逻辑学、社会哲学、认识论都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在芝加哥仅2年,杜威就已经在哲学系组织了一支稳定的、有影响的研究队伍。^①1903年,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出版了一本名为《逻辑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的论文集。^②虽然《研究》一书反映了作者们哲学兴趣上的多样性,但它同时体现了不同哲学观点之间的和谐发展。在1904年为《研究》一书所作的书评中,威廉·詹姆士写道:

约翰·杜威教授,以及至少10名他的弟子,共同发表了一种世界观的声明……它如此简单、如此厚重、如此积极……足以被冠之为新哲学体系。^③

《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的作者们以“芝加哥学派”或“芝加哥实用主义者”闻名,而杜威则无可争议地成为他们的领袖。

同样是在芝加哥大学任职的时期,杜威开始对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承担了全校的教育学课程,杜威抓住这个机会来检验他的心理学与哲学观点。1895年,杜威获得许可并获得必要的资金来开办一所由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主持的小学。这所兴盛了8年的学校被称为“大学附小”,后来又被称为“实验学校”,而它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杜威学校”。^④创办实验学校的经历帮助杜威发展了内涵广泛的教育哲学,这使得他名声大振。杜威早期对教育哲学的“突袭”导致了几篇论教育的小文章的发表,以及两本至今仍

① 除了塔夫茨外,该系的成员还有乔治·H·米德,后者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至今深受推崇。——原注

② 杜威发表于该论文集的文章可在《杜威中期著作集》第2卷中找到。——原注

③ 参见威廉·詹姆士《芝加哥学派》一文,后收入其《哲学随笔集》(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一书第102页。——原注

④ 参见梅休与爱德华兹为杜威学校校史而写的《杜威学校》(纽约:D·阿普斯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一书。——原注

被视为经典的小册子的出版。这两本小册子是《学校与社会》(《杜威中期著作集》第1卷)和《儿童与课程》(《杜威中期著作集》第2卷)。

在芝加哥的数年中,杜威转向了社会行动主义的研究。来到芝加哥后不久,他即与简·亚当斯及其社会组织——赫尔社区(Hull House)建立了联系。杜威成为赫尔社区的第一届理事,他举办讲座并就当前的重要社会问题组织群体讨论。在赫尔社区的经历对杜威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接受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哲学家必须持续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

因为在管理实验学校的问题上与大学当局存在分歧,杜威于1904年离开了芝加哥。1905年2月,他来到了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心理学系。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继续他在芝加哥就已经开始的广泛的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今天已被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通过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联系,杜威继续研究教育理论。这项研究的成果是1911年出版的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我们如何思维》(《杜威中期著作集》第6卷)一书,以及1916年出版的教育哲学的经典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中期著作集》第9卷)。杜威很快就被视为“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而且至今仍被奉为重要的教育理论家。

到1930年离开教职时为止,杜威的著述之丰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于1919年和1920年分别到日本和中国讲学,并在1929年主持了爱丁堡大学的基佛德讲座,讲座的内容作为他主要的认识论著作出版,书名为《确定性的探求》(《杜威后期著作集》第4卷)。^①他受邀在美国的演讲后来作为主要著作出版,包括《人性与人的行为》(1922;《杜威中期著作集》第14卷)、《经验与自然》(1925;《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卷)以及《公众及其问题》(1926;《杜威晚期著作集》第2卷)。

然而,杜威的活动并不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24年,他应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到该国评估教育系统。他作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并被采

^① 杜威在日本的演讲于1920年出版,书名为《哲学的改造》(《杜威中期著作集》第12卷)。——原注

纳。1928年,他因同样的原因应邀出访苏联。^①此外,杜威还协助建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全国有色人种发展协会。他还协助组建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参加了妇女参政斗争,领导了反对非法战争的运动并成为政治行动主义组织的领袖。^②

杜威的退休并不意味着他从哲学和政治领域的退出。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驻校荣誉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in residence),杜威在这里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931年,他主持了哈佛大学首届威廉·詹姆士讲座,后来作为他在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版,即《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0卷)。1934年,杜威主持了耶鲁大学特里基金讲座,并出版了《一种共同信仰》(《杜威晚期著作集》第9卷)这部颇受争议的宗教哲学著作。他的两本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书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1935)(《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1卷)及《自由与文化》(1938)(《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3卷)。1938年,杜威综合逻辑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巨著《逻辑学:探究的理论》(《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2卷)一书出版。^③

1952年6月1日,杜威因肺炎在纽约去世。在去世前的日子里,他还经常发表论文、撰写随笔和书评以及参加政治活动。虽然我们通常将学院化的思考——尤其是哲学家的思考——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袖手旁观,但上述事实表明,对这一普遍的、经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看法来说,至少有一个反例存在。杜威的一生不是在书斋中独思的一生,而是不断探索、不断行动的一生。

① 杜威关于土耳其教育系统的报告收入《杜威中期著作集》第15卷。他关于苏联教育的报告被编入《杜威晚期著作集》第3卷。——原注

② 罗伯特·威斯特布鲁克的《约翰·杜威与民主》(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1)及阿兰·瑞安的《约翰·杜威与美国自由主义的高潮》(W·W·诺顿出版社,1995)两书较好地探究了杜威的政治活动。——原注

③ 涉及这些事实的一些论文、随笔和演讲被编入《杜威晚期著作集》第6卷。——原注

第二编

杜威实验学校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①

[美] 艾达·B·德彭西尔

一、实验学校的开端

1896年1月,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一件事情注定要对整个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杜威学校”(Dewey School)的开办,现在它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The Laborato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②而闻名。杜威学校和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这两个名称都是十分恰当的。这所学校是世界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构想,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所真正的实验室,杜威先生的教育思想在这里付诸实践、受到检验和得到科学的评价。1894年夏天,杜威先生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1895年秋天,大学校方拨款1000美元建立了杜威先生期盼已久的教育学实验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实验学校就在金巴克大街5178号开始运作起来。它招收6至9岁的儿童,共有学生12人,配有2位教师和1位负责手工训练的指导教师。

教育革新运动

正当杜威先生因为这种几乎由他独自带来的教育革新而受到赞誉时,他无疑受到了教育革新运动的影响。这个教育革新运动始于18世纪的欧洲,主

^① 译自 Ida B DePencier.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atory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7: 15—53. 勾月译.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从1896年至1904年,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通称“杜威学校”。在杜威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继续开办一直到现在。——编者注

要反对在当时流行的教育方法。

这场教育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就是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74年,他在瑞士的农场为男女孩子建立了一所学校,除正规课程以外,男孩学习耕作,女孩学习烹饪和缝纫,同时男女孩子都学习纺纱和编织,以此为学校提供支持。来访者常常被裴斯泰洛齐对儿童的耐心所感动,整个学校充满了大家庭的氛围,儿童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欢乐。由于缺少资金,裴斯泰洛齐的第一所学校不得不关闭;在20年之后,他又开办了第二所学校。虽然有众多的来访者慕名前来,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传播得较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裴斯泰洛齐的影响日益增加,尤其在英国和美国。在那里,一些教育家追随裴斯泰洛齐的首创性实践,开始打破过去那种呆板的、纯口头讲授的教学方法,因为过去强调的是安静地和消极地接受并局限于书本知识的学习方式。

一位与裴斯泰洛齐同时代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非常赞同裴斯泰洛齐革新性的教育哲学思想。他也认为,儿童应在活动中学习,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组建了幼儿园(kindergarden,或称“儿童的花园”,children's garden),加入了这场运动。在幼儿园里,儿童通过活动和游戏进行学习。福禄培尔的教育观点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在美国得到极大的拥护,在这些国家里也相继建立了幼儿园。

在这一时代,美国教育家也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儿童怎样学习上。“美国公立教育之父”贺拉斯·曼(Horace Mann)无疑也受到了福禄培尔的影响,强烈反对被他称为“教室内的严酷教学法”。同一时期的教育家也是杜威以前的老师霍尔(G. Stanley Hall)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儿童心理学机构,这也是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之一。

芝加哥也不乏为这个教育革新运动作出贡献的人,其中主要是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上校。他是一个具有磁性人格魅力与坚强意志的人,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一个为儿童感到悲哀并对儿童充满同情的人。”他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并在那里教书。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军队,战争结束前任上校一职。在服兵役期间,他曾对一位朋友讲:他在夜间常常思考教育问题,想弄明白如何使学校的生活成为儿童生动而富有挑战的经历,以

替代一种沉闷而无趣的监狱。战争结束后,他赴德国学习3年,在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1875年,帕克上校返回美国,开始管理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学校。他所做的工作是那么新鲜而又令人激动。从1875年至1878年,共有3万名来自不同地区的教师前来参观他的学校。昆西学校为这些来访者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帕克上校确信,学校里严酷的形式主义不能与儿童的需要相一致。他认为,自我发展是最重要的,儿童应该自然和自由地成长,从做中学,而不是在桌椅的束缚下学习。他热切地关注每一个儿童,并以此影响着学校教师的热情,并使他们从读、写、算的苦役般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学生们在工作中穿插活动,学习内容既来自户外也来自书本。地理、历史、自然科目是统一的中心科目,其他的学习都与中心科目相关。例如,地理不再是关于地点或事实的记忆,而是理解整个现实世界。帕克上校本能地感到,儿童对于他们所感兴趣的事物应该快乐地学习而且是能够学会的,学习的内容应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尽管他鼓足勇气脱离当时现存的学校实践,但他的教学方法是依据上述原则的。昆西学校的成功使帕克上校享有了全国的声誉。

1883年,帕克上校担任库克师范学校的校长。他认为,教师的训练是传播活动与自由这一原则的最好方式——自由既是针对儿童的,也是针对教师的。在任师范学校校长的第十八个年头,他建立了一所实习学校,不仅是为了教育实验或介绍教育改革,而且最重要的是关注儿童教育。帕克上校的观点再一次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前来“实习学校”访问的教师,甚至教育专业外的人士都关注这些教育思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帕克上校的著作《学习课程》(Course of Study)描述了教学的材料、设备和方法。这本书非常畅销,影响了美国几百所公立学校教师的课堂实践。

在芝加哥,另一位加入这个教育革新运动的是贝尔菲尔德(Henry Holmes Belfield)。当1883年帕克上校来到芝加哥时,贝尔菲尔德已在密执安大道第12大街开办了一所手工训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芝加哥商务俱乐部创办的。在这个俱乐部中,都是一些比较有影响但对城市的中学教育表示不满的商人。他们的不满在于:学校没有充分利用学生的视觉和触觉,课堂学习大多是死记硬背,学习过程如此枯燥以致常常使学习失败。贝尔菲尔德

的学校以及其他的手工训练学校也包含这些科目和课程,但同时使学生的手和脑得到了训练。

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一批开明的、富于想象的教育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使教育处于激烈的动荡状态。他们相信,儿童的学习需要自由,即自由地行动、调查、探寻、试验,但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相反,自由是带有纪律的自由,而纪律也是依据儿童的兴趣、能力和自我指导制定的。只要教师依据新的自由的含义开展教学活动,教学也就是愉快的。在学校里,儿童拥有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这才是最大的满足。对于儿童来说,学校生活不再是一种令人抱怨的痛苦。

然而,对于很多成人来说,儿童本应喜欢学校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误解了自由学习的真正含义。此后,这些误解给新的教学方法带来了坏的名声。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新的教学方法渐渐地在很多学校的教室里得到了运用,改变着教育实践和教育哲学。在现代,大部分先驱者所提倡的思想已融入小学教育,尤其是在低年级的教学中。

杜威学校

杜威学校完全是实验性的,是为检验杜威的教育思想而开办的。正如杜威先生自己在教育俱乐部上作的演说所表明的:

学校的基本构想是一个实验室。它有两个主要目的:(1)展示、检验、证实和评价教育思想上的观点和原则;(2)以特定的标准对实施和原则进行总结。^①

杜威先生的学校与帕克上校的学校是不同的,尽管它们都是实验性的。因为帕克上校管理的是一所实习学校,以训练未来的教师。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对教学方法进行实验的教职员都是改革者,但这两所学校有着根本的不同。帕克上校知道什么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杜威先生依据他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知道是为什么。帕克上校曾说过,他与杜威先生

^① 大学纪事,1896,(32):417。——原注

拥有同样的观点,但是,杜威先生对这些观点用哲学术语进行解释。帕克上校还说过,杜威对他讲的内容胜过他对自己讲的内容。帕克上校不能用理性的说服力去分析他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去做,他只是本能地知道应该做什么。

他们都在有效的教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帕克上校的贡献集中在《学习课程》这本著作中;此外,他还培训和指导了一批教师,并通过他们转而影响和指导其他的教师。他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由于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嗓子受了伤,他讲话也有困难。他的成功源于对儿童的极大兴趣与同情心、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工作的热情。虽然杜威缺少这种吸引力,但杜威先生拥有敏锐的分析能力。

杜威先生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有时会想,学校在教学原则与思想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开始教学,这些原则与思想立即被用于实践……在学校中,教师预先提出问题,如果问题得以解答,教师就以问答的计分开始教学。”

也许原则不是预先确定的,思想也没有立即被用于实践,但教师所用的原则与思想是早已存在的,这在学校实践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虽然不是所有的原则都是预先确定的,但其中部分原则如下:

第一,在儿童的家庭活动与他初次接触的学校之间没有裂口。儿童将被带进学校,通过活动使学校与家庭联系起来,家庭成为避难、保护、舒适生活和提供食物的中心,通过手工训练、烹饪和缝纫等,获得社会经验。此后,儿童才进行阅读、书写、计算和拼写的学习,他的成长源于对获得信息和与他人交流的需要。儿童将开始学习准备做午餐、缝纫以及锯、钉、敲等活动。他从经验中学——自由地四处观察,与他人进行交往,以及从教师和他的同学那里获得帮助。杜威先生指出,当一个儿童使用锯子时,没有必要用制作手工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已有了注意力。他的感官早已在警觉,因为他为了制作而必须使用它们。这就是儿童教育从活动开始的心理学原因。

家庭活动应该为数学计算形成一个基础,因为在烹饪、木工和缝纫时不断地需要计算。因此,计算会作为一种生活手段教给儿童,并通过一些活动可以使学习计算变得有序且有效。阅读、书写和拼写也会作为儿童活动与交流的需要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不经意间教给了儿童。

第二,儿童学习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儿童应该学

习如何成为团队中的一员去帮助同伴,同样也得到他人和教师的帮助。学校就是一个社区,儿童在这个社区里承担一个有责任的角色。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书本课程的场所。儿童对于成功的感觉来自于他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一个竞争环境下的胜利者。杜威先生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提到,那时学校的缺陷之一是:在社会精神的诸种条件缺乏的情况下,试图为儿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第三,学校将是通过问题激发儿童好奇心的地方。在那里,儿童应该接受各种挑战,即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方法、发明力和创造力去解决问题,没有死记硬背的学习,没有必须一字不错地背下的答案。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儿童很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探寻真相,他也可能会犯错误,但这就是获得真知的途径——这样的知识才能是完全属于儿童的。也许背诵乘法口诀的方式会使掌握知识的速度更快,而通过判断数字间的关系去获得知识尽管会花费较多的时间,但其结果是更扎实地掌握知识。

第四,问题本身应该驱使儿童自己设定任务。没有成人运用的或儿童需要的奖励,没有对错误的判断和标准,儿童的学习将是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和根据儿童能力的不同可以进行调整的。

第五,教师心里清楚全部教学的中心是儿童而不是教材,儿童的发展包括精神、身体和社会性的发展,这些都是教师关注的对象。教师应该考虑每个儿童的学习能力,注意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会针对每天不同的情况而制订不同的计划。所以,教师的任务就是为儿童选择有价值的经验,选择能激发儿童兴趣的问题,鼓励儿童去探究,并引导儿童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

以前,学校课程中充满着事实性的材料,课程数量之多让学生和教师都难以承受。正如杜威先生所看到的那样,教师的职责是从广泛的事实中进行适当的选择,并随时准备作出改变,或抛弃任何已被证明不具挑战性的经验。教师与学生一起工作、提问、调查和制定计划,当儿童遇到令人挫败的障碍时,教师就作为一个指导者、领导者和帮助者为儿童提供服务。

再者,教育的连续性需要保持,以便学生能够从一项具体的活动推及到相关的活动来获得进步。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学习并不是随意的学习,每个学生以前的经验会成为将来的经验的基础。

在杜威先生的教育计划中,还有其他的原则都明显地不同于传统学校所

实施的教育原则。

那些忠诚的教师需要设计杜威学校的教学程序,还需要立场坚定地反对一些旧的教学法继承者的批评。他们要解释根据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来学习,每个儿童都能学会阅读、书写和拼写;还要解释因为儿童在烹饪、缝纫、编织和木工的过程中需要计算,他们便会主动地学习计算。他们必须坚信和致力于应用杜威教育哲学思想中的观点。教师的这些解释会遭到怀疑。例如,允许学生在教室里自由走动,与其他同学探讨调查情况,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就如他给予别人帮助一样,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吗?没有竞争,没有奖励,而将竞争和奖励还给教师,那么教师给儿童什么呢?没有记忆?没有机械学习?没有纪律,除非有问题出现?甚至以帕克上校的库克县师范学校的工作作为范例,鼓励教师勇敢地面对针对杜威学校的批评、误解和经常性的嘲讽。

有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一些早期的教师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以设计、调查和必要的方式来保护他们为之而努力的学校自由,新的读、写、算的方法,为数不多的安静与被动的学习,以及学校制定的纪律。杜威先生的思想和原则,以及他们对儿童的奉献和在愉快学习方面的成功,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

家长协会

不仅只有教师要保护他们所热爱的事业,家长也是有理由把孩子送到杜威先生这所不寻常的学校;而且家长们常常要求学校证明那种非传统的教学活动正在进行。

在学校开办的第一年,杜威先生邀请家长们共同商讨学校发展的问题,家长之间相互交流学校的情况,然后提出建议。尽管相对明确的讨论十分简单,即儿童很喜欢学校、喜欢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快乐,但是,家长所得知的内容可以在心理学上给以相应的问答。事实表明,家长是学校忠诚的支持者。学校建立的头半年末,学校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的情况,一位家长捐赠了 2500 美元,使得学校可以继续开办下去。

第二年初,家长协会(Parents' Association)成立。它有着双重的目的:一是为学校提供财政支持;二是对教学方法和内容方面存在的一些偏离情况提供建议。随着学校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大,不断有新的家长要求加入家长协会。

这样的家长协会直到今天仍是独一无二的。它由家长自己组织成立,是

一个著名的教育团体。此外，它完全是家长的组织，而不是家长与教师的联合体。实际上，家长协会中的教师只是荣誉性的，而不是固定的成员，每三年成立一个家长班，向所有成员开放。在家长班上，杜威先生会详细阐述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与家长们的讨论并回答一些有关学校活动的问题。《学校与社会》一书就包含了家长协会成立时杜威先生所做的演讲。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协会的基本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并不是学校整体的一部分，但它从未失去作为学校的重要助手的原则。它逐渐拓宽了成员的范围，增加新的成员，以保持其实力与独特的性质。

邻居

杜威学校的邻居应该说是那种接受、培育和支持一所如此不一般的学校的邻居。由于比邻芝加哥大学，因此，海德帕克—肯伍德地区的居民具有良好的修养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临近地区它以良好的声望而闻名。居民的职业多为医生、银行家、律师、实业家和大学教职人员，他们的房子有的很豪华，有的很现代。正是这所大学，也许是它的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吸引了当地的许多知名人士。他们分享了探寻的精神，彼此之间给予开拓新领域的激励与鼓励。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许多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社会变化在这里得到讨论和推动。例如，移民的法律，监狱制度的改革，关闭剥削工人的工厂，纯净食品法案，降低 12 小时工作日，妇女选举权，等等。1893 年，哥伦比亚博览会在中途岛沿岸的杰克逊公园举行，不仅展现了电能和光能的新发展，而且表明了许多新的、发人深省的想法。也许外界听到更多的是博览会上的摩天轮和埃及香妃的舞蹈，而不是关于信仰及提出新的社会观点的国际会议，但博览会后来偏离了时代思考的主题。周边地区弥漫着这种气氛，这正是杜威学校发展和繁荣所期盼的。

二、实验学校的兴盛(1896—1900)

在 1896 年 1 月实验学校开办之初，只有 12 名学生；到了 10 月，就有 32 名学生入学，年龄从 6 岁到 12 岁；2 位全职教师(其中一位教科学、即自然学

习,另一位教授历史与文学),1位手工训练的指导教师,1位音乐兼职教师,还有3名研究生作为助手。甚至在第一年结束前,学校的发展就超过了它原有的规模。在1896年圣诞节期间,学校迁至第57大街和罗莎莉广场(现哈珀大街)的西南角的南方公园俱乐部,搬迁的费用是由一些热心的家长提供的。更大的新场地意味着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在众多申请入学者中选出12名儿童入学,此时需要更多的教师,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经费用于支付临时教师的工资。

事实上,资金缺乏一直是这所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学费很低,开始学费设定为每季度12美元;对于年龄大的儿童,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季度25美元。所以,需要寻找资助。在最初的几年,学校每年收到的捐赠总额在3000美元至5000美元。1899年,个人的捐款从10美元到2400美元不等。

到1897年10月,学生入学人数达到60人,教师16人,学校场地再一次不足,又一次面临更换更大的场地的要求。一年后,学校迁至艾利斯大街5412号,仓库与房子之间有一条隐蔽的小路,仓库可作为体育馆和手工训练教室。

从一开始,杜威先生就希望学校招收四五岁的儿童,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直到1898年,夏威夷的卡索(Castle)家族特别捐资了1500美元,这样杜威学校就增加了幼儿园部,学生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到了1898年秋天,在总共95名入学儿童中,有20名6岁以下儿童,教师人数也增到12位全职教师,7位兼职教师。兼职教师为大学在校生,他们可以免除大学学费作为在杜威学校服务的回报。在1903年迁至埃蒙特·布莱恩大楼之前,学校一直设在艾利斯大街5412号。

教师与课程

当杜威先生向哈珀校长报告1897至1898年的学校工作时,杜威学校账目的总支出为12870美元,其中大部分(9160美元)用于教师工资支出。杜威先生解释道,为了聘请到好的教师,就必须提供高的薪水。他还补充说,有许多教师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拿到很高的工资,选择与杜威一起工作是出于对杜威学校的兴趣。

在学校建立初期,杜威先生计划让不同年龄的儿童在一起学习,较大的

儿童帮助较小的儿童,就像在家里一样;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他还设想,每个活动小组由一位教师教所有的科目;但是,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太具挑战性和刺激性,这驱使他认为各门课程还是由专业的教师来教。到1898年时,学校在分部的基础上,在文学、历史、科学、木工、体育、编织、烹饪和音乐方面都有专门教师。

教师的工作就是向儿童提出问题,然后帮助他们确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做什么。教师也必须加入其中,有时儿童可能会遇到迷惑不解的问题,当儿童手足无措时,教师会通过提问或讨论的方式提供帮助,提供儿童找不到的材料,或当儿童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而受挫时,教师也会提供帮助。

所有的小组都学习历史,杜威先生认为,这是让儿童“洞察社会生活”的一种途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的学习——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历史与科学课程的内容由教师选择、组织和评价,并决定内容的保留或删除。

学校的活动、持续的实验及儿童学习的实验室情况,使支持者与批评者同样感兴趣。《大学纪事》(University Record)是一份小型的传单式的报纸,在大学内每周五发行,几乎持续报道了从1896年11月初到1897年7月的整个学年关于杜威学校一些小组教学的情况。报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细节,以致家长、其他教师和大学教职员工都能清晰地知道杜威学校所做的事情。在这份报道中,任意选取了学校的一些活动。

第一组由年龄较小的儿童组成,他们烹饪谷类食品、玉米粉、玉米粥,制作酸梅酱、苹果酱、酸梅果冻,焖梨子、杏子和西梅。他们称糖时使用盎司,计算杯子中的其他成分,以分数和其他数字运算配合使用,并学习读仪表。

第二组的活动是在烹饪时对切片与滚刀进行比较,从全部谷粒中分离小麦,计算每个谷粒的淀粉含量,进而得出烹饪所需水的分量和时间。

第三组由6岁和7岁的儿童组成,他们加热蔗糖制作糖浆,从棉籽中分离皮棉,为棉布染色。

第四组由7岁和8岁的儿童组成,他们的活动是将融化的铅管倒入砂模中,来制作不同刻度的砝码,估算每一重量所需融化铅的重量。他

们的活动还有制作温度计。

第五组由 8 至 10 岁的儿童组成,他们通过显微镜观察生羊毛,对羊毛纤维与棉纤维进行比较,用手梳理羊毛,然后在手工训练课上制作一套用来做杯子的骨架。

第六组由 9 岁儿童组成,他们通过熔化锌、铅、锡,然后加入铋、钠和镉制成白蜡。

第七组由 10 岁的儿童组成,他们播下种子,试验不同的温度和湿度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第八组由 11 岁的儿童组成,他们制作加强棉纤维的机器。

第九组由 12 岁的儿童组成,他们为较小年龄的儿童制作三叶草的几何形状的模型,因为低年龄组的儿童用这个模型来印染布料。

第十组由 13 岁的儿童组成,他们观察太阳的高度,利用观察结果测定芝加哥的纬度。

学生没有被分为年级,但教学是逐级进行的;学生按共同的兴趣、智力和反应速度进行分组。在较小的儿童中,8 至 10 岁的儿童为一组;在较大的儿童中,12 至 15 岁儿童为一组。也有可能由教师根据类似的合作情况进行分组。因为在智力与成绩测试之前,教师必须自己设定标准。这里没有考试,也没有分数。

1897 年 2 月,每日的工作量在连续出版的《大学纪事》上也被刊载出来。每天,第四组花 30 分钟在车间内排列长凳,在画板上画画;30 分钟用于静读;30 分钟用于缝纫;再用 1 小时准备和烹饪午餐,午餐包括豌豆汤、热米饭和可可等。下午,朗读丘奇(Church)的《伊利亚特》(Iliad)的第十章,然后以儿童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讨论结束。

在接下来的周五,同一个组花 30 分钟在午间工作;30 分钟用于根据黑板上的地图制作希腊的高山、河流的模型;45 分钟在体育馆锻炼。下午,返回学校,写希腊人对他们所崇拜的人物的看法,然后朗读并讨论他们的作文。

外语

学生很早就开始学外语。法语与其他科目联系起来学习,开始于 1897

午。英语语法的学习是在其他活动中偶然进行的,法语语法也是一样的。但是,对话是最重要的。儿童学习用法语谈论烹饪、缝纫、编织和作业,他们学习法语的音韵、唱法语歌、将法语故事和民间传说改成剧本、用法语交谈。在当时,这与原来的语言教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两年后的 1899 年,杜威学校增加了德语和拉丁语,同样使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学。法语与德语的歌曲和戏剧出现在了学生撰写的圣诞节目的书面记录上。法国与德国的历史和文学也包括在丰富而有趣的课程中。

健康项目

杜威学校在健康方面的工作,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学校早期的历史中,学校教职员中有一位医学博士,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健康方面的工作与运动项目联系在一起,对每一个儿童进行个人体格检查,仔细检查他的眼、鼻、喉、耳、心肺等器官,任何小毛病都会通知家长,以便儿童可以得到正确的处理。学校强调学生的正确姿态,检查还包括脊椎弯曲度,根据一年两次的体检情况,可以对椅子和课桌的尺寸做出正确的判断。

体育课包括户外的游戏(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和室内的游戏和练习。部分运动器械,如棍棒和哑铃被有效地运用在唱歌和舞蹈中。学生们不仅在上课时间进行表演,课后也会进行表演。

当然,健康与体育活动方面的内容,每年都会进行调整,但这一直是杜威学校日程安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校外旅行考察

杜威学校课程上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经常进行校外旅行参观。1896 年至 1897 年,每周一的早晨会安排一个半小时去哥伦比亚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是为 1893 年哥伦比亚博览会而建,坐落在现科学和工业博物馆的位置,拥有很多展品。在杰克逊公园的伍迪德岛上有一小块空地,年龄较小的儿童常常在此观察自然界的季节变化。年龄较大的儿童常常去芝加哥大学实验室观察仪器,例如,干涉仪和分光镜。他们也有时间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考察,例如,去史东尼岛上的采石场观察冰川地貌,去奥劳拉的棉纺厂观察纺纱,去维尼亚观察泥崖,去米勒站观察沙丘和沙漠,去第 63 大街的城市周边观

察典型的草原地带,等等。

一些家长批评校外旅行考察会使儿童身体疲劳和浪费时间,但考察仍是学校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实际经验和观察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为什么还要从课本上学呢?

来访者

常常有大量的来访者来参观被称为“游戏学校”的杜威学校。正如帕克学校的校长科克(Flora J. Cooke)所写的,他们带着当时他们可以接受的学校观念而来。1910年12月6日家长协会成立之前,他在一份报纸上读到:

几年前,在纽约的一所很好的学校里,我看到孩子们拿出书本,打开书,然后开始学习计数“1,2,3”。他们举起石板向上倒水,清洗刚才的字迹,然后再进行计算。还有,他们行进到某个地方后,站成一排,找到自己的位置,朗读、拼写或重复乘法表,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所有人都像高效能的机器一样平稳地运行。值得一提的是管理者,她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入任何一个年级的教室,查看学生是否确实在学习同样的课程,使用同样的方法,这样的描述绝非夸张。

头脑中带着上述画面的来访者有点奇怪地发现,杜威学校的学生在教室内自由地走动,与其他人谈话,向教师提出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问题),并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学习。有的来访者把杜威学校视为一个松散的和混乱的场所,是“一种失控自由下的混乱”。有的来访者说,杜威学校的教师只是通过发现儿童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让他们去做,不过是简单地尝试使儿童高兴而已。但是,另一些来访者看到了新的教学方法的價值。

从学校成立开始,来访者就很多,致使一些来访者无法参观与聆听学校的工作和讲解。到1897年11月时,杜威先生为没有足够的向导而感到遗憾。来访者可以随意参观每一个教室,每个教室都为来访者准备了多余的椅子,实际上他们受到杜威先生的邀请,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1899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是来访日;1900年,每周一、周三、周五是来访日。甚至到今天,学校每年也要接待近2000名来访者。

新的名称

1900年,杜威学校成立四周年的时候,它一直被认为是“大学初等学校”(The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后来叫做“实验学校”(The Laboratory School),回到杜威先生最初的设想。这要归功于埃拉·弗拉格·杨(Ella Flagg Young),她于1900年在教育系担任副教授,与杜威先生共同负责教育系的教学管理工作,正是她建议改为“实验学校”这个名称。

交流与互相联系

就杜威学校的实验性质而言,建立一个特殊的交流制度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年,教师们就试图探索教学方法并将在不同小组进行试验,此时,每周的教师例会也开始举行。会上,报告前一周的工作情况,以便教师们知道各小组应该做什么以及成功的做法。教师们互相交换对于问题、教材和技巧方面的想法,进行互相学习。教师们也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其他小组进行观摩,以便每位教师都能了解整个学校的计划和措施。除非正式的教师会议外,还有正式的研讨班和教育俱乐部会议。

学生们对各个小组的活动也非常了解,而不仅仅了解自己小组的活动。在校外旅行考察和短途旅行中,每周由不同的小组集合在一起,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在看故事书和写作的同时,他们也会表演自编的故事和演唱他们创作的歌曲。他们几乎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排练就进行正式的表演。他们的表演是自由和自然的,是儿童的自我表现。另外,学校校报每周发行,校报的编辑由一位高年组的学生管理,但低年组的学生提供报告、故事、诗歌和歌曲。

家长协会是另一种交流的形式。家长不仅聆听杜威先生的演讲,而且也会向他提出问题。每月一次家长会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杜威学校常常是家长们讨论社会事件时的主题。每周出版的《大学纪事》中增加了上述的报告。在家长、管理者和学生之间的一种更有效的交流制度是难以想象的。结果,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从个人的角度关注和参与所有学内进行的活动。

到1900年时,学校开办的第四年,杜威学校已被人们广为知晓。《大学纪事》中报道了一则由密执安大学欣斯戴尔(A. B. Hinsdale)所写的全国教育评议会会议的评论:“在这个世界上,与国内其他的初等学校相比,有更多双眼睛关注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众所周知,的确如此,为了生存,杜威学校需要

资金,还需要依赖于忠诚的家长和朋友们的资助。

三、实验学校的发展、变化和挑战(1900—1904)

帕克上校来到芝加哥大学

在担任库克县师范学校校长的18年中,帕克上校不断受到来自政敌的困扰,这些政敌借助保守的教师与官员来干预和妨碍他的工作。1896年1月,库克县师范学校被芝加哥市接管,由库克县委员会负责,更名为“芝加哥市师范学校”,但库克县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反对帕克上校的观点。

在以后的两年中,由于这些人的强烈反对,帕克上校不能按照他的想法来进行培训教师的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埃蒙斯·布莱恩(Emmons Blaine)夫人的儿子在实习学校读书,她对帕克上校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埃蒙斯·布莱恩夫人意识到,对于帕克上校来说这是在浪费时间,她使委员会认识到帕克上校教育计划的价值。布莱恩夫人是收割机的发明者塞克斯·麦考麦克(Cyrus McCormick)的女儿,非常富有。她为帕克上校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帕克的学校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校,使帕克上校可以自由地实现他自己的想法。1899年6月,帕克上校接受了捐赠,并与原学校的大部分教职员工离开了芝加哥市师范学校。由于作为私立学校的新教学楼需要重建,因此,教职员工获得了一年多带薪假期,可以进修学习或到国外旅行。

1900年,设计师的新学校设计已经准备就绪。这所学校以“芝加哥学院”(Chicago Institute)而闻名。这时,哈珀校长提出另一个建议:帕克上校把他的学校带到芝加哥大学以组建教育学院。

接到哈珀校长的邀请后,帕克上校以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把这个问题交由全体教职员工讨论。有些人对这个建议感到担心,担心他们实验工作再次受到阻碍,很可能被大学本身所破坏。哈珀校长获悉此事后,于1901年2月写信给帕克上校,使帕克上校相信他不仅可以继续自由地工作,而且可以得到大学内其他院系的帮助。

这引起了帕克的学校内更激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一个问题:布莱恩夫人的大笔捐赠最好用在哪里。最后,尽管教职员工的工资被削减了,但他们都选择与帕克上校一起去芝加哥大学。

帕克上校与哈珀校长及布莱恩夫人之间有很多的一致性，布莱恩夫人的捐赠随帕克上校一起到了教育学院；她讲明帕克上校要担任初等学校的校长，杜威先生负责中学部。教育学院包括教育系、一所初等学校和一所幼儿园。布莱恩夫人的意见被采纳，并于1901年3月初最后达成共识。

家长的抗议

然而，在学校与家长的协商过程中，并没有杜威学校的家长参加。1901年3月19日，在春季会议上发布了一份公告：芝加哥学院将并入芝加哥大学，帕克上校将成为初等学校的校长。这份公告就像投入人群中的一枚炸弹。

家长们引起了极大的骚动，他们担心一直缺少资金的杜威学校会被资金充足的帕克学校所吞并，其结果不仅会失去其独特性，而且也会失去实验方法的进步。他们也反对实习学校，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实习的对象”。他们充分信任杜威先生，反对将家长的管理权委托给中学管理部门。

当晚，家长协会的会议随即举行，以便所有的成员都能参加。会议决定向芝加哥大学董事会要求允许杜威学校继续开办，同时，家长们确保每年向大学提供5000美元的捐款。董事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杜威学校要向大学提交预算和预购物品清单。于是，杜威学校得以继续开办。这样，芝加哥大学内就有了2所初等学校：一所是帕克上校负责的训练教师的实习学校，另一所是杜威先生负责的教育系的实验学校。

为芝加哥学院或教育学院安排的新教学大楼坐落在第58大街与艾利斯大道（现为书店）的拐角处，总花费为2.5万美元。

1901年7月，帕克上校与他的教职员工在科兹明斯基公立学校开办夏季学习班。夏季学习班的一个学生在信中写道：

我在科兹明斯基公立学校与帕克上校共同上了一节课。我经常说，他的课完全改变了我作为教师的职业生涯。他请我们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学，尤其要了解儿童。他伸出那双宽厚的手，做出姿势，泪水轻轻地流下。

同年10月，帕克上校和他的教职员工迁至尚未完工的新校址。当时共有

104 名学生,28 位教职员工。一位教师生动地回忆起在教音乐的过程中以锤声、锯声、刨声来伴奏。

更早的时候,计划在芝加哥市的北郊设立芝加哥学院时,韦伯斯特大道的分校就按照原计划开始照顾已在校注册的学生,布莱恩夫人也为建立分校提供了资助。科克(Flora J. Cooke)被选为分校校长,他曾在库克县师范学校和芝加哥市师范学校做过教师。教职员工中大部分在帕克的学校受过训练,这就是弗朗西斯·帕克学校的开端。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帕克上校就成为北边的学校校长,北边的学校以他的姓名命名;南边的学校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

斯卡蒙广场

芝加哥学院或教育学院的教学楼只是暂时的。到 1901 年时,学校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准备更换成更大的新教学楼,这就是今天的埃蒙特·布莱恩大楼,坐落于金巴克大街与肯沃德大街之间。

新教学楼的建筑用地是由约翰·杨·斯卡蒙(John Young Scammon)的妻子提供资助。斯卡蒙先生曾是芝加哥大学的董事、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芝加哥历史学会的有影响的成员之一,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芝加哥公民,还是一位自由的教育界朋友。他提供了在海德公园旁的费恩伍德的一大块地产,还有在门罗(肯沃德)大街和麦迪逊(多彻斯特)大街之间的第 58 大街建造一所住宅。斯卡蒙夫人提出,将海德公园旁的费恩伍德第 2 街区 5 至 16 号地产以一半的价格卖给大学,但条件是这块地必须单独地、专门地为芝加哥大学所用,为纪念她已故的丈夫,故而叫做“斯卡蒙广场”。刻有斯卡蒙先生名字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广场西南角的埃蒙特·布莱恩大楼内。如今,这个广场通常被称为布莱恩广场,但斯卡蒙的名字永久地留在了斯卡蒙花园。

布莱恩大楼

1901 年 6 月,在一个适当的典礼之后,新的教学大楼开始动工。为了纪念布莱恩夫人已故的丈夫,它被命名为“埃蒙特·布莱恩大楼”。6 月 13 日,哈珀校长曾邀请布莱恩夫人到他的家里,“以便与洛克菲勒夫妇(Mr. And Mrs. Rockefeller)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教授一起在 11 点 50 分前乘车到

肯特剧院,在那里将有巴特勒(Butler)教授的报告”。“在这些活动之后,车子将驶到斯卡蒙广场,举行新工程的开工仪式。”

1901年6月28日的《大学纪事》中这样报道:

……一列队伍行至斯卡蒙广场,广场上安静了下来,简单的仪式开始举行。哈珀校长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性发言;然后,帕克上校为新的教学大楼奠基并做演讲,他最后以福禄培尔的一句话结束:“让我们与儿童一起生活吧。”

帕克上校为新的教学大楼奠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没能看到大楼竣工就去世了。1901年秋大,他带病去暖和的南方过冬。1902年3月,帕克上校去世。

帕克上校去世后两个月,杜威先生仍然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帕克学校的教师杰克曼(Wilbur Samuel Jackman)被任命为该校的校长;杜威夫人(Alice Dewey)被任命为初等学校校长。这两所学校分别独立运行,直到1903年10月埃蒙特·布莱恩大楼竣工。

20世纪初,芝加哥的弗朗西斯·帕克俱乐部由芝加哥的学校教师组成,他们都是这位伟大教育家的朋友或仰慕者。这个组织请了一位雕刻家雕刻了帕克上校的半身塑像。1916年12月9日,帕克上校的塑像陈列芝加哥大学布莱恩大楼的壁炉之上。杰克曼先生展示了这个礼物,并向捐赠者致词:

雕刻家将帕克上校的塑像轻轻地移到入口处,他好像注视着、鼓励着和欢迎着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为了追求真理和树立理想而努力。

布莱恩大楼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大部分早于它建成的学校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南面的一些大扇窗户使得教室非常明亮,而北面的许多窗户能使光线射到走廊上。正如建筑师罗格斯(James Gamble Rogers)在《大学纪事》(1903年11月)上所写的:

……世界上可能没有那所学校的建筑有这样尺寸的窗子——换句话说,在白天的任何时间,每间教室都充满着阳光。

同样出自这篇报道:

在这个建筑的设计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实体的地面结构,使用了25×88的大型号的水泥板。在教育学院(布莱恩大楼)里有12块这样的水泥板……这些都经过实验方法的检测。

检测的方法是将房间里堆满砖头……结果是地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而又将两根铁梁置于屋子中央,然后将所有的砖集中起来,结果是不仅房间没有受损,而且地面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偏离。

这个建筑也反映了帕克上校的哲学思想。房间为各种活动所设计,房间的规格有大小两种规格(小房间是大房间的一半),符合专门的主题活动的需要。有用于铸造和类似窑的房间,有用于家政和类似商店的房间,还有用于印染和编织的房间。大楼内还设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展览馆。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房间都是不常见的。多年来,这些教室都很好地适应了学校变化和扩大的需要。

派系与冲突

在最初的3个月里,杜威学校、帕克上校的初等学校以及幼儿园、教育学院、手工训练学校都设在埃蒙特·布莱恩大楼(1904年1月,这座大楼最后改名为贝尔菲尔德大楼)。1903年,两所初等学校被合并,两个单位合成一个单位,其融合的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而且不是很友善,出现了小集团和对抗的现象。杜威学校的教师只忠于杜威先生;同样,帕克学校的教师也只忠于帕克的精神。后者拥有布莱恩夫人这个盟友,只要一有麻烦的事情,她就会写信给哈珀校长要求他解决。杜威先生和帕克学校教师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布莱恩夫人不给哈珀校长写信的时候,杰克曼先生也会给哈珀校长写信,有时抱怨杜威先生不关心帕克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和会议,有时抱怨教职员会议没有定期召开,有时抱怨杜威先生的态度是一种哲学即冰冷的科学

态度,有时抱怨杜威先生自己缺席了重要的会议。杰克曼先生明显地感到帕克学校的教师遭到了冷落,因此,他写信给哈珀校长说:“冰河时代应该被迅速终结。”进而,不能接受杜威先生的夫人作为初等学校的校长,尤其是帕克学校的教师。

1904年初,杜威先生被告知,这一年年末将终止杜威夫人的工作。此后不久,杜威先生提出辞职,尽管他要求哈珀校长向董事会澄清,辞职的原因并不是哈珀校长拒绝重新任命他的夫人。正如杜威女儿在后来出版的书^①中所写的,杜威先生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哈珀校长对杜威学校漠不关心且充满敌意。虽然辞职信1905年1月1日生效,但在1904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杜威先生与芝加哥大学的联系实际上已终止。

先驱者的离去

帕克上校的去世,杜威先生的辞职,表面上看来,实验学校和实习学校都不存在了,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毫无疑问,学校改变了,但这两位教育家的影响并未消除。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史上他们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们基本的教育哲学思想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

儿童和教师的自由曾是学校的主题词——不是无纪律的自由,而是有目的的自由。儿童需要自由地调查、自由地走动、自由地交换意见、自由地提问,这些教育理念从未失去。确切地说,在美国没有哪个儿童不受其影响,因为约翰·杜威和弗朗西斯·帕克的教育哲学思想使得美国的学校经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有趣。

大学附属中学

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University High School)由几所学校组成: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南边中学(South Side Academy)及大学实验学校。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由于约翰·格雷拉(John Greerar)捐赠的5万美元而建立,一幢破旧的大楼和一份很有价值的资产(这份资产后被以20万美元卖掉)。1897年,这所学校并入芝加哥大学,尽管学校仍位于密执安第12大街,哈珀校长成

^① 即杜威的女儿简·M·杜威1939年所出版的《约翰·杜威传》。——编者注

为该校行政上的最高领导。

作为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所较大的学校就是南边中学,1892年由西森(E. O. Sisson)建立。西森以前是芝加哥大学摩根·帕克学院的一位教师。1897年,欧文(William Bishop Owen)接替西森成为校长。1899年,该校迁至列克星顿大道5467号的新址,新校区足以容纳200名学生。

1901年,最早开始进入杜威学校的学生,已到了进入中学的年龄。这些学生组成了第三所中学,最后与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及南边中学合并为大学附属中学。1901年7月,杜威先生开始了担任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欧文先生继续任南边中学的校长,贝尔菲尔德先生继续任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的校长。

这两所学校开始没有中心的办公地点,直到1904年1月,才搬到一起。1902年6月,因为新大楼(称为手工训练大楼,今天已更名为贝尔菲尔德大楼)而使校区场地遭到毁坏。一年后,手工训练学校的学生用木槌和铲子为大楼奠基。

“大学附属中学”这个新名称是经过慎重考虑而确定下来的。在采用这个名称的声明中,包含了一个条件:“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继续开设技术性课程,这一点应予以承认……据此,芝加哥手工训练学校可拥有自己的校长、学习课程和发布通告……”

1903年夏天,手工训练学校的机器及其他设备从密执安第十三大街移至芝加哥大学,直到新大楼竣工。从1903年10月至1904年1月,学术性课程与车间工作在新竣工的布莱恩大楼内进行;但到1904年1月,车间工作转入新建成的手工训练大楼内进行。

在大学附属中学中,欧文先生和贝尔菲尔德先生这两位校长同时存在,是三校合一的主要困难。两所大规模学校的学生主体都有很强的对抗性,于是出现了一种预言,即不可能处理好这种派系关系。因为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忠诚的学生和校友以及支持者。然而,1904年春天,这种联合突然通过一份非学术性声明而完全实现了:大学附属中学拥有了芝加哥所有预备学校中最优秀的足球队。

中学合并后的第一年,入学人数为552人。其中,123人来自手工训练学

校,125人来自南方中学,41人来自实验学校,其余来自美国中部和西部地区。这所学校良好的教育声誉得到更广泛的传扬,它的手工训练学校与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的手工训练学校在美国位列第一。

尽管事实是中学和初等学校处于同一街区,而且相距非常近,但它们执行两个完全分离的制度。初等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一所实验学校,是专业的教育学者的实验室;中学集中于对学生的教学。同时,大学附属中学不是一所工艺学校,其目的不是制作,尽管手工训练学校是它的一部分。根据贝尔菲尔德的想法,这所学校旨在准确的知识、诚实的工作、清晰的思考以及判断力和意志力的发展。

然而,没有不久,中学的实验性质开始显现。有两个问题有待研究:一个是用代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学习经验来修改数学课程;另一个是学校中社团组织的协调,以便使学生的社团生活真正具有教育性。兄弟会和姐妹会被解散,而俱乐部、社团与学术团体在校内建立了起来。

杜威实验学校浅析^①

[美] 劳伦斯·A·克雷明

1894年,约翰·杜威刚刚把家搬到芝加哥大学,就参观了库克县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显然,他对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5年,他的儿子弗雷德(Fred)在实习学校科克(Flora Cooke)小姐的一年级班上读书;翌年,他的女儿伊夫琳(Evelyn)也进了这所实习学校。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研究,1896年初杜威夫妇创办了自己的学校^②。这所新学校之所以称作“实验学校”,是要强调它的实验性质,尤其是要强调它是用来检验杜威博士的一些理论以及它们的社会含义的。实验学校刚开办时,只有16名学生、2位教师。到1902年,它已发展到了140名学生、23位教师和10名助手。杜威博士是实验学校的董事,杜威夫人担任校长,埃拉·F·杨(Ella Fiagg Young,后来是芝加哥的第一位女督学)^③担任教导主任。^④到1904年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时,这所实验学校在美国教育界

① 译自:Lawrence A Crem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 1876—195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135—142. 标题由编译者所加。

② 这些资料取自科克(F. Cooke)和梅尔文(A. G. Melvin)之间的一次谈话。见:梅尔文,《教育史》,1946:323。——原注

③ 杨(1845—1918),美国教育家。——编译者注

④ 简·杜威(Jane Dewey)在1939年写的简要的《约翰·杜威传》中提到:她的父亲把埃拉·F·杨夫人看作“他所接触过的在学校管理工作上最有见识的人”。正是杨,建议杜威把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实验学校”;正是杨,帮助杜威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践。见埃拉·F·杨对实验学校理论的解释,《学校中的隔离》(芝加哥,1900)。这是一篇她在芝加哥大学做的博士学位论文。杜威夫人在创办实验学校中的作用,见伊斯特曼(M. Eastman):“约翰·杜威:我的良师益友”第二部分,《新领袖》1959年4月6日,第22—23页。杜威夫人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大学的理事们感到心理实验的必要性,但对教育实验却抱着怀疑的态度。碰巧,1895年10月,大学拨出了一笔1000美元的款子,作心理实验用。由于没有房间或其他设备,无法利用这笔款子,它很可能要归还。那时,由于说通了大学校长,最后他同意把这笔款子作为教育实验用。这样,校方支持了实验学校的教育工作。”——原注

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教育实验园地。确实,有一些人坚决认为,后来没有任何学校能在影响、质量和贡献上比得过它。

鉴于帕克从实践领域开始,然后转到理论上去,杜威就从一些主要观点开始(他称之为假设),又设计出了检验它们的方法和课程。用杜威的话来说,实验学校的目的是“在发展个人能力和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在管理、教材选择、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和纪律等方面,去发现一所学校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作的社区。”^①后来,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详细阐述了这个最初的假设:生活本身,尤其是那些为人的社会需要服务的职业和社交活动,将为教育提供基本经验;学习的内容可以大部分是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学习好坏的主要检验,是个人的思维习惯和应付新的社会环境的能力。一方面,学校教育要专注于合作的尝试;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能对社会进程产生有益的影响。^②

梅休(Katherine Camp Mayhew)和爱德华兹(Anna Camp Edwards)两姐妹实际上在实验学校创办初期就开始任教。她们合写了一份详细的、引人入胜的实验学校工作记录(1896—1903年)。同帕克的实习学校情况一样,实验学校对幼儿(4~5岁)的工作一般被视为家庭活动的扩展。其宗旨是“连续性”,尽力避免使儿童的经验中断。因为儿童经验的中断,可能“妨碍、推迟或阻挠儿童智力生活(他在活动中的想法)自发的表达。”这样,儿童通常的一天活动就可能包括谈话、建设性工作、讲故事、唱歌和游戏。这些活动都代表一种尝试,即从所熟悉的东西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它的含义。梅休和爱德华兹报告了一组4~5岁儿童的活动。情况如下:

……儿童对各种食物、服装和衣着用品以及宽大而结构复杂的住宅,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很多回答,好似一些小路,通往一条大道,又回到农场。他们到农场参观,看到果园、人们采摘水果以及堆着一束束玉米的田地。这次参观是很多活动的开始,当然这些活动随着教师、儿童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个班的部分儿童做食品商店的游戏,

^① 梅休(K. C. Mayhew)和爱德华兹(A. C. Edwards). 杜威学校. 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15—16. ——原注

^② 大学纪事,1986(1):417—422;芝加哥大学学院. 学院纪事、记录和计划. 1896—10—23. ——原注

出售水果和糖给人做果子酱。有的扮售货员,有的扮送货员,有的扮母亲,有的制造送货车。扮售货员的使用量杯计量糖和酸果,并用纸包好,便于“顾客”携带回家。在教师指导下,游戏被引导到讨论要有一间大仓库。这是一个宽敞的地方,可以贮藏很多水果。食品商店的水果只够卖几天,因此仓库要经常为食品商店供应水果。他们用一只大箱子做成批发商店。因为仓库有几层楼,需要电梯。一个儿童自愿动手,用当时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的一种狭长的包装内衣的盒子做电梯。^①

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活动孕育着学习的可能性。不管儿童怎样天真,他们总是先了解他们的家庭与范围更大的社区的生产、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然后领会到一个工业社会实质上是互相依存的。此外,阅读、书写和正确表达的根源在于谈话;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和地理学知识的来源在于农场参观;不仅手工训练,而且测量、计算和更普通的算术练习的开端也在于“批发商店”的建造。对于具有教育机智的教师来说,所有的活动和职业既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也有一种内在价值;它们既为社会发展和儿童智力成长提供了机会,也更直接地使儿童得到了满足。

但是,有一点要提出来,即杜威曾强调指出,他晚年没有同自以为是他门徒的某些人保持联系。一个不知道利用机会激励学生或培养学生社会观点的教师,就没有一种什么即将来临的清楚感觉。就其性质而言,这意味着这种人可能离开学校;就其智力而言,这意味着透彻了解有条理的知识是在学科中表现出来的。要认出儿童早期学习数学的可能性,教师就必须懂数学;要认出儿童学习基础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教师就必须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知识。总之,对教师的要求是双重的:既要掌握有关学科的完备知识,又要利用儿童童年时期的那些共同经验,引导儿童理解并描述这种知识。正如杜威自己指出的那样,这种要求确实是重要的,但又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响应改革的号召而抛弃传统的课程是简单的,以一连串不但不能促进儿童生长、也不能结束在方法和质量上错误教育的混乱活动来代替传统课程,也是简单的。

^① 梅休和爱德华兹. 杜威学校. 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64—65.——原注

这些指导幼儿工作的原则从属于实验学校的整个工作。^① 6岁儿童——或称做“6岁组”——继续进行“为家庭服务的职业活动”。他们在教室里建造了一个示范农场后，竟然又在校园里种了些冬小麦，经历了从播下种子到做成面包（当然是他们自己烘面包）的过程。“7岁组”专注于“通过发明和发现取得进步”，同一位教师一起研究史前期基本职业的历史发展。“8岁组”抓住“通过探索和发现取得进步”的主题，从腓尼基人的商业贸易活动移到世界探险和世界商业这样范围更大的题目。“9岁组”的重点是美国史，集中在社会服务社和芝加哥的早期发展上。“10岁组”把“殖民地史和独立革命”作为主题。“11岁组”的重点是“殖民地开拓者的欧洲背景”。

与这些主题活动一样，语言、数学、美术和工艺美术、科学、音乐、历史及地理方面的具体工作也在精心计划和妥善安排下取得了进步，而且总是考虑到社会目的。历史成了一幅人类为什么和怎么得到成功或失败的生动画卷；外语同欧洲文化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学；文学被用来记录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希望和抱负。学生刚跨入青春期，教师实际上就注意到他们已逐渐“从直接了解事实或纯观察者的心理观点移到了成人的逻辑观点”，“注视着—一个目标，并以进一步使用为目的，将观察到的东西分门别类”^②，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学术训练代替一些花费不少时间甚至延续一整年的合作活动，鼓励12~13岁儿童致力于专门的课程计划。

13岁儿童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知识，发展了很多技能和敏感性——手工的、社会的和智力的。他们已经学会了合作工作和独立工作，并能清楚和简要地进行自我表现。他们已经无数次地检验过新发现的知识，在所有的主要知识领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总之，他们已对中等教育（杜威及其同事将其定义为：一个以逻辑体系组织和独特的学术兴趣占统治地位为标志的学校教育阶段）做好了准备。

^① 已发表的有关实验学校的记录，比当时任何类似的教育实验更多、更详细。见1900年发表在《初等学校纪事》上的9篇专题文章以及1901—1909年《初等学校教师和课程》连载的那些文章。《初等学校教师》1903年6月号的文章全部论及了实验学校。梅休和爱德华兹做了一件值得赞扬的工作。她们根据这堆资料，写成了一份可读性强的纪事。她们用的所有手稿材料，包括油印的教案，打字机打出的报告，从前教师和学生的信件、照片，学生工作的例子以及杜威博士的评注，经梅休和克伯屈教授同意，现保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原注

^② 梅休和爱德华兹。杜威学校。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222。——原注

从实验结果看,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际上有过一些戏剧性变化。当然,杜威能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信心明确地陈述他最初的假设。例如,1901年,他在一篇为新办的《手工训练杂志》(Manual Training Magazine)写的文章里,总体概述了他对初等学校课程的研究结果。按照他的观点,学科内容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现行的事务或职业,如木工、缝纫或烹饪;二是涉及社会生活背景的学科,如历史和地理;三是掌握智力交流和探究的形式、方法的学科,如阅读、语法和算术。杜威得出结论说:“从这三种学科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向,即离开了个人和社会的直接兴趣,采取了间接的和遥远的形式。第一种学科内容不仅为儿童提供同一种类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从事的活动,而且为儿童提供某些他们在每天的生活环境中早已完全熟悉的社会职业方式。第二种学科内容仍是社会性的,但为儿童提供的是共同生活的背景,而不是共同生活的直接现实。第三种学科内容的社会性,与其说是体现在它本身或任何更直接的联想和交往中,还不如说是体现在它最终的动机和效果(主张文明社会的学术连续性)中。”^①在这三种基本类型的课程中,杜威看到了一种课程的主线。这种课程的儿童观是科学的,对社会的影响是进步的。翌年,杜威在《儿童和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中,概述了这个观点,以后又把它写进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中。

人们如果不细读有关这所实验学校的记录资料——公开发表的报告,教师日记、剪贴簿,一些突出学生的工作例子和一些保存下来的照片,就不会意识到这里是一流教师办的一流学校。^②在从原始人到现代芝加哥人一些主题活动的有序进展中,确实存在着那种复演说(杜威曾在全国赫尔巴特学会抨

^① 杜威. 手工训练在初等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手工训练杂志, 1901(1): 193—194. ——原注

^② 实验学校除优秀的专职教师外,还有一批来自大学的知名教授担任顾问. 因此,梅休和爱德华兹指出:“那时,张伯伦(T. C. Chamberlain)精心研究了他那有关太阳系起源的微星学说,并把它告诉儿童. 科尔特(J. M. Coulter)设计和指导了有关植物种系的实验. 其他与学校合作的人,有动物学方面的惠特曼(C. O. Whitman)、生理学方面的洛伯(J. Loeb)、社会学方面的托马斯(W. I. Thomas)和文森特(G. Vincent)、人类学方面的斯塔尔(F. Starr)、地理学方面的索尔兹伯里(R. D. Salisbury)、物理学方面的米切尔森(A. Michelson)、化学方面的史密斯(A. Smith)以及生态学方面的考利斯(H. C. Cowles). 学校感激大学其他系的很多人,尤其是麦克林托克(W. D. MacClintock)夫妇,黑尔(G. E. Hale)、阿特伍德(W. Atwood)以及杜威先生系里的成员,特别是米德(G. H. Mead)、塔夫茨(J. H. Tufts)和安吉尔(J. R. Angell)的继续不断的合作.”见:梅休和爱德华兹. 杜威学校. 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10. ——原注

击过它)的明显痕迹。^①毫无疑问,实验学校在刚成立后的那段时期里过分强调了自由活动,杜威自己也注意到这所学校偏重于“个人主义”。事实上,为了获得资料,“应该给人以很多的活动自由,而不应该强加太多的限制,这是必要的。”^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实验学校的大部分儿童不仅学到了东西,而且学得很好。也许,更重要的是,杜威试图用一个计划、目的和组织都更好的新教学大纲取代他严厉批评过的那种旧课程。他确信自己的革新远不是最后的,也意识到继续努力和进一步改进是教育科学的重要任务。不过,他肯定要失望的。25年后,他不得不承认进步教育失败了,并认为这是一场彻底破坏传统教育、但又很快放弃了更艰难的任务,即建设更好的教育体系替代已被废除的教育体系的运动的运动。

① 见:杜威.原始心理的解释.心理学评论,1902,(9):917—230;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公立学校杂志,1895—1896(15):233—236.——原注

② 梅休和爱德华兹.杜威学校.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1936:467—468.——原注

杜威和他的实验学校^①

[美] 威廉·博伊德 埃德蒙·金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与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在教育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教育思想起点都是把进化论应用于儿童的教育。从广义上讲,他们俩的哲学都是实用主义的,坚持主张智力从属于实际目的。不过,他们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曾为黑格尔和英国理想主义者门徒的杜威,是更冷静和更敏锐的思想家。可以说,他作为自然科学家不足而作为哲学家有余。尽管杜威关于教育实践的思想也与霍尔一样是相当革新的,但他的思想更接近生活实际。杜威和霍尔的教育思想的不同点在于:霍尔的教育哲学的产生,先于他的那些关于理想学校的计划;而杜威则反之,其教育哲学是在与其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工作有联系的、为建立一所理想学校所进行的各项实验中产生的。

杜威在 1896 年创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目的是为未来的学校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在杜威看来,当时的普通学校已落后于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当大部分人民还居住在乡村时,这种普通学校很能适应他们子女的需要;但随着城镇的发展,面对大批儿童丧失受教育的机会时,它们却无能为力。正如杜威所看到的那样,当时最基本的事实是旧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瓦解和结构单一的乡村社区的消失。

杜威指出,现代儿童生活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他们对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仅仅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只见过衣服形式的布,而从来没有见过布料;只见过饭桌上出现的食物,而对别的食物一无所知。他们所居住的房间用煤气或电灯照明,只要擦一根火柴或按一下开关就灯火通明。而一个

^① 译自: William Boyd and Edmund K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A and C Black, 1972: 398—407.

世纪前的农村儿童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就比较幸运。他们在左邻右舍见过从剪羊毛到织布的整个过程；也见过以往获取光亮须从屠宰动物、取油到纺捻灯芯、制作蜡烛等整个辛苦的过程。而不像现在那样，只要按按开关，电灯光就把房间照得如同白昼。因此，无论在智育方面，还是在德育方面，那时儿童的日常生活比今天儿童的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教育价值大得多。那时的儿童在分担家务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现在的儿童所明显欠缺的学习动机，那时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

各国的传统学校都没有重视这一教育环境的变化。过去时代即当教育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的时代的各种影响，仍在这些传统的学校里继续存在。陈旧的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科目仍然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建造教室是为了讲课和听课。在传统的学校制度中，课堂里固定不变的座位是具有典型性的。传统的学校预先都作这样的假定，即学生是被动的，他们只忙于吸收教师为他们准备的那些东西。他们很少有机会从做中学，因为对儿童来说，坐在书桌前除了听讲，做别的任何事情是很困难的。确实，如果儿童们打算做点别的事情，那显然会感到很不方便，因为他们在活动时会展现出他们的个性。

传统学校的一切安排都是把儿童作为群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对待的。这种学校的直接后果会使学生丧失智力上的主动性，而道德方面的损害将更为严重。道德教育，或更确切一点说是社会教育，只能通过参与某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拟定和共同需要的满足才能获得，而在学校中把学生组织成一个个社会团体。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所能获得的道德教育是微乎其微的。杜威指出：在教室里，社会组织的动机和结合的条件都是缺乏的。在道德方面，现存学校的灾难性的弱点在于：它试图在一个显然缺少社会精神的环境中培养社会的未来成员。（这些道德观重复了马克思的观点）

新的时代要求学校有能力把学生训练成完全能在今天的社会中生活的人。杜威实验学校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一理想。为此，杜威认为有四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

(1) 如何把学校与家庭及其周围的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2) 如何采用对儿童本身生活确实有价值、真正有意义的历史、自然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教材？

(3) 如何把阅读、写作、算术这些正规科目的教学与学生的日常经验以及

今后的职业结合起来？并如何使之与别的信息性学科联系起来，使教学富有趣味？

(4)如何充分注意个别人的能力和需要？^①

杜威把他的理想学校的范例建立在理想的家庭之中。杜威指出，在家庭中，如果父母很聪明，能认识到什么对孩子来说是最合适的，并能提供孩子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将发现孩子在社交和家庭组织中学习。通过参加日常交谈以及各种家务劳动，孩子将获得大量的知识，养成勤勉、守秩序、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见的习惯以及使自己的各项活动服从于家庭的总体利益这个十分重要的习性。至此，杜威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组织起来并加以概括，那么我们就有了理想的学校。

实际上，学校应该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学校中，儿童在家庭中偶然受到的或多或少的训练将得以继续；不过学校训练的形式将更完善，设备更先进，指导更科学。学校不应该与儿童的校外经验割裂开来而本身成为生活的一个断面。如果学校具备了它应该具有的一切特性，那么儿童在学校里也会有与他在家里同样的态度和观点。“对上学和在学校做那些本身值得做的事情都会有同样的兴趣——就像他在家庭和街坊生活中，使他忙个不停地游戏和家务那样，使他感到有趣。”这就是说，像家庭一样，学校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社区，从事共同的事业；而这些事业要使学生感兴趣，并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为事业作出了贡献的一员。整个事业的成功有赖于自己的一份努力。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模仿家庭，十分重视与日常生活有明显联系的手工活动。

在杜威的实验学校中。这一主张是按三条主要路线进行的：

- (1)到木工“车间”工作；
- (2)学习烹调；
- (3)学习纺织(缝纫和编织)。

——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要从事这三方面的工作，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所学校的精神和方法。当儿童10岁或11岁时——该是他们自己发现人类怎样发明布的时候，便把亚麻、棉花，羊毛等原料交给他们。然后，要他们

^①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899: 116. ——原注

带着生产各种不同纺织品的观点去研究这些原料。在对羊毛纤维和棉花纤维的研究中,孩子们发现,羊毛的使用远远早于棉花;要把棉花纤维与棉籽分离开来是很困难的;而且棉花纤维的长度仅仅只有羊毛纤维的十分之一;此外,羊毛纤维比棉花纤维粗,并且相互粘连在一起,因而更容易纺织。

当所有这一切在教师的提问和建议的帮助下得到解决后,学生便接着去思考解决织布的问题。他们“再发明”了最早的梳毛机构架——在两块板上钉上尖钉用来梳理羊毛;他们“再发明”了最简单的纺毛工具——一块穿了洞的石头,当它转动时便可抽出羊毛纤维。就这样,不断地实验,不断地有所发现,一直到孩子们懂得现代使用的织布机为止。与此同时,学生学到了很多艺术、科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艺术包含在一切美好的、建设性的工作之中。杜威说:“把建设性的工作做得适当、圆满、轻巧、灵活,赋予它社会动机,能说出一些道理来,那么你就有了艺术品。”

“在研究各种纤维、地理特征、原料生长的条件、纺织品加工和分配的主要中心等过程中,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如生产机械的制造就涉及物理学知识。”再者,在历史知识方面,各种各样的发明已经对人类发生了影响。“你们可以把整个人类历史浓缩成从亚麻棉花和羊毛到服装的演变过程。”——这几例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研究其他各种职业所用的材料及其生产过程。通过对材料和生产过程的研究,儿童的心理会在其所取得的成就中感到满足,并与此同时从各个方面得到自由发展。这种形式的教育不仅使学生产生了学习的动机,而且还为他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背景。“儿童在烹调中获得了大量的化学知识,在木工劳动中获得了大量的计算和几何原理知识,在纺织理论探讨中获得了大量的地理知识。在了解各种发明的发端和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的作用过程中学到了历史知识。”

我们不能根据以上所述就推断出:学校的中心工作应放在探讨各种职业上,其他学科从属于实践活动,勿需认真对待;相反,学校工作是按一项明确计划进行的,这项计划根据学生心理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引进了人类所关注的一切重要知识。杜威根据心理学原理,把初等学校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4至8岁,游戏阶段;8至12岁,自发注意阶段;12岁以后,反思性注意阶段。

(1)游戏阶段(the play period)的特点是社会和个人交往的直接性。儿童

开始渐渐地从狭窄的家庭生活的限制中挣脱出来,开始熟悉家庭以外的社会。但是,他还不能明确地区分手段与目的,因而他也不为任何问题而烦恼。他的最初学习的中心课题是家庭生活和家务。然后,他参与到家庭所依存在的较广阔的社会活动中去,特别是参加农活。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年,通过实验模拟史前各个时期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解一些重大的发明和职业的发展情况,并在这一年开始学习阅读和写字,系统学习地理知识。

(2)自发注意阶段(the period of spontaneous attention)是学习技巧的阶段。到这一阶段,由于更长久和更客观的知觉可能性的增长,儿童已经能够而且也愿意去获得各种形式的技能。对于儿童来说,手段和目的不再是混淆的了。在处理普通事务中。他具备了分析事物细节和按照规律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学校教学的科目和方法需要作重大改变。“在教育方面,就教材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模糊的整体经验区分成一个个具有各自特点的典型的方面,选出那些对于清楚说明人类在实现其最高目标过程中如何掌握某种媒介,如何进行思维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专门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彼此独立进行。

“方法的问题是一个模拟问题,即要使儿童认识到自身类似发展(也是人类的发展)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使他感到有在实践上和智力上掌握这类工作和探究方法的需要,因为这将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结果。”在这一阶段,正规的美洲历史课程取代上一阶段那种对各种职业及其演变过程只作一般性阐述的教学,开设历史课程的目的是为儿童提供“用以巩固社会成果的社会发展进程方面的知识”,教学的方法是向儿童揭示人类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典型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达到他们的目的。使手段与目的相适应的一般性原则同样也支配地理和实验科学的教学。这一原则直接适用于各科教学。

(3)当儿童掌握了适合各个不同经验阶段的思维、探究和活动方法,能够为获得技术和发展智力而学习各种不同性质的专业和艺术时。反思性注意阶段(the period of reflective attention)便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儿童具有一种较远大的目的观念:他能够对自己提出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由于杜威从未设计出这一阶段的适当课程,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详细阐述他的试验性的学习计划。

至此,我们已经对杜威的教育观点展开了一些讨论,不过只涉及那些以

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但是,作为他的教育观点基础的各种心理学上的预先假定(杜威在实验过程中以及后来作了详细阐述),却有若更大的意义。杜威曾审慎地指出:这些预先假定不是他本人所特有的。在本质上,它们是当时的心理学,其基础是把进化的观点应用于心理。杜威所做的是把这种心理学与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教育时,杜威的出发点是:心理不是一种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生长的过程。按照旧的观点,心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心理所具有的各种“官能”是相同的。如果要进行区分的话,那不过是有些固有的“官能”,如记忆,早一点发挥功用;而其一些“官能”,如判断、推理,迟一点发挥功用而已。唯一被认为重要的是量的差别。儿童被当作小大人,儿童的脑就是小大人的脑,除了认识范围有异,儿童和成人在一切方面是相同的。在杜威看来,这种观点不再站得住脚。他认为,如果我们接受有关脑的进化论观念,我们必须认为脑在本质上是变化的,处于一个生长的连续体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则呈现出不同的能力和兴趣状态。

在论述教材的编排和使用时,杜威转向了发生心理学的另一方面。他指出,心理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环境。“早期的心理学把心理看成一个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的个体的东西,而目前倾向于认为它具有社会生活的机能。需要来自各种社会媒介物的不断刺激,并从社会养料中吸取养分。”^①的确,大自然提供了光、声、热等物理刺激;但這些刺激已经被人类根据社会需要和社会目的加以改造,对它们的解释取决于儿童所处的社会对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方式。通过社会体验,儿童懂得了各种最显而易见的物理刺激的意义,并“在短短的几年里概略地认识了人类花了漫长的几个世纪才取得的进步”。

这种心理的发生观点在教育中有极相似的东西。以前,人们假设心理是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获得知识的,因而认为达到教学要求的途径就是使儿童与被称之为地理、算术、文法等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外部事实发生直接的联系。由于过去不知道这些学科是社会状况的产物并且是对各种社会需要的回答,因此它们被当作纯粹的知识传授给儿童,未能与他们自己的各种需要联系起

^①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899:108. ——原注

来。而一旦把杜威的心理学转化为教育术语,这种对教育过程的误解也就消失。历史、自然科学和艺术等各科教材不再被看成与学生的经验无关的东西,而被看成仅仅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最后的各个阶段(最初的各个阶段也是每一个儿童所具有的)。“我们不知道儿童的倾向或行为的意义,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正在萌芽的种子或未结果实的初放蓓蕾。整个肉眼看得见的世界不足以回答儿童对光和形态的本能含意问题。当儿童要求解释一些引起他注意的偶然变化时,整个物理科学也不能使我们愉快地去满足儿童所提出的这些简单的要求。”^①

这种用个人经验重新阐述自然科学和艺术的作用,在于改变整个教育者的工作性质。教材的传统形式不适于指导儿童的正在发育的心理。对于儿童来说,它极容易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空头符号,一种莫名其妙的象形文字。但是,只有抛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儿童必须学习的内容是一些固定的、现成的儿童经验以外的东西,并把学习看成是儿童智力的必要的满足。然后,教学就成为一种“连续的重建工作,从儿童现有的经验进入有组织的真理——即我们所说的学习——阶段”。而在另一方面,学习也就成了行为和性格的组成部分,与他现时的需要和目的发生有机的联系。一旦以这种方式确立了儿童与课程的正确关系,那么他就再也不会缺乏学习动机,我们也没有必要使他用记忆来做应该通过理智来完成的工作。

让我们替杜威盖棺定论仍然为时尚早。由于我们离对杜威顶礼膜拜——这曾长期遮挡着美国一切教育怀疑论者的视野——时代仍然太近,因此,我们还不可能对“进步教育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场运动的值得肯定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和令人赞叹,因而其结果往往是使教育工作者过于注重教育“过程”而忽视教育的内容和原则。特别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美国掀起了一场对进步教育运动尤其是对美国的“进步教育理论”的全面而深刻的检讨运动。作为进步教育理论基础的心理学和“学习的”许多设想也受到怀疑。

进步教育理论往往低估了儿童自身的意愿和创造性。在许多“进步”学校中,儿童的机灵性实际上被各种社会规则所钝化,因为这些规则不是从儿

^① 杜威,《学校与儿童》//约瑟夫·约翰·芬德兰,杜威教育文选,伦敦:布莱基与桑图书公司,1907:31。——原注

童本身而是从师范学院的俗套出发或是在美国这种特殊的富庶环境中由于父母的骄纵促成的。如今儿童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范围超越了以往的那些界限；对儿童自身的迫切需要和能力，对真正富有刺激性的环境挑战的需要，以及对国际性标准（儿童受教育的环境是否适宜必须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予以了更多的注意。童年和稚气与由于成人对孩子保护过于严密或教条主义而造成的幼稚不是同一回事，而进步教育运动在实践上则犯了后者的错误。目前，人们正在对儿童的思想感情与活动的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首先，人们认为，现代儿童比过去儿童见多识广。

我们还须记住，尽管杜威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但他并非是进步教育观点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倡导者。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教授已指出：^①赖斯（J. M. Rice）1892年以来在《论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打响了这场全国性的改造一切学校的进步教育运动的第一枪。不过，在赖斯文章发表以前，各种公立的福禄培尔式幼儿园已于1878年在圣路易斯创立；从“手工艺教育”开始的手工劳动课程对各种“活动”方法都发生了影响；从18世纪30年代以来，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就曾提倡并实行过“做中学”的方法；斯坦利·霍尔的儿童测量和观察法是“儿童中心课程”的基础；帕克（Francis W. Parker）自1875年以来在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提倡的各种新方法对杜威本人也有影响。而且，正是帕克的推测导致了用于“问题解答”的设计法（用杜威的话说）的产生。杜威的文章有时颇为晦涩难解，偶然甚至自相矛盾，但1918年以来他的学说却引人入胜——这里很大一部分功劳必须归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W. H. Kilpatrick），是他阐明了杜威的许多名言，使这些名言与学校和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秩序实际联系在一起。

^① 克雷明. 学校的变革. 纽约: 文坦杰图书出版公司, 1961: 389—390, 393. ——原注

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①

陈鹤琴

凡关心现代新教育运动的人们,总还记得杜威(John Dewey)所创办的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这个在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学校,是1896年到1904年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一个重要的部分。当时,杜威是把学校系统视作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组织整体,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实验学校任务似乎就在探求这样的学校系统与组织。

假如有人这样问:“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杜威所以办实验学校,是为了要探求一个新的学校系统与组织。”但是这样的回答是否完满呢?我们认为不够,因为它一定还不能满足问者的要求,同时杜威要办实验学校事实上决不是用这样简单的语句可以说清楚的。

首先,我们必须问的是杜威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学校冠以“实验室”(Laboratory)这个名字?根据一般的见解,所谓“实验室”,自然是指自然科学范畴内所应用的研究场所,如生物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现在杜威却在哲学、教育的范畴之内也运用了实验室,这不能不使人惊异。其实不然,就杜威的实验室——实验学校的目标,来跟其他实验室相比较,我们便不难看出其间的共通点。杜威实验室的目的:

(一)对某种理论(theory)、陈述(statement)和原则(principles)予以说明(to exhibit)、试验(test)、证实(verify)及批判。

(二)在特定的路线之内,作某些事实和具体原则的量的补充,使路线本身更加完备丰满。

^① 这篇文章是根据 Katherine Camp Mayhew and Anna Camp Edwards 所著的《杜威实验学校》(The Dewey School)第一篇、第四篇而写的,本文刊登于《活教育》1947年第四卷第三、第四期。选自: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148—153。——原注

杜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学校,是当他在哲学上与心理学上已获得特殊的理解之后,他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场所,使他的理论和原则得以经受实际应用上的考验。这一希望,并非属于杜威个人的,其实,这个希望却正是杜威的哲学与心理学理论极自然的涌现。因为他认为必须在实际的过程中来研究人类知识,理解和品格的发展,这样的研究,才是发掘真知识的道路。

诚如人们所熟悉的,杜威的教育原理是“教育即生长”(education is growth)。所谓生长,乃是生命的本质。教育即在生长之中,教育除了其本身之外,没有任何终极的标的,它进行于各个人整个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随地帮助与指导个人,使他们能正确地改造和适应其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这便是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真正教育的结果。

当我们提到生长的时候,很容易会联想起“未成熟”来,因为常人每以为未成熟便需要生长。于是,生长变成了消极的名词,在它的后面,似乎还有一个“成熟”来作为生长的终极。实际上,成熟与未成熟都是相对的名词。儿童的成熟与否,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应当就儿童的成熟阶段来衡量儿童。就儿童的立场来说,未成熟便是一种生长之力,积极的力,以往人们每以为教育在引发儿童的能力。现在,杜威提出,儿童自身的力亦即教育之力,儿童生活之所在,也就是儿童能动的生长之所在。教育即生长,在当时确是崭新的学说,同时又没有一个学校是追随着这种理论来进行教育的改革,因此,杜威创立自己的实验室,以研究儿童在生长过程中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探求促进儿童生长的有利条件与方法。

杜威的实验学校是为了要实验与丰富他的生长学说而创办的。同时,杜威更认为生长必须在工作(occupation)和集体创造(collective creation)的过程中,才能继续实现。

人类智慧的发展,每每与动作的机会与需要紧密的联结着。一个学校的中心活动应该表现于工作之中,习俗所说的“读书”(studies)并非新学校的真实意义,只有继续的工作,集体的创造,和不断的培养才能促使人类的智慧与知识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个人的经验是具有充分自由的。换句话说,就是个人的经验是能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教育能否给儿童准备其未来的社会生活,就要看学校是否已成为一个具体的小社会。所

以,杜威所希望建立的学校,便是一个集体生活的形式。

以往学校中所注重的读、写、算(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可以说都是需要的产物与活动的结果。任何最基础的工作,都交织着自然的特质与活力,集体生活的过程,自包含着社会的发明,组织与人类义务的建立。所以,要使人类知识继续不断的丰富与扩大,唯一可恃的方法,就是在活动中直接跟事物相接触。人类的知识、理解和行为所以能得以发展,即由于人类具有好奇的、好动的、好群的以及多变的自然需要和自然倾向,教育即生长说,便是从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

杜威创办了实验学校,是企图从这里面来发现与应用真正的教育原则,即发现与应用那足以控制人类生长的原则。同时,使人类的技术、理解和社会生活水平得以有效的提高。所以,杜威的实验学校,是学校工作的钥匙。正如“实验”这一名词所表明的,它是一个活动的场所,是一个供给工作,供给不断进行的工作场所。新教育的实践,需要新的工作者,需要能摆脱旧思想奴役、熟悉过去科学艺术的成就而拥有人类集体工作技能的工作者。实验学校,一方面固然是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实验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铸造进步的教育工作者的熔炉。

教育任务的完成,不仅有赖于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教师的努力,杜威更以为教育生长乃是教师、家长和儿童联合工作的结果。教师、家长和儿童之间的共同学习,并非一点一滴的被动的接受,而是相互作用的主动的学习。一个学校不应当关起门来单独地活动,它应当跟那些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学校的家长们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转变他们,使他们跟实验与工作发生感情,以达改造学校的目的。杜威实验学校的整部历史表现于教师、家长与学生间的密切的合作。如今实验学校虽已不再存在,而这种合作的精神,却仍继续地留存着。因此,对于杜威的创办实验学校,其理想的崇高,不能不使人们产生敬意。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出杜威所以创办实验学校的真实原因。实际上,杜威办实验学校的目的,不仅在丰富与应用杜威的生长教育之理论而已;在另一方面,它还要研究与试行一种新的课程,通过这种新的课程,使教育生长学说,由理论进于实际的应用。

由于实验学校的性质,既是大学研究的一部分,又是教养儿童的场所。

所以,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一方面具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另一方面则必须使儿童的生活有正常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谓课程的本质,决非刻板固定,相反,它必须和儿童经验生长的需要与兴趣相呼应,相适合。

儿童社会性的发展,是儿童适应群体关系的主要因素,教材的选择,必须顾到社会性的条件,给儿童团体行为以充分自由的活动,同时,要指导儿童如何在社会的目的之下来表现自己的兴趣,这种指导并非站在成人的标准上来说话,而是从日常社会行为中发展出儿童自己的标准来,使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年龄的大小,都能在跟别人共同工作或活动的过程中来完成某一事件,并且还要学会如何顺应其周围的环境,如何适应其自己的社会关系。在这一新理论的支配之下,要建立教与学的方法,确是一种艰难的工作!

“儿童应当借经验而学习”(He must learn by experience),这是一句旧的格言,也正是杜威课程论的基础。但这种学习的方法,在近代学校中遭到严重的阻挠。在现代许多学校中,他们只命令儿童去记些对他们毫无用处的知识,或者命令他们去学习一些在他们长远的将来才偶然有些用处的技能。他们完全忽视了真知的获得,乃为实践的结果,经验的赐予。经验是知识的源泉,必须让儿童在实际活动中来发现其创造与发明之路。

杜威创办实验学校,是准备着以他们的努力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积弊的。其实,杜威实验学校的成就,不仅是在教育的实际方面,给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以睿智的指示,并且,在哲学上、心理学上以及社会学上,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留给后人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

杜威实验学校的创办,诚非我们所想象到的那般平和顺利,其间的艰难困苦,正说明一个革新者的勇敢与沉着,光明与胜利乃是不断斗争的结果。新教育工作者应在崭新的旗帜之前,提高警惕。

第三编

杜威与美国教育

杜威在中学当老师^①

[美] 乔治·戴克威曾

杜威来到石油城的时候,正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工业迅猛发展的岁月。石油工业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1865年左右达到了顶峰时期。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办的石油公司就已有600多家。石油城的所在地韦南戈县是当时石油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放眼望去,油井架与钻孔机在那里随处可见。石油城内以及相邻的周边地区,“一座又一座的油井架从屋后拔地而起,或蜂拥于泥泞的沼泽之中,或集结在斜坡之上,或攀附于悬崖峻石之缘。”^②

油城地处油溪与阿勒格尼河的汇合口,因此,两条河流地下所有的石油都会流经此地。那个村庄因而成为当地石油运输的天然中枢,绵延一英里之长的码头和油港则分布在油溪入河口以及阿勒格尼河沿岸。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只(平底船、驳船、木筏)先是靠马匹拖曳逆流而上,然后在油溪岸边将石油舱装或桶装,再由两三名水手掌舵沿河漂流而下,停泊在码头附近。随后,蒸汽拖船会从这里再将承载舱装原油的船只拖到匹兹堡,把石油送去提炼。而承载桶装原油的船只则要一直等到有马匹和车辆将油桶运送到油港的仓库和货场方可。石油运输十分繁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油一直成桶成桶地堆置在油港里,成舱成舱地装载在沿岸的船只上。

运送石油的工人通常居住在河口的棚屋或岸边的驳船里。石油城一带的“棚户区”,让周边邻近的餐馆、沙龙、舞厅的生意不断。据说,那些做苦力

① 译自: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26. 高惠蓉译.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巴布科克(Charles A. Babcock). 宾夕法尼亚州韦南戈县: 开拓者与人民: 第1卷. 芝加哥: 比尔斯出版公司, 1919: 138. ——原注

的劳工，特别是赶马车的人精通亵渎神灵的巫术，在马车的车轮陷在沼泽地过膝的泥沼中或城市街道的泥坑里时，他们就会施展其法术。

1860年时，只有12户人家聚居在一起、人口不过50人的石油城，到1880年的时候，人口已增加到7315人。当然，石油城所有的制造业和商业都是为了迎合石油工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油桶工厂、油井物资商店、精炼公司以及木材场相继出现，因此，从钻孔机的钻尖到汽油一应俱全。

组建于1869年的石油城交易所，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石油产业中厂家、经销商、投资人以及投机者之间的交易往来。19世纪70年代，交易所的业务蒸蒸日上。杜威抵达石油城一年半之前，即1878年4月，为了提供更充足的交易场所，一座新的石油交易大厦拔地而起，建成营业。“每天巨大的交易总额达到1000万到1500万桶石油不等，仅次于纽约和旧金山的证券交易所。在原油价格波动时期，大厅里四处挤满了‘孤注一掷’的男男女女，目不转睛地关注着‘牛市’与‘熊市’的跌宕起伏。大发横财之后接着又血本无归，多少人千金散尽不复来。这只不过是一次汹涌的热潮、一场疯狂的闹剧，数年的急功近利统统被压缩在一个周内丧失殆尽。”^①

当年，人们对石油及石油投资的热情如此高涨，和杜威同住在一个寄宿公寓里的2位经纪人，自然少不了大力推荐杜威借钱去投资“美孚石油”——一家当年已是石油界巨头的石油公司。但是，一心想做学问的杜威显然无意问津投资，依然故我地过着“借书不借钱，煤油点灯非石油”的生活^②。

伴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的不断发展，石油城地区的小学又增加了一二所。但直到1875年，这里才成立第一所中学，以满足孩子们渴求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头三年里，这所中学一直租借房子进行教学；直到1878年，在中央大道和第四街的拐角处才建起了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层楼房。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杜威度过了他在石油城2年（1879—1881）的教学岁月。

同这个时期的很多中学一样，石油城中学（Oil City High School）没有任何档案纪录，因此，杜威在这里的教学经历无从得知。杜威在这所中学任教的唯一证据是他参加的2次毕业典礼：一次是1880年6月7日；另一次是1881年6月10日。两次毕业典礼都记录了杜威是当时学校的副校长以及三

^① 宾夕法尼亚州韦南戈县：开拓者与人民：第1卷。芝加哥：比尔斯出版公司，1919：145。——原注

^② 伊斯特曼（Max Eastman）。约翰·杜威。大西洋月刊，1941，（168）：673。——原注

位教师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教师都是女性,即肯特(E. A. Kent)小姐和杜威的表姐阿菲娅·威尔森(Affia Wilson)小姐。1880年的毕业典礼记载了6名毕业生,1881年则有13名毕业生。这个数字表明,当时石油城中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并不多,大约在75名到100名之间。

杜威在石油城中学任教期间,主要教拉丁语、代数和自然科学。由于在大学期间学习过这些科目,因此,对杜威而言,教中学的课程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杜威从未接受过师资培训,又缺乏实际教学经验,因此,他有时在教师和学生的眼里显得不够老练。

从整体上来说,石油城中学里的学生都非常规矩懂事。那些本来可能会欺杜威年轻而趁机捣乱的孩子们完全被他的亲切、真诚和谦逊所打动,因而几乎从未给杜威添过任何麻烦。与杜威离开很久以后石油城教育界所流传的说法相反,杜威曾经教过的学生都认为杜威先生深受大家的爱戴,学生在他的面前犹如在其他两位老师面前一样,无拘无束,轻松自然。

然而,无论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阿菲娅·威尔森小姐随时都想要为她这位年轻的表弟提供帮助和建议,在对杜威指手画脚时根本不管学生们是否在场。这种做法使学生们忍俊不禁,却使杜威困窘万分。因此,当学生与杜威打趣他这位过于小心谨慎的亲戚时,杜威在言辞之间丝毫没有掩饰内心的不悦。

备课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精力,杜威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石油溪沿岸的码头和油港上的车水马龙自然引起了杜威的注意,他时常同大家一起在桥上观看大河上顺流而下的运输船只。热衷于户外活动的他曾多次约请二三位好友遍访周围的山岭和油井。建于1872年的石油城歌剧院在1878年(恰好在杜威到来的一年前)时又重新翻建改造过,由此让杜威有机会欣赏到了许多最著名的歌剧明星们的精彩表演。

杜威曾经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回忆讲述过他在这个时期的一种体验。据伊斯特曼后来所写的:杜威向他描述了当年的一种神秘的感受不期而至,如同解答了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祈祷真的是发自心声吗?这种感受究其本质是一种自身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的感觉,一种坚信对个人价值及地位的忧虑纯属庸人自扰的信念。伊斯特曼接着写道:“这并不是—种极为夸张而神秘的感受,而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欢乐心境,所有

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他借用杜威的话说：“自此我再也不存任何疑虑，也不再怀揣任何信念。对我而言，信仰意味着无虑……我认为，我已在石油城的那个夜晚得到了这种信仰。”^①

就杜威而言，不管这种感受如何真切，他的宗教信仰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依然是基督教徒，参加礼拜活动时的祈祷似乎也是言为心声。但后来，当他抛弃基督教教义，转投强调一元论的绝对唯心主义，继而改信强调人与自然连续性的人本自然主义的时候，那主要是出于理智和哲学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情感或神秘因素方面的考虑。

当时，杜威对哲学继续保持着自佛蒙特大学四年级时就形成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博览群书，钻研哲学。尽管社会问题也是杜威在大学时所关注的焦点，而且石油城为他提供了观察粗放和无控制工业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极好机会，但杜威却把精力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上。

杜威的注意力完全被机械唯物论所吸引住了。机械唯物论在当时是哲学以及文学刊物上备受争论的焦点，引起了众多意在维护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体系的人士的关注。在审视自己所持的唯物论假设观点的同时，杜威认为，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不会导致唯物一元论，而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以及精神的直觉主义理论——在此理论框架内，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体系可以安稳地被保存下来。

在《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一文中，杜威阐述了这个观点。1881年5月17日，在6月份学校放假前的几个周，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编辑哈里斯(W. T. Harris)。同文章一起寄去的那封书信十分关键，因为对此信的回复直接对杜威后来转而把哲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信中，杜威这样写道：

随信附上短文《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恳望能被为贵刊录用。若无望录用，烦请告知我，邮资随信附上。

诚恐先生不胜其烦，但我仍斗胆恳告，即使这篇文章不能录用，也希望能得到您的意见；并请先生谈谈我是否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哲学研究

^① 伊斯特曼·约翰·杜威. 大西洋月刊, 1941(168): 673. ——原注

上,在此表示十分感谢。又及,我少后辈未解读书时效之秘诀,敬请给我一点指教。希望我没有占据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①

6月份学校放假,杜威离开石油城回到了柏灵顿,在那里他翘首等着哈里斯的问信。

此后,杜威再没有回到石油城继续任教。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佛蒙特州夏洛特村一所学校的邀请,将于同年的冬季学期上课。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中学,位于柏灵顿以南16英里的一个村庄。在去那里任教前的几个月里,他请托里(H. A. P. Torrey)教授在古典哲学和德国哲学方面对他进行辅导。

回到柏灵顿家里后,杜威丝毫不曾松懈,从炎炎盛夏直到瑟瑟深秋,他不断勤奋地钻研哲学。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伦理学》杂志上有关斯宾诺莎(Spinoza)泛神论的热烈争论,而这场争论的导火索大约就是当时许多纪念斯宾诺莎1677年逝世200周年纪念的文章。杜威在对它们进行潜心研究后得出结论,作为知识理论的斯宾诺莎泛神论早已分崩离析。斯宾诺莎本人先是对实体(substance)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接着又以几何学的方式证明了神即为万物存在之实体,但同时又无法为常人眼中的宇宙万物自圆其说。斯宾诺莎的理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神性的,与常人所见迥然不同。那么,为何万物本质与常人所见迥然不同呢?斯宾诺莎的理论就无从解释了。于是,杜威努力钻研的结果就是第二篇文章,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问世。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哈里斯,尽管此前寄出的第一篇文章的命运尚不得知。在信上,他这样写道:

随信所附的文章,论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作为知识理论体系的一些不妥处,在我看来,有一两件事情是人们在评判斯宾诺莎时经常忽视的。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您,期盼能为贵刊录用。^②

在信件寄出的那一天,杜威终于收到了他苦苦等待的哈里斯就其有关唯物论的那篇文章的回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如今早已失传,因此,我们无从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1年5月17日。——原注

②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1年10月21日。——原注

得知哈里斯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得杜威自此把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从杜威给哈里斯的回信中不难看出,哈里斯的这封回信让杜威倍受激励。

欣悉您 17 日来信,感谢先生的赞赏。若能录用那篇文章,我不胜欣喜。因为我未曾订阅贵刊,所以如刊用的话,恳请先生赠期刊一二份。昨日,在收到先生回信之前,我又给先生寄了一篇文章《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仍然期盼先生看后能录用刊登。我年少后生,学习哲学的时间也短,我关心的是您对文章的看法,而不是稿费之事。^①

忙于其他事务的哈里斯没有时间给杜威回信。最后,在翘首期盼 8 个月后的杜威终于又写信给哈里斯,询问他是否已决定刊用关于斯宾诺莎的那篇文章,同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哈里斯在《思辨哲学杂志》做一些工作。

距先生上次来信已有数月。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先生是否已经阅过我的那篇论及斯宾诺莎的文章,以及另一篇文章有没有可能刊用?先生作为康科德暑期学校的校长,肯定事务繁杂,而我有不少空暇时间,愿意协助先生做校对工作。如先生需要的话,可随时与我联系,我将非常乐意去做。不知先生是否需翻译类文章。我最近阅读了卢森科拉兹(Rosencraz)先生对由柯奇曼(Kirchmann)编纂的黑格尔百科全书的介绍文章,详述黑格尔与康德及其他自己的主要理论的关系。如果先生需要的话,我将愿意寄呈译稿。^②

我们无从知晓,对于杜威的主动请求,哈里斯当时到底是如何回信的。但是,杜威的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刊登在《思辨哲学杂志》上。1882 年 4 月的期刊所刊登的是那篇关于唯物论的文章,另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文章则刊登在同年 7 月的期刊上。后来,杜威谈及到这些有点刻板的文章时说:“当时,寄去的那些题目仅仅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在与它相关的教材缺乏的情况下,我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1 年 10 月 22 日。——原注

②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2 年 7 月 1 日。——原注

只能给它以刻板的阐述。”^①

当佛蒙特州夏洛特村的莱克维尤高级中学(Lake View Seminary in Charlotte)冬季学期开学的时候,杜威开始了他在中学当老师的又一个时期。这一次,杜威是主持一所刚刚进行过重组的学校,因此任务多少有些艰巨。美国卫理圣公会从1840年到1880年11月21日一直都在接济和维持夏洛特村的一所学校,它的校舍当年曾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81年,学生家长和其他一些有意为村里孩子提供中等教育的人士自发筹资在学校的旧址上建起了一座新的校舍,同时对学校进行了重组,将其命名为“莱克维尤高级中学”。为学校不断提供帮助和监督学校运行的莱克维尤高级中学董事会邀请杜威在1881年至1882年的冬季学期主管学校事务。

夏洛特村同佛蒙特州农村地区的许多村庄都很相似,虽然它位于两条大道的交叉口,但却拥有香普兰湖的迷人风光。村里有莱克维尤高级中学、一座卫理圣公会教堂、两家百货商店、一家鞋店、一个铁匠铺以及大约20户居民。杜威平时就住在村上的一户人家里,每个周末则搭乘往返于柏灵顿和蒙特利尔之间的火车回家。

莱克维尤高级中学有30到35名学生,年龄从12到20岁不等,大多是农民家庭的孩子。在这些学生中,不少人的学习基础不好,成绩较差,因此,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为此大伤脑筋,其结果使得人们对杜威在教学方面的普遍看法都是有待改进。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都是中规中矩的,但年纪稍大的男孩们比较顽劣,相互之间搞恶作剧、开教师的玩笑等,不一而足。杜威为了掌控这种局面而付出的心血并没有换来太大的成效。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始终是太过羞涩、太过绅士风度,而不是一位厉害的训导教师。当年的学生安娜·拜因顿(Anna L. Byington)小姐回忆道:“我特别记得杜威先生在教学时的两件事情:一是男孩们是那样的调皮捣蛋,另一是杜威先生每天上课前如此热情洋溢的长篇祈祷辞。”^②

因为在莱克维尤高级中学的聘任期只是那年的冬季学期,于是,杜威可以在其他空闲的几个里按自己的计划钻研古典哲学著作以及与托里教授

^① 杜威.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亚当斯(George Adams),蒙塔古(William P. Montague). 现代美国哲学:第2卷.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0:16. ——原注

^② 1938年7月17日的采访。——原注

一起讨论。杜威与托里教授的讨论通常都是他们在附近树林散步的时候展开的。这样,他们师生之间逐渐加深了了解,老师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从老师身上则发现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家的魅力,这些都是在教室讲课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的。在回忆和托里教授一起度过那段时光时,杜威写道:“在我3年中学教学工作之后,在我们散步时的交谈中,托里更加随便地谈出了他在教室里没有讲到过的见解,而表现出一种潜力。这种潜力使托里有可能在更自由的美国哲学发展中跻身于领导人中间。但是,这样的时刻并没有到来。”^①同样,作为学生的杜威也更自由地谈论和提问,使得老师感受到了这位学生的智慧力量,这是他原先在课堂上所没有察觉到的。

^① 杜威,《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亚当斯(George Adams),蒙塔古(William P. Montague),《现代美国哲学》: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0:15。——原注

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①

[美] 乔治·戴克威曾

在中学当老师期间,杜威曾与他在佛蒙特大学学习时的老师托里教授多次谈到过他自己的前程问题。他们俩有着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杜威不能再继续在中学教课了。托里建议,杜威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提议,因为当时的大学很少会聘用在基督教神学方面没有深刻造诣的哲学教授。可是,这个建议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因为杜威本人对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哲学领域的初步尝试和努力已经得到了哈里斯的赏识。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杜威决定听从托里教授的意见,并很快就制定了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计划。

杜威十分感激托里教授在柏灵顿期间的帮助。多年后,他曾这样写道:“我的成长应该归功于他(托里)对我的双份恩惠。一是他使我的思想明确地转向了把哲学作为终生的职业;二是在那一年里他用了大量时间对我进行指导,我开始专心于哲学史方面经典著作的阅读,并学习富有哲理性的德国哲学著作。”^②

让杜威苦恼不已的是学费问题。在中学当老师期间的薪金没能为他攒下多少积蓄,父亲也早已多年不再经商而无力相助。在得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向20位研究生提供500美元的奖学金之后,杜威提出了申请,并请求托里教授帮他写一封推荐信。于是,托里写信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乔治·莫里斯(George S. Morris)。在信中,托里简要地概括了他对

① 选译自: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26—43. 高惠蓉译.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杜威.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亚当斯(George Adams),蒙塔古(William P. Montague): *现代美国哲学*:第2卷.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0:14—15. ——原注

杜威的申请资格的评价：

请允许本人在此把约翰·杜威先生推荐为申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者。杜威先生187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佛蒙特大学，在大学期间就在哲学领域显示出优异才能，自毕业后又一直对哲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杜威先生在形而上学方面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拥有成功从事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突出的智慧。我相信，假若他有机会培养这方面的潜力，凭借他高尚的人格和对哲学的热爱，肯定会获得最好的成果。^①

1882年夏天，当申请研究生奖学金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杜威立即又申请了一个金额较低的奖学金。他在写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 Gilman)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迫切心声：

我渴望能够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继续深造，尽管申请研究生奖学金没有成功一事让我倍感沮丧，但我仍希望能有幸获得一项奖学金，以便明年继续我的学业。当然，若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以及没有奖学金的资助就无法完成学业的话，我本人不会提出上述申请的。我相信，若有幸得到奖学金的话，我自己一定会很好地使用资助，并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

我已看过明年的教学通告，发现预定书目中的大部分书籍我已经读过，即便是其中没有读过的书籍，我也已翻阅过与其相类似的书籍。如果您能告知本人是否有望获得奖学金，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十分感激。^②

然而，杜威又一次失望了，他没能申请到奖学金。但是，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求学的杜威，决定接受一位姑妈提供的500美元借款。杜威接着递交了入学申请书，很快就收到了研究生部的录取通知，进

① 托里给莫里斯的信，1882年2月11日。——原注

② 杜威给吉尔曼的信，1882年8月11日。——原注

一步学习哲学。

同年9月,时年23岁的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学习。杜威之所以选择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一步深造,是因为它的赫赫盛名——它是一所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可以与欧洲任何一所院校相媲美的美国高等学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即在杜威入学时的五六年前,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采用研讨班和实验室的方法进行教学,鼓励教师和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资助学术性著作和刊物出版。

在成立初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招生的名额极少,学生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翻阅约翰斯·霍普金斯入学最初的学生名单,就是在浏览此后三四十年内成为美国各大学著名人士的名单。”^①杜威刚入校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人数为125人,第二年人数就迅速增加为159人。研究生教学都是小班授课,特别是哲学专业,招生人数从2人到11人不等。这就加强了师生间的交往,为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杜威学习期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离巴尔的摩商业区只有几步之遥;但如今,它已处在城市的包围之中。当年校园内的七八幢教学楼或位于或面对霍华德大街、尤托大街、莫纽门特大街,以及小罗斯大街为界的街区,但小罗斯大街现今早已不存在了。校园附近的皮博迪学院(Peabody Institute)藏有6万卷学术参考资料,这对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当年相对有限的藏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由于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因此,学生大多分散住在校园附近的私人住宅和住宿公寓里。杜威读书时住宿的那幢公寓早已被拆除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停车场和商业建筑。

鼓励教师和研究生从事创造性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当时大学的学术活动,使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学术感兴趣的校园氛围是别处无法与之相比的。比杜威大几届的学长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曾这样写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天的开始是充满福音的早晨……校园四处都在传颂学长们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希望为自我找到通往成功的动力。”^②杜威在抵达密执安大学后不久,曾在一个团体作演讲时说过:“让巴尔的摩的学生受益最影响大的是学术活动的氛围和参与学术研究的志向。在那里,没

① 瑞安(W. Carson Ryan):《早期研究生教育》,纽约: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39:32。——原注

② 罗伊斯(Josiah Royce):《目前美国大学生生活的理想》,斯克利布纳杂志,1891,(10)。——原注

有人会殆于思考、精神颓废。学生不会被当作被动听课的水桶，或是研磨每日规定死记硬背教材内容的磨盘，而是自发去探索真理的人，教师的教学方法则是适当的鼓励和建议。”^①

杜威发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氛围非常活跃。在校期间，他把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课业和学术研究中，除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外，还发表了3篇文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拥有近350万的捐赠基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因此，每年都会向它的几个院系提供丰厚的拨款，但唯独哲学系是个例外。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吉尔曼校长对科学很有热情，却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哲学上，因而在拨款时更倾向于从事科研实验的院系。此外，他认为，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很难在美国的高等院校谋到教学职位，因为它们所聘用的教师一直都是那些在基督教神学专业受过教育的人。出于一种善意，吉尔曼校长最初也曾劝说杜威放弃哲学专业的学习。

缺少行政的支持直接反映出为哲学系开设的高级课程较少，其课程只局限于哲学史、逻辑和心理学，仅仅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哲学系主要工作的要求。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几乎鲜有涉及。杜威写道：“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系里开设的课程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我猜想，没有人比系里的教师更清楚，他们是多么无力开设弥补大学应当涉及的学科课程。”^②

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政治、经济和社会哲学方面相关课程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杜威选修了历史学和政治学作为辅修专业。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他选修的辅修专业课程有：制度史（两学期）、英国史资料、比较宪法史、美国制度与美国经济（两学期）以及国际法。在这些课程中，有的课程与杜威在佛蒙特大学学习期间的课程有所重复，但杜威希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课程会有更深层的分析，并且能从哲学的角度去予以阐释。可是，事与愿违。为此，杜威深感失望，他觉得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差强人意的地方。他在给哈里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辅修专业学习时，学的课程是历史系开设的国家理论和国际法等，而且与历史系的师生交往甚密。历史系我们学校最大的院系，拥有最为优秀的学生，然而，学

^① 杜威.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密执安亚克尔, 1885, (3): 292. ——原注

^②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 1884年1月17日. ——原注

校并没有向这些优秀的学生提供哲学方面的熏陶,历史哲学和社会道德哲学方面的课程都没有涉及,在我看来,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学生就很难从他们自己的课程中获益。”^①皮尔斯(Charles S. Pierce)开设的逻辑学课程与杜威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对此他有点失望。杜威原本以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是“哲学逻辑”,一种截然不同的象征着真理的知识体系,即它的起源、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比较价值。但是,皮尔斯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在学业安定下来后不久,杜威就写信给托里说:“我没有选修逻辑学方面的课程,这门课程十分数学化。对于皮尔斯先生而言,逻辑学只是以数学方式对物理科学的阐释。与其说这是一门哲学课程,倒不如说这是一门科学课程。实际上,我想皮尔斯先生并不认为这其中除了物理科学的概述之外,并没有任何哲学成分。”^②

第二年,杜威还是选修了这门课程,当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出于学分上的考虑。在这门课程将近结束时,杜威向哈里斯抱怨说:“对于皮尔斯先生开设的逻辑学课程,相对而言,数学系的学生要比哲学系的学生对此更加感兴趣。”^③直到20年后,在经过了更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杜威才意识到皮尔斯所讲授的逻辑学对于他形成自己良好的知识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开设的心理学课程一直处于该领域的最新前沿。教师霍尔(G. Stanley Hall)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早年曾对神学颇有造诣,但之后由于对神学与日俱增的怀疑而转攻哲学和文学。1874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undt)发表的《生理心理学原理》引起了霍尔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动身前往德国,拜师在冯特门下潜心学习。霍尔认为,“新的心理学”具有很好的发展,遂决定将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1882年,霍尔接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主持心理学讲座,开设了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两门课程,以及一门纯理论的心理学课程,称为“心理学与伦理学原理”;同时,他还应邀为立志于教学工作的学生开设了一门研讨课——“科学教学法”。杜威选修了以上所有的课程,并在霍尔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中独立完成了一些实验。根据杜威的描述,这些实验主要是围绕“注意”而开展的。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4年1月17日。——原注

② 杜威给托里的信,1882年10月5日。——原注

③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4年1月17日。——原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判断一个是否把注意完全集中于某一事物时,对‘旁人’的意识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注意在造成不自觉的肌肉活动方面的影响——类似模仿‘心智’阅读。”^①

在那段时期,杜威最大的满足来自聆听密执安大学莫里斯教授的课程。自1878年起,莫里斯教授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客座讲授哲学。莫里斯在哲学界的名声最早源于他所翻译的尤伯威格(Ueberweg)在1872—1873年所写的《哲学史》及其以后的著作。早年,莫里斯曾在德国留学,以特伦德伦伯格(Trendelenburg)^②为师。回国后,他发展演绎出一种新黑格尔主义。据杜威的回忆,当时的新黑格尔主义,即“把一种集逻辑和唯心的形而上学论与一种唯物论的认识论结合了起来”^③的学说。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杜威选修的莫里斯教授的课程有:认知科学研讨课、英国哲学史、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二年选修的课程则有:斯宾诺莎伦理学研讨课、德国哲学史(尤其是从康德到黑格尔时期的哲学运动)。

在开始研究生学习后不久,杜威给托里写信描述了他的前两门课程:

在他(莫里斯)的指导下,我的课业是每周4课时的英国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塞;还有就是每周两次的所谓的哲学研讨课。相比较而言,后者令我在许多方面受益匪浅。这是一门对认知科学加以文本研究的课程。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这样的:阅读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译本),然后根据书中的主题——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普罗泰戈拉等人的著作,完成相关题目。每个学生一个题目,要求查阅相关资料、请教权威专家等,然后在课堂上作陈述。接下来,我们还要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通过尽可能多的原著研究,要求我们在课程结束时对希腊哲学(至少在知识典故、出处以及含义等方面)有更深层了解……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3年2月4日。——原注

② 特伦德伦伯格(Friedrich A. Trendelenburg, 1802—1872),德国哲学家、语言家、教育家。——编者注

③ 杜威.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现代美国哲学:第2卷. 纽约:麦克来伦出版公司,1930:19. ——原注

他在英国哲学方面的讲课不是介绍性的,而是评论性的,往往会指出感觉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矛盾和不妥之处。^①

杜威也曾写信给哈里斯,与其探讨斯宾诺莎以及德国哲学方面的课程:

现在,我正在听莫里斯教授开设的2门课程。其中一门课程是从莱布尼茨(Leibniz)开始的德国哲学讲座。由于莫里斯教授在校只有半年时间,因此,今年的课程大部分内容受时间限制仅限于康德(Kand)。目前,莫里斯教授正在讲谢林(Schelling)。我想,在此结束之前他会黑格尔(Hegel)作一番简要介绍。另外一门课程是针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主要是以研讨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莫里斯博士和每一个学生轮流对一些论题进行阐释——运用斯宾诺莎的体系和一般的哲学讨论方式。由此,这门课程不仅使我们对斯宾诺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使我们明确了泛神论和“本体论”体系的逻辑,当然同时也就掌握了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之间的不同。因此,这两门课程不仅使我十分感兴趣,而且受益良多。^②

莫里斯教授的教学风格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教学时全身心地投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讲课真诚且令人折服,让学生们难以忘怀。1915年,杜威曾这样写道:“莫里斯教授的讲课在我的记忆中历久而弥新,他在讲课时总是燃烧着智慧的热情之火,近乎狂热。当讲到某个他所重视的主题时,他的态度就如同在例证他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的虔诚,灵魂是躯体的形式,是灵魂的图极(entelechy)^③。”^④

.....

一方面因为是受莫里斯对新黑格尔主义虔诚信仰的感染,一方面是因为

① 杜威给托里的信,1882年10月5日。——原注

②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4年1月17日。——原注

③ 图极,亚里士多德的用语。——编译者注

④ 杜威·乔治·西尔维斯特·莫里斯//温利(Robert M. Wenley). 乔治·西尔维斯特·莫里斯的生平与著作.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7:313。——原注

杜威此时深受某些问题的困扰,而似乎只能在新黑格尔主义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杜威很快成为新黑格主义的信徒。在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之前,杜威已熟悉康德与苏格兰现实主义的直觉主义哲学。早在佛蒙特大学本科学习时,杜威就接受了直觉主义,但与此同时他又深感直觉主义的缺陷,即其在有限与无限、神与人、精神与实在、灵魂与躯体、个体与群体之间构建起来的二元论。这些二元论让杜威大为头疼。他迫切地期待着一种可以克服所有这些缺陷的哲学,这种期待又由于他在宗教经历中碰到的难题而愈发强烈。杜威自幼受自由的卫理圣公会的福音熏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它的教义;随后,他却发现越来越不能为了向某些教条妥协低头而割舍掉比其更加理性的观点。

对于杜威而言,由莫里斯教授所阐释的新黑格尔主义,仿若雪中送炭。新黑格尔主义对实在的界定是:实在就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这就彻底扫除了直觉主义在事物之间造成的各种障碍。新黑格尔主义认为,实在是一个有机体的存在或精神,既与其他无数的有限存在或精神不同,又通过这些有限的存在或精神并在其中实现自己更高层次的存在,填补无限与有限、神与人之间的鸿沟。

在黑格尔主义中,杜威找寻到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的东西,他为此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满足。对当时的杜威来说,哲学一直是一种“理性的训练”,如今成为一种“极大的释放”,将他分散的观点和感知从其不同的空间中解放出来,并且整合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这使得杜威的身心感到十分兴奋。

因而,杜威开始潜心研究新黑格尔主义,埋头钻研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尤其是格林(Thomas Hill Green)、约翰·凯尔德(John Caird)、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华莱士(William Wallace)等人的著作。在杜威看来,这场以这些人为代表的运动是在当时哲学界极为关键和极具建设性的。自然而然地,杜威在这段时期的著作大多是阐释新黑格尔主义,论证它与其他哲学相比而显示出来的优势。

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篇论文是受到莫里斯在讲授英国哲学课程时的启发,这是一篇探讨感知相对论及其他的哲学含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研究杜威的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反映出杜威是如何迅速掌握莫里斯的思维方式的。它的题目被杜威定为《认知与感觉的相对性》,并

于1882年12月12日投稿给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形而上学俱乐部(Metaphysical Club at the Johns Hopkins)^①,这也是他同莫里斯开始合作前的三个月。1882年12月29日,杜威将此稿寄给了哈里斯,并附信写道:

兹送上一篇文章,文章论及感觉的相对性,意欲将它应用于感觉论的一个阶段,乃本人在论述唯物主义时所采用的同样论述。如这篇文章能刊载于《思辨哲学杂志》,我将不胜荣幸。然而,我并无催逼先生之意。

第二个月,这篇文章在《思辨哲学杂志》上刊登了。沿着莫里斯在《英国思想与思想家》(British Thought and Thinkers)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杜威认为,感知是相对的以及所有的认知来自感知这两种假设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成立。这是因为,如果说感知是相对的,那就暗示着我们绝对认知客观实在的存在,并借此认识到我们的感觉是相对的。但是,如果同时认为所有的认知都来自相对的感知,那就暗示我们不可能绝对认知任何事物,因而也就无从辨识我们的感知认识是相对的。就杜威自身而言,他认同第一个假设,因为受神经系统支配的感知的确是相对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杜威并不认为第二个假设是错误的。其原因是他发现了并非源自感知的认知,即思考意识所具备的认知,不仅能够感知,同时还客观存在,而且对两者进行比较,断定前者是相对的。由此,杜威得出结论,感知理论的相对性,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当然的那样,支持感觉论、唯物论或不可知论,而是支持一种承认思想的构成力作为绝对存在并决定客观万物的理论。

杜威随后发表的2篇论文反映出他对哲学方法日益浓厚的兴趣,以及对黑格尔主义矫正了以往哲学中出现的错误的深信不疑。“哲学方法”是任何哲学的核心,因为当杜威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他指的是得出真理的一种方法和标准。在这两篇论文中,第一篇《黑格尔与范畴理论》,在形而上学俱乐部1883年4月10日的会议召开前就递交了。由于该稿现已失传,因而只能猜测其大概内容了。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这是一篇对黑格尔的辩

^① 形而上学俱乐部是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些俱乐部中的一个。其成员既有教师,也有学生。皮尔斯、莫里斯、霍尔都曾是这个俱乐部的主席。它创建于1879年,1884年停办。每月一次会议。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杜威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原注

证法给以高度赞赏的文章,认为真理是一种绝对而和谐的概念体系,通过矛盾双方在优化综合过程中的统一得以实现。第二篇论文也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准备递交给1883—1884学年研究生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最后,这篇论文发表在了《思辨哲学杂志》1884年4月号上,题目为《康德和哲学方法》。

杜威的第四篇文章写于1883年秋天,即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第二年。这篇文章源于那年夏天他与托里教授的一次散步时的讨论。他们俩讨论了心理的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联系。后来,杜威进一步思考了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他发现,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包括我们的那些道德本性,似乎是受到心理活动的影响,这些心理活动并不因而成为意识的。通过使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等同于“一种已失去自我的特殊存在,而进入了心理,成为由心理所阐述的机能之一”。杜威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假定存在“一种始终如一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不同于自身进入‘兴奋’或连续的意识”。因此,杜威发现,那些事实并没有通过这个研究而得到揭示,他“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也就是‘直觉主义’的那些东西”。杜威在这篇题为《意识心理学》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思想。这篇文章是他准备参加11月13日形而上学俱乐部举行的会议而写的。它从未发表过,但杜威在会议后第四天给托里教授的信中叙述过其内容。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第二年快结束时,杜威想更好地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和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他仍然遇到了那个经常重复出现的学费问题,这也许是他渴望得到讲授哲学课程的职位和解决他的专业的主要原因。为了达到获得学位的要求,杜威需要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他自己决定这样做。他曾在给哈里斯的信中写道:“我尽力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自己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学位论文上。”^①

因为杜威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未出版过,人们也从未看过。他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康德的心理学”。关于这篇论文,杜威在给哈里斯的信中对它的解释是特别有趣的。

他[康德]的精神哲学(他至今有的),或者他的认知理论的从属方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4年1月17日。——原注

面,除给予他的感觉、想象等理论的一般阐述外,我希望能够指出他把理性或精神的概念作为人的经验的整个领域的中心和有机统一体。也就是说,他坚持这一看法,即他是现代哲学方法的真正创立者。但是,在某些范围,他陷入了自己的弱点和矛盾之中。这个哲学方法问题,现在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①

这些评论表明,杜威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许多地方重复了他早期的论文:“康德和哲学方法”,在同样的领域得出了很多相同的结论。1888年,也就是4年之后,杜威在一封信里证实了这一点。在那封信里,他这样写道:“发表在《思辨哲学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康德和哲学方法),在一些方面与博士学位论文的思路有点相似。它的发表是为了获得奖学金,但是博士学位论文……从未发表过,其题目是‘康德的心理学’。”^②

在杜威的研究生学习的最后几个月里,通过他对新的心理学的兴趣,可以看到他对哲学方法的关注。当他首先开始这一方面学习时,他给托里教授写信说:“我没有看到心理学和哲学之间任何的密切联系,但我设想,心理学将为磨提供谷物,如果没有其他东西的话。”^③但是,当杜威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深入下去的时候,他越来越因为新的心理学以及它对哲学的含意而兴奋起来。他在1884年5月11日提交给形而上学俱乐部会议的一篇题为“新的心理学”的文章中表述了这些思想。同年秋天,这篇文章发表在《安多弗评论》(Andover Review)上。

在这篇文章中,杜威用心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来阐述新的心理学。对心理活动的哲学条件的研究导致了对心理学实验方法的介绍,用许多有效的方法来补充反思方法。从生物学出发,具有了有机体和环境的思想。当有机体的概念被采用和应用于心理生活时,心理活动被视为“一个有机体根据所有的生命规律的机能发展”。当环境的概念被心理学所关注时,它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心理并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

① 杜威给哈里斯的信,1884年1月17日。——原注

② 杜威给鲍尔(T. R. Ball)的信,1888年5月28日。——原注

③ 杜威给托里的信,1883年2月4日。——原注

活中发展的,社会生活有助于心理的形成和确定。^①因此,新的心理学利用了社会学、历史学、变态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知识和灵感的学科。

杜威通过主张“心理生活的同一和联合”继续阐述他的思想。他认为,新的心理学坚持驳斥了旧的心理学的心理生活看成是由凌乱微小的感觉或观念混杂而成的,或将其简化为独立自主的官能的观点。此外,杜威认为,新的心理学所包含的逻辑与旧的心理学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或许杜威此时想起了皮尔斯,他说,新的心理学抛弃了旧的心理学的逻辑和数学类推与规则上的法律虚构,而与经验相融合,“相信母亲不会背叛自己的孩子”。旧的心理学的逻辑是,“丰富多彩的经验在不同的国家、个人、甚至生命的不同时刻从来都是不同的……它们被整齐而仔细地进行分析,不同的部分被各自贴上标签,分门别类地收好,再整体被打上‘既成事实’的印记。”新的心理学拒绝接受这种刻板的图解式的逻辑,取而代之的是“事实、过程、生命的逻辑”。^②

从这一分析中不难发现,杜威看到了新心理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在基本概念——有机论、物力论以及否认把形式论作为一种逻辑形式——上的基本同一性;同时,他也认识到需要用某种具体而系统的方法把这两个思想领域结合起来的问题。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两年研究生岁月使杜威的心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使杜威接触并认同了新黑格尔主义和新的心理学,它们把杜威引领到将这两者合而为一的问题面前——这个问题让他耗尽了此后数年的精力和心血,并使他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但是,这些年的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还不止这些,正如杜威后来所说的:对黑格尔的研究,“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究竟是什么痕迹呢?杜威曾撰文解释:

“在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形成中,每个人都依赖于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客观精神’,即文化制度思想。这种思想也带有孔德(Comte)、孔多塞(Condorcet)和培根(Bacon)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中曾出现的一种绝对精

① 杜威.新的心理学.安多弗评论,1884,(2):285.——原注

② 杜威:新的心理学.安多弗评论,1884,(2):278,188.——原注

神,即形而上学思想已退了出去;而通过文化环境对个人的观念、信仰和学术态度的形成起作用的思想,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着。在形成我关于现成智力在心理学和哲学两方面具有共同设想的信念中,它是一种因素。这种现成智力作为一个没有经验主义支持的客体,是与物质世界相对的。在形成我关于最合理的心理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信念中,它也是一种因素。这种心理学不同于对行为的生物学描述。就更加专门的哲学问题而言,在我早期的辩证法信念被怀疑论所取代之后,黑格尔学派所强调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思想,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我继续产生影响。一直到我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在与黑格尔《逻辑学》的专题讨论会的联系中,我试图用‘重新调整’和‘重新改造’的术语来解释黑格尔的思想范畴。最后,当我完全从黑格尔学派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我逐渐认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更好的理解和阐述黑格尔的这些原理。”^①

莫里斯很早就发现了杜威的卓越才能。这个年轻学生在研讨课上的优异表现,在形而上学俱乐部上的精彩言辞,以及他所撰写的文章,都使得莫里斯对杜威在研究方面的潜力寄予厚望。后来,当学校想要物色一位在1882—1883学年第二学期为本科生讲授哲学史课程的教师时,莫里斯立即推荐了杜威。虽然当时的这个班级只有7个学生,每两周才上一次课,但杜威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不管怎样,他终于有机会去讲授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了。但是,杜威非常谦虚地否认了这是对他的优异表现的旨定。他在给托里的信中写道:“所有院系的研究生都会或多或少地协助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我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哲学史方面的专长进行教学的人,这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的。”^②

杜威曾谈到在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所教的哲学课

当然,这是个本科生班级,用的教材是尤伯威格的《哲学史》,内容自然删去了一大部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们了解到尽可能多的哲

^① 引自:简·杜威.约翰·杜威传//保罗·希尔普.约翰·杜威的哲学:第1卷.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39:17—18.——原注

^② 杜威给托里的信,1883年2月4日.——原注

学派别——事实上,这是无法完全做到的,但至少使学生们了解一些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也给他们了。此外,就是使他们从课本中接触一下不同学者的理论。如果日后他们有机会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的教学工作就是根据课本知识向他们提问,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以解释。整门现代哲学只有约30处需要背诵,因而不可能讲得太深。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进行了3次背诵测验。明天,我们将会开始学习霍布斯(Hobbes)的理论。讲课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有益于奠定牢固的知识基础。对我而言,这还是一次很好的复习。^①

为了解决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二年的学费问题,1883年春,杜威向校方申请了师资奖学金。他的申请得到了莫里斯教授及哲学系其他教师的真诚支持。然而,吉尔曼校长当时仍然存有疑虑,认为有必要在颁发师资奖学金之前对杜威有更多的了解。最后,1883年3月30日,吉尔曼校长写信给佛蒙特大学巴克汉姆(Buckham)校长,请求巴克汉姆和托里向他提供一些有关杜威的个人信息。吉尔曼校长在信中表达了他自己对杜威这位年轻人的印象:

贵校毕业生约翰·杜威先生,自去年冬季开始在我校学习。在此期间,给我校哲学系的教师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目前他是我校一个职位的候选人之一。我个人认为,杜威平常沉默寡言、不善言谈——这或许是由于职务关系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熟悉。因此,我想向您及贵校的托里教授了解一下有关杜威先生的性格、才智、人品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情况。如果明年我校聘任杜威担任一个教学职务,他将会给本科生讲课。我想知道,虽然杜威具有良好的心智能力条件,但不知他是否具备我们需要的教学能力。对于你们的回复,我会保密的。^②

不久,吉尔曼校长接到了自小看着杜威长大的这两位长者的回信。他们的信揭示了杜威的人品。巴克汉姆校长在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① 杜威给托里的信,1883年2月4日。——原注

② 吉尔曼给巴克汉姆的信,1883年3月20日。——原注

约翰·杜威的逻辑严谨，一丝不苟，见识独到。他为人从善如流——据我所知，在宗教信仰上虔诚恭敬，绝无任何巫邪古怪的想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他比较沉默寡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信心不够强的缘故。这也是让熟知他为人的人们唯一产生疑虑的地方——他是否具备一位教师所应有的果敢和执著。我个人认为，如果相信他并对他委以重任，那肯定会增强他的自信，并使他逐渐克服这一缺点。^①

两天后，托里教授也为他的忘年之交、曾经的学生约翰·杜威，给吉尔曼校长写来了回信：

您写给巴克汉姆校长询问有关杜威先生情况的信件已转到我的手上。就杜威先生的才智而言，可以说，我自己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在哲学上有着如此清晰的见地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富有真知灼见的学生。杜威毕业后，我曾与他多次就哲学问题交流看法，在交谈中，我感到杜威在哲学领域的发展潜力很大。哲学是他所选择的职业生涯。杜威从年少时就养成了喜爱深入反思的习惯，因而常常显得寡言少语。然而，天生矜持严肃的他在熟人面前则一反拘谨刻板之态，而表现得大方自然。

杜威先生在道德品格方面无可指摘。他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我所在的教会。在宗教信仰上，他恭敬虔诚，从不感情用事，完全值得信赖。

至于他的教学能力，我确实无法加以判断。我个人认为，在讲授一门完全投其所好的课程方面，他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位成功的教师。学生们绝对不会抱怨他们的老师讲课条理不够清晰。我认为，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和熟练，杜威会在教学艺术上迅速获得实际技能。请允许我在此向贵校深表谢意，感谢贵校能让杜威先生在大学的哲学课程上担任临时教师；同时表达我由衷的祝福，相信杜威一定不会辜负您对他的信任和期望。^②

① 巴克汉姆给吉尔曼的信，1883年4月3日。——原注

② 托里给吉尔曼的信，1883年4月5日。——原注

在如此大力的支持之下，杜威终于获得了师资奖学金，其名字列入了1883—1884 学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通告的教师名单上。师资奖学金的获得，意味着杜威无需再为学费问题担忧，可以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学业和研究上。当然，他有时要去给本科生上课。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里，学生的社团生活与美国大多数的院校不同。这里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学生活动，例如，周末舞会、体育赛事、大学生联谊会举办的聚会、返校节或者捉弄大一新生的社团加入仪式等。学生们只能在附近的市区内寻找自己的娱乐方式。当年，一家杂货店的楼上的一个简陋的房间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社团中心。在课余的时候，师生们会以德国大学生的方式在那里欢聚。提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活，杜威曾经这样评价道：“关于巴尔的摩学生生活的篇章，就如同讲述蛇在爱尔兰的著名典故^①，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生活可言。充满美国院校特色的传统和习俗在这里闻所未闻。如果打听学生生活的中心在哪里，人们会指给你一家小小的俱乐部。在这里，师生们会常常聚在一起，喝几杯德国啤酒，哼一哼德国歌曲。这就是中心，也就是开始和结束的地方。”^②

杜威最喜爱的娱乐方式就是游历巴尔的摩，体验当年美国第六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两个好朋友以及他的哥哥戴维斯。戴维斯是在杜威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书一年后来到这里攻读经济学的。经历了刻板 and 压抑的青少年生活，杜威终于有机会可以自由地在大城市里去看看戏，偶尔光顾一次小酒馆，或者错过了周日礼拜也无须担心受到责罚。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杜威经常在巴尔的摩的剧院里担当群众演员。在对杜威 91 岁生日时的一次采访中，《约翰斯·霍普金斯时事通讯》(The Johns Hopkins News Letter) 的一名记者发现：“时隔 66 年之后，这位哲学家和教育家记忆中印象更为清楚的是巴尔的摩，而不是霍普金斯。福特大剧院唤起了他当年在舞台上上上下下扮作持矛士兵或是邮递员，事后又急急忙忙赶回学

① 传说中，神父圣帕特里克将所有的蛇都赶出了爱尔兰。——编译者注

② 杜威.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密执安亚克尔, 1885, (3): 292. ——原注

校完成有关康德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时的回忆。”^①

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任务之一就是参加博士学位的综合考试。杜威在综合考试中的表现优异,这在莫里斯从安阿伯写给吉尔曼校长的信中得到了反映。莫里斯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得知杜威的口试成绩优异,我们正在考虑正式聘任杜威担任我校的教师。”^②

对于熟悉莫里斯教授和杜威的人来说,莫里斯推荐杜威到密执安大学哲学系任职,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莫里斯很早就对杜威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潜力大加赏识,私下曾经表露过密执安大学能够聘任杜威的愿望。然而,直到杜威离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返回家乡柏灵顿时,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在回到家里数周后,杜威还是没有接到聘任通知,他开始怀疑起自己当初放弃在中学教书的做法是否明智。恰恰在这个时候,7月,杜威接到了密执安大学校长安吉尔(James B. Angell)的来信,密执安大学准备聘请他担任哲学系的教师,月薪900美元。安吉尔校长的来信措辞十分诚恳,因为在他担任佛蒙特大学校长一职后,他与杜威的父母相交甚密,他甚至还记得杜威幼年时的一些情况。在接受聘任后写给安吉尔校长的信中,杜威这样写道:

贵校密执安大学的聘任通知我已收到,本人十分愿意接受这份聘请。我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不会辜负您对我的聘任。

非常感谢您为我的聘任所做的一切;同时我要从个人的角度感谢您的那些亲切和蔼的话;我还要感谢您的美好祝福。时隔那么多年,您仍能记得我,这是我的荣幸。

我的父母和我向您及夫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③

随着杜威告别了学生时代以及一所著名大学正等着他去任职,杜威踏上了漫漫的事业征程——将使他享誉世界的事业。

① 91岁高龄的杜威回忆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岁月。约翰斯·霍普金斯时事通讯,1950:10—31。——原注

② 莫里斯给吉尔曼的信,1884年5月21日。——原注

③ 杜威给安吉尔的信,1884年7月19日。——原注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①

胡 适

文科各系的教授阵容

今天我想谈谈 40 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从 1915 到 1917 年的哥大。我在 1915 年 9 月注册进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其后一共读了 2 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试及格,我就可以写论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学博士]的学位了。1917 年的夏季,我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所以 2 年的时间——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尔研究院就读的 2 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

这几年正是哥大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方面,声望最高的时候。杜威那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专治希腊哲学的研究院院长乌德瑞(Frederick J. E. Woodridge)教授那时也在哥大研究院授哲学史。哲学系的芒达基(W. P. Montague)教授是当时[西方]六个“现实主义者”(realists)之一。授伦理学(ethics)的教授厄德诺(Felix Adler)则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The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的发起人。这个学会事实上是个没有神学的宗教^②。所以当时哥大的哲学系实是美国各大学里最好哲学系之一。

当时哥大其他各系如历史系、社会系、教育系等等,也同样享有盛名。我只能说人文学科这一面,其实当时哥大在科技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在历史

^① 选自: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85—94。译注者注释有所删节。

^② “伦理文化学会”亦译为“道德文化学会”。笔者便是在这个“学会”内,用非宗教仪式结婚的。——译注者注

系里面我只认识几个人,如授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顿宁(William A. Dunning)教授和倡导新史学、后来又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教授;以及第一位以自己经济观点来诠释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 Beard)教授^①。此外还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历史系花太多的时间。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里选过一门全课。当时最驰誉遐迩的一门课,便是罗宾逊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这门课。事实上这是一门研讨孕育各时代西欧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化运动史,这门课在学术圈内享有其应有的声誉。罗氏印有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我读了这些大纲之后,觉得它极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选修这门启蒙的课程。

哥大当年的校园建筑只限于今日我们所说的老校舍。例如那时的图书馆便集中于洛氏大楼,今日我们叫它做洛氏纪念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中文图书馆那时便设在洛氏大楼的顶层。和今日相比,那时的图书馆和中文图书馆实在都是很小的。那部辉煌的巨著《古今图书集成》便陈列在该馆首要位置,看来真令人耳目一新。

那时约翰·介大楼(John Jay Hall)还没有兴建,也没有女生宿舍[詹森大楼(Johnson Hall)]。男生宿舍则限于两座老建筑——哈特莱大楼(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大楼(Livingston Hall)。立于这两座老楼的对面便是新建的宿舍佛纳大楼(Furnald Hall),这是当时认为最摩登的新楼了。那时哥大[外国学生活动中心的]“国际俱乐部”(International Club)便坐落在今日的约翰·介大楼的基地之上,它也是“世界学生总会”下面的一个支会。今日大家都不太记得了,但是它却是当时外国学生活动的中心。

在这三座大楼之内,我们今日查一查当年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应该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许多当年的学生后来在中国政界和文教界都是知名的人物。与我同时的一共只有3个中国学生住于佛纳大楼,因为这座大楼是新建的,租金较昂。除我之外,便是那位有名的宋子文和张耘。张耘后来以张

^① 查理·毕尔(Charles A. Beard)是美国以经济史观治美国史,最负盛名的早期哥大名教授。他的名著《美国宪法之经济诠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于1913年初版问世时,美国政学两界为之大哗。因为他揭穿了北美合众国华盛顿以下诸开国元勋道学面具之后的生意嘴脸,被指为褻渎圣贤,随后被迫自哥大辞职,一时“人心大快”!——译注者注

奚若一名知名国内。他在中共政府内做了许多年的高等教育部部长。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所谓“民主党派”的一分子。

住在其他两座老宿舍里的中国学生则有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以及我后来的上司和同事蒋梦麟。蒋氏是学教育的。在入学哥大之前曾在旧金山一家革命报纸[《少年中国晨报》]当了将近10年的编辑，以薪金辅助学费。他后来成为中国重要的教育家；由代理到实授北京大学校长，也是我当北大校长的前任。此外还有很多别人^①。

让我再叙述一下当时学生所极感兴趣的教授阵容。我还记得在哥大最初几个星期的学习生活中教授讲课的情形。例如社会系名教授之一的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 1855—1931)，如今事隔40余年我还记得他上第一堂课时的开场白。他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说：“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45至50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的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这几句话，40年后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余音绕梁。但是我听他的第一堂课以后，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虽然我仍然欣赏他的著作。

还有教我政治理论史的顿宁教授。在今日他已被看成旧学派的代表，但是在那时他却是这一行的拓荒者。在其所著专门研讨上古和中古时期《政治理论史》的第一版序言里，他就说在他以前，英语民族国家、德意志以及其他欧洲各国还没有过类似的著作。顿宁并不长于讲授，但如今事隔40余年我仍然记得那位和蔼而衰迈的老教授。在那一年的冬季，他每次上课时，先要在教室四周张望一下，然后把所有的窗户都关闭好，又在他衣袋里取出个小帽子戴在头上，这才开始讲课。

在康乃尔时代我的主修是哲学，副修是英国文学和经济。第二副修事实

^①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长寇克(Granson Kirk)访问中东，所过之处，哥大校友设宴欢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来，往往以为是各该国内阁官员商讨国事的聚餐会。所以胡适的学生时代住在哥大三大宿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抖”了起来的，不独以华人为然也。——译注者注

上是经济理论,主任导师是亚尔文·詹森(Alvin S. Johnson),他后来自康大辞职去就任新办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编辑,后来他又和哥大经济系名教授西里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 1861—1939)共同担任《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詹森是专攻经济理论的名教授,是该行的一位泰斗。我真想不通,我在上了他两年经济理论的课之后,竟一无所获。

所以我得到个结论:要不是经济理论这门课有问题,那就是我自己的头脑有问题。可是在我们那个由詹森指导的研究班里,后来竟然出了个名经济学者弗兰克·纳特(Frank H. Knight)。纳氏最初主修也是哲学,后来专攻经济。他所写的博士论文《冒险、波动和利润》^①,后来竟使他成为一个知名的经济理论家。所以经济理论这门学问实在没什么毛病;这显然是我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使我对2年研究院内的经济课程一无所获。

转学哥大之后就不再以经济理论为副修而代之以政治理论。另一副修在当时夏德(Frederich Hirth, 1845—1927)教授的提议与邀请之下,以“汉学”(Sinology)为副修。

夏德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据我们所知他是哥大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那是美洲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丁龙[这位早期旅美的华工]原是美国卡本迪将军(Horace W. Carpenter, 1825—1918)的一位佣人,他[的为人和工作]深得卡氏的敬重,所以卡氏乃独立捐资给哥大设立一席专治汉学的“丁龙讲座”。

夏德教授的《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著作^②、当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他那时在哥大却苦闷不堪,因为他简直没有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所以我倒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以汉学为我的两门副修之一。夏德先生待我甚好。他不但领导我参观哥大那个他所协助建立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他还把他那丰富的中文典籍的收藏全部让我使用。我和这位老先生厮混得很熟,他有时也请我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们和其他的学生。

^① Frank Hyneman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21: 381. ——译注者注

^② Frede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3: 388;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 & Munich; Shanghai & HongKong, Kelly & Walsh, 1885. ——译注者注

我还记得他的助手刘田海。田海是前中国驻美公使刘锡鸿[编审者按：根据外交部档案资料处所编《中国驻外各公使大使馆历任馆长衔名年表》，刘锡鸿于清光绪三年三月十七日被任命为使德钦差大臣(原为驻英副使)。驻美表内，并无其名；人名索引内亦仅出现一次。似未任驻美公使职]的儿子。这位刘君甚为成熟。他虽然算不得是个汉学家，但是他的中文根基甚好，做夏德的助手，胜任有余。

我在夏氏的公寓之内还遇见一位温和美丽的女子尤金·梅耶(Eugene Meyer)的夫人阿葛勒丝·梅耶(Agnes Meyer)。梅耶先生是《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也是老罗斯福总统任内的金融界巨子。阿葛勒丝本人也有她自己的成就——她也是美国新闻界的领袖之一。

夏德教授非常喜欢我，同我常常谈他自己有趣的故事。有时这些故事也是拿他自己开玩笑的。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他说的一则故事，便是他自己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当翻译的笑话。这位中国总领事那时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夏氏应约为那位总领事临别致辞的翻译。夏德[既然身为哥大中文系的教授]这项职务他是不能推辞的。但是当这位总领事起立致辞之时，夏氏却为之大起恐慌，因为这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夏氏一句也听不懂。事到临头，他当然不能向商会当局来临时解释说中国方言太多，福州方言他是一句不懂的。他情急智生，乃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并大记其笔记。当总领事演说完毕之时，夏氏乃起立[用英语]为总领事重新演说一番。一开头夏氏便说，我(总领事)这次离纽返国，心理上充满了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与亲人久别重聚；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夏氏说得情文并茂。当夏教授“翻译”完毕之时，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

以上便是夏教授告诉我的故事之一，我仍然至今未忘。

在我所有的教授之中我特别希望一提的是约翰·杜威教授和厄德诺教授。在我转学哥大之前我已经认识了厄德诺教授。前面已经说过，厄氏是一种新宗教“伦理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但是他是无神的；也没有什么神学来作其理论根据。当我还在绮色佳的时候，我有几个犹太同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个伦理俱乐部。他们之中我还记得的有罗拔·卜洛特(Robert Plaut)和哈鲁·里

格曼(Harold Rieglman)。卜君现已仙逝；里君则仍然在纽约当律师，曾加入共和党一度竞选作纽约市长候选人。里君和我一样也是从康乃尔转学哥大的，他人法科，我进哲学。就在康乃尔这个伦理俱乐部，我第一次听到厄德诺教授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

后来我又选读了厄教授的一门课，因而和他本人乃至他的家人都熟悉了。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记了很多条厄德诺语录。让我抄几条在下面^①：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的人——的最好部分。

只有对别人发生兴趣才可使自己常是活泼泼地，常是堂堂正正地。

要生活在深刻地影响别人！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

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很容易看出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所以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

杜威和实验主义

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在我进哥伦比亚之前，我已读过约翰·杜威、查理·皮尔斯(Charles Pierce)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实验主义大师]的著作。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所占据了的缘故。所谓“新唯心主义”又叫做“客观唯心论”(objective idealism)，是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家葛里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尔派哲学中流变出来的。康

^① 译文欠佳，然为胡公自译。笔者喜其信达，故未敢擅改。详见《留学日记》第819页。——译者注

乃尔的塞基派的哲学^①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斯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郇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地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在这些实验主义的宗师和领袖们之中，詹姆士死于1910年也就是我初到美国的那一年，皮尔斯死于1914年，是年我自康乃尔结业。所以1914年以后，杜威是实验主义大师中的硕果仅存者，他的著作也是我所倾慕的。在哥大我选了他两门课：“伦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我非常欢喜“伦理学之宗派”那一课。那门课也启发我去决定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②。

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但是听讲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可以领略他那慢慢地所讲的课程了。他虽然不是个好演说家或讲师，但我对他用字的慎重选择以及对听众发表意见的方式则印象极深。

杜威那几年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纽约河边大道(River side Drive)和西116街的南角。每个月杜威夫人照例都要约集一批朋友以及他的学生们举行一个家庭茶会。在这些家庭招待会里，我们这批学生都有极大的兴趣与光荣能见到纽约文化圈内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那些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们。杜氏的学生们被邀参加他这个“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都认为是难得的

^① 康乃尔的“塞基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派。只是该校一批搞“新唯心论”的教授，群居于塞基大楼，臭味相投，此唱彼和罢了。——译注者注

^② 中文题为胡氏自译。见《留学日记》第1133页。——译注者注

机会^①。

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也就难以作详细的叙述。他对我之所以具有那样的吸引力,可能也是因为他那些实验主义大师之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了。杜威对威廉·詹姆士的批评甚为严厉。老实说我也不欢喜读詹氏的名著《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②。我本人就是缺少这种“信仰的意志”的众生之一,所以我对杜威的多谈科学少谈宗教的更接近“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比较有兴趣^③。

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个杜威思想如何影响我自己的思想的实例来说说。

在我选修他的“伦理学之宗派”的那一课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做《逻辑思考的诸阶段》。这一篇后来被收集在芝加哥大学于1916年所出版的杜著《实验逻辑论文集》里面^④。

在这篇论文里,杜氏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过程都要通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固定信念阶段。在这个紧要的阶段里,人们的观念和信仰都

^① 杜威在这个公寓内一直住到1952年,他93岁时老死为止。杜氏自1921年自华返美以后,对中国大感兴趣,所以在他以后的家庭招待会里,中国名人和学生总也是客人中的主要分子。

1927年杜威丧偶,但是他的招待会仍继续举行。一次一位中国学生,不善饮酒,却偏好两杯;不意一时酩酊大醉,竟在杜威卧榻之上鼾睡起来。等到酒醒之后,他所看到的,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却是杜老头的胡须飘飘。他居然与杜大师同榻睡了一夜。一时传为趣谈。

二次大战后,杜氏以八七高龄,居然续弦,讨了位42岁的年轻夫人。杜先生当然不能再生孩子了;他二人乃领养了2个意大利孤儿,杜氏年逾九十之后,仍然神志清明,著述不停,至死方休,也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位怪杰。

笔者震于杜威大名,于1948年进入哥大之后,亦常与同学二三人赶着去“看杜威”,不用说那都是受了《胡适文存》的影响。——译注者注

^②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and Human Immortalit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332. ——译注者注

^③ “实验主义”在杜威崛起之前通用 pragmatism 一字,意为“实用主义”。学者认为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这一概念如不加澄清,则易流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所以杜威不喜此字,乃另造 instrumentalism(工具主义)及 experimentalism(实验主义)。杜氏主张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中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也就是“知识必须自实践出发”。它不是“只论目的,不择手段。”相反的它是为达成解决问题,于实验中选择正当而有效的手段。这就是杜氏的“实验主义”。——译注者注

^④ John Dewey.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6: 183—219. ——译注者注

是固定的、静止的。外界不能动摇它丝毫。^①

接着这第一阶段而来的便是一个破坏和否定主观思想的阶段。这一转变以古希腊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诡辩家”(sophists)为代表。他们观察万物,一切以人为中心。这[第二]个阶段杜威名之曰“讨论阶段”(period of discussion)。其要点是基于好辩与公开讨论的习俗,而导致合乎逻辑的思想。这一点使我大感兴趣。因为中文里表示有逻辑的思维叫做“辨”[“辨”与“辩”通],原来也正是这个意思。

第三阶段可以叫做从“苏格拉底的法则”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杜威对苏格拉底[求知]运动的诠释,颇多溢美之词。但是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逻辑,则颇有微词。

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当然便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的科学了。

^① 唐德刚按:例如古埃及、巴比伦和我国殷商社会里对神的观念,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神权时代”的观念罢。

回忆杜威与他的影响^①

[美] 威廉·赫德·克伯屈

我第一次同杜威教授的接触是 1898 年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暑期班里。但是,我从这个课程里学到的很少,我对这个课程没有思想准备,对杜威的教学方法也不习惯。我后来才知道,杜威总是带着他的一个问题来到课堂上,坐在班级的前面,仔细地考虑,并把与他的问题有关的创造性思想大声地说出来。

两年后,在查尔斯·德加莫的指导下,我学习了杜威的一篇专题论文《与意志有关的兴趣》。这对我与我的思想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在这篇论文里,杜威分析了关于“兴趣”和“努力”对学生所产生的比较教育效果的一场争论。“兴趣”理论的支持者,把赫尔巴特派的兴趣学说曲解为一种“使得事情有兴趣”的表面的“糖衣”的方法,由威廉·T·哈里斯领导的“努力”理论一派,则指责这样的“糖衣”将宠坏儿童,而且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品格的形成,而努力正是完成这一事情所必需的。为了保持努力,他们建议在必要时,要通过威胁和惩罚来强制儿童去努力。

杜威说,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是错误的。你们用糖衣不能使事情有兴趣,而强制的努力——强制儿童去行动,而不是使他们置身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中去——是不能形成品格的。特别是,你们误解了在兴趣和努力之间的固有关系;更突出的是,个人亲自感到的兴趣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经验的第一阶段,而与它相联系的个人努力则是产生实效的阶段。因此,适当的努力和适当的兴趣不能对立起来,在本质上,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相互补充的。

^① 译自: William W Brickman, and Stanley Lehrer.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New York: Atherton, 1961: 13—16.

那时,我是一所学院的数学教授,可是好几年来,我曾把教育作为一种业余兴趣而沉醉在里面。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经验以及他把教育过程作为品格形成的新看法,说服我放弃了数学。以后,我就把兴趣集中在教育方面,把它作为我的毕生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07年,当我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笔奖学金时,我才实现了改变我的兴趣的愿望。当时,杜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哲学,在以后的3年里,我选听了他所有的课程,同时决定把教育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我于1907年开始跟杜威教授学习。我认为,在哲学方面,他那时仍然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因为有一个时期,杜威和其他人一起曾经追随过新黑格尔主义路线;而我,于1895至189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哲学之后,也接受它作为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发现,杜威强调过程的概念,强调自然的连续性和归纳科学的方法,已经建立起一种完全新的哲学,即后来所称的实验主义。在我和杜威一起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3年里,我放弃了新黑格尔主义,接受了取而代之的新观点,从而在生活和思想方面获得了一种新鲜而富有生命力的观点。

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1952年杜威去世为止,我对同他的许多接触感到很满意。杜威阅读了我于1912年写成的《蒙台梭利^①方法的检验》一书的初稿并表示赞同。当他自己完成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前七章时,他把这些章节交给我征询意见,并提出完成这部著作的其他题目。当时,我正在教“教育原理”这门课程,于是,我开列了一份我在教学时感到麻烦的一些哲学问题的目录,送给杜威。起初,他拒绝接受这份目录,但是,后来他重新阐述了一些问题,这些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已经完成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

我另一个与杜威接触的例子,是在他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以后。他接到了作为教育哲学方面的客座教授职位的邀请,同时我在教教育哲学中已经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尽管他在哲学和教育哲学两方面的威望很高,是一位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但他感到对新职位的一些实际细节没有把握,因此,到我这里来征求意见。不用说,我非常高兴地对他的需求给予了帮助。

说到杜威教育思想的来源,一些人认为他是从卢梭和福禄培尔^②那里得

① 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0),意大利教育家和医生。——编译者注

② 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 1812—1852),德国学前教育家。——编译者注

来的。关于这一点,我有一次问过杜威,他明确地告诉我,在他形成他自己的教育观点之前,随便哪一本书他都没有读过;与此同时,他说过,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他从弗兰西斯·W·帕克那里得到了帮助。当杜威来到芝加哥大学时,帕克正在芝加哥从事教育活动。至于杜威的生活哲学(和随之发生的教育哲学)的来源,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从威廉·詹姆士那里得到了他的心理学。正如杜威后来所说明的,这意味着,他和詹姆士俩人都深深地受惠于达尔文^①的《物种起源论》。很可能从这个来源中,杜威得到了如前面已说过的过程的概念、自然的连续性和归纳科学的方法。它似乎也是在杜威观点中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它们来自于在他的佛蒙特家庭里他所分享到的、与其他美国人相同的有创造力的边疆背景。

就杜威在哲学史上的相应地位来说,我把他放在仅次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位置上。至于他在教育哲学史上的地位,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说到他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我把他同威廉·詹姆士、弗兰西斯·W·帕克和爱德华·L·桑代克^②放在一起——他们已最有效地帮助我们现在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形成。

①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编译者注

② 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美国心理学家。——编译者注

杜威唤醒了黑暗中的美国学校^①

[美] 劳伦斯·A·克雷明

杜威像桑代克一样,在自己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读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杜威就学时深受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影响。1884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去密执安大学工作。几乎一到美国西部,杜威就开始丢掉自己所背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包袱。仔细阅读他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著作,尤其是他同麦克莱伦(James Alexander Mclellan)合著的《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就会发现这些著作清楚地展示出了他努力把新科学具体体现在他的伦理学和哲学思想中。《心理学原理》是杜威学术上的“奥德赛”(Odyssey),使杜威的思想有了许多“新方向和新性质”。特别是他从这部著作中接受了一种客观心理学理论的观念,这种理论牢牢地扎根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关于这一点,杜威后来写道:“这种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而越来越进入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②1894年,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③聘请杜威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后,他那已经发芽的思想就迅速地结出了硕果。

在许多年后举行的杜威70寿辰庆典会上,杜威讲了一段话,谦逊地描述了他在美国生活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对他身边情况

① 译自:Lawrence A Crem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 1876—195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115—126.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杜威. *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亚当斯(G. P. Adams),蒙塔古(W. P. Montague). *当代美国哲学*:第2卷.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30: 24; 简·杜威(Jean M. Dewey). *约翰·杜威传*//希尔普(P. A. Schilpp). *约翰·杜威的哲学*. 纽约, 1939: 3—45; 芬内尔(L. S. Fener). *约翰·杜威和美国思想界人民运动的背后*. *思想史杂志*, 1959, (20): 545—568; 怀特(M. G. White). *杜威工具主义起源*. 纽约, 1943; 萨维奇(W. Savage). *密执安大学发展的约翰·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进化*. 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50. ——原注

③ 哈珀(1856—1906), 美国教育家. ——编者注

的变化多少有点敏感。他对什么东西在消失和死亡,什么东西在出生和生长,有着某种正确的评价。因此,凭借这种反应,他预言未来将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他70岁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生日庆祝会,并称赞他促成了一些他预见可能会发生的事情。”^①杜威的这段话的确过分谦逊,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真理。

人们都认为,杜威在进步教育运动初期起了作用。在他的周围,要求各种各样教育改革的呼声响成一片。实业家和工会坚决主张学校要承担传统的学徒训练职责;社会服务社工作者和城市改革者拼命主张卫生学、家政学、手工艺和儿童保育方面的教学;每一种爱国者都在要求制订美国化的教学计划;农民新闻工作者迫切要求一种新的农村生活训练,以便给年轻农民一种快乐感和前景感,同时防止他们搬到城市去。应该看到,贯穿在这些建议中的共同意思是:家庭、街区或车间不再起到传统的教育作用,必须想办法结束这样的状况,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学校必须继续扮演它们的角色。

留给杜威的是一种传统观念:学校像一个遗产继承人的机构。1899年,为了回答人们对他夫妇3年前创办的那所实验学校的批评,杜威向家长和学校资助者连续作了3次讲演。这些讲演后来汇集成题为《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的小册子出版。这是一本畅销书,在出版后的10年里重印了7次。杜威在观察教育学舞台,试图使观众了解它的意义的同时,坚定地把教育酵素的责任加在工业主义身上。他用柏拉图式的词句提出:社会起到学校教育的作用。旧的农业社会背后,有着历史悠久的农户和农村邻里的教育。农村中,每一个年轻人都分担了有意义的工作;生产的全过程展现在任何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儿童眼前。杜威强调说:“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类型的生活中所含有的训练和品格形成的因素……我们不能忽视直接接触自然、实际事物和素材、手工操作的实际过程以及适合社会需要和有效的知识对教育目的的重要性。”^②

但是,杜威继续说,在工业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认为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过同样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性质将是什么?那就是,学校将承担对传统的

① 杜威. 人及其哲学. 坎布里奇, 1930: 174. ——原注

②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 1899: 23—24. ——原注

农村生活起教育作用的一切方面。杜威得出结论说：“把这一切因素组织起来：理解它们的全部含义，把它们所包含的观念和理想彻底地、不妥协地体现在我们的学校制度中。这样做，就意味着使每所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各种类型的作业活动，并充满艺术、历史、科学的精神。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工具时，我们就将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最深切和最好的保证。”^①

当然，杜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要求学校扩充课程，也不仅仅是反映怀特(Morton White)^②已正确指示的“反对形式主义”，实际上提供了进步教育的“进步”是什么的答案。让我们回想一下，杜威所说的“雏形社会”，实际上是大社会的缩影。因此，他看到的传统教育与现实生活隔离的弊病就消除了。但杜威所说的“雏形社会”，更重要的是改善大社会，使它更有价值、更可爱、更和谐。学校再一次被设想为社会变革的手段，因为“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一旦被详细说明，教育理论就成为政治理论（再一次用柏拉图式的词句），教育家就会被卷入社会改革的斗争之中。

杜威在讲演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尖锐的观点。他斥责“旧学校”方法呆板、课程划一，教育重心也长期是“在教师、教科书以及你所希望的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直接的本能和活动上。”^③杜威提出，新教育的本质是把这个重心重新移到儿童身上。于是，儿童的谈话、提问、解释和表现出来的自然冲动被看成自然资源和教学过程“不要投资的资本”。学校工作必须从儿童的这些自然冲动开始并抓住它们，控制它们的表达方式，以“不仅促进儿童生长，而且使他们有同样的结果，进而使他们获得从前的教育思想中也提到的职业知识和训练”。^④

《学校与社会》中充满有关教育的新常识，其中包括实验学校一些优秀的教学实例，以及那些有时代感的教师通过观察得到的有说服力的备课资料（也有同时代人关于本能和复演说的惯常说教）。但是，在杜威的分析中，什

①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 1899: 43—44. ——原注

② M怀特,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编译者注

③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 1899: 51. ——原注

④ 杜威. 学校与社会. 芝加哥, 1899: 70. ——原注

么是新的呢？归根结底，答案就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校从隔离状态回到了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中心。杜威认识到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并设想了一种新教育。这种教育可能会产生用人际关系来衡量的社会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区别。尽管杜威在系统阐述他的理想时已改变了文明的含意，但教育作为文明标志的传统观念再一次被唤起。

《学校与社会》与杜威的那本巨著《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相隔了17年。在那些年里，杜威作为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批评家，其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了。1904年，他同哈珀校长一连争吵了几次后，就离开芝加哥大学，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开始了一段特别多产的时期。那一时期，他相继出版了许多著作如1908年同塔夫茨(James H. Tufts)^①合著的《伦理学》(Ethics)、1909年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1910年的《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1913年的《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1915年同女儿伊夫琳(Evelyn Dewey)合著的《明日之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他虽然不是有意培养门徒，但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们。由于1914年《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创办，通过充满活力的门徒、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鲍恩(Randolph Bourne)^②，杜威开始为广大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公众所知。^③到1916年，杜威已被公认为进步主义的一位最主要的发言人。不管他写什么文章，都保证有众多的感兴趣的读者。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意外，《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出版，立刻就在一些地区引起了轰动。人们认为，这本书是自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来对教育学所作的最显著的贡献。^④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中，杜威开始探究民主、科学、进化、工业主义的教育含意。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对进步教育运动作了最明白、最全面的

① 塔夫茨(1862—1942)，美国大学教授。曾在密执安、明尼苏达等大学任哲学和心理学教授。——编译者注

② 鲍恩(1886—1918)，美国政治家。——编译者注

③ 菲勒(L. Filler)：《伦道夫·鲍恩》(华盛顿，1943)，第4、6章。勒讷(M. Lerner)指出，杜威的公众声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鲍恩是热情的门徒。见：伦道夫·鲍恩和两代人，一年两次，1940—1941，(5—6)：65。——原注

④ 见：拜尔(T. P. Beyer)的评论。日晷，1916，(61)：103。李普曼(W. Lippmann)把这本书说成是“最杰出和最有权威的学者献给美国文明社会未来的成熟智慧”。见：新共和，1916，(7)：231。——原注

阐述。这本书的思想很丰富,又不图系统的说明。^① 杜威既有启发性地、批判地评论了他以前的一些教育家,如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②、洛克、卢梭、康德(I. Kant)^③、费希特(J. G. Fichte)^④、黑格尔(G. W. P. Hegel)、赫尔巴特(J. F. Herbart)^⑤、福禄培尔(F. W. A. Froebel)^⑥(不像他的门徒,杜威研究过哲学史),又明显地意识到同时代人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上的发展。当然,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他在更早的著作中已预示过,并带有一种人们早已熟悉的口气。^⑦ 像任何名著一样,这部著作既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又是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它把进步教育许多不同的方面和谐地结合到一种范围广泛的理论之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为它们指出方向。正是它的出版,为教育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

杜威对民主主义的定义是从美国经验的材料上得来的。他认为,因为在组成社会的各种团体中,关于分享共同利益的观点越来越不同,在这些团体中,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就更加自由,所以,需要盛行民主主义。一个民主社会就是这样起变化的,就是这样尽可能明智地、科学地组织起来的。用杜威的话来说,这是“有意识进步的”。^⑧ 什么理论更能适合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一个正在引人注目地改变习惯和信念的移民团体社会、一个知识分子感到在衰退但又迫切需要重建的社会? 民主主义成为对“更完美的联合”坚持不懈

① 杜威概括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人类的冲动和本能与自然力在生物学上的连续性;心理的发展有赖于参与有共同目的联合活动;自然环境通过在社会环境的运用产生影响;利用关于渐进发展中的社会的愿望和思维中个别差异的必要性;方法与教材必要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内在联系;承认心理是认识和检验行为意义的思维。”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16:377。——原注

② 亚里士多德(前 884—前 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编译者注

③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编译者注

④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编译者注

⑤ 赫尔巴特(1776—1841),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编译者注

⑥ 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编译者注

⑦ 《与意志有关的兴趣》(1896)中概述过动机理论,《教育的伦理学原理基础》(1897)中概述过道德念,《我的教育信条》(1897)和《学校与社会》(1899)提出过教育学和社会哲学,《儿童与课程》(1909)中论述过儿童经验和系统知识的关系,而《作为社会中心的学校》(1902)和《教育中的民主》(1903)中阐述了社区理论。有意义的是,杜威的教育学有这么多的观点,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系统提出和阐述的。在这十年里,他每天都接触实验学校的问题。教育学,见:贝克(M. C. Baker),约翰·杜威的教育理论基础,纽约,1956。社会处境,见:金格(R. Ginger),奥尔特格尔德的美国,纽约,1956;麦考尔(R. L. McCaul),杜威的芝加哥,学校评论,1956,67:258—280。——原注

⑧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6:375。——原注

的追求,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过程。正如杜威 1899 年所设想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新社会是民主主义的具体体现。

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概念中,设想了一种对教育的强制要求。在后来变得出名的一段话中,他阐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

“民主政治热心教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表面的解释,一个民主的政府,除非选举人和受统治的人都受过教育,否则是不能成功的。民主的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的原则,就必须用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替代,而自愿的倾向和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情,每个人必须参照别人的行动,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了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自己活动的全部意义。这些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接触点表明,每个人必须对更加多样的刺激作出反应,鼓励个人变换行动。这些接触点使个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展。只要行动的刺激是片面的,这些能力就依然受到压抑。因为这种刺激必须在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由于排他性而排除了很多社会兴趣……一个变动的社会有许多渠道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传播出去。这样的社会必须教育它的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否则,他们将被突然遇到的种种变化所迷惑,看不出这些变化的意义或关联。”^①

杜威用社会的术语明确表达了教育的目的,确信教育最终将在个人改变了的行为、知觉和顿悟中显示它的成功。杜威给教育下了定义:“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②这段话支配了他的生长概念。生长是杜威学说中用得很多的中心词。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根据杜威的说法,教育目的不仅是教学生做公民、做工人、做父亲、做母亲,而且最终是使

①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6:101—102. ——原注

②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6:89—90. ——原注

他们过最完满的生活——也就是既会连续增加经验的意义，又会连续提高指导后来经验的能力。

生长的概念最终把杜威的个人理论与扩大的进步主义联系起来。杜威希望教育不断扩大社会情境的范围，在这种情境中，个人能觉察到问题并作出选择，然后按照选择去行动。他希望学校形成使个人能够控制环境而不仅仅是去适应它们的习惯，^①因此，希望每一代人在试图在后代身上培育的行为品质上胜过前辈。他提出，进步的社会应“力图形成青年的经验，使他们不重演流行的习惯，而是养成更好的习惯，使将来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步……我们无疑还远没有实现教育作为改进社会的建设性媒介的潜在功效：也还远没有实现使教育不仅阐明儿童和青年的发展，而且阐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这些儿童和青年将是这个未来社会的成员。”^②

杜威就这样阐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之间的一般关系，接着又谈到教育的特性，强调充满在教和学每一个方面的一种新的统一精神。杜威公开批判二元论——这使人回忆起他早期的黑格尔主义——抨击劳动和闲暇、人和自然、思维和行动、个性和联合、方法和教材、心理和行为的历史性分离。调和这些二元论，就是在建立一种哲学——“把智力看作是通过行动对经验材料进行有目的的改组。”^③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为“有意识进步的”社会利益服务。

在杜威抨击的所有二元论中，对他的进步主义观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文化和职业的传统分离更重要。杜威像他的同时代人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④一样，深入考虑文化和阶级的历史联系。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就意味着拥有某几种知识，表明有知识的人是上流社会阶层的成员。从希腊时代起，文化就同与贫穷相对的富裕、与劳动相对的闲暇、与实践相对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学校课程中，文化意味着强调某些文学和历史的学科，特别是掌握古典学科知识和外语。对于杜威来说，这种文化概念必然强调的是阶

① 在谈论个人和环境协调的过程中，杜威谈到一些容易适应环境的习惯和容易控制环境的习惯。教育和这两种习惯都有关，但主要与后者有关。他指出，野蛮人适应环境，文明人改造环境。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16：55—57。——原注

②③ 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16：92，377。——原注

④ 维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编译者注

级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他们的共同,是排斥而不是联合。此外,当文化对一些社会团体,如政治家、职员和知识分子团体来说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时候,它对于另一些社会团体来说则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排斥和不公正这两个方面,历史的文化观显然是势利的。^①

杜威认为,民主主义需要文化的重建以及与它相一致的课程,需要把科学和工业学科设想为使很多人更了解周围生活的工具。这意味着把职业科目介绍到工业社会的生活中去,这些职业科目不仅能培养实用的技能,而且能作为更加理智的冒险事业的出发点。他强调说:“教育者的问题在于使学生从事这样一些活动:获得手工的技能和技艺的效率,在工作中发现即时的满足,为后来的应用做好准备。所有这些事情都应从属于教育,即从属于智育的结果和社会化倾向的形成。”^②生长意味着从现在的经验着手,并增加这些经验的意义。如果工业主义是当代的中心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其他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从它着手呢?

杜威得出结论说:从本质上看,没有什么学科本身具有自由或者文化的力量,任何科目在某种程度上(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理解它)都是指一种文化。他写道,关于文化的定义,也许没有比“文化是不断扩大一个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的范围,以及增加这种理解的正确性的能力”^③这一定义更确切的了。就这一点而言,如果根据心理发展的目标进行适当的教学,那么,文化就能包括比平时仅包含科学和手工艺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

那么,杜威将怎样回答斯宾塞(Herbert Spencer)^④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呢?杜威提出,判断知识价值的标准应该是社会性的,他认为,规划课程时,必须把要素放在第一位,而把精炼放在第二位。“凡是社会方面最基本的事物,换言之,凡是与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经验有关的事物,就是要素。至于代表特别群体和专门职务需要的事物,应该是第二位的。”^⑤对一个阶级来说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对另一阶级来说却是广泛的

① 杜威的文化理论,见:教育中的文化和工业.教育双月刊,1906,(1):1—9;文化和文化价值,见:孟禄(P. Monroe).教育百科全书:第2卷.纽约,1911—1913:238—240;19世纪文化的讨论,见:威廉斯(R. Williams).文化与社会.伦敦,1958.——原注

②③⑤ 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16:231,145,225——原注

④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编译者注

通才教育,在这种地方,民主主义是不能兴旺起来的。在共同生活的问题上,人们要求一种普及教育;在“旨在提高社会意识和兴趣”的问题上,人们要求一种广泛的人文教育。

杜威是否真正解决了课程的重点问题呢?当然,课程的重点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因为杜威的标准是如此模糊,以致对评判课程计划没有多少帮助。美国教育史全是一些特殊团体的例子,是这些团体“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上”推行自己所喜欢的教育改革方案。伍德沃德(Calvin M. Woodward)^①很快就从手工训练对华盛顿大学学技术的学生是有用的看法改变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贝利(Liberty Hyde Bailey)^②使得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看法也有了同样的飞跃,这毕竟是好多年来以人民的名义做一切的民主政治的一条规则。那么,作为一种评判标准的社会价值所固有的困难也更大。一位评论家曾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困难,并告诫人们说:“在杜威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个人都没有希望过隐居生活(反映他的自我意识)。人们认为,隐居是一种有罪的奢侈。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自己毕竟只是‘修正和改变以前接受的信念的代理人’。总之,人们不得不确信,尽管杜威先生出色地捍卫了个人主义,但他的道德理想实际上是‘善于交际的人’。”^③

杜威承认这些源于进步主义本身的困难。从本质上看,人们肯定会将他的系统阐述看成贺拉斯·曼思想的继续。在普及学校教育方面,杜威看到了在更广泛的民主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没有随之变革学校教育本身的性质,那么人就会丧失社会的含意。这个变革的关键将是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超越了仅仅包括语言和文学的传统偏见,扩大到了包括一切有关的人类事务。^④杜威像贺拉斯·曼一样,承认教育是一个有关个人生长和发展的问題;他也像贺拉斯·曼一样,把重点永远放在社会、团体和公众的经验方面。杜威最终认为,只有在扮演适当角色的学校教育得到普及的时候,民主主义才会实现。因此,在教育变革中,他看到了一个“有意识进步的”社会最重要的工作。

① 伍德沃德(1837—1914),美国教育家。——编译者注

② 贝利(1858—1954),美国植物学家,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编译者注

③ 民族,1916,(102):480—481。——原注

④ 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16:300—301。——原注

杜威和美国教育^①

[美] 马辛尼·格林

1894年,约翰·杜威成为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1916年,他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这是他的教育信念的最明确的阐述。其间的几十年,是表现了杜威作为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哲学家而成长的一个时期。在这些年里,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并在教室内外对成千上万的人作讲演,还活跃在很多组织中。

一种通常的错觉是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一起产生的。这所学校被过多看成是为一种“进步”学校的原型。当杜威担任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主任时,实验学校就建立起来了。它是与系里的教师在教育理论和心理学方面已经进行的工作直接有关的。它与许多哲学的和心理学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它的目的是通过实际应用来检验一种专门的认知和行为哲学。1936年,杜威写道:“这所学校原意是一所实验学校,不是一所实习学校,(在目的上)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进步学校”,它的目的是“加深和扩大社会接触和交往,以及共同生活的范围”,它的试验“在于发现导致良好的社会结果的倾向、能力和需要”^②。

这所学校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访问者都赶来参观,而且常常被他们看成似乎是与传统教育的一个彻底决裂而感到震惊。杜威说,他们带来了“一所修道院学校的想象”,并发现了他们认为是狂热的个人主义的活动。他们没有把社会要素视作从属于教师和教科书的一种新的形式。芝加哥的报纸不

^① 摘译自:William W Brickman, and Stanley Lehrer.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New York: Atherton, 1961:75—92.

^② 杜威. 芝加哥实验的理论//KC梅休,AC爱德华兹. 杜威学校. 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公司, 1936:464. ——原注

止一次地反映了这样的访问者的敌意和激烈地反对正在进行的事情。

然而,实验学校的工作有助于增加参加杜威在教室里的讲演的出席人数。而且,对杜威来说,因为学校的特殊情况和需要自愿的财政支持,参加许多公共集会,在共同支持的运动中与教育家和其他有兴趣的人结合起来,那是必要的。实际上,《学校与社会》(1899)的第一版就是杜威的筹款演说的一个集成。它的影响的迹象可以在第二年的《辩证法》杂志上的一篇书评中找到。那篇书评的作者指出:“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第一份报告传到了外界。除了有些地方的个别人外,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它。”他们又继续说,教育家们并不认为它将长期继续下去或教任何新的课程,但使教育家们惊讶的是,“这所学校依然存在,而且到现在已是第四年了。在今天,更多的眼睛注视着它,毫无疑问,这超过了对国内其他任何的初等学校的注视。”亨利·斯蒂尔·康迈格^①把《学校与社会》称为杜威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并指出,当它出版时,杜威“早已作为美国最有创见的和最渊博的思想家之一而出现”^②。

在芝加哥时,杜威与伊利诺斯儿童研究会(Illinois Society for Child Study)和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的其他教育家一起参加了许多会议。在提供使他的思想能传到许多学校的渠道方面,这些讨论会正如杜威参加的公共集会一样重要。除了提供讲坛外,它们还增加了出版的可能性以及保证了一种对新思想善于接受的读者。《与意志有关的兴趣》第一次出现在《赫尔巴特学会年鉴(1895)》的增刊上。《教育中的伦理原则》发表在第三本《赫尔巴特学会年鉴(1897)》上。现在,《与意志有关的兴趣》被认为是一种引起人们注意的最早的、明确的教育论述。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贡献的重要性,在《教育评论》(1896年第12卷)和《公立学校杂志》(1895—1896年第15卷)上得到公认。

可能同样有意义的,是杜威在芝加哥的友好的和职业的交往。他的好朋友之一埃拉·弗拉格·杨曾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早些年里的一段时间的一位同事,后来是芝加哥学校的学区督学。正如简·杜威所写的,当杜威离开那里时,埃拉·弗拉格·杨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她不仅与杜威友好交往,而且

① 康迈格(Henry Steele Commager,1902—1998),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编译者注

② 康迈格.在美国的充满生气的思想.纽约:哈珀出版公司,1951:587。——原注

对杜威的思想有影响。记得,在1911年,她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NEA)的主席,并在一些年里她利用很多机会以“新教育”的名义进行演讲。可以看到,在对杜威的响应中也有她的一部分功劳。与简·亚当斯和赫尔社区的交往起了另一种作用,尽管它是很有限的一种作用。对一些人来说,这个社区是一个中心。在他们中间,有芝加哥舞台上的艺术家和作家,因此,杜威在那里的交往是多方面的。但是,必须指出,那时在艺术界中对他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反应。

除外,詹姆斯·R·安吉尔又成为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同事。他曾与杜威一起在密执安大学(与詹姆士和罗伊斯一起在哈佛大学)学习过。安吉尔是一位心理学家,后来成为了机能心理学^①的最有影响的提倡者之一,成为詹姆士和杜威结合起来的思想的一个传播者。

《我们怎样思维》发表在《初等学校教师》杂志(1903年12月号)上,可能至少部分地被考虑为在实验学校中已经进行的工作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从1898年至1910年,赫尔巴特学派在美国教育中的影响占有着统治地位,以及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严格地按照“五步法”^②内容和品格的形成开始有所改变。克伯屈认为,在《我们怎样思维》出版之后,赫尔巴特主义开始“逐渐消失”,但是要建立一种非正式的联系,那是困难的,特别是当我们回忆到例如威廉·C·巴格莱^③《教育过程》(1905年)这样的著作时,它表现为对赫尔巴特主义的一种修改,但几乎不可归因于杜威的著作。

对全国教育协会的演说和记录汇编的一个观察,给我们指出,在紧接着杜威的芝加哥实验以后的一些年里,假如从整体来看的话,杜威的工作给公立学校教师的印象是小的。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可以发现,在全国教育协会的讨论中,没有什么有意

① 机能心理学是欧美现代心理学流派之一。它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詹姆士和杜威创立,安吉尔继承和发展。它主张心理学研究意识的机能和功能,反对心理学仅仅分析意识的内容。——编者注

② “五步法”,即“五段教学法”。一种关于课堂教学阶段(I.预备;II.提示;III.联想;IV.总括;V.应用)的理论。由赫尔巴特学派的齐勒尔和赖因在赫尔巴特的教学过程理论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提出。——编者注

③ 巴格莱(William Chandler Bagley,1874—1946),美国教育家。要素主义教育(强调人类文化遗产里所谓不变的共同要素)的提倡者。1917—194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编者注

义的事与芝加哥的实验有关。1911年初,埃拉·弗拉格·杨开始把实验主义的报告带到了这些会议上,但是,最初的反应是不大的。

在《明日之学校》(1915年)中,杜威和他的女儿描述了一种把新的理论付诸于实际的公立学校制度。但是,杜威没有把声望作为他们著作的先驱。在被提及到的公立学校中,是在加里^①、印第安纳波利斯^②和芝加哥的那些学校。杜威说,它们表现了“用例子说明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方向”的基本相似点。

当然,在那些研究过的学校中的随意选择的例子并没有表明,在大多数美国学校中正存在着的主要变化。1902年,在《初等学校教师》杂志中描述的悼念弗兰西斯·W·帕克的仪式上,杜威悲哀地叙述到帕克为使教育成为社区生活中的一种力量而作的努力。他评论说:“他是一位先驱者,而对一些人来说,他好像是一个追随时尚的人。”

一般地,人们仍认为,当杜威离开他在教育重建方面的工作而转向思考他的哲学主张时,他作为教育家的影响仍通过“所赞赏”的那些学校而继续存在。特别是在1912年以后,这些学校已经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回忆起实验学校的试验性质,以及它的心理学的、哲学的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拉格^③的坚决主张,那些“进步学校”是可以追溯到杜威的影响的。

但是,1938年杜威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割断他自己与“进步教育运动”的关系,这也并不奇怪。

在1910年以后,杜威的著作仍旧逐渐开始在各种教师训练机构中使用,在公众的报刊评论中,对他给予了一些注意,并把他看作“教师的教师”。

大多数学生同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威廉·H·克伯屈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伊德·H·博德^④那富有创造性的提倡,采用一种能激起普遍的实际反响的方式来传播杜威的教学、学习和思维理论。克伯屈的《设计教学

① 印第安纳州西北部一城市。——编者注

② 印第安纳州的州府。——编者注

③ 拉格(Harold Ordway Rugg,1886—1960),美国教育学家。1920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编者注

④ 注博德(Boyd Henry Bode,1873—1953),美国教育家。——编者注

法》(1918)^①就涉及杜威有关的问题的设计模式。但在那时,杜威学派的(探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克伯屈自己的发展、进一步的心理调查和变化的社会要求被给予了新的形式,那也是清楚的。

尽管许多人精通和忠于包括杜威哲学在内的经验主义者的哲学,但要把在1919年组织起来的进步教育协会看作是对杜威工作的一种具体的反应,那是困难的。但是,它的最初的声明表示出对“在教育的所有形式中的进步”的信奉,虽然它的社会关系的含意基本上是关于个人的“自然发展”。

在那个时期里,对美国教育家来说,他们自己充分地发现,在经验的哲学、科学的方法、学习的指导,民主的性质和学校的社会作用等方面,杜威所说的实际上是清楚的。

^① 设计教学法,实用主义教育的一种教学制度,为美国克伯屈所创。主张设计单元活动,其一般程序为:目的(动机),计划,实行,评价。——编译者注

杜威和今日的进步教育^①

[美] M·I·伯杰

约翰·杜威今天仍处于美国教育的一个矛盾的中心,这是一种讽刺。这个致力于调和显然对立的教育观点的人,却成为一个矛盾的新时代的原因。为什么杜威至今仍然是教育界的一个争论的突出人物,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著作里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使得许多人误解了他。第二,许多真诚地相信他们是遵循杜威教育思想的人,产生了同杜威自己的信念相反的或离开很远的新的概念。第三,许多攻击杜威的人从来没有费点心思去了解或理解他的意思。

什么是杜威的教育观点呢?最普通的错误是以为杜威是“进步教育之父”,因此,凡是这个运动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要由杜威负责。实际上,进步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杜威的思想无关的。了解到杜威曾经以大部分的力量从事批评进步教育家的基本假设,许多人将会大为惊讶。这位美国哲学家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他试图调和进步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两者之间的矛盾,以表明这两种哲学在教育体系中都是有生命力的和适当的。杜威有2本著作很清楚地表明他是试图调和这些分歧:《儿童与课程》(1902)和《经验与教育》(1938)。

在教育中哪样东西更重要呢?是儿童还是课程呢?进步主义者说,儿童同他的一切需要和兴趣应当比一切别的东西都要受到重视;人格和品格、自由和创造、自发性以及变化——是“进步教育”的基本要求。相反的,传统主义者则着重课程、过去的遗产、人类的积累经验、知识和见闻、指导和训练、旧的和已往的东西——这些都是从传统主义派生出来的东西。杜威在《儿童与

^① 译自:William W Brickman, and Stanley Lehrer.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New York: Atherton, 1961: 126—131.

课程》一书中说,这两个学派的思想,在它们的适当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

“抛弃把教材当作某些固定的和现成的东西、当作在儿童的经验之外的东西的见解;不再把儿童的经验当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把它当作某些变化的、在形成中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认识到,儿童和课程仅仅是构成一个单一个的过程的两极,正如两点构成一条直线一样。儿童的观点以及各种科目的素材和事实构成了教学。”(第 11 页)

因此,对于杜威来说,儿童和课程两者在教育过程中都是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选择这个或选择那个,而是设想一种方法,使得儿童以自己的一切经验去理解和吸收我们文化的财富。他继续说:

“根本的错误……是以为我们没有选择。要么放任儿童按照他自己的无指导的自发性去发展,要么从外面把命令强加给他。行动是反应;这是适应,是调整。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如单纯的自我活动——因为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生活环境里、在一个情景里,并参照它的周围情况而发生的。但是,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如从外面把真理强加上去,或者从里面顿悟到真理。一切依靠着心灵自身在对来自外部呈现出的事物的反映中所经历的活动。现在,构成科目的系统知识的财富的价值,使得教育者可以决定儿童的环境,从而间接地去指导他。它的主要价值、它的主要表现是为教师的,不是为儿童的。它的教师说:这些东西是儿童在真、美和行为各方面可能有的才能和成就。现在要注意,每天的情况是如此的,他们自己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朝着这样的高峰进行。让儿童的本性实现自己的使命,这是在这个世界自身现在所拥有的科学、艺术和工业中对你显示过的。”(第 30—31 页)

杜威试图从“非此即彼”这个教育问题的公式中摆脱出来。如上所述,传统教育和进步教育,在它的适当的范围内是可以有用的。同样无疑地,两种哲学,当它们不合理地去强调的时候都是错误的。传统教育当它注重课程而忽视学习者的时候,就造成一个错误。进步教育当它把全力倾注在儿童身上

而无视外在的权威的时候,当它无视教材的重要性的时候,也同样是错误的。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一书中说:

“……当否定了外在的权威之后,问题在于发现内在于经验的可以控制的因素。当否定了外在的权威之后,并不是说一切权威都应该被否定,而毋宁说是要求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权威的源泉。因为旧教育把成人的知识、方法和行为的规范强加于未成年人,这并不是说(除抱有‘非此即彼’的极端哲学的偏见外),成年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成年人的经验没有指导的价值。相反地,以个人的经验为基础的教育,意味着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较之传统学校要有更多样的、更亲密的接触,因而要受别人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指导……”(第8页)

尤其重要的是,杜威说,对于任何哲学因为它的名称而牵强附会,这是错误的。进步教育和传统教育两者无疑都不是完善的。唯一值得考虑的理由是要有助于教育的改进。

“我时常用……‘进步’教育和‘新’教育这些词语。可是,在结束之前我要声明,我深信教育的基本问题既不是‘新’对‘旧’的问题,也不是‘进步’对‘传统’的问题,而是有什么配得上称为‘教育’的问题。我希望并相信,我之所以支持任何目的或任何方法,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目的和方法可以加上‘进步’的字样而已。根本的问题是关于教育的性质问题。‘教育’一词不需要冠上形容词。我们所需要的教育是纯粹的和简单的教育,当我们为了使教育可以成为一种实在的而不是一个名词或一个口号,而从事于发现教育的意义和什么条件必须具备的时候,我们就会取得比较可靠的和比较迅速的进步……”(第115—116页)

看来,父母们和教育家们研究杜威和他的哲学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有些人在接触到杜威之前就停止了,还没有经过检验就认定这个人是“坏”的,不应当读他的东西,不理他就算了。第二种方式,另一些人则超越了杜威而从来不停下来检验一下他的思想,他们发现了那些他们自己相信是

真正“进步”教育的东西,尽管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同杜威毫无关联。第三种方式,还有不多的人曾经研究了杜威的著作,根据现在的情况来检验他的思想,判断它们的价值,重新建立一部分是接受和另一部分是改变了杜威思想的新的教学计划。

关于教育实际的合理改革的任何希望,似乎只能寄托于第三种方式。许多杜威主张的东西并没有被认识到。我们的学校多半还是旧瓶装新酒,仅仅是杜威思想中极少部分进入了学校,这也不全是学校的过错。杜威的教育纲领是很难认识的。这位哲学家的设想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只是装置活动的设备,或者让人们坐成一个圆圈。按照他的设计,一种纯粹的气氛——民主的气氛出现了。当我们想着我们学校的任务是尽可能以最好的方法授予儿童更多的、确实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学校的目标。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是试图以一种生活方式去教育人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教育人们去思考这种生活方式。仅仅是知识,永远不能使人自由。也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创造出一种理智英才,便宣称已经是民主的了。杜威的整个哲学的灵魂是:充分认识一切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允许每一个人的最完满的发展,并借助于一种民主的气氛来建立形成民主的美德的一种教育制度。

最后,杜威的学说是需要修改和改变的。如果杜威复活的话,他无疑将是批评他自己学说的第一个人。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即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周围情况和思想变化着的动态世界里的思想,会强迫他这样做。杜威没有阐明不同层次的学习的区别是什么。儿童应该像儿童那样学习,但是青年人有着不同的兴趣和问题。同样地,对于成年人就不能够像用儿童一样的方式去教他们。一种方法不能解决“教育”的各种问题。每一种层次的学习要求按照它自己的教学方法来进行。同样重要的是,每所学校必须了解它的特点,并为那所学校和在那个时间里,创造一种适当的教学计划。

杜威是现代教育思想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出了用新的方法来解决旧的问题。他是比任何其他的教育家更多地使民主和教育趋于有机的统一。杜威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应该去阅读他的著作,去理解和修改他的思想。

究竟对约翰·杜威发生了什么^①

[美] 乔·R·伯内特

20世纪前半期,杜威的名字在美国课堂里是脍炙人口的;而今,却似销声匿迹了。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动荡的20年间,杜威和他的追随着对于美国教育,就和共产主义者对于美国文化一样,被看做可怕的人物。——这种联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你不清楚这两种现象都是出于当时巨大的保守主义的潮流的话。

那种潮流现在已减弱了一些,而在最近二三十年内,由它所激起的教育改良和革新也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保守主义者在某些场合是以杜威的主题为对立面的,所以,今天美国教育在实践上所遇到的不利情况,是不能归咎于杜威和他的追随之者的。

这篇论文所讨论的范围,远超出“杜威的际遇”这个题目。我想用“论文”这一词语的字源学上的含义,采取探讨和假定的方式,把事实情况作一种个人的总结。因为我深信,在美国教育界,对杜威这一角色的解释者大多数不是带着偏见,就是把他曲解的。

杜威实用主义的进步论和浪漫主义的进步论

对于“杜威的际遇”这个问题的最普遍的回答是:杜威从来没有充分地或广泛地被人理解过。正因为如此,一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或两个问题:就是他的追随之者曲解了他的思想,或是他自己表达得不够使人理解。

关于杜威不容易理解的问题,我没有意见。不过,事实上有许多人认为

^① 译自:Joe R Burnett. Whatever Happened to John Dewey.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Columbia University, Summer 1979.

是容易理解的。

至于杜威思想被他追随者所曲解的问题,我想,关键在于一个人对于他的思想所能正确接受的程度。

假如一个人把杜威看做进步教育“父亲”、“祖父”或是“前辈政治家”,而一般的进步教育家则是他的理论的解释者和应用者,那么,这个人就大大曲解了杜威的思想。

可是,这是一种为人们所接受了学说,因为进步教育在近几十年内,已经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段时期联系起来。特别是和“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9—1955)联系起来。他们把这段时期杜威的高大形象和进步教育联系起来,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认为,把这种历史观点用在思想史上是一种偏差,而且如果找出了“为什么这是一种偏差”的道理,就可能暗示在美国教育思想的某一个组成部分上有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提出另一观点,实际上这个观点在几十年前,当一些在哲学上很有素养的人在写教育史的时候,就已熟知了。他们认为,在形成进步教育的一系列观念还没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广泛流行之前,杜威对教育思想还没有作出很多贡献。有些人指出,杜威的影响直到1919年之后才明显地感觉到,这是1916年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和进步教育协会成立的结果。但是,请看看下面有关教育上的进步主义的说法:

进步教育这一名词,由于进步教育协会的成立,才取得现在确定的含义……然而,这个运动本身却是早得多,同时是更广阔、更深奥的。

从历史上来说明,似乎是比较公正的。这个运动创始于卢梭(1712—1778)和他的《爱弥儿》(1762)一书的问世。但沿着本文所讨论的道路,对学校进行一个有意义的改革,却开始于裴斯泰洛齐(1745—1827),他是深受卢梭和当时一般人道主义者影响的。他的影响遍及全球,通过许多渠道传到美国,例如,算术和地理的改革、学级制学校的建立(来自普鲁士,特别是通过贺拉斯·曼的著作)、谢尔登(Sheldon)的直观教学。影响比较迟的是赫尔巴特(1776—1842)和福禄培尔(1782—1852),他俩是和裴斯泰洛齐一起研究的。

不少进步主义者替自己的教育信念寻找哲学上的支持,不过从浪漫派的自然主义方面找来的多,而从实用主义方面找来的少。对他们来说,进步教育的主要原则是源于卢梭及其拥护者,并非杜威及其追随者。对于实用主义者杜威来说,兴趣和自由这两个主要原则基于认识论;体现这些原则的活动课程根本上是一种检验真理的方法。另一方面,卢梭的浪漫主义追随者,把进步教育的原则主要地建立在人性论的领域之内,因为儿童的自我活动是自发的,兴趣和自由只是自我表现的主要手段而已。

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对于本性非常重视,他们以卢梭著名的假定为根据,认为儿童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堕落的,这是当时卢梭的同时代人的习惯说法。他们认为,人类的本性依照一定的规律而发展,是绝对不变的,好像天体循轨道而运行一样,那么,教育者的责任就是找出这些规律;一旦找到了这些规律,进一步的责任就是引导规律的运用,而不是去阻碍它们。整个儿童研究运动由此而产生,而儿童本性就变成了准则。

由此看来,进步教育很早就是哲学上两棵不同的树,并不是一棵树有两个根——后者是政治上的看法。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①分别称它们为实用主义的树和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树。据多数的记载,后者早在1840年,就由贺拉斯·曼和亨利·巴纳德开始引入美国教育界。当杜威进入教育理论界作为他第一次有名的游历时——刚在他的芝加哥年代(1894—1904)之前——浪漫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看出,杜威之所以加入浪漫主义阵营,是为了政治和教育的目的(例如,推翻传统教育的腐败方面)。如果这点正确的话,我们就可意料到他对同盟者的批判,调子低于对共同敌人(传统教育)的批判。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批判“新”教育的浪漫主义方面,后来才批判“进步主义”的教育(“进步教育”这一名称,是在新教育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不过,无论迟早,他把传统教育看成是比浪漫主义更大的敌人。

然而,要注意的是,杜威只是参加进一股早已确定了的教育思想潮流,而并不是开创这一潮流。他之所以被浪漫主义者所接受,是因为浪漫主义者被形势所迫,想从他的思想里挑选一些去证实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如果把

^① 布鲁巴克(1898—1988),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编译者注

他们看成杜威哲学上的追随者,那就错了。如上所述,杜威似乎也允许这样。

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真正追随者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无疑,至少在我看来,如克伯屈(Kilpatrick)、蔡尔兹(Childs)、劳普(Ranp)、康茨(Counts)、拉格(Harold Rugg)、布拉梅尔德(Brameld)、贝恩(Kenneth Benne)、史密斯(B. Othanel Smith)、史坦利(William O. Stanley)和贝尔斯(Ernest Bayles)等,这些博学的追随者都是把实用主义的准则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基础的。各人在做法上都有独到之处。其中,有些人也偶然有一点曲解,但不完全是在浪漫主义方面。

杜威和上述追随者在实用主义的进步主义方面,可能组成一个庞大的集团,但实际上有些追随者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得到很多人的公认。有些人甚至更迟些。早在20世纪开始之前,在传统教育以外的教育思想中,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在许多初等学校的教师中深入人心。在1880到1915年间,这些人中间有很多人要为美国中等教育大发展提供服务人员和指导思想,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在他们中间更加繁荣发展。

我想,关于进步教育的观点——从哲学上看可分为两条线;但从工作上看,常常是一个政治性的反对传统教育的一条线——能够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在我看来,它的确说明一些学者怎样对某些事情改变了说法。例如,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对进步主义的教育家就这样写道:“我们设想自己是依照杜威的指示行动的,但他们往往把杜威的折中的、不明确的和杂乱的名言,应用在他们最感兴趣的许多问题上。”我们猜想,这一说法与其说是讲1900年以后的杜威——上述的那些实用主义追随者并不找那些不明确的、折中的或没系统的杂乱的名言——不如说是讲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者,他们从杜威的思想里找些志趣相投的东西,而不是找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

上面我提到“美国教育思想的某一个组成部分的非常危险的东西”。对这种危险的发掘,上述观点却不无贡献。在一开始,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原以好多派哲学理论作为基础。但是,一则这些哲学理论相互之间并不协调,二则这些不协调的哲学理论由于不能适应于美国的工业和世俗社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部分退出了舞台。显然,所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外行的只是沉溺于浪漫主义的人,他们几乎攫取任何概念,只要能提高儿童本性的、先天的感情的特点就好。甚至连和他们有系统联系的但又严格地限制他们的

观念也可以不同。这样,你可以发现,这些进步主义者毫无疑问地运用许多法则,这些法则是从多方面的智慧源泉里汲取的,例如,某些精神分析派思想家,某些认知心理学家,某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甚至于某些存在主义者。

杜威思想(或者其他有系统的教育家思想)在这混杂堆里被无选择地搞乱了。但如果比较一下另外一种危险性,这种混乱也是不足道的。因为如果这种思想不能提示或导致始终如一的研究,而助长追随时尚或不尊重理智的习气,那可能有一天只是灵敏地借浪漫主义去接受新的概念,将把自己染上独裁主义者的色彩。

杜威和美国教育实践

杜威的哲学究竟能直接地并一贯地影响美国教育实践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无法准确知道,但可以猜想到是很少的。因为浪漫主义似乎已经是(而且还是)差不多浸透了所有哲学上的进步主义的变种。再引用格雷厄姆的话,他声称“进步教育家是美国学校在1920到1950年间所发生的教育上巨大变化的主要负责人”。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杜威的直接影响是否会和他的哲学一样被强烈地感觉到。

还有一个怀疑的理由,就是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的教育学说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教师没有经过他的教育学说的培训。学校里没有它的资源,家长和政客们也不会支持它。例如,杜威指望教师要像专家一样熟悉他们的教材,虽然教师不需要成为一个生产专门知识的研究家。教师必须从儿童的社会环境、家庭职业和生活背景去认识每个儿童。只有当他们掌握这些情况时,才能负起做老师的特殊职责。把教材心理学化,使学生能依据各人问题解决的水平 and 类型真正地掌握它。可是在20世纪初期的师范学校里,所教的并不是这一套;而且那时的学校里和教室里都是挤得紧紧的,也很难实施这种教育。

那么,人们似乎要问,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里所办的实验学校和想象中的广大模仿者是怎样的呢?

约翰·杜威和伊夫琳·杜威合著的《明日之学校》里所赞美的学校又是怎样的呢?关于第一问题,杜威的辩护是:因为是实验学校,是一种试验,不必

加以推广,也很少学校有充分条件去有效地模仿它。

至于《明日之学校》里提及的学校,在不同意义上和程度上,杜威都用“试验性的”这一术语。但其中,没有一所学校是有彻底的实验主义意义的。有些学校实际上仅够格为学生充分准备参加社会活动和多种职业,每一所学校都在某一方面带有实验主义的色彩,但没有一所学校是完全实验的,或是实验占优势的——在班级活动和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确实都不是这样。

然而,我现在要超出这一点说几句。不管杜威的教育学说是多么好,若不是教育家们具有丰富的才能训练和教育设施,它根本不能广泛推行。杜威是知道这一点的。例如,他 1938 年(79 岁)就表明下面的意见:

新教育的一般原则本身,不解决任何有关进步学校的实施管理诸问题,宁可说它是提出新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一种新的经验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问题还没有认识到,那里谈得到问题的解决。

这样看来,杜威自己也不表示他所期望的效果已经达到,或者是很容易达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论学校教育

1919 年以后,杜威遭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值得特别阐释一下,它和上面的某些观点相结合。

杜威和他的阐释者把对教育的差不多无限的信仰,作为在一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信仰必须予以密切注意。因为在现在的美国教育上,而且特别是学校里,这种信仰差不多已经不见了。可是,在以前美国教育和正规学校教育里是被看好的。这是他对一般教育的信仰的最好理由之一。

现在,大多数教育家已经忘记了杜威的遭遇,如果他们曾经看到过的话。甚至今天,有的人只抓住杜威的乐观论调,因而掩盖了他的悲观危急的处境。为了证实这一论点,他的一些论述值得引录。下面除了第一段引文,全是引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当时进步教育在学校里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也就是说,

他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传统教育的。

我们的学校送出的人去应付当代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这种生活是穿戴着古旧的盔甲的；他们以笨拙的活动夸奖自己，作为精心的、经过考验的信证。

另一种方法是明显的：学校养成了一种囫囵吞枣的心理习惯，热衷于被人愚弄；对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的批评，固执地抱着似乎非常慎重的回避态度……学校甚至于比传教士更顽固地无视社会的弊病——这可不行了。也和传教士一样，用对个人罪恶的动情的话来弥补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困难的讨论。

或者

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诉之于暴力的使用，其实际结果是它们自己遭到损害，以致本来的目的以后用经验的智慧方法来达到。

说到这里，我不愿被误解，认为激进分子有任何垄断特权使用暴力。情况恰恰相反，反动派是掌握暴力的，不仅是在军队和警察方面，而且是在出版界和学校里。他们提倡不用暴力，真正的理由是他们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暴力；所以，他们的政策是想用理想化的词语来掩盖暴力的存在——他们现在所用的个人主动性和自由等词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或者

在学校里获得一点点的知识或见闻，但并不互相连贯；我怕与政府是如何行使政权的、政党是如何形成和如何活动的、机构是怎样的、什么东西赋予机构和政治领袖以权力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联系。事实上，有些城市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危险的，例如，学校里的学生，不仅对于政府的机构得到形式上或结构上的认识，而且通过特殊偏爱以及和实业界有势的

人交往,了解到他们自己社会是如何治理的。

或者再

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里的人数,在一代时间里已增加6倍多,这样的激增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些成员没有为旧制度所服务的阶级背景、传统和需要。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一些新的学科和课程带进来了,但它们是零零碎碎的,没有一致的目的;同时,旧的学科保留着,没有一点修改,和新的学科并列。这样,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天生爱好的学生,对于他们的才能或是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才能提出任何明确的概念。这种学校,与其说是一种体制,不如说是放任自流。

又再

不幸的是,我们跟近来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人种偏见熟悉了。我们是否能完全摆脱种族偏见,而以完全的民主自豪呢?我想,只要看看对于黑人的待遇、反犹太人主义、逐渐增长的(至少我怕它在增长)严格反对外国移民入境等情况,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涉及教育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不仅要培养能消极地容忍不同种族和不同肤色的人民,而且要积极地、敢作敢为地、有建设性地去培养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爱好愿望。我们的学校在这些方面做了些什么呢?我知道,我们的公立学校在消除阶级划分和创造一种认为同是大家庭里的一个成员的博爱感情方面,有很好的声誉而且应该获得很好的声誉。但我不相信,在消除各种族间的猜忌、偏见和势利上,我们已做到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一切,而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也已尽了它的责任。

最后

有一点不能否认,学校多半是教些识字工具,把现成的知识传给学生。然而,用以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却不把探究真理和考察意见的技

能加以发展。相反地，他们憎恨这样做。他们摧残了天生的好奇心，用许多无关的材料加重学生的观察和实验能力的负担，以致不能像很多不识字的人有效地运用这些能力。就民主国家的普通学校问题而言，在给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时，只做到了第一步。就民主政治来说，如果学校不能根据科学态度进行培养，解决应该教什么和如何教，那么，所谓学校教育工作只不过是危险的、偶然的事业而已。

杜威对于教师是否有改进美国学校教育的能力和动力，已逐渐失去了信心。对于这个事实，一般也被忽略过去。他不怎么批评教师。但是，与他后来的论述比较，人们应该看到，他在《我的教育信条》里的阐述，以及带有鼓动色彩的“战斗号令”和“为什么我是一个教师工会会员”等对于教师的乐观的陈述。

杜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的严厉批判，是他日益剧烈地攻击美国阶级社会及政治、商业和工业上自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统治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大部分教师是太驯服的，所以在这方面不敢跟随他，尤其是在康茨的《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吗？》这篇文章所激起的整个大风暴中。教师们在哪里教育委员会和商业管理者的严格控制之下，很少有教育领导者在任何时候所表示的明显的政治热情——自1920年到现在更没有这种热情。

杜威的整个社会哲学已经明显转变，不可能再赞同社团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大部分教师却津津乐道地教诲学生。早年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杜威，很像一个主张在中央集权下实施统治的人，但过了1900年，就完全不同了。实际上，社会经济的阶级分析是杜威惯用的方法之一，尽管他还用其他方法加以补充。

也许很少的杜威追随者能看出他的转变。如果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很少人愿意跟随他。许多人仍以为他还是主张像19世纪末的公社制邻里关系和家庭扩大化的雏形社会那样的学校，但是，杜威早已看出那种社会的局限性。他已注意到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一定效力，正在冲破这种局限。1919年，他就这样说：

只是许多人生活在互相接触的环境里,不能就成为一个社会。每个人多少都受到或近或远距离的人的影响。一本书或一封信可能使得相隔几千里的人的关系比邻里的关系更密切。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杜威或明或暗地促进美国社会的社团性质。这种论点的关键,在于词义的含糊。杜威赞同更集中的机构来表现公共福利,借以减少和摆脱同工商业社团形态的国家相一致的自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他认为,这种共同负责的社团组织可以把人们从官僚主义下解放出来,不再为它所奴役。他说:“一个国家优劣的标准,在于它把个人从消极的斗争和无目的冲突中解放出来的程度如何,以及对每个人在工作中的积极支持和保证程度如何。”这样看来,国家是一种提供人们工作机会的措施,它一点也不能干涉作为社会集团基础的那种亲密结合:

大同社会把它设想为自由和充分地相互交往的社会,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它绝对不能具备各地方社团特有的性质。它将做最后的工作:协调各地方社团间的相互关系,并充实各地方社团的经验。如果地方社团的生活被外部不受控制的机构侵犯或局部被破坏,就成为不团结和不安定的直接来源。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这样。

上面曾经说过,家长和政客们不愿支持杜威的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上,其理由就在这里:他直接攻击国家统治权,尤其是在沙文主义猖狂的时期。

杜威和今天的教育

我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杜威的教育哲学在过去很少被人应用,也很少被人理解。它同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仍旧混淆不清,早期理论上的概念堆积是教育上放任自流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哈钦杰(Fred M. Hachinger)近来要求政治统一、保卫美国的公共教育。

克雷明(Lawrence Cremin)^①提出,如果另一个教育改革时代出现在美国,进步主义可能复活,那时杜威的哲学及其教育哲学正好可以作为候选者。但是,要想产生效力,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划分;同时,杜威自己的理论也要比今天更有系统地为人们所理解,并且要阐释得更明确。

对于教育改革,并没有明显的迹象出现。但关于杜威思想的论述,却不断涌现。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和波洛斯(Kathleen Poulos)在《有关论述杜威的文章一览》中写道:在所包括的86年中,关于杜威及其著作的研究文章有2200篇以上,平均每年约25篇;但自1973年1月到1977年1月这段时期,共出现了300篇,每年平均超过60篇。不过光是数量的增加,不能就说是杜威的重视;实际上,研究文章的质量和广泛性也继续在提高。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杜威著作被译成外国语的范围在扩大。几十年以前,大部分是翻译他的教育著作——主要是1920年以前出版的著作;最近,他在哲学和政治哲学上的成熟著作也被翻译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记得博伊斯顿和波洛斯说过,近来对杜威学术成果的研究,最有意义的现象是不但质量在提高,而且数量也在增加。这大概是准确的,研究者为了想表现自己的学术成就,所以到他著作尚未很流行的时期里去寻找研究项目。但另一方面也是确实的,就是处理他那浩繁的著作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变得无需劳驾海格力斯大力神(Hercules)了。这要归功于在卡邦代尔的南伊利诺斯大学。自1960年开始,那里设立了杜威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对国际上研究杜威的学生和学者提供资料和进行协调的中心。这个中心的活动和成就,需要专门文章进行叙述,现在只要说明以下这些就够了。它实际上收藏了已经出版的杜威全部著作,藏有杜威大部分的信件和大事记汇集;现已出版杜威早年著作的权威性版本11卷,经过现代语言学会的审定(在美国哲学家的著作中,这是唯一接受这种严格审定的版本);有些附加卷在整理中,预计将成为一套丛书,依照著作的年代先后排列,约有40卷^②;并且已经出版一本“指南”,在杜威所注意的重要课题范围内的重点文章和书目摘要;出版一卷一览表,列出任何地方已经出版和未出版的关于杜威

① 克雷明(1925—1990),美国当代教育史学家。——编者注

② 《约翰·杜威全集》已出版,共37卷。——编者注

的著作。对杜威研究的补助和评奖,做得并不多,但意义很大。此外,对全世界的学者进行大量通讯工作,给以研究上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是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并表明是对杜威的重视,那就是出版商现在印刷杜威的著作,比起二三十年以前要增加许多。一些杜威著作的选集近年来也出现了,还出版了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对杜威哲学的分析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戴克威曾(George Dykuizen)写的《杜威的生平与精神》一书,它是一本被人喝彩的杜威传记,现在已有普及本,流行很广。

杜威的著作十分浩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界很多人研究分析哲学、欧洲哲学和科学哲学,但美国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现在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学院派哲学家们常常把实用主义者看成是一个大裁缝铺,各人负责一件衣服的一部分。他们指的主要是皮尔斯、詹姆士、米德和杜威。诚然,哲学知识的无缝衣服,从杜威那边是不容易得到的。如果把他和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或者和其他实用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混淆起来,一件教育哲学的无缝衣服倒是容易得到的。近来,布罗德斯基(Garry Brodsky)写了一篇关于学院派哲学家和杜威的文章,有一点使人们感兴趣。他用“为什么”这一问题问自己:“假如杜威是如谢弗勒^①所说的一个‘实用主义的巨人’,那么,为什么大家没有给他更大的关心呢?为什么他不能在美国哲学上发生较大的影响呢?”

在关于杜威的研究中,已经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那就是把他和教育史上的“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有关杜威的范围内,争论集中在下面的问题上:按修正主义者说,在1916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杜威的思想和行动是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保守主义的或褊狭的社会政治政策的;而另一些人的说法,与之相反。我想,这种争论将出现什么局面,或者争论是否将继续下去,现在还言之过早。然而,这种争论实际上是会产生有益的效果的,因为可以使得教育哲学家们和其他人对于杜威的社会政治著作和活动比以前更加重视。

^① 谢弗勒(Israel Scheffler),美国分析教育哲学家。——编者注

结 论

杜威的教育学说在学术上什么是错误的和什么是需要的,这里我把自己的看法作一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对于杜威教育哲学的各种论述,从一个哲学家的观点看,似乎都带着门外汉的历史谬见。我的意思是:所论述到的许多概念,都是出现在杜威早年的教育学说卷帙里的。等到教育学说的卷帙减少之后,即1916年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之后,至于带有技术专门性的《趋向一种教育科学》(1929)和有点累赘的《经验与教育》(1938)是例外——似乎杜威就再没说什么了。

但是,在我看来,比较正确的道路是:先把杜威已成熟的哲学用哲学上的或概念上的观点系统地组织起来,然后加进以前那些与之和谐一致的东西。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好说。现在,让我最后谈三种情况。

第一,外行的历史方法,从把杜威看成黑格尔派的有机体论者的一部分开始,几乎不变地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他的后来地位。用这种方法开始的人将从各种道路去探寻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不知是怎样在杜威哲学里失落了。如果从杜威成熟的著作里看,没有明显的黑格尔有机体论;所找到的是早年盛开过的花,但后来凋谢了。

第二,把实验主义当作一种教育哲学。早年,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追随者很狭隘地和排外地强调科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或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才重视美学经验,认为它对科学研究本身是基本的东西。成熟的杜威有一套美学理论和一种综合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他这样称呼他自己的哲学,表明反对更狭隘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从概念上来裁决他的科学探究的理论。因此,对于教学法上的“完整思维的活动”或“问题解决的方法”等,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采用他的这种探究概念去处理。

第三,杜威的皈依宗教的理论,在说明他的教育概念时大部分滞留在里面。事实是因为他在皈依宗教问题上的重要著作《一个共同的信仰》(A Common Faith, 1934)是如此简短,而且在各种宗教(和宗教截然相反)的问题上如此尖刻,使得我们不易认识到他在其他成熟的哲学著作里带着皈依宗教的形

象。无论如何,杜威这方面的思想在今天对我们是最有启发性的,因为现在的宗教教育正在膨胀到很大的程度以代替公共教育。无疑地,一部分是为了反民主的理由,但另一部分理由是因为公共教育从来没有找到一种合理而又充分的办法去处理作为普通经验的现象的宗教经验。这种对皈依宗教的重视,和美学对经验的重视一样,必须把它加到对杜威早期形成的教育哲学概念的理解中去,假如这种哲学是如他自己所预期那样全面而有活力的话。

杜威的教育思想和社会思想回顾^①

[美] 弗雷德里克·李尔奇

约翰·杜威去世才7年,但对这个人和他的工作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了。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当前关于美国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通俗论战中所造成的。在这个论战中,他已经成为25年前残存的进步主义者同保守主义者以及现代教育上的要素主义者之间的战斗的一个象征。在这论战过程里,杜威的思想受到某种讽刺。而他的观点和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往往被忽视或遗忘。因此,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再一次集中回忆一下杜威这位教育家以及他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在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某些含糊所引起,有的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于杜威写作时代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来阅读他的著作而引起的。这样来使用我们批判的权力,就不必感到有什么罪过。杜威自己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哲学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诊断。”如果根据我们对一个已经改变的历史环境的理解,我们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不同于杜威的看法,提出对问题的解答也不再是他的解答,他自己可能最不会恼怒。他经常说,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问题,在面临着我们时代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正在依据他的精神进行工作。

19世纪末,当杜威第一次出现在教育舞台上的时候,美国的学校还没有它自己的哲学。在美国教育史上虽已创办了许多本国的学校,如富兰克林的

^① 选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7):7-10.

学校^①、贺拉斯·曼^②办的非教派学校、由公家划拨土地的农工学院和文科学院等。但美国的教育思想仍从属于欧洲。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德国的学说占统治地位,而当时在教育上最负盛誉的赫尔巴特^③,正像哲学上的黑格尔的学说一样,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影响。当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研究生时,他自己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以后逐渐转变,到19世纪90年代时,他摒弃了唯心主义而发展他自己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方式。在他学术成熟的过程中,杜威开始对教育问题发生兴趣。1896年,他和他的妻子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就在第二年,他出版了《我的教育信条》一书。189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著:《学校和社会》,该书曾译成13种文字。这本小册子的中心思想是,主张把学习,包括方法和内容,同现代工业上的职业和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劳工合作形式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学习充满活力。杜威说,教育孩子参加建设性的工作,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看到他们活动中的社会和科学的价值。这本书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传播了学校是一个工业和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新思想。杜威以此能使教育工作者看到他们的新的任务,并使他们理解到他们工作的重要社会意义。

杜威撰写了不少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著。1916年,他发表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这本书最全面地叙述了他的哲学,并使教育成为他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书比其他任何一本著作更能使杜威在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学院里成为一个权威,有时还被看作是一个正确的权威。20世纪20和30年代,杜威对美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最大,不过即便在当时也不是绝对的。理论上的敌手是有的,但那些攻击杜威的学者在当时还不能起大的影响。尽管他的文章风格不流畅和缺乏一般人所讲的个人吸引力,杜威却得到了比他任何一个对手更大的响应。据我看来,他成功的理由是他能够把教育上的许多问题和对当代文化进行诊断的工作打成一片。

杜威认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处于严重分解的状态,表现在

① 指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于1751年创设的费城学校。——编者注

② 贺拉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美国教育活动家。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第一任干事(1837—1849)。在美国教育史上被称为“公共教育之父”。——编者注

③ 注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编者注

分歧和分裂；这种分歧和分裂产生了不必要的冲突，终于有碍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他自认他自己曾经受到这种情况的损害。在杜威的几本自传式的陈述中，有一本提到新英格兰的传统思想，反对把责任和娱乐结合起来，并把灵魂和肉体分裂，人和自然分裂，以及自然和上帝分裂。类似的二元论已在教育里出现，并造成同样有害的影响。学校脱离了社会，职业训练被看作是不文雅的，各学科间的课程彼此缺乏联系，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分裂了，结果使学习变成一种枯燥和机械的事情，不能导致思考能力的成长。杜威拒绝承认上述的任何分界线，或许是他对教育与文化诊断中最急进的部分。他指出二元论思想对社会的损害和个人的浪费，而主张一切个人的特殊要求与兴趣都要服从于社会利益和批判理智的判断。

如果我们不把过去一度对教育事业发生关系的某些旧传统和旧思想作对比，就不能理解杜威教育思想的新颖。我特别记得古典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伦理思想。当然，这些古典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伦理思想今天还有信徒。但是，在杜威看来，这些思想是过去的包袱和偏见，结果是把现代社会生活分裂而不是统一起来。这些思想阻止人们正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并阻碍杜威所讲的“人类经验的改造”。基督教的伦理不能再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势力是有理由的。这些信赖圣经和教义的教会有理由害怕科学和批判理智的进步。我们应记得，有名的斯柯普斯讼案(Scopes Trial)^①直到1925年才发生，因为美国的原教旨主义不能接受进化论。而且，基督教的伦理把道德问题仅局限于个人的得救和灵魂的完善。但对杜威说来，这些字眼的“内在的”(inner)和“精神上的”(spiritual)，只意味着和其他事物缺乏关联和交流。古典人文主义也为类似的无聊的东西所苦。它太文学气了，所以不欢迎科学；太文雅而高贵了，所以不能为美国的粗野平等主义接受。古典人文主义也致力于个人的完善，而把由于大量移民、工业制度和社会整体的需要而提出的美国教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置诸不谈。

杜威逐渐相信需要有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建议把学校看作是社会改造者，而教学工作应负责协助指导这项改造。杜威从不提倡教育是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受到人们指责。相反，他希

^① 约翰·斯柯普斯是美国田纳西州代顿的中学生物学教师，以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触犯田纳西州法律而受到控诉。——编译者注

望使学校成为典范的社会,帮助消除大社会的无价值的东西。但杜威没有很清楚地指出有价值与无价值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会在许多新近的教育著作中充满了那些不着边际的字眼,如“好得多”(ever better)、“富得多”(ever richer)和“美得多”(ever finer)的一部分理由。但是,如果这些教育学者能深入了解杜威关于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他们就会发现他的道德标准是:显然他是主张合作和分享,反对竞争和贪婪的行为。

如果学校是社会改良者而不单是致力于学习的一种组织的话,那么,它必须终止它和社会实际生活的脱离,要善于感受科学与技术上不断增长的需要,并把这些需要转变为不断扩大的各行各业所必要的条件。然而,杜威并不希望把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的运用扩大到所有人类的事务上去。这种“理智方法”的教育会有两个主要优点:它可以增进个人的思考能力,清楚理解他们的目的,并指导他们的选择方法;另外,它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群众可以根据社会的公益来对各种专业权威和学术兴趣作出判决。杜威把教育同科学的方法相联系而不同任何偏见、宗教或形而上学相结合,是希望美国的学校能在社会中取得一致的看法,否则社会就会因信念不同和利益冲突产生分裂。因此,他希望把学校变成为社会建造者。

我这样仔细地推究杜威思想的社会观点,一定会使那些认为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领导者的人迷惑起来。事实上,进步教育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的时期,杜威并没有和它发生直接关系。而且,与其说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倒不如说他是这个运动的批评者。“儿童中心学校”这个术语在杜威的词汇中是没有的,其他像什么“创造的自我表现的教育计划”和“学生的积极性”等提法,一再使他表示惊愕。杜威认为,进步教育只满足于反抗,甚至剧烈地反抗旧教育的顽固性,而不致力于教育上的核心问题。对一个对每样事情都具有自制力和在行动上有所目的性的思想家来说,仅仅反抗虽是可理解的,仍应该承认是智力的失败。

杜威并不忽视个人才能的发展,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同进步主义者是有区别的,这反映在下列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杜威常常注意到社会的联系和社会的需要,这在前面我已略述过了。第二,他从不把个性看作是孩子固有的东西,而正像我讲过的,杜威早期的思想是把个性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组织的唯一目的。关于社会秩序和个人发展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矛盾,杜威并没有

给以解决。但是,我认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比个人发展的方向更来得重要。

最后,这使我作出几个其他重要的解释。第一,作为一个应时而生的哲学家,杜威拣出几个希望大家重视的问题和情况,这些问题与情况在30年甚至50年以前可能极为重要而现在则不然。杜威曾致力于把一个具有相抵触的信仰和传统的五光十色的社团组成的集体建成一个统一社会。他试图变更教育以适应工业时代的现实,并给一个多元社会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不管人们的基本信念如何,都能运用。杜威的这些努力,大部分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在我们面前又开辟了新的教育阵地。美国的广大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的要求,这在过去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和创造了空闲的条件,从而促进了他们对提高文化生活的要求。今天,有50%的中学毕业生要求获得高等教育。

但是,这个变化不应该只从数量上来衡量。它也使文化质量有所提高,并使人对一切过去只是美化高贵妇女和绅士文化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据我看来,这个情况可能比杜威和一切改良主义者对文化遗产、艺术、古典文学和宗教作出更自由的适应。在杜威这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看来,其中有许多过去曾经认为是优秀的事物,都被以前的阶级集团所损害或受到有权势组织的贬值。例如,欧洲族古老的人文主义提倡的,并被认为是贵族特享的“个人的完善”,现在已为广大的美国青年肯定为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青年在高等教育中接触到功利主义价值的同时,试图发现、了解和领会他们自己。在这种探求中,他们将比杜威更重视人文学科。由于杜威的哲学是一种坚强的哲学,他始终关心着有待于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就他允许人文指导的教与学取得的。他说,精神生活不是自发的。它需要积累和分别吸取别人的经验,并通过连续学习而获得进步。所以,杜威从来没有讲过要放弃有组织的题材,或者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在于对学生和题材具备知识。

搞清楚了杜威对进步教育的态度以后,我现在感到有必要谈谈他的教育思想中的某些模糊的观点。这就是关于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这两个因素在他的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例如,他在1916年发表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说,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关怀个性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和工业组织应该以它们对这种发

展的贡献来加以衡量。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和评价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培养它的个别成员成为完人。但在20年代末,可能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和面临国内破坏性的经验个人主义和危机的缘故,他却转为倾向社会主义。1928年访问苏联时,杜威为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中掀起的炽烈的共同信念和“一种普遍而感人的宗教现实”所感动。杜威觉得1917年的革命解放了巨大的精神活力,这种活力同样也表现在苏联的学校里。“过去我只在理论上这样相信,总是认为一般学校的沉闷和毫无生气的现象是由于学校脱离生活,看到了苏联相反的情况后,使我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似乎使杜威思想中隐藏着的宗教和社会的因素变得表面化。他时常渴望有这样一种社会,能把冷酷和粗野溶化在集体精神中;在这个渴望中,民主政治将变为准宗教集体的形式。过时信念所不能再满足的那些想望,在这里将成为集体生活的前景。这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当他们拒绝接受犬儒主义或绝对是社会和宗教的分裂所形成的唯一结论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无论它的价值怎样,这种关于社会的神秘思想跟杜威早期的简单自由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就学科在课程中占有地位而论,也要看它能否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而定。如果不能这样,而仅仅满足静观的、精神的或思辨的要求的话,那么,人文主义将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可疑。

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教育和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社会动荡和转变的关头,教育工作者容易同社会运动和社会纲领结合起来,因为这些运动和纲领有希望给教育工作以新的刺激并把它的意义扩大到教室以外去。这个希望是可以真正地实现的。无疑,杜威自己吸引了广大的追随者,这由于他给学校规定了一项重大的社会任务。但是,这样做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公立学校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盟,可以达到使教育受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党派精神侵蚀的程度。杜威自己是警惕到这个危险的,但他的有些著名门徒却没有。

这使我提出了最后一个争论点,我认为这个争论点是头等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并不真正需要同某些社会运动和纲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的成员,他的工作不在于组织或劝诱青年参加某些社会活动。

即使在大班上课时,他也应该专心致志于个人智力的培养,教导和启发人们的思想。教学应以个人为直接的和主要的对象,社会只是间接的;当教师和学生相互接触的时候,教育工作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而不需要外来的干预。另外,学和教的工作必须经常地进行下去,不管能否找到鼓舞人心的社会信念和理想。换言之,教育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受教育的过程中,理智的好奇心、判断思维和知识的增长等价值能真正地经验到,就是说,在于教师和学生都对这些价值感到喜欢。

杜威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意见,我不能完全确定。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或许会断定判断思维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改造那些衰老无用的社会组织。但是,杜威还有另外的一面。这可以从他的“教育即生长”这个定义中表示出来。他说,生长以外无目的;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这是自然主义者杜威说的话,他以学习和研究为乐,因为他认为学习和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酬报,不需要用结果来辩明。作为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者的杜威的思想可能比作为社会实用主义者的杜威的思想来得经久些。

一个创始的心的影响^①

[美] 托马斯·培里

杜威的 70 年哲学活动,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0 年的门徒身份;10 年的摆脱影响和崭露头角;其后 50 年杜威成了杜威——在这 50 年中,他自己创立的若干原始的观念,产生了丰盛的果实。

20 世纪的开始标志着美国哲学的转折点。当时是如此感到,现在回顾起来还是如此。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已从德国输入的康德的“唯心论”在学术界中逐渐取得优势。一方面间接地通过像柯律芝那样的文学媒介物及经过属于格林凯尔德兄弟^②学派的英国哲学家的介绍;一方面直接通过对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们的研究。这一运动的美国代表人物——哈佛的罗伊斯、亚姆赫斯特的加门、密执安的莫里斯和温莱、加利福尼亚的豪依林、波士顿大学的邦尼、康乃尔的格莱顿——都是当时的大师。他们为僧侣及青年的保护人提供一种世俗的哲学,那种哲学维护道德和宗教的传统——不知不觉地代替了苏格兰的“常识”哲学和宗教界中的正统的有神论。

这种哲学的基本论题,是它坚持“理性”或“精神”的自主或自足性,这种自主或自足性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揭露那种经验借以“组织”并获得“客观性”的范围和理想的能力。这种观点,不但和英国学派的感觉主义的经验论相对立,而且也 and 康德本人相对立,因为康德是使理性和它必须与之一致的感觉材料分离开来的。理性摆脱了对感觉经验的依赖,能一跃而对宇宙作出结论,这些结论是无论怎样广泛的单纯观察都永远达不到的。哲学家,作为理性的代言人,能够预先认识自然和历史必须服从的必然性。他可以用宇宙权威的口气,说出他的心思;而且,由于他所宣告的直觉或可证明的真理支配着

① 选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现代美国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62—370.

② 指 John Caird 和 Edward Caird 兄弟。——译者注

外在世界的偶然事件和因果关系，他可以要求使道德和宗教信念的基础稳固起来，使之足以抵御唯物论的攻击。

在1900年前后，当这一哲学在美国极盛的时候，有两位哲学家大胆地向它挑战，他们都在过去10年中积蓄了攻击力量。尽管约翰·杜威生于威廉·詹姆士之后17年，并认为詹姆士是他的“精神上的先辈”，但詹姆士是杜威的同辈长者，而不是他的先辈。

詹姆士的教育是断断续续的和不规则的，他的工作时常为疾病所中断，而且他经过了许多年还未确定他的职业。他曾试作画家，研究医学，教授生理学，并由此过渡到教授心理学。在1890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心理学原理》之后，他继续研究了几年。然后，他临时用讲演和论文的方式发表了他的哲学主张。要对这个年表作正确的理解，必须认识詹姆士思想发展的内在的连续性。他的气质经常是哲学的，而且他的哲学已预伏在他的心理学中，正如他的心理学已预伏在他的生理学中一样。可是，事实上，詹姆士的主要哲学著作，都写于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也就是他的生命的最后10年。

杜威的哲学的生长时期比詹姆士短些，而且，略去其间的间隔不谈，它是曲折较多，连续性较少的。詹姆士的最初著作刊行于19世纪70年代，清楚地发表了她的哲学主张，而杜威却经历了转变和再生。詹姆士继承了法国的唯意志论，与罗伊斯的浪漫主义有着共同基础。但他所真正著述的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他任意地批评他们，同时又自认是他们的正统。另一方面，杜威的哲学渊源于康德和黑格尔；但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被迫抛弃了他们。对于詹姆士，唯心论是可怕的敌人，他经常反对它并逐渐获得了战胜它的信心和力量；对于杜威，唯心论是他引为后悔的青年时代的错误。

詹姆士和杜威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更不是嫉妒的关系。他们感到他们间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同之处比差异之处深刻得多。各人都曾大度地承认对方对自己的帮助。他们的天资和气质存在巨大的差别，同时在他们的继承人中可能经常有詹姆士派和杜威派的分别，正如在继承苏格拉底的传统的人中经常有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分别一样。这种类比的确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像柏拉图一样，詹姆士是比较戏剧的、诗歌的、神秘的、直觉的、有发明力的、多产的、博学的、机敏的、讽刺的。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杜威却是较坚

执的、有系统的、冷静的、讲究方法的、缜密的、完整的、细心的、严格的。

詹姆士和杜威间的哲学上的差别,不能认为是学说的差别,却只是着重点的不同。这些差别中的最重要之点,可以追溯到他们所不能不继承(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愿意)的哲学流派的特色。没有哲学家能完全改变他的思想。对于詹姆士,这种不可摆脱的残余影响,是英国的经验论;对于杜威,是康德的唯心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不及他的“经验主义”重要;也就是说,他坚持事物就是它们“被认知那样”(known as),认知则指对具体的个别事项的感性的察识(sensible acquaintance)。因此,在詹姆士看来,认知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在实践中被引起的,它终结于存在的显示或揭露。詹姆士的特殊天才在于他对直接的意识经验的细致差别的敏感以及——和休谟相反,对于它的转变的和衔接的连续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杜威忠于他的唯心论的传统,坚决主张认知的主动的特性。认知的“作用”不是像詹姆士所主张的直觉的前奏,而是知识的目的,正如是知识的开端一样。它开始于实际行动的挫折,继以理论的活动,而终于实际行动的恢复。推理思考不是感知的直接性(perceptual immediacy)的不完全的代替物,它本身就是知识的真正生命,感知的直接性只是知识的开端。知识就是思想的运动——这是杜威的唯心论;思想的工作是实践的一个方面和一种工具——这是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出自而且被包含于时空世界——这是杜威借以反对他的早期的唯心论的理性主义及先验主义的“自然主义”。他的哲学可以称为“不纯粹理性批判”(拟康德);或观念的实验辩证法(仿黑格尔)。

詹姆士的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杜威的隐含的形而上学,反映出同样的差别。对于詹姆士,宇宙的形象是在经过提炼和概括的感知经验中显现的;对于杜威,是在尝试与错误的过程——即从问题到解决的过程中显现的。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反映出他的经验主义;杜威的形而上学反映出他的效用主义(operationalism)。但如果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一词被理解为:思想是附属的和次要的,而且把它用于杜威的全部哲学,这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在杜威看来,像在黑格尔的“客观的心”学说中一样,思想作为一种过程是实在的。它是在自然全部进化过程中作为自然的特征的适应、冲突和再适应的一个特殊方面,可以用生物界的智慧行动作例子。

詹姆士的经验主义和杜威的效用主义之间的这种根本分别,指出了杜威的批评者最根本的异议之所在。探究的作用是存在的世界的一种描述和揭露呢,还是它的一种例证呢?存在的世界就是它被认知的那样呢,还是被自然化、普遍化了的认知本身?第一种可能性导致实在论,第二种可能性导致新的唯心论:一种无疑是摆脱了旧唯心论的先验主义、绝对主义、超验主义和永恒真理论等的唯心论,但依然是唯心论,如果唯心论意指:认知的心所特有的程序和联结提供了哲学洞察力的锁钥。

自从1910年詹姆士逝世后,杜威享誉美国近40年,他在美国哲学家中的出类拔萃是无可争辩的;甚至那些认为他往往是谬误的代言人,对他很难估价的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的出类拔萃,不能说是由于他的文体的华美,或由于人格的突出,或由于惊人的功勋。因此,它一定是由于他适合时宜和他的观念的丰饶。

杜威的哲学适合时宜,像詹姆士一样,在于他反映了19世纪的科学对20世纪哲学的新刺激。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甚或宗教的取消,它并不意味着唯物论;但它的确意味着对科学精神的同情和把科学成果作为头等真理予以接受,俾为哲学所促进而不是废弃或轻视。在科学的领域内,它所包括的幅度是从牛顿的物理学到牛顿以后的物理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和社会学(人的科学)。作为这种刺激的表现,新哲学反对当时至少在美国和英国已经流行甚广、正在占着统治地位、并且倾向于堕落为权威的正统的一个学派。杜威和詹姆士攻击它的堡垒,为各种新颖的哲学思潮开辟了道路。因此,不仅实用主义者,而且实在论者、实证论者、自然主义者和重新建立的唯心论者,都感到杜威对他们有帮助,至少也把他看作他们的思想解放的象征。他们感到他是和他们一起反抗旧传统的。

杜威赞同现代工艺学之着重于所有它的广大的工业的和社会的分支及其有效的应用。他的着重实验是和现代科学探究所赞许的技术相协调的。他对各种各样的绝对的强烈的厌恶,是与现代科学探究的“或然主义”或临时的性质相一致的。对于杜威来说,像对于现代科学一样,没有任何智力的成就是最后的。每一新的进展都扩大了无知的范围,并产生新的问题。在杜威和现代物理学看来,自然本身并不是由一个永恒的秩序组成,也不是由经常重复出现的同样的实体组成,而是由单一的、流动的“事件”组成的。

但杜威对于现代科学的态度,不是仅仅消极的接受。在他对科学的崇拜中,他怀着对自然科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20世纪的态度特色。自然科学并不是本质地、自然地、自动地有利的。它的应用提供一个毁灭的兵器厂,也提供一个进步的兵器厂。因此,许多人相信:在人们控制自然环境和控制自己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自然科学要成为有利的东西,它的社会的起源和含义本身必须被包括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对于科学的这一种社会学的或人道主义的批判,杜威是先导。

在这一点上,必须提出警告。如果社会科学要充当自然科学的可靠的向导,它不能仅仅是“描述的”——用这个词的狭隘意义。例如,宣传的心理学的发展,并不保证人类免于戈培尔^①的毁灭势力,却只为他提供武器,这些武器愈是“科学的”,它们的害处也就愈大。要使科学成为有利的东西,只要求它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是社会科学,还是不够的;必须在某方面提出一个标准,并据以判定某些结果是好的,另一些是不好的。

无疑地,杜威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尽管我们会希望它更明确些。要找寻这个标准,必须再看看智慧本身的职能。智慧是人们解决冲突的才能,而探究就是它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的冲突,就是和谐和满足;如果智慧的运用的结果是冲突的继续,这是智慧的失败。换句话说,使杜威站在和平、自由、正义和人道方面的标准,已隐含在他关于智慧所要对付的特殊挑衅的概念中——即关于要求智慧解决的问题的性质的概念中。因为真理是智慧的一种功能,又因为智慧被要求去解决冲突的问题,又因为冲突的除去是善,因此真理就是善。如果要引申出有关的结论,这些前提没有一个能被省略。

杜威之着重合作的智慧,使他能赞同新的自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他可以同情计划经济,它是有组织的、有远见的智慧之应用于需要的满足;他也可能同情政府为了平等和安全而作的渐增的干预,因为政府代表着人的结合和分享——和他们的原子论者的、竞争的利己主义相反。

一方面,杜威的强调社会,使他和完全放任的旧自由主义(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分离;另一方面,他的着重于智慧的“自足性”,使他和极权主义异

^① 戈培尔(Paul Josef Goebbels, 1897—1945),法西斯德国的纳粹首领。惯会造谣说谎,故以其名为“造谎专家”的代用语。——译者注

道,而使他和民主主义一致。社会通过个人行使智慧。个人是社会的智慧工具,也是它的最高产物。智慧的具备,就是赋予人类个体以尊严的特权;这种能力的实现,就是社会得自个人的利益。在这种理想的意义上说,人类生活是智慧的自我实现,通过组织获得并体现于突出的个人。

这些就是借以了解杜威的特殊的民主主义概念的名词。它的对立物是权威主义和传统主义,即人们要依照从上面、从过去、从周围环境强加于他们的意见生活着。人们的自由,主要在于能够自作主张。只有人们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并自己作出结论,他们才是平等的。作为民主主义特征的人类交往,就是人们的心是被觉醒而不是被麻醉,是使它敏锐而不是使它呆滞。就是这一中心观念,使杜威在那些认为民主主义的精髓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分配、而在于思想言论和交往的实施保护的人中,名列前茅。

同样的观念构成了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核心。惯常有人以游戏诗文讽刺进步教育:把它比作儿童(要求解除他选定他想做什么的痛苦命运的儿童)的假想事故。这个故事的寓意和对它的通常理解正好相反。凡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进步教育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并不意味着朝最小抵抗力的方向进行。照着别人的话去实行或信仰,是容易的。自己选择却需要智力的运用;服从、接受、响应、模仿却不需要。

对于学生是困难的事情,对于教师也是困难。教育的艺术在于提供刺激物,以引起抉择的努力。施行这种艺术,需要对人的同情和了解;发布命令和制定法规,却不需要。有时会认为杜威之所以杰出,只是因为他的著作数量多。杜威的写作和出版一直未间断过。他的书名数目是巨大的,对于任何编书目的人(无疑也是对他本人)都是可怕的。他的确对一切可能的哲学题目,也就是说,实际上曾在人类心目中出现过的一切问题,都写作和出版了书籍。根据过去的纪录,在量和质之间确具有正的相关,但数量多而质量低——在各方面都平庸——也是十分可能的。

杜威的著述丰富,不是由于他想在各方面都发表意见的职业义务感,而是因为他在这方面都有些话要说。他的迫切要求与人交往和讨论,就是他自己的主张的奉行。一切探究,不管是在实验室中或在教室中或在会议中或在书刊中进行的,都是合作的和实验的。

他写了心理学、伦理学、价值学说、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方法论、教

育、美学、政治学和宗教等方面的书籍。对于所有这些题目，他都有些东西——对于专家们有兴趣、有价值的东西——要发表。对于所有这些题目，他都曾新颖地、辛勤地思考过；像他自己所明白承认的，有时他的思考的确是晦涩的，却从不草率或模拟。他的心是第一等的，因为它是创始的。他在美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已被确认，而美国之将在人类思想史中占着中心的（而不是边缘的）地位，也应大大地归功于他。

杜威教育哲学之我见^①

[美] 杰罗姆·S·布鲁纳

1897年,38岁的约翰·杜威发表了一篇颇具鼓动性和预见性的著作,题为《我的教育信条》。这篇文献预示了他以后的大部分教育著作中的观点。

杜威提出了5个信条。第一个信条给教育过程下了定义:“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第二个信条包含着杜威的关于学校的概念:“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社会生活的形式里,凡是最有效地培养儿童分享人类所继承下来的财富,以及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运用自己的能力的一切手段,被集中起来。因此,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在第三个信条中,杜威谈到了教材:“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社会生活给予他一切努力和一切成就的不自觉的统一性和背景……真正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杜威的第四条信条体现了他对教育方法的观点:“提供教材和处理教材的法则也就是包含在儿童自己本性之中的法则。”对杜威来说,这个法则就是行动的法则:“在儿童本性的发展上,自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我相信,意识在本质上是运动的或冲动的,有意识的状态往往在行动中表现自己。”最后,是杜威的第五个信条:“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今天,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这篇文献。它的乐观主义具有美国传统:拒绝对于生活的悲观主义态度。它以实用主义的精神来解释真理,把真

^① 译自:Jerome S Bruner. After John Dewey, What? //James C Stone & Frederick W Schneider. Readings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1:95—105. 伟俊、钟会译.

理看作是对行动结果进行探究的产物。它不仅对个人的生长能力,而且对社会按照其最好的意愿来塑造个人的能力,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篇文献的最后几行词句是:“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

然而,正是那些最有生气的部分——乐观主义、实用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承认——使人们感到不安。因为在从 1897 年到今天的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我们不仅对自然界的看法,而且对人类社会及其组织结构等的看法也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人的本质、人的潜力和潜能、人的情感和人的生长方式等方面的理解,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

杜威虽然受到了他的哲学立场的前提的限制,然而他的思想却反映了这些变化。但是,在杜威最初的那些前提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富于革命性的学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们大大改变了探究的特性。两次世界大战,暗无天日的希特勒时期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的相对论的革命,能源时代及其新技术,怀疑主义哲学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盛行,所有这些迫使我们教育哲学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基本前提进行重新评价。

那么,让我们根据今天人们对世界和人性的本质的认识,来重新检验一下这些前提。但是,进行类似这样的工作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澄清。一个人写作总离不开其时代背景。杜威就是针对 19 世纪 90 年代学校教学的僵硬和无效,尤其是对儿童本性的忽视的这一点来著书立说的。杜威对直接经验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意义的强调是对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教育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批判,这种教育几乎根本没有将教学与儿童的经验的天地相联系。为激励人们起来改变这种状况,杜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好事过了头即成坏事。今天,我们正是处在这样一种“过了头”的背景中,来重新考虑教育问题。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曲解,常常使其理论变成了一种他本人对之深表遗憾的、纯感情主义的教育实践。他在其“信条”中写道:“除了呆板和迟钝、形式主义和机械公式,我们的教育受到的威胁没有比感情主义更甚的了。”对“班级设计”和“生活适应”课程的疯狂崇拜,对那喋喋不休、使人生厌的“准备”的概念的盲目信仰,因而,一味害怕将

儿童置于成人和大自然的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会使得儿童轻松自在的直接经验的天地受到侵害——这些关于儿童的观念大多是与教育过程方面的实验完全脱节的，然而又都是在杜威的名义之下得到公认的。在杜威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是既崇高而又脆弱的。但我们的时代呢？我们将如何来表达我们的信念呢？

教育试图发展心理的力量和感受性。教育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教育过程将一部分累积起来的、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传授给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它形成了个人的冲动、意识和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也必须试图发展人的智力，这样个人才会有能力超出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方式，才能够有所创新——不管这种创新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够创造出一种他自己的内部文化。因为无论对那一种文化的艺术、科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来说，每个人都必须是他自己的艺术家、自己的科学家、自己的历史学家和自己的航海家。没有一个人能通晓整个文化。实际上，这几乎是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这种社会性的记忆形式的决定性的特征。每个人只经历其中的一部分。要想全面形成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必须利用通过教育得到的那部分属于他个人的文化遗产。

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的种种需求使得个人按照自己的最好心愿去创造世界的理想形象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们的时代也目睹了那些使个人从属于社会既定目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主张“从属”的意识形态，对人的个性毫不同情，它尊重的只是个人对社会进步作出的工具性的贡献。然而在同时，尽管有这些意识形态，人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解却仍然深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之为智慧上的黄金时代。未来的时代要求我们不仅应当将更深刻的理解力运用于社会的改善方面，而且也应当运用于个人的改善方面。

正如杜威在许多年前说过的那样，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确实不错，但具有两重性。因为所有的教育，不管它是好是坏，都是如此进行的。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个人所说的特定的语言对其思想、经验的形式与结构所起的制约和塑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确实，有理由相信，思维过程本身是社会交往的内化，是被早期外部谈话所决定的一种内部语言。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教育成为可能。但是，

教育在形成和表达人们的经验的同时,也能成为对人们的思维活动加以限制的主要手段。对抗这些限制的有效办法是选择的观念(the sense of alternative)。这样说来,教育不仅应当传递文化,而且也应当提供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并且增强人们在这方面进行探究的愿望。

半个世纪以来,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知道,心理健康仅仅只是心理发展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心理方面疾病的悲剧性在于:它使病人为躲避他那无法处理得了的种种日常现实问题而疲于奔命,以致他不再可能有学习的信心和热情。但心理健康只是最起码的条件。心理能力是随着其运用而发展的,假如“适应”(adjustment)被作为一种理想目标的话,那这种理想目标可真是太低微了。为了发展既有个性又和社会相关联的优异品质(excellence)而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的聪明才干,这才是比较理想的目标。在弗洛伊德学说盛行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知道,解放本能和天性、给予它们以自由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通向聪明才干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途站。对我们来说,在这下半个世纪中,弗洛伊德学说中最有预见性的,不是他为反对僵硬的道德说教的束缚所作的斗争,而是他的准则:“那里有伊特(id),就让那里有自我。”

正如杜威在结束其第一个信条时所说的那样,教育必须从“心理上探索儿童的能力、兴趣和习惯”开始,但是,一个出发点并不就是整个旅程。为了儿童去牺牲成人或为了成人去牺牲儿童,其错误是相同的。以为生活教学总是能适应儿童的兴趣爱好,那只是一种感情主义的想法;这正像强迫孩子鹦鹉学舌般地去重复成人社会的教条一样,只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兴趣是可以被唤起和被激发出来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这样说大概是不会错的:供给引起需要,对可望获得的东西的欲望引起反应。人们总是试图使儿童具备认识世界和他自己的更深刻、更有力和更敏锐的方式方法。

学校是进入心理生活的入口。确实,它本身就是生活,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一种准备。但是,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精心设计它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可塑性强的那些岁月中,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正是这种可塑性,赋予人类的发展以特征,并将我们人类与其他所有的物种区别开来。学校不应当仅仅是向学生提供得以继续与更广大的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机会。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在这里学生通过其智力的运用来从事发

现活动,在这里学生跃入一个崭新的、未尝想象过的经验领域,这里的经验和先前得到的经验没有连续性。例如,学生初次理解了什么叫诗歌,或体会到在能量守恒定律的观念中包含的美妙、威力和纯朴——没有什么被消耗,只不过是转换的形式而已,而且广义地说对其进行测量也是可能的。假如有一种连续性可能被找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将儿童的思想万能的我向意识(*autistic sense of the omnipotence of thought*)转变为在思维活动中的现实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有所作为的人的一个特征。

在强调学校一方面与社会、另一方面与家庭的连续性的时候,约翰·杜威忽视了教育的一个特殊功能——为学生展现各种新的前景。假如学校仅仅是儿童从亲密的家庭环境进入社会生活的一个过渡场所,那么,这种生活太容易安排了。这里考察一下原始社会的教育制度是很有意思的。那时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男孩的生活中都有一个急剧的转折点,这个以“成人礼”(ritede passage)为标志的转折点通常是在青春发育期,它有效地将儿童的行为方式与青年的行为方式鲜明地区分开来。

当然,要是以那些先文化社会(*preliterate societies*)的做法为榜样来从事我们的教育实践,那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只是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相似的地方:教育并不将儿童与成人混淆起来,它承认向成人的过渡包括各个新的经验领域的引进,对各种新的奥秘的发现和探究,各种新的能力的获得。这是教育的精髓,也是其自身的报酬。

在东欧传统的犹太人居住的小市镇里,睿智的学者曾是特别重要的人物——犹太教法典里的“克霍克汗姆”(Talmad Khokhem)。他的风度,他的含蓄的谈话方式,他那宁静自若的神态,使他被视为漂亮英俊的形象,而不是能胜任工作的典型。传说的中国社会也有其完美人物的形象,这种人在生活中将知识、情感和行为以一种美妙的方式结合起来。17—18世纪欧洲的绅士的理想形象大概具有同样的作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可能就是以这种精神极力主张:若教育欲赢得公众声誉,它必须向学生揭示伟大的思想和情操。我想强调,教育的酵母是优异的观念(*the idea of excellence*);而且,优异的观念又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形式,其数量之多有如世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个性一样,每个个性发展着他自己的优异的形象。学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应该培育各种优异的形象。

仅有一种超然的、理想主义的优异观念是不够的。一种关于优异的学说欲取得成效,必须使它能够接触到其影响的每个人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和解释。犹太人的学者、中国的学官(scholar administrator)、18世纪的绅士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所体现的生活形式与作风,是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力求达到,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从中得到借鉴的。因此,我认为,学校中也必须容纳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和体现优异的男子和女子。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教职人员非得由那些极有天赋的男女来充任;然而,教师却必须在他(她)的自己的治学观点中体现出对优异的追求。的确,有了电视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技术手段,我们也可以在其最高意义上向学生和教师提供对优异的具体实在的描述。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将会发现,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或艺术家在对初学者谈话时,能够做到和在对研究生谈话时一样轻松自如、诚实坦率。

教育中的教材问题只有与人们对知识的本质的看法联系起来后,才有可能得以解决。知识是我们建立的一种模式,用来给予经验中的规律性以意义和结构。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中的、有系统的思想观念,在使经验变得经济和连贯方面都是创造发明。我们创造的概念,诸如物理学中的力、化学中的键、心理学中的动机、文学中的文体,都仅仅是一些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理解。文化的历史就是伟大的、有系统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史,那些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会从关于人类和自然界的较深刻的价值意义和看法见解中产生出来。伟大的、有系统的思想概念的力量,不仅在于它们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而且有时能够预见或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事实上,这些思想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获取经验的手段。我们是在牛顿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牛顿以为时间的流逝是均衡的,因而我们总感到时间是在刻板而又稳定地作匀速直线运动。实际上,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对感知觉的研究后,我们已知道,经验并非那么直接和纯净,它的获得总要通过我们的各种感官的准备状态的过滤(filter)。课程由我们所期望的东西所构成,而这些东西又导源于我们对世上存在着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等问题的认知模式或思想观点。

从这里,引出了两个信念。第一个信念是:知识结构——其连贯性和使得从一个观点必然能推断出另一观点的根源——应在教育中得到应有的强

调。因为结构——非凡的概念化的创新发明，给予相互间没有联系观察结果以秩序，赋予我们可能学习的东西以意义，使经验的新领域的开创成为可能。

第二信念是：知识的连接应该到知识自身中去寻找——假如这些知识是值得被掌握的。像杜威那样，期望用教材与儿童的社会活动的关系来论证教材的正确性，只是对知识的性质和如何去掌握它的曲解。数学中的交换律的意义并不是从这样的社会观察中得到的：2间各住着14人的房屋与14间各住着2人的房屋不是一回事。相反，它存在于能产生一种关于数目的思维方法的观念之力量中。这种观念轻巧自如、美妙非凡而且极有生成能力，我们可以说，它起码像形式文法中的将来条件时态一样强有力。没有交换率，就不可能有代数学。假如集合论——现在常常作为新的数学课程中的引论部分——非得要与直接经验和社会生活相联系才能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值得教了。然而，集合论为理解次序(order)和数字奠定了基础，这些若靠利息率和按每捆多少钱的价格买卖若干捆干草之类的社会性计算，那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数学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必须从经验开始，但是向抽象化的发展要求它必须从明显的表面经验中摆脱出来。

最重要的，这里考虑到了是否经济的问题。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地掌握任何一门学科——要是“掌握”意味着涉猎了所有的事实、事件和细节的话，即使一辈子都用上去也不行。为了强调其结构而呈现的教材，必然会具有富于生成能力的性质(generative kind)，它使得具体项目能得到重新组织，或最起码的是，为那些可能碰到的具体项目准备好一个合适的所在。

那么，什么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材呢？对于“应该教些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看来可以从对于“什么是重要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得到。假如我们一旦能够回答“什么是值得了解知晓的”这一问题，那么，要区分什么是值得教和学的内容与什么是不值得教和学的内容就不困难了。当然，自然界的知识、人类状况的知识、社会的性质和动力的知识、在体验今天和追求明天时可能会用得上的关于昨天的知识——我们似乎有理由设想，所有这些知识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还有一种知识必须加入进去——关于我们的艺术遗产的成果的知识，它们记载着我们的艺术奇迹和爱好的历史。

这样，一个关于符号体系的问题马上产生了，而我们是借以这些符号来

理解和谈论知识的。

存在着自然意义上的语言和数学意义上的语言。从这个特殊意义上来说,我无法想象一个世纪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他一定会精确而又熟练地掌握一种自然语言和数学。因为要想开拓新的经验领域和获得新的能力,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它们必须在任何课程体系中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

最后,和杜威当年写作的那个时代一样,我们无法预知目前正在受着教育的儿童将来会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中。这样,多方面的心理能力和竞争的潜能就是我们能够给予儿童的工具了。时代和环境要经历种种变化,但儿童对这种工具的需求却是不变的。在理想的学校中我们向儿童提供的一系列学习内容,不必固定地采取某一种形式,但必须如此:不管教的是什么内容,都得让学生连续不断地学习研究下去,直至使学生从深化了的理解中体会到心智的力量。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对知识的掌握,才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目的是一回事,它们是相同的。教育的目的是受过训练的理解力,而这也就是教育的过程。

首先,让我们确认,理解的对立面并非无知或简单的“不知道”。理解某件事,首先意味着是放弃了另外一种设想这件事的方式。在一种设想方式和另外一种较好的设想方式之间,通常存在着某种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会带来突然的焦虑——这是我们的生物遗传本能之一。随着焦虑的出现,又会产生各种防卫措施——逃跑、害怕或是惊呆,而这些是有害于轻松和热情地进行思维活动的。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其心智能力事实上都是有极限的,这体现在他们处理信息的有限的能力上——我们称之为的广度(span),能够同时容纳6到7个互不相关的项目。超过这个限度就会产生超载、混乱和遗忘。如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指出的,求得经济的原则是向我们的7个心理输入口(mental input slots)供给精髓而不是杂质。学习材料被学习者组织成为结构的程度可以判断他是在与精髓还是与杂质打交道。基于这个理由和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些理由,我们必须在把某个专题的广泛的学习材料提供给学生之前,首先使学生具有事物是如何和在何处配合、衔接的大致概念。通常,这种大致概念的发展来自最初的一些经验,和儿童生活紧密相连的概

念在这时是具体实在地体现出来的。既然如此,学习的循环就从特殊的和直接的内容开始,逐渐向抽象发展,直至达到一个属临时性质的目的,那时,学生可以运用抽象概念,并以一种为抽象概念所允许的更深刻的方式去掌握新的特殊和具体的内容。

教学的方法应该尽可能地以引导儿童自己去发现为目的。对儿童们进行讲述,然后就这些讲述的内容进行考核,如此做法不可避免地会造就出那些只会呆坐板凳死读书的学习者(bench-bound learners)。他们的学习动机往往与手头的任务没有内在关系,而仅仅是为了讨好教师,升入大学或虚假地维持自我尊严。鼓励学生去发现有两方面的效果。首先,儿童会将所学的内容变为他自己的东西,会将他的发现置于他为自己而创造的内部文化世界之中去。其次,同样重要的,发现以及它带来的自信心是对学习的高尚的奖励。而且,还鼓励人们去加强属于教育核心的这个过程——经过训练的探究。

必须鼓励儿童去从他所学到的东西中获得充分的好处。这并不是说必须要求儿童将所学到的东西直接运用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去,当然,如果他有恰当的机会去运用的话,那更好。应该说,这是尊重知识连贯性的一种方法。两个事例以及一种使之相关联的关系,即可以而且也应该吸引学生去概括、去推断,去作一次基于直觉的、尝试性的跃进,甚至去建立一种假设性的理论。从单纯的吸取到在思考中对所学的东西进行运用这一跃进,是思维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确实,像大致的猜测,直觉的运用,对那些必然是不充分的论证材料的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活动都是儿童需要从事并得到指导的。它们是消除儿童的被动消极状态的有效办法。

最重要的是,教育过程必须摒弃智力上的不诚实行为和那些只做泛泛解释却不有助于听者理解的欺骗方式。我在别处表达过这样的信念:任何学科都能以某种诚实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对一个小学五年级的班级讲授社会常识时,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描绘成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年,放学以后与他兄弟巴特(Bart)待在一起,苦思冥想大洋彼岸有些什么东西,即使这样的描绘正好与儿童的直接社会生活经验相吻合,其做法也是不诚实的表现。谎言终究是谎言——即使它听上去像是熟悉的真理。同样,给一个小学六年级的班级上自然科学课时,和一年前向学生们提供关于哥伦布的褊狭的形象时一样,以一种包着糖衣的虚假形式,为他们

描绘一幅关于原子的既经过篡改歪曲然而又具体实在的图画,那也是不诚实的表现。不诚实的印象只会阻碍自我产生的理智的探究,同时会阻碍真正的理解力的发展。

我相信,教育是改变社会的基本方法。甚至各种革命也不比它们所体的思想和为了实行革命而发明出来的种种办法为好。

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化之快是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变化的消息几乎能在一瞬间就传遍四方。假如我们的信念——学校必须是生活本身,而不仅仅是生活的准备——是真诚的,那么,学校必须反映出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变化。

这个信念的首要的含意是: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使得在知识新领域(frontiers of knowledge)发展起来并不断深化的各种真知灼见能够在我们的学校中得到反馈。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中,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为保证新的、更有力而且往往是更简单的理解方式能够回到中小学的教室里来,人们正作着持续的努力。但是,使得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领域也保持经常不断的更新变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是,知识的前哨并不总是高等院校和研究实验室,它们可以是政治和社会生活、艺术和文学领域或迅速变化着的商业和工业社会。任何地方都有变化,而我们就在变化中学习。

我以为,我们需要一个新型的机构,这是课程中的一个新概念。我们目前还没有,然而正在开始意识到其需要的这种机构,或许最好还是称其为“课程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rriculum studies)——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很多。让这种机构成为学者、科学家、实业家、艺术家与优秀的教师们的聚会之地,在这里,他们对课程进行不断地修改和更新。这样的工作能突破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系科的限制——不管是教育系科、艺术系科或自然科学系科,还是医药或工程系科。我们一向很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加快的生活变化和其对于教育过程的意义。我们还没有与教师们一起来分享从新的发现、新的见识和新的艺术成就中得到的益处。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一向有着自我封闭的教室的观念(the notion of the self-contained classroom),而且还有自我封闭的学校的思想——甚至于自我封闭的教育体系。

让我再来考虑一下我说的关于优异形象(imager of excellence)的那些话,以及经常不断的课程更新在帮助这些优异形象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显

贵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驻联合国大使,才华横溢的大提琴家或敏感的剧作家,利用历史做文章的史学家,或寻求当今模式的社会学家——这些人和学生一样,也在追求对新问题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是学术精英(excellence)的代表。要使我们的学校受到社会进步和向更优异的方向发展的良好影响,必须不断地将这些人的智慧和努力引回学校,使得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能因此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处在知识前哨的成人与处在他自己前哨的年轻学生之间,没有性质上的差别,两者都是在寻求理解。

如何把我所谈的问题来总结一下呢?或许最好还是采取与约翰·杜威的“信条”相应的方式:教学不仅仅传递文化,它还形成心理的力量和感受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如何为自己去探究并建立一种他自己的内部文化。学校是进入精神生活的入口,而这意味着对最大限度地使用智力的信心和对每个人所了解到的东西之含意的检验。教育中的教材即关于世界及其连贯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有结构且有历史联系,使得我们能在经验中找到秩序和预见性,并在惊奇之中体尝到乐趣。教育的方法即包含在任何理解之中的方法——一种受过训练的认真的努力,力求独立地去求知并且将一个人已理解的东西变成对世界的有条理的说明和表述,这种说明尊重特殊性,但也承认抽象性在理智上是绝不可缺少的。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里,学校仍旧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工具。既然如此,它通过使我们的时代的各种新的见识在其课程中得到反馈的方式,寻求不断地更新和修改其教学的方法。最后,所有这些信念都依赖我们去培养和体现从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类型的优异(forms of excellence),任何低于这些理想的目标肯定都是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不相称的。

第四编

杜威与世界教育

世界教育家杜威^①

[美] 威廉·W·布里克曼

半个多世纪以来,五大洲的教育家们都认识到,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实验对世界各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早在1882年杜威23岁时,他的名字已第一次在一份外国杂志——法国的《哲学杂志》上出现。这是一年以前在《思辨哲学杂志》上刊登的他第一次发表的文章的摘要。在1899年以前,他的教育思想已在欧洲的出版物上被讨论。这是由著名的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孔佩雷(Gabriel Compayré)在《大百科全书》中所写的一篇论文。很清楚,孔佩雷和其他的欧洲教育家阅读了杜威的英文版教育著作。

据我所知,杜威在教育方面的著作的第一个外国版本是在1900年发行的《学校与社会》。它在美国出版一年以后就在伦敦发行了。杜威教育著作的第一个译本很可能是1900年出版的瑞典译本《与意志有关的兴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杜威的其他著作已经被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他的名字已经被欧洲教育界人士所熟知。对教育有着影响的一战后的改革精神,对于杜威教育理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赢得了追随着。这是一件十分惊人的事,因为一般地说,人们不相信美国人在文化、智力和教育方面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东西。当新教育之风吹过欧洲的时候,杜威的教育观点一下子为人们所熟悉。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和福禄培尔曾有过他们的全盛时期,然而新的明星出现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要求不同的教育内容、原则和实际。提倡从古典的教材中摆脱出来和采取活动过程,以及强调科学的和社会的教材,重新阐述了19世纪的许多教育思想。英

^① 摘译自: William W Brickman, and Stanley Lehrer.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New York: Atherton, 1961: 132—143.

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学校运动,使得教育家们熟悉了为杜威的思想铺平道路的近代教育观点。可能由于杜威很少提到或者引用裴斯泰洛齐和其他现在已去世的伟大教育家的言论,因此,许多欧洲教育家可能感到,在这位美国教育家的著作里有什么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支持一些外国教育家的教育观点,杜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提到了。

曼彻斯特大学的芬德利(J. J. Findlay)教授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英国教育界对于杜威的注意的人。他在1907年和1910年编辑的两卷本杜威文集曾广泛地流行。这部文集的第2卷,即《教育论文集》,芬德利认为是“杜威的信条”。在杜威的著作中,在英国出版的是《学校与社会》第二版(1915)和《明日之学校》。凯瑟琳·C·梅休和安娜·C·爱德华兹合著的那本《杜威学校》也在英国出版发行。由于不存在语言的问题,因此,英国的教育家们就能经常读到在美国印刷的原版书。

在英国作家所写的几本重要的教育著作中,都包括了有关杜威的章节。例如,麦克卡林斯特(W. J. McCallister)写的《教育中的自由生长》(1931)。最有趣的是,在罗伯特·R·拉斯克(Rober R. Rusk)的名著《伟大教育家的学说》的第二版(1954)里,增加了有关杜威的一个大章节。拉斯克博士宣称,杜威“在20世纪前半整个时期的整个时期里统治了教育舞台”,正如裴斯泰洛齐统治了较早的一个世纪一样。

最近,由柯蒂斯(S. T. Curtis)和布尔特伍德(M. E. A. Boulwood)合著的《教育思想简史》(1956),为约翰·杜威的生平活动和影响提供了它篇幅最长的一章。他们对于杜威是有眼力的,但是,他们也引用了一些主要批评家的话和他们自己的观点。

杜威在英国的遭遇是很难估计的。沛西·能^①爵士经常引用的一段评论说,杜威“对于解放现代教师的职业智慧贡献很多”。正如柯蒂斯和布尔特伍德所说的,虽然杜威在英国被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教育思想的一位领袖”,但是,他并不是在一切主要的领域里都得到承认的。例如,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写的《教育学说的发展》(1912)一书里,对于赫曼·H·霍恩(Herma H. Horne)、威廉·C·巴格莱、爱德华·L·桑代克和其

^① 沛西·能(Percy Nunn, 1870—1944),英国教育学家。——编者注

他美国教育家的思想都作了讨论,可是,对于杜威却连提也没有提。

在英国的教育著作中,杜威的名字和思想被略去的情况也是可以发现的。那些从宗教和古典世界中寻求启示的人是很少提到他的。近来,似乎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与其把杜威看成教育界的圣人,不如把他看成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拒绝。这一代表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贾杰斯(A. V. Judges)教授。他于1957年编了《教育与哲学精神》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评价实用主义。贾杰斯教授把自己说成是杜威的一个学生,杜威的信念引起了他的注意。

法国在1909年以前,杜威的一些著作就出版了。在1909年和以后的3年里,“新学校运动”的领导者乔治斯·伯特尔(Georges Bertier)在《教育》一书中刊印了《学校与社会》的一部分译文。1925年,比利时的著名教育家奥维德·德可乐利^①为法国的一个出版公司翻译了《我们怎样思维》;6年之后,这个公司又出版发行了《明日之学校》。法国对杜威写的或关于杜威的著作给予了稍高的地位,在1947年时出版了《经验与教育》,到1957年时又出版了《自由与文化》。前者也包括了译者卡罗(A. Carroi)所写的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一个说明。

在法国已出版的关于杜威的论文中,最好的可能是由现在在巴黎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的鲁本·华伦罗德(Reuben Wallenrod)所写的《约翰·杜威:教育家》(1932)。

近几年来,法国人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似乎继续保持着一种兴趣。这可以从这样的一些著作中看出,例如,布洛克(M. A. Bloch)的《新教育哲学》(1948年)、法国巴丁学前教育委员会出版的《杜威教育著作》(1955),以及由吉恩·查蒂(Jean Chateau)主编的《伟大的教育家》(1956)一书里布鲁巴克^②写的《结论》一章。但是,大体说来,几十年来,杜威在法国所受到的尊敬,似乎是因为他的哲学方面多于他的教育方面。

引起瑞士教师们对杜威的注意的,首先是艾多瓦特·克莱帕雷德(Ed-

① 德可乐利(Ovide Decroly, 1871—1932),比利时教育家。——编译者注

② 布鲁巴克(John Seiler Brubacher, 1898—1988),美国教育家。——编译者注

ouard Claparède)^①,其次是阿道夫·费列尔^②。前者是一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早在1905年就开始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讨论到杜威,但是他1913年给皮陀克斯(Pidoux)研究杜威的4篇论文的译本所写的《引论》,为瑞士人对这位美国教育家的正确评价打下了基础。唯一能找到的另一个杜威著作的瑞士译本是德文的《我们怎样思维》(1951)。通晓多种语言的教育家可能是用在德国、法国或者在英国出版的译本来研究杜威的。

1949年,我曾说过,“少数的杜威教育著作在意大利看来好像是有效果的”。在意大利的译本、期刊的参考书目、偶尔的专题著作和在教育著作里的论述中,杜威的2本教育著作是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意大利的教育声誉的概括。在意大利,很可能是卡莱顿·华虚朋^③作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一位官员的出现,促使意大利人对杜威感兴趣。在已翻译的杜威教育著作中,有《民主主义与教育》(1949,1954)、《学校与社会》(1949,1954)和《今日之教育》(1950)。进一步指出杜威对于意大利教育学的重要性的,是在1954年至1957年之间出现的3本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专题论著。其中之一是吉诺·科拉罗(Gino Corallo)的《约翰·杜威:教育家》(1950),这是一本600多页的书,包括了杜威的部分著作和关于杜威的著作的一个详细书目的提要。

在西班牙,国家教育协会的秘书多明戈·巴恩斯(Domingo Barnés)在1915年翻译了《学校与社会》第二版。几年以后,洛伦佐·卢苏里加(Lorenzo Luzuriaga)开始写有关杜威教育理论的文章,并翻译了他的许多教育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在西班牙至少出现了9种译本;到30年代初,又出版了一种。八卷本的《教育学》可能是在西班牙内战前五年在马德里出版的。由于战争的到来,卢苏里加教授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他继续翻译杜威的著作。除这些教育家之外,似乎只有少数的教育家致力于杜威的研究,特别是在佛朗哥^④时期。在过去20年中,很少的西班牙作家承认杜威在教育方面的领导

① 克莱帕雷德(Edouard Claparède, 1873—1940),瑞士心理学家。——编译者注

② 费列尔(Adolph Ferrière, 1879—1960),瑞士教育家。法国教育家德摩林的学生和追随者。1912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新学校局”的组织者和主席。——编译者注

③ 华虚朋(Carleton Washburne, 1889—1968),美国教育家。曾创立“文纳特卡制”。——编译者注

④ 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编译者注

地位。

对德国教育家来说,杜威的教育思想是由一个美国人卢西达·D·博格斯(Lucinda D. Boggs)带到他们面前的。他曾于1901年在德国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杜威的兴趣理论在教育学中的应用。然后,出现了一些翻译本,但主要是在百科全书、书籍和教育期刊中的论述和参考书目。主要的翻译者埃里克·哈勒(Erich Hylla)教授1930年第一个把《学校与社会》译成德文,1949年又出版了第二版。

对杜威在德国的声誉提高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家是乔治·凯兴斯泰纳^①。他自己也已驰名于世界。非常有趣的是,这位德国教育家是在1907年从一本英文版的《学校与社会》中,而不是从埃尔莎·格立特(Elsa Gurlitt)的1905年的德文译本中了解杜威思想的。一直到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去世为止,凯兴斯泰纳通过他自己的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做了很多传播杜威思想的工作。

坚决认为凯兴斯泰纳受到杜威的深刻影响的一位知名人物,是比利时的神父弗雷茨·德·霍夫(Fraz De Hovre)。他那有创见的佛兰芒语著作在法国和英国的译本是比较有名的。虽然霍夫在《哲学与教育》一书中批判了杜威,说他是对于社会和宗教信仰的文化基础保持沉默的“一位多少有点偏见的社会教育家”,可是霍夫还是把杜威当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除了指出杜威对德国的影响之外,霍夫还认为,这位美国教育家对英国也是有影响的。

荷兰的教育同行表示对杜威的著作有一些兴趣,这可以从各种教育著作的参考书目和论述看出来。但是,似乎只有一种《学校与社会》的译本(1919年)。在纪念荷兰教育家简·莱德哈特(Jan Lighthart)时,人们曾注意到杜威,并提到了在这两位教育家的思想之间的相同之处,但是,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位美国人对莱德哈特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瑞典人意识到杜威是一位教育家,大约是从1901年开始的。当时,《与意志有关的兴趣》一书的瑞典文译本已经出版。瑞典人对杜威的兴趣,可以通过其他一些译本和批判性的专题论文以及各种教育出版物表现出来。1948

^① 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德国教育家。——编译者注

年,《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瑞典文译本出版。

因为这个或那个理由,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杜威的注意显然很少。一个例外是,1953年,一位挪威的教育家西格德·诺斯特布在一本学术著作中对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了评价。

杜威在俄国的声誉要追溯到伟大的俄国教育家斯坦尼斯拉夫·T·沙茨基。他在1905年就熟悉了杜威的思想。早在1907年,杜威著作的俄文译本就出现了,绝大多数是20世纪20年代时出版的。当时,杜威在苏联的名声达到了顶点。1928年,杜威曾访问苏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在1931年苏维埃教育政策改变后,结果抛弃了杜威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年里,这位美国教育家被打上了“反动分子”、“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的标记。

一些斯拉夫国家对杜威的教育工作和著作也是十分感兴趣的。译本和专题论文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有出版。

杜威的著作在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也被翻译出版。他的思想在葡萄牙、丹麦和芬兰的教育著作中都有所阐述和评论。1924年,杜威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还访问了土耳其的学校,并写过一份报告概括了他的印象。这份报告曾用土耳其文出版过,于1952年又重版。这可能是在土耳其对杜威的思想还继续保持着兴趣的一个迹象。

在过去的10年里,在印度、中国、朝鲜和埃及都出版了杜威著作的译本。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以“约翰·杜威”命名了它的教育学院。对日本来说,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学习杜威,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从1950年起,至少有10种杜威的哲学和教育著作的译本在日本出版。最近,在日本成立了约翰·杜威学会,很多哲学家是它的会员。杜威的名字也已深入到南北非洲,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那些来自各个地区的教育家的影响,他们曾在美国和欧洲研究过杜威。

尽管杜威的著作已为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所熟知,但是,只有3个国家对他的思想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兴趣。在墨西哥,这种兴趣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在巴西,它是在哲学和教育两个方面;而在阿根廷,它主要是在教育方面。一位关于现代教育的多产作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卢苏里加教授,在过去20年里,至少翻译了6本杜威著作。

根据查尔斯·E·菲利普斯(Charles E. Phillips)写的《加拿大近代教育》,加拿大人对于杜威的教育著作的注意要回溯到1899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杜威的许多思想被付诸实践,许多加拿大教育家指出了杜威对他们国家的教育的影响。甚至有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希尔达·尼特毕(Hilda Neatby),能与任何的美国对手的斥责较量,但也承认杜威的学说“对加拿大的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杜威的声誉也深入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各个地区。杜威的一些著作还用亚美尼亚语^①和依地语^②出版。只有少数的教育家能像杜威一样已经并且正在享受到那么广泛的声誉,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在一些国家里,除去杜威或者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与杜威观点相似的那种思想外,很多教育家似乎不知道别的美国教育思想家。这是使人遗憾的,但也表明了杜威声望的程度。

杜威的教育著作已经为全世界所周知。在一些地区,他的观点已经引起了教育哲学和实践的变化。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反对杜威的情况,而且它可能要继续一些时间。约翰·杜威的影响可能会衰弱下去,也可能得到加强。总而言之,如果杜威那普遍的声誉的记录能被抹掉的话——除非有人能同他平等地进行比较,这一切是难以预料的。

① 亚美尼亚语,前苏联一加盟共和国所使用的地方语言。——编译者注

② 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编译者注

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①

[美] A·亨利·帕苏

在《杜威著作精选》的“导言”中,西多斯基(Sidorsky)说:

20世纪上半期,杜威是对美国哲学思想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是广泛而深刻的……

杜威思想对美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影响之大,可被看作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主要表现。

毋庸置疑,杜威对哲学思想和教育改革的影响并不限于美国。1946年,国际教育局的编辑吉纳瓦(Genena)、德劳顿斯(Robert Drottens)称誉杜威是对当代世界教育具有最大影响的人。香港新亚学院院长欧春城(Ou Tsuin Chen)1961年曾这样评述:“杜威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哲学家,对于他的不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全世界的广泛影响,几乎没有教育家能与之相提并论。”

1949年10月20日,正值杜威九十寿辰,借此机会,布里克曼(Brickman)讨论了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出了杜威对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的影响的一些例证。他感到虽然“证明其影响的存在”是困难的,但他相信:

“根据于各种译著、专业杂志、专业的和其他出版物的各种思想讨论,以及大量资料中有关的理论与实际,杜威在与世界上同时代的人物

^① 译自:A Harry Passow. Dewey'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Columbia University, Spring, 1982.

的关系中,比较易于评价的是他作为教育家的声望。”

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方面,世界各国都受到杜威的影响,大致通过三条途径:(1)杜威的出国访问,最突出的是他对日本、中国、土耳其和苏联的访问;(2)杜威的著作被翻译成至少有 35 种语言文字;(3)跟随杜威和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同事们学习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名学生,并且在美国其他大学和学院也教授杜威的哲学,这批留学生归国后,成了他们国家的政府和大学的领导人物。

杜威的出国访问

1905 年,杜威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系。为了挣些额外收入,杜威每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兼课 2 小时。正是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杜威“成了哲学上实用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同时,实用主义开始支配了美国哲学”。

杜威于他的休假期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即赴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为期是 1918 学年的一个秋季学期。1919 年 1 月,杜威及夫人乘船往远东度假,因为日本邀请他去讲学。足足两个半月时间,杜威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系列讲演 8 次。这些讲演贯穿了一个总的主题,即关于“道德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改造和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这些讲演稿后来以《哲学的改造》为书名,1921 年于美国出版。按盖格(Geiger)的说法,杜威曾希望“通过他的讲演去宣传他的拥护世界和平的思想”。

从 1919 年杜威访问日本以来,他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一直维持着,并达到了它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几乎全盘“美国化”。小林繁夫(Kobayashi)曾详细地考查了日本教育思想中的杜威哲学。^①

杜威在日本的讲演,明显地标志着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态度的剧烈改变,即在他曾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了和平主义的主张。正如盖格所说:

^① 小林繁夫 1964 年撰著了《约翰·杜威与日本教育思想》(John Dewey in Japanese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编译者注

“杜威不再认为使用武力是正义的，民主主义的工具可恰当地用以完成国际和平合作，民主主义不但可以当作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且可以当作帮助人类去重新组织他们思想理想。后来，杜威围绕这个题目发展了他的思想。”

杜威在东京讲学期间，他以前的中国学生的一个小规模代表团正在东京，并邀请杜威下一学年到中国作访问。“青年知识分子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强烈地吸引着他”，杜威明显地对和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兴趣。杜威接受了邀请，他一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批准他告假一年的复函，就到达上海并准备到3个城市讲学。结果，杜威在中国逗留了2年，这是他在国外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在基南(Keenan)《杜威实验在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施瓦茨(Schwartz)写道：

“杜威与现代中国的交往，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历史中最为迷人的插曲之一。由杜威的中国信徒们，把他的思想应用到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去，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的一幅奇特的画面。”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每一篇讲演都被译成中文，并被辑成五大讲演集，其在杜威离华前已印刷十次。杜威一到中国后，发表了3天的公开演讲，与会的有1000多名中国有影响的教育家。几乎在杜威到达中国的同时，一场抗议中国政府腐败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爆发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和集中表现在它秘密接受了凡尔赛和约上签订的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款。正如基南指出的：“杜威和他的夫人在中国的整个期间，中国的情况是：大量的示威、罢课或罢工以及各界联合斗争席卷全国，知识界也参与了抗议运动。”

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的留学生，有许多人在1919年之前的十年中曾留学美国，其中有的人曾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赛泽(Sizer)指出，留学生们各自按他们所留学的国别为派系自行组织起来，“留美学生是为中国设想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留日学生是设想一个更为军国主义的政府；留

法学生较多地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团体及抱有不同理想的个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途径开始减少。”

留美学生日益相信教育作为进步和改革的工具的意义。对此,赛泽则断言:

“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一般都被赋予一种救世主的情感。他们觉得,正如在美国民主的社会模式中所体验到的和在美国教育实际中所认识到的那样,把教育的改革和民主的实现这两者结合为一体,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1919年邀请杜威访华,不仅是为了让杜威演讲他的哲学和提高他个人的权威,而且也是为了增强引起留学生充当领导者的信心和雄心。”

有几百种杂志刊载杜威的讲演,这种现象是新的民族运动的一部分。实用主义(在当时的中国通常译作“实验主义”),“成为一股与新的政治觉悟相应的政治和哲学争论中的有意义的思潮。”

杜威涉及实验方法和实验哲学的讲演里,一个有意义的部分集中在教育改革方面。他强调“知识领域里的破除传统权威的革命”;他强调儿童中心课程,即“摆脱强调教材的教室,转向强调儿童的生长”;他强调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的学校社会化的作用——“儿童的社会化不但应当给予他们对传统的批判态度,而且还应当发展他们对目前社会和政治状况批评判断。”因此,杜威认为时事问题应当纳入课程。

但结果是,如杜威1922年所写的:“在中国教育的革新和政治化的道路上,到处碰壁。”他看到了没有政治的改革就没有教育,只要腐败的政府反对学校和把教育经费移作他用,也就谈不上学校的发展。他看到这方面的“令人悲叹的重要资料。”基南觉察到:“改革或希望教育能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但在不民主的政治条件下,执意通过文化改革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已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

赛泽曾指出,除了运动中所包含的主要的语言改革(有时称作“文字改革”)有一些成效外,所采纳的“杜威的方法”还包括“幼稚园运动、女子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的‘专业化’、美国式的测验和管理实践,以及地方分权运动的

推广。”然而，在赛泽看来，杜威的学生们并没有创造性地、有效地翻译和发展杜威的哲学，或许因为杜威的光临和人们把他奉作导师“妨碍了灵活地、创新地对待他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是可能为中国文化所吸收的。”

1924年，土耳其教育部邀请杜威去考察他们的学校制度。杜威在土耳其度过了2个月时间，但正值学校放假期间。他在土耳其时，提交了初步的备忘录；在他回国后，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报告。杜威给土耳其教育部的报告强调把教育手段与教育目的联系起来有必要。他强调学校应当发展成为“社团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杜威提议，土耳其教育部派人到别的国家参观它们的教育制度，拟订所去的国家和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他建议翻译书籍，特别推荐“那些有关‘进步学校’的实际方法和设备的书籍，这些书籍应当‘广为介绍’和‘由教师仔细地研究’。”按照杜威所设想的美国的民主主义概念，他指出尽管土耳其应有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但它应当为多样化提供依据而不要划一化。杜威还建议，如果土耳其打算成为一个民主社会的话，一些学校应当组织学生政府的形式，应当摒弃“默写、专横统治和机械服从的方法”。

杜威访问土耳其时，学校正处假期，他只能依据土耳其教育的结构和一般趋势给予他的印象和信息。他给土耳其政府的报告，正如布里克曼所揭示的：“杜威力图以美国教育的实际去推动土耳其教育的改进，这是十分明显的。”20年后，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斯(Maxwell Hyslops)的研究指出：“今天土耳其教育组织的特征和目标证明了杜威的建议被土耳其人所接受的程度。”在《新共和》杂志中，刊载了杜威对土耳其的印象。

两年后，即1926年，墨西哥政府邀请杜威去讲演和参谋。当时，由于杜威以前的墨西哥学生用西班牙语翻译了杜威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他的观点早已为墨西哥所熟知。布里克曼指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无疑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政府、社会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改革。”

1928年夏，杜威随同一个由25位美国教育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次访问时间不到2周。在回国途中，杜威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印象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他对苏联是十分同情的，美国有几家报纸居然称他为“布尔什维克”。到1928年访苏时，杜威的名声已很好地树立了起来。实际上，他的事业的闻名以及他的著作被翻译是早在1907年的事情，

其标志是《学校与社会》一书的出版。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杜威的思想似已影响了俄国重要的教育家,例如,沙茨基(Stanislas Shatsky)和泽林柯(Alexander Zelenko)。沙茨基说:“1904 年,来自美国的新教育原则已传入莫斯科。这些原则的基本观点是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革。”关于 1928 年的访问,沙茨基回顾说:

“仔细考虑有关儿童兴趣和能力发展的方法时,我最大地得益于杜威的详细分析。他一贯主张的实际应用中应小心地验证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由于 1917 年的革命,苏联开始寻求完全重建教育体制的思想。罗森(Rosen)指出,紧跟革命而来的几年里,西方教育学观点受到迫切的追求和欢迎。

“部分地不仅因为要打破从前沙皇学校的权威主义的方法,而且还因为这些观点适合于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殊目的。这种目的,不在于使教室自由化,而在于破除由旧政府遗留下来的教师的权威,直至他们被可依赖的、理想中‘正统的’共产主义教师所替代。”

杜威的思想,诸如道尔顿和设计教学法,因为似乎能符合新的共产主义政体的政治目的而被接受了。罗森指出,在这一所谓的“实验时期”里,“强迫听课的现象和传统的普通课程减少了,测验、考试的次数和学生的年级压缩了,普通教育的质量非常之低,学生所发的‘疑问’是由教师供述的。”

据埃德蒙·金(Edmund King)的观点,苏联采取的做法反映了杜威和当代美国的教育方法是极受苏联教育者欢迎的:

“非正规的考试、课程和标准,这大概是由地方以‘生活调节’为理由所认可的。学生每年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升级,要求继续升学也是如此,不必达到预定的标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uis Strong)访问苏联后,1924年在她的《进步教育》一书中写道:

“早期苏联的教育改革按照杜威的教育观点所做的比之按照美国其他流派所做的要多。杜威的每一本新书都不被放过,并迫不及待地译成俄文作参考,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补充。”

在考察早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时,布里克曼发现,到了1924年,像沙茨基这样的一批教育家已成了党员并忠于共产主义,但沙茨基“继续利用杜威和其他进步教育的实际做法,去实现与杜威思想针锋相对的教条主义目的”。布里克曼写道:重要的教育家,如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平克维奇“钦佩杜威及他的观点……并写赞美的文章”。《苏联大百科全书》1931年版把杜威描绘成“一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并以很长的篇幅研究他的思想……

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就指出:“学校制度基本上不能保证国家迅速的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普通教育基础和读、写、算技能,教育制度的过火和明显缺陷,引起了调整的行动,即现在是结束‘实验时期’的时候了。”于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进步教育的做法被清除,杜威的显赫地位开始下降。布里克曼指出,1931年8月1日苏联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颁令学校必须做大量认真的工作,“因为设计教学法和其他‘进步’的程序在给予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以及为他们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而作好适当准备方面都已告失败。”到1932年秋,新的教育改革开始了:“取消了不分级制和设计教学法,恢复了教师行使处罚的传统职责,再度强调基础学科,非基础学科退居于次要位置,又开始举行年终笔试。”布里克曼称作的“对进步教育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36年7月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处理别的事情中决定,废止所有的智力测验和心理测量。

随之而来的是,消除了与进步教育和“实验时期”的活动有关的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教育家,包括教育人民委员。正如布里克曼所说:“杜威的名字对苏联教育学不再起重要的作用,杜威已无人问津,即使提到他,只不过是出于尊重而不赞同。”但一当杜威担任了对被驱逐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所受指控进

行调查的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时,情况就发生了迅速和剧烈的变化。1937年4月,杜威与委员会的其他5位成员到墨西哥去听取陈述;5月,杜威提出了初步报告。杜威任该委员会主席并宣告托洛茨基无罪,引起了一场对杜威的个人攻击。苏联教育家把杜威刻画成“一个反动派、华尔街的工具、劳动人民的敌人和战争贩子等”。1952年,杜威去世的那年,苏联学者谢伏金(Shevkin)在他所著的《为当代美国反动派效劳的杜威教育学》一书中,表达了“或许是对杜威最详尽、最尖刻的斥责”。布里克曼说:“谢伏金断言:杜威歪曲了关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科学概念”,杜威“不仅是美国人民的万恶敌人,而且是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仇敌。他关于世界、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观点的整个体系是为美帝国主义穷加辩护的。”1957年1月发表的苏维埃教育四十周年的纪念刊《苏维埃教育学》,就根本不再提及任何抨击杜威的事情,杜威的同事康茨(George S. Counts)遭到痛斥,“但是杜威简直像是不存在了”。

杜威著作的翻译

就苏联和中国的情况来说,杜威思想对其教育计划和教育实践的影响还是可以讲得清楚的。然而,在其他的国家里,这种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布里克曼曾这样写道:

“热情的人们声称20世纪教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都是由于杜威引起的;与此同时,诋毁者们都极度地贬低杜威的作用……在本文将要提到的36个国家中的大多数,由于对杜威著作的翻译和关于他的思想的讨论,杜威作为教育家的声望是很显赫的,可是,受到他的影响并因为他的哲学和实践而导致了变革的国家,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然而,毫无疑问,没有教育家、哲学家或学者能像杜威那样,有那么多著作被翻译出来,并被译成那么多种文字。翻译通常表明这本书很有意义,也就是译者相信其观点和内容会吸引广大的读者,同时读者也会反过来影响翻译工作。

杜威著作的翻译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汇编了从1900年

到 1967 年翻译杜威著作的文献目录, 编者是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的安德逊(Robert L. Anderson)和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在译作年表上, 1900 年出版有 2 本: 日文的《伦理批判大纲》和西班牙文的《学校与社会》。1966 年, 年表上列有 6 本译作: 旁遮普文的《伦理学》、中文的《现代世界中的智慧》、法文的《逻辑: 探究的理论》、阿拉伯文的《道德教育原则》、意大利文的《确实的寻求》以及日文的《教育科学的资源》。

译著计有 154 种, 可分为三大类: (1) 书、文章、小册子、专著和文集——67 种; (2) 首先以其他语种出版, 以后译成英文的著作——4 种; (3) 以其他语种出版, 未被译成英文的著作——79 种。翻译的语种达 35 种。表 1 列出一些杜威很重要的著作, 并将它们译成的语种一起列入表内。

表 1 杜威著作及其译本一览表

著作题目和出版年份	翻译种数	语 种
经验的艺术(1934)	4	阿拉伯、意大利、日、西班牙
儿童与课程(1902)	23	保加利亚(4)、汉、法、德、希伯来、匈牙利(2) 意大利、朝鲜、波兰(2)、葡萄牙(2)、罗马尼亚(2)、俄、西班牙(3)、瑞典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	25	阿拉伯、保加利亚、汉、捷克、德(2)、古吉拉特、希伯来、伊朗、意大利(2)、日(6)、朝鲜(2)、马拉萨、波兰、葡萄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西班牙、土耳其
伦理学(1908)	5	日(4)、乌尔都
伦理学: 道德生活的理论(1906)	6	印地、日、葡萄牙、旁遮普、西班牙、乌尔都
经验与教育(1938)	14	阿拉伯(2)、保加利亚(2)、汉(3)、法、德、希腊、希伯来、意大利(九次印刷并出第二版)、日、西班牙
自由与文化(1939)	19	阿拉伯、汉(2)、法、德、希腊、印地、意大利、日、加拿大、朝鲜、马来亚、葡萄牙、西班牙(2)、泰米尔、土耳其(2)

续表

著作题目和出版年份	翻译种数	语 种
我们怎样思维(1910)	15	保加利亚、汉、法、德、意、日、波兰、葡萄牙(2)、俄、西班牙(2)、土耳其
人性和行为(1922、1930)	16	阿拉伯、德、印地、意大利、日(4)、朝鲜(2)、土耳其(2)、西班牙(3)、瑞典
我的教育信条(1897)	21	阿拉伯、汉(2)、法(2)、德、希伯来、意大利(3)、日(2)、波兰、西班牙(8)
确定性的寻求(1929)	5	阿拉伯、希腊、意大利、日(2)、西班牙
哲学的改造(1920、1948)	24	阿拉伯、汉(2)、捷克、德、伊朗、意大利(4)、日(5)、朝鲜(3)、马来亚、葡萄牙(2)、西班牙(2)、泰米尔
学校与社会(1899、1900)	41	阿拉伯(2)、葡萄牙(2)、捷克、荷兰、法(3)、芬兰、德、希伯来、匈牙利、意大利(2,其中一种达21次印刷)、日(8)、朝鲜、拉脱维亚、波兰(2)、俄(4)、塞尔维亚、西班牙(2)、瑞典(4)、土耳其(2)
明日之学校(1915)	18	阿拉伯、保加利亚(3)、汉、捷克、法、日(2)、罗马尼亚、俄(3)、西班牙(3)、瑞典、土耳其

杜威的重要著作都被译成了意大利文,许多译本经过好几次印刷。《我的教育信条》由奥利瓦(Cuigi Oliva)译成意大利文,于1913年以单行本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杜威的最主要著作和他的许多文章已在意大利翻译出版,有许多重印了好多次。《学校与社会》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版是1949年,到1967年已经21次印刷。

关于杜威对意大利教育改革的影响,虽无英文的研究材料,但从翻译杜威的著作和一版再版、一印再印的事实,可以看出意大利对杜威的哲学观和对教育的意见也是有相当大的兴趣的。1980年10月,厄比诺(Urbino)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杜威的研讨会,其中有7篇是意大利学者准备的,3篇是美国学者准备的,1篇是西德学者准备的,与会的人提请继续关注杜威及其思想的研究。

1948年以色列建立前,杜威对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似乎也有影响。本特维奇(Bentwich)对以色列的劳工住宅区,如集体农庄或公社和合作社,作了如下描述:

“这些学校的课程是‘进步的’,它以设计教学法为基础,把手工劳动和活动方法放在显要的地位。那里有大量的儿童自治政府,学校与青年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理论是‘自由’教育是未来自由社会的基础。”

以色列的先驱教育家杜希金(Alexander M. Dushkin),曾随杜威学习从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博士学位。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教育学院称作“杜威教育学院”,或许这是世界上唯一用杜威命名的教育学院。

关于杜威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小林繁夫集中地作了深入研究。据报道,在日本,“至少有254篇文章和58本著作的题目上有杜威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出版了21种翻译的杜威著作。”小林繁夫在1964年的文章中写道:两年前一位日本报界人士说“没有人能否认近18年来杜威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巨大影响,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教育思想家”。1945—1957年的日本《教育百科全书》在“教育思想研究”栏下有176个条目,几乎一半(81)条目涉及杜威。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居第二位,但只有18个条目涉及他。1946年,纳加诺(Nagano)的《杜威哲学概要》出版,到1948年已是第16次印刷。小林繁夫提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行杜威学说的证据:统计了这方面书刊的销售,各种教育协会会议上研究杜威学说的论文,甚至有关纪念日等。

在小林繁夫看来,1919年杜威到日本两个半月的讲学,并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而他在此后的年代里发表的著作所传播的观点,却确实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威学说流行程度是令人惊奇的。小林繁夫指出:

“对一个在教育上长期只知道实用主义传统的亚洲国家来说,对杜威思想的热衷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学习进程中给儿童更大的自由,关于科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工业革命导致的急剧变化,在这些方面杜威是主要的发言人。而且,他也是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哲学的倡导人。在他的实

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哲学中,他把民主主义与教育理论结合了起来。”

小林繁夫强调,许多日本教育家都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时期的“新教育”是日本1912年到1926年间“新教育运动”的继续,这场运动是因为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出现而衰落的。虽然小林繁夫为杜威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作了有力的证明,但他表示:“没有周密的调查,要确定杜威对日本学校实际的作用是困难的。即使那些把占领时期所实行的教育改革看作是‘基于杜威的原则’的日本教育家,对于杜威思想已渗透到教室活动中去的程度,各人看法还是不同的。再说,‘杜威的探讨’重在态度而不是一系列教学程序,因此,直接观察和客观判断都是困难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之所以成为日本研究杜威的重要年代,大概有好几个原因。曾到美国学习过并对杜威研究有贡献的学者吸引着学生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小林繁夫指出,杜威以他民主主义哲学家的声望促进了人们对他的教育思想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日本的进步教育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杜威思想一度几乎使德国的教育学思想黯然失色。”那时,日本的教育改革是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作为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运动”,大约20世纪20年代为鼎盛时期,日本在那时已仿照美国和欧洲进步学校的模式建立了一些学校,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为日本教育工作者所喜欢。小林繁夫这样描绘那段历史:“几乎每个人都把时行的社会观具体化为他的教育理论,甚至于那些最顽固的教育家,虽然不讨论孔德的社会学或杜威的观点,但也不反对倡导‘民主主义’。”1927年,克伯屈(Kilpatrick)访问日本并介绍了设计教学法,而设计教学法是已注入了杜威思想的。克伯屈的讲演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收音机)拥有了广大的听众,他于1929年秋回国。克伯屈曾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弟子。据他1927年估计,包括他的美国弟子在内约有200人。

到30年代,日本的新教育改革运动濒于崩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处于“受敌视和受迫害的环节中”,进步学校“时常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体制的威胁”,以至于被迫修改自己的基本原则以图幸存。例如,学校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进步教育家们认为是“真正教育的一个主要障碍”的日本考试

制度,然而,极端国家主义分子加剧对此的压迫和控制,进步学校总是面临困难险阻。小林繁夫指出:

“它们面临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既要反对入学考试制度对课程的影响,又要帮助学生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更甚的是,它们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控制,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在决定它们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上,政府有时趋于把教师的自由囿有狭小的范围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迫使政府工作人员关心日本教育改革的计划,这个计划显示了“要让日本的教师、教育学者了解杜威的思想,了解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所流行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它显然把进步教育运动同“杜威教育”看作是一回事。占领时期,战前杜威哲学的积极分子东山再起,结果是引起了“杜威勃兴”。在战争结束与和平条约签署的8年间,至少有119种有关杜威的书籍和论文发表,翻译的杜威的著作达11种(包括新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学校与社会》)。1950年,日本首次翻译出版了杜威1938年的《经验与教育》,在这本书中杜威批评了进步教育过火的问题。

据小林繁夫说,许多日本教育家“注意到占领时期的教育政策不仅以进步教育为基础,而且也导源于杜威”。杜威在日本和在世界各国一样,被作为进步教育哲学家看待。小林繁夫指出:

“占领时期的教育改革政策并非有意识或审慎地以杜威为出发点,但计划的许多内容却似乎和杜威的理论相一致。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相信占领时期的政府对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意见是正确的。在社会研究的新课题中,引进了‘经验’和‘问题’的探究,美国人自己也认为这是与杜威的哲学紧密联系的,吸引了许多人去研究杜威。”

5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要素主义对实用主义的论战。然而,即使联邦教育恢复了要素主义的课程,杜威仍明显地支配着哲学研究。小林繁夫提到,有一位观察家说:“对杜威的表面的、时尚的兴趣已成为过去,因为杜威不再是新颖的了;然而仍保持着的是对他的哲学的更深入和更认真研究的兴趣。”

在许多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不是继续研究杜威,就是研究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反应。”在评价杜威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时,小林繁夫概括道:

“在了解日本现状时,今天尚有许多富有意义的杜威哲学的痕迹。人们正开始正确评价他对传统教育和社会哲学的批判。自从灾难深重的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知识界已表现出对民主主义更强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他们追求杜威的真谛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杜威是专心致志于为民主主义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的人。”

杜威的影响——一些结论性意见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一些正在经历迅速的社会或文化变化的国家,在设计它们的学校和教育制度方面,追寻并找到的作为学校改革的指导应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建议。杜威在中国度过的2年,是中国走向现代生活的关键时期。另外,杜威“还考察了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的教育机构,并且分析了他们在改造他们的传统教育制度中所作的努力”。

西多斯基曾经说过:

“尽管极权主义的崛起和两次世界大战给杜威对自由的乐观主义带来极大的失望,从战争结束到1952年去世这段时期的著作里,杜威继续坚持宣扬人类智慧的内在可能性。如果把智慧科学地用于解决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它将能使整个世界实现自由,实现更为民主的社会。”

1949年,布里克曼在评价作为教育家的杜威的世界地位时指出:

“无论右的还是左的……除了对杜威教育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加以责难,都承认这位伟大教育家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对他的成就的兴趣一直遍及世界,甚至在杜威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西多斯基认为,实用主义“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本土产生的第一次哲学思

想运动”，并且非常明显，“实用主义给杜威提供了一条哲学基本原理，即坚持采取科学的研究作为唯一的方法论使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情境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似乎引起了全世界知识界人士和教育家们的注意。杜威倡导用科学的方法去批判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的问题。

正如西多斯基所看到的，对美国教育的批判是杜威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也是他为重建诸如机会均等、结社和言论自由、教育的民主主义等准则而作的努力的出发点。他相信，对教育的改造能带来美国社会的繁荣。

在费瑟斯通(Featherstone)看来，杜威是一个指明主要问题的人，虽然他不一定总能解答这些问题。费瑟斯通说：

“我们也是以杜威那样的姿态奋斗着，因为整个文化所面临的教育和理论的课题，从很多方面讲，是在进步的时代(progressive era)里所规划的……进步教育的课程也是我们的课题：教育作为工作或工作的准备与教育的作用和内在价值之间的矛盾，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矛盾，机会均等与天才教育的矛盾，等等，这些至今仍是重要的课题……要问杜威是怎样认识民主、艺术、教育、浪漫主义的，就等于问我们自己应该怎样理解它们。要考虑杜威对美国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作何反应，也就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这一切就是杜威之所以会成为中心人物的原因。”

布里克曼于30年前所作的总结，今天看来还是恰如其分的。对全世界的教育家和知识界人士来说，“杜威被公认为当代努力争取更好的教育的主要代表。人们可以根本不接受杜威的意见，甚至可以在重要的观点上与他根本对立，但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杜威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和有意义的。这就是杜威在与国外同行们的关系中的地位，这就是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在世界上的声望——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教育家享有如此高的威望。”

(这篇文章是为出席1980年10月10—13日于意大利厄比诺大学举行的纪念杜威研讨会而准备的)

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①

[美] 约翰·杜威

一、列宁格勒给予的启示

圣彼得堡^②改名为列宁格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象征,但意味着什么,思想上还犹豫不定。有时,这似乎标志着一种无比的成就,一种灵魂的完全转生。在另一种场合,人们能想象这是一种尖锐的嘲讽。因为人们可以想象,现政权的敌人对于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以列宁的名字命名正感到恶意的满足。它的颓废的、几乎是腐朽的那种状况,在他们看来,对于布尔什维克^③所宣称的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和更为美好的世界,是一个适当的注解。但是,人们也有认为比彼得的名字更多的东西铭刻在这个城市上,而这是由彼得的坚强意志所唤起的。这个城市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说明了他的永无休止的创造力。也许,沙皇彼得,毕竟常常被称作第一个布尔什维克,而列宁是他的真正继承人。

无论如何,尽管这个邈远的城镇,它的灰泥的墙油漆剥落,是一件破烂的锦袍,但人们得到的印象却是有生气、有活力。人民走来走去,好像某些强大

① 译自:William W Brickman. John Dewey's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China-Turkey.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64: 44—112.

② 圣彼得堡的名称于1917年改为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为列宁格勒。——原编者注

③ “布尔什维克”(Bolshevik)一词源于俄文 bolshinstvo(多数),词根 bolshe(较大)。这个词形成于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英国伦敦开会时,分裂为列宁的拥护者(布尔什维克)和反对者(孟什维克),俄文 Меншевик由 Мензныиццо(“少数”)而来。1919年,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原编者注

的压力已经移掉,好像他们刚刚觉醒,意识到被释放的精力。我听说,当安纳托尔·法朗斯(Anatole France)访问俄国时,他拒绝收集统计、积累数据、调查“情况”,而在街上散步,从群众的姿态和面部表情来得出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城市,对刚刚看到的情况没有比较的标准。可是,人们曾见过其他国家的普通人民,我觉得不能相信那传送一个新生活的信息是一个幻想。我愿意相信我曾经读过的,说在俄国有大批男人和妇女生活在禁闭和受压迫的悲惨境遇中,正像有大批人在国外流放一样。但是,这另一批在路上行走的人,聚集在公园、俱乐部、剧院和时常出入的博物馆是一个现实,就像他们不屈服的和不辩解的态度也是一个现实一样。人们不得不认为,或许第一个现实属于过去,一个革命的偶发事件;而第二个现实属于现实和未来,革命的实质在于解放生命中的勇气、精力和信心。

在列宁格勒的最初日子里,新的印象使我眼花缭乱。适应是困难的,我生活得有点迷乱。但是,渐渐出现的一个明确的印象一直留在我心里,并且被随后的经验所证实。总的说来,我曾经听到太多关于共产主义、关于第三国际^①,却很少听到关于这次革命;听到太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最后成功正是由于他们的首创精神。现在,我体会,任何学历史的人都应当注意到,革命所解放的力量在任何精确的意义上并不是那些推动一连串事件发生的人们的努力,更不是他们的见解与希望的结果。对于了解俄国正在发生什么,没有应用这个明显的历史真理而感到生气,我应该对我误解别人受到责备——我埋怨那些信徒和颂扬者,以及那些评论家和敌人,我觉得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谈话和写作经常给了我错误的印象,使我对一个革命的基本事实陷于无知——人们可以得到暗示,而不必描述,称之为心理的和道德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是人民对生活的需要与可能的态度的一个革命。在这个反应里,我或许偏向于过低估计理论和期望的重要性,它们的作用是激发起解放受压迫的力量。试图怎样以共产主义的公式和布尔什维克理想的实际重要性来陈述在这个国家里的现实生活,我仍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更加重视心灵的革命、人民的解放以及革命力量的聚集。

^① 第三国际,也称共产主义国际或红色国际(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1943年5月公告解散。它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和推动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世界革命的机构。——原编者注

这种结论似乎是荒谬的。这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构成俄国革命的全部含义的人以及吸收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传统观念的人,肯定是要同样引起反感的。虽然我并不想贬低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我的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这些情况比起那些只能称做革命的事业来说是次要的。现在存在的情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向这方面过渡;在历史的辩证法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作用是消灭它自身;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是对存在于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的反命题;在一个新的综合命题下,它是注定要消亡的。这些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告诉我的。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过渡,事实如此明显,使得人们接受它并没有什么困难。到达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所描述的真正目标必须有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信条,面对已经激发起来的新生力量,会觉察到绝对论者的形而上学和过时的直线式的、片面的“进化”理论的陈腐气味。

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更生动的印象。自然,可以想象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可能是现在“过渡”的产物。它现在存在着的证据是微弱的。但是,强加于人的感觉是,如果它最后终于出现,并不是因为精心制作现在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式的缘故,而是因为有某种适应人民的东西,一个革命唤醒了他们,那它将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而出现。假如失败的话,那是因为革命所唤醒的精力是太自发了,不能使他们适应在切合需要的条件的基础上构成的公式——除非假定历史变化只有一条单一的和必需的“规律”。

无论如何,如果人们从列宁格勒的表面印象去判断情况只是一个起步,即使作为第一步也很难说是完善的,而是因为现在流行的经济从一切外表现象来看,明显是一种货币经济。我们常常思索,倘使我们到达列宁格勒时,对过去的事情一无所知,对它的经济情况没有事先的期望,我们会有什么观感。当然,头脑里不可能完全清除先前的偏见来回答这个疑问。但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我意识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个真正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差别的时候,经济情况看来和任何尚未从国际和国内战争封锁和灾荒的贫困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首先,就是一个贫困的印象,虽然还不是过于悲惨。多少有那么一种感觉,或许可以说,所有人都一样贫穷,好像只有共产主义才分享共同命运。但不需要很多时间,就可看出一些区别。人们从服装和姿态上便能识别至少有

四个阶级或许应当叫做等级,和人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中所见到的一样。不过差别并不如此明显,特别在奢侈生活和排场方面,各个阶级的相似多于人们能在纽约和伦敦所看到的情况。但是,在那里区别仍存在着。虽然看到在一些商店特别是食品商店门前,人们排着相当长的队伍,然而没有明显的苦恼迹象。人们营养不良,剧院、饭馆、公园和娱乐场所都挤满了人——价格并不便宜。商店的橱窗摆满了任何地方都看得到的同样货品,虽然通常是廉价市场的次品。这里和别处一样,在橱窗前面,儿童玩具以及廉价的珠宝之类,吸引着大群的人。在那里,有着货币——正如我曾经讲过的,从性质上,即使不是从数量上说,有着一种纯粹的货币经济——显然货币在照常流通。

我把自己限制在初期的印象里,至少限制在那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所加深和证实的印象里,也限制在那些来自直接的和表面的以及被疑问、解释和讨论所影响的印象里。后来,通过更为明确的询问所获得的专门知识,使早期的某些印象稍微得到了修正。这样,人们弄清了为什么人民花钱这样随便、用在娱乐上和用在必需品上一样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整个的政治措施反对个人的积蓄,因此,就把金钱看作直接的和现在的享乐手段,而不是看作将来行动的工具。同样地。当人们看到事物的外表下面,人们的最初印象认为这里的经济制度和任何其他贫困国家相似,就被这样的见解所修正:虽然这个制度明显地是资本主义的,可是它是政府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私人的资本主义。可是,这些随后的修正把印象转化为观念,却没有取消初期印象本身。对我来说,实际的结果是先人之见肯定有了转向。一个伟大的人类革命的意识已经出现在面前,这个革命意识已经带来了,或者毋宁说它常常就包含着在生命中激起的活力、勇气和信心。关于革命主要是经济和工业的这个想法在同样程度上已经退到次要的地位——并不是没有意义,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但它现在并不表现为人类的、心理的、革命的原因,而只是作为革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或许只是由于很不敏感,我在国内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回顾过去,用历史的眼光来判断,或许这正是人们应该盼望的。但因为高喊经济的重要性,像我曾讲过的,来自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拥护者和敌人双方可能迷惑了很多人,正像它确实迷惑过我一样,我几乎很难更好地把印象记录下来。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在俄罗斯的一场革命这个明显的事实,

正在以空前的规模解放人类的力量，这不仅对这个国家，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①

二、一个处于不断变动状态中的国家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试图谈一些我在列宁格勒所看到的俄国生活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总的感觉。为了分别记录这个或那个特殊接触所引起的观念或情绪，放弃企图传达一个单独总括的印象，应当说更容易些（或者说更有启发）。但是，这后者的任务的完成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事实上没有较长时期的停留、广泛的接触和语言的知识，因而很难获得准确的报道^②。你与之交谈得有多少，你就获得多少不同的观点，有些甚至想当然认为是事实。要不然，人们发现有些问题会以感到为难的方式而避开。因为某种理由，这后一个说法，在列宁格勒比在莫斯科的经验更为真实。某些事在前一城市只是一声耳语，而在后一个城市则是大声宣扬。回避的气氛改变为受欢迎的讨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过去冷酷无情的幕布仍然挂在一个城市里，而对未来的期望的力量却集中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例如，虽然人们主要关心的不在经济情况方面，但人们自然地在那方面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心，要提出一些问题。这里的许多商店售货给顾客，从全部外表看来，为了金钱和经济利益，像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商店一样。它们是怎样进货和经营的呢？多少个商店是属于政府的，多少个商店是合作经营的，合作事业与国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有多少私人企业？诚实的公共责任心是怎样获得的？在这方面，限制投机商诱惑的方法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看起来是自然的和单纯的。但不容易找到它们的答案，即使有了答案，彼此也不能很好地相符。有的部分，解说是过于简单的，我不向那些消息灵通

^① 从这些句子最初出现以来的评论，使我感到对这个革命经济方面的次要性讲得太彻底了。我不想否认这个经济革命的政治方面，在提高劳工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利益，从社会的底层到达顶层，是心理和道德转变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作者注

^② 在语言、居住和消息之外，人们也要在泛读和精读的基础上了解历史、文学和教育制度。——原编者注

人士求教,任何旅行家都知道在世界任何地方积聚错误消息是多么的容易^①。但是,与这个事实一起和在它的背后有个原因,在我看来,其一般意义是每个想作任何努力评价俄国事务的人应当知道并认真对待的。它的性质可以用一个答复来说明,这是最初常常给我的关于合作商店性质的答复,即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政府商店的别名罢了。后来,通过接近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我了解到和它的真相正好相反,合作社运动不仅从战前很有希望的开头增长了8倍,而且它的经营管理原来是自治的、典型的洛兹德尔(Rochdale)式^②。从某种观点来看,或许比我在访问中所接受的更重要。对今日俄国合作事业的发展与展望的一份报告,将比我所要讲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但是,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提到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经济情况。从我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中(各种相同经验表现成为典型的),我认识到关于苏维埃俄罗斯情况的每一个叙述给予一个准确的日期是必需的。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我得到的关于俄国合作事业情况的错误消息,不仅是忠实的报道,而且是根据几年前所获得的情况的回忆。因为有段时期,俄国的整个工业机构由于世界大战、封锁和内战而变得如此混乱,政府实际上接过了合作社的管理——即使在这个时期,知道后者在法律形式上依靠正式投票非常小心地捍卫它们的自治,好像这些是他们自己的独立决定,措施和办法是由政府强加给他们的,也是重要的——这种情况已不再存在了。相反地,自由和民主管理的合作运动有了一个新的活力——当然,仍由国家控制价格。但在那个时期形成的观念和信仰流行并坚持着。我要不是相信这个例子是典型的,我就不会这样长篇谈论它了。它之所以典型,因为大部分关于苏维埃俄罗斯过去的知识,事实上只是回忆在某个时候某些事件的情况。

关于俄国情况的每一个陈述,假如人们要有任何价值的准则,记下准确日期的必要性表明一个事实——或是一个力量——我认为,比大多数广泛传播的“事实”——即使它们是真正的事实——更重要得多。因为它们表明俄

① 预先做好准备和对国外观察、谈话进行仔细的分析,就能把错误消息减到最低限度。——原编者注

② 这只涉及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最后的物价管理当然在政府手中。——作者注

国正在不断变动和迅速变化,甚至动荡状态到了什么程度^①。假如我没有知道其他什么的,我会怀疑所有关于俄国的概括观点,即使它们符合1922年或1925年的事态,与1928年很少关联,到1933年时或许只有研究文物的意义了。在那个国家居住的外国人常常征询我的意见,俄国在一切内部问题和政策上过一天算一天,只是在外交上才有一致性和完整性。在那些同情者的口里,对俄国正在发生什么,有一个称赞的公式:不断变动正是那些管理事务的人对实际情况的需要有一种现实主义适应态度的标志。在不同情者的口里,就说成是统治者没有能力,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在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但是,变动的事实,无论好意或坏意的解释,它仍然是突出的,无可反驳。鉴于有关俄国事务僵化的流行见解(我承认在我访问之前也有这种看法),使我确信这个变化和不断变动的事实都需要尽可能给予强调。

当我的关于俄国事务僵化的先入之见被证明是一种最为违反事实的见解时,它不一定被广泛接受。但还有其他许多先入之见——我高兴地说,我并没有这些先入之见——在访问以后看来是更为荒唐的。其中一个是在访问前后常常提出的问题:你们一行人怎么敢去俄国?——似乎那里的生活是那样粗野、混乱和不安全的。人们犹豫着对一个有理解力的公众讲这个想法,但我发觉这种见解如此广泛流行。我确信,在俄国有守秩序的和安全的生活,将会遇到远远超过半数的欧洲和美国公众的怀疑。尽管有秘密警察、审问案件、逮捕和流放资本主义分子(nepmen)和富农(kulaks)^②、流放政敌——包括党内持异见分子,但是群众生活正常地、安全地和适当地进行着。假如我不怕引起反感的话,我可以提到在东欧别的国家旅行要更为烦扰得多。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表面的日常生活更为安定、更为安全。即使是“流

① 1927年12月,斯大林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流放到苏维埃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的阿尔玛·阿塔。当杜威访问俄罗斯时,农业集体化过程正在进行中。同年10月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第六次共产国际会议也在进行。这些是杜威可能考虑到的一些变动迹象。——原编者注

② nepmen(耐普曼)是利用新经济政策谋取暴利的私人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工业家。1921年,列宁宣布允许私人经营。1927年,这个制度被斯大林废除。kulak(意为俄文拳头的意思)是一个吝啬的、富裕的、利己主义的农民,他有自己的机器和雇工。1928—1929年,斯大林清除了这些富农。——原编者注

浪儿童”，他们曾构成了这么多故事的主题，现在已经从大城市的街头消失了^①。

回想起来，善意的朋友们常常给予的显得有点幽默的另一个警告，就是不要受被带去看展览的地方的愚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对于一个遥远的和陌生的国家的情况施展想象力是困难的；但现在看来，似乎不需要有很大的想象力就可以认识到俄国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有足够的事情要做，用不着为设立展览场所去感动几百或上千个旅游者而烦扰。供我们“参观”的地方和机构——列宁格勒对外文化关系协会(Leningrad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②准备了一个最有兴趣的游览程序——确实是在一定意义上很有展出价值的展览场所。我希望它们是其中最好的，以代表新政权正试图做些什么；每个地方都有足够多的平凡的成就，用不着旅行几千英里来看它。但是，它们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或者因为历史的条件，就像古老的宫殿和珍宝；或者因为现在的迫切需要，某些为工人假期而开设在涅瓦河中一个岛上的疗养地，有一种马马虎虎的样子；古老宫殿似的住宅，现在用作工人俱乐部，似乎没有特别活跃的作用。大加宣传的“墙报”，当翻译了它的内容时，似乎很像在别处较少炫耀的所谓布告牌。但这段插话仅仅是同其他机构的活跃和在儿童之家的那些墙报的自发的欢乐气氛相比较而言的^③。

谈到官方规定日程中所列的“参观项目”，其中一项使我永久不能忘怀

^① 这些“流浪儿童”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儿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尤其是1918—1921年的内战时期和1921—1922年的饥荒时期，离开他们父母的孤儿。这些儿童经常被青少年组成犯罪帮。“流浪儿童”总数估计有200万到700万人。一位苏维埃教育家、乌克兰的马克连柯(Anton S. Makarenko)在改造少年罪犯，给他们灌输社会公德和教育他们为一个集体社会着想而闻名。“流浪儿童”构成“苏维埃俄罗斯20年代中期的一个社会问题，直至政府对12岁以上儿童采用罪犯法”。见：Frederic Lilje. Anton Semyonovitch Makarenko: An Analysis of His Educational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Soviet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14——原编者注

^② 列宁格勒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是对外文化关系总会(简称VOKS)的一个分会，成立于1925年10月，是苏维埃生活、社会和文化的官方对外宣传机构。这个组织用几种文字发行许多出版物和定期刊物。根据1928年9月对外文化关系总会《新闻公报周刊》的一篇社论，对外文化关系总会的口号是“全世界知识界的力量为真正的世界文化的胜利联合起来”。引自：Ruch E. McMury, Muna Lee. The Cultural Approach: Another W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e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112. 1958年，对外文化关系总会改名为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关系协会。——原编者注

^③ 在学校中，墙报的一个作用是在维持纪律方面作为一个助手。它是由少先队组织选择一些儿童编辑的，一个学生思想不好就可能在一幅漫画里被讽刺或在其他方面被嘲弄。——原编者注

的,那是访问设在彼得霍夫过去一个大公爵的避暑公馆里的儿童教养所——在距列宁格勒不远的涅瓦河上游,这是白军(while armies)到过的离列宁格勒最近的地方。房屋有一部分在战争中被破坏了,还没有完全修复过来,因此,这工作就是要教师和儿童们来做的。有些宿舍里还没有热水供应,墙壁还需要粉刷。这里的儿童三分之二是过去从街上收容来的“流浪儿童”、孤儿、难童等。孤儿收容所的设置不足为奇,更谈不到难能可贵。我提到这个措施,并不是为了要证明布尔什维克政府如何特别关怀年轻一代。我的意思是拿它来说明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我用言词所能记述的。我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到过如此大量聪明、快乐而又灵巧工作的儿童。他们没有排起队来等候视察。我们走过几处场所,见到他们分别忙于各种夏季作业,例如,浇灌园地,整理蜂箱,修理房舍,在一座暖房里种植花卉(这暖房是一批当初见到什么就毁坏什么的特别顽劣的男孩建造的,现在由他们负责管理),制造各种简单的工具和家业用具,等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而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我无法将它表达出来。我缺乏表达所必需的文字技巧,可是,那种印象本身仍将永远留存下去。假定这些孩子来自境况最优裕的家庭,那场面也还是使人惊讶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考虑到他们那种简直不可想象的早年历史和生活背景,我就不禁对这些孩子的所有培养起来的才能表示深切的赞叹,并对这些孩子能完成的事情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我明白,在我这个结论的宽度和引出这结论的狭隘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但经验并不是孤立的。虽然以后所得到的印象不曾有那一次那么丰满,可是每到一少年儿童教育机构,我都是那样的感觉。同时,不管怎样,我觉得有必要维持这个结论:它那看来有些夸张的性质,至少可以证实我对于俄罗斯民族内在的能量,对于十月革命所产生的解放作用,对于我生平有幸遇见的某些最聪明、最忠诚男女在教育上利用革命后各种新条件的智慧和表示同情的技巧,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由于我只处理第一手的印象,而不处理系统调查得来的情况,我将选择两个别的印象来作结论,每个印象碰巧都在撇开官方向导出现的。在我的同

伴、美国教育家们^①到达列宁格勒之前有几天空闲的时间，消磨在哈密塔基^②（Hermitage，或译作行宫）。这个博物馆作为一个欧洲油画的宝库是不需要多说的。有许多参观者，成群的农民、工人，成年男女，最多的是青年，30~50人一队来参观，每队都有一个热心和机灵的领导。我们每天遇到这些队伍，20或30个不同的队伍。同样的事情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而且，这个经验并不是孤立的。在每个我们参观过的艺术、科学、历史的博物馆里，都同样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天，我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是否有革命的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过去不明白的，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变得几乎使我着了迷。在俄国或许最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归根结底，不是改造经济的努力，而是利用经济变革作为发展大众文化特别是一种世界上还从来不知道的美学文化的手段。

我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象这样一个陈述，会引起那些只听到布尔什维克破坏活动的人们的怀疑。但是，我应当忠实地记录在我自己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普通外国人的骚动或混乱的印象。这个新的教育斗争可能还不成功，它必须面临巨大的障碍，它被过多的宣传倾向所感染。但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些宣传倾向将随着苏维埃俄罗斯为创造自己自由和安全的命运，会因内容空洞而逐渐死亡。其主要的努力是宏伟的、崇高的，它表明对人类的本性的一个信仰，认为那是民主的，超出过去所向往的种种民主。

我要记录的另一个印象是来自对民众文化馆（House of Popular Cul-

① 杜威提及的到苏联旅行访问的25位教育家，是由美苏文化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Russia）组织的。据秘书布雷厄姆（Lucy Braham）小姐说，这个访苏旅行团“完全是非官方的、自费的”。1928年6月23日，乘坐“罗特尼戈姆号船”抵达瑞典哥德堡的团员有：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学校与社会》杂志编辑卡特尔（J. Mckeen Cattell）博士；前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科夫曼（Lotus D. Coffman）博士；卡利顿学院院长考林（Daniel J. Cowling）博士；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达根（Stephen P. Duggan）博士；布鲁克林工艺学院院长科尔比（Parke R. Kolbe）博士；十分熟悉俄罗斯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作家、教师库尼茨（Joshua Kunitz）博士；费城德雷克塞尔学院院长马西森（Kenneth G. Matheson）博士；阿默斯特学院名誉院长奥尔兹（George D. Olds）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教授、十分熟悉俄语言和俄罗斯教育史的教育史、比较教育学者伍迪（Thomas Woody）博士。其他团员代表着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界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杜威博士比其余团员先期抵达列宁格勒。参见：American Educators in Russia, School and Society, vol. 27. June 1928:779. ——原编者注

② 哈密塔基最初是作为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的一个宫殿而建造的。19世纪，它改建成一个博物馆，珍藏了精美的收藏品，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油画。——原编者注

ture)^①的非官方访问。这是在工厂区的一幢不错的新建筑,四周是娱乐广场,有一个很大的剧院,4间较小的会议厅,50间为俱乐部、开会、文娱和游戏、工会本部之用,花费200万卢布,白天或者毋宁说是夜晚——每天平均有5000人经常到这里来。或许这是由政府建筑和管理吧?不是,这是工会自己努力的结果。工人们抽出工资的2%,供应他们集体生活的这些设备。这个文化馆的工作和管理人员都由他们自己选举的职员承担。和我们自己的工人相对地不活动以及在我们自己国家类似的慈善性质的相同事业比较起来,会留下一个勤勉的印象。这是真的,这个文化馆——在列宁格勒也有类似的一个——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内在的和必要的联系^②。同样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大的现代工业中心都可能存在;但事实却是,同样的组织在别的更高度发展的工业中心并不存在。在列宁格勒有,而在芝加哥或纽约^③却没有。并且是存在于那样一个假定是在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受政府控制的社会里,作为有组织、自愿、主动和合作努力的活力的一个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我知道答案,那或许表明我对在苏维埃俄罗斯真正在进行的事情就开始有了了解。

三、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世界

在列宁格勒,常常会听到两个评论:一个是那个城市与其说是真正俄国的,倒不如说是欧洲的一个前哨;另一个是莫斯科是真正俄国和半东方的。我不应当冒险用我的简单经历来反对这些陈述,但说明一下在哪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可能有某些用处。如果说列宁格勒没有东方意味,但也很难使我看到是欧洲的;而今日的莫斯科至少显得过于西方化。对于第一个城市,它的

① 民众文化馆,通常包括图书馆在内。——原编者注

② 很可能杜威博士不熟悉文化馆的作用是作为对成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工具。据一位经常到苏联访问的人的说法,列宁格勒的威堡斯基区文化馆有“各种学习小组,包括党员以及政治和社会工作者的小组。”参见:Beatrice King. *Changing Ma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USSR*. New York: Viking, 1937:233. 莫斯科文化宫有一所工人夜校,在那里工厂工人能“在智力和艺术上发展自己的才能,从而帮助实现斯大林关于建立一支工人知识分子队伍的指示”。参见:Beatrice King. *Changing Man: The Education of the USSR*. New York: Viking, 1937:234. ——原编者注

③ 也许芝加哥的联合中心(The Amalgamated Center)应当除外。——作者注

建筑师实际上是从意大利来的，或许就是企图仿造一个欧洲城市。但实际上地方精神却进入了他们的头脑，而且控制了他们的手，他们建造了他们事前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而且，奇妙的位置，光彩的天空，无边无际的地平线，激荡和暴风雨的气候，没有使我想起从前知道的任何一点欧洲的情况。至于莫斯科，虽然它的自然结构有某些半东方的东西，东方人挤满了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但是，它的精神面貌和形态与动作缓慢和古老的东方是相距很远的。在精神和意向方面，莫斯科是新的、激动活跃和机敏灵活的。在我看来，比我们自己国家里的任何城市、甚至边境城镇更为新颖。

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个城市来说，前者仿佛是古老的。当然，历史并不是那样写着，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来写文章，就该是另外一种讲法。可是，如果我们同时看一看莫斯科，我们眼睛所接触到的和神经所感受到的，乃是一个不断运动着而没有一点休止，甚至可以说紧张的地方，使人觉得具有一种专心致志于未来世界的创造力。与此相反，列宁格勒则说明过去时代，甚至为往昔表示哀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那么一个传说，说访问美国的欧洲人常常是这样讲或者这样写的：这个国度上居住着一个年轻得出奇的民族，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又有年轻人的天真幼稚和缺乏经验。我从莫斯科所得到的印象正是这样，而且觉得在这一点上还远远超过我自己的国家。说实话，那里的生活充满着希望，充满着自信，几乎过分活跃，往往表现得很稚气，在某些事情上稚气得使人难以相信；有勇气大胆进取，因为这勇气是从年轻人的无知中产生的，不会由于旧时记忆太多发生惧怕而有所退缩。这个城市解脱了困惑于过去时代的包袱，仿佛怀着满腔热情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有一点却比拟不起来。除了奋发图强的锐气之外，对于已经着手的任务，又觉得困难重重（我说的仅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教育界领导人）。不能说他们沮丧，不过在表现出满怀希望的热情之外，他们还显得仿佛是受到了互相冲突的几股潮流的激荡，不敢断定是否能够到达已经在望的港口，或者遭到淹没。自发性和幽默感同原来就有的严肃性相结合，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结合在俄罗斯男女身上的确是留下痕迹的，他们肩负重任，通过教育的手段在俄罗斯人民中创造一种

新的精神面貌。^①

因此,我们在莫斯科的逗留,就是这样明显地不同于对列宁格勒的访问。在列宁格勒,我们多半是在最便利的条件下进行参观,让我们从自己观察到的和接触到的事物中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莫斯科不仅仅是个政治中心,它是将各种活力输入那横跨欧亚两洲的整个俄国的“心脏”。因此,到了莫斯科,在访问各种教育机构的过程中,我们感到简直像自己在这里也有一份,亲切地接触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参与到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世界。我们在列宁格勒曾看见许多过去时代的纪念物和当代的若干产品,现在则仿佛突然被引入到实际过程中来了。新的经验当然加深了我已记录下来的在列宁格勒的许多印象,同时对它也有所修改。加深的是我对十月革命解放出来的精神和活力的感觉;修改的是我对新政权正在努力使这种解放出来的精力用到有计划的建设工作上去的感觉。

我在这样写的时候,心里十分明白,对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这种有希望创造的想法,在那些七八年前已对苏俄固定了看法而不容改变的人们看来,一定是非常荒唐的。我对于我所见到的一切,当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那印象是突如其来的。最经常问我的问题(和在苏俄有无自由的问题连在一起),就是那里是否有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在进行。这个问题的流行,说明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破坏性的许多报道对民众的想象仍有很大影响。因此,对于见识到事态的不同面貌的人来说,也许要增加一份将那经历所产生的效果记述下来的责任。所以,在谈到建设工作有更积极意义的情况之前,可能还得说一说(实际上已有许多参观者说过了),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场革命的保存性,而不是破坏性。在英国,从亨利八世到我们这个时代,凡可从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行动联想起的破坏行为,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所见到的要多得多。我刚从英国旅行过来,对那地方所遭受的损毁和文化艺术上的破坏记忆犹新,因此,我常想,最好能将英、俄两国在革命运动中遭到破坏的艺术品和建筑物列出互相比较的清单,这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极其顽固的思想会有特别好处的(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都有这种思想)。致力于保存文化的一个确实标志,就是在苏俄看到的博物馆的大

^① 苏维埃教育的基本目的一直是——现在仍然是——造就新苏维埃人(New Soviet Man)。——原编者注

量增加和扩大。因为博物馆的建设和对历史文化及艺术珍宝的精心爱护,在破坏精神凌驾一切的地方是搞不起来的。现今仅在莫斯科一地,已有将近100所博物馆;就全国来看,在省一级的城市,博物馆的数量在现政权下增加5倍以上;而且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他们还相应地作了种种努力,便这些珍宝便于人民观赏和利用。

再说,同广泛流传的那种神话恰恰相反,这个保存文物的工作还包括东正教的许多教堂及其所有艺术物品。传说中关于布尔什维克反对教会和提倡无神论的话,都是十分确实的。但是,凡具有艺术价值的教堂和各种陈设物品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十分细致地甚至以科学的热情加以保护^①。有许多教堂已经改为博物馆^②了,这是确实的;不过显然还有不少教堂存在着,可以满足自称为信教者的需要。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许多博物馆对神像的大量收藏,足以使艺术爱好者觉得跋涉到这两个城市没有白费精力。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一项极为重要的修复工作时,专门请许多老艺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化学家前来帮助。确实是进行了“修复”,那种方法是在旧政权统治下使用过的,人们都很熟悉。例如。一些壁画上可爱的原始人图案,就请从事高级住宅油漆工作的“手艺人”涂上艳丽的油彩。这工作现在不做了。一些浮俗的装饰物,原本是配合迷信思想的东西,花钱太多而趣味又极可厌,现在都去除了。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说来,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尽管还有许多似乎更需要花钱、花时间的东西要做,但已使世界上一项伟大的历史纪念物恢复了本来的美感。

倘不是群众中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俄罗斯一味疯狂破坏,那么这类事情大概只要一笔带过就算了。可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类事情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们不仅象征着建设性的活动,而且也象征着方向。依我看来,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充满着审美性质的群众文化。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③就不是偶然的事情

① 显然,杜威博士对亵渎基督教教堂和犹太教教堂毫无所知。——原编者注

② 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列宁格勒的内夫斯基·普罗斯皮克特的卡赞圣母大教堂被改为宗教和无神论的历史博物馆。——原编者注

③ 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i, 1875—1933),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以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而著名。1917—1929年,他是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在革命时期,他因保护艺术杰作免受损坏而声誉卓著。——原编者注

了,他对于精心保护俄罗斯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宝是最有功绩的。在今天的整个世界上,许多进步学校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恢复对艺术作品的关心,包括文学、音乐、雕塑;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目前那样,美学的目标和性质在一切有关教育的事物上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墨西哥可能是例外^①。这一点,不仅渗透在俄国各类学校中,而且遍及于那种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而不得不称之为“成人教育”——这名称若从美国现有教育事业了解其含义,那就远远不足以表明在“破坏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度里,那种有组织的、极其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当前我们听到的一切有关俄国的先入之见,都带有一种特异的讽刺语调,而这种先入之见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上则是不知不觉地都会有一点。不过,若将普遍热衷于唯物主义经济制度那种流行观念同致力于生活艺术的创造和普遍参加艺术品的加工制作过程的许多具体事实拿来对照一下,也许会产生最强烈的讽刺意味。

也许我应当反复提醒读者,我是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写的。我以极大信心谈论俄国,只是根据从那个国度教育界领导人身上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中反映出来的生动活泼的意志和活力。读者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常常想起的一个问题:就整个苏维埃俄罗斯的精神和目标来说,我的这个从特殊事例所得到的印象究竟有多大的正确性呢?我直率地承认,我是从这个特殊的观点出发,在那精神和目标表现得最富建设性因而也是最完美和最动人的态势中加以认识的。不过,一方面我承认,这些特殊事例所构成的图画,比我们从研究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可能获得或实际获得的景象更为纯净、更为清楚;另一方面也必须说明,我确信从根本上说,这又是一幅更真实的图画。当然,我不可能引述足以使读者与我同样具有这个信念的客观例证。但我可以说明所持理由的本质,我就是根据这些理由在我的思想中逐渐形成这个信念的,即认为我们接触教育工作比接触某些政治情况和工业情况,能够更密切、更正确地了解新的俄罗斯生活的内在意义^②。

有些论点可归入否定的一类:与我个人从教育方面感觉的和看到的比较起来,我读过的用全部政治和经济观点写的书没有带给我一种真实感。有些

① 杜威1919年访问日本,美学在日本教育中的作用,没有给他一个持久的印象。——原编者注

② 杜威没有反对教育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1928年并不亚于1918年和1958年,共产主义者试图用教育去促进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目的。——原编者注

书所包含的很多情况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有些书是由通晓俄语并且有广泛的接触的人写的。这样，对某些重要事情的了解使我沉迷在宁可相信我自己的印象而不相信他们的报告，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再说一遍，其中有些人——故意伪造，也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讲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他们没有讲什么，他们遗漏了什么，而那些事情肯定是存在在那里的。结果，这些作品像是给我有某种空虚的感觉，一种由于对最重要事情缺乏感应的空虚。他们提供静止的断面，与运动隔离开来，但只有运动才具有意义。

这些议论无疑太模糊、太不明朗。参考一本特别的书可能会明确一些。我选择卡尔格伦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Bolshvist Russia)^①。对于作者的俄文能力或者他搜集资料的勤勉是没有疑问的，对他的目的的诚实我也提不出疑问，他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布尔什维克的原始资料中引用过来，这个事实保证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那么，为什么不接受他的几乎全部不利的结论呢？部分是因为这本书没有充分地注明材料的日期，它没有讲明所报告的坏事发生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但更大部分是因为我完全没有从这本书里得到这些事情的性质的认识，而这种性质是与这些事情有关联的。结果，承认一切可抱怨的坏事存在于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其中许多仍然存在着，总的作用却是死的、空虚的，缺乏重要的意义。举一个例子来说，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来源本身是为群众收集那些可咒骂的事。谈到这种材料的真实作用时，把它本身作为一堆完全孤立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自明的，那是一回事；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倾向的证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当人们寻求一些积极的和不同寻常的努力去搜集和出版这些有关材料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是通过一种深思熟虑和系统的努力去进行探讨和自我检查，那是在其他国家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接着，人们发现这个运动关联到对一个社会科学的现实性的信仰，作为为社会病态作出诊断和为建设性的改革提出规划的一个基础。人们可以相信所说的“科学”，但是不相信并不改变这个事实：人们从孤立的然而可靠的事实的报告中得到的只是一个死的和歪曲的观念，直至了解到这是与自我批评的思想运动有关系的，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安东·卡尔格伦(Anton Kalgren)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一书是由安娜·巴威尔(Anna Barwell)从瑞典文翻译的(New York: Macmillan, 1928)。卡尔格伦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斯拉夫语教授，曾访问过苏联，并写了一份批评尖锐的报告。——原编者注

可以认为这个思想运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将这个运动看作教育运动,其正面理由是:事实上,根据情况的需要,苏维埃领导人的中心问题是培养一种新的心理状态,用最常听见的三四个词中的一个来说,就是新的“意识形态”。坚持“经济决定论”的教条,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当前流行的一切思想和信仰,其内容和性质都决定于经济制度和经济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信条。但是,若说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不承认思想和信仰——即不承认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功效,不管其内容是什么,那也是不确实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原本是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到后来却又变成第二位的因素“交互地”发生作用。所以,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说,问题不仅在于要用集体主义经济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在于要用集体主义的心理代替“资产阶级”^①时代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心理——这种心理在多数农民和多数知识分子身上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如同在资产阶级身上一样。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运动乃是处在一种循环状态之中,不过它被官方描述为“辩证法”的一个例证。“最后的”群众意识形态将决定于共产主义制度;但在另一方面,引导这个制度取得成功,则有赖于创造一个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心理的能力。后面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显然就是一个教育问题。这说明各种教育措施对于现今俄国人民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衡量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时,我们又可将此作为一个具有极大透视力的放大镜,用以了解许多重大事件在建设性方面所体现的精神。

教育机构居于中心地位。在当前的“过渡”状态中,还可以随手举出一个例证,那就是到处都存在着宣传活动。不用说,目前这个时代,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宣传活动在那里起着政府权力的作用。不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现在的苏俄那样经常不断地、始终如一地、有条不紊地把宣传活动作为控制的工具。说实话,俄国的宣传活动已显出这样的重要性和社会威严,使得“宣传”这个词若翻成其他文字就很难表达出它的正确意义。我们是直觉地把宣传与完成某些特定目的联系在一起,这种特定目的总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关系着某个阶级或集体,相应地对他人就不能公开。可是,在俄国,宣传工作

^① 俄文的“资产阶级”,更经常是拼写为“buzhui”。——原编者注

却代表着强烈的群众信仰。人们可能认为那些领导人在信仰目标上完全错误,但他们的真诚态度却是不容置疑的。对他们来说,宣传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什么私人或者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此,宣传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宣传。两者不仅是混合的,而且是同一的^①。

由此可见,当我谈到教育机构的时候,我所指的范围较之学校制度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关于俄国现行学校制度,我希望以后再写。在这里,我只把它作为例证的一部分,用以说明当前——或者“过渡时期的”俄国的主要建设工作,从其内在意义上来讲,都是教育性质的。在这个特殊方面,学校工作的意义可以用我们时常听到的几句话加以表达:“旧的一代就其整体来说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被旧的制度凝固了,我们只能等待他们去世。我们的真正希望在于年轻一代。”可是,学校在创造新的“意识形态”中所担负的任务,不能孤立地加以理解,它是“交互地”发生作用的一部分。在当前时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和措施,其本身实质上都是具有教育作用的。这些变化和措施不仅设想为给将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准备外部条件,并且还设想为创造一种有利于集体主义心理的气氛和环境。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含义,主要还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尽管在学校中这样的办法用得很多——而是依靠对人民群众进行实际工作,使他们在生活上获得解放,给予他们稳定感和安全感,让他们有机会享受娱乐、休闲以及各种各样新的艺术欣赏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我们看到,最有效的宣传活动,即作为最有效的教育工作,乃是以实际行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使之更充实和更丰富,同时将这种种好处尽可能紧密地同“集体主义的”心理结合起来。

综合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地所获得的印象的差别,也许最好是这样的说法:在莫斯科,将当前作为“过渡时期”来看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直率地说,当我离开列宁格勒时,我感到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而共产主义并不是成功的。我在莫斯科的经验,并没有改变后面这一点印象,使我能够相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在这里实际上比我所意想的稍多一些。可是,那些经验却使我相信,这里正在投入十分巨大的建设力量,用以创造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心理。我应当称之为新的品德,因为苏维埃领导人不喜欢使用一切道德术

^① 把教育和宣传等同起来是一个重要观点,它并不是其他访问者常常体会的。——原编者注

语。那些经验还使我相信,这个努力正在切实地取得极大的成功——成功到什么地步,当然我是无法估量的。

如上所述,“过渡”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实在的。可是,向哪里过渡,对我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那个目标当然是明确的,就是实现他那特有的历史哲学所要求的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深深感到创造一种属于合作性质社会类型的新的心理和新的品德的努力获得的成绩越大,则这种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将是怎样一个性质就越不容易辨识明确。因为我完全倾向于这个信念:这种新的心理状态,就其确实是新的和革命性的程度来看,必将按照它自身的要求和目的创造它自己的未来社会。这个未来社会无疑将与私人资本和个人利益的西方世界大不相同。不过,我以为,这个未来的社会可能同样不会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所要求的那样的社会^①。

我希望自己所用的语气能够清楚表明我是在谈印象,而不是用可以提供一切客观证据的方法在谈问题^②。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意识到,我可能对自己个人印象的价值和效力估计得过高了,高过别人可能对我的期望。可是,即使我那许多印象不仅不恰当(这一点肯定是难免的),而且还十分错误,我仍感到有必要将我在参观莫斯科时所得到的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印象记述下来: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词语去把握它的终极意义,这个终极意义是要从一个民族在心理状态和道德表现上的极其重要的变化中、从一场教育改造中才能见到的^③。这个印象同热心拥护和竭力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两种人所具有的信念,恐怕都相距很远。但我心里铭记着这个印象,必须如实地将它写出来。

① 这对以后的发展是一个最有趣的预言。——原编者注

② 在杜威的第二篇文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学会极大地怀疑所有关于俄罗斯的概括性观点”。尽管他在后面的两句话里保留了他个人的印象,但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俄罗斯的概括性观点”。——原编者注

③ 杜威博士在这里显然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他撇开了他坚信的“宣传即教育,教育即宣传”的观点,而得出了这个结论。例如,扫除文盲是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根据金夫人(Mrs King)的看法,五年计划“不仅是工业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经济的需要影响了文化目的”。教育变革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是携手并进的。——原编者注

四、俄国的学校正在做什么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谈了几点理由,说明我为什么相信在俄国的“过渡”状态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当前正发生着的心理和道德上的变化;我为什么还相信,尽管这个变化到最后大概将成为引起经济和政治变化的一种手段,但就目前来说却是处于相反的关系。这个想法等于说,一切制度的意义都属于广义的教育——这就是它们对于气质和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它们的作用是使人们养成乐意地合作行动和集体行动的习惯,正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按照“个人主义”行动那样。对于狭义的教育机构,即各类学校的重要性的目的,也是从这个考虑来制定的。学校乃是一个直接地、集中地致力于获得效果的场所,其他机构则是用分散和迂回的方式来进行的。按照流行的用语来说,学校就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武器”。因此,学校的活动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从管理组织以及精神和目的两个方面楔入到其他一切社会机构和社会事业。

在苏维埃教育家心中,对于由家庭、工厂和政治机构培养气质和态度同由学校进行这项工作两者之间联系的看法,大概可以用一位新的教育领导人就他自己如何进行工作所说的话来加以说明。这位新的教育领导人参加教育改革^①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②,当时他和另一个俄国人(此人曾参加过纽约市大学的社会改革团体工作)共同在莫斯科工人住宅区领导一个社会改革团体。自然,他们进行的工作不带政治色彩,只举办一些儿童俱乐部、娱乐、体育等无关政治的活动。实际上,这就是在我们美国常见的纯属慈善性质组织

^① 在这些人中,第一位显然是沙茨基(Stanislav Teofilovich Shatskii, 1878—1953)。他与曾居住在芝加哥的赫尔社区(Hull House)的建筑师泽林柯(Aleksander Ustinovich Zelenko, 1871—1953)一起,于1905年在莫斯科郊区的谢尔库沃建立了第一莫斯科住宅区(the First Moscow Settlement)。1907年,这个住宅区刚刚建立的实验学校就被沙皇下令关闭,沙茨基和泽林柯因“试图在幼儿们的心灵中传播社会主义”而被捕。见:Lucy L. W. Wilson. *The New Schools of New Russia*. New York: Vanguard, 1928: 14。沙茨基是一个杜威的仰慕者,在20世纪30年代清洗之前是主要的苏维埃教育家之一。随后几年,他的一些著作被重新出版,在这个意义上看来,他似乎已被恢复名誉。托马斯·伍迪在他的《新精神:新人?》(New Mind: New Me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一书中,曾经详细叙述了他曾采访过的沙茨基的思想、工作和影响。——原编者注

^② 指20世纪初。——编译者注

的那些活动。即使如此,他们也还是遇到旧政权的不断反对和干扰。举例来说,讲述这个故事的教育家是最先把足球介绍到俄国的一个人,结果竟因此事在监狱里被关了几个月。因为当权者相信踢足球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训练青年人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投掷炸弹!附带说一句,广泛开展竞技活动和球类比赛是当前俄国社会生活中很突出的一点。例如,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观看了农业人民委员会养马部门主办的跑马比赛,还有一场足球比赛,每场比赛都有观众 1.5~2 万人。1911 年,为了扩大活动的范围,他得到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俄国富人的资助,在离莫斯科大约 80 或 100 英里的地方,开办了一个教育实验站^①。我听别人说,这个教育实验室是综合托尔斯泰^②译述的卢梭的自由学说和美国传去的那种重视生产工作教育价值的思想作为依据而开办的。

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在指出现今苏维埃教育制度中某些因素方面,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含义的。但是,它的主要价值还要看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要看既定权威的不断反对,以至在教育改革和工人状况改善方面的最温和的和非政治的努力对于教育改革家们心理上的影响。我所讲的教育家开始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改革家,不是一个激进派,而是一个立宪的民主派。他满怀着信念和希望进行工作,认为学校通过提供一种新型的教育,可以平静地和逐渐地在其他机构里引起所需要的变化。他的《天路历程》^③描写了从一个改良主义的学究式的教师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④对整个苏维埃教育运动的社会方面提供了一个例证。首先,有个明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那就是,沙皇政权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所阻止的那些改革和进步的努力,布尔什维克政权却积

① 1911 年,一个儿童夏令营在莫洛佐夫(Morozov)家族的一个成员在卡卢斯基·古贝尼耶地区的一个避暑山庄开设。沙茨基指导这个夏令营,并在那里发展成为欢乐生活的居住区,还附有一所实验中学。——原编者

② 注托尔斯泰(Leo N. Tolstoi, 1828—1910)伯爵 1859 年为农民儿童开办了一所按照进步教育路线的自由的初等学校。1862 年,这所学校被沙皇下令关闭。——原编者注

③ 《天路历程》,17 世纪英国作家班扬(John Bunyan)的宗教寓言小说,表现一个善良的人一生所走过的圣洁道路。——编译者注

④ 1926 年,沙茨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苏维埃教育史学家把他加入共产党称为“无疑是当时苏维埃教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参见:Sergius Hessen and Nikolaus Hans. Fünfzehn Jahres des Sowjetschulwesens. Langensalza; Beltz, 1933; 190. 当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苏维埃教育转向右倾时,沙茨基的思想遭到摒弃,与他的同事、教育家和共产党员布隆斯基(Pavel P. Blonskii)、平克维奇(Albert P. Pinkevich)以及卢那察尔斯基一样。——原编者注

极地加以促进。这个事实肯定影响了很多自由的知识分子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合作。其中一个人(不是党员)告诉我,他认为那些知识分子无论在那里都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是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使俄国在它最需要的时候失去帮助。就他本身说,他发觉现政府正在为旧政权时他内心想干的事业扫清道路,那时一切进步常常因被反对而变得毫无希望。而且,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发觉他的建议甚至他的批评,只要当局一认识到他是真诚的和试图合作的,就会受到欢迎。我可以补充说,尽管我的经验是有限的,但我看到自由的知识分子既谈论他们不满的政策,也谈论他们赞赏的政策。比起第一个来,世界上再没有更不幸和更没价值的阶级了。比起第二个来,再没有更充满生气和更快乐的阶级了——尽管经济情况、居住地方、工资等受到严密的限制。

这第一个考虑,在旧政权下与在苏维埃政府下社会所向往的前途和命运之间几乎不能想象的差别,至少在我对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先前的估计里是没有给予适当重视的。我猜想,有许多人,当他们意识到沙皇政府的压制和专横的性质,在把现在的俄国制度与一个想象的民主制度对比起来时,就不自觉地形成他们对现在的俄国制度的评价。他们忘记了对于俄国千百万群众来说,他们只是同他们已经有过实际经验的制度来对比。现在的俄国制度同那种人民已习惯了多少世纪的制度类似,即个人统治制度;像旧制度一样,它有很多压制的特性。但从群众经验中可能看到的唯一途径来看,这个政府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而这在过去是关闭的和拴住的;同样有兴趣的是,这个政府给予他们接近快乐的源泉,而他们熟悉的另一个政府只是把他们放在灾难之中。正是这个事实,而不是特务和警察的监视(无论后者可能怎样过分),说明现政府的稳定,尽管在国内共产党员的数量是比较少的。认为只要从外部进行全面的封锁和隔离,现政府必然就会由于国内原因而崩溃,基于这种观念的对待苏俄的政策纯粹属于幻想。在巴黎的侨民出版了五六种俄文日报,其中三种日报专门鼓吹复辟君主政体^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比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那些孤立的团体可能生活在怎样的幻想状态之中。

^① 此外,侨民也出版了教育著作,以及米留科夫(Pavel N. Milyukov)的不朽著作《关于俄罗斯文化史的评论》(Ocherki Poistorii Russkoi Kulturi, 1931),部分内容已译成英文《俄罗斯文化纲要》三卷本(Outlines of Russia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2)。——原编者注

我把话讲到题外去了,由于在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鼓励和关怀下^①,进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有了惊人的发展,这就自然地使人谈到那些事情——而且我是讲亲眼看到的而不是仅凭耳闻的事情。不过,对这位教育家的转变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因素(他的历史我认为是典型性的和象征性的),使我们脱出改革思想和进步思想的范围而进入真正共产主义的领域。我相信,每个共产主义教育家必将强调这个因素,而不是强调我刚才所谈的那个因素。在这位教育改革者从教育学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经历中,经济情况妨碍教育目标较之政治上和政府机构的明显反对,其影响要大得多。事实上,他是仅仅将后者视作前者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提出的。依他所说,教育有大小两种。小的一种是学校所提供的;大的一种,即具有最后影响力的教育,是各种实际生活条件,特别是家庭和周围环境条件所提供的。根据他自己所述的经验,这位教育家发现,他在学校内所做的工作,即使是在他的实验学校那种相对来说十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作,也被环境造成气质和心理习惯的教育——或反教育——取消掉了。因此,他深信,如果要使进步性学校的目标不是经常被破坏和被分散,那就必须使社会教育事业与它共同工作,两者必须配合一致、相互补充。随着这个信念的发展,他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想通过学校机构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工作,对这个工作进行破坏的主要力量正是私有财产、利润和聚敛制度所培养的那些利己主义和个人私有的理念和方法。

这个故事因其具有典型的标志性而很有教育意义。如果加以引申,也可以谈到苏维埃学校实际活动的规定内容。因为从这位教育家的影响来说(这影响是很深远的),人们把教材、教法以及学校行政和训育工作的精神都看作为协调社会实际情况——要考虑到各地情况的不同——和学校各项活动的方法。我的参观时间不够长,即使篇幅允许,也不能将这个协调工作的组织和方法写出一篇恰当的报告来。不过,至少我可以将它的总的精神谈一谈。在整个过渡时期,学校不能指望那么大范围的教育用任何单一的、专注的方

^① 杜威没有能预见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1—1935年从“殷切关怀”的态度转变为颁布一系列法令,停止了“进步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参见:William W Brickman. *The Historical Setting after the Revolution*//George Z F Bereday, W W Brickman and Gerald H Read. *The Changing Soviet Schoo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71—73. ——原编者注

式创造出那种必不可少的集体思想和合作思想来。农民自古相传的风俗习惯、小块土地、三套式的耕作方法以及家庭和教会的影响,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在他们身上形成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城市工人尽管有较多的集体主义倾向,但他们的社会环境也还是从许多方面发生反集体的作用。因此,学校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对抗并改变那些至今仍很强烈的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势力,虽然从名义上说已经处在集体主义制度之下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们首先必须详细而精确地了解学生在家庭中受到哪些实际情况的影响^①,由此就可能根据学生的环境条件解释他在学校里的习惯和行为——而这个工作,还不仅仅是笼统地了解一下就行了,而要像一位高明的医生那样,根据病因正确地诊断他所审察的病情。因此,这位教育家把他的哲学称为“社会行为主义”^②。他所看见的任何事物,不管是耕作方法、农具、住宅建筑的风格、家庭工业、教堂房屋等,都使他寻求受到这些事物影响的人在其行为上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与此同时,这位教师每当在学生身上见到什么不良行为的时候,总要努力学会如何追寻其确切的社会原因。这样一个想法,虽然从理论上说来很有道理,可是实行起来,如不用一些技巧的话,那自然还是会落空的。我知道有一项教学方法上最有趣的创新,那就是他们研究出一个方法,能使教师发现校外生活影响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希望,比我有更多时间可用的人能在最近将这个方法详细介绍过来。在这里我只能说,这个方法包括若干工作项目,其中有关于历史和地理的讨论、笔试的题目、学生的作文,还有对全年家庭开支的详细研究。这个方法同任何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经济学说都没有什么关系,其所得出的结果已经显出了重大的教育价值,还可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新方法。

这样得来的关于家庭情况及其对行为的影响的知识(我还可以顺便说一句,依我看来,这个社会行为主义,更合理地说,比任何纯生理学的行为主义更有希望),乃是使学校能顺利地对付其所发现的不良情况和加强有力措施而采取各种方法的先行步骤。在这里,当然,是在这一点上,学校对社会的建设性工作刚刚开始起作用。关于这一点,以后我在谈到把“对社会有用”的工

① 这种知识作为控制家长的一种形式也是有用的。——原编者注

②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至今仍是苏维埃教育的基础。——原编者注

作那个观念作为判定“设计”价值高低的标准时,还要详细地谈一点——因为苏维埃教育正在全力推行“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①。不过,使人感到兴趣的是,除了这个方法的实际施行之外,还在于它体现了当前俄国关于教学法的教育理论上集中争论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仍有一个学派主张教育上的原理和原则可以从心理学和生物学引出——尽管引述马克思理论的分量正在掩盖其影响——又认为离开对于家庭和当地环境的具体了解,正确的教育方法也必然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我没有论述苏维埃学校实际上在做什么以及它们是怎样做的,却在某些一般性问题上费了太多的笔墨。那是因为,就俄国的整个形势来说,重要的是这些关于社会愿望和人们相互接触的一般性问题。苏维埃学校区别于其他国家制度和区别于外国进步学校的地方(很多地方和外国进步学校相同),正在于依据一个单一而又有综合性的社会目标有意识地控制每一项教育活动^②。正是这个依据,说明了我开头所讲的社会联系。这一点还可以用正统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学校活动和家庭关系来加以说明。彻底的集体主义者认为,传统的家庭是排他性的,实际上是和外界相隔离的,因此,是同真正的集体生活不能相容的。这个观点我们常有所闻,不需要再复述了。不过,除了常说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结婚和离婚的限制之外,家庭制度从间接方面受到的侵蚀多于从正面受到的攻击,它的那些历史性的(包括经济上和宗教上的)支持力量都减弱了。例如,由于世界大战,住宅的限制在俄国正在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更严重了^③,人们就有意地利用这一点,用以造成比家庭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同时切断与家庭的许多牵连。“团体”(gruppe)^④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字眼,而一切种类的集体组织的建立,都是不利于家庭单位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因此,凡是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于历史性的家庭制度没有很多感情瓜葛的人,都能看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种非常

① 沙茨基和其他苏维埃教育家使用“综合法”(complex method),这个方法实际上是设计教学法的一个变种。它与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教授的思想、杜威博士和其他欧美国家教育家的最重要的教育原理是有关联的。1931年,设计教学法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法令所废除。——原编者注

② 这是控制教育的方法。——原编者注

③ 在大城市里,虽然建设了新的住宅,但仍然存在住房严重短缺的情况。——原编者注

④ “gruppe”是德文,意指团体(group)。俄文的 gruppа 是由它而来的。——原编者注

有趣的社会学试验,试验结果可以有助于断定那维系传统的家庭关系的力量有多少属于内在的原因、有多少属于外部的原因;同时,还有助于断定那习惯形式的家庭,作为真正起到社会化作用的组织能有多少力量,作为培养非社会利益的场所又能起多大作用。

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学校在造成各种力量和因素中的作用,而这些力量和因素的自然结果是削弱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对于任何观察者来说,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每一个西方国家,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增加了,随之而起的至少是旧式家庭关系的松弛。在俄国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有计划地加速这一过程。例如,学校制度的最早一个阶段,以3至5岁的儿童为教育对象;在许多城市里,要求将儿童每天由它照管6个、8个以至10个小时,而其最后理想(虽然当前事实远不是那样)是要将这种办法普及全国并强迫实行。这种办法一经照办,那它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乃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目前即使在莫斯科也只有十分之一这样年龄的儿童进了这种学校。在教育儿童方面,侵犯家庭生活的事情也不是就此而止。现在正计划在乡间举办夏令营,类似我们为贫民区儿童举办的露天养育院,从这些称为“幼儿园”的全日制学校里过来的许多儿童可以在这里度过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有些夏令营已经开办起来了。我们参观过的那些夏令营,就其伙食、卫生、医疗措施以及日常营养来说,比任何地方的同类机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一类精心计划的机构是用来分解家庭生活的,那也未免有些过分^①。不用说,还有更突出的原因。这类机构是整个教育活动体系的一部分,苏维埃政府从这样的一系列活动中表现出它对劳动阶级的特别关心,借以赢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同时按照共产主义的教学计划的标准,提供一种以劳动为内容的实物教学。从这个方面,正如像从其他许多社会事业一样,人们获得这个印象,

^① 1956年2月,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需要寄宿学校。事实上,这些寄宿学校同年9月建立。有些非苏维埃教育家看到寄宿学校扩大后,就认为重新开始了一个减少或取消家庭教育影响的运动。在苏联,苏维埃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声称:“寄宿学校主要是为了那些儿童。他们的家长认为学校能比他们自己更好地教育儿童。”引自:Ina Schesinger. *Secondary Educati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Changing Soviet School*, 1960:208。也根据俄罗斯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寄宿学校研究室主任格默曼(V. Gmurman)1958年的一个陈述:“寄宿学校的存在不是摧毁而帮助苏维埃家庭。学校帮助家庭用工产主义道德品质培养他的儿童。很多家庭还没有处在一个高的文化水平上。”Ina Schesinger. *Secondary Educati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Changing Soviet School*, 1960:210。——原编者注

即苏维埃政府当局正以一种周密的、有计划的和全面的方式,试图预先阻止工业化的后果,这些后果在其他国家里已经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逐渐出现在社会上了。因为在任何西方国家,每个大工业中心都可以见到机械工业化的结果,实际上都将传统的家庭加以分解。从这个观点出发,俄国政府正在使用托儿所等方式^①,大规模地发展私人慈善机构在我国大城市中所办的事业。可是,即使作了这样的比较,有一点还是确实的,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为执行既定社会政策而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利用学校的惊人例证。这个政策包含着许多宣传成分,其中有好多是我个人觉得反感的。但是,不能放弃使青少年教育作为工具来实现某些社会目标的广泛努力,而一切对于深思熟虑的社会控制所做的努力都可归到宣传那一类。

关于苏维埃教育这一方面情况的介绍,引述列宁的一段话——已成为布尔什维克教育文献中一段经典的话作结束语,也许是适当的。因为依我看来,如果必要的话,为支持我关于学校在培养作为成功地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条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居于中心位置那种仿佛有点极端的论述,不妨引用一下官方的权威性言论。列宁说:“学校脱离生活、脱离政治,是谎言,是伪善。资产阶级社会盛行这个谎言,宣传学校在政治上是不偏不倚的,又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从而掩盖它利用学校作为政治工具的事实。我们必须将它所隐瞒的东西,就是学校的政治作用,公开宣扬出来。我们过去的斗争,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新一代的目标则远为复杂,那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②

^① 托儿所是照顾从3个月到3岁幼儿的保育室和保育学校。这些学前学校可以在工厂和集体农庄里找到,因而使母亲们可以出去工作,以提高国家工厂的产品。——原编者注

^② 列宁经常用这一措辞来表达他关于教育的基本思想。因此,1918年8月28日,他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我们说,我们的学校事业同样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我们公开声明,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参见: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XXIII, 1918—19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5: 215. 1919年1月18日,他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参见: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XXIII, 1918—19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5: 498——原编者注

五、新时代的新学校

学校要使学生联系社会生活,因而又要使教学内容和方法联系社会生活,而不是同社会生活相脱离,这个思想在教育理论上是我们所熟悉的。^①从某种形式来说,一切彻底的教育改革的企图都以这个思想为基础。因此,苏维埃教育的特点,并不在于使学校的活动和校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而是在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把教育体系组织起来这个事实。不是像我们美国那样仅有一些私人开办的少数零散的学校作为示例,而是由整个政权的势力和权威在后面支持着。为了使我自己对于那些教育界领导人如何和为何能在极少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开创出这类教育的一个实际工作范例的问题获得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结论: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将中心位置给予社会生活的经济和工业方面,而经济和工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教育改革家比较起来,十月革命就在这个事实上给予俄国教育改革家很大的便利。我不知道西方国家任何一个诚实的教育改革家有什么理由能够否认,在将他认为合适的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活动引入学校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个人竞争和谋求私人利益在我们经济生活上所起的作用。这个事实几乎使学校活动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必要离开与社会生活的接触和联系,而不是使学校活动组织起来以创造这些接触和联系。当前苏维埃教育形势足以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有在一个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中,教育改革家的理想才能适当地付诸实施^②。

在学校工作和校外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中,经济关系居于中心位置,这在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签署的正式文件中表述得很清楚。他写道:“当前社会教育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一般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根据劳动效率发展公有经济;(2)根据共产主义精神发展人口。”教育目标提出如下:“(1)普通文化与劳动效率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相结合;(2)按照各种

^① 它至少与塞内加(Seneca)所说的“不谈生活,谈学问”一样古老。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编译者注

^② 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原编者注

不同行业 and 不同条件培养工人,以满足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3)满足不同地区和各类工人的需要。”^①

像一切正式的声明那样,这些主张必须按照其付诸实行的具体措施来加以理解。从这样的说明可以看到,在上述三项目标中,将“普通文化与劳动效率相结合”放在培养工人以满足各项专业需要之前,要不然就显不出它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制度中,突出的一点也许在于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狭义的职业教育,即专业化工人的技术训练。恰恰相反,任何地方都将技术训练置于次要地位,从属于普通文化的需要,而普通文化本身原来就含有社会性工业的意义,也就是说,由此发现并发展各项能力,使得一个人能够以合作方式从事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对社会有用”的含义是广泛的,指的是一切能使人类生活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要理解学校工作从工业方面和一般社会活动互相联系的精神,最方便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把我们美国制造商协会对同一问题的说法拿过来,然后颠倒一下。专业技术的准备要到下一阶段在“技术学校”^②里才进行,而这种学校是要上了7年“统一劳动学校”^③之后方能进入的。这些技术学校称为“综合技术”学校^④,不过这个名称如果照普通英语的用法来加以理解,是会理解错误的。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个名称指的是学生个人可以选修许多技术科目中的任何一门的那种学校;而在俄国的制度中,学生在这种学校里不是接受“单一技术”训练,而是接受对于许多专门工业技术来说属于基础性质的知识技能。也就是说,即使在确定属于职业性质的学校里,对于某一特殊职业的专门训练,也要放在最后几年里才进行,即在打好一个普通技术和科学及社会知识基础之后。

就我所能断定的范围来说,对于工业教育采用这个广义的概念,同那适

① 杜威引文的来源可能是英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编者曾用德文版找出这段引文。在德文版中,公共教育有三个基本目标,杜威引证了两个作为“社会教育现有的主要问题”。杜威所说的三个“教育目的”是作为教育目的所依据的六项原则来叙述的。英文版看来更多是一种译述,而不是翻译。——原编者注

② 技术学校是中等学校,其目的是为学生在工艺、教学、护理等部门进行半专业性工作做准备。——原编者注

③ “统一学校”(Unified School)或“统一劳动学校”(Unified Labor School)是苏维埃学校最初的名称。学生能够在一个单一的教育机构中读完所有的年级。——原编者注

④ 综合技术训练可以追溯到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教育是心理的、生理的和综合技术训练的结合。——原编者注

合于按合作精神办事的社会的普通文化相一致,这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创局面的最初几年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进步教育理论的情况。这种进步教育理论有一条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参加生产劳动,从学生方面来说,乃是自我教育的主要刺激因素和向导,因为这种生产劳动是符合天性的或心理上的学习过程的;同时,由于社会生活中各项职业活动所起的作用,参加生产劳动又为学校联系社会生活提供了最直接的道路。俄国一部分自由派教育家在十月革命前已根据进步教育理论开办了一些私立实验学校。这个理论在教育哲学上是最进步的,也符合于俄国当时的需要。

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学校事业中,“劳动学校”的思想占据了绝对中心的位置。这个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认定生产劳动具有良好教育作用的同时,必须从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去理解它,并且把它作为创造新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作为适应现行经济制度的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因素仅在苏维埃教育发展的早期(即到1922年或1923年为止)发挥了作用。在这一时期,整个说来,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占据优势的。此后,从马克思学说的观点上发起了一反击,但这个反击并没有否定生产劳动在学校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概念。它只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工人的新地位来解释劳动观念,从而使这个思想具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形态。这个变化是逐渐形成的,即使现在也还没有完成过渡或融合。不过,这个变化的精神却在一位教育思想领导人的言语里表达得很清楚:“一所学校要成为真正的劳动学校,它必须能使学生了解并具有工人的意识形态——不管在乡村或在城市。”这里所说的工人,当然是指已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自觉意识到其地位与作用的工人。对于早期“资产阶级改革思想”,通过对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视而予以改造,因而继续并增强了早期那种注重学校与工业联系的一般思想。

这份报告必须限于若干一般原则的叙述。如果篇幅允许我叙述那使学校与按合作原则组织的社会联系起来的多方面线索,那么,就可以使这个骨架有血有肉。但我无法那样写,只能对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所起的解放学生态度的作用给予赞扬。我所遇见的学生都具有一种活力和一种对生活的信心——这是不能同单纯的自信相混淆的信心——由此使我获得平生最令人鼓舞的一个经验。他们的精神恰当地反映在一个14岁男孩子送我的一幅图

画背面的题词上。他的学校就是把刚才所说的把这种思想贯彻得最完全、最高明的若干学校之一。他的题词说：赠送这幅图画是为了使我记住这所“打开我的双眼的学校”。过去我从理论根据上对学校同社会生活相脱离而使普通学校陷入沉闷消极至何等程度的想法，以我在俄国学校所见到的反面情况，证明它是正确的。

在文化教育和工业教育之间建立联系，有三四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其中一个就是政府文件上提到的关于学校应将当地的条件与需要加以结合的问题。苏维埃教育并没有把教育上的统一与划一不变混淆起来；正相反，集中化的做法仅限于有关最后目标和最高精神的事情，而在细节上则是允许多样化的，或者是鼓励多样化的。每一个省都有它自己的实验学校，研究当地的各项资源、材料以及问题，使学校工作与之相适应，用以补充中央或联邦实验站的工作。政府规定采用方法的首要原则是：不论什么课题，学生的工作一律须从观察他们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开始。我所见到一个最好的供教学用的自然和社会资料博物馆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乡村，那里所陈列的东西是以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多次旅行采集的当地动物、植物、矿物等，以及当地古代风俗和历史的全部标本为基础组织起来的。

这个从最接近的环境开始联系社会生活的原则，可以从俄国少数民族——（大约有 50 个不同的民族）以最大规模进行的教育工作为例来说明，作为构成政治联盟因素的文化自治思想，在学校中已成为事实。十月革命前，许多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是没有学校的，很多甚至连文字也没有。经过大约 10 年时间，集中大批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努力——俄国在语言学上一直是力量雄厚的——所有各种民族语言都有了书面文字，用当地语言编写的课本也出版了，各种教材适合于当地环境和生产习惯，同时至少开始有了学校制度。撇开教育上的直接效果不谈，我还有这么一个看法，那就是从这些民族多数都持有非共产主义信仰这一点来看，苏维埃政权所特有的那种对于文化独立性的严密注意乃是它取得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个特点，即摆脱种族和肤色的偏见，则是布尔什维克在亚洲许多民族中进行宣传鼓动的一项最重要的资产。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对抗那种宣传的影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在和亚洲民族往来时放弃其优越感，由此驳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论点，即认为资本主义和帝

国主义的剥削与种族偏见互相结合而不可分,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它们,只有在俄国的支持下采用共产主义。

劳动在教育体制中的中心地位,这在选择和组织教材或课程内容上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原则在政府文件上被称为“综合制”。详细办法见一份教育期刊,但大体上,这个制度从消极一面来说,就是停止将教学内容分割成为若干孤立的“科目”,如同旧学校所规定的教学大纲那样,而从整个人类生活——包括同人类社会生活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自然界发现学习材料。用政府文件中的话来说:“整个教学大纲以学习人类的工作及其机构为基础,以学习这个工作在当地如何进行为出发点。”不过,对于后一点的考察,“需要求助于人类经验——就是书本,以便把地方的现象同本国的以及国际的工业生活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把这个关于教材的正确概念变成现实,教师们必须自己先当学生,因为他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观点来考虑传统教材。为使工作顺利,他们不得不既研究当地的环境,又熟悉中央政府的详细的经济计划。例如,在教育体制上对自然科学和我们称为自然研究的工作是赋予极大关注的。但是,根据指导原则,对于这一类材料决不可以作为孤立的东西单独进行学习,而是应当按照这一类材料实际上进入人类生活的方式,即人类为了社会目的在工业上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办法加以考虑。由于这个方式把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人类活动的方面,因而它增添了活力。除外,这个提供材料的方法又迫使教师们了解政府的计划^①——就是政府为以后若干年发展国家经济而拟定的详细设计。一位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教育家,见到这里的教师因参与祖国社会发展的计划工作的作用而增加了尊严,不免深深地羡慕。他免不了要问他自己:这样参与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是否只有在企业公营的国家才有可能,而在企业私营的国家则是办不到的。他对这个问题也许找不到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不断地在他的头脑里出现,对他必定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在美国有关苏维埃教育的文献中,“综合制”常常和我国所实行的“设计教学法”混为一谈。这两种教学法避免从孤立的科目的某些固定课文开始教

^①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The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的缩写和更为熟悉的名称。这个组织设立于1921年,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原编者注

学,而尽力使学生通过自身活动去接触社会生活或自然界的某些较为完整的部分,就这一点来说,那是有理由将两者看作一回事的。可是,全面地看来,这是错误的。其理由有两点:第一,综合法在组织上包含有一个统一的知识体制。正如上面已说的,它集中注意于学习人类所做的工作。一方面从这工作与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和能量的关系上去学习,另一方面从这工作与社会政治的历史和制度的关系上去学习。第二,从这一智育背景出发,其结果是,尽管苏维埃教育家们承认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最初是从美国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好处的,可是他们也批评我们学校中使用的许多“设计”是偶发的和琐碎的,因为这些“设计”与任何普遍的社会目标没有关系,完成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确定的社会效果。

在他们看来,一个教育“设计”乃是实现关于社会教材的某种“综合”或统一的整体的原则的手段。衡量其价值的标准,是它对某些“社会有用的工作”具有多大作用。具体的设计随城市或农村各种不同情况以及当地环境的特殊需要和不足之处而变化。一般说来,这些作用包括:改进健康卫生条件(在这一方面,当时正在积极开展一个运动,其中很多地方是以美国的方法作范本的);协助扫除文盲运动,给不识字者读书读报;帮助儿童搞俱乐部活动、组织旅行等;帮助未受教育的成年人了解当地苏维埃的各种政策,使他们能运用智力参与苏维埃的工作;参加共产主义宣传活动;还有,在工业生产方面,参加各式各样有利于改善经济条件的活动。例如,在我访问过的一所农村学校里,学生们进行着在传统学校中属于单独的植物学和昆虫学等科目的活动。他们在各种实验条件下,栽培花卉、粮食作物、水果等,观察各种害虫和益虫同它们的关系,再将观察结果告诉他们的父母和其他农民,分发改良品种,等等。任何一件事情,其目标都是要使工作最后归结到以某种实际行动参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即使仅仅叫幼儿拿几朵花给病人或给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有一所城市学校进行这个工作的时间最长。举例来说,我在那里见到许多有趣的图表,由此表明一个工人住宅区的许多家庭前后 10 年间由学校男女学生在各项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所造成的改变。

说到这里,再就苏维埃学校的管理和训育制度略谈几句,大概是顺理成章的。有一段时间,自由思想和学生管理的风气几乎趋于泛滥。但是现在,

“学生自治”^①的思想(这是政府计划的基本思想)显然是以积极的形式见之于行动的,因此,从整体说来,早期那种过分的现象如今已属于过去。刚才所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赖以促成自觉遵守纪律的学生组织尽可能不是为了“管理”学校而建立的,而是要从学校本身或周围环境所需要的某种工作方法的运用中成长起来。在这里,虽然发生在美国学校里的那种自治思想当初曾是诱导因素,可是最初在美国的做法也是受到批评的,认为它过分模仿成年人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从学生自己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因而是矫揉造作和徒具形式的。我想到其他许多国家流行的看法,它认为布尔维克俄国完全没有自由和完全不讲民主方法;但如果让任何有这种思想的人看见俄国学校的学生组织得比我们更为民主,同时注意到他们通过学校管理制度在接受一种训练,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和企业的自我指导工作,搞得比我们号称民主国家更有组织、更有条理,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那会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为求合乎公道,我在结束时应当讲明,这个我写得很不周全的教育制度,目前是质的存在重于量的存在。按照统计数字来说,这个教育制度的实现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我们看到战争、饥饿、贫困、按照相异思想和理想培养出来的教师等外在困难,以及从新的社会基础上创立并发展一种教育制度的内在困难,那我们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觉得惊讶了。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这种种困难,那么,我们倒会因已有的进步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个教育制度尽管实践范围有限,但不能作为纸上的东西来看待。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事业、一个自动的组织。一个美国访问者^②看到有那么多地方在创始时都是受了我们国家一些进步学校的启发,因而感到出于爱国心理的自豪,可是同时也感到自卑,并激励我们进行新的努力,因为这种思想在俄国的教育制度中比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使他不同意共产主义教育家们所作的那种断语,即认为自由教育家的进步理想只有在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经济革命的国度里才能实行,他也不得不在思想感情上进行一些必要而有益的反省。无论如何,假如他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完全一样,他会因

① “Auto-organization”,学生自治会,是由皮斯特拉克(Moisei M. Pistrak)这样的教育家在早期苏维埃教育中所采用的一个实验。——原编者注

② 这个“美国访问者”可能就是杜威博士本人。——原编者注

为现时使美国教师与俄国教育制度隔离的许多虚假报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而深感遗憾,而这个教育制度却是最完全地体现了我们那号称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因此,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比其他任何国家多得多的东西。过去,我不理解有些外国访问者,特别是法国人,说苏维埃俄罗斯过分热衷于把传统的欧洲文化“美国化”的批评,如今我懂得这个批评的道理了。

六、伟大的实验及其未来

致力于探索俄国的未来,总结个人对于俄国的印象,这是必要的。即使是鼓励我一直写到现在的那个信念,即在俄国变化的最有意义方面,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心理的和道德的,涉及对没有揭示出来的未来的一种展望。虽然那个信念的形成无疑是由于单方面同教育界人士的接触,尽管没有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接触,但它仍有着很好的权威性。列宁本人就表示过这样的见解,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的情况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变革。他说,“在革命发生之前,认为教育和自愿的合作化能有任何显著的成就,这是乌托邦。工人必须首先掌握政权,但当他们手里掌握了政权时,他们就认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个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以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的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他接着说,社会主义事业在当前从经济上讲,和提高合作化有同样意义,并且要加上那句重要的话:“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①

对同样的结果,更进一步的证据体现在我们有些人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②的一次会谈中。她是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个部门的领导人,自然是

① 见列宁著《论合作制》。——编译者注

② 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 1869—1939) 1898年与列宁结婚,是一位有影响的苏维埃教育家。见:凯洛夫(Kairov)和冈察洛夫(Goncharov)编著的《教育学词典》第1卷,第580—584页。——原编者注

一个具有巨大威望的人,考虑到她自己的地位,她的谈话对于学校的组织和行政问题保持异常的沉默。她所谈的是与人的生活有关的一类事情,这些事情是在她与儿童和妇女的接触中发生的,说明了她们希望得到教育,得到新的光明和生活——这引起了她的兴趣,这同她的那种几乎是家庭妇女型的鲜明的母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会谈结束时,克鲁普斯卡娅总结了现政权的任务:它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得到个人的文化教养。曾经发生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有待于实现的文化发展的手段和基础。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因为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一切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就不能实现。但是,经济的变化是为了能使每个人充分地分享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一切东西。

即使在经济形势上,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在智力和教育方面。从狭义上讲,确实是,没有在各方面即工业的和行政管理的熟练技术人员的准备,现在工业的结构和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威尔斯^①关于世界问题所说的话,对俄国来说特别正确,在教育和灾难——即工业崩溃^②之间有一个竞赛。从根本意义上讲,也确实是,没有群众的愿望和信念的改变,计划也是不能完成的。真的,在我看来,最简单的和最有帮助的方法是去观察俄国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把它看作在转变激励人类行为的动机上的一个巨大的心理实验。

自然,有两种观点。从这两种观点看,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因为它的结果是事前注定的,为私人获利的个人资本主义事业狂信者和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狂信者两者都事前有了准备好的答案。根据第一种观点,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按胡佛先生^③的话来说,它命定要产生一个“经济的真空”;根据后一种观点,行动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化,是社会“科学”明确知道的规律所起作用的绝对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犹如地心吸力的规律之于物理学一样。不是两者中任何一种类型的绝对主义者,我觉得,把这看作其结

① 赫伯特·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著名的幻想小说家、社会家、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920年,曾到苏联进行访问,会见了列宁。1934年,再度访问苏联。——编者注

② 赫伯特·G·胡佛(Herbert C. Hoover, 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届(1929—1932)总统。——编者注

③ “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在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个竞赛。”参见: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1949: 1198. ——原编者注

果尚未十分肯定的实验更有启发性。但是,无论如何,它恰恰是我们的地球上正在进行的一个最有趣的实验——尽管我要十分坦白地说,因为自私的原因,我宁愿看到它在俄国而不是在我自己的国家进行这个实验。

两种信念在它们教条的形式上都为一个目的服务。第一种信念——“个人主义的”哲学——使人能容忍现在制度中罪恶的东西。如果这是像人类本性一样的固定,并且如果人类本性是建筑在现有经济制度的形式上,那就只有尽我们所能予以忍受,别无其他办法。第二种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们信心和勇气,向这个制度挑战。但是,不顾双方的这些教条信仰,我应当说在俄国的实验有着两个目的。第一个和更直接的目的是看看人们是不是能够有这种安全保证,反对贫穷、疾病、年老,以及为了健康、娱乐、适度的物质安全和舒适,使他们不必为了纯粹的个人所得和积蓄而挣扎,简言之,不致被迫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就它今后的目标,这是一个实验,以发现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熟悉的民主理想——至少在字义上是熟悉的——是否将不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得到最完全的实现。这个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自愿合作化、联合的工人控制和管理工业、取消私有财产作为一个固定制度——自然,这与取消私人财物是稍有不同的——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个目的明显是经济的目的。但是,更进一步的意义是当为所有的人提供经济保障和工人控制了工业和政治时,那就有了使所有的人都自由地和充分地参加有文化教养的生活的机会。一个国家只为一种私有文化努力,而很多人因为经济压力而被排除在外,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国家,这是经常听到教育家和工人双方都讲的一个想法。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的先入之见——或者,假如你愿意,也可称为偏见,经历了最完全的颠倒。我有这样的见解,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规划。这个见解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给予经济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大声地自我宣称的“经济的唯物论”所培养起来的。因此,对我实际所发现的情况几乎毫无准备,也就是,至少在我接触的圈子里(无论如何,既包括一些工人,也包括一些教育家),“文化教养”的发展以及人人有可能分享其成果的实现是最显著的特征。最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社会主义者主要考虑改善工人的物质条件,好像从事一种公共的、有别于私人的慈善事业,以提高工

资、改善居住条件、减少劳动时间等。自然，现在俄国的政权，也从事这种事业，但它非常明确地考虑扩展和扩大实际生活的内容。确实，我不能感觉别的，而只能感到（虽然我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客观证据）外国访问者强调普遍的贫穷并把它作为预言现政权即将垮台的根据是错误的。首先，贫穷对群众来说只不过是历史的遗产，他们不再特别意识到这个特殊问题的苦恼；其次，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是那样献身于人道和道德的理想，想使自由文化教养得以普及，他们不介意这个问题，而且并不感到这是一种牺牲。

或许发现这种态度，我应当早有准备。这个运动在俄国本来是宗教的，那是我我经常听到的，并且我想我是了解和相信的。但当面对种种实际情况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完全没有了解它。对于这个缺点，就我所能找到的有两个原因——当然，我只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一个原因是以前从来没有证明一种广泛传播和动人的宗教事实，我无法知道它实际上将会是什么样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联系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观念，作为一个宗教，过多联系到理智方面的神学，即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主要内容，联系到它自称的经济的唯物论，而过少联系到使人感动的人类的愿望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我有点明白原始基督教的动人的精神和力量是什么样的。我甚至不愿去想那时候在人性上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新的信仰将在白日的光亮里褪色，变成俗套和流于形式。我完全有准备听到说我对这方面的情况过分夸张了；我有准备相信由于完全出乎预料的印象，我夸张了它的相对的重要性。但是，在进行这些考虑之后，我仍然确信，如果人们不考虑到这种宗教的热情，那就不能了解现在的运动。宣称信仰“唯物主义”的男男女女，事实上应当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但这表明一种活生生的信仰比试图用信条来表达它自己更为重要。理智的公式看来要受到责备，因为它们总有某些在感情上说是不相关的东西，它们是那样大地受到历史上偶然事件的影响。无论如何，我对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确实有着一定的羡慕，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和经济地位，而是因为一个统一的宗教社会信仰带来了生活上的单纯化和整体化。“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里有个任务，如果他们是忠诚的，那主要是批判性的；那些在俄国和新秩序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有个任务，那是总体的和建设性的，他们是正在有组织地进行运动的一些有组织的成员。

在苏维埃官方的神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从不正常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时人类发展可能性的现代宗教信仰之间,那种不一致的感觉是存在的。同样的不一致看来会伴随着此后进行的一切重要的运动。它们有它们的理智公式;但对后者的利用曾经为感情提供一个保护的外壳。任何对于俄国前途的预言,必须考虑在僵硬的教条的一方和实验的精神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说哪一方将获胜。但是,我只能设想俄国人民在他们的发展中,最后将通过一系列对种种实际情况的适应,在人类相互联合的形式上建立一些新的东西。认为这些在革命领导人的意识里将是共产主义的,我是怀疑的;认为它们将标志着具有高度自愿的合作以及对于资金的积累和运用的高度的社会控制,看来是可能的。就像基督教和民主的历史都曾显示的那样。然而,信条有一个广阔的道路,能使自己坚持和适应事实上的变化。因此,除非连续性有什么异常的中断,很可能,不管事实上结果是什么,仍将叫做共产主义,仍将被认为是它的创始者的信条的实现^①。

教育再一次为在苏维埃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实验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显著的例证材料。在距莫斯科不到 100 英里的地区,有一个相当典型的俄国北方农村。在那里有一个在沙茨基指导下的教育区。这个教育区是分布在一些村庄的 14 所学校的中心,它们在一起构成一个广泛的(也是集中的)教育实验站,为俄国农村制度提供各种材料和方法。据我知道,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相比。当夏令营正在举办的时候,我们满意地访问了这个教育实验站,而且也注意到在它的影响下的村庄的效果。在皮斯特拉克(Pistrak)^②的指导下,在莫斯科有一个类似的事业是研究市区工人问题的。由于正在假期,它是关闭的,因此,我缺少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它是积极地和成功地进行着的。此外,正如已经注意到的,每个省都有它自己的教育实验站,研究特殊的地方问题。这些事业是政府主管的,不仅是得到批准的,而且有着权威的声望。那里也存在一个最高的科学委员会,其中有一个教育处。这个科学委员会的职责一般是拟订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计划。这个

^① 杜威充分了解共产主义学说的灵活性,并且准确地预言苏维埃政策的之字形道路。——原编者注

^② 皮斯特拉克(Moisei Mikhailovich Pistrak, 1888—1940)是一位教育家,他在莫斯科的莱普辛斯基学校和社区进行指导工作,与沙茨基不同,他是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原编者注

计划具有灵活性,向前展望若干年,并包括根据不断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所确定的许多细节。关于这个事业,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用科学调节社会的成长。教育处作为科学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其职责是检查和审核正在开展的教育实验的结果,以提供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应用到国内的学校制度里去。沙茨基和皮斯特拉克两人都是这个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这保证教育实验站所得到的结论会受到充分的注意。

这件事情在这里讨论而不在理应归属的苏维埃教育里讨论,是为了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表明不管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是如何严格和教条的,其实践实际上是受灵活的、有生命力的和创造性的实验因素所影响的。在这一点上或许应该引用皮斯特拉克的话,因为他是一个严格的党员,这些话就显得更为重要。他说:“我们不能把同样的规则应用于每一所学校的状况,那样的程序将和我们学校的本质相违背。这对发挥教师在教育方面的创造才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个,就不可能创建新学校。认为教师是工匠而不是创造者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每一个人多少是个创造者,当一个人在孤立时对一个问题可能找不到创造性的解答,但在集体中我们都是创造者。”^①没有人会声称这种创造的理想现在已实现了,但也没有人在接触教育活动以后会不感到这种精神标志着俄国学校的领导人已达到了在别的国家所不知道的一个程度。在我的第一篇论文里,在同教育的努力没有任何紧密接触之前,我已接触到俄国情景的表面,写下了所得到的生气勃勃和解放的感觉。后来同教育方面的接触证实了这个表面印象,同时也留下一种感觉,即这个解放运动因为得到了加强和指导而有了一定的推动。

我不相信,任何个人对现在俄国运动成果的确切形式有任何重要性的专门猜测,因为在这个形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数。假使我大胆表示一个预测的倾向,那仅仅是作为唤起对两个已经在进行的运动的注意。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素是自愿合作化集体的成长。在正统的学说里,这在到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预定的目标的道路上形成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为什么手段不应当也是目标,为什么那个据说是过渡的阶段却标明着目标,对我来说是不明白的。关于农民在俄国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必要性,不

^① 这段引文可能由杜威博士进行过分析和评价。——原编者注

管这种考虑是不乐意的,也不顾官方对城市工厂工人的偏爱,而不断地对他们作出让步,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的结果,而是加强了合作化的可能的信念。和这个因素连在一起的,虽然是一种比较不重要的直接的实际力量,可是我应当提到教育制度的实验情况。当然,在学校里存在着大量的灌输和宣传。但倘使现存的趋势发展下去,看来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言,最后当合作化的思想得到发展时,这种灌输将服从于独立判断的主动性和力量的觉醒。一种在理智上是自由的教育将不会妨碍奴性地把教条作为教条来接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一直听到关于辩证的运动,由于它,一个运动最后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我想,学校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就是一个“辩证的”^①因素。

这些评论并没有贬低俄国革命运动的意义,在我的心里,毋宁说增加了它的意义,增加了世界其他地方研究它的需要。而且,没有实际的接触是不可能从事研究的。认为世界的六分之一能够永久地被孤立和“被隔离”,那是很荒谬的;而这个荒谬看法所起的作用的结果,更可能是悲剧的甚至是幽默的。但更为荒谬的是,认为一种活跃的思想已经以一种宗教的力量和特点抓住了一代人,能够被推向一边而加以忽视。这种企图,倘使加以坚持,那将增强它的破坏性,而无法获得可能积累的有它的建设性的认识的利益。就美国而言,政治上对俄国的承认不会走得这么远,以带来为了双方国家和世界的利益的那种关系,但这至少是必要的、先行的一步。我去俄国时对那个问题是没有信心的,除了认为对俄国的承认符合我们好的政治传统^②。在我离开时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保持那种障碍以阻止交往、认识和了解是近于违反人道的一种罪恶。

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情况,人们不能同情的是它注重阶级斗争和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必要性。这些苏维埃俄罗斯的特性趋向于退入幕后,因为当局受到压力而需要在俄国本身从事巨大而艰难的建设事业。但是,产生这些特性的精神被这样的信念所助长,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苏维埃俄罗斯敌人,因而它必须持久地保持防御,而最好的防御是积极的进攻。我并不认为,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自由交往,会立即消除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内

① 至于现在,杜威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原编者注

② 1933年,美国政府承认苏联。——原编者注

战的观念。但我相信,这种交往将逐渐夺取火焰的燃料,而火焰就将熄灭下去。

我不能不在结束前提及一点,那是和这总结的余下部分没有密切关联的。如我所说,在和平时期,第三国际对俄国比对其他国家的危害更多。但是,如果发生欧洲战争,我相信它将在每个欧洲国家作为一个现实波及生活。在我离开俄国时,对那些依然玩弄权术而引起战争的政客们犯罪的愚昧,有了一种比我以前有过的更强烈的感觉。有一个预言,我是愿意对它承担责任的。倘使有另外一次欧洲战争,在目前情况下,在每一个大陆国家,内战将加上国外战争的恐怖,那欧洲每个首都都将成为一个杀戮场,超过革命时期里最可怕的恐怖。

美国教育家杜威在我们苏联作客^①

[苏] 斯坦尼斯拉夫·T·沙茨基

7月初^②，我同以约翰·杜威为首的美国教育家们一起度过了整整5天时间。

这次会晤早就吸引了我。且不说杜威教授现在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都是一位最有声望的现代教育思想家，单就在教育事业上的两种社会生活极不相同的代表们的会晤来说，其本身就是非常吸引人的。

为了避免在会见时的一切官方调子，创造一条比较坦率交换意见的途径，我和同志们决定邀请少数美国教育家(10人)与我们一起在莫斯科度过一个夜晚，随便交谈，交流客人们对已在苏联看到的事情的一些印象，并约定以后几次的会见。

在与美国人一起喝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一些拘谨的、朴实的和容易相处的人，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研究着一个对他们来说是新的环境。

除了茶点之外，我们还请他们欣赏音乐。莫斯科的一位著名钢琴家为他们弹奏了几首乐曲，我则应邀唱了几首俄罗斯民歌和抒情歌曲。两位接近老年的美国女教师要求我唱《国际歌》。她们说：“因为它被禁止公开演唱，所以在美国听不到这首歌曲。”但是，她们听说这是一首如此有力的曲子，想必就是因为它能造成那种强烈印象才被禁止的。我答应了她们的请求，就与钢琴伴奏者约好，决定用我所能唱上去的最高音唱《国际歌》。我开始演唱《国际歌》，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首极有力量的歌曲，我和伴奏者为此很受鼓舞。在听完三段歌词之后，美国人就站起来向我们俩走来，并说他们还从来没有听到

① 译自：Станслав Т. Шацкий. Шац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3). Москва, 1964:206—214. 曹妙贞译。

② 1928年。——编译者注

过比这更有力、更能激励人的演唱。因此，一位老年女教师补充说：“我们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在我们国家里禁止演唱这首歌。”我们大笑起来，并就这个问题开起了玩笑。

我们与美国人的下一次会见，是在实验站的教育陈列馆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作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学校基本任务的报告，由亚·乌·泽林柯出色地译成英文。报告之后，美国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很有趣。有一位老年女教师问：“您真的对你们的孩子说打仗不好吗？”原来这位教师是个和平主义者。当我回答说，我们那些发达的邻国正在加紧武装，迫使我们更多地考虑防御。她不满地反驳说：“每个想证明自己的武装是正确的国家都这样说。”我解释说：“是的。但是，在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我们这里，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阶级，我们努力使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发达的民族加在他们头上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不想征服任何人。”对此，她回答说，任何国家都不像你们那样多地考虑到战争。

另一位教授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组织学校的社会工作时，我们采用什么测验方式来使它经受科学的测定。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在学校教学的技巧问题上，测验方式的运用可能是成功的，而至于像社会教育那样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测验方式未必在这方面会是合适的。

还有一位客人问：我们开始用什么东西画画，是用木炭、铅笔、毛笔，还是用颜料？

总之，就我们在苏维埃俄罗斯认为是基本的那些主要问题来说，我们与它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相互理解；但唯一可以期望的是，他们能有礼貌地倾听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这次座谈之后，杜威教授向我走来，拉住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一边说：“我一直在想，我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些不十分恰当的问题。你别以为我赞同他们的想法。为此，我想对你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经常不断地访问那些发生了革命的国家。我曾应孙逸仙^①之邀在中国待过2年，我曾到过墨西哥和土耳其，现在我又来到了你们国家。我渴望了解你们这里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① 孙逸仙，即孙中山（1866—1925），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民主革命家。——编者注

隔些时候,我被告知,美国人想要访问农村并了解农村工作的愿望。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这件事情安排妥当。美国人乘普通郊区列车前往。美国人上车时受到优先。车厢里挤满了普通的旅客,从基辅到沃龙涅什线路的乘客主要是农民和工人,所以,这些外国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向我们询问:谁来了?来做什么?以及,能不能同外国人谈谈?那天是星期六,很多工人和职员正要回到他们农村的家中度周末。

杜威的邻座、一个工人最初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好!我们与你们之间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是吗?当然,我们的生活是不能与你们相比的,但是,毕竟我们以前生活得更苦。而现在,我们也许很快就将达到你们的生活水平。”这个工人又继续对我说:“请你问问他们,是否打算同我们打仗?”杜威教授请我转达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杜威说,去年,美国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态度很不友好;而现在,开始对苏维埃俄罗斯极感兴趣,态度已明显地好转了。工人说:“嗯,这很好。然而,要做些有益的事,那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坐到了杜威教授身旁,就美国教育和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本质问题,开始同他进行了冗长而有趣的讨论。在这次交谈中,可以了解到美国学者的一些很有趣的见解。杜威坚持认为,虽然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且他也承认由这个制度而产生出来的社会祸害,并赞同对它进行最激烈的批评;但是,要改变一种不好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逐步进化的方法,而不能通过任何革命的方法。他说:“你们的革命在我们美国当然永远也不会发生。”我问:“那么,社会制度的改变究竟怎样才能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杜威回答说,美国是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只要从大城市跑到住有普通公民的小城市看一看,就立刻可以明确地看到,民主主义已经渗透到普通的美国公民的生活里,而他在任何别的国家里还没有见过与之相同的民主主义。他又继续说,至于我们的资本家,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证明,在他们中间,就像对社会服务那样开始形成占有大量财产的观点。这些对正确地组织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社会作用的观点,在美国社会中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传播。杜威教授又说,很清楚,我们同你们一样因阶级斗争而感到困扰。毫无疑问,这种斗争在美国是存在的,并具有尖锐的形式,而我们正在为使这些阶级摩擦越来越减弱而努力。例如,我们那里正在认真地研究一日6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我说:“是的。当然,也许对你们来说是成功的,但是,为

了保证你们的一日 6 小时工作制，中国人大概不得不工作 12 小时以上。”杜威又说：“你是那样想的吗？我个人深信，我们愿中国人一切都好，我们不想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任何的侵占。”当我提到英国及其殖民地政策时，杜威有点激动地说：“我们美国人认为英国的制度已经过时了，我们正在给它以非常尖锐的批判。”

众所周知，杜威教授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实用主义教育学，即行为教育学问题的活动家之一。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请他给我解释一下，他怎样评价美国的生活环境。既然它们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那么，从将来人们的民主主义教育观点来看，他是怎样评价它们的。因为这些建立在商品流通的剩余价值和买卖的基础上的关系，不能不引起对发财和保卫自己财富的竞争的興趣。杜威回答说：“是的，这是我们所具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对这些情况加以认真的分析并寻找出路。例如，现在我们那里正在非常有力地宣传稳定物价，任何一个去商店购买所需物品的顾客，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都不会怀疑卖主想从他那里赚得更多。每个商人和每个顾客应该得到社会分配给他的利润额。我们为这而努力，并且在这方面正看到社会矛盾的明显缓和。”我又问他：“但是，你们是否认为，你们的资本家把那种稳定化看成是对他们个人事情的干涉？”杜威回答说：“是的，目前是这样。但是，渐渐地，我们的资本家将应该承认更加合理和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的一切好处。”我又说：“那么，你们以为，他们会承认和认识自己的一切罪恶，并放弃自己的一切资本吗？”对此，杜威笑了笑说：“不管怎样，这不会那么快。”

在农村，美国人参观了儿童夏令营，并访问了几个村庄。我问他们从学生那里得到了什么印象。我很惊讶，他们最感兴趣的竟是孩子们到处表现出的态度——师生之间的同志式的交往态度。原来，在他们美国，孩子们距离成年人要远得多。这个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很吃惊，因为我有必要阅读有关美国学校、美国教育的情况这件事，迫使我思考某些其他方面问题。

孩子们的天真、热情以及非常的好客，也使美国人很吃惊。

我们为美国人组织了一次有关学校和儿童夏令营情况的报告。这次报告是由 2 个学生作的。然后，孩子们，也就是营员们领着分成几个小组的美国人参观了他们自己的房间和营地设施。使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孩子们向他们提出了很多对外国表现出极有兴趣的问题。在这之后，孩子们为美国人举

行了音乐会,并以舞蹈作为结束。美国人总是请求为他们表演一些俄罗斯的舞蹈节目,特别是哈萨克舞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晚会结束时,杜威要求我转达说,他认为在这里度过的几天是他在苏联的整个旅程中最有意思的。

美国人对我们的农村情况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我知道,他们在某些方面很怀疑,也就是说,他们在想我们可能给他们看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中存在的东西。于是,我提出了一个让他们熟悉俄罗斯农村的办法。我和美国人一起站在村庄的道路上,请他们自己指明他们想参观的村舍。然后,在同户主商谈之后,我不留在那木房里,而让他们同自己的翻译一起自由行动。就这样,美国人访问了3个村庄。他们对访问农民的兴趣是很大的。那天是星期天,清晨,人们还不那么多,但美国人很快被村妇、农夫和少年儿童们围住了。谈话进行得非常坦率,在一座木房里,甚至进行了一次独特的集会。我们的农民向美国人证明说,不承认俄罗斯是不好的,俄罗斯很困难地生活着,干着自己的事业,而这对美国人是有益的。

我注意到,我们的农民怀着愉快的心情让美国人参观自己的家庭,并谈论着自己的家庭事务。我感到,让美国人到我们的农村里来是十分安全的,因为农民们只要知道客人是谁、为什么而来,就马上会谈到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很苦,但我们将会生活得更好。

杜威使自己的交谈者大吃一惊。他说,他在法国的农民家里所看到的肮脏使人感到惊讶。根据他的看法,俄罗斯人生活得要干净得多。这个看法引起了农民们怀疑的一笑。

有趣的是,在一座小木房里,一位83岁的美国女教师对装饰品的古怪布置产生了兴趣。在木板墙的一边,挂着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袖的画像;而沿着墙角的另一边,又挂着很多被熏得发黑的圣像。主人解释说,一边是他的,而另一边是他妻子的。对于这一点,他妻子急忙说:“呵,圣像在我们这里一直就是这样挂着的,现在无须再向它们祈祷了。”美国人问:“如果你对圣像前的祷告不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你能把它们卖给我吧?”针对这句话,妻子回答说:“很乐意,我可以把它们送给你。”美国女教师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但是,在与同事们商量之后,她决定花3个卢布买下圣像。付钱后,她把圣像包在报纸里。女主人一边把钱放进口袋里,一边认真地说:“如果你对这还感兴趣的

话,就请说,全村会给你送来整整一车的圣像。”看得出,这个情景给美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的美国人问我:“那么,你们农村里有没有富农?”“有啊,我可以指给你看看他们的住所。”我们向富农的房子走去,在其他许多房子中间,那座房子显得相当突出。它涂上了天蓝色的油漆,在一些小房间里,摆满了各种规格的家具和镜子,在架子上摆着各种小装饰物。一个不大的柜子引起了特别的注意,柜子中间摆着7个蜡制的犹太教堂作为装饰,而在它们的两边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半身石膏像。美国人把这全套家具都记入小本子上。

总之,客人后来承认,到现在为止,他们对俄罗斯生活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们原以为,他们将在这里皱着眉头遇到一些肮脏的、不友好的消瘦不堪的人们,但是,他们却见到了很多直爽的、殷勤的和甚至是快乐的人们,非常愿意让他们看自己的住所,并高兴地与客人进行多种形式的谈话。

当在农村里的参观活动快要结束时,我们安排了一次美国人与我们教师的座谈会。教师们对这次座谈事先作了准备,并列出了一大串问题。第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是这样的:在苏维埃俄罗斯,我们想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为之而奋斗的战士,而在美国,你们想培养怎样的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团的25人的观点并不相同。

显然,在他们之间,内部的一致是很少的,因此,我们教师提出的问题使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作出共同的回答是相当困难的。

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教授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有在你们苏联才有,而在我们美国是没有的。这时,我们的一个青年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对待客人们来说,这是很不妥当的。在这之后,杜威纠正自己同事的话说:“不是我们那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我希望它们没有。”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回答。

总之,这次座谈会的气氛相当紧张,要得到和作出结论以及找到某种认真地交流思想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到莫斯科以后,我在美国人的旅馆里又同他们见面了。我问他们现在对我们的工作得出了怎样的印象。针对这个问题,杜威说,他个人很有兴趣地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他承认这次旅行确实是他过去一切旅行中最

有意思的。当然,在美国将很难讲述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难就难在美国人几乎不可能理解苏联生活的条件,但是,他认为向美国人讲述自己的印象是他自己的义务。

在交谈中,一位美国女士提出了一个见解,依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见解。她说:“你们在这里总是追求并努力得到很多重要的东西,而这种情况我们美国却很少,因为我们一切都有,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作结论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是未来的国家。我应该这样来理解你的话吗?”“当然可以。你们的教育工作比我们具有更多的有利基础。我们不会组织,我们给学校提供了良好的设备,但是,在工作中看不到在你们这里所能看到的那种热忱。”

分别时,我与杜威教授交换了照片。我在自己的小照片上写着:我希望杜威回到美国以后,用自己敏锐的智慧来评价我们的工作情况,并在美国迅速传播正确对待我们事业的观点。他也给我写下了以下的话:“我怀着对你们国家极大的好感而离开你们。只有在你们这里,这样深刻的教育工作才是有可能的。”

美国人答应写一系列关于在苏维埃俄罗斯旅行的感受的文章。显然,他们为它收集了相当多的材料,我看见很多客人都备有记录本,并把其中很多页记得满满的。我们将等待着他们写的文章。

杜威与一个意大利男孩的逸事^①

[美] H·M·克利巴德

在杜威夫妇 1894 年去欧洲的旅行中，不幸降临到他们的家庭，他们 2 岁半的儿子莫里斯因患白喉症而在意大利米兰去世。

10 年之后，1904 年 7 月，当约翰·杜威和艾丽丝·奇普曼·杜威夫妇在与芝加哥大学威廉·雷尼·哈珀校长的一次争论中，辞去他们在那里的职位之后，他们又一次乘船去欧洲旅行。杜威的几个孩子也与父母一起同行。

但在去英国的路上，8 岁的戈登生病了，船医诊断是食物中毒。当杜威夫妇抵达英国利物浦时，戈登的病被确诊是伤寒。于是，戈登被隔离在利物浦的一所医院里。在那里，他的病情似乎在慢慢地好转。为了使孩子在病房中能够快乐一些，杜威还帮助儿子整理了一份体温图表。

可是，就在戈登出院前不到两个星期时，杜威发现，戈登看上去有点病情恶化。尽管杜威夫妇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但是病魔仍然残酷地从他们的手中夺去了孩子的生命。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开后，杜威夫妇收到了许多封来自国内的老朋友的慰问信。

尽管如此，戈登的死对杜威夫人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正如她的女儿简·杜威所写到的“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她从前的活力”。

戈登去世后又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一个 8 岁左右名叫萨拜诺(Sabino)的跛脚的意大利男孩，与他的小弟弟一起在威尼斯的圣·马科市场注视着一家商店的橱窗。那天国家管弦乐队正在演奏，街上和商店里都挤满了人。在两个男孩的后面，站着一对美国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女儿。那个男的就

^① 摘译自：H M Kleebader. Dewey and An Italy Boy.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Columbia University, Autumn 1982.

是约翰·杜威。他一面看着这两个男孩在商店橱窗玻璃上的影子，一面轻轻地拍拍萨拜诺的肩膀，邀请他们兄弟俩一起到路旁的一家咖啡馆去。在与这个美国人一家一起喝茶，并高兴地品尝了他第一次吃的白脱油的味道之后，萨拜诺同意由杜威夫妇把他兄弟俩送回家。萨拜诺兄弟俩对这次奇遇颇有点惊慌失措，跑到装嵌着一只钟的拱门那里去，以辨别他们所在的方位。当他们回到家时，这对美国夫妇请求萨拜诺的母亲，允许他们明天再带萨拜诺到威尼斯郊外的利多海滨去玩。

对萨拜诺来说，第二天是颇为兴奋的一天。在穿过半岛到利多海滨去时，萨拜诺由于看到2匹白马拉着一辆市内轨电车而非常兴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奇的世界。在海里游泳之后，他们又来到一家餐馆，在那里萨拜诺又一次与杜威一家一起吃点心。

第三天，杜威夫人单独陪同萨拜诺到他的家里。她对萨拜诺的母亲说，她想把这个孩子带到美国去。萨拜诺的母亲有点不知所措，就征求萨拜诺自己的意见。萨拜诺犹豫了一下说，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在与杜威夫人谈话之后，萨拜诺的母亲告诉萨拜诺，他将随这对美国夫妇过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这必须由他自己作出决定。最后，那个男孩同意与杜威夫妇一起去美国。

在乘船去美国之前，杜威夫妇把萨拜诺送到一所医院里，由他们所认识的一位英国医生进行治疗。当杜威夫妇回国时，他们一起出发去安特卫普，在那里，另一位医生被约请来对萨拜诺那残疾的膝关节进行检查。这位比利时医生在检查后决定截肢，但是，萨拜诺的新的父母决定采取另一种做法，他们立即回纽约。在纽约，一位著名矫正医生迈耶斯博士建议使用一个模子来使大腿处于某种固定状态，并在医院里进行长时期的治疗。在萨拜诺住院的那几个月里，杜威的时间都花费在圣·罗克医院里。萨拜诺的新父亲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萨拜诺出院之后，仍需要照顾。他腿上脓疮必须每天换绷带，而且阵阵疼痛也使得他难以入睡。因此，每天晚上，杜威都蹑手蹑脚地走到他儿子的床边，同他在一起，讲故事给他听，直到他睡着为止。白天，人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河边公园里推着萨拜诺的轮椅。

一些年以后，杜威夫妇在家里接待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医生朋友。哈克

特博士看到萨拜诺穿过房间,就对他说,把拐杖放下,走到她那里去。于是,萨拜诺再也没有使用过拐杖。半个世纪之后,萨拜诺在回忆父亲在自己生活中的这段时期的情况时深情地说:“可以把他给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写成一本书——我说,这确实是个人的关怀。”^①

萨拜诺成为杜威家庭的成员后,约翰·杜威对他表示出一种特别的信任,尤其是遇到一些手工操作和实际的事情时。因为对那些事情来说,杜威自己好像只有一点点才能。甚至连具有独立精神和颇为能干的女儿艾丽丝·杜威,也觉得可以依赖萨拜诺。因为萨拜诺具备完成几乎摆在他面前的任何工作的才能。在萨拜诺到美国后的一年里。杜威夫妇曾带他到阿迪龙达克山区去度假。在那里,杜威给他8岁的儿子搞来了一枝萨维奇来复枪。萨拜诺很快就成为一个神枪手。在允许驾驶汽车的法定年龄之前,萨拜诺早就成为家庭的司机。那是在杜威把汽车开到一个树林里并决定不再开车以后,他开始尝试驾驶家里的汽车。因为杜威一家在长岛的庄园远离任何一个汽车维修站,萨拜诺也就学会了维修汽车的技术。有一次,当两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对他们熄火的法国制造的摩托车感到束手无策时,他们向杜威提出,愿意花10美元请萨拜诺去修理。萨拜诺很快就使他们的摩托车重新发动了起来。

杜威的庄园需要做相当多的养护工作,萨拜诺被不断地被叫去帮忙。杜威特别喜爱芦笋,他计划种植半英亩芦笋。杜威与他那十几岁的儿子合作,一起设计了一种简易的灌溉渠道,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劳动,给田里的作物浇水。由于人工水泵效率低,萨拜诺就采用了一个汽油发动机使水泵运转。杜威对儿子的技能感到特别满意。杜威夫人也总是为她儿子的自力更生精神感到自豪,要萨拜诺为她设计植物园。当他的姐姐简·杜威的车库被狂风刮坏时,萨拜诺就与帮简·杜威干活的杂务工一起,重新加上了链索和钢丝绳,一天内就把它修复好了。

杜威夫人一向对丈夫的服装审美力表示异议,常因杜威把他自己衬衫的袖子做得过长而感到特别的恼火。于是,萨拜诺采取了手工的办法,把他父亲衬衫的袖子缩短。后来,他又学会了一种更加精巧的技艺,包括拆开那个

^① 萨拜诺·杜威 1967年2月10日在纽约亨廷顿自己家里的谈话。——原注

袖口,裁去一小段,然后再重新缝好它。一天,杜威先生买回一件“糟透了的”衣服,夫人十分生气,明令禁止杜威穿着那套衣服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许穿到学校里去。杜威夫人对杜威说,应该由萨拜诺立即领他到裁缝那里重新选购一件,杜威顺从地去了。在裁缝店里,萨拜诺帮杜威选好了衣服,并看着他试穿。在量尺寸时,杜威告诉萨拜诺,他也应该买一套。于是,萨拜诺很快就为自己选好了衣服,并跟着父亲一起试穿起来。多年后,萨拜诺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他仍然经常顺便去看望杜威夫妇。这时,杜威仍然会要萨拜诺与他一起出去,帮他选购衣服。

在给杜威一家带来不幸的意大利之行 30 年之后,杜威的女儿简·杜威在《约翰·杜威传》中回忆起她的意大利弟弟,曾这样写道:

“在意大利逗留时,杜威夫妇收养了萨拜诺,这使全家感到非常高兴。萨拜诺是一个与病死的戈登年龄差不多大的意大利男孩。他那不知疲倦的快乐和不怕重病的勇气,以及生活的活力和交朋友的能力,使他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惹人喜爱的成员,并给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了安慰。更为有趣的是,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后来继续从事杜威夫妇的初等教育工作,成为进步学校的一位教师。他还是教育仪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这些仪器是供学校中的手工活动和科学实验所使用的。”

在家庭的一次不幸之后,约翰·杜威确实实地又得到了另一个儿子。

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的影响^①

[土耳其] 萨布里·巴尤克迪文奇

就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的影响而言,教育家之间的看法不一。一些人承认他的贡献,但却拿不出确凿的书面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一些人认为杜威的影响甚小或根本没有影响。一些土耳其教育家并不提及或并没有注意到杜威。我本人同意大多数人的看法,即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我也认为,就杜威作为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言,这些看法遗漏了一些要点。以下便是我试图对此所作的详细阐述。

1924年,杜威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来到土耳其帮助开展教育改革,他在土耳其逗留了3个月考察教育问题,并将其调查结果和若干建议写进为土耳其教育部准备了两份报告之中。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第一份报告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一份报告,毋宁说是一份备忘录,其中表明国家预算中应当拨出的专项资金之数量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款项。第二份报告,即1924年的报告^②,长达30页,显得更加全面。我将主要根据这第二份报告分析杜威对土耳其的影响,然后集中关注杜威作为一位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其思想对土耳其教育所产生的总体影响。我相信,要想把这些思想梳理清楚,弄清其历史背景是大有裨益的。

^① 译自:Jim Garrison. *The New Scholarship on Dewey*.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225—232. 原青林译。

^② 指《关于土耳其教育的报告和建议》。——编译者注

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

土耳其的知识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曾出现过许多大起大落的现象。在共和国时期以前,我们目睹了土耳其所经历的在文化和世界观方面基本属于奥斯曼王朝的时期。奥斯曼帝国如同土耳其历史上从10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其他王朝一样,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神圣的古兰经是统治者和信仰者的根本大法,苏丹王是所有穆斯林的正式首领。由于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没有分离,伊斯兰教便成为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精神支柱。“思想”受制于“赛利亚特”(Serlat)(即穆斯林宗教法律:基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制)。由于“思想”不能摆脱教义的约束,要想找到一条活跃之路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个人的自由思想受到阻止(我在这里使用“他”,因为“她”躲在帘子后面)。国家不鼓励个人亲自探索世界、寻求真理,宗教和宗教领袖就是真理。“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宗教教规,这便是客观思想无法获得自己的独立生活领域的重要原因。这便是奥斯曼社会从未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缘故,即便发动了多次革新运动。

西化问题作为一个军事防御问题于1774年开始引起奥斯曼决策人的重视,但在以后的适当时期又发展成一个文化转型问题,并最终明确地提出了国体问题。对伊斯兰教企图管理整个生活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出现于号称“坦齐马特”(Tanzimat)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并于1839年由苏丹王圣旨予以公布。曾经受西方制度影响的坦齐马特行政官员看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按照宗教原则行使国家事务是不可能的。公布的文件向国民承诺,政府将更加公平地对待他们,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将得到保障。此外,所有的臣民,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内,将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待遇。坦齐马特的这一政令并没有带来国家状况的明显好转。另一个这样的政令于1856年公布,基本上重申了上述原则。

尽管作出了上述承诺,但行政官员或是出于无知或是有意阻挠,并没有完全执行坦齐马特规定。坦齐马特改革应当被视为挽救帝国命运的最后努力。苏丹王的个人专制统治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受到削弱。导致《1876年宪法》出台的一系列事件主要由一小撮号称“年轻奥斯曼”的土耳其文学—政治

精英的行动所促成。《1876年宪法》是奥斯曼王朝历史上第一个宪法。这表明奥斯曼统治者再也不能对席卷欧洲的政治自由的春风置之不理。总之,从1839年(坦齐马特改革)至1923年(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时期应当被定性为政治幼稚阶段。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在土耳其境内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奥斯曼特性”的制度被弃置一边,“共和国特性”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这是从奥斯曼文化独特的神权政治性质和中世纪性质向西方理想的转变。封建的权力形式被废除,这意味着权力的来源归属于民族本身。

当时,教育和国家状况是悲惨的和混乱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战区丧生,国家的人力几乎耗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处于文盲状态。在这样的情境下,土耳其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阿塔蒂尔克(Atatürk)对教育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现代共和国的堡垒。

自1923年10月29日共和国宣告成立至1924年3月3日,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理念在土耳其并存。一类包括以宗教教育为基础的传统学校,支持这种教育理念的有宗教部和社会基金会或一些地方福利基金会;另一类是受教育部控制的世俗现代学校。随着1924年3月《统一教育法》的通过,土耳其教育的双轨制得以消除并被真正的西方世俗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进而又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根基。换言之,伊斯兰教育制度被一种全国性的自由、普及和世俗学校制度所代替。

对土耳其社会—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简要概述,表明了杜威来到土耳其时所面临的处境。杜威是否对土耳其的历史、社会和教育有深刻的了解(除了他在伊斯坦布尔和布尔萨逗留期间的考察活动),难以断定。他的资料主要是通过与其内阁官员和教育家的讨论与会见而收集的。他的报告也主要是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杜威报告的内容

杜威在其报告中提出了若干条关于改进土耳其教育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分成三类:教育计划、学校制度和教师培训。

根据他的观点,首要的问题是明确学校的目的,它们应当成为社会生活

的中心,尤其在农村地区。教育部应当发挥其领导职能,以便使公立学校成为现代的、进步的、高效的和适应国家需要的学校。

“……教育部过多和过于高度集权的活动将会遏止地方的热情和创造性,阻止地方机构承担应有的责任,形成一种过于划一的教育制度,不能灵活地适应城市、农村、沿海等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的农村机构、不同环境和诸如牧、粮、棉、果等不同产业的多样化需要。同样危险的是,任何的集权制度都将在行动上表现出官僚、武断和暴虐的性质……”

杜威强调目的与活动、计划和资源以及与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威在其报告中主要涉及土耳其的教师培训和教师地位问题。在他看来,教育的改进取决于教师培养的改进。教师职业如何吸引合适的德才兼备的人并使他们具备学科知识和现代进步教育理念,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

“必须成立不同类型的师范学校来培养农村学校的教师,特别针对构成土耳其生活主流的土地耕种者的需要……学校培训的结果将必定应用于实际生活……一定数量的师范学校应当扩大规模,以便开设针对商业和工业学校教师以及体育、运动、卫生,绘画、音乐、幼儿园、设计、缝纫等教师培训的专门课程。至少应有一所学校专门开设培养学校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课程……”

杜威还提议将教育类外文书籍和期刊翻译成土耳其文,并建立流动图书馆为学习者提供各种读物。他还提出,“教育部成员的薪水应当足以吸引最优秀的教育人才。”

至于其他建议,他提出以下四条:

- (1) 将教师派往国外参观和考察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
- (2) 至少有一所师范学校具备“实验学校”的设施。其目标在于开发新的和进步的教学方法和材料,并且特别重视儿童研究以及心理学、心理测试和

测量方法等。

(3) 国家教育部应当注重团结,但反对划一而赞同多样性。

(4) 外国学校能够提供宝贵的服务。它们有条件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并在不同的实践中进行实验。教育部应当尽量与地方和外国私立学校合作,鼓励它们开展各种方法和课程的实验。

实践中的杜威报告

杜威的报告尤其影响了教育部长穆斯塔法·内卡蒂(Mustafa Necati),他将杜威的大部分建议付诸实施。在穆斯塔法·内卡蒂时期,《土耳其教育组织法》(The Law of Turkish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得以通过,因此遵照杜威的建议,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培训学校得以成立。从农村生活出发,建立了农村教师培训学校。德尼兹利小学教师培训学校更名为“农村教师培训学校”,凯泽里岑西德里村创办了一所目的相同的新学校(1927—1928)。此外,在这一时期,教师的薪水与晋级得到了重新理顺,可以说,他们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们被看作社会中最受尊敬的成员和领导者,担负着培养后代和启迪整个民族的重任。编号为439、788、789、1108、832、842、900、915、1237、1919、999、1846、1416、1452、1702、2287、2530、2621、2777、3007、3457、3458、3467和3238的一系列法律在议会中通过,要求土耳其共和国的教师得到满意的薪水并得到额外劳动的报酬。这些法律同时规定,教师还应得到一定数量的寄宿补贴,相当于其薪水的十分之一。

为了培训小学督学和中学教师,为了开展教育研究,一个名为“加齐教师培训研究所”的新机构在安卡拉成立。最有才华的学生开始被送往国外留学,尤其是欧洲和美国。

这一切皆为杜威报告中所建议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穆斯塔法·内卡蒂是怎样借鉴杜威的建议的。此外,可以证明杜威报告之影响的另一个事实是,穆斯塔法·内卡蒂在其讲话中经常引证杜威报告。

杜威报告中关于教师培训的大多数建议都已付诸实施。农村教师培训学校的样板也被视为创办“乡村成人业余学校”的样板,它在土耳其教育史上曾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

由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原因,杜威报告中的一些忠告未曾得到应用,例如,避免集权制和赋予外国学校更大的自主权等。1924年以来,外国学校受到监督和控制,宗教宣传受到禁止。根据杜威的观点,“只要这些机构能够主要致力于教育土耳其青年一代,它们就能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极其有益的作用。”实际上,在这些学校中,起源于法国的“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这所学校曾在土耳其人区别西方思想和自由思想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希腊和亚美尼亚学校只招收本国侨民的孩子,并且成为保障和培养希腊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主要工具。这便成为禁止和严格控制外国学校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个证明杜威影响土耳其教育的事实是,他的著作被译成土耳其文:《学校与社会》(1924),《民主主义与教育》(1928),《教育中的道德原理》(1934),《明日之学校》(1938),《自由与文化》(1962),《经验与教育》(1966)。

总之,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的具体贡献已足够清楚了。不过,杜威当然不是唯一应邀赴土耳其帮助其发展教育制度的人。1926年,德国教育家库内(Kuhne)博士起草了一份强调课程改革的报告。1927年,比利时教育家奥默·比斯(Omer Buyce)考察了土耳其的技术教育。1932年,瑞士的阿尔伯特·马尔切(Albetrt Malche)教授考察了土耳其的大学。1934年,美国的帕克(Parker)考察了初等教育。1933—1934年,美国的凯默勒小组(Kemerrer Group)起草了一份关于普通教育制度的报告。

至于约翰·杜威对土耳其教育的全部影响,我认为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澄清这一问题,尤其是关于问题的另一面。换言之,约翰·杜威作为一位教育哲学家仍在通过其教育理念,尤其是其实用主义思想,从理论上继续影响着土耳其的教育。就此而言,我认为教育完全是一个互动过程。这种互动的成分如此庞杂,不考虑这些成分——这正是社会的不成文法(例如,期望性生活方式、理想的人类、信仰与思维模式等)——一切针对新的教育改革的主动行动都将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实至少对土耳其教育来说被证明是正确的,亦即是说,实用主义(或者是对它的误解)作为一种以特定方式处理教育问题的范式似乎应当对依然存在于土耳其教育的概念层面上的歧义承担责任。

对教育的教育性危害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热情很高。教育部领导，尤其是1926年成为教育与培训处负责人的默罕默德·埃明·埃里西吉尔(Mehment Emin Erisirgil)，为了将实用主义的思想付诸实施，曾经作出了不懈努力。埃里西吉尔先生与阿夫尼·巴斯曼(Anvi Basman)一道起草了初等教育计划，并在该计划的引言部分主张将实用主义方法应用到土耳其的教育中去。他在《哈亚特》和《米哈拉布》期刊上阐述了自己关于实用主义的见解。阿夫尼·巴斯曼则将杜威的部分著作译成土耳其文：《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和《民主主义与教育》。同时，他还根据实用主义方法撰写了中学科学课本。

知识的真实性只有经过实验才能明确假定对教育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希图在一种“外来”哲学的帮助下推动教育的发展的做法影响和支配着“无哲学状态”的过程。这种无哲学状态成为教育中的一种官方思想。换言之，这个国家的教育问题是通过某种范式加以处理的，而这种范式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用一种范式来统领教育的做法，同样对多元主义的发展和民主生活的改善产生了消极影响。

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不是被当作一种传统而是根据其结果而加以采用的。这便导致上级部门将一些现成的方法付诸实施，这些方法自然导致学校教与学的定型和刻板。此外，由于“无哲学状态”而造成的任何“主义”的统领地位使之转变为一种教条的结构。由于普遍存在的“无哲学状态”，因此要画出关于这些概念的地图是不可能的。概念层面的模糊又导致教育思想上的模糊。

其实，可以追溯到奥斯曼时期的真正问题主要是“转变思想”的问题，转变价值基础与实现的变革相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实现思想的转变，我认为就很难实现任何彻底的社会变革和教育制度变革。自世俗的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很难解决他们的身份和诚实危机。宗教曾被下层阶级用作社会身份的系缚物。依我看来，所缺乏的是一种民主的世俗价值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教育制度可能发挥作用，使民主精神走向繁荣。这里似乎形成了

恶性循环。因此,主要障碍就在于传统文化中,尤其在于家庭结构中。一般地说,土耳其的家庭在其自身的结构中反映了权力主义的价值观。当今家庭中所提供的教育是个人精神态度和行为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我看来,唯一能够克服旧的教条思想的力量就是人文主义文化。尤其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一种受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影响而主要关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教育制度是无法成功地铲除旧思想的根源的。土耳其的政策和教育制度中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相信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和更新社会机构就能够使一种民主的世俗生活得到全面发展。既然新的制度已经被采用,使之发展的价值基础也应当被采用。那种认为彻底变革的价值基础可以从外国进口的想法是错误的。它只能通过我们所缺乏的一种哲学文化或哲学传统来加以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哲学状态”是由教育制度中广泛采用的实用主义做法和方法促成的。作为这种范式的结果,教育的基本目的一度被看作是培养专家和合格人才,而不是培养整体的人。这便是鼓励在校生训练计算能力和仅仅设计实用性项目的缘故,而阻止他们去做的是质疑他们的道德与文化信仰的真实性和强调个人在决定自己命运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单独训练人的“双手”比陶冶人的“心灵”重要得多。看起来,土耳其教育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形成一种“心理结构”的问题,一种与新的民主领域和新的制度相吻合的精神能力。这就需要看到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而避免从“主义”的狭窄窗口看教育。无疑,在土耳其的国情下,坚持实用主义是不应该的,约翰·杜威应为这一过失承担责任。

结 语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大体上决定着其教育制度。然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坚称其教育制度完全是本土的。一切制度都是作为本国和别国各种成分的综合体而出现的。借鉴别国的经验和知识宝库是十分自然的,尤其就教育而言,这一事实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借鉴过程”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利用。当借鉴思想的过程以“模仿”或“照搬”的方式出现时,意外的结果和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墨西哥的教育复兴^①

[美] 约翰·杜威

对教育感兴趣的墨西哥人迫切希望引起卡勒斯(Plutarco Elias Calles)^②总统对教育实际情况的关注。卡勒斯总统是作为一位农村学校教师而开始他的生涯的。在他早期的政治主张中,他把他的计划概括为两个政策:一是经济自由,二是公共教育发展。大多数外国居民肯定都了解这个计划的第一个要素,即通常称为布尔什维主义,但并没有太多的人会不辞辛劳地去了解其第二个要素。

在开始时,我们可以关注教育实际情况的正式数据。在墨西哥,学校分为两类:联邦的;州的和市的。市立学校日趋减少而由州来接管,但联邦学校比州立学校发展得更为迅速。不仅如此,联邦学校还受到保护且入学容易。而统计数字表明,州立学校经常是没有组织的,很难得到保护,入学也较难。初等教育学制6年,前四年是法定的也是义务的。事实上,有十分之四的入学儿童在公立学校里学习。我们没有关于私立学校的数据,但是,在天主教的教育机构关闭之前,据估计有一半的儿童在这些私立学校里学习。

在联邦行政区,政府投入了4倍于迪亚兹(Diaz)政权全盛时期的财力。由于革命时期的毁坏,在一些大的城镇仍然没有学校,州立和市立学校的数量相当于1910年时的情况。当时^③,墨西哥城及其郊区建起了5所露天学校,800~1000名儿童依靠工厂提供的1~2万美元的费用而得到照顾。在帕

① 译自:William W Brickman. John Dewey's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 China - Turkey.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64: 119 - 129. 周雁译。

② 卡勒斯1924年就任墨西哥总统。——编译者注

③ 指1926年。——原注

伊赫(Puig)博士的指导下,这种类型的学校管理是首创的,学校充满艺术氛围、有益健康、很好地适合当时的环境以及它的低费用,将使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食宿成为可能,并能够短时间内在联邦行政区实现。

直到最近,除为进入大学作准备的一些学校外,在墨西哥没有什么中等教育。^① 近期开办的4所中学已经人满为患。另有1所联邦师范学校,它的校舍和设施配备与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包括实习学校的学生在内共有5000名男女学生。政府计划在每个州建立1所地方师范学校。在墨西哥,正在繁荣发展的国立大学^②有1万名学生,大部分是女生。它的校长普鲁尼达(Pruneda)博士非常注重学生和教师的交流,在即将到来的秋季访问美国之行,将会安排与我们美国的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我希望它能够圆满实现。也因为如此,在蒙塔诺(Montano)博士的领导下,大学始终为北美国家开办一所真正独一无二的暑期学校(在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国家学习去掉我们普通“美国人”的傲慢)。去年夏天,参加暑期学校交流的就有300多人,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教师。

然而,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发展是农村学校,当然是指那些为土著印第安人开办的学校。这是现政权最为关注的事情。它使一次革命富有意义,而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它不仅是墨西哥的一次革命,而且在一些方面是世界任何地方已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实验之一。因为它标志着为把占人口总数80%的印第安人融入社会群体的一次专门的和系统的尝试。在革命之前,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被忽视,而且被轻视。那些攻击革命自以为是的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被忽视和被轻视是一种蔑视人民群众的政策的结果,也就是无视影响生活每一阶段的教育的结果。例如,迪亚兹政权没有为印第安人建立过一所农村学校。尽管在教师保障上存在困难,但现在已有2600所这样的农村学校,其中1000所是去年开办的,明年有望增加2000所。据估计,如果能保证在10年里有这样的增长,将会有足够的

① 从1926年起,中等教育被划分为3年一个周期,2年或3年后再接受高等教育。见:拉菲尔·拉米雷兹(Rafael Ramirez). 墨西哥//坎德尔(I. L. Kandel).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学院教育年鉴.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1942:268—269。——编者注

② 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最初成立于1551年。——编者注

学校提供给墨西哥所有的适龄儿童,文盲在新的一代中将不复存在。

这个教育改革^①不仅代表着把不同民族融入于社会生活以及把墨西哥知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种努力,而且它还必然意味着国家政策的统一。在墨西哥,没有什么事情比前几年把印第安人从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奴役和歧视下解放出来更值得理解了。尽管在这些方面,现在还存在教堂——国家的危机基础。由于没有农村学校,因此,对与人民生活联系产生影响的唯一的共同力量就是教堂。客观地说,牧师的影响并不是为了社会和政治的统一。事实上,那些乡村牧师用他们对教徒心灵的巨大影响力来反对农村学校的建立,这至少是导致初等学校锐减的原因之一。

要在墨西哥创建一个精神和政治统一体,其困难是巨大的,以至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可企及的。通过怀念早年在美国殖民地的日子,一个相对居民少且文明程度高和被印第安人围绕(尽管他们很少与印第安人接触)的日子,最容易勾画一个国家的统一政权。事实上,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过的是定居的农业生活,比我们美国的印第安人有更高的文明和更强的抵御力量,但也增加了处境的困难。除外,印第安人也不都是同族的,他们大概分为三个不同的部落,自我中心意识强烈,非常看重他们的自治,珍惜由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独立生活。我们认为,墨西哥革命政府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政府所回避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民主的思想的特色还很肤浅。在墨西哥,包括来自美国的普通外国居民都认为融合印第安人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唯一的出路是“强大的”寡头统治。也许有人会想,革命政府的勇敢尝试将会赢得认同,如果只是因为它的勇敢,甚至有人会想这个理由也是不充分的,但是,普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性好赌(乐于面对挑战)会表现出他们特有的民主信仰。

比统计数据有更多意义的精神和目标激励了这些农村学校。最近,墨西哥第一任教育次长萨恩斯(Moises Saenz)^②先生(曾在纽约的林肯学校任教过)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在我所见过的社会学校中,没有哪一所能比得上墨西哥的农村学校。”我愿意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教育运动

① 注意这与桑切斯(George I. Sanchez)的著作:《墨西哥:一次通过教育的革命》(1936)的书名相似。——编者注

② 萨恩斯(Moises Saenz, 1888—1941), 1922—1933年曾在公共教育秘书处服务。192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编者注

能比墨西哥的教育发展表现出更多的学校活动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精神。长久以来,我有一个特殊的想法:一些“落后”的国家在教育上有很大的发展机会。相对那些由于多年顽固的传统习惯而建立学校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一旦开始走上学校之路,便会更少受到传统和制度的阻碍。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即新国家的新教育能用先进国家的最进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重新开始。但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农村学校以及师范学校的精神和目标却重新激起了我的信念。

农村学校的许多实际工作是粗陋的,因为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即使条件不成熟也去做。但是,它是有活力的发展过程中的粗陋,并不是因自以为是的习俗而带来的粗陋。我不知道长期的革命是否能够根除这种影响,但是,随着这么多又这么快的社会转变带来的影响,显然到处都有一种明显的实验精神、一种“尝试做任何事情”的愿望,并且大多数事情都不止一次地进行试验。如果现在有一个好的开端,最大的需要就是政策的持续,以及真诚地希望政策管理的改变将不会导致教育计划的突然中止。

既不是校舍和课程学习,也不是教师的准备,造成了过度实验的错误。去年开办的上千所农村学校中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没有花费国家和当地民众的资金进行装备,主要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孩子有机会上学的家长拒绝这样做。就我在特拉斯卡拉州所见到的情况便可证明,这些农村学校的校舍主要是旧建筑,有时是教堂,有时是住宅,它们都是毁坏了经过重修后作为校舍使用的。在离墨西哥城不远的的一个印第安人村庄,6个年级的学生挤在6个不同的土坯房中,这些房子是由学生的家长提供的。每所学校都附有一个花园,花园充满了印第安人的特色。尽管蔬菜在这里可能被忽视,但花园肯定是五彩缤纷的和受到很好的照管。

简陋的校舍和友善的氛围是为了一种简单的课程:阅读、书写和必要的西班牙会话,一些“演算”、乡土地理、强调革命和独立英雄的国家历史,还有职业教育(主要是农业教育),如家政、编织、陶器制作等,作为当地的特色(它是现政府“社会主义”总政策的一部分,鼓励家庭和合作经营的“小企业”的发展,作为对大部分外国资本的企业入侵的补偿)。很多地方十分注重音乐和造型艺术设计,印第安人在这两方面表现出了他们的天分。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表面现象,那么与城市职业学校相比,小的农村学校虽然

工作是粗糙的,但它们的设计却好得多,因为城市百货公司的建筑造成了一种劣质的入侵。如果农村学校能够继续保护本土艺术、审美传统和模式,保护它们不受机器制造工业的影响,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为文明提供独一无二的、令人满意的服务。很幸运,墨西哥教育部前任部长瓦斯孔塞洛斯(Vasconcelos)^①和杰出的人类学家盖密欧(Gamio)博士都强烈坚持保护本土的艺术和工艺品。有一位毕业于国立大学、有造诣的墨西哥女音乐家,坚持周游世界收集民间歌曲、歌词和音乐,其中墨西哥的最多,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能与之相比。

就教育而言,农村学校的主导理念是:有教师比没有教师好,只要是本地能读会写、乐于献身教育事业的男、女都可以当教师。大多数人在开始执教前都接受了专业教育训练,教师训练的最有趣的特点之一是“文化讲习”(cultural missions)^②。文化讲习团去一些乡村小镇,召集附近地区的农村教师,用3周时间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这个训练工作不是理论教育,经常有体育训练(现在墨西哥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操场和篮球场)。社会工作者(通常是女性)教他们卫生、急救、预防接种、照料孩子的初步知识等。还有教合唱的教师、手工训练的专家,要求他们尽可能利用当地的材料进行教学,使他们能够最终成为学校组织和教学方法的专家。然而,后者的任务主要是使学校的学术教学与农业和手工业协调起来。

在上一学年,文化讲习团在6个州工作;第二年,预算增加50万个比索以进一步扩大其工作。同时,联邦政府当局尽可能快地为所有的学校建立小型图书馆,其目的是使每个小型图书馆成为社区在知识、娱乐和经济上的新生活的中心。在每一幢大楼里都设有夜校,白天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来到这里,他们的行动说明了对学习的渴望。他们步行几英里路来到受教育的地方,每

^① 瓦斯孔塞洛斯(Jose Vasconcelos, 1882—1959),墨西哥教育部长(1920—1925),墨西哥国立大学校长(1920—1924)。作为一位拉美文化的倡导者,他促进教育和文学。——编者注

^② 文化讲习计划关注农村教师的挑选和训练以及农村教育的内容。这个“巡回师范学校”运动的发起人是墨西哥教育部的麦德林(Robert Medellin)。1923年10月,他组织了第一个文化讲习团,由他的得力助手拉菲·拉米雷兹和其他五位教师组成。1926年,即杜威访问墨西哥那一年,墨西哥教育部成立了文化讲习局(Bureau of Cultural Missions)。当年有6个文化讲习团服务于2572所农村学校,在这些学校的2916位教师中有2327位教师接受了训练。见:休格斯(Lloyd H. Hughes),墨西哥文化讲习计划。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0:10—14。——编者注

个人都带着一支蜡烛,借助烛光进行学习。实际上,印第安人教师每天都要工作,为了一天4比索的工资他们每天晚上还要工作。

流行的教育标语是“学校行动”。最常见的抱怨是,以前的学校毕业生有奇异的记忆力,却没有主动性和一点点独立的责任感。这个事实多次提醒我,注意墨西哥人的心理极限。我首先思考所有情况的一般心理规律:只要学生用传统的方法进行传统的学习,学习材料就会与他们的经验分离,那么他们就只能依靠记忆。现在,“活动”虽然不能总是适合教学组织或知识内容,但它是一个指导原则。“设计教学法”是除官方学校外的所有学校作为课程的基本方法,因此变化肯定是有的。实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这种方法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实施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墨西哥今天最耀眼之处就是它的教育行动。那就是:有活力,生气勃勃,有奉献精神,把当代最好的理论付诸实践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动手做的愿望。

在美国,在一种同情和理解的义务下,我们对印第安人一直实行一种不同的政策。把印第安人融入现代生活的政策在实施时是特别困难的,它的见效要求如此多的时间、和睦和稳定,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任何行动绝对是犯罪的。在墨西哥,人们可以同情合法权利没有受到保障的外国人,然而,从长远的职业角度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给予合法权利相对创造一个全面的人那就是第二位的事情了。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都意味着不稳定因素的迅速增长,而且这种不稳定反过来会延长内部的分裂,这是墨西哥不希望看到的灾祸。这种外来干涉意味着蓄意培养所有引起社会混乱的种子。

杜威的日本之行^①

[美] 乔治·戴克威曾

1918—1919 学年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休假年，于是，他利用了大半个冬天的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客座授课。在课程接近尾声时，杜威与夫人准备去日本度假。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夫人和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如果现在不去，以后就更不会再指望了。因此，最后我们决定办理护照，并预定了 1 月 22 日的船票。”^②

当杜威准备访问日本的消息传到日本时，邀请杜威到东京帝国大学作讲座的筹备工作立即展开了。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小野荣二郎博士早年在密执安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结识了杜威。小野回国后曾在一所日本大学任教，1896 年弃教从商，投身银行界，事业一帆风顺。杜威访日时，小野已任日本劝业银行副总裁。

小野希望为杜威的此次日本之行设立一项讲座基金，于是他找到了涉泽荣一男爵，当年叱咤日本财经界和慈善界的风云人物之一。涉泽男爵曾分别于 1902、1910、1915 年先后到美国留学，学习美国商业和金融的运营模式，并将所学带回日本，为日本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杜威抵达日本时，涉泽男爵已经是 83 岁高龄了，虽然早已退出商界，但他仍热衷慈善事业。他非常愿意为杜威的日本之行提供资助。这样，在东京帝国大学校方的支持之下，小野向远在旧金山的杜威拍发了电报，盛情邀请他前往东京帝国大学开设讲座。杜威接受了这份邀请，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经费上的妥善安排，另一方面

① 译自：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186—194. 高惠蓉译。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杜威给莱文森(Salmon O. Levinson)的信，1918 年 12 月 9 日。——原注

则是他所言的：“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和联系，而不是置身事外。”^①

杜威夫妇按照预定的日期，即1919年1月22日，搭乘日本“春秋丸”号轮，从旧金山动身前往日本。在两个半周的航程中，杜威有足够的时间同船上的旅客，尤其是与一群刚刚访问过美国小学的日本中小学校长们相互交谈。2月9日上午11点，中途因为暴风雪的缘故耽搁了若干个小时的“春秋丸”号轮终于抵达了日本横滨港。守候已久的摄影师、记者及代表们纷纷涌上客船，热情迎接来自远方的贵宾。小野博士、东京帝国大学负责人姊崎宏教授以及东京帝国大学伦理学教授友枝孝彦等人都登上了客船迎接杜威夫妇。

杜威夫妇立刻被记者们包围了。记者们纷纷为他们拍照，并请求他们发表感言：杜威依次分别与夫人、姊崎教授、友枝博士以及归国的访美日本中小学校长们合影。杜威在发表感言时说，他与夫人非常荣幸访问日本，他以前的不少学生现在就在日本。他们夫妇计划在日本待5个月。他还提到了在船上与访美日本中小学校长们十分有意义的交谈。他呼吁日本国内能够更加关注日本中小学的发展。此外，他还表示非常想同日本领导人就有关重大的国内及国际事务交换意见。同时，他会为美国《新共和》与《拨盘》两家报刊撰稿，报道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当被问到在东京帝国大学系列讲座的主题时，杜威回答说，主题尚未决定，要等与大学的教授们商议后才能决定。记者采访结束后，杜威夫妇驱车前往宾馆。

杜威夫妇在东京下榻的是帝国饭店，为时大约一周。之后，应日本好友新渡户稻造博士及夫人的盛情邀请住进了新渡户家的一套房子里。新渡户夫人本身就是美国人，自小在美国接受的是基督教贵格派的传统教育。她的先生新渡户稻造比杜威小4岁，曾在德国和美国两国留学深造。他们夫妇俩在纽约时就与杜威夫妇相交甚密。新渡户博士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时任日本基督学院院长一职。

杜威夫妇搬至新住处后的愉悦之情，在杜威夫人写给子女们的信中尽显无遗。“到日本已经有一周了。现在我们的住处位于山顶一个美丽的花园内，绿树成荫，姹紫嫣红。李子树很快就要开花了。到3月份时，满园已长成

^① 杜威给莱文森的信，1918年12月21日。——原注

大山的山茶也会吐露芬芳。远处依稀可见的是神奇的富士山、绵延的山岭、以及东京远郊的平原。山脚下一条运河蜿蜒其间，两岸是曾经远近闻名的樱花树林，却在最近的一次暴风雨中被几近摧毁。”谈及房间，杜威夫人写道：“我们的住所是一所独用的公寓。房间四周都是巨大的玻璃窗。一间宽敞明亮的卧房，一间小小的更衣室，还有一间书房。现在我就坐在书房里，阳光正从四周的窗子倾洒进来……室内周围到处都是近期出版的关于日本方面的书籍，这真的让我们爱不释手。”^①

在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商谈之后，杜威决定开设的系列讲座的主题为“现代哲学的地位：有关哲学改造的一些问题”。讲座将面向公众，计划共进行8次，时间从2月25日(周二)至3月21日(周五)，下午3:30开始。最终计划顺利实现，具体安排如下：

2月25日(星期二)：关于哲学含义的一些有争论的概念

2月28日(星期五)：思辨的认知与行动的认知

3月4日(星期二)：哲学改造的社会原因

3月7日(星期五)：现代科学与哲学改造

3月11日(星期二)：关于经验与理性的概念变迁

3月14日(星期五)：影响逻辑学的改造

3月18日(星期二)：伦理学与教育学的改造

3月21日(星期五)：影响社会哲学的改造

杜威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每次讲座的简要参考书清单，为那些想要进一步研究讲座课题的听众提供便利。

杜威讲座是在帝国大学法学院的一间大讲堂里进行的。由于杜威的盛名和事前的宣传，第一次讲座吸引了约1000多名听众——其中，多数人是东京市内及附近地区师范院校的教授和学生，还包括不少外国留学生。当天的报纸报道了讲座在人们当中引起的热烈反响，系列讲座的良好开端预示一切都会进展顺利。

^① 约翰·杜威，艾丽丝·奇普曼·杜威。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纽约：达顿出版公司，1920：20—21。——原注

系列讲座的第一部分还在继续着。3月5日,杜威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完成了3次讲座。这实在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民族。听众仍然很多,大约有500多人。”^①但是,随着讲座的进行,听众渐渐变得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30~40人出席讲座了。

杜威曾谈到此次讲座的根本目的是:“揭示推动不可避免的知识改造的诸多力量,设想知识改造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路线。”^②以此为目的,首先,杜威指出,传统哲学主要的是依靠理性和证据,并对道德、社会及宗教中的一些不变的价值观念加以论证;这类哲学支持的是绝对或先验的实在,保证传统价值观念的永存不朽。而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化的出现及政治和社会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使人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人们感兴趣的不再是那些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事物,而是那些具体的、特定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事物;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将传统与权威奉若神明,而是更加相信科学氛围熏陶下的智慧力量;人们崇拜进步观念、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是历史上所谓的“黄金岁月”;人们深信掌握自然知识就可以掌管自然,相信这才是通往发展进步的唯一途径。

杜威接着谈到,哲学需要加以改造,需要面对现代生活中新的发展趋势。首先,在仔细研究了经验与理性在传统哲学中的对立之后,他得出结论:对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理性与经验在智能表现方面是相互合作、相互联系的。其次,杜威还认真研究了实在与理想两者之间的对立,同样认为这两者并不对立,也并不属于不同的领域。理想不过是实在的演化和发展,在创造力的引导下,升华到更高的或者理想的境界。在说明逻辑学改造的必要性时,杜威阐释了实验调查的逻辑。而在详细阐述道德与社会思考方面改造的必要性时,他尤其强调了对特定的、具体的道德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指出应当通过集思广益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诉诸抽象的道德和社会概念及其理性的体系。

尽管杜威极少使用“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这样的术语,尽量避免“倾向于某个问题解决方案的学派性宣讲”,但讲座还是折射出杜威在哲学上

^① 约翰·杜威,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 纽约:达顿出版公司,第52页。——原注

^② 杜威. 哲学的改造. 纽约:亨利·豪尔特出版公司,1920:3。——原注

的独到之处。随后,当这些讲演 1920 年以《哲学的改造》为题汇集成书在美国出版时,评论者盛赞该书集杜威哲学观点之大成。

然而,杜威的讲座对当时日本大多数的哲学学者,尤其是老一代的哲学家,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家所钟爱的是理性的、绝对的、系统的哲学,而不是杜威所谓的经验的、具体的、实践的学说及实用主义。

但是,在日本,支持杜威观点的专家学者也大有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在留美期间聆听他的授课时,有的是在研读他的著作时,为他的哲学观点所深深折服。早期的早稻田大学就是研究杜威学说的中心。“早稻田小组”的成员中有田中王堂、帆足理一郎以及田制佐重。紧随杜威的观点,田中王堂强烈主张哲学应当抛弃“阳春白雪”般的学究做法,而是应该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帆足理一郎 1929 年翻译出版的《教育的改造》一书,亦显示出杜威对其的深刻影响。田制佐重 1918 年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20 年翻译的《明日之学校》以及 1923 年翻译的《学校与社会》,都反映出他本人对杜威教育哲学的浓厚兴趣。^①

当许多日本哲学专业的学生抓住杜威访日的大好机会,与他进行了多方面的交谈。永野芳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曾经在东京大学就读的永野,是日本最多产、影响力度最大的一位杜威学者,他还是 1957 年杜威学会(The John Dewey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冈部矢太郎的叔父是约翰·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旧交,矢太郎也曾经与杜威促膝长谈。在谈话中,杜威指出日本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相对空白。杜威的这番话语给冈部矢太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他开始专门研究教育心理学,并逐渐成为日本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权威。冈部矢太郎曾回忆说,那次谈话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此,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批对杜威的哲学,尤其是他的教育哲学的虔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占领军接管了日本。随后,在推动日本教育体系建设更加现代化和民主化方面,杜威学说的拥护者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学术领域之外,让杜威在日本深感兴趣的则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对政治和社会自由主义的认同和接纳。杜威写道:“自由主义在四处传播,每个

^① 小林繁夫. 约翰·杜威与日本教育思想. 安阿伯: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4:29—40.——原注

人都在大谈特谈民主主义。”据杜威的了解，击败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长期以来，德国是统治阶级眼中的典范和榜样，而它的战败使军国主义党派众叛亲离。随着德国国力的日渐衰竭，“之前自由主义者只能偷偷地在课堂上低语或者只敢在报纸上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议论的话题，终于可以大声地在公共场合畅谈了”。^①

杜威观察到，自由主义的中心在大学校园。即便是在长期以来被视为保守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堡垒的东京帝国大学里，自由主义思想家层出不穷。一份报告表明，该校政治学学院的大部分师生都是积极的自由主义者。而另一份报告则显示，大学院系中的许多人都是一个称为“黎明”社团的积极分子，并以公开讲演的形式宣传民主主义观念。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学生深受“激进观念”的影响。在东京帝国大学，一群学生创办了一份自由主义期刊《民主》。事实上，杜威了解到，每个月都会有类似于《改造》、《新社会》这种名称的杂志创刊出版。

然而，日本的政治自由主义不敢对目标有任何奢望。杜威发现，“很难想象在日本这个国家，自由主义政党会有一个坚定一致的政纲”。^②政治机会主义是当时自由主义党派唯一奏效的政策。商业与军事利益集团有效地巩固了政府的统治，可以说，国家就是由这两大利益集团组成的。而维护这些势力的工具则是学校里教师教给大家的神话，即天皇是“上天之子”、是最高的统治者，人民要绝对顺从。然而，天皇事实上手中并无实权，因而“这一深入人心的宗教教义实质上巩固了真正掌权者的统治”。^③由此，除非自由主义者敢于冒宗教和社会动乱的危险，他们只能对政府的形式听之任之，最多在政府内部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奋争。据杜威观察，扩大选举权范围是当时最主要的议题。

“民众政治意识与宗教和神权观念的结合”是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日本当局就是用这个说法来自圆其说所谓的日本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有一项神圣使命的言论。而那些反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和军事政

① 杜威. 自由主义在日本. 人物与事件, 1929: 149 — 150 // Joseph Ratner. Popular Essays in Social and Philosophy, vol. 1.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9: 149 — 150. ——原注

② 杜威. 重访日本: 两年之后. 人物与事件, 1929: 182. ——原注

③ 杜威. 自由主义在日本. 人物与事件, 1929: 166. ——原注

策的人就是在与神为敌，与这个国家为敌。因此，自由主义党派总体上虽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们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之完全无能为力。

自由主义者与极端保守主义者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抵制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长期以来，他们对美国一些歧视东方人的法案一直十分愤慨。日本自由主义者和极端保守主义者一致强烈要求废除这些法案，并请求在《国联盟约》中增加有关禁止歧视东方人方面的条款。杜威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凡尔赛和平会谈时没有加入该条款的做法，严重挫伤了日本自由主义者的感情，而极端保守主义者则可以趁机辩解，威尔逊所谓的为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战的不过是信口雌黄，是物质主义至上的美国用来掩盖其垂涎中国、西伯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业贸易及其领土的野心；而国联也不过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资本主义体系，用来控制世界却无需担心军队开支和麻烦的工具”。^①

战争导致的大规模工业扩张刺激了日本的经济自由主义。杜威发现，工业化加大了经济阶层间的差异。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使无产阶级与富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在学术界，人们争论的话题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是否一定要走同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以资方与工方的利益对立为特点的发展道路。”^②

一派观点认为，从“与人为善”的原则出发，这种对立状态既无法避免，又不一定必然存在。这一派代表了旧式儒家思想中寡头政治的观念，主张君臣之间保护和效忠的原则仍然能够适用于现代社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工业大生产中的家长式的管理措施，不仅要善待雇员，而且要提供种种福利待遇，例如，医疗、失业保险、便利的住房及娱乐设施等。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注定腐朽的传统陋俗，完全寄希望于雇主的体察下属。这些知识分子强烈坚持“权利”原则，主张人们享有同等的权利，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去奋斗争取。

尽管日本的自由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杜威认为其直接结果仍然是个悬念：“一个在教育、军队、行政机构中根深

① 杜威. 日本与美国. 拨盘, 1919, (64): 501. ——原注

② 杜威. 自由主义在日本. 人物与事件, 1929: 158. ——原注

蒂固的政党肯甘心束手就擒、自动下野，这似乎根本不太可能。”^①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任何一个背弃民主的举动，例如，拒绝废除种族歧视法案、继续放任帝国主义国家剥削落后民族的做法，都会阻碍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进行。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杜威分析指出：“除非全世界都背弃了民主，日本会一如既往地民主主义迈进。”^②

在日本期间，杜威还有意对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加以认真研究。然而在研究之后，杜威认为，日本的自由主义事业不容乐观。他观察到教学过程中许多“从做中学”的做法，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校对敬拜天皇的狂热重视。杜威了解到，孩子们并没有把天皇就是上天之子的说法当作神话，而认为事实就是如此。连大一点的孩子——即便理智上不这样想，至少在感情上和现实中也都这样认为，直到这个神话在孩子们的潜意识中生根发芽而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至于教师，杜威发现，“任何教师都会誓死维护这些书本上的爱国主义传说。”人们告诉杜威，公共学校的教师可能是全日本最为狂热的爱国者。“不止一位教师在火灾中为了抢救天皇的画像，不是自己葬身火海，就是让学生去抢救而葬身火海。”^③

杜威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杜威夫人也从未走出过人们的视线。报刊在报道杜威的同时，总是会提及杜威夫人及其他对美国小学教育的卓越贡献。女性知识分子特别希望了解杜威夫人在有关女性公共事务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于是3月在东京特意安排了一次答问会。

其中，有人问到了长期困扰日本知识女性的一个问题——女性选举权问题。杜威夫人早年曾经活跃于纽约的女性选举权运动之中。对此，她认为，女性同男性一样拥有同等的能力和才智，值得同样地信赖和尊重，因此最起码的是应当享有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此外，还有人问到了女童教育问题。杜威夫人的问答是，女童同男童一样的天真聪颖，那些拒绝给予女童同等教育机会的组织与机构，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其自身本来可以享有的占二分之一人口的女性在经济、社会以及人民文化生活中的贡献。当被问及对日本允许

① 杜威. 日本与美国. 拨盘, 1919, (64): 502. ——原注

② 杜威. 自由主义在日本. 人物与事件, 1929: 169. ——原注

③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 纽约: 达顿出版公司, 1920: 148—149. ——原注

卖淫行为的看法时，杜威夫人认为，与其徒劳地谴责那些邪恶齷齪的现状，不如切实有效地教育好年轻的女子，为她们日后从事正当和有益的工作做好准备。

尽管讲座的准备和开设工作日程繁忙，但杜威与夫人还是尽量抽出时间丰富他们在日本为时 3 个月的生活。在寄给在美国的家人的书信中，他们向家人描述了日本的剧院、博物馆、寺庙、神龛，以及访问的学校。他们还提到了在日本度过的几个节日、艺伎表演、朋友带他们前去参加的花园聚会，以及在日本友人家中及饭店里所品尝到的独具日本风味的饮食。杜威夫人还在信中讲述了他们购物的店铺和百货商店。

杜威夫妇很喜欢混迹于街上来往的人群之中。杜威特别注意到了身穿亮丽和服的女孩子，发现她们极少恃强凌弱、喧嚣打闹。杜威写道：“不管你对日本有什么别的看法，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彬彬有礼的民族，或许真是太彬彬有礼了。”^①

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座结束后，杜威夫妇离开东京，前往京都及大阪两地。在那里，杜威分别与两地的教师和大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每次讲演后，市政部门及大学的官员都会设宴款待杜威夫妇。

不久，当日本天皇宣布有意授予杜威勋章“旭日章”时，日本政府正式肯定了杜威此次的日本之行。根据天皇的声明，授予勋章是为了表彰杜威在学术上的贡献，也是为了促进美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杜威委婉谢绝了这枚勋章，因为对他而言，其中包含了我最不喜欢的非民主的含义。^②

^① 约翰·杜威，艾丽丝·奇普曼·杜威。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纽约：达顿出版公司，1920：50。——原注

^② 伊斯特曼(Max Eastman)。约翰·杜威。大西洋月刊，1941，(168)683。——原注

寄自日本的书信^①

[美]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1919年2月 东京

如果想看一场盛大的、颜色暗淡的化妆舞会,就看看今日的日本吧。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随心所欲,我会在房顶上坐下或站起来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大声呼叫,让他们来观看表演。如果不是服装款式特别的话,我会认为,所有过了时的服装都到了日本,而非比利时。服装的款式和布料都很奇怪,就好像你在阁楼里翻找着旧日各种颜色和式样的衣服,然后把所有不同颜色、样式和尺寸的和服汇集到一起,配上你从未见过的男人的帽子,还有泥泞的街道。在东京你就会看到这一幕。拉黄包车的车夫穿着紧腿裤,绑着裹腿,看起来很优雅。他们穿着湿漉漉的棉布做的既不是袜子又不是鞋子的东西,整天在泥中、雪中跑着。他们或者站着,或者坐在台阶上,等待拉客人,可还是整天充满了活力。我感到很矛盾,既想坐一下这样的车,又担心语言的障碍,更不忍心让车夫去拉。他们就像安了钢制弹簧的小人,步伐轻快。我还是只坐汽车,这儿汽车不多。我已有点厌倦了新鲜事物不断带来的兴奋感。今天早晨,一个男子从一个古董店里出来,鞠躬说道:“对不起,请问是杜威太太吗?我知道您,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照片。我们这里有许多古董,来看看好吗?我非常乐意将它们送到您住的饭店。您住在哪个房间?”再鞠躬。“请不要送到我的房间,我经常外出。有时间我会过来看看。”“谢谢,夫

^① 译自:John Dewey and Alice Chipman Dew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ited by Evelyn Dewe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0. 选自:关松林. 交流与融合——杜威与日本教育.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33—169.

人,请一定来,我们这里有许多珍贵的古董。”再鞠躬,“夫人,早晨好。”

街景和服装一样,看起来就像久远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东京是日本的现代化都市,但我们也应该留意它在变革时期所保留的过去的东西。但愿我能够清楚地向你描绘出穷人们看上去的样子。年龄到了13岁的孩子看上去从来没有揩过鼻涕,再加上几件和服,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和服外套着和服,衣料用棉布和羊毛制成,颜色鲜艳,有花纹,外面的是棕色的格子图案的和服,卷起来,还是太长,于是被提到了腰上。背上还有一个小孩在和服里面晃荡着,小孩的头上是黑色的刘海,松软的头皮露了出来,从未用手帕揩过的鼻子。背着孩子的那个孩子,年龄也很小,鼻子也从未揩过——我边走,心里边惊奇地叫着,这比以往看过的戏剧更令人感到兴奋。我们对他们感到好奇,他们对我们也同样感到好奇,尽管我们住在多数外国人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就像猴子,无法向司机说明白到底要去哪里。在街上找不到任何英文街名,除了几个英文标识,其他一个标识也看不懂;街道曲曲弯弯,长长短短,呈环状;城里有一条大运河环绕着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似乎每隔几分钟就从它那儿穿过一次;每次穿过它,我们就会觉得和前一次走的方向一致。你爸爸走向一个年轻人寻问这段路,年轻人穿着乌尔斯特大衣,戴着斗篷和毡帽,毡帽看上去像美国的浅底软呢男帽,只不过矮了几英寸,你爸爸问他 Tei-ko-ku 酒店怎么走,如果他日语发音正确的话,应该是帝国酒店。男孩转过身问道:“你们是想到帝国酒店吗?”(用不太标准的英语)我们说:“是的。”他说:“就是那儿的大建筑物。”(用不太标准的英语)于是,我们又走过几个建筑物,路上所有穿着木屐的人都注视着我们的脚。我们终于来到了旧仓库一样的地方,这儿的费用竟和美国第五大道的酒店一样贵,而喝的粥里面却什么都没放。和任何一处老式的法国酒店一样,他们也对所提供的东西精打细算。酒店经理就像那种最有名的、引人注目的玩偶匣玩具,见到你就弹出来,每次当你从大厅走下来,就向你鞠躬,每次、每次、每次都是如此。一切都是如此滑稽,好玩。商店和我们家里的卧室一般大,有足够的空间进去,脱掉鞋子,再踏上地垫。除了外文书店,我们哪个商店都不能进,因为我们的鞋子太脏,没有时间解开鞋带脱掉鞋子,即便想要穿破我们的丝袜。我们打算买几双好看的条纹袜子再去购物。我脑子里冒出想要穿木屐的想法。

1919年2月11日 东京

今天是节日。因此我们无法去银行,但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全民选举和民主化的问题。据说,天皇身体欠安不能来庆贺。据我们所了解,他的病以及关于他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由大臣和女主人来安排。

我们经历的有趣的事情和印象如此之多,已经感到很难及时将它们记录下来。昨天早晨我们去散步,下午有车接我们出去,这样我们已经从表面得来的第一印象中恢复过来。我们看到了大学和幕府将军之墓,从车上望去,那些墓修得极好。明天,我们大概能去博物馆。一排排的石灯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数以百计只灯笼照亮的夜空给人以神秘、幽灵般的感觉。

如果说日本人对他们的历史不感兴趣,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同其他国家一样,至少受过教育的人对历史还是感兴趣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关于人们对茶道兴趣的复苏。他将安排我们去看茶艺表演,但没有说去哪里。从他给我们的印象来判断,不光有表演,还有盛大的晚餐,既能表现出日本新贵的堂皇又能体现日本的品位。他告诉我们某个百万富翁最近花了16万日元,相当于8万美元,买了一只旧的用于茶道的中国茶碗。他说这些收藏家们有各种各样的收藏,每一套茶具都值上百万美元。这只特殊的茶碗是黑瓷的,装饰着鲜艳的色彩。他告诉我们还有一种茶,产于中国,是将茶树枝嫁接到柠檬树上。他有这种茶,是中国的大使送给他的,我希望能够有幸品尝一下。

说到酒店,你可能会对那位经理感兴趣,他刚刚从沃尔多夫和伦敦回来,在那些地方他一直在学习怎样和人打交道。他们提供给你爸爸的外汇率似乎是其酒店发展方式的一个标志,他们还将建更多的酒店。这家酒店在日本是一流的,目前只有大约60套房间。

总的说来,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8月初,讲座应该就结束了,正是开始旅游的时候。没想到冬季来东京竟是个好计划,因为这里的气候虽然算不上太好,却不是特别冷,尽管不容易看到棕榈树如何在雪中茁壮生长。日本似乎培育出一种独特的半热带植被,可以抵御冰冻和冬季。我能预见到我们会很忙,接下来的几周,你妈妈将比我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各种观光活动。无法描述这是多么令人着迷,当然这很类似于书籍和图片,但从质量上来说,观

光带来的感受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不只是零散的标本。

1919年2月13日 东京

今天，我们开始了独立购物。这里说英语的人之多，英语口语程度之高令我吃惊。在大百货商场购物与在家乡一样方便——而且从受到的关注和舒适度来讲这里更使人感到方便。他们给我们包装纸或鞋套套在鞋上。设想一下，如果在芝加哥能在这样的天气里效仿日本的做法，该是何等的改观。

一番狂风暴雨式的社交、寒暄活动，尤其是昨晚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相比之下，今天下午显得有些沉闷。让我来详细叙述一下。我们每天早晨都在8点钟吃早餐，今天我们还未吃完早餐人们就开始打进电话。两位先生用车送我们去学校，我们再次拜会了校长，他是该校的绅士，我想是儒学家。能够受到接待而不是待在车里，你妈妈对此印象颇深。不过我想，校长对于她的拜访比我的拜访更感愉快和受到恭敬。然后，我们去了我提到过的那家百货商店。到那里购物的人很多，因为价格固定，质量讲求诚信，而且如有发现别处同样商品价格比此处低廉者还有奖励。他们还说，在这里参观日本，了解服饰、装饰品、玩具、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最为方便，因为来自全国的日本人都到此观光。商店来了一群被称为红地毯的农村人；人们之所以称他们为红地毯而非暖房是因为他们在冬天里穿着用线串起来的红色床毯而不是穿大衣。到了晚上用起来可真是方便。

虽然距离3月的女儿节还早，可各大商场已经摆上了节日的商品——这是桃子节，各种穿着旧式服饰的节日玩偶——国王、王后、仆人、女佣看上去非常有趣并具有艺术性。日本已经对玩偶加以利用，而我们还没有。然后，我们又在这里吃了午饭，很普通的日本午饭，味道非常好，我们用筷子吃的饭。然后，他们送我们回酒店。2点钟的时候，一位朋友来带我们去拜会涩泽（Shibusawa）先生——我想甚至只住过一晚的外国人谁都知道他是谁，不过你可能不会知道他已经83岁了，皮肤却像婴儿一般，反应敏捷，思维活跃。过去的二三年，他已经不再参加其他活动，而专心于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活动。很显然与许多美国的百万富翁所做的不一样，他所感兴趣的是知识与道德方面的活动，而不只是捐钱。他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解释了他的生命理论

(他是一名纯粹的儒学家,不是宗教狂),尤其是他正尝试着做的事情,不单纯是救济。他希望保留过去的儒学标准,并使之适应现在的经济状况;这基本上就是你也知道的封建经济关系的道德观,他认为现代的工厂主能够对雇员采取旧式的父亲般的态度以防止日本的阶级斗争。激进派嘲笑这种观点,在美国也是一样。据所有的报道,日本还没有出现劳资问题,尽管战争带来的大量财富和工人日渐贫困已经开始使社会出现变化。到现在,工会还没有被批准成立,但政府已宣布虽然不鼓励,但不再禁止。

书归正传。还有一位朋友邀请我们到帝国剧院去看戏剧,剧院的坐椅都是欧式的,建筑物很精美也很大,与任何一个首都的剧院一样精美,和纽约的剧院一样没有做过分的装饰。4点开始表演,中场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吃饭,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你可以带饭,吃饭时没有座位,放在腿上吃。没有一部戏剧是严格意义上的旧史剧,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是一部由古典剧改编的戏剧——大意是关于一匹忠诚的马和几世纪前的农夫。最没意思的是一部问题剧——主要是对现代问题的哲学论述——自我的表现权利与艺术事业——一些甚至对日本观众都没有艺术感染力的格言之类的东西。观众的理解力都很强——几乎和巴黎人一样有专业的欣赏力,很显然,这部戏剧的观众都是这样一类人。在日本,演员的演技很高超但戏剧本身缺乏艺术性,就连美国的观众也不会太关注只注重道德情感而不注重艺术感染力的剧目。但是,像那些基于老故事和旧传统的古典戏剧却更加具有戏剧性和夸张性。这个日本人还说,旧式剧院比半欧式的剧院拥有更优秀的演员。我猜想,这些半欧式剧院是由政府资助的。在帝国剧院,管弦乐队的座位是1.5美元;在全天营业的剧院里,同样的座位价格更高。甚至在帝国剧院还没有鼓掌的习惯,尽管在大幕拉下时有一两次稀稀拉拉的掌声。日本一直利用旋转舞台来进行布景变化,就和铁路的转车台起的作用一样。好了,昨天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昨天我们事先已经邀请了2位先生吃饭,把此事告诉朋友时,他们说:“哦,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改天来嘛。”看来这是日本的礼节,一天的任何时候打电话在日本也是一种礼节,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可是,非常遗憾,今天他们来电话说今晚不能来了。

今天一天相对比较平静。只有4名日本客人和2名美国客人。其中有2名日本客人,一名是女士,她是女子大学的校长;另一名是该校的年轻教师,

她来自有钱的贵族家庭，已经变得非常前卫。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要对见到的每一位日本人鞠躬，询问他们能否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得利用我的有生之年学会这里的友好和礼貌的举止行为。恐怕比阅读有趣的是写下这些事情，更不用说比阅读更有趣的是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替我们把书信保存好，待我们老了不能四处游历时拿出来翻看翻看，希望回想起那些游历时光：所到之处，人们待人如此善良，让我们飘飘然，自觉是了不起的人物，既享受到家庭般的欢乐，又体会到身处奇特的半魔力国家所产生的惊喜，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半魔力的。对于那里的大众，人不可能不对他们的快乐状态产生好奇，也不可能不认识到何谓真正的古老而拥挤的国家以及佛教与禁欲的奇异快乐是如何发展的。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日本是一个新生国家；我不再相信那种欣赏古董得去中国和印度的说法了。表面上可能是如此，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任何国家都是古老的，那里生与死如同树叶生长与凋落一样，那里个体的人同树叶一样。旧世界与新世界不仅是相关的，它们和任何事物一样也是近似独立的。

我们听见外面有吹哨声，你妈妈以为是银行的信使来了，于是我按铃让门童带其进来。可是，哎呀，事情没有那么浪漫，那是通心粉小贩的叫卖声。

1919年2月 东京

下飞机后一个星期，我们到了一个小山上。它位于美丽的花园内，树上的花蕾含苞待放。李子树不久会盛开，接着是3月的山茶花，山茶花这种植物可长成很大的树木。远处可看见奇妙的富士山、周围的丘陵以及更远处的平原。一条运河恰好从我们的山脚下流过，沿运河是从前闻名遐迩的樱花园，但几年前基本上被一场风暴所毁掉。

我们独自住在一套漂亮公寓，几乎到处都是窗户，该公寓内的窗户都是玻璃窗。一间大卧室、一小化妆间和一间书房。现在，我坐在书房里，阳光从四面的窗户照射进来。尽管炭火盆完全能够暖脚、晾干头发，像现在我用炭火盆暖脚那样，但我们还是需要阳光。我们被有关现代日本的各种书籍所包围着，因此，我们读书的欲望一刻都不能等待。这个房子很大，山顶上一栋又一栋房子，其间有游廊相连，而游廊又与一个又一个房间的墙壁分离。我要

拍张照片。在这所房子的最远端是 X 先生的图书馆,由几个房间组成,而在其尽头是举行茶道的茶室。我们的主人并非新贵,不会因举行茶道而购买价值百万美元的茶具。对此,他嗤之以鼻。不过,茶室内有一个金色漆艺茶桌,金光闪烁,还有其他几件旧家具,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均为无价之宝。看我们用早餐的情景,你会感到好笑。女佣於贞(O-Tei)把早餐端到阳光明媚的客厅,先吃水果。两张小漆桌可随意移动。饭菜与其上桌方式是我们西式的。古朴的广东青花瓷碟和其他日式餐具可爱宜人。用过水果,她用两根铁杆子扎住面包,放在炭火盆上烘烤,并把烤好的面包直接用铁杆子递过来。同时她教我们日语,我们教她已知道的英语,我们每次说话她都咯咯地笑。唉,我们把烤面包放到碟子上面她却不见了踪迹。咖啡壶在边桌上,我们急着找杯子,当然也有些担心会破坏规矩。没杯子,她给忘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了,拿来了杯子,我们喝上了咖啡。随后她再次离开,用青花瓷盘端回来炒鸡蛋。然后,她一边用铁杆子递给我们一片烤好的面包,一边咯咯地笑了几声并轻柔地说话,我们从未听过那么温柔的嗓音。我告诉她烤面包掉到干净的地上不碍事,她乐得咯咯不止。于是,她去大卧室取煤气灶上的咖啡。这完全像一场美丽的戏剧,没有受到任何对效率、时间及省力器具的模糊观念的干扰。之后,两位女佣整理床铺、扫地,一人抬起沙发的一端,另一人掸沙发下面的灰尘。她们面带笑容鞠躬,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感兴趣,好像我们是她们的亲朋好友。

现在女管家进来了,一边不断地鞠躬,一边非常非常慢地说她愿意陪我去城里转一转,介绍一些情况,与此同时我教她英文。我问她是否要去教堂,她说自己不是基督徒。想象一下,那听起来多么有趣。她是 X 先生的秘书,新基督学院的学生,而 X 先生是该学院的院长。她现在进来侍奉我们用早餐。她没走,跟我们学说英文。她会很多英文,但太书面化,帮她转换成口语方式十分有趣。设法让她张口,打破日本妇女礼貌的轻声细语是我的主攻方向。昨天,我们参观了距此几步之遥的女子大学。校长成濑(Naruse)先生身患癌症,无法治愈。虽然卧床,但他仍能十分自然地谈话。他已向学生作了告别演讲。在一次讲话中,也向教师们道了别,并任命代理他现职的教务长作为接班人。这所大学开设插花、长剑和日本礼仪等课程。行政主管是一位很好的女士。她说我不仅可以来,而且可以参观自己想看的東西。

当天下午,又有来访者,其中有两位妇女:一位是 R 大夫,骨科医生,在当地已行医 15 年,是我们房东的老朋友;另一位是 T 小姐,在美国 7 年,刚刚回国。我在斯坦福大学听过她的许多情况,并给她捎过信。她在女子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但她说校方担心她开社会学课程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她先教英文,然后将社会学融入英文课堂,逐渐过渡到社会学。她是一位有趣的名人,有人跟她说我可能很孤独,因为你父亲不在,所以,她要带我和其他任何我想带的朋友去看戏剧。我们已去过帝国剧院,享受过涩泽先生的包厢。这次最终安排去看歌舞伎剧,我们席地而坐欣赏真正的日式表演剧,那是我非常渴望的事情。我知道,这种演出从上午 11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10 点。

1919 年 2 月 22 日 东京

昨天,我们去看日式表演剧,下午 1 点开始,约 9 点结束。坐在包厢里,不断地有人端上茶点,两幕戏之间有丰盛的饭食。同多少现代化的戏剧相比,我们更喜欢传统的日本戏剧。涩泽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包厢,准确地说是两个。他的侄女和另一个亲戚外加住处的两个年轻人一同前往。我不想对传统的日本戏剧作评论,只是想说学习日本历史与传统的方法是看戏,并有人陪同解释;尽管与中世纪欧洲戏剧一样朴素,但服装却更加精致昂贵。当 40 名武士出现在舞台上时,场面十分壮观,衣饰货真价实,非哗众取宠之物。你妈妈比我看得多,我得 4 点半去协和学会——实际上我开始一点都没指望去,因为涩泽先生说他把我们安排在包厢里是因为担心我不在时你妈妈可能会寂寞!约有 25 名日本人和美国人出席会议。我讲了 30 分钟话后,在旁边的饭店用餐。之后,一起逗留了一个小时左右。

除了看戏,本周的大事还包括参观女子大学,或许你对此不以为然,可你哪知道我们都看了什么。离得不远又有人带过一次路,我们早早就动身步行前往,可是我们忙于看店铺,一直走到尽头才发现走过头了,于是折身往回走,因而迟到了。上午,我们在他们的实习小学和幼儿园度过。所有的孩子都身着非常鲜艳的和服,要多鲜艳有多鲜艳,多半为红色,夹杂一些别的颜色。小孩子们待的房间像花园,亮丽的鸟儿栖居其中,快乐无比。所有的课堂活动都很有趣,但彩色蜡笔画尤为突出。孩子们享有许多自由,不是在做

毫无个性的模仿——似乎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在绘画和手工活动中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多样化，如此少的雷同，毋庸说质量比我们孩子的平均水平高得多。孩子们没有受到明显的约束，但他们既愉快又表现得好。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来访者并不注意，原来以会他们会全体起立鞠躬的。如果你要想到一切正常的课上活动——包括在这所学校内的大量手工、绘画等以及到六年级期末学会 1000 多个汉字，既要会读又要会写，你就会有所了解孩子们有多么勤奋；当然，他们还得学会日本字。之后，我们 10 人共进午餐，由家政系的女生烹饪和侍奉。绝妙的午餐！——配菜装饰远胜过西餐。餐后，真正的表演开始了，先是插花，分古典和现代风格；接着是示范给客人上茶点的古典礼仪，地位低者如何拜见地位高者；随后是演奏竖琴——一种放于地上的 13 弦竖琴：先是两名女生和一名教师演奏；然后是那位教师独奏，他是位盲人，据说是日本最好的琴师；他演奏了《溪中漂棉》，据说他很少演奏此曲，一年仅一次。哎呀，你可以听到溪水起伏荡漾拍打溪石的声音，听到女人们吟唱和击打棉布的响声。我对它的理解好于我们西乐中的泉水，我因此认为也许我的耳朵生来适应日本音阶，或缺少日本音阶。之后，我们被带到茶馆欣赏茶道。你妈妈跪坐在榻榻米上，我基本坐在椅子上。后来，我们又去体操馆观看传统女武士的剑矛操练等项目。教师是位 75 岁的老妇人，身体柔软灵活得像只猫，体态比任何在场的女生都优雅。我现在对被视作教养的传统礼仪和仪式极其尊敬。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完美，不全神贯注是不能做到的。现代儿童体操运动同这些礼仪相比十分令人遗憾。出了体操馆后，我们来到位于一个花园内的学生宿舍。宿舍是简朴的日式建筑，我们的女生会认为像仓库，但一切都很洁净，可以在地板的任何地方用餐；南墙皆为玻璃窗，阳光充足；女生们坐在地上学习，书桌约 1.5 英尺高，没有使室内显得凌乱的床铺和椅子。我们被带到其他房间后，回到餐厅，品尝了非常精制的日式佛教斋饭，饭菜都盛于小碟，包括作为甜点的甜食，五六种各不相同，制作精美；还饮用了三种茶。

这里人人讲礼貌，我们回去时要么文明得让人认不得我们，要么因看到他人不够文明而生气，也让人认不得我们了。X 先生用自己的车送我们回去。我们到达大厅时，5 位女佣鞠躬微笑，替我们拿拖鞋，挂衣帽，进进出出，像是去野餐。我认为，女佣们喜欢她们日常工作的这样变化，因为她们真的微笑，

好像在享受自己的生命时光。如果是敷衍和做样子的话，我便成了大傻瓜。

哦，我没有向你提及此次旅行的理性思考。此外，我也太忙而没有充分时间去思考。可能在中国，它们会自然地诞生于脑海。在上封信中，我忘了告诉你，内政大臣给了我一个可续签日本铁路头等座位的月票。这里一位朋友请他给你妈妈也办一张，但他却说很抱歉，该特权无法授予妇女。于是，我是家里唯一的受赠者。我还没有机会使用，不过会创造机会的，以便体会一下那种特权的感受。

1919年2月28日 东京

我没怎么观光，只是逛街景。一般的散步锻炼有人陪着，而且线路总是不重复。有天傍晚，我们饭后来到了附近一条热闹街道——沿人行道（或准确说沿街）将书摆开的书商、小餐车、拥挤的街道与商店。到处都有电灯，一些年轻艺伎和拿着她们的日式三弦琴的女佣小跑而行。除了逛街，我们还去了电影院和一家日本料理店。这里的餐馆都是特色店。我们去的那家是面馆，我们品尝了三种面：小麦汤面、炸虾荞麦面以及海带凉面。我们俩总共花了27美分。而这个普通的小店，比任何美国饭店甚至最好的都干净。电影情节似乎比我们的复杂，当然进展较缓慢。在银幕附近的小间内有一男一女，只要演员嘴唇一动，他们就配音，这当然会有话多的可能。片中有几个打斗场面，谋杀，恶棍与被迫害的年轻未婚女子，以及有惊无险的自杀未遂。但即便有向导陪同帮助，我还是看不懂。这是简单的娱乐活动。除白天散步，我们一般去寺庙。总的来说，那里的人比寺庙有趣。有时，你也感觉到树木布局美妙，产生了像天主教堂一样的宗教宁静效果。总体上，这里的朝拜与罗马天主教的相似，其程度比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都明显。他们略显稚气：在儿童神殿看玩偶、毛毛狗、玩具风车。此外，他们的草拖鞋、草凉鞋以及重要场合穿的儿童和服都十分动人。有时，母亲剪下自己的头发，挂起来作为供品。其他事情则既有趣又令人哀叹，如将书面祷文搓成唾沫纸团唾粘到神的身上。为此，有些神像现在已罩上金属网。我已非常习惯这里的街道，能辨别多数商店，如棺材铺、桶匠铺等。使街道如此有趣的是，你可以向内观望所发生的一切。我忘记提到在街上看到的一件最有趣的事情：一位捕鸟者拿着一

根长长的欧椴木杆,好像竹渔竿,一个带活动门的放鸟的筐以及其他一些工具。可是,我没看到他抓到一只鸟。

1919年3月2日 东京

今天提早写信是因为我们要去镰仓。你可能听说过 50 英尺高的大铜佛像吧,它就在那里。一位朋友安排我们去拜见日本最著名或学识最渊博的佛教高僧,属禅宗教派。该教派颇具哲学思想,信奉朴素生活和适当禁欲。就是这个教派,对古代武士阶层的影响最大。镰仓在横滨的另一端,是幕府将军的旧都,有许多历史性神殿等古迹。

昨天,我第一次通过翻译向教师协会约 500 名教师发表演讲。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众多小学教师中,大约仅有 25 名女教师。晚上,我们去吃晚饭并参加了英语口语学会的招待会,有美国人和日本人,多数为日本人,男人和女人都有,是少见的社交场面。曾经听说这是东京一处日本男人和女人以社交方式自由相见的地方。会长说日本人在社交场合相见显得很矜持,至少酒过头遍之前只要讲日语就是这样的;但说英语会恢复他们在美国养成的习惯,使他们有所放松。这是语言影响心理的有趣现象。

1919年3月4日 东京

你会吃惊地发现这个国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至少我看是这样。这里,有一种我们不理解的社会民主。全日本都在谈论民主,对其理解要从立宪制政府而非打破现有政府形式的角度出发。选举代表似乎没有扩大到包括大量纳税人的程度。任何体制下纳税人是制定政策的力量。扩大选举权是目前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和扩展男人的专门教育对未来立法人来说是转折点。战争期间,日本诞生了许多新的百万富翁,他们已经为男人建立了新的职业学校。440 名学生即将被送到国外不同的国家生活,津贴丰厚,其中没有一位女性。在任何专项提案中,都没提及女性,甚至没提到妇女的需求。

昨天开始是这样度过的:因为是著名的玩偶节,早晨我为一个看上去不怎么样的洋娃娃做了件衣服,它是我为一个小姑娘费劲找到的,完全是美国

风格。另一个是一个可笑的仿制品，仿制的是美国婴儿，看上去却像半个日本人。尽管我能找到做长衣服的料子为它着装，但还是照原样送人了。他们邀请我到家里看他们的展示。一些玩偶有 200 年的历史，是娘家祖辈流传下来的。我要找到有关这个节日的一些文献，因为内容太多而无法写清楚。但人会即刻喜欢上玩偶倒是事实；它们不像我们的洋娃娃那样没有生气，而是艺术品，象征着民族生活的各个不同阶段。小姑娘们很喜欢自己的玩偶。要是我对此事前有所了解的话，我会知道拿什么礼物来日本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无助。如果你来，就带洋娃娃。

下午，我应邀去的一个家庭拥有全国最佳玩偶收藏或最佳收藏之一，此行真开眼界。开始令我十分不快，因为迷路，到出发地——帝国饭店迟到了 45 分钟。拥有这闻名收藏的家庭为官宦世家，女主人系大名的女儿，所以他们的玩偶非常古老。它们固然精彩，但更为精彩的是古老的大漆家具、古瓷器和玻璃器皿。玩偶茶点用极小的碟子被端到小桌上，客人们坐在地上，女主人和她的家人忙着上茶点。我们喝的白色米酒从漂亮的有盖小玻璃酒瓶倒入玻璃酒盅。我们举杯为其家人的健康干杯，酒味甘美，香气宜人。用过茶点后我们来到茶道室，之后我们来到家人招待外国人的地方，享用真正的茶点，其中包括许多种漂亮的糕点。茶杯下面的茶碟饰有樱花图案，现在正赶上樱花时节。茶杯撤走，用杯子上来的是浓郁的巧克力。桌子高度适合普通椅子。所有供外国人居住的住宅风格不雅，但非常舒适，属维多利亚中期的风格。夫人劝我们品尝特色糕点，结果吃得都很饱。一种糕点呈美丽的粉色叶子形状，包在一片去年存储起来的樱桃叶子里。叶子给糕点增添了美味，也不使糕点黏手。然后是看似巧克力穿在扦子上的 3 个棕色小圆糕点。你把第一个完全咬掉，其他两个可以边吃边移动。仅这一串糕点就可吃饱一顿饭，并且很有营养。所有的糕点原料都是豆糊，像我们最油腻的酥油面团。第二道茶点结束后，我们道别离开。夫人、她的 3 个漂亮女儿和她的妹妹都送我们到大门口。当汽车开走时，我们最后看到的是男管家和这些漂亮女士们的鞠躬，和再一次齐声说出的再见。年轻姑娘身着平纹毛料和服，颜色和图案极其艳丽，甚至对日本人来说也会产生联想。她们看似花儿盛开在古老永久的花园里。

花园不好描述。我想象过日式花园的样子，但发现它与实际完全不同。

这个地方很大,草现在呈棕黄色。其大部分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松叶,似地毯一样。沿松叶层边缘一条草绳勾勒出优美的轮廓曲线。大块石头的运用是整个最令人感到意外的部分。它们很古老,饱经风霜,呈现许多灰色和蓝灰色色调变化,背景是矮灌木,所产生的简洁朴素效果颇具古典美,那是我们几个世纪才可能实现的效果,而且还得耗费掉大量物力。

然后,我们去 M 教授家赴宴。他有 6 个孩子,大的是男孩,约 25 岁,帝国大学毕业,现在是政府的工厂督察员,能说 8 种语言,其中包括其爱好的世界语。法语教授夫妇也在场,他们俩诙谐睿智,谈话中相互配合,年轻的丈夫口语比起我们任何人都好,发音极为准确,但他从未离开过日本。餐后,2 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出来向在场的人鞠躬,然后走到矮桌边,蹲下玩围棋,晚饭后的时间一直在玩。围棋是一种家喻户晓的棋类,不要问我更多的内容,只知道用格子棋盘下棋。食品饮料接连不断,直到晚上近 11 点我们才离开。日本人家里有许多我们没有的可口饮料,也许他们的不如我们的最佳饮料,但丰富了非酒精饮料的种类。除饮料外,我们还饮用了两种酒。

这是我能记住的最近一次晚宴。每个盘子旁边都有一张菜单卡,我猜它们是给外宾的纪念品,如果真是这样,我却忘记拿了。我们吃的有汤、两种面包和黄油,还有鱼馅饼、去骨小鸟加蔬菜烤面包、几烤盘日式通心粉以及肉片很嫩的烤牛肉(配有土豆球、豌豆、肉汁、沙拉以及另一种忘记菜名的菜)。橘子酒后上的是白酒和红酒。然后是美味布丁、蛋糕和草莓。那些水果于户外种植。它们栽在一排排人工加温的石头之间,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加温的,用低矮的竹支架防止草莓秧触及石头。草莓与稀奶油一道享用,最后是香浓的西式咖啡。

饭后,我们离开西式招待厅上楼来到日式大房间,坐在火炉边,孩子们也来了。即刻茶水端上。然而就在我们要起身回家时,被劝留再喝一杯甘甜的橘子酒,还有多种瓶装天然矿泉水。日本人的乐趣之一是看外国客人学日本坐姿,你想不到他们以此为乐。我能笨拙地应付,但你父亲甚至都无法打弯。星期天,我们在日本著名高僧面前坐了 2 个小时,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哪怕在松软的垫子上坐上几分钟的话,你就会想象到我们身体是否扭动,双脚是否变得麻木。得体的起身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1919年3月4日 东京

朋友带我们去镰仓，那事先读导游手册都没有意思，我想我的描绘也不会有吸引力。但要提的是700多年前，第一代幕府将军定居那里，使之成为他们的首都，现今除了佛教寺庙外什么也没留下。我们在火车上遇到帝国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他去那里参加一位将军诗人的70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将军诗歌讲座。我们还碰到几百名男女小学生，由老师带队星期天观瞻历史遗址。供奉战神的大庙之一是一座博物馆，内藏古剑、面具以及其他藏品。朋友带我们去拜访日本禅宗教派的首领释(Shaku)大师。他通过翻译与我们谈了约2个小时，问答关于佛教的问题，尤其是他的不同观点。非常有趣的是，我们被引入一个比例和谐的日式房间，壁龛内挂着一幅漂亮的画轴，5条腿的金属小桌镶嵌着珍珠。房间里除了嵌板天花板上交替画着美丽的蓝色和金黄色菊花外没有其他什么装饰，5个丝织坐垫供我们使用，房间堵头有一丝织坐垫为其专用。约5分钟过后，另一扇屏风门打开，大师出现了，身穿飘逸朴素的紫铜色长袍。接着茶与松糕端上，与此同时谈话过程已经开始。顺便我应该说，当看到人们席地而坐时佣人们的鞠躬与跪下的动作看上去更加自然而不那么谄媚，她们必须跪下递送东西。他的为人具有君子风度，相当克己，不过于优雅，丝毫不像有些印度教大师那样油光锃亮，而且很有魅力。在我们离开时，他感谢我们的到来，对结交了一些朋友表示欣慰。其谈话主要涉及道德但颇为形而上学，多少有些不易理解，让我想起了罗伊斯。这是一次有价值的经历，因为他是日本学识渊博和极具代表性的高僧，如前所述，亲眼所见完全不同于阅读。在某方面他比罗伊斯现代，他说神是人内心的道德理想，当人发展时神道也发展。我们看到了50英尺高的巨型铜制佛像，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最著名的独尊雕像，让你不能不看。其气势不亚于天主大教堂。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我们的主人似乎是位通才：参议院议员、教育权威、兰花爱好者、画家以及我搞不懂的一些才能。餐桌边就座的有20余人，简短的讲话后用香槟酒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在场的还有2位内阁成员。女主人是8个孩子的母亲，看上去约30岁，而对于30岁的人来说她是很漂亮的。饭前饭后有三四个小女孩在周围，像其他新一代的女孩子一样活泼自然，如你

所愿。养成的性格当然是日本传统的，因为即便最活泼可爱的儿童也知书达理。不管你怎么看日本人，他们大概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也许过于有教养了。我问你妈妈，这些女孩们何时进行洗礼使其生命离体，她回答这些女孩子从不洗礼。

成濑校长今晨辞世，他患的是癌症，幸好没有熬更长时间。他是日本最杰出的人士之一。去世前两天，皇后寄给他 5000 美元供办学之用，这是一笔不小的捐款，将有助于妇女的教育事业。说到我们就餐的这个家庭，可谓出身显贵，单凭他们介绍玩偶节时拿出一些皇室王妃们送给女主人的精美玩偶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顺便说一下，玩偶绝非玩物，它们是可供鉴赏的艺术品和历史。孩子们拿出了自己的美国洋娃娃给你妈妈看，一共有 10 个。

1919 年 3 月 5 日 东京

我已举办 3 次讲座。他们是有耐心的民族，听众仍然较多，大约有 500 人。我们逐渐和许多人有了一面之交，如果能有两三星期不准备讲座的话，我可以认真地了解一些事情。可现在这样，我只能积累一些印象。毫无疑问，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会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行动。如果没有实现和平民主的诺言，保守且实力仍然很强大的官僚和军国主义者会说他们说过情况会逆转的。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尤其我国，采取恰当行动的活，这里的民主进程会稳步快速地如期进行。

1919 年 3 月 10 日 东京

昨天，我们第一次欣赏了能剧(Nohdrama)^①。我们上午 9 点到达那里，我下午 2 点前离开去参加成濑先生的葬礼，而你妈妈一直看到近 3 点，她得去一所学校讲演。你妈妈可能比我描述得生动，剧场建筑是一种谷仓似结构——完全是伊丽莎白式剧院，没有舞台道具，只有一些活的小松树和一个画的大松树，还有华丽昂贵的戏装和面具。欣赏水平是后天的，但可以很快

^① 能剧，日本最早的剧种。由三种要素，即“脚本”（包括歌词和念白）、“型”（舞蹈程式）以及“和”（乐器伴奏）组成。——编者注

培养起来。如果演出不是艺术性突出而且演技超卓的话,那对外国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演出。事实上,演出很吸引人,尽管很难说除了完美的演技外还有什么其他吸引人的地方。有意识的控制力当然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

成濑先生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因而其葬礼是件大事,东京所有的汽车和黄包车都集中在那里了。在葬礼上,大约 10 个人讲了话,即便对我这样什么也听不懂的人来说也是震撼人心的。其中一个文明之举是发言人在向听众鞠躬之前向遗体鞠躬。存放遗体的棺槨位于台子上,周围是鲜花,比美国葬礼上用得多。

今天下午,我们本来要去参加男爵个人的茶话会,可他患的流感变成了肺炎。

回头说星期六,招待会令人愉快。我们遇到在教会中小学和大学任职的美国教师,在我看来他们友好而睿智。对传教士的指责似乎甚嚣尘上。在朝鲜就发生了与传教士有关的骚乱,因为有人在那里煽动独立,它似乎始于曾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朝鲜人。这里的传教士似乎分歧很大,一些人责怪那里的传教士,说他们会败坏日本各地基督教的名誉;而另一些人则说它证明基督教教义有一定意义,对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促使国外评论和宣传,并使日本人改变其似乎以武力控制为手段的殖民政策。有传言说,前朝鲜皇帝是非自然死亡,是自杀身亡,想推迟或阻止其长子娶日本的公主。他们本来要尽快完婚。似乎无人知晓是有人编造传闻挑起革命运动还是确有其事。与此同时,据说婚礼即将举行,日本人为可怜的公主难过,她是牺牲自己嫁给了外国人。

星期二晚上,妈妈邀请 X 夫妇和其他一些人到日本餐馆吃晚饭,包括我们自己共有 8 人。在这家牛肉馆里,我们席地而坐,使用筷子。薄薄的小牛肉片被生着端上来,外加调味用的蔬菜,牛肉片放在炭火盆上的小盘子里,每两个人一个炭火盆。自然是乐趣无限,恰似一种室内野餐会。

哦,对了,星期五上午,我们去了帝国博物馆,馆长带我们四下参观。我不想描述博物馆,只是想说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被带到一家烟斗店,你妈妈买了 3 只日本小烟斗,即女士烟斗,相当精巧。店主说,这是他第一次卖东西给外国人,所以送给她一个女士烟丝袋和一个烟斗套,都是用荷兰布制作的,虽

说不很昂贵,但也相当于购物的全部费用,肯定超过他的销售利润。这些东西着实让人喜欢,因而关于他们经营花招的传闻不攻自破,这实在是对外国人的友好之举,尽管他自己说他们卖古董时一般会对外国人提高价格。

1919年3月14日 东京

我们刚参加过一次小规模野外聚餐会。你妈妈有点感冒,所以,仆把晚饭给她送上楼,以免孤单也把我的送上来。妈妈拿出一本日语短语手册,当着她们的面读“不同短语”的发音,看她们咯咯笑得直不起腰来,什么戏剧也没这么滑稽有趣。我吃到最后一口时问及食物的名字并且说其名字,然后说“sayonara”,即“晚安”。这种传统的滑稽场面是幽默的典型例子。他们当然是性情温和的民族。我观察过从附近公立学校出来的儿童,未见一例欺负人或挑逗的情况,只有特别温和的那种,没有争吵和近似于争论的情况。而且,他们都是健壮的小家伙,不娇生惯养。看10岁或12岁的男孩子玩儿童捉人游戏(playing tag)和用带子把一个男孩子绑在自己的背上跳沟渠是很好看的。没有公开责备或责骂孩子的,也没有顶嘴的,更不用说打孩子或没完没了的唠叨的,起码在公众场合没有。有人会说孩子们表现好,所以不被责骂,但相反的说法才是合理的猜测。必须承认就和蔼的外表、快乐和礼貌而言,他们没有受到不好环境的影响。一些外国人说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可说这话的人从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也没好到哪去。不管怎么说,表面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然而,日本人说他们的礼貌只对朋友和认识的人,不是说他们对陌生人不礼貌,而是他们对生人不关注,不会特意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我提到过买烟斗时那位给你妈妈礼物的店主。昨天,我们在那个区,妈妈又去那里买了个烟斗,跟他讲了人们对礼物的赞美。于是,他起身摸出一个更加贵重的烟丝袋来,多少有些磨损和陈旧,是那种现今舞台演员才使用的。他要送给你妈妈。你妈妈自然尽量拒绝,可没有办法。他通过和我们一起去的朋友说,他非常喜欢美国人。既然上升到了国际关系的高度,我们得考虑送他某种礼物。然而,我们把此事告诉了这里的美国朋友,他们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今天上午,我们本来要去参观贵族女子学校,已约定好带我们四下看看。但你妈妈感冒因而无法成行,我们给人打电话看是否能改变时间。今天下午,就有人给她送来一些可爱的百合花和孤挺花,送花人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弗洛伊德理论的追随者会根据我的这些话即刻推断说我该有多么不礼貌。

晚饭我们是去一家日本餐馆吃的。在这家鱼味餐馆里,我们自己烹制鱼和蔬菜,但这次不用炭火而用煤气。我们吃了配菜、鱼、龙虾等,数不胜数。店员不是拿来菜单点菜,而是端来一个大盘子,上面有各种样品供你自己选择。其中有长着半个贝壳的鲍鱼,有点像我们的蛤蜊,但不那么难咀嚼,更不用同大蛤蜊相比了。我没有品尝炸鱿鱼和其他奢侈食物,而是体会更加边缘化的东西。有时间,可尝试用筷子吃带壳龙虾。你会采用比筷子更加古老的方法,我就是那样做的。这家餐馆十分普通,尽管以其烹鱼的秘方而闻名。这次餐费比其他地方都贵,也许是因为我们品尝了太多的围碟。其他地方8个人花费不到5美元,可享用美味和一切任何人都能吃的东西。

1919年3月14日 东京

早餐的仪式结束了,我惋惜你们不能分享这些极大提高生活品位的日常节日活动。目前,我们正在佣人们的帮助下学习日语。我未能参加一所私立幼儿园举办的玩偶节活动,结果,今晨收到孩子们寄来的明信片和许多他们自制的礼物。礼物都是玩偶,很有趣,我要寄回家一些。随送来的礼物,他们写道:“我们做好蛋糕准备您的到来。当您不来时,我们绝望极了。请下次来吧。”我确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它的语言是很难学会的。导游手册中的语句表达方式系男人们的用法。于是,当我结结巴巴地说出那些语句时,姑娘们简直乐得要死。她们告诉我,应该用更为复杂礼貌的女人方式说话时,我讨饶了。这完全是一个逗乐子的游戏,不至于她们为了随时添加饭菜老是盯住我们每一口吃饭动作。她们做的一切都表示最善良的态度,每一个行为或动作都是友好的。

今天的日程是这样的:去一个传教士家吃午饭;然后参加你父亲下午3:30的讲演;之后参加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举办的宴会。明天是我的自由

日,小秘书将带我去购物。那个大百货商店是一个时髦的地方,所有的贵族和富人都在那里买和服。我可以买一件新和服,弥补一下原打算买二手和服的想法。我去京都时,希望找到一件真正的旧和服,因为新面料的纺织方法受外国影响很大。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和 Y 一起找到一家古玩小店,很值得一看。Y 断定经营小店的老夫妇是武士,具备真正贵族的礼貌,小地方被布置得典雅漂亮,如同自己家一般。我打坏了一个九谷古盘,想在那里找到一个。他们没有,但我们看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多次鞠躬,当我们离开时说,我们很抱歉没买东西却添了麻烦。他们回答说:“请原谅我们没有您想要的东西。”

明天,我们去邻居家吃午饭,这个教授家庭非常精明风趣。没有一个女人被传唤,至少已婚妇女没有,因为一个原因:她们都害怕自己的英文不好。但我现在学会凡事顺其自然,不介意细枝末节,也从不知道这样是否为上策。上星期二的婚礼是我们见过的最有趣的社交聚会。这种仪式是基督教式的,来宾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富贵和时尚。女士们全都穿着黑色丝绸和服,沉坠的上好黑色丝绸的下面是柔软的白色中国丝绸,第三层是鲜艳的颜色。K 的和服第三层是鲜艳的朱砂红。因为她是母亲,和服袖子不是很长,但年轻姑娘则穿颜色鲜艳的和服,袖长几乎及地。新娘也穿黑色的。所有这些和服都以色彩为饰,有的绣花,有的在正下方染色。新娘的和服在她坐的地面上展开,和古画中描绘的一模一样,上绣厚重玫瑰色牡丹花,其内衣与黑色和服内衬都是玫瑰色。头发梳成传统发型,像日本版画所绘的那样,上别淡色乌龟壳做的长发簪,两端刻有几簇小小的花朵,它支出约 3 英寸,在头上形成发冠。婚宴是这样的:首先是新郎的父亲;第二位是新娘的母亲;第三位是新郎;第四是新娘;第五是新娘的父亲;第六是新郎的母亲。座位呈直线排列,如画中描绘的那样新娘坐姿完美,她和新郎都低垂目光。当每一个人从旁经过时,他们一起沿座位线鞠躬,但他们不动手或不动眼睛,也不动那完美衣服的一个衣折。我忘记说了,遗憾的是,男人们都穿着欧式服装。然后,我们来到两个大房间,男人们坐在一间吸烟,女人们在另一间。认识我的人都非常友好。公爵夫人将我介绍给新娘的伴娘,起码她们是家里的姑娘。她们是姊妹和年轻的亲戚,都穿着最艳丽的和服,绣着花,点缀至极。她们看似天堂中的鸚鵡、孔雀和蓝色的小鸟,可想象到的美丽色彩应有尽有。而宾客的清一色黑

色和服饰与在此人群中显得突出的纯白羽饰，形成了完美的背景，不存在我们那边聚会时因色彩混杂而产生无序的视觉效果。饮茶的过程很讲究，人们围桌而坐，两家人坐在一个位于房间一端的长桌边。此时，新娘身穿绿色和服，同样艳丽；离她约2英尺远坐着新郎，两人均居长桌的中间位子。

1919年3月20日 东京

本周我们参加了若干次社交活动。星期二晚，H将军在军械场花园为我们举行晚会。他不会讲英语，和我们一起乘“信誉”号过来的。我们本来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入军械场。约有25人参加，大部分是基督教协会成员以及日本教会的牧师们，前一天晚上我在那里作过演讲。将军热衷于引入更多的民主，我就民主的道德意义发表演说。对了，在我们眼里，这完全不是花园，而是公园，而且是在东京除了皇家公园之外最好的。它不同于我们知道的日式花园，面积相当大，丝毫没有精巧的小型仿造物；大型仿制物很多，因为你也许知道，按比例缩小复制名胜是古代园艺家的风尚。200年前建筑这个公园的大名(Daimyo)^①极度崇拜中国人，复制了几处中国名胜以及京都的一处景观。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在狭小的空间内创造出众多变化；如果有“中央公园”的话，他们能够复制地球上的一切，包括阿尔卑斯山和爱尔兰海峡的风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它们都经过艺术角度的思考，每块小石头都有其自身的寓意，因而无知者只能看到皮毛。要想吃透它们，必须像研究艺术家杰作那样去对待之。军工厂的烟雾已经熏死了许多古树，因而公园的许多辉煌已经失去。

你妈妈在信中提到过一位年轻日本妇女要和我们同船去纽约学习，求你妈妈途中关照。今天，另一位年轻女士来访，说她想回美国。就年轻女士和我们一起回国之事，Y说我们得慎重，因为其母亲要去美国时曾经有人求她途中关照17位未婚女子，结果只跟她走了3个人。你不能理解的是，去美国学习意味着基本上放弃婚姻，她们将变成老姑娘，待回国时已不受婚约约束。此外，去过美国的人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昨天听说一位日本妇女，近30岁，

^① 大名，日本封建时代的大领主。——编译者注

就要嫁给这里的一位美国建筑师。例外是有的,但这个例子显然是个轰动的浪漫情缘。讲座涉及神道教的社会性,该教是官方教派,而非公认的日本宗教。尽管没人说发表言论不是科学角度的理所当然,我的意思是假定它是公正的,但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慎重,避免出版任何说过的言论。一方面天皇政府是名义上的,这是最敏感的问题,因而不可依赖文档的评论或分析来说明祖先是神或者神是祖先。一位官僚绅士确信神圣的祖先一定把他们自己的语言痕迹留在某个地方了,于是他考察古代神殿,并且有把握地说他在一些房梁上发现了不同于汉语或日语的字符。他把这些符号拓下来,当做原始语言展示,直到后来一些木匠看到后解释说,它们是普通的行业标记。

1919年3月27日 镰仓

这里的天气比芝加哥更加多变无常。星期一午夜还是暴风骤雨,待我第二天起床时却是我们从未有过的艳阳天。我们外出观光,不用穿大衣,木兰花挂满树。昨天和今天是阴冷的三月天,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若不是刮风,昨天晚上会挂霜。这里肺结核流行,也难怪。

今天上午,帝国大学的3位教授来访。他们希望详细安排我们在此的活动日程。我猜我已被问及20遍我们要在镰仓逗留多久。当我说不知道并要取决于天气和其他因素时,他们说:“哦,对。”可是5分钟后,他们又问同样的问题,是他们提前替自己详细安排一切,还是他们认为我们是无助的外国人,我搞不懂,我想两者皆有吧。但他们不能明白,我们在去中国之前无法说要做事情的准确日期。同时,我从来不认识任何经常改变自己计划,尤其是社交计划的人。

目前反美势头正盛,似乎主要限于报章,但多少也受到人为的煽动,可能是受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的挑唆。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军国主义派系名誉巨损,自由民主情绪相应上升,因此,他们发现有必要采取行动以便卷土重来。抨击美国是抑制自由民主情绪传播和强化军国主义政党之论点的最简易方法,就好像扭住了狮子的尾巴似的。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非常热烈,主要是针对美国,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排除在外,也不管这里基本禁止中国和朝鲜移民这样的事实。他们歧视中国人的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

过,任何国家的政治优点都不是一致性的。除了种族歧视的话题之外,同日本人有联系的外国人没有发现见诸报端的那种反美情绪。万一英日同盟条约因国际联盟或任何其他事情失效的话,即便原因在英国,美国也要承担责任。两年前,这里发生过类似的反英运动,就战争事端与英国同盟作了一番极强硬的讨价还价。由于德国和俄罗斯退出,英国没有明显的理由贪占很多,因而利益分摊了。因为他们(日本)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即使他们同法国因与俄罗斯有类似的利益之争而联合,也让人感到他们对美国的攻击更加愚蠢。

1919年3月28日 东京

明天我们再去镰仓,离这里只有1小时30分的车程。我们还将做短途旅行,去山里和温泉区,但樱花季节提前许多时间,比通常早10天,因而我们担心如果走得远的话,樱花会在我们不在时开放。所以,我们可能几天后返回,停留约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去京都旅行5天,参拜位于伊西(Ise)的神殿,它是日本最古老神圣的神道教神殿,意味着它是皇家祭祖的主要地点。说到祖先,你记得我们提到过的伯爵。他第一个妻子的父亲最近被封为男爵。议会休会,伯爵已动身去南方海岛,向埋葬在那里的前妻祖先们告知家里的重要新闻。这位年长的开明贵族出身政治世家,曾与过世的天皇关系甚密,如今不愿意参加纪念前天皇批准宪法的年度大会,其原因是他对立宪主义没有取得进步而感到厌恶,他说在他能够向天皇禀报进步之前无法拜见天皇。否则他无颜见面,他觉得要对天皇负责。这个世界不适合阴阳界相通论者生存。

最近,我们以吃饭为主。昨天两餐、今天一餐是日本料理,都用筷子。昨天中午在饭店吃的东西很多你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吃过了。晚饭在朋友家吃的,桌上有12种菜,后来又添了二三种,不包括茶,和今天的晚餐完全相同。给我们的扇子上面写着菜单,只有日语。此外,还有银制小盐瓶作为礼物。两次晚餐的一个特点是上了3次汤,开始、中间和结束,在这样的场合米饭在接近最后一道菜时才上。然后,端上一二种半粥状的菜。我能吃生鱼,没有问题。星期天午餐在一个家禽料理店吃的,其中有海带包生鸡肉;其次是鲍鱼,我们吃的一些甲壳鱼类,可能是鱿鱼。

我们在这里已有6个多星期了。算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像一些六日游的旅

行者那样游览许多地方,但我认为,同停留 6 个月的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我们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下见到了更多的日本人,还见到了相当数量可与之交谈的人,虽然不是官员,但也是有代表性的知识界民主人士。就日本人的状况我见得少,但了解的比预计的要多,这正好与欧洲旅行的经历相反。我回来时尽量见几位官员,因为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足够多的情况,可对他们说的话加以判断。总的来说,美国应该向日本表示歉意,或起码示以同情,而且不用担心。当我们自己面对这么多问题时却说人家有更多的问题似乎很荒谬,当然他们的资源、人力和物力都比我们匮乏,所以,在处理上述许多问题时他们几乎得先走一步。对他们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成为头号强国的速度太快了,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实现他们的声誉和地位是件可怕的任务,他们可能会被压垮的。

1919 年 4 月 1 日 东京

日本人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仿效。他们在学校开设非常好的课程,教孩子们什么是美以及礼貌友善对待外国人,要像对待自己家的客人一样。这可以提高民族尊严。

昨天天皇外出,正好被我碰上。对我来说是相当吃惊和幸运的经历,而对他又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在街上碰到他之前不知道他偶尔出宫。像往常一样,我和一个朋友走下我们的小山,去乘坐电车。在电车经过的街道一侧,我们走过运河桥,然后转弯,过一个街区走到电车站。我们走到桥的另一端时,街两侧的所有人都被集合起来,站成一小排,鸦雀无声,3 个警察正在按身高认真而和气地调整每个人的位子,这样每个人都尽可能有好的视线。于是,在那位警察鼓励的眼光下,我们也站到队伍里边。没有人高声讲话,在注意到朋友正和警官唠嗑后,我大胆地问为什么让我们站在那里。她用同样的低嗓音说:“天皇要经过这里去早稻田大学参加开学典礼操练。”哎呀,用一羽毛,你当时就可能把我撞到。我想除非根据天皇车门上的菊花能够判断出的话,我完全不该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对她说:“他怎么来,乘汽车吗?我们在这儿要站多久?”我看过这样的报道:街道被清空,两边房门关闭数小时,而电车轨道上被撒上白沙,等等。“不长,”她说,“只一小会儿。”现在,我

知道我不会轻易相信关于天皇的传闻了，于是我就像3岁小孩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和其他人一起等待。不久天皇的车队来了，首先身着素色咔叽布制服的马队，随后一个典型日本人长相的人独自坐在其中一个轻型维多利亚马车后排座位里，马车洁净而光亮，车门上装饰着菊花。他身穿咔叽羊毛制的服装，就像车队中的其他人一样，头戴一顶帽子。跟上来的是其他小型两匹马维多利亚式马车，造型完全一样。我仔细观察了一位独自坐在座位中间的小个子男人，他挺胸，目光直视前方，让人好笑。队伍通过期间，我问我的朋友：“哪一位是天皇？”她答道：“在第一辆马车上的就是。”仍然是一片非常有教养的安静，精神抖擞的小个子骑兵逐渐通过。我在桥边上又站了一会儿之后，开始朝电车方向移动。天皇是朝相反方向走的。过了一小会儿，我说：“我不知道天皇参加开学典礼之类的事情。”我接着喋喋不休。我的朋友以其缓慢平静的恰当语气说道：“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天皇。”我说：“是吗？”然后又问了些问题，仍然对没有人高呼万岁也没有一点声响感到好奇，直到今天我才得知当时所有的人都是目光低垂地站立着，而我是唯一目视天皇的人，他们对天皇崇敬至极，所以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另外，早稻田大学是一所自由民主的私立大学，我还是很好奇，直到我了解到天皇是参加贵族学校的开学典礼，而早稻田大学开学典礼是他每年都要参加的。瞧，我多有运气，我耽误了一会儿也问心无愧，我见到了天皇。

帝国花园晚会将在我们离开东京一个星期后举行。所有三品以上的贵族、帝国大学的所有教授以及最近到达的所有外国人均被邀请。外国人只能参加一次，除非是教授。在得知这些细节之前，我们在大使馆的登记簿上签了名。既然知道了我们只能去一次，而且如果被邀请就被期望出席，我们要撤回被邀请的请求，因为晚会的时间是4月17日，我们15日到达京都。幸运的是，一位男爵的女儿，身为皇室成员，已经邀请我们明天和她一起去看举行晚会的皇家花园，我们可能会看得更仔细一些。这个帝国花园是皇家花园的一个，不是护城河后面天皇生活其中的那个。好像秋天赏菊晚会是在那里举行，那也绝不是在内护城河之内举行，没人能进去，除非天皇招见。护城河与皇宫的环境优美宜人，既然你若需要描写性语言的话可以阅读旅游指南，我就不在此赘述了。护城河的河堤由封建属国的人力建成，像所有的此类工程一样，它也是不遗余力地要建得辉煌壮丽。很久以前，一些河已灌满河水，但

仍然有 3 条河还没有。在外护城河之内你可以步行一段时间,看到有严肃的护卫把守的雄伟宫门。在花园内,空气清新,树上的鸟儿鸣唱,市内的灰尘永永远远离此地。

今晚,我穿着日式布袜,这种小巧的脚趾布袜不适合我的脚,但总比毡制的丫巴拖鞋要好。每每上楼时,那种拖鞋都挂不住脚。事实上,在住处我穿一般的便鞋,但不穿的为好,我们从外面进来时总是脱掉便鞋。真的,日本人是一个比我们干净的民族。我讲过用日式浴盆洗澡吗?每天晚上,3 英尺多深的木盆装满很热的水供我们洗浴。这里的浴盆热水来自水龙头,而在镰仓浴盆的堵头有一个小炭火炉,每晚水从外面用水桶提进来,再加热。洗起来似乎可以,遗憾的是我们国内一年到头不用浴盆,因而当我们使用这一古老而简单的小设备时会大惊小怪。不过,我们能够学会用炭火盆取暖做饭的方法。

我们已经学会熟练使用筷子吃饭,用筷子没什么不好。我认为,其主要缺点是用它吃得太快,在这个国家细嚼慢咽不为人所知。一些自己做饭的小窍门在纽约介绍一下是很有趣的。最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做真正欧洲人意义上的观光,在城里四下转悠,整天购买小东西,然后晚上回到十分温馨的家里。和欧洲完全不同,我们因有可以共同厮守的地方而被娇惯坏了。

日本最杰出的演员来到这里。他住在大阪,名叫雁次郎(Ganjiro),我们定了星期四的包厢。所演的剧目是过去在纽约演过的,叫“武士道”。它比在纽约演出的时间长许多,并且叫另外一个名字,演出方式也十分不同。星期天,我们又去看能剧演出。若买不到好票的话,我们将去看一场所有角色全都由女演员扮演的戏剧,通常这里的剧组演员全部由男演员组成。扮演女角色的男演员的确扮相出色。他们平时生活、着装、行为举止都如同女人一样,以便不失艺术水准。只有在取站立姿势时,他们才无法掩饰是男人这一事实。戏在下午 1 点开始,一直演到晚上 10 点。茶和晚饭用精美的大漆午餐盒送进包厢。雁次郎每一场都登台,连续演 8 个小时,可以看出这里的演员在为艺术而工作。戏装精美绝伦,但演员们却不是在昂首阔步地炫耀。他们的言语大受行动方式的左右,动作是他们获得效果所必须依赖的表达方式,因此,他们的表演是用整个身体来完成的,就这一点来说世界上其他任何流派都为之逊色。最好的演出,像我们要看的这一个,能够表达任何情感,据说用他们的背部和小腿肚子都能如此。

1919年4月1日 东京

我们近来的活动比较杂。上周我们在镰仓度过3天,包括往返共4天。镰仓位于海滨,对日本人来说是冬夏过周末的圣地,而欧洲人则在宾馆度周末。夏天,外国人去登山,而日本人去海边,主要是因为孩子们在海边有更多可玩的东西,可爬山似乎是需慢慢培养的情趣。镰仓四面环山,所以,气温大约比东京高10℃。豌豆花正在开放而樱花都谢了。我们在那儿期间天气湿冷,只有一天除外。那天,我们排满行程,看了许多地方,搞得相当疲惫。赶在动身去观光之前,你妈妈和我正在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我们去了一家店铺,这家店铺专门印刷日本古典艺术的精美复制品,包括在日本的中国古画,依我之见,比彩色版画复制品更值得购买,尽管我们已经有一些版画复制品。在日本,有许多人发了战争财,因而很多旧贵族正将自己部分珍宝卖掉,我觉得即使对于美国人来说售价也过高。过去的官宦家庭显然具备足够利用市场的经商意识,不过有些人手头拮据,卖得多一些。一周前,我们去了一家拍卖行,看到一大批真正的古董,比古玩店里出售的要精美得多。本周末,一位侯爵要拍卖一大批藏品。然而,据说他们留下精品而将次要的藏品甩给暴发户,事实上不是什么古董都是精品。

我还没写到的另一个经历是看柔道。那位杰出的柔道家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为我安排一场特殊的柔道表演,事先他对每一部分进行理论方面的解释。星期天上午的表演在一个大型柔道馆举行,很多人在做一对一对的“自由”练习,他们动作快得看不清细节,只见人们突然从某人背部摔过去,扑通地落到地上。柔道真正是一门艺术。这里的教授学习的是旧式操练方法,经过研究发现了它们的力学原理,然后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分级练习法。这套练习体系实际上不含有许多技巧,而是以力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研究人体的平衡、平衡被打破的方式以及如何恢复自己的平衡并且利用他人的重心转移。首先要学的是如何摔倒地面不受伤害,仅此一项所交的学费就值得并且应该在我们的体育馆内推广。它并非是室外比赛好替代的项目,可我认为它比我们大多数室内形体体操好得多,心智因素更为突出。总之,我认为,这里的研究应该从意识控制的角度出发。告诉亚历山大(Alexander)先生从图

书馆借一本哈里森(Harrison)——他的同胞——写的书,名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它是一本通讯集,不深奥,但趣味性很强,据说有一定的可靠性。我注意到,柔道馆内人们的腰很细,他们呼吸总是始于丹田。他们的二头肌不特别大,但小臂却很大,我从未见到过。我还要等着看日本人做后仰翻动作。在军队里他们有一种间接的深呼吸方法,其源头可追溯到旧时代武士的禅宗教义。然而,他们从其他军队吸纳了许多现代身体操练方法。

这里的花园到处樱花盛开,街上随处都是人和米酒。日本人酗酒显然是有季节性的,因为此前我们未见喝醉酒的人。

1919年4月2日 东京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早晨起得很早,写信,尽管匆忙赶着写信,却没有发出去,因为我们决定即使等下一班的快船也比慢船邮得快。你一定会同时收到一大堆信件。一整天天气都很晴朗,却不闷热,适宜四处观光。我们去了一家艺术品商店,买了几张前天选好的印刷品。然后拜会了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一名国会议员,思想激进,头脑清晰,人也很有趣,精力、好奇心和兴趣都非常像美国人。我们四处走走,了解了很多事情,然后他带我们去他岳母家吃午饭。他们家的房子很美,是日式的,还带点外国风格,和多数富人的房子一样。两种风格迥异,但日式部分比外国部分漂亮得多。在仿制德式地毯、桌布和壁挂方面,日本人缺乏品位,但他们自己设计的这些东西却很精美。房子是绝对的干净,里面没有地板,却像镜子一样光亮,一尘不染。我再试试准确描述下一场款待。我们坐着3辆人力车,穿过两旁栽满樱桃树的狭窄街道,走上山来,透过大门和竹墙,可以看到富人们的漂亮花园。竹墙是用约6英尺长的竹竿用绳子捆在一起做成的,花园搭配上绿色非常漂亮。我们来到U先生家,他带我们进到外国绘画室,房间整体效果是维多利亚中期和德国式的。该房间里面有一个漂亮的漆衣橱,非常大,把房间里其他的每一件东西都显没了。家里的女人们进来,鞠躬,非常殷勤好客,对我们的感谢之词报以微笑。教授的妻妹,年龄16岁,想去美国;还有祖母,很有祖母的威严性格。和我们的孩子一样,孩子们围着祖母转来转去。女人们给我们端来茶,蓝白色的茶杯、很小的漆底座和茶盖,糖果配着绿茶。我忘说了,与U先

生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在3次不同的时间喝了3次不同类的茶，同时还吃了些点心，过了一会儿，又招呼我们吃饭。一个较低的桌子旁安排了3个座位，上面放着漂亮的蓝色织锦坐垫。家里2个年轻的女人跪着准备服侍我们。她们给我们倒葡萄酒或苦艾酒，我们喝的是后者。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盖着盖子的漆碗，里面盛着普通的鱼汤，有几片鱼和绿色的东西。我们喝了鱼汤，用筷子将固体的碎块放到嘴里。祖母本打算准备外国菜，但聪明的孙女说准备家常饭，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因为我们很少吃过真正的日本饭菜。除了女儿节的玩偶饭，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真正的日本饭，并由家里的女人们服侍着，这似乎是我们受到过的最高待遇，因为只有当外国人受到邀请坐在地板上，由女人们服侍时，才算其家向外国人真正开放。她们跪在桌子旁，女佣端上菜递给女人们，再由女人们端给客人，非常美。我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盘腿坐上一顿饭的时间，可起身时却很笨拙，因为我的脚和膝盖都不听使唤了。我们喝了汤，吃了凉的炸龙虾、对虾，把它们在旁边的调料里蘸一下吃，另一个碗里还有凉菜；然后又吃了热炸鱼，又吃了点腌菜、米饭，日本人吃米饭能吃好几碗；然后是甜点，甜点一直放在你旁边，是凉蛋卷，很好吃；然后上茶，是外国茶，叫乌龙茶。我们还吃了吐司，也是外国的。然后离开餐桌，被领进楼上的房间，里面摆放着许多漆器、铜器和木制品，然后下楼，茶和一盘水果已准备好。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要开车送我们去帝国花园。我们在门口穿鞋的时候，最后一道茶上来，是很浓的乌龙茶，里面加了牛奶，还有2块方糖由你自己加进去。这样，3小时内我们已经喝了6次茶。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帝国花园。读一下旅游指南，你就会明白确实很难。第一眼看到的是上万棵兰花。还有生菜、豆角、番茄、马铃薯、茄子和瓜类，全都在温室里，供皇家享用。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完美的生菜，每一棵都在大小和布置相同的框架里，好像是假的一样，所有其他的菜也是如此。马铃薯为什么在温室？这你别问我。瓶子里的葡萄看上去好像是在温室里栽培的，葡萄刚刚长出来，但也许不是，因为我对那些小葡萄藤懂得不多，不知道它们是否支撑得住。框架里的花十分完美。大片的雏菊和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鲜艳的花准备放到外面的花床里供聚会时所用。我们不能参加17日的聚会。现在供聚会时天皇和皇后坐的一个巨大的木瓦顶亭子正在搭建，而第

二天就会被拆掉,或者是下一周,因为聚会可能持续不止一天。如果下雨,聚会就开不成。今天夜里看上去雨将损坏花蕾,但今天白天天气十分完美。对于一个终身阅读有关日本花园书籍的人来说,看到这个著名的花园都会稍稍感到吃惊。大片的草地,没有花,这里的草还没变绿,没有我们那里绿得早,但大片的水仙花却好看极了。斜坡上、樱桃树下的那些水仙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构成了一幅人生中最难忘的美景之一。人工湖泊、河流、瀑布、小桥、岛屿、山峦和跳跃、游动的大鸟,这一切足以使你有理由来日本。一片片的树林十分精致,眼睛扫过长长的树林,就像欣赏一幅幅风景画。公园占地 165 英亩,没有建筑物。最初它位于城市的一侧,还相当不错,现在尽管它还是处在城市的边界,却处在来往车辆较多的车道上。

我们已经安排好星期一再次去帝国剧院。今天是在一个小剧院观看著名演员雁次郎的表演。据说当他来东京的时候,东京的演员和剧院经理出于忌妒不让他得到公平的机会。T 先生原来是芝加哥人,来到这里,打算在我们走之前安排一顿晚餐。晚餐将安排在一个饭店里,所有过去教过的学生都参加。饭店总是令人感到有趣,当然我们同意了,这样会使我们在东京多逗留一天,尽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余下的时间我们要尽可能安排短暂访问,坐车到处看看樱花。我还希望去一些有名的茶楼。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茶楼。在这座城市里,除了一些时尚的百货商店外,没有一家喝下午茶的茶楼有女士光顾,可以看出东京的淑女很少走出家门。

济田(Sumida)河是一条很大的河流,汇集了群山一侧所有的小溪,河上满是中國帆船和小船。无论是对于东京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心。

1919 年 4 月 4 日 东京

雁次郎这位从大阪来的著名演员正在这里演出,演出很精彩。除了在纽约演出的剧目之外,他还演出了一幕剧,名字叫做“武士道”。化身人形的狐狸跳的舞蹈确实很精彩。不用费力去描述它。与我们看过的其他日本舞蹈一样,它既不是很慢的种种姿态,也不像俄罗斯舞蹈那样狂野。他表演的是独舞,没有男伴或女伴,像俄罗斯舞蹈一样自由,同时又更古典得多。你只有

看过之后才会意识到人类的手和臂有多大的表现力。他戴许多面具，然后根据所戴面具的类型来表演或舞蹈。他可以不用爬就能效仿一个动物的运动——像一只猫一样优美柔软。他是老雁次郎的儿子。

在这逗留的最后几天，行程安排得很满。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完。樱花正在盛开——这是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树木。假如山茱萸树再大些，花朵再粉红些，看上去就更接近樱花树了，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像樱花树的树木了。樱花树开满了樱花，却没有树叶。当然，木兰花也是如此，但木兰花较粗糙，樱花较细腻。

今天我们去了博物馆，在某些方面它要比帝国博物馆还要好。这里的东令你目不暇接，还有精美的中国的物品，所有的一切都精妙绝伦，但绘画作品除外。

1919年4月8日 东京

我们正在收拾行装，明早8:30出发，行程一天，先是乘日本最快的火车，一直到下午4点钟。普通列车每小时15英里，很遗憾，日本在早期采用的是窄轮距，执行的是众所周知的第一安全的原则。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最有趣的是在周日到农村去看樱花和狂欢者，有点类似狂欢节的时刻。人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戴上假发，还有米酒，纯度为90%，只有我们很少的几个人没有醉。所有的人都练习和我们说英语，不管都会些什么。有一个穿着盛装的人跟我们说他是卓别林(Chaplin)^①，不过充其量也就是擅长模仿，除了一场打斗外，我们看不到野蛮和粗暴。很显然，该活动就是要达到一种提升自信和表露感情的心理效果。平时他们都互相很矜持，可在周日他们似乎相互倾吐着内心深处的秘密和生活抱负。这天，主人一直都在慈祥地笑着，即使是一个身穿鲜红色女人衣服的家伙坚持在跑板上骑车时他也微笑着。他们很少喝醉，使他们高兴的不是酒，而是受欢迎的节日。人们真的很高兴。

一条运河的两边栽种着数英里的树木，该运河为东京提供着水源。各种各样的树木出于不同的生长期，有的没开花，有的盛开，有的没长出树叶，有的长

^① 卓别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英国电影艺术家。——编译者注

着粉色叶子。花朵正在落下,虽然仅是一场小雪,但树上却看起来挂满了雪。

昨天我们又去了帝国剧院,两个包厢 10 个人。我们被领到了后台,参观了演员休息室,被介绍给一个演员和他的儿子。他儿子大约 11 岁,后来在舞台上跳了一段很美的舞。他的老师在休息室里教他汉语写作课,直到跟他说话才抬起头来。他是我在日本看到的最英俊、最聪明的少年。在日本,表演实际上是祖传的行业。我不知道一个没有在童年经过训练的局外人是否能从事表演这一行;而且我想即使他会表演同业行会也不会让他进入,尽管有一个英国血统的人在日本舞台上很成功。昨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包括舞蹈,也了解到他们很想到美国,但需要资助人。如果能仔细选择有大量的动作而不是说的剧情,并对剧情进行详细解释,至少在纽约是会引起轰动的。

另一次盛宴是在昨天晚上,地点在日本的传统茶楼里,一段供消遣的能舞(noh dance)和大约 12 道菜的盛餐,但最有趣的还是与人们交谈。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有机会见到了比一般人更了解日本的一些人。我们还没有经过官方允许,还没来得及将我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在 8 周内获得的对社会状况方方面面的了解全都汇总到一起。就信息而言,一位有经验的记者在几天内就可以获得,但我觉得信息只有通过不断积累的印象才可以被吸收,事物的本质及背景才可以被了解。他们最初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一切都很重要也很关键,当时我还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也很难用词语表达,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明白。从表面上看不到变化的迹象,但对于变化所持的心理准备来说,目前日本处于大约美国 50 年前交流和开放最初几年时的状况,接下来的几年将会看到日本所要发生的社会变化。

1919 年 4 月 12 日 奈良

我们开始了行程,第一次看到了日本,当然是从风景的角度来说。第一天从东京到名古屋的车程很有趣,但假若没有富士山的话,就不会完全这样有趣。我们连续几小时时断时续地从 3 个方向看到了富士山。天气暖和、晴朗,我们运气非常好。日本最好的古堡就在名古屋,甚至在封闭的乡村和住宅区里你都也许听说过古堡上的那两只金海豚。古堡是一个皇家宫殿,必须

有来自东京的许可你才可以进入。我们动身去那里试一试是否能进入，因为在东京 X 先生家里见到过一位来自奈良的年轻人。我们给他打了个电话，通过他我们并没有被允许进入（他说他自己从未进去过），他马上请我们去吃饭。我们被领到奈良一流的茶楼，又吃了一顿他称之为具有茶道特色的美餐。我们开始了没有仪式的茶道，是茶叶末，每人一个茶碗。我们都认为，奈良的烹艺比东京更好一些，味道更可口，风味食品的种类更多，主人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鱒鱼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它们有 4 英尺长，外面好像裹上一层焦糖，我们得知它们是在含糖的一种液体中烹制的，然后又送给我们一瓶米酒，我们现在开始拖着玻璃器皿到处走了。吃完饭后，他说但愿我们不会认为他的做法有失妥当，他说他已经邀请了奈良最好的三弦乐手歌手和舞者，换句话说，就是让几名艺伎在大卫王面前唱歌跳舞。艺伎分不同的等级，有的相当于合唱团的，有的是高级演员。邀请的这些人都是高级的。他说希望我们能看到真实的日本，而很少有外国人看到真实的日本。他指的是饭店和舞蹈。如果你不是这些高档地方的老客户或老朋友的话，她们是不会接待你的。晚会上的女士们认为他对其中的一个女孩尤其感兴趣。我个人觉得，音乐和舞蹈都比旅游手册上介绍的有趣得多。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古老的伊田神庙，大约 2 点钟到达，又气又饿，但肯定错过了朝拜的时间，因为天气不好。神庙所在地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长满了树木的山峦和潺潺的小溪。树木大都是杉树，属于加利福尼亚红木科，虽没有它们高大，看上去都非常相似。这是一个深受人们喜欢的地方，挤满了成千上万名提着地毯袋的香客（确实就是那种布鲁塞尔地毯袋），由于事先被告知，我带了一个借来的长袍，戴一顶男用礼帽。我们的向导说女士不需要特殊的服装。我的脸上涂上了出征油彩。东京那边已经告知高僧我们马上要到来，时间已定好。涤罪仪式在最外面的大门入口举行，用一个仪式用的小杯子和盘子将水倒在我们的手上，然后高僧朝我们撒盐，只对待我们这样。当我们到了栅栏门的时候被告知没有穿“参观服”的女士，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入内。但我是应该作为帝国大学的教授来对待，因此被允许进入。我忘了说，我们前面有一个警察轰走了前行路上粗俗的百姓。跟着高僧我们慢慢行进在从海边运来的石子路上，穿过一个尖桩栅栏来到临近下一个栅栏的指定地点。我比日本向导距门口更近。我们鞠躬朝拜。我鞠躬的速度很快，很不

雅观。我想，我们的日本向导至少站了 15 分钟。

1919 年 4 月 15 日 京都

我们来到了日本的佛罗伦萨，它甚至比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更多可看的東西。今天是雨天，也许是一周不间断观光活动的好开端。今天早晨我们是在山中(Yamanaka)商店度过的，它是我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商店，由最美的日式房间组成，摆满了各种最美的艺术样品，以真正的日本方式进行分类。我买了一件红色的织锦，是一块镶条，暗红色，上面有金色和深蓝色的人物、牡丹和鸟类图案，是佛教的僧侣在行进时左胳膊上搭的东西，还有一个鉴定证书证明，它有 100 年的历史。镶条大约 5 英尺长、1 英尺宽，由 4 块布条组成，在接缝处缝在一起，布角形成了榫孔，但十分严丝合缝。布条大多用丝带织成，缝到一起。我还买了另一条，是紫色的，上面还是大鸟和牡丹。与织有菊花或小花卉图案的织锦相比，我更喜欢牡丹的图案。带有石榴图案的织锦也很有诱惑力，但我没有买，考虑到在中国买比较便宜。我还买了一套漂亮的茶具，是灰色陶瓷的，蓝色纹饰，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花了 30 日元，相当于花 15 美分买了一个茶壶和 5 个茶杯。还有许多价格更便宜，但也很漂亮的茶具。明天，我们将去一个茶道起源的寺院，参观茶道表演，那儿的高僧将为我们表演。你最好读一下旅游手册，了解一下京都的寺院。这里的寺院太多，无法在信中一一描述。参加所有这些活动全都由市政当局的车接送。我们很幸运，因为京都像果壳里的果仁一样已比当初古代首都的规模有所缩小，寺院之间相隔很远。明天，我们去皇宫。现在我们总是不停地走啊，越走越胖。

天气很好，春光宜人。我们到的时候，樱花已凋谢。不过枫叶的嫩叶正绿或正红，整个世界像天堂一样美。和佛罗伦萨相比，这里的山峦更近、更高。京都拥有一切的自然之美。我们在这里只能待上一周，然后去大阪，那里有木偶剧院和戏剧学院。雁次郎是院长。我们最想看的是木偶剧院，因为那是日本戏剧表演的发源地，有关表演的许多规定都基于木偶的动作。

从很多方面来讲，京都都展示出世界最可爱之处，是自然与艺术梦幻般的结合。规模宏大的寺院，天然的木材，上面满是古代未知流派的绘画和雕刻作品，如此令人痴迷，使你不禁在想，如此多的思想、情感出现在一个星球

上,那么一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世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甚至连其部分的存在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参观的花园是一个古老的日本花园,自1000多年前建成就没有变化过,融入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东京的寺院看起来像是没落时期破烂不堪的废墟,而京都的寺院艺术的完美却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被称为茶道起源地的第一佛教寺院的风景都是修建之初就建造的微缩河流、岛屿和小沙丘,种植着小树,模仿的全都是中国作为文化之邦时的实景。他们说在中国原景遭到破坏,年久失修令参观者感到心情难过。50年前,在奈良有一座精美的宝塔被出售,宝塔高5层,售价50日元。一些美国富翁很显然一定要买下中国的巨门、宝塔和寺院,以保护它们遭到毁灭性的噩运。日本人及时觉醒,意识到这些历史文物的价值,在古老的建筑材料还没有腐朽之前重建了一些寺院。在这里,木头被用作大型建筑的材料看上去非常华丽。世界上最大的钟,12英尺高,悬挂于钟楼里的一棵树干上,钟楼的屋顶是弯曲的,像花的形状,当初大钟是被拉到高山顶上的。下周六,我们将会听到低沉的钟声。我们在奈良听到过一次,大钟9英尺高,是我们所听到过的最低沉的声音。它们是精美的青铜制品,声音非常柔和悦耳,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听到,你会希望最终审判日发出的判决应该就是那种声音。我们和D小姐共进午餐。她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日本女子为了获得教育而付出的努力,故事感人至深,令你有一种冲动,恨不能马上摘下耳环卖掉它们以资助这些理想主义者。她们是先驱者,像我们那些开伐树木成为开拓者的先辈那样,不过她们却没有树木可开伐。她希望我回到美国后到每一个教会,告诉他们一定要捐款使这里的人受到教育。

第一天,我们乘坐市长的汽车到处参观。第二天,学校给我们租了一辆汽车。我们尽情享受不应得到的一切,有时我感觉真是受之有愧。当然,这些日本人都拥有高贵的品质,有资格获得种族平等。

我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住,然后回来充分观光。墙壁上的画大都损坏,但画轴、屏风等都很精美,我很高兴地这样说,我们已经不再把它们看作怪诞派的作品。我们感受到它们的美。你一旦明白大地上的树木是真实的,画中的树木也是真实的,这时你就会开始去欣赏自然和人类的本性。

今天下雨,没有做多少事情。我们昨日中午到达此地。旅馆在山边,景色迷人,尽管在奈良由帝国铁路系统经营的那家旅馆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唯

一的一流旅馆,但这里的旅馆条件也相当不错。下午,学校派了一辆车,我们乘车前往郊区的一个著名的樱花景区,花已凋谢,但河水、山峦和树木都很美,一大群人在享受着生活,各个阶层的人们,他们户外游玩的方式是十分惬意的,在茶楼里也能获得极大的愉悦。无论在哪里我都从未见过像日本这样的地方,每一天都像是在过节,看到的仍旧是米酒,但不是很多。

这个月,这里的一个剧院上演一场特殊的艺伎表演,剧院和一所培训学校有关联。舞蹈表演持续了1个小时,然后一连重演了四五个小时。我们是昨晚观看的。这里艺伎表演的舞蹈要比剧院和奈良所见过的小型艺伎表演在动作上更机械一些,但色彩搭配和舞台场景的处理很精彩。有8个不同的场景,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进行场景变化。有一次是通过活板门拉下幕布的;还有一次,看上去像是幕布前面的一个帆布垫子被拉了上去,结果它竟是被画在幕布一侧的。

市长邀请我们星期六与教师们谈话,然后我们应市政当局之邀参加了一个日式晚宴。同样当他们不用车的时候也把唯一的车供我们调遣,还安排好我们下周一去参观瓷器厂和纺织厂。该地是日本古代和现代艺术品的总部。学校给东京方面打了电话,批准我们参观这里的宫殿,但据说与我们在名古屋没能见过的宫殿不同。在奈良,我们多数时间是在几英里外的法隆寺寺院里度过的。我必是想表现出多么博学,只是想说它们在1300年前把佛教传进日本,这意味着文明尤其是艺术的传人。有那个时期留下的壁画,但很遗憾,已经褪色了;还有许多雕塑,即木雕,当然,这里没有大理石。正巧赶上了皇子圣德太子的生日,他是位绅士,上述艺术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传入日本的。有许多他的雕塑,我们最喜欢的是他2岁、12岁和16岁的雕塑。他的虔诚是超前的,因此,一切都是相当开放的。各种西洋景、摊位、数百名香客,他们将愉悦与虔诚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意大利农民。这里的人有钱就花,日本人不是那种守财奴。我们被领进高僧的花园吃午餐。当然他很忙,却身着华丽的僧袍迎接我们,然后端出茶水和米糕。这个美丽的小花园与墙外鼓声吆喝声形成的对比,吆喝声、一排排的火腿、鸡蛋与该古老艺术寺庙形成的对比,非常有趣,和日本的其他事情一样。

你也许还记得E小姐,其身材比一般的美国妇女还要高。对于乡村人来说,你妈妈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但是E小姐却是受人耻笑的目标,很显然,

日本人唯一没有学会掩饰的情感就是好奇心。他们几十个人聚到一起，不知有多少次我看到父母设法不让孩子错过这种场面。有几次，我看到一路上人们围着我们慢慢地走，表情严肃，唯恐漏看点儿什么。不是无礼，只是出于朴素的好奇心。早饭后，我们去博物馆，几个小女孩出现了并鞠躬。其中一个9岁或10岁的女孩抓住了我的手，一路走到博物馆。看到她们友好的样子很是令人感动，尤其是其中一个显然很穷，总是仰头看着我笑，捏捏我的手，又按按她自己的，然后又高兴地笑起来。我发现，自然是孩子们的天性。星期日的早晨，一些士兵出发去满洲里或朝鲜。8点前，我们听到大街上传来木屐声，数百名男女小学生跟着老师向车站进发。第二天早晨，仍旧如此。

1919年4月19日 京都

我们刚从艺伎晚会归来。这是又一次了，由市长和其他15位市政官员举办。你爸爸十分得意，据说，这是京都市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那种方式款待学者。如果他得意，那我这位在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男人们的狂饮宴会上的女性该怎么样呢？艺伎们的年龄从11岁到50岁左右不等。年纪较大的一位艺伎是市里最佳舞蹈演员，表演了精彩的童话舞蹈，令人如醉如痴。她因参与政治活动坐过监狱，据说其活动涉及贿选，以便使她偏爱的人当选。这里，女人涉政是违法的。像我见过的所有该阶层年龄较大的女人们一样，她平静时面露忧伤之色。不过，她们都在不停地说话和款待，因而忧郁的神情不被男人们所察觉。就我们所见到的而言，她们多数是非常有教养的。当然，我们见的只是最出色的。她们谈吐如同贵妇一般文雅，性情如同少女一般温顺。这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她们对我们很好奇，问了各种问题。一个17岁的姑娘说自己喜欢小孩，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告诉她有5个孩子时，她很是高兴。她长着娇媚的小嘴，如同古代版画上的一般，其舞姿也和画上描绘的一样。姑娘们端酒递饭，但饭总是在宴会最后上。11岁小姑娘表演了舞蹈《登富士山》，精彩的平足动作让你感觉到在和她一起攀登。演出中间，她戴上一个面颊部位鼓起的面罩，然后擦汗，洗她那张小脸，给自己扇风降温，接着继续表演。一切动作优美典雅，细腻连贯，绝对没有突然或意外的姿态，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表面化动作。跳完舞蹈，她来到我身边坐下，她的皮肤

热得像发烧一样。所有的男人都年长于她,我得说他们待她都很好。

此类欢宴是这样进行的。我们穿着袜子进入饭店,通常我们被引入一个小房间,跪坐于垫子上,一边饮茶一边等待客人聚齐。这一次大约在6点钟,我们被引入大房间,这样的房间四周总是有金色的屏风和门扇,可推拉到窗前。坐垫在这个漂亮的长条形房间的三面布置,相互间隔约3英尺。在一面的中间部分,垫子擦起来,这样,尊贵的外国客人可以坐着而不必跪着。客人被一一介绍后我们就座。我们相互握手,因为他们的鞠躬相当难为情并且他们已经适应我们的问候方式。之后,我们所有人再次就座。随后漂亮的女招待轻盈而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小餐桌。第一张桌子给你爸爸,第二张给我,第三张给市长,然后依次给其他人。市长坐在就餐一行人的尽头。每个人前面摆好桌子后,市长来到空场中央致简短的欢迎词。他总是在说有多么抱歉他款待的不周,承蒙尊贵的客人赏光可他未能锦上添花,以及这是第一次该市以此招待形式宴请外国学者。然后,你爸爸尽力作答。他坐下后,我们揭开漂亮的大漆汤碗的盖子,拿起筷子,喝一口汤,从小碟里夹起一小薄片滑滑的生鱼片,在调料汁儿里蘸一下,送入口中。今晚,这第一种汤是珍稀的绿海龟浓汤,很鲜美。于是,把汤喝光,吃了一点儿鱼。我们的向导提醒我们别吃太多的生鱼片,怕我们不习惯。这时,又一个漂亮的大漆盘子放在你身边的地上,上面是一个小小的大漆碟,碟子上有2条焦黄的小鱼,完美至极,边上装饰着2小块蛋糕和精致的樱桃叶子卷鱼松。每种菜都是一件艺术品。这道菜是前任天皇的最爱。这也难怪天皇喜欢,它们烹制时用了料酒,此种甜酒由日本米酒制成。吃鱼时,用筷子能将鱼刺剔除,剩下的便一扫而光。这道菜一就位,一位身着长可及地、颜色艳丽和服的小姑娘出现在你面前,见她手里拿着一个青花瓷瓶,下面有大漆杯垫托着,于是你知道宴会真正开始了。继她之后,来的是年龄较大的姑娘们,一次一个,她们倒着米酒,舞蹈艺伎逐渐进来并且向在座的人鞠躬。她们笑话外国人总是忘记客人应自己举杯要人添酒。每一个人都为他人健康干杯,虽然我不喝米酒,但日本人一杯接一杯地喝,一抿一杯,举杯再添。交谈变得活跃起来,姑娘们更多地参与其中。有人说,她们是日本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女人。不管怎样,除我之外不曾有谁的夫人出席陪同,姑娘们非常有教养,对丝毫的嗓音或姿态的暗示都能做出反应,对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即刻心领神会。她们一看到我们不喝

米酒，便为我们拿来许多瓶矿泉水。接着，她们跳起美丽的舞蹈。两个姑娘，17岁左右，表演了名为《京都东山上的黄昏》的舞蹈。在名古屋，在京都，或者无论什么地方，主题始终是一些与附近自然景观有联系的自然现象，简洁而经典。之后，年长的著名舞蹈家表演了令人难懂的舞蹈《保育员哄孩子睡觉》，这也是最受人欢迎的主题。虽说舞姿优美，但有时过于微妙，无法理解所有的动作。这些姑娘们都穿着深色和服，如同贵妇一般，唯一不同是该行业规定所致，比如后领口低、及地的长和服在其周围形成波浪状。就年轻姑娘而言，她们的宽腰带不同，系成长蝴蝶结垂于地面。年轻者还戴着明亮的头饰，衣袖很长。但其他女孩子也穿长袖戏装和服。

宴席连续上了几道海鲜。随后又上了4个草莓、2片橘子、若干块薄荷果冻和蜜饯笋片。之后，又上几道海鲜，多半是颜色好看的甲壳鱼类，总是十分难咀嚼。然后是非常好吃的凉拌什锦酸黄瓜和几小块龙虾或螃蟹，很好吃，任何酸口的东西与这里的多道海鲜都很对味。最后上的是米饭，装在一个很大的大漆盘里，盖着盖子，看似小桶。米饭由一个年龄较大的舞蹈艺伎盛到碗里，年轻艺伎们再把米饭递到客人面前，她们不断地跪下起来，动作轻盈如燕。多数日本人一般吃满满3碗米饭，而且吃得很快。我得说他们的米饭很香，但我只能吃一碗，部分原因是我无法狼吞虎咽。再最后，你的碗里被倒满茶水。

每到此时，在其他位子上的先生们，一次一位，过来跪在你面前问你是否喜欢樱花舞和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都是诸如此类的话题。你还和舞蹈艺伎成为亲密朋友，或许除了“谢谢”、“很好”、“再见”之外没有用什么日常用语，以及面对不断的微笑，时而也听到懂一点点英语的人向你做出的解释。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外国人知道日语词汇。当你突然冒出一两个蹩脚的单词时，他们报以笑声表示称赞，并且对你的良好发音施以褒奖之词。今晚，我们吃了一道菜，配有极小极小的绿辣椒。那是很好的调味配料，3个辣椒大约有发卡那么大。

人们总是品尝一点点，在宴会的最初阶段你通常被提醒不要吃得太多。在品茶晚宴上，米饭是在开始时上，可与海鲜配着吃，尽管人家告诉你不要吃得太多，还有其他菜，但那种吃法也很惬意。我忘记说了，就餐中间总有一道热糊糊，主料是清鱼汤而非牛奶和调味蔬菜，也很好吃。实际上，我已经十分

喜欢这道海鲜了。

当我们在饭店门口上汽车时，所有小舞蹈艺伎都站在雨中以美国方式向我们挥手致意，直至我们远去。当时，我猜这些疲惫的小家伙们回去后还要为更多的男人们跳舞。我们晚上 8:30 到家。日本的晚宴似乎都很早，只是涉外晚宴除外，他们参照我们的时间和方式准备。

我得告诉你，最好的日本茶叶种植在这附近一个叫宇治的地方。有一次，在市政厅讲座结束后我们喝过那种茶。它焉得要死，味道没什么茶叶与之可比。它酸如柠檬，一点苦味都没有；口感柔滑舒畅，有点像低糖雪利酒，总之挺好喝。这里的售价起码每磅 10 日元，但我将买一些带回去。这里上好的普通茶叶售价每磅 15 日元，相当于 7.5 美分。

1919 年 4 月 22 日 京都

今天，我们去参观学校：首先是男子中学，然后是一所小学，门上方悬挂美日两国国旗以示敬意，气氛非常友好。孩子们为我们表演了许多惊人的绝技，一个小孩用日本鼓击打出他们的行军鼓点。之后，去了一所纺织学校，出于某种原因，学校很差，入学率不高。那里的机器陈旧，是过时的德国货。事实上，机器看似德国人淘汰给他们的二手货。这里的最佳作品仍然全都是手工制品。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水力发电电力。最后，我们去了一所女子中学，附属一所培养中学师资的女子师范学院。京都出类拔萃的学生都去那里上学，同在其他学校一样我们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们开设家政学，因而我们品尝了他们准备的精美日式午餐。此次，和其他多数行程一样，我们都是乘坐市长专车。这真是一个学者受尊敬而不受歧视的国度。由于在帝国大学讲过课，正式场合我被称为“阁下”。大阪不希望被京都超过，所以，我将给那里的老师讲课，市里安排我们住宾馆，市长为我们举行宴会。当然，你妈妈是唯一出席的女性，因为他们不会想到邀请自己的妻子。然而，外国妇女被指望有异样的表现，而且她们受到相当的礼遇。艺伎似乎是唯一受过全面教育的女性，不是指学术型的，而是了解人情世故、善于言谈。我想男人们参加这些宴会，与她们交谈，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妻子过于顺从。在我们出席的宴会上，有一位妇女名叫“唱歌蝴蝶”，由于被人认为关心政治而冠以绰号“宪法”，

杜威传

尤其认为她倾向于民主政治。当听说她因为关心政治而坐过监狱时,我们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可结果是进监狱是因为她为自己心上人多得选票贿赂选民。不过,她毕竟是当地名人,其监狱经历显然给她带来了利益,提高了声誉。

日本的“杜威勃兴”^①

[日] 小林繁夫

1962年,一位日本教育周刊的作家指出:“杜威对过去18年的日本教育思想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影响超过其他任何思想家的影响。”^②有一段时期,日本民众对杜威哲学的兴趣极其强烈,日本人自己将这种热情称为“杜威在日本的勃兴”。

近年来,有关杜威的出版物层出不穷,或者可以算是不断“勃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有254篇文章以及58本著作的标题中出现了杜威的名字,另有21本杜威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在日文版的《教育参考书目》的“教育思想家研究”标题下的176个条目中,有将近一半的条目是以“杜威”为关键词的。“杜威”部分列出了81个条目,与之相比,位列条目数第二的苏联教育家“安东·S·马卡连柯”部分下仅有18个条目。^③

有关杜威的书籍销量很好。研究杜威的权威学者永野芳夫(Nagano Yoshio)指出,二战后他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他的多部有关杜威著作的版税。虽然很难得到精确的出版数据,但是,书籍的大量印刷足以估算出它们的热门度。例如,永野芳夫的《杜威教育学导论》1946年第一次出版,但之后的2年中加印了16次。

日本教育协会会议上频繁发表的有关杜威的论文,也说明了杜威在当代日本教育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在连续数年的日本教育研究学会年会上至少会研读一篇有关杜威的文章。1951年时达到了高潮,这一年有8篇论文发

① 摘译自:Victor Nobuo Kobayashi. John Dewey in Japanese Educational Though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1—9. 高惠蓉译。

② 田村神治. 杜威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亚洲学术期刊, 1962-09-26. ——原注

③ 日本教育研究学会. 教育参考书目(1945. 8—1957. 3). 东京, 1958: 23—29. ——原注

表。在该学会 1961 年年会时有 4 篇,而 1962 年年会时也有 3 篇。杜威也是学生写论文时热衷的话题。日本的多数大学要求学生毕业时写论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开始,至少有 268 篇毕业论文和 13 篇硕士论文是有关杜威的。他成为教育类论文的热门研究对象,为此 1959 年还出版了《研究杜威教育思想指南》一书。

杜威已成为了数个特别教育活动的主题。在一个热衷节日的国度,举办“杜威节”也不足为奇。1953 年,四国岛的爱媛(Ehime)大学便发起了一个“杜威节”。1955 年 6 月 1 日,北海道大学及北海道文科大学举办了“杜威之夜”的活动。杜威主题也进入了该年的广播节目,NHK 教育电台播出了一个名为“杜威哲学与日本教育”的节目。因为对杜威的热情以及学者们对正规组织成立的倾向,1957 年日本成立了杜威学会,到 1962 时已有 130 位教育家和哲学家成为其会员。^①

1926 年,杜威在第六次国际哲学大会上讲话时提出,哲学是时代的派生和心声,是文化的产物。“哲学……保持着与文化史的紧密联系,沿袭了文明社会中的变化。传统的流派抚育了它,追溯它们的源头至关键时刻可以使当前的思想出现新的方向。工业上的新发明、世界的新发现以及科学的新发明丰富了哲学。”^②

同时提出,哲学不仅仅是文化的反映,其自身对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他认识到,哲学从整体上对历史起着保守的作用,因为它经常为现存的制度、做法以及传统辩护;然而就算是在说明和澄清其保守倾向时,哲学也选择了存在的因素,并赋予它们本不具有的意义。

对哲学的这种阐释是对当今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是由日本人自己作出的。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传统和西方传统的差异。日本人一直在努力解开不同的思想流派在存在中的不同意义,这样可以为由于旧社会突然遭遇外国社会的制度、技术以及价值观而带来的混乱的局面创造一个秩序。对哲学的这种阐释从对当今的研究延伸到了教育哲学研究以及教育自身过程的研究。“教育”这一术语的使用被局限在专门的机构即学校

① 西谷见藤. 杜威学会的历史与现状. 亚洲学术期刊, 1962-09-02. ——原注

② 杜威. 哲学在文明中的作用//埃德加·布赖特曼(Edgar Brightman). 第六次哲学国际会议记录. 纽约, 1927: 537. ——原注

中,使它滋养了该术语的某种不成熟倾向。包括课程、教学方式、管理及教师聘用系统在内的教育系统在不同的社会中变化不一。课堂中推崇的种种方法,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培养年轻人形成的价值取向及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个社会的理想、目标和渴望。教育哲学力图使教育机构更合理,尝试澄清那些需要或不需要通过教育提升的意向,提升它们的原因,以及提升它们的方式。

日本有着以快速的发展步入工业及技术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奇妙历史。它是灾难性战争的战败国,却能从战争的失败中实现快速的经济复苏,在这样的社会中,杜威思想在其教育思想的地位如何?

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其教育的独裁传统一直闻名于世,对杜威思想的巨大兴趣更显突出。杜威不仅是主张在学习中赋予儿童极大的自由、支持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进步以及与日俱增的变革相匹配的哲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是美国自由与民主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其实用主义哲学或实验主义中将民主与教育理论联系起来。他目前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否就意味着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正在为日本国民接受?是否意味着杜威哲学以某种方式反映了日本民众坚定地建立二战后创造的民主制度的渴望?或者是不能将“杜威勃兴”看作是另一次狂热?此类的狂热不仅在教育史,而且在日本与西方的交往史上也时常发生。对于日本教育学家们,杜威意味着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日本人对杜威兴趣的研究要涉及的……正如研究所表明的,对杜威的兴趣不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及战后的美军占领(1945—1952)有关,而且它还和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的发展相关。

日本在杜威思想有影响的学术和教育史领域比较薄弱,该领域似乎十分松散和无关紧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件证明事实刚好相反。至今,那些不起眼的战前杜威研究学者及教育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海外受过教育,战后却涌现出来成为教育哲学重建的主导人物,日本的战败使这一重建变得尤为必需。几位作家将日本战败的形象比作激进思想与自由思想之流的洪水之门的开启,这个比喻应用到教育哲学的变革中是十分恰当的。但是,洪水之门开启之后放出的是一个适度的思想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杜威思想的重要性的认识的主要来自心理学领域。当今的日本教育家们认为,他们的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历史证明了民

主教育思想并非是日本的新事物，它并不是美国占领军们自认为是在他们的谆谆劝导下将民主革命带给这个无助的战败国的先进的东西。虽然日本教育学家们默认自己因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日本升温中缺乏积极的参与而负有罪责，但他们也愤恨像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占领军教育改革顾问之一坎德尔(Isaac L. Kandel)等人的观点。1946年，美国教育使团来到日本提出的重组教育的建议和日本的传统没有任何直接的非直接的关系。^①

许多其他教育学家将占领军时期的“新教育”视为杜威教育项目，但对他们来说，“新教育”在大正时期(1912—1926)就已经开始了，它只是被军国主义和战争打断的“新教育运动”的延续。

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更倾向于将他们的生活定位的重点放在历史和传统上。那些明显延续过去的事物、活动以及努力就格外有意义。对历史理性的需求，即对先人的感恩而并非强调效用的实证主义标准，可能正是一个旧社会在外来价值观和理想同化影响下仍能经历快速变化的特征；任何能成功地融入及被引入其文化的东西必须和过去接轨。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日本的杜威学者们表达了这一需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战前的事情证明了对杜威的兴趣既不是狂热也不仅仅是对美国事物的盲信。日本人用含蓄或者明确的方式接受来自西方传统的观念和制度并成为他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表明杜威的思想也将成为“日本传统”的一部分。

因为时间关系，目前研究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课堂实践在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的差异很大，没有对日本课堂实践的长期研究将很难判定杜威对学校实践的影响。在那些倾向于认为由美国占领军推进的日本教育改革是以杜威原则为基础的日本人中，有关杜威思想渗透到课堂活动的程度也有意见上的分歧。此外，“杜威方式”很难被直接观察和客观地判断，因为其更像是一种态度，而并非是一套教学程序。

^① 坎德尔. 教育新时代(The New Era in Education). 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5: 11. 原注

第五编

杜威与中国教育

就杜威来华讲学之事致胡适^①

陶行知

敦请杜威来华讲学

——致胡适

适之吾兄请看：

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②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叫我觉得又惊又喜。为何惊呢？因为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既而又想到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想到这里，又觉得大喜了。所以即刻就把这事和郭先生^③谈了一下，当时就决定由他经过日本的时候当面去请。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我不久也要写一封信去。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你看如何？上海一方面等写信和省教育会商量之后再往下看。

《新中国杂志》^④发现很是件好事，看来信的笔气似乎是由老兄主持的，若

① 选自：陶行知全集：第8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218。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 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国立大学。1877年成立于东京。——原编者注

③ 郭先生，即郭秉文。中国近现代农业教育家，1910—1915年留学美国。——原编者注

④ 《新中国杂志》创刊于1919年5月，至1920年8月停刊。——原编者注

是果然如此,那我就勉力去作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副厚意。不过4月1号以前就要交卷,却没有十分把握,万一第一期赶不上,第二期一定寄来。

前几天报上有个谣言,说你什么要出北京大学,我们正在预备写信欢迎你到南方来,哪晓得报上又有更正的新闻了,可惜可惜。

陶知行写

三月十二日

杜威将来华讲学

——致胡适

适之吾兄:

现在有一件可喜的事,一件可悲的事报告:

今日接到郭秉文先生的信,他说到日本已经见过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并不是帝国大学交换教授,不过游历的时候带着演讲就是了。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说4月中就可到中国,打算游历上海、南京,扬子江流域,一直到北京。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留中国一年。既然有此很好的机会,这一年光阴自然不能轻轻放过。怎么办,要等郭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商量后才可定当。杜威先生到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①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弟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子民^②先生商量推举一人,以便接洽。附上敝校所拟办法数条,请与蔡子民、蒋梦麟^③、沈信卿^④三先生(蒋、沈二君现在北京)磋

① 南京高师,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原编者注

② 蔡子民,即蔡元培。中国近代教育家,1917—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原编者注

③ 蒋梦麟,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任哲学系主任、总务长、代理校长等职。——原编者注

④ 沈信卿,即沈恩孚。——原编者注

商,并请赐教。杜威先生来期已迫,请从速进行为要。杜威先生通信地址一纸,请留存尊处。

可悲的事就是许君怡生[荪]已于 22 日下午逝世,病是 influenza(流行性感冒)转为 pneumonia(肺炎)。自去年此病发现以来,朋友中因此逝世的,中外共计已有 7 人了,真是可惜得很。上上星期六日河海工程学校^①,开四周年纪念会的时候,还见过一面,当时面容并无病状,弟于 22 日下午从上海回来始而闻他病重,不到一刻,电话就报他的死信,真是当头一棒,叫人吃惊,丧事已由孟邹^②先生来宁主持,老兄得此不幸的消息,也免不了伤感一番。

陶知行谨启

三月卅一日

附:杜威来华接待事

——致胡适

适之:

麟今晨自杭归,你的信都收到。知行亦自宁来沪。今先将徒威(即杜威——编者)的办法回答你,他事另函详。徒威留一年,甚好。南京、上海方面准合筹四千元。来信所谈计划,我们极赞成,照办就是了。

知行
同启
梦麟

六月廿四日

^① 河海工程学校,现为河海大学,校址南京。——原编者注

^② 孟邹,即汪孟邹。——原编者注

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①

陶行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今年是先生的休息之期，他想要在这一年当中，到东亚来游历一番。现在已经到了东京，在帝国大学讲演。大约4月间就要到中国来，预备游历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别的地方。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关系，就不能不略为晓得杜威先生的历史。

先生于西历1895年，生于美国弗尔卯梯州^②之柏林顿城。1879年毕业于弗尔卯梯州立大学。1884年在约翰司霍布金大学^③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充米支干大学^④和米尼梭泰大学^⑤哲学教员。至1894年即应支加哥大学^⑥之请，担任哲学教授。1902年改任该校教育科主任。1904年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服务。这是杜威先生的一段小史。

但是读这一段小史，只略为明白他一生经过的大概。他一切的学说主张，都不能从这里看出来。所以要知其人，必先读其书。就我所晓得的，杜威先生所出的著作，共有16种。我们且按着出版年份，把他们先来介绍给大家同志看看。

① 本篇在1919年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发表后，又改题为《杜威先生的史略和著作》，作为《杜威先生在华讲演集》一书的序言，文中列出杜威著作增至21种。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00—302。

② 弗尔卯梯州，现译佛蒙特州。——原编者注

③ 约翰司霍布金大学，现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铁路大王约翰斯·霍普金斯1876年创建。——原编者注

④ 米支干大学，现译密执安大学。——原编者注

⑤ 米尼梭泰大学，现译明尼苏达大学。——原编者注

⑥ 支加哥大学，现译芝加哥大学。——原编者注

《心理学》	1886年出版
《人生哲学的评论》	1894年出版
《人生哲学的研究》	同年出版
《数目的心理学》	同年出版
《我之教育信条》	1897年出版
《学校与社会》	1899年出版
《学校与儿童》	1900年出版
《儿童与课程》	1902年出版
《论理学的研究》	1903年出版
《思维术》	1909年出版
《教育丛论》	1910年出版
《达尔文在哲学上的势力》	同年出版
《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1915年出版
《将来的学校》	同年出版
《平民主义的教育》 ^①	1916年出版
《试验的论理学》	同年出版

除了上列书籍之外,还有许多著作散见于各种杂志当中。例如《哲学评论报》、《心理评论报》、《哲学心理和科学方法杂志》和《新民国》上,都时常有杜威先生的名论。

上列各种书报,凡是研究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的,都应该备来参考。不过教育界中普通的人,只要选几种最关紧要的读读,就可以明白他学说的大概了。他的著作当中,和教育最有关系的,一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二是《将来的学校》,三是《思维术》,四是《试验的论理学》^②。这四部书,是教育界人人都应当购备的。我们教育界同志,对于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有想研究的么?如有,就须先读这四本书。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

① 即《民主主义与教育》。——编译者注

② 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原编者注

杜威的中国之行^①

[美] 乔治·戴克威曾

同原先的设想不同,杜威远东之行的时间被延长了。在日本期间,杜威收到了国立北京大学的邀请函,盛情邀请他于1919—1920学年到北大开设讲座,具体时间为1919年6月至1920年3月。这份邀请函是由杜威以前的几位中国学生共同努力促成的。杜威的学生们相信,杜威的访问会对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自由主义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获得了中国5个进步教育团体的经济资助,从而为杜威的中国之行筹得了足够的经费。

1919年4月28日,杜威夫妇搭载“熊野丸”轮离开日本前往中国,4月30日抵达中国上海。整个5月份,他们都在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地观光。在朋友们提供的导游和翻译的帮助下,杜威夫妇参观了手工作坊、工厂、学校和寺庙等。在北京,他们还去了紫禁城,参观了那里的宫殿、神龛、博物馆和议事厅。当他们在拥挤的街道上和过往的人们擦肩而过时,杜威夫妇发现这里的人们随和、善良、忍耐,讲话声音太响,态度却又极其谦恭。在杜威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来源于这种拥挤繁杂的日常生活而并非超脱于此。“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是中国人对这种拥挤生活条件的回应。万事皆顺其自然,从不节外生枝。”^②杜威夫妇在目睹了中国一些地区极为贫困的状况后,深受震动。杜威说,这是他来之前所未曾想到过的。杜威夫妇俩忧虑地发现,如此多的小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不得不外出工作,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小小年龄,就如此成熟……街道上的孩子们凝神观望着,聪慧过人,富有同情心,非常快乐,却又超乎年龄的老成和认真。”杜威写道,他愿意捐献

^① 译自: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4—205. 高惠蓉译. 标题系编译者所加.

^② 杜威. 什么使中国后退. 亚洲, 1920, (20): 373. ——原注

“几百万元来修建操场、购买玩具和配备带领孩子们游戏的工作人员”。^①

5月12日,杜威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的会谈是他在中国这段日子里的亮点之一。一年前,即1918年5月,孙博士辞去了大总统职位,不再名列广东七大将军之一。由于旧式军阀控制了广东地区,自此孙中山无职可任,卸甲归乡。最后,他来到上海定居。在杜威访华期间,孙中山正在谋划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他对思想与行为间的相互关系尤为感兴趣。杜威与孙中山在会见时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与中国人民有关的方面。杜威后来提到过与前总统孙中山一起度过的那个愉快的夜晚,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及哲学方面的浓厚兴趣。

杜威在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座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16次)、“教育哲学”(16次)、“伦理学”(15次)、“思考的类型”(18次)以及“三位现代哲学家——威廉·詹姆士、亨利·柏格森、伯特兰·罗素”、“教育的现代趋势”和“美国的民主发展”(3次)。这些讲座都是以英语进行的,由中方人员翻译并记录,以备日报及学术刊登载之用。每次讲座,杜威都会事先把每次讲座的摘要打印成文,将其交给译员以便翻译。

58次讲座翻译成中文后被整理成册,由胡适担任编辑,书名为《杜威五大演讲》。其他的讲座以全文或摘要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的哲学和教育期刊上。由于杜威并未保存这些讲座的英文原稿,因此,讲座内容一直不为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所知,直到近期英文翻译的版本《约翰·杜威:在中国的讲演,1919—1920》(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的面世。

杜威来华访问时,正值中国哲学界欣欣向荣之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哲学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新唯实主义,其中尤以伯特兰·罗素为甚,还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当这些西方哲学相互交汇,并与东方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如新儒家思想和新佛教思想相碰撞时,其结果正如一位近代中国哲学史学家所说的是“一次哲学的巨大沸腾”。^② 在国立北京大学,杜威的到来无疑成

^① 约翰·杜威、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 纽约:达顿出版公司,1920:184. ——原注

^② 引自:布赖尔(O. Brière). 中国哲学五十年,1898—1950. 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56:26. ——原注

为这次学术繁荣的催化剂。人们热烈地期盼着杜威的讲座，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

在北京期间，杜威还定期到清华学院开设讲座。这所学院当年由美国庚子赔款基金创建的，包括高中及大学的头两年阶段。其毕业生通常会被送到美国高等院校，完成他们的大学本科教育。杜威每周一次到这所学校讲课。清华学院位于北京城外约 10 英里的地方。在清华学院的经历让杜威相信，由于刚刚完成大二学习的大多数中国学生还尚未成熟，并不适宜派送到美国生活和学习，因此，“清华学院应当成为一所四年制的院校，然后精心挑选，派送更为成熟优秀的学生到美国完成研究生教育。”^①

在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座接近尾声时，杜威一家（包括 1919 年 7 月到中国与父母汇合的露茜）准备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在那里，杜威计划到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讲座，包括“教育哲学”（10 次）、“哲学史”（10 次）以及 3 次“实验逻辑学”方面的讲座。在回顾南京的工作时，杜威这样写道：“我在这里讲授的是教育哲学，相当受欢迎。此外，还有希腊哲学与逻辑学史，共 8 个小时，但中间还包括口译的时间，因此，这更像是一堂浓缩精选并加以例证的讲课。”^②

杜威的远东之行又持续了一年，他被盛情邀请担任 1920—1921 学年国立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正如杜威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约翰·雅格布·科斯（John Jacob Coss）说的那样：“胡适和其他一些人士非常想把中国的大学建设得更加现代化，而要做到这点则意味着不仅需要培养师资，同样还需要有成型的教材。胡适特别想让我开设一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课程，作为今后这门课程的标准。”^③科斯校长在回信中表达了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杜威的思念之情：“我们很遗憾还要再等一年，但同时又为您感到高兴，可以对东方古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④

根据计划，杜威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座上，与此同时，他还兼顾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讲座。但此次讲座较

① 杜威给约翰·J·科斯(John J. Coss)的信,1920年1月13日。——原注

② 杜威给约翰·J·科斯的信,1920年4月22日。——原注

③ 杜威给约翰·J·科斯的信,1920年4月22日。——原注

④ 约翰·J·科斯给杜威的信,1920年6月10日。——原注

以前更加精深,不设口译,只面向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

杜威在北京的第二年,令他最高兴的莫过于获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当年,有许多学生以及中美双方的教育家见证了这次学位授予仪式。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蔡元培博士在学位授予辞中把杜威比作“第二位孔子”,人们为此长时间的鼓掌以示祝贺。

在北京的第二年,还让杜威有机会与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建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1920年的夏天与秋天,罗素与他的秘书多拉·威妮弗雷德·布莱克(Dora Winifred Black,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之女)在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旅行。随后,1921年的冬天与春天,他们又来到国立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杜威夫妇与罗素和布莱克小姐之前曾于1920年秋在湖南长沙见过面。当年,湖南省长在得悉如此知名的贵宾来到长沙之后,曾经专门设宴款待这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罗素曾经提到与杜威夫妇的这次不期而遇:“我与杜威教授及夫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督军为我们准备的长沙的一次宴会上。宴会后,杜威夫人曾在致词中向督军建议湖南省采用男女同校教育制度。督军的回答颇具外交辞令,说他会对此加以慎重考虑,但他又觉得湖南在此方面的时机尚未成熟。”^①

罗素到达北京后,经常与杜威小聚,而且有时聚会还会有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学者参加,大家在一起探讨哲学问题。他们各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于是讨论场面经常是唇枪舌剑、各持己见,国立北京大学的哲学之风由此更为强劲。

同年3月,罗素身染肺炎,一度病人膏肓,奄奄一息。英国报社甚至做了最坏的推测,宣布罗素已于3月28日辞世;《曼彻斯特卫报》为此还刊发了长篇悼文。在罗素病危时,杜威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据《日本广告报》的报道,杜威还曾记录了罗素的遗嘱。另一报道则称:“1921年,杜威在北京探望病危之际的罗素时,后者向其概述了结束国家纷争的计划,热心地与其探讨中国当时的形势,并提到了与陈独秀的谈话……面对病榻上时日不多的罗素身上所散发出的无限热忱、幽默、智慧,杜威深受感动,几乎不能自持。”^②

① 伯特兰·罗素. 中国的问题. 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22:236—237. ——原注

② 舍尼曼(Ralph Schoenman). 世纪哲学家伯兰特·罗素论文集. 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67:8—9. ——原注

由于当年多拉·布莱克尚未与罗素结婚，英美两国的社交界没有像对待罗素那样接纳认可她。对此，杜威夫人深感不平。她认为，如果罗素可以为社交界所接纳，那么多拉·布莱克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后来，她还力排众议，盛情邀请布莱克小姐与罗素到她的家中做客。

在中国的2年时间里，由于杜威在大专院校讲座授课的日程得到了精心的策划和安排，因此，杜威不仅可以与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而且还有机会与非学术界的人们交谈。事实上，这也是资助团体的本意所在，通过与尽可能多的团体的交流，让杜威的观点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北京居住期间，杜威还分别到过满洲里、山西、山东和陕西。1920年5月南京讲座结束后，杜威还巡游了长江沿岸各省，走访了浙江、江苏、江西、湖南以及湖北等省份。1921年春，杜威还去了中国的南方两省——福建和广东。总共加起来，杜威曾经到过中国当时22个省中的13个省，并且在这些省份的省府做过讲演。

杜威夫人和露茜(Lucy Dewey Brandauer)俩通常都会与之随行，而且总是会与杜威一起被安排在讲台就座，如此听众们就可以看清他们每个人。露茜曾经回忆说：“那些在地方城市的讲演通常都是在当地最大的礼堂里进行的。所有的学生，上至大学学子，下至幼儿园稚童……那些小孩子在讲演及翻译的整个期间都极其可爱和遵守秩序，偶尔会有一个尚在蹒跚学步的幼童悄悄地离开座位，走到走廊中间，认真端详我们几分钟后，又静静地走回座位。”^①

杜威在中国各省所做讲演的题目范围很广。举例来说，在福建，对福州中小学教师的4次讲演题目分别是“自动的研究”、“习惯与思想”、“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以及“教育与实业”；对大专院校教师的讲演题目是“自动与政治民主”；对地方师范学校学生的讲演题目是“教育者为社会领袖”；在地方教育协会的会议上，他的讲演题目是“美国教育组织及其影响于社会”；对私立政法学校的师生的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对南泰少年协会的讲演题目是“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对福建商友协会的讲演题目是“民治的意义”。

杜威夫人经常也会应一些妇女团体的邀请前去做讲演。在福建，她曾经

^① 露茜·杜威·布兰道尔给乔治·戴克威曾的信，1967年6月28日。——原注

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一起畅谈“中国妇女教育的必要性”；在私立政法学校演讲“美国妇女选举权的奋斗史”；同华南女校的学生谈论“美国的女童教育”，以及“中美两国争取女童教育权运动的比较”；在女子师范学校与女子职业学校师生的聚会上，她的讲演题目是“学以致用”；在女青年会上，她的讲演题目是“我们女性如何报效社会”。

杜威夫妇所至之处，总是会有专设的委员会盛情接待；同时，政府要员及市政机构、专业团体、教育组织的代表总是会专门设宴欢迎。离别之际，欢送宴会上的发言人总是会对杜威夫妇的讲演表达他们内心由衷的荣幸与谢意，并赠送纪念品——花瓶、漆盒、丝绸披肩及围巾。

如此真挚而慷慨的接待令杜威及家人久久难以忘怀。时隔46年后，露茜说道：“中国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的周到与慷慨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的那两年是我一生最美妙的时刻之一，我的父母也同样如此。”^①

尽管杜威讲演的私人氛围是非常亲切友好的，但是，中国政治与社会如此混乱的大背景让杜威大出所料。国际上，中国当时正在徒劳地试图摆脱外国势力扼杀中国政治与经济、侵占瓜分中国国土的野心。懦弱腐败的政府为了换取一系列的贷款，使日本得到了更多的权利和对中国的控制，将中国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一个附庸国。这一方案激起了人们对于政府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憎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觉得应当采取行动了。于是，1919年5月4日，就在杜威开始讲座的前一个月，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了抗议亲日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肃清政府中的亲日官员，中断与日本的合作。他们强烈要求抵制日货，与此同时，商人和店主们举行了一次大罢工直到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示威遍及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中学，获得了各地爱国团体的一致支持。当上海、天津、南京的商人开始罢工而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准备加入时，政府做出了让步，许诺进行改革。

与这场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相伴随着的是巨大的文学和文化发展，通称“新文化运动”。人们在这次运动中批判了许多中国传统的陋俗，认为正是这些陋俗束缚住了中国，以至无法从陈腐的过去中挣脱出来，成为现代国家中的一员。他们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必须实现现代化，必须适应

^① 露茜·杜威·布兰道尔给乔治·戴克威曾的信，1967年3月6日。——原注

20 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强烈要求创立一种普通大众看得懂的白话文。他们希望学校的课本和参考书都要以白话文印刷,而非过去一贯使用的文言文。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创办了白话文期刊,其内容则是关于全中国范围内的主要时事问题。

因此,当杜威抵达中国时,这些范围广泛旨在复兴中国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立即引起了杜威的关注,他认真地观察和解读着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他曾这样写道:“这正是学术现象,值得去研究、琢磨、调查和思考。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包括正沉浸在改造阵痛中的欧洲,能和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提并论。”^①于是,杜威在讲座、授课和外出演讲之余,还抽出时间来撰写文章,主要为《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供稿,报道中国的形势。

在杜威到达中国 4 天后的学生抗议示威是他记载的第一个事件。在“中国学生的抗议示威”中,杜威详细描述了学生们的行动以及政府的反应。对杜威而言,这一抗议示威标志着中国从被动接受到积极主动的转变,显示出了独立于政府之外而又能最终压倒政府的组织团体的存在可能性。对于大多数还是孩子却能够做出如此之盛举的青年人,杜威印象尤为深刻。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很难想象,我们国家 14 岁以上的孩子能够带头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净化并改革国家政治的运动,并能让商人和专业人士因感到羞愧而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②

其他文章,如《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中国政治的新酵母》、《中国的政治动乱》、《工业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民族吗》,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阐述了中国当务之急——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统一全面的交通运输系统,以及克服地方强烈民族主义的全民族意识。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社会和文化改革运动的文章,其中包括:《转变中国的意识》、《谁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中国的新文化》。杜威强调指出,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应当避免国民生活的二元主义。他认为,中国对西方科学

① 杜威. 旧中国与新中国. 亚洲, 1921, 21(5): 445. ——原注

②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 纽约: 达顿出版公司, 1920: 247. ——原注

技术的接纳与吸收必然会引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制度方面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应当符合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现在和未来的实际情况。杜威曾写道:“所需要的是一种新文化,是从西方最为系统全面的思想体系中自由吸取的——但一定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化所运用的方法和媒介。”^①

杜威还时常评论外国势力的对华政策。在《在东海的两边》、《从内部看山东》、《远东的僵局》、《中国的噩梦》、《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在华财团》、《重访山东》等文章中,杜威探讨了在华外国势力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他特别谈到了日本自诩的“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抵抗欧洲侵略的保护者”。杜威发现,日本人的侵略行径事实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1915年5月7日的“二十一点要求”提出之后,这一天被中国人视作“国耻日”,同时对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东西都充满仇恨。杜威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怀疑历史上是否曾出现过如此全民的憎恨和仇视;日本人令人发指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令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与日俱增。”^②

杜威在《中国的国际斗争》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一场价值观念和理想范围内的斗争,将影响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度,还是继续维持独裁政治的传统——至于究竟是冠之以共和国还是王国的称号,倒在其次。”^③

杜威认为,中国人民实际上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都倾向于民主而不是独裁。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典范的民主国家。他写道,“尽管这种民主还只是中国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口号,然而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明白,只有民主才符合中国的历史精神。在这一点上,沉默的大众感同身受。”此外,杜威还写道:“谁都无法了解在看不到民主希望的中国,人们会把此时的美国想象得如此理想化。”^④

杜威当时并未觉察到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许多中国的师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持者,在大学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得到俄国强有力

① 杜威. 中国的新文化. 亚洲, 1921, 21(7). ——原注

②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 纽约: 达顿出版公司, 263页—264页. ——原注

③④ 杜威. 中国的国际斗争. 新共和, 1919, 20(8). ——原注

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俄国自身仍处于革命奋斗阶段,无暇顾及参与他国的革命运动。在杜威看来,新文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特点,没有受到俄国的任何直接影响。他预言性地宣称:“可以想象,军阀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引起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反抗。”^①

杜威在中国的时间长达两年,其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样的。杜威对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关于纯哲学理论主题的讲座,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实用主义思想学派。杜威的学生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了工具主义,回国后将其传播到了中国国内,赢得了一批年轻学子的追随。但是,胡适早期从哲学理论到文化改革运动的兴趣转移,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使实用主义阵营自此失去了一名强有力的拥护者。杜威的在华讲座主要以实用主义为中心,许多中国的哲学学者及专家聆听过他的讲演或者看过报纸及学术期刊刊载的讲演内容,实用主义由此在中国焕发了新生。然而,在杜威离开中国的一二年后,中国对实用主义的热情也逐渐冷却。最后,实用主义在中国沦为最没有影响力度的哲学学派之一。^②中国的哲学家们,同日本哲学家一样,整体上都偏爱于西欧或东方传统中较为抽象、理性、综合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什么经验的、具体的、相对的、实用的实用主义哲学。

相对而言,杜威对中国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持久。毫无疑问,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教育方面的讲座,大大推动了之前人们就开始的对杜威观点的传播与普及,杜威的教育观点渐渐应用于中国的学校教育之中。在杜威访华结束后,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

至于中国对杜威的影响,历史是有记录在册的。杜威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的经历“是最有意义的,同时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所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③他解释道:“这是一次绝对超值的体验,与其说学习到了什么新鲜事物,不如说获得了崭新的看待事物的视角与侧面。西方的任何事物在这里

① 杜威. 中国的新文化. 亚洲, 1921, 21(7). ——原注

② 达布斯(Homer Dubs). 近代中国哲学. 哲学杂志, 1938, 35. ——原注

③ 杜威给约翰·J·科斯的信, 1920年11月7日. ——原注

都会变得完全不同,如同年轻人的重生,世界未来的希望指日可待。”^①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简·杜威(Jane M. Dewey)对这次经历做了总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为使她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而斗争。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这就为社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工具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据。”^②

① 杜威给约翰·J·科斯的信,1920年1月13日。——原注

② 简·杜威.约翰·杜威传//保罗·希尔普(Paul A. Schilpp):.约翰·杜威哲学.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39:42。——原注

寄自中国的十封书信^①

[美] 约翰·杜威 艾丽丝·奇普曼·杜威

1919年5月2日 上海

我们一直由几位中国知识界人士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照顾着,他们多数是归国的留美学生。在这里,“留学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如果中国能获得独立的话,美国的大学同样功不可没。接待委员会带我们去参观一家中国的棉纺织厂,这里甚至都没打着日本工厂都有的劳动法的幌子来掩饰一下。厂里雇佣了一些6岁的孩子,但人数并不多。在纺纱车间里主要是女工,她们的工资是一天30美分,最高的是32美分。在织布车间里,工人干计件的活,工资达到了40美分。

我想把我们某个平常的下午所吃的东西告诉你。先是在旅馆里吃午餐,然后我们去报社,大约4点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用茶点。从报社出发,我们前去拜访一位重要的满族政治家的女儿。她是一位小脚女人,生养了10个孩子。她出资奖励在禁止纳妾方面写得最好的文章。纳妾制度被他们称之一夫多妻制,他们说这在富人中间很难废除。在女主人家里,我们品尝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喝过的、很稀罕的茶,还吃了2块做成小蛋糕样子的肉馅饼,味道相当独特,好吃极了。之后,我们上一家餐馆吃晚饭。起先,我们走错了餐馆,在那里等着的时候,餐馆的人给倒了茶水。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收一分钱,反而还感谢我们走错了地方。而后,我们穿过一开

^① 选译自:John Dewey and Alice Chipman Dew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ited by Evelyn Dewe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0: 150 — 311. 徐来群、姚羽译. 标题系编者所加.

始走的街道到达了那家正确的餐馆。这里被他们称之为白老汇大街和第42街之拐角,果然不虚此名。旅馆旁边有一个大屋顶花园,旅馆和花园都是由百货商店经营的,地下也是他们的地盘。只要你想吃到的东西,你都能吃到,这也许就是对于人性的悲哀的评注了,但我们昨晚就这么做了。首先,我们进入了一间摆放着全是中式家具的屋子,中间是一个非常小的圆桌,一排排凳子沿着一边为歌妓们摆放着,她们只唱歌不跳舞。那些凳子没人坐,所有的中国年轻人都对这种歌妓伴唱的习俗感到羞耻,而想摆脱它。在桌子一侧摆放着带壳的小杏仁,和我们这里很不一样,非常甜。杏仁旁边是干的西瓜籽,很难剥开,因此我就不吃了,但所有的中国人都磕得津津有味。两位女士进来了,她们曾在纽约留过学。这些中国人都既能说英语,也能听懂英语。在桌子上,有几小块火腿切片,有名的皮蛋尝起来就像硬的煮鸡蛋,其样子则和深色的果冻比较像,还有几小碟糖果、虾等食物。尽管他们坚持要给我们摆放着勺子的小盘子,但我们还是自己动手用筷子进食。接下来是一场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盛宴,服务生不断地把桌子中间的菜撤走,又上新的菜肴,让我们随便享用。这些有着如你所愿的烹饪水平和昂贵价格的上乘菜肴,若要在日本的话那是不可能吃到的。我们吃了鸡肉、鸭肉、鸽子肉、小牛肉、鸽子蛋,喝了汤,尝了鱼和长在岩石上的小牡蛎(非常美味可口),还吃了精致的小菜以及与其他东西拌在一起的竹笋。我们享用了烤虾、鱼翅和燕窝(这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味道,只是一种非常清淡的汤,但价格不菲,那才是它存在的真正原因吧),它是在烹饪过程中几乎全溶解的明胶。我们享受的待遇还不止这些。每上了几道菜后,身着脏兮兮的白褂子和头戴旧帽子的服务生就会把热气腾腾的带香味的湿毛巾递给我们。我们的甜点是豆沙馅的小蛋糕,里面裹着杏仁糊和其他糖果,一个个做得都很精致,看上去就像艺术品一样,但是没什么味道,不怎么吸引我们。而后,我们吃了水果,香蕉、苹果和梨,它们都是一片片切好的,每一片上面插着牙签,这样我们吃起来很方便。接着,我们喝了一种汤,是用鱼的胃或气囊做出来的。我们又吃了可以想象的最可口的大米布丁,它是用模子刻出来的。米饭里面象征性地填充了8种不同的东西,我一点都不知道是什么,但它们在味道上区别不大。在上这道菜时,先给我们一只小碗,里面盛着半碗调料,看上去像牛奶酱。实际上,它是用磨成粉的杏仁做成的,用来蘸大米布丁吃的。它是如此的可口,令他们此前所做的一切

菜肴都相形见绌，我打算亲自去学做这道布丁。

1919年5月4日 上海

我会见了一位中国的小脚女人。我们和她一起吃了饭。她一直在厨房做饭，仆人把所需的东西拿进去给她，一直忙到吃完饭才进了房间。她面容姣好，有一张温和而圆润的脸，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相当漂亮的。当然，她走路很慢，东摇西摆的。昨天作完讲座，我们又去她那里了。她领我们参观了她的住所。室内装饰良好，不过在我们看来不够便利，我觉得这样的布置在这里已经很现代化了。屋里有一个楼梯，上面还有一个小天台，那里既可以坐，又可以晾衣服。洗澡盆是一个锡制的桶，桶里的水是用小炉子烧热的，就像我们的小的洗衣炉灶。它有一根出水管伸到地面，但没有在东方常见到的阴沟。在厨房里，有一只支在箱子上的小铁炉，他们烧小块的柴火生炉子。整个屋子隔成3个区域，两口浅的大铁锅用来烘烤和煮东西，还有一口深的铁锅放在中间存放泡茶的热水。因此，只需要生两堆火，两端的火堆散发的热量同样加热了放在中间那口锅子里的水。

毋庸置疑，如果有机会展现的话，中国人是非常善于交际的民族。像我们这位女主人的丈夫那样的男人自然是能力非凡，思想观念也很先进。他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让人印象深刻。当我们访问学校的时候，他并不做事先安排，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按一套设定好的方案进行参观。当我们出去吃午饭时，他领我们去了一个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

昨天，我们去一家百货商店买了手套和袜带。手套是 Keyser 牌的，进口的，袜子、袜带、背带等也是。手套价格从1美元到1.6美元不等，背带是1美元。我买了一些丝绸，16英寸宽，每码卖55美分。店里乱哄哄的，地面也不干净，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我们花了3美元买了一本书，书上标着在英国的定价为1先令6便士，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手套和袜子是日本生产的，又好又便宜；优质的丝制长统袜是1.6美元一双。但是，中国人仍然不买这些日本货，而是买美国货。我们访问了一家棉纺厂。中国的棉和丝由于缺乏科学的生产工艺和对种子的适当照料，现在的质量变差了。在织布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把本国产的棉花和我国产的棉花混在一起。

[1919年5月13日]^①星期二下午 上海

昨天^②晚上和前总统孙中山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发觉他是一位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说到中国人的弱点是源于对一位古代哲学家“知易行难”的观点的接受。因此,他们不喜欢“行”,尽管在“行”的过程中有可能获得全面的理论认识。然而,日本人的长处就在于,他们即便一无所知,还是继续“行”,并在错误中学习。中国人却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因此,孙中山写了一本书向他的民族证明,事实上是“知难行易”。

美国民众的态度是希望参议院反对该条约^③,因为它根本就是把中国交给了日本。我想,这里就仅仅提一下会谈中涉及的两件事。一方面,日本已经拥有了更多的部队,即23个师,安排在中国的兵力比在日本的还多。日本人管理了中国人,已完全占据了满洲里。他们借给中国2亿,用于扩展这支军队。根据在宴会上的谈话,他们每月借给中国200万,共20年。日本估计战争会持续到1921年或1922年,向德国提议组成一个进攻性和防御性联盟,日本向德国提供由它训练的中国军队,德国则把协约国的特许权和它在中国的殖民地转让给日本。为了表示诚意,德国已经把它在中国的领地给了日本。这一事实导致了英国在和约签署时,签订了秘密协议,同意把德国的所有权给日本。这些人并不是沙文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清楚讨论的内容,也见多识广。其中的一些声明是些既成的事实,比如军队的规模和2亿借款,当然我不能给予保证。但我的看法是,普通民众反对这一认可的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的和约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从整个东方形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有点魄力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是唯一的拯救办法,而形势的确比我们在国内所了解到的要严峻得多。假如事态再持续5年或10年,倘若没有两件事发生,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在日本军事统治下的中国。这两件事是:或是日本在此期间垮掉了,或是亚洲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我认为,一个

① 该日期系编译者所加。

② 1919年5月12日。——编译者注

③ 指巴黎和会上准备签订的条约,最后该条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即《凡尔赛条约》),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编译者注

日本化一军事化的中国是一半对一半的可能性。这里的欧洲外交使团当然想控制美国，这是完全徒劳的。英国则操纵着一切与印度有关的事务。他们都拖延着，长期抱着所谓的乐观态度并互相争执着，只有日本知道它想要的什么，并紧随其后。

我仍然相信日本人自由运动的诚意，但他们缺乏道德勇气。知识界的自由派几乎与我们一样不知道真相，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希望继续保持一无所知。因此，伟大的“爱国主义”就产生了，欧洲人的掠夺行径很轻易地就以出于自卫的观点证明了其合理性。

1919年5月18日 南京

毫无疑问，我们是在中国。我们听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杭州是中国城市中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参观完这座城市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围绕杭州城的是一座城墙，据说有 21 英里，也有说是 33 英里——我猜想是后者，不过城内还有数百英亩农田。今天下午，我们被带上了城墙。随地势的不同，城墙的高度从 15 英尺到 79 英尺不等，大约 12~30 英尺宽。墙是由硬的烤砖砌成的，约为我们这里的 3 倍那么大。在大的城墙里面，总有一个较小的城寨，被称为皇城、满族城，不一而足。但自革命^①后，这些内墙被拆除了，我猜想，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表明他们对满族的蔑视，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把砖用起来。这些砖以每块 3 美分或 4 美分的价格卖掉，装在大手推车上，用人力运往各地。这幢房子的复合墙体就是用这些砖砌起来的，还有几千块砖存放在大学的空地上。他们是用手把砖刮平的，你可以想象其中投入的人力和这些砖相比较而言的价值。我还是来说说我看到的一些景象吧——典型的中国，不远处是光秃秃的小山，山脚都星星落落地散布着墓穴，就像动物的地洞和高尔夫沙坑；农民的石屋上是茅草房顶，看上去像爱尔兰或法国的风格；石榴园里开满了可爱的鲜红的石榴花，还有其他的水果；一部分稻田的秧苗已经开始生长，其余的正准备播种，一块地里有十来个人在劳作；菜地里，主要种着瓜；远方，城墙绵延数英里，山上有一座宝塔，湖里荷叶莲蓬，更

① 指辛亥革命。——编者注

远处是葱茏苍翠的群山——还有这座城市。然而，并非有这么多景象皆尽收眼底。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实际上，我偶尔才能看到一张很中国化的脸。大部分时间，我都忘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看上去就像到处可见的肮脏而贫穷的可怜人。他们是快活的，却不爱玩。我想，用几百万元来建造游乐场、购置玩具以及培养游戏的骨干(play leaders)。我不得不认为，中国的祸根就在于人们极其缺乏主动精神，习惯于让别人去做事。与之相伴的事实是，孩子们很快就长大了。在这样一个有着3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不到100所学校；而且，这些学校只有几百人，顶多二三百人。街上的孩子们总是四处观望，很机灵，看上去品性良好，相当快活，但却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老成和严肃。当然，许多孩子已经在织布机旁工作了，在他们走路都还不稳的时候就开始了。杭州是个“丝绸之府”。我们参观了一家国营工厂，厂里有几百名员工在工作，这家厂至少能够自负盈亏。在城里，没有一部动力摇纱机和织布机，也没有一种雅卡尔提花织机。男童经常得坐到上面，不停地交替操作，有时要用脚踩动6个或8个踏板。大部分摇纱不是靠脚力，而是用手完成的，但他们的手动摇纱机比日本的要精巧些。看起来，机器有许多地方需要掌握，很多东西需要改进，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密切联系的。改变是如此之难，难怪每一个待在这里的人多少有点中国化了，并且由于个人对中国人的喜爱而接受了他们的温顺品质。

由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对日本的抵制等原因，学生们现在正成立一个爱国联盟。但是，南京大学的老师们说，不应满足于二三件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他们正在规划一项涵盖一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当他们使精心制定的宪法成文时，他们会精疲力竭，或许他们还会面临许多困难，以至于在面对可能完成的事情上，他们也会变得沮丧和气馁。我不知道，我是否曾告诉你上海某家裁缝店的一个店员，由于他抱着一贯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认为目前的形势谁都无能为力，因此，他说对日本的抵制是好事情，但“中国人记性差，不一会儿就忘记了”。

各处都悬挂着许多涂写着汉字的草帽，人们把行人拦住，摘掉他们头上戴着的日本产的帽子。这一举动是出于善意，并没有人反对。日本商店前有很多警察，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进去，他们在“保护”日本人。这就是中国的特点。警察们都持枪拿刀，人数很多，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唯一跟他们一样

无聊的就是狗了，数目更多，全身伸直地躺着，从不蜷做一团，也从不会有任何机会去干任何事情。

我们参观了旧的科举考场，现在它正在被拆掉。科举考场都是些小房间（考室），大约有 2.5 万间。想获取功名的考生在科举考试期间就关在这些考室里。据说，考室是一长排建造的，单坡顶，建在一条公共长巷的两侧，基本是面对面敞开着。其中一些考室对着下一排考室的后墙。每个考室有 2.5 英尺宽，4 英尺长。考室内两边墙上各有上下二条槽缝，一条是椅子的高度，另一条是桌子的高度。考生们在上面插上 2.5 英尺长的两块木板，作为他们的家具。他们坐卧、答题、饮食、睡觉全在这些考室里。若天不下雨的话，他们的脚就可以放到走廊的硬地上，把身体舒展一下。整个考试持续 8 天，分三场进行。考生于八月初八晚进入考室，第一科考试一直到初十下午。然后，他们在外过夜。初十一下午，考生又来考室参加第二科考试，一直考到初三下午。再隔一天，到初十四晚上，考生再次回到考室参加第三科考试，直到初十六晚交卷出场。他们在长巷里可和其他人随意交流，长巷的栅门是上锁紧闭的，没有人能以任何理由从外面进来接近考生。考生时有死在考场的。但是，如果考生能把认识的朋友带进长巷里，让他替自己答题，那么全中国最蠢的人也能通过考试，成为类似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人。因此，有名的中国文人就是这样产生的。科举考试的准备不是政府的事情，可以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备考。考场的房子仍然保存完好，也许很容易就能改建成一所学校。但是，你认为他们会那么做吗？根本不会。政府没有打算在那里建立学校，因而这些房子会被拆掉或为官方所用。假如你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你就无法想象官僚主义有多严重。我们还参观了一座大的孔庙，每年使用两次。它就像所有的庙宇一样，伴随着岁月的沉淀，布满了灰尘。如果你打算偶然访问一下任何一座中国的庙宇，你都会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荒芜的、被人遗忘的废墟。星期天，我们去了地狱神殿，陪同的先生建议法师应该把雕像上的灰尘拂去。法师说：“是的，如果把灰尘拂去，那会更好。”

1919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 南京

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痛恨日本，但他们都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不合，他

们各自的组织无法走到一起。许多留学生没有工作,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经商,或他们不愿从底层干起,而且部分官员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敌对态度。

在这里,做生意是一种典型的方式。我们刚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快信,本来它应该是12小时内可以收到的,却花了4天时间才收到。因为快信更快些,人们才不发电报而选择快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也许得花好多时间等待,也闹不清为什么你的快信没有按时寄到你手中,但你得自己承担其中的风险和费用。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同外国人耍花招,出于羞怯感,他们仅仅是随波逐流,一直在与自己 and 他人周旋。

这幢房子离铁路站4英里远。这里的街上没有车,有许多人力车、几辆马车,几乎没汽车。这里也没有轿子,至少我不记得看到过。但在几天前,我们去镇江,那里的街道很窄,轿子是主要的运载方式。这里的人力车夫们一天付40美分到城里去租他们的黄包车,这些黄包车都一样,非常旧。他们赚一点点钱,比租车的钱多了没多少。在上海,人力车夫们一天付90美分获得拉车权,可以赚1美元,也有可能达到1.5美元。

最近有一天,我对一位年轻的教授说,中国仍然支持三大有闲阶级。尽管他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和评论者,但他看起来很吃惊,问我他们是哪些人。当我问他,是不是不能说是官员、神职人员和军人?他回答,不,可以这么说,就此打住了。这样看来,既思考又执行,尤其侧重于执行,这是他们的座右铭。

1919年6月1日 北京

我们会见了一个来自内地省份的年轻人,他正为长期没有得到薪水的教师们筹款。此时,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但是,与当时的中国军队相比没有比它更糟糕的了。中国的许多省份实际上都是在军阀和督军的控制之下。这些军阀和督军靠贪污军饷来增长自己对地方的压制力量,他们大多是公开的亲日派头目。

我们的事情刚刚得到安排。昨天,我们私下讨论了在东方的最后四个月的计划,约定在这剩下的时间内尽量多安排时间学习。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月,要尝遍所有的地方小吃。谈论一下隐秘的和多智的东方。与欧洲相比,

他们向你敞开的比你想要的更多(尽管必须承认有时候的信息是混淆的)。

昨天,我们去了风景如画的西山(Western Hills),看到了坐落在真正的大理石基座的石船,就像画一样美。但是,石船的其他部分都是赝品,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然而,如果你比较起来,就会发现石船可以与凡尔赛宫相媲美。这里最好的建筑风景是以瓦片为顶的佛教寺庙,每一个瓦片都有一个玉佛,就像是看电影一样。我们步行来到比俄罗斯山(Russian Hill)高的地方,穿过一座假山上的山洞,山洞是通往清扫这一寺庙的地方。看来这个地方归属满族,他们收费很高,即使到尼亚加拉瀑布去也没有那么高的收费。从这可以看到,中国需要一次革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和左派,就像我前一次信中所说的,有太多的贪官掌管着混乱的事务。总之,我唯一能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官员和军阀都在更加肆无忌惮地为个人掠夺财富,他们害怕一旦发生一次运动,整个帝国就会在他们眼前倒下。中国的现状很让人担心。我想引用我国的几句格言:“你永远无法预测”,“让别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相反,他们毫不掩饰他们自己所有的弱点和缺点,在冷静地和客观地陈述之后,他们会说“那是很糟糕的”。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否合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出合理的结论。然而,这使他们成为极好的朋友。正是在他们减少对自己管理的时候,日本人试图想控制他们和提供必要的活力。在这里你肯定能看到,日本人那有名的褊狭心理的另一面,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如果你整天在做一些事情,那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一种心无旁骛的心理。当其他人还在摇摆不定或根本就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应该不停地朝着你的既定目标前进。

今天早晨,我们去著名的博物馆——紫禁城(Forbidden City),这是中国唯一仍保持领先的地方。在紫禁城里,坐落着很多金碧辉煌的宫殿和谒见大厅,还有黄色的琉璃瓦以及高大的红墙。你所看到的真是一种粗俗的辉煌,而且第一件事情是在你的脑海里会显现出一个传统的关于东方的想法。我想,这里比其他我到过的地方更受到印度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北京城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当欧洲那些首都还在偶然性地出现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用他们的组织权力大规模地修建都城了。毫不怀疑地说,如果他们很好地使用权力,他们还是有组织的权力。这个博物馆简直就是一个珍宝、瓷器、青铜器、翡翠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或陈旧的博物馆。进入博物馆的花

园需要 10 美分,进入博物馆内其他地方需要花费 1 美元或更多,因此我猜想,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它大概是为了控制公众和平民进入,才收费这么高,而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1919 年 6 月 20 日 北京

上周末,我们走了 10 英里到清华学院(Ching Hua College)去。这是一个靠博科瑟赔偿基金(Boxer Indemnity Fund)^①而建立的学院,是一所高中层次补习 2 年大学课程的留学预备学校。该校刚刚毕业了 60~70 名学生,明年将前往美国留学。他们去美国各地,主要是一些小的学院和中西部的州立大学。相当一部分人去 Teeh 学院,一部分人去史蒂文斯学院,但没有人去哥伦比亚大学,我想主要是因为该校在大城市的缘故吧。毋庸置疑,把这些学生放在小城市有很多好处。中国有不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他们主要是去读本科教育的。除了汉语教育外,教学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这些男孩们看起来早已对英语听说读写非常熟练了。比较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待这些孩子的方式,在他们真正调整自己之前,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羞辱一直到去美国。然而,当他们学成回国后,他们因为所遇到的情况甚至比以前更差而又要调整。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有着美好的希望,同时又受到美国式的教育但对此毫不知情。他们找工作非常艰难,以至于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法保证。经常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但这个国家完全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忍不住地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是多么的落后,她的问题是多么的可怕。同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坚信中国的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或许他们是正确的,毕竟中国有二千年^②的辉煌历史。

你在自己的一生中或许有些时间要来这里,因此,了解关于钱的知识是很有用处的。除了中国的银行家了解钱的知识,很少有人了解它。这里,11 个一角硬币等于 1 美元和 6 个 20 美分相当于 1 美元,然而,11 个铜板等于 1 角硬币,那么 1 美元就相当于 138 个铜板。结果是节俭的人常常用 1 英镑或 2

① 即中美庚子赔偿基金。——译者注

② 这里有误,应为“五千年”。——译者注

个大铜板付给黄包车夫车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纸币。明晚我们要去西山，被告知要带上几美元和 60 个 5 美分硬币，去西山的火车车票钱正好是 1 美元，好像再没有其他用途了。相反，外国人经常待在旅馆里做事，人们经常拿 5 个 20 美分来兑换 1 美元，如此等等。这些旅馆是外国人开的，并不是精明的中国人开的。还有一件你知道后会很高兴的事，那就是北京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化的城市，所以，我们每隔一天可以吃上冰淇淋，两大杯冰淇淋。这对你很有帮助。

智者一言。请记住，不要问一个中国人是否要下雨或其他关于将来天气情况的问题。这里，乌龟被认为是天气的预言者，但乌龟被视为是地球上最卑鄙的动物，你会明白问这样的问题是一种羞辱。在这次反日运动中，他们给日本人的微妙礼物是拿一顶日本制造的草帽，这是他们从路人头上拿过来的，然后把它切割成像一只乌龟的样子，并把这顶草帽挂在了电话杆上。

顺便说一下，当我把这里发生的第一次运动与大学生的乱闹相比较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公平地对待学生。整个运动是经过精心计划的，看起来很早就完成了，否则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因为一个政党不久表示要举行一次运动，两者时间是一致的，他们害怕他们的运动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派别的代理人，想单独地作为学生行动。试想一下，在美国 14 岁以上的孩子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的前沿，对商人和专业人士加入他们而感到羞愧。在一些国家里，这却是真实的。

1919 年 6 月 25 日 北京

这里谈一些关于家庭消费的简单事实。在中国，所有的木板都是用手锯开的——两个人和一张锯，就像一个横切的架锯(buck-saw)。在新的北京饭店，它是一幢大楼，人们用大的原木锯成合适的长度做窗户框架，而不是把做好的窗户框架放在里面。吐痰也是一门普通的技艺。当一位女学生想借口离开她的座位的时候，她横穿房间用力地向痰盂吐痰。现在，小甜瓜已经可以吃了，它们像成熟的黄瓜，比较小但很甜。做苦力的人们和男孩们在街上把小甜瓜连皮带瓤地吃个干净。孩子们吃小的青苹果。桃子很贵，但那些得到又青又硬的桃子的人就生吃它。盆栽的石榴已经开花，正在结出果实，

其颜色是一种很好看的猩红色。荷花池的荷花也在盛开,那玫瑰红的颜色引人入胜。当荷花的花蕾将要开放的时候,它们好像有意猛地开放,散发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但是,荷花从来就不是为艺术而生,只是宗教才使它变为艺术。神圣的池塘搞得非常整洁,坐落在紫禁城的护城河里面。在北京,男人是女人的2倍。

星期日,我们去参加一个中国人的婚礼,是在海军俱乐部举行的。他们的婚礼与我们的婚礼没有什么区别。新郎和新娘都穿上传统的外国服装,戴着结婚戒指。婚宴有9桌,其中6桌是男士、3桌是妇女和儿童。妇女们带着孩子和他们的奶妈在中国随处可见,我的意思是,无论这些妇女到哪里,奶妈们都要跟随着到她们要去的地方,这是一个习惯。在整个婚宴上,除极少数的男女留学生之间对话外,没有男士与女士说话。鸡蛋1美元可以买120个。在我们的公寓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男人们带着鸟出去散步,有些鸟是在笼子里面,有些鸟是用绳子把它们的一条腿拴在木棍上,以便鸟在木棍上栖息。

1919年7月27日 北京

我想,我要回头写一个大约5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我的一次演讲中,他从中间走廊走到我身边,大约站了15分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点也不害羞。前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家丁的护卫下来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的包厢里,开始很认真地用汉语与我交谈。我的朋友发现,他是想问我是否认识他的三叔。他是上次演讲举办者的孩子,他的三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如果你碰到T先生,请代我和他的侄子向他问好。这个男孩那天晚上和我们对话几次,每一次都是认真的和毫无拘束的。其中有一次,他向我要名片,然后小心地用红纸把它包起来。这家餐馆在荷花池旁边,现在正是荷花的盛花期。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荷花的美丽,总之荷花就是荷花,我建议你明年夏天来这里看看。

1919年8月4日 北京

上周,我去天津参加为期两天的教育会议。这次是受天津教育联合会的

邀请同所有中学的校长讨论与秋季开学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校长非常保守，反对学生参加游行和政治团体。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秋季开学非常紧张和提心吊胆。他们认为，学生们在整个夏天参加政治运动之后，在适应他们中学（都是寄宿学校）的学校纪律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学生们在管理政府几个月之后想要管理学校。对于主张自由的少数派来说，当他们让学生安顿下来适应学校的生活时，可以想到学生们的暑期经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他们回来的时候会带来新的社会观点。因此，教学应当改变，管理学校纪律的方法也要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

有一天，我在一所私立中学吃了一顿很美的中餐。该校是15年前在一个私人住宅里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有6名学生。现在，它有29亩土地，1100名学生，分年级进行教学。它正在建设第一幢学院大楼，今年秋季准备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100名新生。尽管校长是一个活跃的基督教徒，认为只有基督教教育可以拯救中国，但学校的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在管理和支持，没有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参与管理。其主要的赞助者是一个既不说英语也不是基督教徒的、传统的但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校长说，两年前，当他们三个人（包括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内）到世界各地进行教育考察时，美国政府从纽约到旧金山专门给他们提供秘密保镖的服务。这位校长对中国传统的绅士有很深的印象，他说：“哪一种教育能造就这样一种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绅士。与他相比，你们西方有修养的绅士被宠坏了。”他们肯定具有世界上的谦恭有礼的行为习惯，就像日本人的礼仪习惯，但要减少一点，以便表现得更加自然。然而，这种类型的人并不普遍。我问校长：“教会教育对中国的被动和不抵抗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这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影响和在美国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影响不同一样。”后者，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Y. M. C. A.）已经放弃了不干涉的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应该改变社会状况。校长说，按照原来的看法，基督教青年会与其说是基督教徒，还不如说是一群社会工作者，他们所有人都是受到鼓励的。我认为，或许中国人能通过抛弃基督教的所有腐败而振兴基督教，把它变为一种社会信仰。

这位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校友，也是中国很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说话的时候用了很多形象化的隐喻，很抱歉，我记不清他都说了些

什么。其中,在说到日本的活力和中国的惰性时,他这样说,前者是水银,受到他们周围的各种影响;后者是原棉,热不会温暖,冷不会结冰。然而,我重申了观点,中国人的保守更多的是智慧和深思,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固守传统。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当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时,他们的人民将会发生更彻底的变化,所有这些方面都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据传,现在的情况是,教育部长要想回到他的办公室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解散这所大学;二是阻止校长回来就任,三是解雇所有在座的中学校长。很显然,他不能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安福俱乐部(Anfu Club)相当痛心。据说,这个教育部长是一个聪明的政客,当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在座的人他是受到诽谤的。有人说,他本人也是安福俱乐部的成员。

在从天津回北京住所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中国的另一面。有一位法国前部长被介绍给我作为我的旅行伙伴。他是一位高等数学方面的博士,从美国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谈话的主题是需要对灵魂、神灵附身和占卜等进行科学研究,以便科学地肯定灵魂精神的存在和否定灵魂的存在。当时,他讲了很多中国的鬼神故事。除了故事情节的生动外,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对待鬼神的。很显然,他比我们美国的一些巫师对这方面了解得更多。但是,确实很多中国人都有鬼神附身的现象发生。你知道中国富有的家庭都在自家住宅的院子里建一堵墙,我猜想,其目的是把鬼神堵到外面去。因为鬼神走路是不能拐弯的,所以,当一堵墙竖立在住宅前门的位置是安全的。否则,鬼神就会在不舒服的时候就去侵占某个人的身体,造成鬼神附身的现象。据说,天津的一群前政客对灵魂现象有研究兴趣。考虑到中国是鬼神的故乡,我不清楚西方的研究者为什么不在这里开始他们的研究呢。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不容易受骗的,因此,不存在不经过加工的鬼神故事。

杜威先生与中国^①

胡 适

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5月1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②，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11省。他在北京的5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10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地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10年20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

① 选自：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13—15。

② 这个时间有误，据史实，杜威先生及夫人于1919年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编者注

一、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它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它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它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二、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地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久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因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上的人对于他的评判几乎没有异议(除了朴兰德 Bland 一流的妄人)。杜威这两年来的对中国尽的这种义务，真应该受我们很诚恳的感谢。

我们对杜威先生一家的归国，都感觉很深挚的别意。我们祝他们海上平安！

杜威在中国^①

胡 适

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10月20日，在1952年逝世，享年93岁。今年10月，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地方，将庆祝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

40年前，也就是1919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艾丽丝离开美国到远东来旅游。这次旅行本来只是为了游览。但是，在他们动身离旧金山之前，杜威接到邀请他到东京帝国大学和日本其他高等学府讲学的电报。

当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接到中国5个教育团体请他到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讲学的邀请。他接受了这次邀请。杜威夫妇就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刚好在学生运动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前三天到达上海。这就是大家常常把它叫做“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

引起杜威夫妇那么大的兴趣以至于他们改变了原订要在夏季几个月以后就回美的计划，并且决定在中国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这次学生运动以及它的成功和失败的地方。杜威当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同意。假期后来延长了一年。这样，他就在中国整整待了两年零两个月，也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当伊夫琳·杜威小姐^②在她为杜威博士夫妇书信集^③作的序言中写“人们在中国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的吸引力，使他们改变了他们原来想在1919年夏天回美国的计划”这些话时，她说的就是他

① 选自：哲学译丛，1964，(3)：65—68。原文发表在《东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中，是胡适1959年夏天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所作的演讲。

② 伊夫琳·杜威（Evelyn Dewey，1889—1965），杜威的第二个女儿，曾与其父亲杜威合著《明日之学校》一书（1915）。——编者注

③ 即《寄自日本和中国的书信》。——编者注

们对这次学生运动所感到的浓厚兴趣。因此,在这里把“五四”运动和它的遍及全国的影响来作为这篇关于约翰·杜威逗留中国情形的讲话的背景,加以扼要的叙述,从顺序方面来看是合适的。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了几个月,而在巴黎举行的和会正在草拟和约的最后条款。中国人民曾经希望:在威尔逊^①的理想主义的“十四条原则”当时还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的情况下,中国所受的痛苦可能消除一些。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下述两项消息开始传到中国:威尔逊总统在给予中国要收回山东前德国占领地和租借地的要求以道义支持方面失败了;和会决定让日本去同中国解决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当时没有办法,中国政府无能为力。人民失望而且沮丧,但是没有办法。

到了星期日,也就是5月4日,北京的学生举行了各大中学校大会,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当时的政府训令中国派去巴黎的代表团拒绝接受那项决定……

在发表了演说并且作出决议以后,大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这次游行以下述事件而告终:大家把那个因采取亲日政策以致声名狼藉的外交总长的紧闭着的住宅的大门冲开。参加游行的学生走到屋子里去,把凑巧在那里吃午饭的一个客人——应召回国商量问题的驻日公使——痛打一顿。在混乱中,有人放火烧房子——可能为了吓退那些示威的人。有一批学生在回校途中被捕了。

这就是40年前在5月4日发生的事情。

当有关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第一次发表,并且立刻引起全国各地学生和一般公众同情的反应时,杜威夫妇还在上海。

当杜威夫妇到达北京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次学生运动在6月初达到高潮的情景。许许多多的学生在街头发表演说,向人民讲各种道理,说中国抵制日货就可以重新获得它丧失了的权利。6月5日,杜威夫妇写信给家里的女儿说:“现在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有一千名学生前天被捕了。他们住满了(被用作临时‘监狱’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并且已经开始住到理学院去。”

① 指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译者注

在同一天，他们报告了那项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消息：“到了黄昏时分，来了一次电话，说大学楼房四周囚禁学生的那些（士兵们的）帐篷已经拆除，士兵们正在离去，于是，里面的学生开了一次会，并且通过一项决议，质问政府是否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假如他们的言论自由没有获得保障，他们就不想离开那座房子。由于他们计划继续发表演说，这次虽然离开了，将来还是会再次被捕的。这样，他们就用整个晚上留在‘监狱’里的办法，使政府陷于困境。”

杜威夫妇后来解释说，政府这次不光彩的屈服，是由于这个事实：上海的商人前一天曾经用罢市来表示抗议当局逮捕那一千名学生。杜威夫妇发表意见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共和政体，是一个笑话……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却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撇开妇女不说，他们有完全的社会平等。而且，一方面，立法机关完全莫名其妙，但是另一方面，当舆论像目前这样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却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6月16日，杜威夫妇写信回家说：那三个亲日的高级官员（包括外交总长）已经辞去政府的职务，学生已经取消罢课。

7月9日，他们写信回家说：“这里人们很担心。有消息传说（中国的）代表团没有签署（那项和约）。”两天以后，他们写道：“你不可能想象的出，没有签署（和约）这件事，在这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整个政府曾经一直赞成签署。总统在签署前十天还说（签署）是必要的。这是舆论取得的胜利，而一切都是这些小小的男女学生推动起来的。”

我引述这些信的目的在于，说明杜威博士和夫人在他们逗留在北京的头三个月内获得的最初印象。总之，这个“奇怪的国家”当时对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他们决定待下去，初时要呆一年，最后呆两年零两个月。他们访问了22省中的11省——北方四省，华中五省，从上海到长沙，又访问了南方两省。

关于准备迎接杜威讲学的工作，也许要说一说。在他到达中国前一个月，发起邀请杜威的团体要我讲了4次关于实用主义运动的情形，首先谈皮尔斯和詹姆士，但是特别着重讲杜威。由蒋梦麟博士编辑，在上海出版了有关杜威的教育哲学的一批文章。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念书，是杜威的学生之一。

杜威的许多学生被邀请来把杜威的讲演内容翻译成中国话。例如,他在北京和山东、山西两省作的讲演,都是由我口译和笔译的。我们还特别挑选了一些作记录的能手来把他的几次大讲演记录下来,以便在报纸和杂志上全文发表所有的讲演。大家叫做杜威在北京所作的“五大讲演”(一共有 58 讲),都被记录下来并且全文发表,后来还出了书,在杜威于 1921 年离华以前大概重印了 10 次,并且在 30 年间继续重版。

从这五大讲演的题目,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到杜威讲演涉及的范围和内容:

- 一、关于现代教育趋势的讲演 3 次;
- 二、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讲演 16 次;
- 三、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 16 次;
- 四、关于伦理学的讲演 15 次;
- 五、关于思想流派的讲演 8 次

他在北京作的讲演包括其他两大讲演:

- 一、关于美国民治发展的讲演 3 次;
- 二、关于现代三个哲学家的讲演 3 次。(詹姆士、柏格森、罗素——这些讲演是他应特别请求而作的,为的是在罗素于 1920 年到达中国讲学以前介绍罗素)

杜威在南京作的讲演包括这些大讲演:

- 一、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 10 次;
- 二、关于哲学史的讲演 10;
- 三、关于实验科学的讲演 3 次。

杜威当时总是用他自己的打字机事先把每一篇讲演的提纲打出来,把副张交给他的口译者,让他在演讲和翻译以前研究这些提纲并且想出合适的中国词句。杜威在北京每次讲演以后都把提纲交给那些经过挑选的记录人员,

以便他们能够在付印以前核对他们的报道内容。经过了40年,我最近重读了大部分他在那些讲演的中文译稿,我还能感到这位大思想家和导师的生气勃勃的风姿和真诚。他在课堂上或者在听讲的广大听众面前总是字斟句酌。

杜威在许多城市公开讲学一年以后,他的中国朋友们劝他在中国多逗留一年,主要是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不靠口译者的帮助来讲学并且同高年级学生讨论问题,还用一部分时间到北京和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去讲课。他过去的一些学生曾经在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教育中心创办了少数“实验学校”。杜威对这些学校很感兴趣。有一些学校,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一所,被命名为杜威学校。

杜威在1921年离开中国。1922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开会,讨论彻底修改全国学制和课程问题。1922年的新学制第四条写道:“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在组织学制时,应特别注意儿童的个性和资质。因此,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采取选修科目的制度,而且,在所有初等学校中,分级和升级都应采取灵活原则。”^①在1923年的新学校课程和1929年修订的课程中,都强调这个思想:儿童是学校的中心。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在这些修改内容中是容易看出来的。

① 译自英文。——译者注

杜威对中国的影响^①

[美] 托马斯·培里

向西方学习

杜威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已经从日本、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学到了许多东西。这种知识方面的扩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生存所确实需要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展已经带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可是,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从这些国家来的关于学术和社会制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彼此冲突的,需要从这些学说中作出抉择,使这些学说能把中国从纷扰不安的浪潮中挽救出来,并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儒家的争论已经解决了,至少目前是如此。然而,在这种传统的人道主义被抛在一边的时候,应该有某些东西来代替。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大部分将来自西方。

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力量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精神的或人道主义的传统,而是它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控制以及民主制度。中国最好的期望就是在民族发展的这些方面仿效西方。西方的各种精神传统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并没有很成功地传授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致他们很少领会到这种赋予西方内在生活方式以精神教育的深远奥妙之处;而且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西方发展的道路。只有少数人,如梁启超,在晚年时才领悟到西方文化的伟大是那么多的建立在它的基督教的精神结构和它的古典的文化遗产上。康有为很少看透西方文化的这些渊源,可是他的确清楚地看出科学和民主都不能提供中国新的生活秩序所需要它所支持的政治制度。由于科学知识和

^① 摘译自:John Blewett. 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4 — 225.

民主制度的发展,西方曾经第一次形成了人类生活的各种新条件。但是,对中国来说,还要有时间学习这些知识并找到它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新的时代仍在前进中。中国的进步学者已经远远地走在西方的落后集团的前面。

可是就在这时候,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俄国产生了。未来世界社会的另一种模式正浮现出来。这两种模式,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在两个国家(即美国和俄国)找到了它们最生动的表现,这两种模式都同欧洲对立,两者都对未来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俄国革命]这个令人鼓舞的福音在中国也找到了易于接受的精神力量。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同外国列强建立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应当同哪些民族和哪些政治文化的传统站在一起? 1919年,思想界的趋势肯定是朝着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它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些东西似乎被选定为它自己过去传统的替代物。早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美国和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后。当时,美国从义和团的赔款中拨出一部分,为中国的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建立一个特别教育基金。美国的地位跨越了太平洋,其经济力量对中国的帮助——这一切都有助于确立两国人民之间发展起来的特殊的、亲密关系。当美国哲学家中最负盛名的杜威教授来到中国时,中美两国学术交流的最高潮差不多就要来到了。中国人对于杜威提出的各种思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屏息地倾听着,并进行认真的考虑。

杜威在北京大学受到很好的接待。他在那里发表了5篇最重要的讲演:《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考的类型》、《我们时代的三位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罗素)》、《伦理学》。在以后的两年中,杜威旅行了全中国,在许多大学发表演说,其内容基本上同北京所讲的那些问题相同。他是那么的成功,所以当他两年后离开中国时,胡适谈到他时说:自从东西方建立关系以来,没有一个人曾经“那样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他的讲演出版了许多次。他的其他著作的中译本也出版了:《哲学的改造》、《思维与教学》、《教育科学的源泉》、《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

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杜威对一个民主中国的重大愿望,时常在他对中国人的讲演和他的有关

中国的著作中表现出来。他看到美国当时被中国理想化了,因为中国人把美国看成是“中国自己实行民主所希望的一个蓝图”。杜威个人所表达的兴趣甚至是更清楚地建立在对一些民主理想有根本吸引力的基础上。杜威得出结论说:“虽然这种民主政治显然只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所支持。可是这些少数人懂得,广大的群众也感到,单是这种民主政治就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①

要了解杜威逗留中国时所面临的困难,就必须了解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背景。权力的争夺仍然在继续。民主政体不可能即时实现。此外,自由理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特别是在教授和学生之中,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事务中的热情胜于实力的能力。正是从这些知识分子中,杜威热衷于他的信念,即中国对民主政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愿望。尽管这些自由主义者一直不明白实际政策对建立一种民主秩序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着的选择是:究竟是支持政府,并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促进自由和社会的发展;还是促进对政府的怨恨,希望通过某种途径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组织的转变。杜威在他逗留中国的时候,同那些赞成和反对政府的人都有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不能用一种直接的方法来影响实际的政治。杜威的工作就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鼓励民主和自由思想;同时提出一个教育纲领,为未来的一代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做好准备。

哲 学

杜威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成是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实证主义在1898年严复^②发表了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一书以后,开始支配中国学术界的生活。赫胥黎的这本书当时在青年学生中非常流行。我们从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里,特别是在杜威到中国的前几年里,能够追溯到实证主义的后期发展。《新青年》在杜威1919年到来以前,曾刊载了这样一些人,例如,亚当·斯密、尼采、穆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卢梭、

① 杜威. 中国的国际斗争. 新共和, 1919, (20). ——原注

② 严复(1854—1921), 近代中国思想家、教育家。——编者注

孟德斯鸠和克鲁鲍特金等人的研究著述。同时,王国维^①使中国人广泛地熟悉了近代欧洲思潮,特别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但是,来源于英国的实证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著述,特别是斯宾塞、赫胥黎和达尔文的著述,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准备。这种实用主义具有在它公开自认的经验上研究实在的方法,而并不具有康德的微妙,也不像黑格尔的那种结构上的综合,也并不像在柏格森和詹姆士的哲学里所看到的精神上的洞察以及在胡塞尔哲学里所看到的那些主观偏见。早在杜威在北京讲学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充分致力于孔德学说的研究,即认为一个人的发展是从最早阶段的宗教、神话的理解开始,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纯粹知识的科学阶段。杜威一贯引证这些发展阶段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虽然他引证过去各种经典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它们对今天学术传统的束缚。杜威以纯粹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对有关人们超物质存在的知识的各种哲学进行攻击以后,直率地告诉我们,他较多注意攻击他的实际效果而很少注意其逻辑性:“实际上,声明用系统方法处理绝对的存在来解释哲学的起源,是出于不怀好意的预谋。在我看来,用发展论的方法来破坏这种哲学理论化的形式,比从事于逻辑辩驳的任何企图所能做到的更为有效。”^②杜威根据他所理解的人生的直接问题,建议把智慧看作是适应和控制所面临着的新社会环境的工具。这样一种具有心智意义的“改造”将有效地消除一切以前有关超验真理的幻想。

与这种对西方文化的过去遗产的否定相应的是,关心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眼前问题。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也想拒绝他们自己过去的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里限制他们国家发展的伦理的、艺术的和社会的顺从主义。但是,即便有这种相互的同情和实证主义的共同背景,杜威在他的哲学上仅仅吸引住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胡适。其他次要人物曾经接受杜威的观点,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过去40年中,许多中国思想家曾受到他的影响。但是,他们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形式上的隶属于实用主义。具有相反的吸引力量的还有儒家学说,以及最近来自欧洲的康德派的批判主

^① 王国维(1877—1927),近代中国学者、教育家。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思想。——编者注

^② 杜威. 哲学的改造. 纽约:霍尔特出版公司,1920:24. ——原注

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论。然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一种未能表现出它的全部力量的相反的影响,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学的人道主义,他在许多问题上是和杜威一致的。可是,蔡元培在学术生活方面具有不一般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不曾为这种类型的人道主义提供丰富的内容。但是,这种类型的人道主义在中国往往和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它在精神方向上提供了某种细微的改变,并阻止了它向往于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

胡适当学生的时候就感到西方唯物主义哲学的吸引力。他把科学和技术更多地看到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东西。他对杜威的实用主义表现了一种宗教的热情,正如孟子对孔子的人道主义一样。通过胡适,关于人类心灵的新概念被移植到中国,这个新概念是作为实用主义适应实在的一个工具。可是,即使在胡适身上,也可以看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形式哲学是无结果的。因为在哲学思辨方面,他先前作的诺言从来没有实践过。

追溯杜威对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影响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在哲学领域里,其他的一些传统比杜威和胡适的传统要强得多。实用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哲学学派只盛行了几年。一个细心的学者作出了这种判断:“自从20年代中期以来,实用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已经为其他一些西方哲学流派所遮盖。包括胡适在内的实用主义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方面。哲学的舞台让位于新实在主义、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儒家学说,并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①对于实用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个总结,我们可以补充达布斯(Homer Dubs)1938年所写的一段话:“胡适影响中国的黄金时代大约是在1923—1924年。此后,他的影响大大衰退了,他无力吸引门徒。在今天,我要提一下,实用主义者是许多哲学派别中最小的一个派别。”^②

教 育

杜威在中国的最大影响正像他在美国一样,是在教育方面。他按照自己的主张,比任何人更多地使教育成为一个专门的、先进的研究领域。他在政

① 钱温慈(Wing-tsit Chan), 胡适与中国哲学, 东西方哲学, 1956, (春)。——原注

② 达布斯, 近代中国哲学, 哲学杂志, 1938(35)—1—原注

治上和哲学思想上的影响是一个更大趋向的一个部分,而在教育上的影响是独创的、决定性的和持久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任何一个人在20世纪内对全世界的教育计划像杜威有那么广泛的影响,那是难以置信的。尽管这种影响在欧洲由于没有让人们看得清楚而延搁下来,但在亚洲这种影响要来得早得多。它的最大的影响是在中国。

杜威在中国接近的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杜威作为一个教育家在工作上处于一种有利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某些方面比在美国还有利得多。因为中国的学生具有一种为美国的学生所缺乏的政治感和社会感。纯理智的思辨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杜威一样,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值得向往的。“生活教育”对于渴望对自己的社会幸福作出贡献的中国学生来说,具有一种可喜的意义。

实际上,当杜威来到中国时,人们正注视着戏剧性的学生运动。他们以激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的行为,迫使政府做出一些重要的政治决定。杜威像学生们一样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在杜威看来,这标志着中国从消极等待的状况中觉醒过来。“那种认为中国自身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靠外力才能得救的想法,受到了猛烈的打击。”这个启示说明了中国“能够有所作为,并且将来一定有所作为。悲观主义的诅咒被粉碎了。一个行动已经完成了。一件事业已经实现了”。^①

杜威承认,在中国存在着能改变政治混乱的其他一些力量,“但是学校里、学生运动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政治上的自觉,是使未来政治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力量。”^②虽然上面所说的是有关学校对国家所起的一般影响的一个简单叙述,但对杜威来说,它具有我们一般未曾领会的深远意义。总之,就杜威关于人的一些思想而言,他本能地注意到青年人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思想如何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心形成起来。学校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当杜威看到大学生们那样热衷于自由主义理想的时候,他感到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发展的某种必然性。这些人以后要统治全社会的,他们将解决当代中国的一些基本政治问题。他发现,中国人自己比其他许多人更了解教育的社会作用。“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像今天年轻中国代表

① 杜威. 中国的学生运动. 新共和, 1919, (20). ——原注

② 杜威. 中国政治的新酵母. 亚洲, 1920, (20). ——原注

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①

在杜威来到之前,从日本学来的德国教育思想和计划在近代中国教育体制中占据优势的地位。值得注意的一些进步都是在这种范围内作出的。可是,现在由于杜威来了,美国的教育目的、方法和教材就占据了优势。美国的整个教育研究制度输入到中国,有关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实验学校和教育纲领建立了起来。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便按照美国进步教育的观点对教育宗旨作了修改。

在1925年以及在1928年,由于中国人民中发扬一种民族精神的需要,导致了对教育目的一种不同的陈述,即较多注重于社会,而较少注重于个人。整个教育纲领被注进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结构。可是,杜威的影响仍然保持着。在这个结构中,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生活教育、儿童中心教学、学校即社会——占有适当的和永久的地位。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正确性,并且在美国一样被运用着。无论如何,对杜威活动的重新评价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同时关于自然和人的命运的更重要的观点已经给教育的更广泛的范围和终极的方向做好了准备。

杜威的成就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尝试中所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是把中国引入一个新时代:政治上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上的激进经验主义和教育上的进步主义。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努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威所代表的主张从一开始便由于一些理由而严重地受到阻碍。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在哲学上的弱点。杜威的观点没有能为过去若干世纪中形成儒家个人美德和赋予社会结构以一种内在生命力的传统人道主义,提供令人满意的替代物。他的教育纲领包含一些极好的想法,极有利于对青年的培养,可是这只有在一个更适当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结构中才有可能,而这正是他的哲学所不能提供的。第二,他的主张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而陷于困难。自由主义以秩序为先决条件,它不能创造秩序。第三,他的主张由于当时对西方的

^① 杜威. 美国与中国教育. 新共和, 1922, (30). ——原注

敌视而遭到麻烦。这是由于对强加于那么多亚洲人民的殖民制度的仇恨而引起的。如果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免除这种敌视的话,这也只是部分地被免除罢了,日益增长的排外主义也把美国人包括在内。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杜威在他逗留中国时期的成就是很大的。在这个时期中,他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交往的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如果我们不想一下前一世纪中多少来自西方的教会教师在与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任何联系时所遇到的重大困难(虽然许多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是在他们的控制下),我们是不会理解这个卓越成就的。中国人的内心保留着和外界隔绝的一个领域,这从来不曾为这些宗教领袖所体会。

杜威和中国人的接触是属于基督教一类的,而且他本身具有特殊的通达人情的吸引力。他是20世纪的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Matteo Ricci)^①在中国学者聚集的北京大学的新宫廷里出现,那时的北京大学信奉西方思想正如前几个世纪中信奉儒家思想一样热烈。

杜威第二个显著的成就是认识到中国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思想和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他们需要西方的帮助。不过同杜威认为一种学问必须使自己同现实相适应的信仰一致,他经常鼓舞他们以创造的精神把自己的国家引导到现代世界中的适当地位去。杜威确信人的心智力量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并反对把思想强迫灌输或强加于人,所有这些体现在他坚持中国人应当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

杜威的第三个成就是加强中美联系的纽带。无疑地,他的深刻影响大部分来自中国领导人物中对美国的友情,而且通过他的学说和榜样把这些友情培养成为更大的生命力。在杜威访华之后,美国其他一些教授,特别是教育家,被邀请到中国帮助建立若干教师训练中心,并按照现代的标准,开展一种研究计划,来指导和促进中国人民普及教育的新努力。

^①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明末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首领。——编者注

第六编

杜威生日庆典

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①

蔡元培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团体公祝杜威博士六十岁生日的晚餐会。我以代表北京大学的资格，得与此会，深为庆幸。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这种时间的偶合，在科学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正值博士留滞我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相同的一点，我们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别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们大学说：现今大学的责任，就该在东西文明作媒人么？又不是说：博士也很愿分负此媒人的责任么？博士的生日，刚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经过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又十个六十次，新旧的距离很远了。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②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学，虽不能包括中国文明的全部，却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们现在暂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孔子说尊王，博士说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造。这都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孔子所处的地位、时期，与博士所处的地位、时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怪他。

但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即以教育而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三千个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鲁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贡，有贫的如原宪；所以东郭、子思说他太杂。这是他破除阶级的教育的主义。他的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作普通学；用德行、政治、言语、文学的四科作专门学。照《论语》所记的，问仁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不一样；问政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也不是一样。这叫做“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

①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069—1071。

② 即詹姆士。——编译者注

个性,适应社会,决不是拘泥形式,专讲画一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就是试验的意义。

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决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所以我们觉得返忆旧文明的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至。因而对于杜威博士的生日,觉得比较那尚友古人,尤为亲切。自今以后,孔子生日的纪念,再加了几次或几十次,孔子已经没有自身活动的表示;一般治孔学的人,是否于社会上有点贡献是一个问题。博士的生日,加了几次以至几十次,博士不绝的创造,对于社会上必更有多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用博士已往的历史可以推想而知的。兼且我们作孔子生日的纪念,与孔子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作博士生日的庆祝,还可以直接请博士的赐教。所以对于博士的生日,我们觉得尤为亲切一点。我敬[谨]代表北京大学全体举一觞,祝杜威博士万岁!

1919年10月20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446号(1919年10月22日出版)

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词^①

[美] 约翰·杜威

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院社会学、哲学及历史学基础部以及美国教育联谊会^②的朋友们：

通过贝恩(Kenneth D. Benne)^③博士,我想表达我对你们的深切感激,感谢大家在我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给予我的荣誉。回顾过去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充满了欢乐和享受,这也更增添了我的感激。最近一次与贝恩先生的接触,是他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时候。在50年中,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哲学和教育(首先是教育学)时,我与州立大学及州立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哲学系的教职人员也有着密切而频繁的联系。我此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因为在那时,我从交往中曾得到了激励以及在智慧上的帮助。在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④的多次会议上有人个人见解的人士至今仍然健在的恐怕不多了。在那个时期,以麦克默里(MacMarrays)^⑤兄弟、德加莫(De Garmo)^⑥为一方和以哈里斯(W. T. Harris)博士为另一方之间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辩论,相互交换观点。我满怀感激的心情回

① 译自: American Education Fellowship. Essays for John Dewey's Nintieth Birthda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0: 3—4. 勾月译。为了庆祝约翰·杜威九十华诞,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院社会学、哲学及历史学基础部和美国教育联谊会一起在厄伯纳举行了约翰·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

② 美国教育联谊会(American Education Fellowship),其前身是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1944年改为此名。——编译者注

③ 贝恩(Kenneth D. Benne),美国教育联谊会主席。——编译者注

④ 全国赫尔巴特学会,其前身是1892年成立的赫尔巴特俱乐部。1895年改为此名。1902年,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研究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编译者注

⑤ 麦克默里兄弟,即查理·麦克默里和弗兰克·麦克默里,美国教育家,因向美国教育界介绍赫尔巴特而闻名。——编译者注

⑥ 德加莫(Charles DeGarmo, 1849—1934),美国教育家,因推广赫尔巴特主义而闻名。——编译者注

想他们在教育问题上对我自己的帮助,在我人生的发展时期,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所讨论的教育问题是有助于我进步的。在这几年的杰出成就中,麦克鲁尔(MeClure)的思想可谓是一个亮点,他后来是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他曾因哲学系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到过哥伦比亚大学。

除通过回忆这些交往来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外,我想将今天发言人中的一位也包括在其中,他就是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奥托(Max Otto),让我们共同感谢他所做的工作,并向他致以敬意。我特别珍惜每一次的压力与紧张,正如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体会到我们都被连接在一个连续不断并持续发展的链条中,这是智慧与道德持续发展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后来者作出贡献,因为我们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智慧与道德。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存在着希望,而且不仅仅是希望,而是更有自信。我们知道,事实上,好多年前乔希亚·罗伊斯(Josiah Royce)^①曾对此提出“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一词,也可以说成“持续发展的共同体”(the continuing community),这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约翰·杜威

^① 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 — 1916), 美国哲学家。—— 编译者注

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演讲^①

[美] 肯尼恩·D·贝恩

我们聚在一起庆祝杜威的90岁生日。倘若我们能首先思考与本次聚会相关的两个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关切和更加敏感的方式举行本次庆典,我们将从中得到更多的收益,并通过我们使别人受益。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约翰·杜威的生日?我们应当如何庆祝?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回答的。然而,在我们中间可能会出现众多不同的答案中,我猜测还会有一种我们在此相聚的共同目的和共同理由。这就是杜威先生在向我们致词时所提出的目的和理由。我们以某种方式加入到一个思想和努力的大集体中,这个集体致力于提高作为人类行为最终裁决者的共同才智,其当代的共同目的在约翰·杜威的大力帮助下得到了澄清和界定。在当今混乱和冲突的张力之下,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这个集体的继续存在表示担心。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今天世界各地许多别的群体聚在一起一样,就是为确保这个大集体的继续存在而助上一臂之力,这正是杜威在其致词中所表达的一种希望。

我们不应忘记杜威为这个集体所作出的贡献,这一点也许很重要。那不是一种需要通过问答式教学来弄通和弄懂的教条,也不是一种需要在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反对意见面前得到保护的完美信仰,更不是一种面对人间邪恶旨在将顺从变成一种易于接受和值得褒奖之态度的慰藉传递;而是对其重要性和疑难程度足以对我们大家最清晰明确的思想构成挑战的共同问题的澄清,是一种催人行动的和需要我们做出最大贡献的未完成之业,是一种关于和整合我们的最清晰思想与最大贡献的实验号令。杜威向自己和向我们大

^① 译自: American Education Fellowship. Essays for John Dewey's Ninetieth Birthda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0: 5—8. 原青林译

家强调的这一问题、这一任务虽难于解决或完成，却易于用通俗的语言加以陈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实验科学使人类知识日益丰富、日益精确，也使人类支配周围能源和材料的实用技术日益增强。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新的和适切的价值观本可以指导人们对他们新发现的知识和技术力量加以人性化的利用，然而人们在这方面的道德和审美水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裹着知识上无法穿透的教条外衣，实行孤立的相对重要的制度，这使得从过去经验中积累的正确的伦理和审美思想无法在新的条件下生长和发展，也无法有效地影响人们关于正确利用知识和力量的实际决定。这既是一个使科学技术的实验过程人性化的问题，又是一个使人性的伦理与审美训导具备实验性质的问题。

显然，这一任务要求哲学家们与教育家们协同努力。我们怎么能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处境出发，重新思考科学与道德、科学与艺术、知识与价值观的关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发现将我们的新思想整合到人类一代代年轻人逐步走向更富于智慧和责任心的成熟阶段的过程（即受教育的过程）并在其中得到检验的方式呢？我相信，今天到这里来的大多是研读哲学和教育学的学生。我们将要听到和讨论的一些论文就是由研读哲学的学生撰写的，其他一些论文则是由研读教育学的学生撰写的。这两个学科的学生在庆祝杜威生日的活动中走到一起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能够像杜威那样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教育学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我曾试图指出，正是当代知识和道德任务的各种要求的本质使得杜威着重指出，哲学乃是教育的一般理论，而教育乃是检验哲学思想的实验室，如果哲学思想得以检验的话。我希望看到，今天本地的哲学家们和教育家们的短暂相聚将成为一种持久性相聚。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杜威的生日”这一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答案。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庆祝”，我不由回想起“庆祝”（celebrate）一词的词源。它是由一个曾经表示“大批出动”之意的拉丁语单词派生而来，直至后来才开始具有“向……表示敬意”之意。我们可以想象，不计其数的人们向一个伟人靠近或者向他的不朽之作靠近。他们不单单为了向一个人表示敬意，同时还寄托着一种希望，即通过靠近希图从此人的丰功伟绩中得到些什么，以帮助他们理解生活中的复杂和困难。我认为，这种希望只对一些

人来说是正当的,那就是通过庆祝洞悉他们所寻求的“丰功伟绩”的某些奥秘的人。

倘若我们能从今天对约翰·杜威贡献的庆典中得到最大收益的话,难道我们不可以试图洞察他在过去半个世纪对美国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教育管理者与重建者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奥秘所在?就不断提高我们自身的思维和理论推断的活力与能力而言,我们能够向杜威学习些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的两条不完全的思路似乎是值得稍作思考的。第一条思路便是杜威的思想在极大程度上产生于美国人共同文化之志向,或曰感觉和思维的方式。我们可以准确地说,杜威的思想表达澄清了美国普通人以前未曾表达的志向、感情和思维方式,其充分程度在理性思考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杜威思想的这一特点作了令人赞叹的描述:“我已表明,在我看来,似乎是美国生活重要特征的东西,即在某些相当严格却极其广泛的范围内从事与我们直接相关的政治和业务的自由,无需对先前存在的社会秩序毕恭毕敬,虽然它们必须从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必须维护其价值体系……你无法用上述伦理去接近他(美国人),但你可以用另一种伦理去达及他,这种伦理无非就是其行为所隐含的理智的发展结果。我认为,正是这种隐含的理智在几乎无需什么领导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主意的情况下促成了美国社会的稳步发展和团结。杜威的哲学思想强调根据手段确定目的,这种哲学思想是美国人头脑中的隐含的理智逐渐形成的方法。”

其次,杜威并没有对这种共同理智的条件和情况所保留的“隐含”性表示满意。以往的理论推断往往将舶来的或不完整的理论当作“理论”加以接受,而不是运用和发展其自身主动经验中所固有的“理论”,以至于使美国这个文化群体对之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而杜威敢于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大胆进行理论假设。理论推断可以涉及引导和决定我们行动的各种变数及其相互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一直是一个激进的理论假设者。假若没有一种理论来描绘决定我们行动的一切重要因素,我们的思维便注定是极其“抽象的”,就像实在主义思想、本位主义思想或教条主义思想的思维方式所常常表现的那样。因为这些思想往往以各种方式将某种“抽象的”图式强加于不同境况和它们自身的行动之上,而这种图式又是由对行动——情境的单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觉察发展而来的。受到如此引导的行动对于完全具体的经

验而言,必然是非正义的和暴力性的。只有一种适当的理论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具备崇高的具体性,而不是“不良的抽象性”。杜威的缜密而谦逊的理论假设所具备的崇高的具体性有助于说明其思想的魅力和力量。

也许在 1949 年,我们可以从杜威身上学到如何在思考社会和教育的过程中接近当今美国平民乃至世界平民的新的志向和思维方式。也许我们能够学会进行缜密而谦逊的理论假设,以便我们的思想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具体而可靠的指导。也许在这样的学习中,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的重构性思维提供更多的永久性力量,对世界各地的平民思想产生更加重要和持久的影响。

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上^①

(约翰·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 1949年10月20日晚上在纽约市
康芒多尔旅馆的格兰德大舞厅举行)

开场白

哈里·W·莱德勒(Harry W. Laidler)

工业民主联盟执行董事

约翰·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这几天,整个世界都在跌宕起伏的进程中赫然停滞,向我们今晚的嘉宾——尊敬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民主领袖约翰·杜威表示致敬。

来自拉丁美洲各地、加拿大的高等学府以及欧洲、以色列、土耳其、日本、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以公共集会、广播、撰文、翻译和颁奖的形式来庆祝一位对我们当今世界的教育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的一生和成就。他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人。

美国和奥地利的总统发来了贺电,英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荷兰以及挪威的首相以及每一个民主国家的知名人士也发来了贺电。他们讲述了约翰·杜威及其生活和教诲对他们的重要意义,并代表我们所有人祝愿他继续成为我们未来的教育领袖。智利政府还向他颁发了勋章。

在所有人的贺词中,我最喜欢英国爱丁堡大学戈弗雷·汤姆森(Godfrey Thomson)教授的贺词。我认为,这一贺词所代表的是杜威博士今晚在其生日宴会上收到的祝贺中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汤姆森教授指出,苏格兰的教育体制是开拓精神和保守主义非同寻常的结合,它以开拓者的方式追随着杜威

^① 译自:Harry W Laidler. John Dewey at Ninety. New York: League for Industrain Democracy, 1950. 原青林译

的思想,同时又以谨慎的方式体现出精明的苏格兰人的特点。在他的贺词中,我还想引述一段话:“谨向这位大师致以我多年良好的祝愿。我想起有人曾经在一位英国大学教师 90 岁生日聚会上对他所说的一句话:‘我希望我能在你活到百岁时向你表示祝贺。’”

“回答是: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可能,你看上去似乎身体很棒,很健康。”杜威教授,我们大家从现在起都会精心呵护我们的身体,这样,在 10 年后,我们就能够像今晚这样以同样的热情来庆祝您百岁生日。

我还喜欢来自杜威教授教过的学生埃里克·海勒(Erick Hylla)的贺信,信中表达了其他民族对杜威博士民主思想的渴望,以及教育工作者立志在一个国家将这种广泛追求的思想传播给自己国家人民的奋斗历程。这位学生在希特勒政权成立的前几年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成了德文。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希特勒上台后,这些书几乎全部被销毁了。

在战争期间,海勒的家和个人图书馆被烧成了灰烬。海勒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杜威的这本书。最终他找到了,但历经了千辛万苦。这本书最初的出版商住在俄国人控制区。当时纸张难寻,货币严重贬值。海勒写道:“但是,当货币一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着手办理此事并获得了很大成功。现在,这本书的第二版正在印刷。我希望第一本书能在杜威博士生日的时候交到他的手上。然而,在德国办事没那么快。”

海勒接着写道:“这本书一旦出版,将有助于我们根据您杜威博士在这本书中以及在你一生全部的宏伟著作中所极力倡导的精神重建我们的教育体制,这对于德国而言意义重大。祝愿未来的几年可以向您进一步证明,人类虽然会有很多凶兆劫难,但人类通过民主教育在不断进步,正朝着创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丰富的自由以及带来更有意义的快乐的方向迈进。”

今天,美国有 100 多所高等院校分别举行集会和讲座,庆祝杜威您 90 岁华诞这个里程碑的日子。以克伯屈(Kilpatrick)教授为主席的庆祝约翰·杜威 90 岁华诞组织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根据委员会的建议,纽约大学的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教授正在编写一本杜威博士文集,来回顾他在各个领域的杰出贡献。这本文集将在明年的春天付梓,书名为《科学和自由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Freedom)。杰尔姆·内桑森(Jerome Nathanson)也在编写一本文集。接下来,本周末将

举行3个重要会议,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新学校(New School)的布琳·J·霍夫德(Bryn J. Hovde)校长,萨拉·劳伦斯(Sarah Lawrence)学院的哈罗德·泰勒(Harold Taylor)院长、亨利·S·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教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系主任,种族文化协会的杰尔姆·内桑森、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约翰·L·蔡尔兹(John L. Childs)以及其他人都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

在晚宴开始之前,我们很高兴地把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亲笔贺信^①转交给杜威博士。

现在,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一位美国最年轻的、最具进步教育思想和最受欢迎的大学校长,萨拉·劳伦斯学院的哈罗德·泰勒院长作为宴会的主持人。

(哈罗德·泰勒院长接下来成了晚宴的主持人,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幽默感征服了在场的嘉宾。他郑重宣布,今晚的一切活动是,“献给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人,一个我们人类当中的伟人。”

应邀参加今晚宴会的不少嘉宾来自国内外的各个社会团体,他们一一向杜威表达了致意。其他嘉宾还应邀讨论了杜威博士在哲学、教育、艺术和公共事务领域所作出的贡献。除了接下来的演讲人外,泰勒院长还邀请了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西德尼·胡克、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J·J·辛(J. J. Singh)以及智利驻美国总领事卡洛斯·德拉巴拉(Carlos Delabarra)致辞。德拉巴拉先生还代表智利政府向杜威博士授勋。

① 杜鲁门总统在致杜威的贺信中写道:“亲爱的杜威先生:祝贺您在经验的智慧和朋友的爱戴上达到了如此成功和如此完美的境界——以及具有年轻人的不可征服和不可战胜的精神。对您来说,一次快乐的生日充分意味着使人振奋的昨天和满怀信心的明天。”——编者注

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表示祝贺

弗兰克·D·法肯索尔(Frank D. Fackenthal)

哥伦比亚大学前任代理校长

我很荣幸参加杜威 90 岁生日庆祝晚宴,然而我不无遗憾地说,艾森豪威尔校长今晚没能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令人高兴的是,他将在以后的一个活动中向杜威教授表示祝贺。我比今晚的贵宾(杜威)早 2 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所不同的是,我的到来是通过向一个招生委员会提出申请得以实现的,而他是受学院和校董事会之邀请而来的。

因此,从 1901 年至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整个工作期间——他还要接着工作下去,因为对他来说,退休就像过生日一样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我能认识并且迄今比别人更了解杜威教授是我一生极为珍贵的财富。

今晚,还有更多人带来了生日的问候。他们都是一些领域里的知名人士,正如他们的名字和头衔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恰恰促使我去做一些我担心不明智的比较:

有六个印度男人
非常喜欢学问。
见到了大象,
(尽管自己都是盲人)
每位凭着观察
满足了自己的心灵。

一些人一定会发现约翰·杜威很像一位哲学家;另一些人会关注他的思想对法律支柱的作用;还有一些人会谈到他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带来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在杜威的身上可以找到在重新研究教育原理和实践的过程中一个伟大教师的品质,一个令人振奋的领袖的品质。他对人权和

责任的执著,他对人类尊严中固有的自由的坚定,可能对他人而言似乎更像一堵厚实的墙。在遇到这种“是大象或不是大象”的情况时,任何一个服务于教育的人、一个管理者都可能把杜威看作是大学的一个个体、一位同事和一个成员。为了增加与分享学术生活的愉悦和满足,他义不容辞地履行了自己的全部职责,并承担了更多的日常事务和必要的琐事。他总是听从学校的调遣,时刻准备着为他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提供咨询和帮助。无论课程计划的修改,还是对学生、教师、管理者三者之间关系趋向的指导,只要什么地方需要他,他都乐意帮助。当这些问题巧妙而又果断地得以解决时,对一所学校的健康发展和良好运作来说,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他总是—一个凭良心行事的人,但也不总是寡言少语。

然而,所有这样的事都不会影响他在课堂里的活动,尽管课堂外面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善于利用自己的自由空间,将自己的伟大才能发挥到极致;他身边吸引着大批的学生;他著述丰硕;他工作勤勤恳恳,犹如在葡萄园里工作的工人。他让世界了解了哥伦比亚大学,也让哥伦比亚大学了解了世界。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但是,超越其影响的是他对民主的人性化,而我怀疑,当来自印度的男人和我所做的表述完成后,我们对杜威教授的描述是否比爱默生(Emerson)^①的几句话精辟:“没有什么比伟人更为简单的;的确,能做到简单的就是伟人的。”

约翰·杜威不只属于一所大学,他属于整个美国教育,但让哥伦比亚大学欣慰和自豪的是,他多年来选择把他的帽子和衣服挂在了莫宁赛德(Morningside)^②。至此,请让我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教授表示敬意,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编译者注

② 指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编译者注

杜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意义非凡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

美国高等法院助理法官

这场盛大的聚会仅仅是为了庆贺一位哲学教授的生日。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是他的90岁华诞。另外，我还怀疑，美国哲学学会的会员就是在场的几位。或许，从专业角度讲，成为哲学家的人并不是很多。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次呐喊——“富人，穷人，乞丐，小偷，医生，律师，商人和首领”——在这里都得以体现。

是什么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不向约翰·杜威表示敬意，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他也不需要通过这种鼓励方式来排遣思想上的孤独，即使有时伟大的思想家需要这样。我们在这里对他所给予我们的一切表示感谢，并对文明的人类最终依靠精神的东西而不是依靠稍纵即逝的时尚和不起眼的东西又充满了信心。在约翰·杜威的身上，我们可以汲取到开创道德工作的全新力量。

约翰·杜威给予了我们什么呢？他一直属于这样一位思想家，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但人们却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所写的内容可以在100多本书中找到。但是，读完所有这些书——我对书中内容的认识正好证明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一种震撼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哲学教授这一职位。或许，在哲学教授和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个人如果他的专业所全神贯注的东西是一些永恒的、尚为解决、有待高度抽象思考的问题，除非他能超越个人的技术问题并且能促进人类思想的发展。尽管哲学探究的术语对人们来说可能听起来像讲外语那么难懂，那么，从人文主义意义上讲他就只是一个伟人。这样的思想家会使每一个行业重新思考其专业上的问题。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能够通过专心致志研究破碎的思想来传播令人振奋的光芒。因为他看到在不显眼事物表面下的有机体；他能够看到是因为他对整个完美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具有深刻的感应。

在这个房间里，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对生活的领悟中证明，这种力量一直

就是约翰·杜威对他的时代的影响；而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影响已经延续了很久。请允许我举一位伟人来说明这一点。在谈到私人通信的自由时，贾斯蒂斯·霍姆斯(Justice Holmes)先生是这样表达他对约翰·杜威作品的感受的：“它就像薄薄的玉片一样，时而精妙，时而简练和开放，把整个世界和人类都看作是流动的物体……它给我留下了像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①一样的印象：那么和谐，那么充满生命活力和体验，其想象超越了大多数的作家、哲学家或其他的人……有时会清楚地表明，他的写作思路非常清晰；有时又变得模糊不清。尽管如此，令我欣慰的是，他比任何一个这些年我所认识的人更接近这种和谐的摆动……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上帝的表达是含糊不清的，那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但是，杜威会急切地告诉你该是怎样的。”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和信函中，贾斯蒂斯·霍姆斯都表达了独特的敬意，因为他是一个极乐意偿还精神债务而毫不吝啬的人。

我们当中只有几个人有幸在课堂上聆听过约翰·杜威的讲课，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受过他的教育。尤其幸运的是，那些偶尔与他交谈受到教诲的人。我个人对他的感觉可以由约3个世纪前一位著名剑桥大学的校友所说的话准确表达出来：“我一整天在书房的书堆里劳作，可还不如与他交谈一个小时感觉这么好。因为他不是一个封闭的图书馆，也不是抓起来就读的一本书，而是一个准备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的人，一个喜欢学习的人。是的，他是一股长流不断的泉水，不知疲倦地向那些或许根本不想接受的人施善。”

我不关心哲学信条的风向，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即使在这个场合也难以说清杜威现在所刮的大风的风力和风向。但是，关于这场风的影响，或许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评说几句。杜威的思想穿透力太强，难以拘泥于一个偶像或被一帮占有欲极强的信徒所持有。他的哲学观从来就不受制于僵硬的三段论建立起来的固定体系的约束。生活以其旺盛的生机和讽刺、按照自己的方式嘲弄着这一体系。杜威教育我们要学会使用从体验中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在解决那些常常是无法靠抽象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的过程中取得新的体验。尽管他远离喧闹的人群而全神贯注地探究智力的问题，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靠着谦逊的认识得到启蒙和锤炼，主

^①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其创作对美国 and 欧洲诗歌的发展很有影响。——编译者注

张人尚未走过的路需要相关的精神和意愿去开辟和尝试。他的乐观是谨慎的和自我考验过的。他对人类潜能的信念是一种能量，而不是一种镇痛剂。

如果我所获得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已落后于约翰·杜威思想的各种观点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无疑就像是一个信念声明，考虑发放一个作诗的许可证，最后当诗人战死在战争中，再将许可证留给自己的子孙。“人是万能的。在心灵的王国里，他没有可以想象的目标；但是在物质的王国里，这样的目标他可以随时达到。还没有发现什么强大的力量可以使他受到挫折；通过他的后代，他可以最终战胜显而易见的死亡结局。没有什么潜在的恐惧会让他永远感到害怕，也没有什么巨大的痛苦让他在精神上不能忍受。他的内心充满着各种他心目中的上帝所恩赐的品质：美丽、智慧、博识、全能和神性。”

这一信念的基础反映在约翰·杜威对民主社会各种主导力量的深刻认识之中。他的领悟在于，他认识到民权难以仅仅从法律保障方面获得有限的力量。我们的人民一直关心立法或执法的合宪性而非其智慧，结果所认同的价值观往往是虚假的。即使那些毫无顾忌地使用司法手段遏制民主进程的人也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分寸感、睿智的幽默以及没有恐惧并不都是合宪性的检验标准。但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合宪性上的倾向会使合宪性与智慧难以区分。这种态度是自由精神的大敌，对有可能引起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问题的立法而言，尤其如此。很多由于不明智和懦弱原因而被斥之为非自由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不合宪的。文明最深层次的需求的终极依赖必须在法庭上证明无罪的证词以外去寻找。除此之外，法官应该去反省，即使是无意识地反省那种捉摸不定的但又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即公共舆论的大趋势。积极地、坚持不懈地将自由的信念转变为一个社会的感情、思想和行动是一次真正的抵御束缚人们心灵诱惑的保卫战。我们必须感激这种信念所带来的诚实和舒适的生活，也无须担心信念的各种不确定性。没有开放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开放的社会。如果社会不开放，人的精神就会被肢解和奴役。

公开讲真话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过去的人告诫我们不要讲死人的坏话，但我也应该讲活人的好话而有失佛蒙特州人的谦逊品质。但是，这种场合不会再现。如果我当着约翰·杜威先生的面说他，使我再一次想起了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一个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之前生活很贫困的人，当时的

条件在约翰·杜威看来是最基本的了,那就请杜威先生原谅我。就像我问心无愧地说起约翰·杜威一样,威廉·佩恩(William Penn)^①据说曾讲过,他是一个“博学而不势利、敏捷而不失礼、交谈时诙谐但又认真和严肃的人;他是一个具有超凡才智的人,但又是一个没有丝毫野心人。”

杜威——一位公共事务的领袖

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

美国民权联合会主席

前一段时间,有人做某个调查,请我说出当今5个最伟大的美国人。说出第一个人很简单,那就是约翰·杜威!说出其他几个人就让我立刻感到为难了。对于每一个我所能想到的人,似乎都有些保留。最后,我是绞尽脑汁才说出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但是即使到现在,我发现我对自己所筛选的人还是不十分满意。有一半的人选让我赞同当今一本书作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但是,杜威是放在任何时代都称之为伟大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人。

约翰·杜威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教育家。由于我自己不是一位教育家,我总是对我的教育界的教友们把杜威作为他们自己同行的方式深感不快。当然,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位自贺拉斯·曼(Horace Man)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但是,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今晚所参加的就是一个更为普通的社交聚会了。正是约翰·杜威的包容的一面唤起了我的好奇,这是一种已经开启了每个思想和生活大厦窗口的自由精神,一种引导人们穿过未知的荒野和僵死的传统而通向心灵颠峰的冒险开拓精神。约翰·杜威是一个摆脱了以三教九流进行分类的人,因此,所有狭隘的归类都不适合他。

例如,教育家们刚把杜威的肖像牢牢挂在他们自己的房门上,哲学家们就会走过来宣称杜威还是一个好好活着的人,只不过是他们队伍中一个与众

^① 佩恩(1644—1718),英属北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者。著有《致各派新教徒书》等。——编者注

不同的人。我记得，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博士在他的《哲学的故事》(Story of Philosophy)一书中是以他与杜威的逸事作为结尾的，在书中他先讲到柏拉图，接着是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Spinoza)、肯特(Kent)、叔本华(Schopenhauer)、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以及其他同样著名的人。我认为，他这样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与其说杜威以教育擅长，不如说他以哲学为主导。在我个人的书架上浏览杜威的著作，有一本著名的题为《一个共同的信念》(A Common Faith)的书，这使我想到了，这位伟人的思想家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当代有关宗教方面的书。

因此，杜威既属于宗教，也属于哲学和教育，但更属于公共事务这个伟大的领域。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政治职位，也不支持任何的党派运动，但是，约翰·杜威完完全全通过自己智慧和性格的力量，给所有为人类争取更多自由和完美生活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一直就体现了一个崇尚民主、推进民主启蒙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领导才能。他从没有放弃对人类事业的追求，总是处于运动的前列，把自己的大名作为一个所有向前看的人以此可以求助的旗标。美国什么时候曾经拥有过这么一个勇敢或睿智的公民，抑或世界什么时候拥有过这样一个真正的预言家？

在他的90华诞之际，约翰·杜威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出现的。人们的欢呼声在他的耳旁回响。但这并不会宠坏他，因为他的谦逊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当他在思考他自己一生的奇迹时，谦逊也会给他以安慰，激励他奋斗不息。我想起了西拉书(Sirach)的一段话：

让我们来赞美伟人吧；
那些靠才能名扬四海的人，
那些靠智慧领导百姓的人，
以及那些靠理解为百姓着想的读书人。
许多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世界永恒不变，不会被毁灭；
对他们的追忆也不会消失，
他们的英名会被一代一代传诵。

杜威和劳工世界

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
国际女士服装工人联盟主席(A. F. L.)

今晚与会的教育家和世界各地的学者齐声称赞杜威博士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这些参加劳工运动的人对人类自由和人类价值观的理解,已超越了干一天诚实的劳动换得仅仅一天诚实工资的境界。我们很早就深深体验到与约翰·杜威博士所结下的真诚和温暖的友情关系,因为他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做出了不懈的贡献。

我们认识和敬仰杜威博士,因为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自由主义领袖,一个坚定的工会会员。对于我们进步主义劳工运动的每一项事业和目标,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真诚的支持。

杜威对成人劳工教育的执著关注;他对教师行业中自由工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贡献;他反对国内外红色和黑色极权主义者不妥协的立场;他对我们国家新的政治联盟的潜在机遇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注,使他在最广泛的劳工——自由领域赢得了无数朋友和同事对他的爱戴。

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我们的思想更加清晰,我们的运动更加健康,这是因为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向教授、教育家、哲学家、工会会员杜威博士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希望他在未来能继续为我们的美国工会和自由主义运动添砖加瓦。

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的贺词

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C. I. O.)主席

今晚能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向一位伟人的哲学家、教育家、一位美国人和世界公民表达敬意,感到非常荣幸。我带来了许多工人的祝福,他们的生活因为约翰·杜威而变得丰富起来。

在我离开底特律之前，我的小女儿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她我要去参加一位哲学家的生日聚会。她问：“哲学家是干什么的？”于是，我拿了一本书，让她看书中诸如亚里士多德上一辈哲学家的图片。她又问：“杜威先生比亚里士多德老吗？”我回答说：“没有，他马上就要赶上了。但是，历史将会记住他与亚里士多德同样伟大。”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乱世界里，人类的智者充满了疑虑。当他们寻找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以便让人类可以获得经济安全和美好物质生活而无须牺牲任何人类基本价值的回答时，当他们寻找如何可以在民主的国度里拥有经济富有和政治自由的答案时，他们的心开始沉重起来。

在这一求索过程中，约翰·杜威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导向标志，因而在今晚我们向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敬意。今晚，在充满独立和自由的世界各地，约翰·杜威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向他表示祝贺，我们还应该像他那样在有生之年努力地工作。我们应该将务实的人类民主哲学应用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依此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来缩短民主所经常承诺的与民主很少得以实践之间的严重差距。祝贺约翰·杜威生日快乐！

作为哲学家的杜威

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 Perry)

哈佛大学哲学荣誉教授

当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急切盼望杜威、席勒(Schiller)与他结成联合阵线来共同应付对手并试图界定他们之间的细腻差异的时候，杜威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甚至最微贱、最无名的作家大概也有一种自然的抵触心理，尽管别人给了权威性的解释，他依然会意见很大，即使他认识到他做别人的批评对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如果杜威仍然还有相同的看法，那他一定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受不少苦。既然他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的名人，那就希望他已克服了这种自然的抵触心理。我们这些今天应邀来谈一谈对他看法的人，

肯定不能回避谈到在我们看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并且的确能够放弃任何为他做权威性辩护的权利。

毫无疑问,杜威依然“意见很大”。我刚刚拜读过他发表在10月份《评论》学刊上的一篇文章。我相信,他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又写了一些东西,并且还有其他的手稿待发。《评论》学刊上这篇文章的题目《科学时代的哲学未来》(Philosophy's Future in Our Scientific Age)可以作为对杜威整个人写一篇评论的内容,其副标题为《哲学的作用从未如此重要》。文章的主旨是作者为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哲学大会撰写的贺词。在那里,你拥有的杜威是:他的合作精神,他对当代栩栩如生的认识,他对未来的展望,他的不屈不挠的信心,他的哲学工作,他对以科学力量的范畴获得释放以及其内在的动力得到恰当的引导为前提,依靠科学力量来解决当代道德和社会问题的信念。

因为杜威在场,我是不敢以权威的口吻乱说什么的。他对权威的厌恶是解读他的基本个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敢这么说,当然绝对不是权威的。杜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正统人士。他的人道主义,他的民主思想,他在教育以及其他领域中倡导的进步主义,他的道德规范,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他的信念:人的尊严在于他有能力为自己思考。按照杜威的观点,这种能力不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或专业研究人士;他会让各行各业的人们,在人类的各个年龄阶段,从幼儿园开始,只要不是在摇篮里,都能认识到这种能力。思考,为自己思考,全新地去思考,从个人的体验中学习,作出个人的判断以及去思考个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与同伴的交流和互动中发生的——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权利,一种不能废除的权利,它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唯一保障。而与之相对的是傲慢、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均变论、奴颜婢膝、传统和怀疑论,这些正是杜威倾其全部智慧和日益提升的声望进行坚决斗争的大敌。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个性,杜威与威廉·詹姆士一起在20世纪为美国思想提供了发育的土壤。碰巧的是,我的一生有50年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被杜威称之为“精神之父”的威廉·詹姆士。换句话说,我认为自己是杜威的精神兄弟。将詹姆士和杜威进行比较,一直是让我着迷的反思课题。他们哲学经历不同,天赋不同,性情和风格差异很大,两

个人是不可能复制的，他们从来就不是对手，他们都以个人的耐性和个性著称。然而，从广义上来说，他们一直是盟友，而且正是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才造就了今天的美国哲学。过去 50 年的美国哲学家大多都一直在确定、解读、评价或反驳他们，然而无论是何种情况，都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

通过他们之间的联合，詹姆士和杜威打破了 19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所带来的束缚，解放了当时年轻人的思想。这些人现在都成老人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寄给克莱顿(Creighton)^①一篇文章，希望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他接受了我的文章，但以父亲的口吻对我的年轻急躁进行了叱责。他说：“你就像詹姆士一样太轻率了。”任何一位年轻的美国哲学家都会因敬畏哲学的历史或其崇高的倡导者而不敢开学术的玩笑或做出鲁莽的行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任何一位年长的哲学家也不愿提出这样的指责。为此，我们必须感谢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我喜欢把他们的名字与美国哲学界新自由的预言家联系起来。

詹姆士 40 年前过世了。今天，杜威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的活力。作为一位喜欢畅所欲言且仍然在世的哲学家，他还会为自己辩护。然而，我斗胆对他再一次进行非权威性的诠释。我指的是他的道德规范。没有人会怀疑他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一些人希望他能就这方面谈一谈，或就其他方面的事多写一写。但是，道德规范的存在不仅是在于这个人本身和他的行为，而且还在于他说的话。为此，我要谈到最近的一篇文章。他赞同道德知识能为“作为自由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服务，并且“能使学习道德知识的专业化和技术性的方法为实践一个共同和共享的美好事业发挥作用”。一个诠释杜威的人引述杜威自己的话说，杜威一直“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赞同一种较高质量的体系”。这是一种理想、一个标准，具有共同和普遍的意义，而约翰·杜威在实践中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思想根深于他的一般世界观，是他的社会哲学的前提假设。只要我不轻易将它称之为“绝对”的思想，我希望我把这种思想归因于他，他是不会生气的。

向一个不知道索取并且从来就不觉得自己该拥有的人致意，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谦逊的优秀人物因为他们的谦虚和优秀而值得加倍赞扬。越是

^① 克莱顿(James Edwin Creighton, 1861—1924)，现代哲学家。生于加拿大。美国哲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哲学评论》主编。——编译者注

拥有相同优越感的人越是缺乏优越感的气质。他没有觉得自己不能辜负自己的好名声：要表现得出众、睿智、善辩或幽默。他就是说了他想到的。他的性格和心灵充满了纯真的品质。因此，在我们敬慕他的著作的同时，我们要更加热爱他这个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我想引用卡莱尔(Carlyle)^①的话来贴切地概括杜威这个人：

“哲学家是一个从最高点走下来的人，一个从最低点攀越上去的人：他是所有人的平等和友善的兄弟。”

杜威对艺术的贡献

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过去有很多人批评杜威，因为他不像赶时髦的哲学家那样谈论真、善、美。因此，这些哲学家认为，他不会像一个正统的哲学家那样对世界的正直、永恒和美好的事物感兴趣。他谈了大量有关方法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崇尚方法的矮人国(Nibelung)的人，生活在黑暗的方法论阴沟里。杜威曾提醒感伤主义者，理想需要付诸实施，因此，那些鲁莽的批评者又简单地视他为不尊重理想的感伤主义者。他已认识到，生活和社会都在不停地变化着，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的智慧和应答的想象力。

由于杜威谈了很多有关想象力的原则问题，因此，他的许多评论家已经认为他早忘记了想象力本身是什么。他强调共享体验的重要性，结果众多的唯美主义者和独白者认为他没有认识到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和体验的个性。

在90岁的时候，杜威教授一定早已习惯常人对他评价所用的陈词滥调了吧。他在有生之年，已看到了一些披着哲学外衣的所谓新魔法是如何给那些

^①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 — 1881),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编者注

希望逃避现实艰难困境和挑战的人以不切实际的安慰的。他在有生之年，已看到了缺乏思想耐心的人是如何急匆匆地诉诸口号、回避和暴力方式的。

在这种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喧闹中，杜威始终平静地强调，理想是人类潜能的一种投射反映。从长远来看，那些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的专业智慧是人类完善的唯一希望，而在进入我们的原子时代后，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一个濒临自杀疯狂边缘的世界里，杜威感到有责任谈论方法问题。在一个到处都是花言巧语理想牺牲品的世界里，他感到有必要指出一条有规范的和有成效的期望之路。

杜威是这样的一丝不苟，我们可以说，甚至到了极端刻板的地步，结果是他的一些学生甚至都忘了他最终关注的是什么，哪一种是实现生活的方式，是整体的、直接的、透明和清晰明朗的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让一些人仍然感到惊讶的是，在约翰·杜威 70 岁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年轻，他本该写一本有关艺术的宏伟论著。“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一些人问。他们不太相信这样的回答：“有一个实用主义者在瓷器商店里。”

一个致力于实用性和工具性事业的人，为什么必须屈就自己或鼓起勇气才敢去谈论涉及崇尚美感、为艺术而艺术、诗歌和冥想的崇拜者这方面的问题？在对杜威在艺术方面的兴趣和想象力表现出惊奇后，他们或许显露出他们自己对艺术和生活所持观点的局限性。他们还显露出他们自己没有抓住杜威一直最终关心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受到严格管制和机械呆板的社会里，由于我们的智力习惯死板僵硬，体验总是不全面的，并且常常被分隔和扭曲。而智慧的价值在于使生活少一些阴暗、混乱和困惑。艺术是一种卓越（excellence）的体验，想象是一种圆满的生活，而圆满的生活是诸如艺术和艺术体验所体现出的个人创造力。

对民主社会的检验就是看在多大程度上各种阻碍被打破和活力得到释放，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自由地达到其完整和辉煌。杜威谈过社会机构的问题、科学和社会领域的方法问题、一般的智力问题，并且对人性实现的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将人性的实现以艺术的方式基本描述为一种体验。对于杜威所表达的全部清晰明理的论述，我们大家都感到他是生活的诗人，他认识到变革总是在发生着，变革带来了挑战和实现圆满艺术生活和想象力的可能性，带来了建立自由社会的可能性。这种社会使得充满活力的个性成

为人类希望的核心。

杜威和民主教育

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荣誉教授

要考察杜威的教育理论,我们就必须考察他的哲学思想。因为对杜威而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对杜威来说教育是“一个形成基本素质的过程,具有智力和情感特征”,但是,哲学的任务是在选择什么样的基本素质需要培养的过程中进行评价,继而提供充分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作为有目的付诸实践的教育理论”。

但是,就约翰·杜威本人而言,他又是如何开始的呢?他的出生和培养背景又是怎样的呢?他出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家族历史的清教徒后裔的家庭,在佛蒙特州一个小镇长大。从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他浅显易懂的实用思想,他对具体生活问题的关心以及(其中包括)他对道德问题的浓厚兴趣。

那么,杜威的伟大之处缘何而来呢?一部分是源于他自身的能力,一部分是源于他母亲的抚育关爱,一部分是源于他在佛蒙特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教育,但最主要是源于他的“基本素质”——对所面临的思想界的挑战性局面的反应。伟大思想的诞生是基于有能力的人依靠新的和未来的资源去解决重要的问题。对约翰·杜威而言,什么是令人振奋的重要问题呢?

让杜威兴奋的问题是,旧时占主导地位古老的哲学思想作为一方与某些当代发展的哲学思想作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的冲突。一方面,古老的哲学认为:(1)基本的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观点构成了“永恒的真理”;(2)任何将自然资源进行改造以符合明确需求的行为,如太阳的热与人类世界,或导盲犬与人类,是一个设计实例、一个宇宙意图的实例;(3)无论何处,先验的演绎逻辑应该主导基本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与下面现行哲学的两种发展趋势相对立和冲突的是:(1)现代科学仅仅是以归纳实验逻辑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为基础的。从现代科学那里

直接产生了人类迄今所发现的似乎是最明确的知识,间接地通过技术出现了文明史所见到过的最伟大的变革;(2)但是具有相同的战略意义,或许接下来更为持续的是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该书是杜威出生那一年出版的)。这直接否定了各种陈旧的论述:物种是永恒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基本的物质是不会改变的(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甚至人类本身都是逐步演变而来的);在进化过程中,设计是没有明显位置的。正是这一连串的冲突,促使杜威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

杜威能够获得的新资源是什么呢?(1)实验探究的归纳逻辑,科学的方法;(2)达尔文的人类是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同发展的概念;(3)达尔文—皮尔斯—詹姆士把意义、思想和行为看作是生物为各种目标和目的控制环境的活动的观点。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杜威的自问:(1)为什么不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2)为什么不能用哲学解决目前社会实际生活中的真正的问题?(3)为什么不能从达尔文观点的角度去考察人类和他的各种问题?(即生活、思想和情感是人类解决生活问题的实际努力)这些正是杜威在哲学和教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很多人相信,他对上述每一个领域的思考都比其他人思考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然,依我的判断,就教育这个我最为熟悉的领域,情况的确如此。

那么,杜威对教育的重大贡献是什么呢?

1. 最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一开始所看到的,恰当的生命哲学必须是整个教育过程和活动的基础,进而为教育过程的每一个具体步骤提供合理的指导。

2. 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社会和个人企业最终都必须根据他们对所有相关人的影响加以评判。尤为特殊的是,我们必须了解每个层次的学校每一次活动的情况:这一活动是否发展了所有受到该活动影响的人,使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以开放的胸怀、负责任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生活的各种需求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3. 从上述的原则可以说明,“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

4. 因此,教育必须停止以获得教科书和讲课内容为其主要的目标;相反地,教育必须以人的个性和人格为目标,以发展全面的人去获得完美的生活

为目标。

5. “纪律、自然发展、文化和社会效率都是道德品质,即一个人的标志。这个人应该是那个以教育行业推动发展的社会里的一个优秀成员。”“教育不仅仅是获得这样的生活的手段。教育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通过实践文化来学习文化,通过实践民主来学习民主,通过实践道德来学习道德,以思想和行为来实践每一个活动。那纪律该怎么办呢?”“一个经过训练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并有意识地实施行为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一定纪律的人。在这一能力的基础上,再拥有一种可以在精心选定的课程里面对外在的干扰、困惑和困难仍然能挺得住的能力,那你就把握住了纪律的实质。”

6. 儿童的兴趣是他在发展中的能力最为确定的标志和体现。凭借兴趣,儿童可以通过必要的努力来认识自己。这样,纪律就产生了。

7. 教育成为这样一种持续不断重新构建当前体验的活动,并给予这一过程以新的含义;而教育在扩大和加深社会内容的同时,又给予个体更好掌控进一步体验过程的能力。

8. “每一位教师应该认识到他的职业尊严;他是一个社会公仆,其分工在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确保合理的社会发展。”

9. 如前所述,使教育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应该成为首要的社会义务。

美国教师和学生向杜威表示敬意

乔伊·埃尔默·摩根(Joy Elmer Morgan)的贺词

全国教育协会(NEA)《期刊》主编

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向约翰·杜威表示深深的谢意。当杜威诞生时,这个协会才刚刚成立2周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是在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称道的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称道的时期一起长大的。

约翰·杜威对美国自由的公立学校和其作为民主基础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最明智和最称职的家长期望他孩子得到的一定是社会为他

的孩子想要的教育。

20年前,在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晚宴上,全国教育协会为杜威颁发了终身会员证书。我能为他颁发这一荣誉感到很荣幸。从那时起,他一直就是美国社会和经济目标委员会的成员。他还被推选为全国教育协会所授予的最高荣誉——终生荣誉主席。我们在《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最富有内容和最好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并且不少由其他人撰写的文章都深受过他的教诲和思想的影响。

在今天报刊的大标题上,有很多的政治家和英雄的名字,但是,在记载这个时代的历史时,受到人们怀念的将不是这些人。历史所记载的将是托尔斯泰(Tolstoi)、甘地(Gandhi)和杜威的名字。在孩提时代我学过一首诗,我想重温一遍:

善良的心是美丽的花园,
细致的关怀是万物的根,
亲切的话语是艳丽的花朵,
仁慈的行为是沉甸甸的收成。

请允许我代表40万全国教育协会的会员和美国3000万因约翰·杜威的教诲其生活将发生改变的儿童,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您来日继续作出有益的贡献。

丽贝卡·西蒙森(Rebecca Simonson)的贺词

纽约教师协会主席

我感到很惭愧。一位课堂教师能为在座的听众说一些你们尚不知道有关约翰·杜威的事情吗?是的,我感到,的确有几件他为我们做的事情可以说一说。在那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大家都亲眼目睹并生活在一个威权的、压抑的和僵硬的学校氛围里。我们的课堂是沉默的,纪律是很严厉的。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喊声:“把手放在背后,坐整齐了!”我们意识到,这些言语是陈旧的权威教育概念的标志和特征。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摆脱了这种概念,因为约翰·杜威告诉了我们原因。宽松的纪律,健康的氛围,这些都是许多人正在努力将其带入我们学校的孩子生活当中的内容。这些内容源于我们学会给予孩子以充分的尊重。同样,进入我们学校的还有一种从教师身上体现出来的新的创造性工作和自由思考的特征,这也是因为我们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东西。

约翰·杜威对个体的乐观评价和他对个体工作的深刻理解最终使我们很多人深信,我们可以并且必须在学校里做得更多、更好。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方式必须由学校来培养和提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约翰·杜威就指明了道路,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指导。为此,我们心存感激之情。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耐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他以特殊的身份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成为教学领域的一个特许的工会会员,并带领我们去拼搏。今晚,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向他表示祝贺,祝愿他不断进取,使自由的生活得以生存和繁荣。

艾丽斯·霍夫曼(Alice Hoffman)的贺词

亚伯拉罕·林肯中学学生

作为这个国家众多学生的代表能和您约翰·杜威说话,并与您分享这一快乐的时刻,能够有此殊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姑娘。

对于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杜威,美国的学生深表感激。因为学习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知识的获取不再是一项令人厌烦的任务。因为引入我们今日学校的是由约翰·杜威培植的新的令人振奋的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实践中证明对我们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学业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杜威博士最喜欢的口号“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它已经成为打开通往更广义的学生活动概念之门的钥匙。

过去的课程是在没有多少学生参与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由于约翰·杜威的努力,学校已经改进了教育方法,并确立了值得奋斗的教育目标。现今的课堂教学是在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学生可以在社交化的课堂教学中交流看法。这一过程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欢迎。现今,学校的课程计划更丰富

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更为深远。

在林肯中学,如同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其他学校一样,民主教育正在进行。通过广泛的课外课程,包括成百上千个俱乐部,学生们学会了做中学。这些课程都是由学生团体组织发起的,由学生管理,为学生服务。在最重要的俱乐部——学生团体组织委员会里,学生管理有助于在学校生活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里,那些希望改进自己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他们民主选举出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

民主教育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例子是我们的“林肯奖”(Lincoln Award)。每年,经过2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学生们选出一位他们认为为纽约市提供了最佳服务的公民。今年5月19日,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林肯奖颁发给杜威教授,以表彰他在改善我们城市学校中所做出的成功努力。

我们都认识到,在约翰·杜威的影响下,所有这些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有助于建立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有助于培养领袖才能、自由的意识、合作的精神、社会化的个性和现实的理想主义。

因此,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我国无数的学生以及那些进步教育哲学的受益者,向您约翰·杜威表示我们最诚挚和最衷心的祝贺,代表人类祝您拥有一个富有成就感的生活。

来自东方的敬意

胡适

今晚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不仅代表我本人和今晚出席宴会的一些中国朋友,而且代表成千上万个您的中国朋友,他们要么是您的学生,要么是您学生的学生,向您杜威博士表达最热烈和最衷心的祝贺。

我们敬仰您,热爱您。我们非常感谢您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您在其他外国所居住的时间都长。你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准确地说是两年又两个月。你曾到过中国11个省份的学校里生活过,与当地的教师和学生交谈过,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哲学和新的教育理论。

我们感谢你曾当过我们的老师,当了我们的年轻中国 40 年的老师。你对我们学校无数中国孩子的生活和幸福产生了影响。

今晚,我们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记得,我曾有幸于 1939 年在这里参加了您 80 岁华诞的庆祝活动。然而很少有人会记得,30 年前即 1919 年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家与你在北平庆祝你 60 岁的生日。那天真是奇特的天文巧合,正好也是孔夫子的诞辰日。

那天说到亚里士多德,说他与孔夫子相比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杜威博士,你是否记得那是一个多么开心的时刻。你所有的中国朋友共同庆祝你的生日和他们最景仰的古代贤人的生日。我们这位贤人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

杜威博士,你是否记得,在您 80 岁生日的时候,你不能亲自和我们一起,但你给我们发了一封信,上面有这样一些庄重的话:“当我想到今天许多生活在国外的人们因与朋友接近会面和进行友好交谈就担心会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这种危险的情况,一想到这些,我就会相信,最终的民主保障使邻居们可以在大街小巷自由集会,每天发布的新闻没有受到新闻审查,朋友们可以在客厅和公寓里聚会,大家可以在那里进行自由交流。”

10 年过去了,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因私人聚会与朋友会面交流时就常担心会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的危险之中。的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在明显的恐惧之中,他们不知道还有诸如未经审查的新闻、没有基本的自由以及没有基本的民主保障等事情。

我对您的生日祝愿是,当我们大家,你的学生下次聚会庆祝你百岁生日之际,你会欣喜地发现全世界的民主保障得以实现,包括我自己的祖国。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贺词

印度总理

从开始访问你的国家之日起,我根本就没有一天空的日子。就在今天晚上,主人为我举行了一个特别宴会,很多人都应邀参加了。终于,晚宴一结

束,我就赶到这里。

能参加这样的晚宴,来到这样的场合,即使是片刻时间,也确实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两三天前,我第一次见到杜威博士。但是,还没有几位我所熟悉的美国人对我自己的思想以及我认为最终对我的行为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因此,认识杜威博士一直就是我的愿望,或许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从他成熟的智慧方面汲取一些力量。

我们都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都意识到时代的需求,都在试图弄清楚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和行动。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将一个人的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通常是很困难的。在今天特殊的形势下,这种协调尤其困难。所以,人们需要智慧。

当一个人深信他所选择的行动路线并开始行动的时候,他是否能取得伟大的成功在最后的评判中并不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尽管谁都想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

如果你对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还没有想清楚,那麻烦就会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拥有约翰·杜威这样的成熟智慧就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因此,当我经常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老的和新的哲学家请教。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可以获得一些沉着和平衡,可以感到发热的大脑正在冷静下来。杜威博士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因此,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希望他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约翰·杜威 90 岁华诞组织委员会的贺词

威廉·佩珀雷尔·蒙塔古(William Pepperell Montague)

致约翰·杜威——一位哲学家、教师、公民和朋友：

那些你一生中曾经影响过的并且仍然在影响着的人们向你表示赞赏和感谢。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智能低下的人,还是学识渊博的人,都从你对一切有关人类事务的独特的、自由的和深刻的思想中获益。

是你振兴了哲学,将它体现为一种对人类体验基本潜能的认识。你指

出,自然世界并不是与人类世界格格不入的,而是所有人类潜能的产地和源泉。你教导我们,在重建我们共同生活的机构中有条理使用智慧的极其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才能得以丰富和完美。

你教导我们,要确保民主的依托主要是基于所有公民可以做出自由和智慧的选择。当教育主要成为一种把预期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目的去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和发现的习惯时,这种自由和选择才能成为可能。

你教导我们,共享体验的价值。你亲自树立起一个榜样,来体现人类应该如何参与相互的生活。你全身心地支持劳工运动的发展,关怀工业和政治民主的成长,促进人权的进步。

你从根本上重塑了教育理论,你的研究成果逐步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在你个人的生活中,你体现了你深奥的民主哲学的原则,敢于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表现出对友谊的珍爱,展示了灵活的和幽默的语言。

在你 90 岁华诞之际,让我们和你的全世界的朋友一起向你表达我们最美好的祝愿,祝愿你能为自由和更加灿烂的人类事业提供更长久的睿智和更勇敢的服务。

约翰·杜威 90 岁华诞组织委员会

威廉·赫德·克伯屈(主席)

杰尔姆·内桑森(秘书)

弗雷德里克·L·雷德弗(Frederick L. Redefer)

欧文·埃德曼

哈里·W·莱德勒

哈罗德·泰勒

1919 年 10 月 20 日

约翰·杜威的答词

我几乎无言以对,我为你们在这个时刻所讲的和所读的一切而深深感动。我难以充分表达我自己对组织委员会和今晚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的

谢意。

有一点我是幸运的。不是因为我活了 90 年，而是因为我活到了 1949 年而不是 1969 年，或者可能更糟糕的 1979 年，甚至 1989 年这个年龄。即使现在，几乎只要捡起一本期刊，就可以找到一篇有关由于人的寿命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的文章。如果人的寿命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延长，我可以想象，从今晚起的以后二三十年里，就不会再有庆祝一个人活到 90 岁的建议了。更有可能的是，会召开会议讨论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长寿问题。

无论如何，沉湎于回忆应该是一种老年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特权。我一直在充分追忆我晚年的生活，这使得我不得不回忆过去，思考那些年是如何度过的。

经过充分的反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为善还是为恶，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一直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我是一个以哲学家的身份活到 90 岁的人。而且奇怪的是，这一结论并不是从我嘴里硬逼出来的一种不情愿的承认，而是作为一种吹嘘说出来的，尽管我担心这一行业里我的许多同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吹嘘。

但是，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尽管我似乎已涉足了不少领域，如教育、政治、社会问题甚至艺术和宗教等，但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一直都是—种特殊的副产品，而我主要感兴趣的领域还是哲学。

这一副产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负面的，另一个是正面的。从负面来说，哲学对各种形式技能的要求——人们会说到专业学术技能——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涉猎以外的领域就显得很诱人，因为古老的原则是篱笆墙另一侧的浆果更多、更鲜艳、更大。另一个也是正面的原因是，哲学不可能靠自身的反复思考无限地繁荣或生机勃勃地发展。哲学家需要新的和第一手的资料。否则，有关过去的哲学家思想和信念的故事就会成为一种自身的终极目标，而不是解决当代生活中紧迫问题的资源。

也有可能的是，那些打着哲学旗号从事某种探究的人夸大了哲学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对遇到的问题有一个合理明确的认识和说法：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来的，以及出现在什么地方。哲学家可能有理由认为，他们可以透过事物的外在东西去看其内在的东西；从事物的外在表现去看其本质的东西。哲学家完全有

可能会变得狂妄自大；但是，盲目夸大我们对问题有一个相对清楚和明确认识的重要性是不太现实的，尽管这些问题实际上或在实际生活中是造成我们遇到困难和罪恶的原因。我相信，去夸大智慧的敏锐性和兴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智慧的敏锐性和兴趣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我们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转变成智慧术语，这样就可以提出计划并作为矫正行为的条件接受智慧的探究。因为在技术和医学技能中，我们已得知，在我们确定问题之前就付诸行动会把事情搞得比以前更糟糕。因为除了系统地从事罪恶根源的研究外，我们可以做的唯一取舍的选择是：要么依照日常惯例和不自觉的习惯机械地行动，要么出于恐惧本能地行动。

当前，传统和习俗已被很好地分成各种指导我们行动的可靠资源。尽管我们现在几乎生活在长期的危机状态中，但危险即恐惧和不安全感是我们活动的主导动因。

在我 90 岁生日之际，人们对我的活动给予了各种善意和慷慨的，经常是过于慷慨的赞誉。其中，有一件事情我特别乐意接受，那就是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所说的话。他说，我曾帮助我的人类同胞从恐惧中解放出来。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重要的是，那种没有被认识到的和仔细斟酌过根据的恐惧，不仅妨碍着我们的进步，而且引导我们个人和集体踏上了没有目标的和混乱不清的行动道路。当我们自己背着恐惧的枷锁并让它支配着我们行动的方式时，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人类的同胞失去了信念，这也是对民主精神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许多年前，我读过一篇由一位敏锐的政治家撰写的文章。他说，多数裁定的原则并不是民主的核心，而是某个拥有一个特定政策作为目标的团体成为多数的过程。这种说法我一直记忆犹新，实际上它蕴涵着一种认知，即民主是一个教育过程；投票行为在民主的机制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开放和公开交流过程的积累。在这种过程中，各种偏见有机会相互抵消；事实和思想持续不断的相互交流揭示的是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展示的是有助于人类美好生活的东西。

这一教育过程是基于对人类美好认识和人类美好愿望的信念，因为当交流逐步从禁锢、偏见和无知中解放出来时，这一过程就会从长远发展中表现出自身的明显特征。它会强烈和持续不断地提醒着，当从压迫和压抑中解放

出来时，一起生活的过程就会成为一种对人性形成日益坚定的信念；因此，它会成为对我们的相互关系加以理解的一个持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排除恐惧、怀疑和不信任。

从这次聚会所体现出的友谊是感觉出来的，而不是谈出来的，因此我格外珍视它。这种友谊是一种我有幸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的吉祥预兆。因为我知道，尽管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一吉祥预兆针对的是事业而不是个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明白友谊的这种表现正如我所经历的，是对有助于自由和正义的事情同情的体现，是对有助于合作和友谊的事情同情的体现。这种友谊只能在有自由的地方发展繁荣，而这种自由是我们和无数大众所共同拥有的，即共同快乐。

我想以一封来自德克萨斯州老朋友的信结束我的发言。在这封信中，他说尽管他很乐意参加今晚的宴会，但他对自己现在的缺席并不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晚宴的议程与其说是纪念过去，还不如说是“带着决心和勇气大步迈向未来”。

我深信，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重温过去的岁月，尽管有 90 年的历史，而是放眼于未来的工作。今天庆典的议程就是“阔步前进”。

我把给予我的过于慷慨的赞誉看作是一种标记，即通过对民主作为道德和人类理想始终不渝的信念来确立实现美国梦想的愿望的信念。这一信念一直是坚定的和纯真的，甚至在一些绝望的人相信武力而不是合作时也是如此。这种合作可以给双方带来友好情谊和相互理解，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成千上万份贺词

（节选）

您，约翰·杜威和你同行的希腊哲学家们是驱除恐惧的人。受你教诲的人对潜在的恶魔、另类思想家的邪恶灵魂、所谓的道德败坏以及思想意识的庞大幽灵并不畏惧。你的追随者带着感激的心情去拥抱那蔚蓝天空下的绿色大地，他们毫无畏惧，更不要说各种让人安静睡去的死亡。

90年成了你与永存之间的里程碑。90年的岁月将会流逝，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约翰·杜威。到那时，他们会重新思考是谁教诲他们去生活而没有任何毫无根据的恐惧呢？约翰·杜威会再一次为他们活着。

——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

新社会研究院前院长

你的著作和学说对讲英语世界的各地有思想的人们产生了影响，向他们阐述了民主的真正含义，并增强了他们对民主生活方式的信念。在大不列颠，我们与美国的同胞一样共同拥有你对教育作为提升人类和促进人类进步手段的信心。

——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

英国首相

许多年前，约翰·杜威发出了预言家的警告，他说：“自然科学暂时超越了心理科学。我们已经掌握了自然机制……但我们还不了解，可能的价值观将成为现实生活的条件。因此，我们仍然受制于习惯和武力。”

同样，亨利·伯格森曾说过，我们每一次可能的物质的增加都相应有精神的增加。

这重大种和谐是愿望和理想高度统一的象征，它在我们的民族之间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和谐是我们尊重和仰慕像约翰·杜威这样的人的象征，他们想帮助我们的民族获得“精神的增加”。

——亨利·邦尼特(Henri Bonnet)

法国驻美国大使

杜威博士从来没有对一个坐在学校板凳上、可能拥有林肯(Lincoln)的才能、衣衫褴褛的小顽童失去信心。因此，机会平等作为教育民主体制的先决条件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概念已经使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发生了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斯蒂芬·达根(Stephen Duggan)

亲爱的杜威教授：在你的 90 岁华诞之际，我十分自豪地给你发出这封贺信。

在英国，你是知名的“现代教育之父”(Father of Modern Education)，因为你使教育工作者们认识到儿童对真实世界和其周围环境的奥秘发生兴趣的极端重要性。在把学校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以及认识到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你教育我们必须帮助儿童发展他们的适应能力并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如果他们长大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公民的话。

你揭露了在正规教学中普遍存在残酷竞争的谬误，当儿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携手工作时，你给我们指出了儿童之间民主合作的丰富内涵。通过这样的合作，他们学会了自律和自制。总之，你让我们恢复了研究儿童游戏的伟大理论，并使我们认识到思想的过程。

——艾伦(Allen of Hurtwood)

世界早期儿童教育组织主席

让其他人去评论你为教育哲学所做的真正里程碑式的贡献吧。我要讲的话肯定是真诚地感激你把哲学应用于人际关系。正如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重新引起了世界人民对于种族的思考一样，你的哲学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思考不同种族、阶级和文化的人们可以一起和谐积极地生活和工作。之所以隆重庆祝你的生日的理由是，你已享有殊荣地生活以便看到你所信仰的哲学被检验和重新检验，直到被理解为千百万人民生活的一种原理。

——查宁·H·托拜厄斯(Channing H. Tobias)

菲利普—斯托克斯基金会董事

这位美国哲学家比现代的其他任何人更加有效地参加了人们为平等自由的战斗，这场战斗正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进行。一种理性的自由信念和把智慧力量作为自由的方法，正是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共同经验。

——布琳·J·霍夫德(Bryn J. Hovde)

贺拉斯·M·卡伦(Horace M. Kallen)

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

附录

附录一 约翰·杜威生平年表

(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单中惠

1859年

10月20日,约翰·杜威生于佛蒙特州柏灵顿市南威兰德街186号。他是阿奇博尔德·斯普雷格·杜威(Archibald Sprague Dewey)和卢西娜·里琦·杜威(Lucina Rich Dewey)夫妇的4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父亲经营杂货零售生意。

1875—1879年

在佛蒙特大学读书。约翰·杜威和他的哥哥戴维斯·杜威是杜威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

1879年

从佛蒙特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

1879—1881年

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中学的教师。讲授拉丁文、代数和自然科学等课程。

1881—1882年冬

担任佛蒙特州夏洛特村莱克维尤高级中学教师。

跟佛蒙特大学H·A·P·托里教授学习哲学史。

1882—1884年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883年春季学期中,杜威讲授大学本科生的哲学史课程。1883—1884学年,曾获得奖学金。

1882年

杜威的第一篇著作《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在W·T·哈里斯教授主编

杜威传

的《思辨哲学杂志》4月号上发表。

1883年

1月,法国《哲学杂志》刊登了杜威的第一篇文章的摘要。这是在国外刊物上最早提及杜威。

1884年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康德的心理学》(未公开发表)。

1884—1888年

担任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讲师和助理教授。

1885年

第一篇教育论文发表,题为《教育与妇女健康》(载《科学》杂志1885年10月16日)。

1886年

7月,与艾丽丝·奇普曼结婚。

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心理学》在纽约出版。

1888—1889年

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

1889年

与麦克莱伦(J. A. McLellan)合著的第一本教育著作《应用心理学:教育原理和实际引论》在波士顿出版。

1889—1894年

担任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

1893年

第一篇关于中等教育的论文,《中学的伦理学教学》在《教育评论》杂志11月号上发表。

1894—1902年

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讲授研究生课程。

1896—1903年

领导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学校的最初名称为“大学初等学校”,通称“杜威学校”。杜威在《一个教育学实验》(载《幼儿园杂志》1896年6月号)和

《大学学校》(载《芝加哥大学学报》1896年11月4日)等文章中,对这所实验学校作了论述。

1896年

《与意志有关的兴趣》发表。

1897年

《我的教育信条》发表。

1899年

《学校与社会》出版(1915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该书1900年在英国出版。

《心理学和哲学方法》发表。

1899—1900年

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

1900年

担任《初等学校纪事》的编辑。

1902年

《儿童与课程》出版。

1902—1904年

担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

1904年

被授予威斯康星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04—1930

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授课。

1905—1906年

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

1908年

与詹姆士·H·塔夫茨(James H. Tufts)合著的《伦理学》出版(1932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1909年

《教育中的道德原理》出版。

杜威传

1910年

被授予佛蒙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我们怎样思维》出版(1933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1913年

被授予密执安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发表。

1915年

参加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立,并担任第一任主席。

被授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与他的女儿伊夫琳·杜威(Evelyn Dewey)合著的《明日之学校》出版。

1916年

《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

参加纽约市第一个教师协会的创立。

1917年

被授予伊利诺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

2—4月,杜威访问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作讲演。

1919—1921年

访问中国。1919年4月30日下午杜威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的访问。访华期间,他在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作讲演。杜威于1921年8月2日从青岛离开中国,结束他对中国的访问。

1920年

被授予中国国立北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哲学的改造》(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出版。

杜威与他的妻子艾丽丝·奇普曼·杜威合著的《寄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一书出版。

1922年

《人性与行为》出版。

1923年

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美国哲学学会的年会,并在该会组织的卡鲁

斯讲座上作讲演。

1924年

在土耳其研究教育状况。

1925年

《经验与自然》出版(192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1926年

在墨西哥研究教育状况。

1927年

杜威夫人艾丽丝·奇普曼去世。

1928年

6—7月,杜威随美苏文化协会组织的美国教育家旅行团访问了苏联,并考察苏联的教育状况。

1928年起担任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直至1952年逝世。

1929年

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座上作讲演。

担任人民院外活动集团的主席和全国独立政治行动联盟的主席。

《对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的世界墨西哥—中国—土耳其的印象》出版。

《确定性的寻求》出版。

1930—1939年

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30年

被授予法国巴黎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出版。

自传性提纲《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发表。

1931年

在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士讲座上作讲演。

《哲学与文明》发表。

《从教育混乱中寻找出路》发表。

杜威传

1932 年

被授予哈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4 年

在耶鲁大学的托里讲座上作讲演。

参加新教育联谊会(New Education Fellowship)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的国际教育讨论会。

1935 年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

1937 年

担任控诉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审判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1938 年

《经验与教育》出版。

1939 年

《自由与文化》出版。

1941 年

7月,参加新教育联谊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举行的国际教育讨论会,并担任会议主席。

与贺拉斯·M·卡伦(Horace M. Kallen)合编的《罗素案件》发表。

1948 年

12月2日,与罗伯特·L·格兰特(Roberta L. Grant)夫人结婚。领养了两个孩子:小约翰·杜威(John Dewey, Jr)和阿德里安娜·杜威(Adrienne Dewey)。

《人的问题》出版。

被授予挪威奥斯陆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194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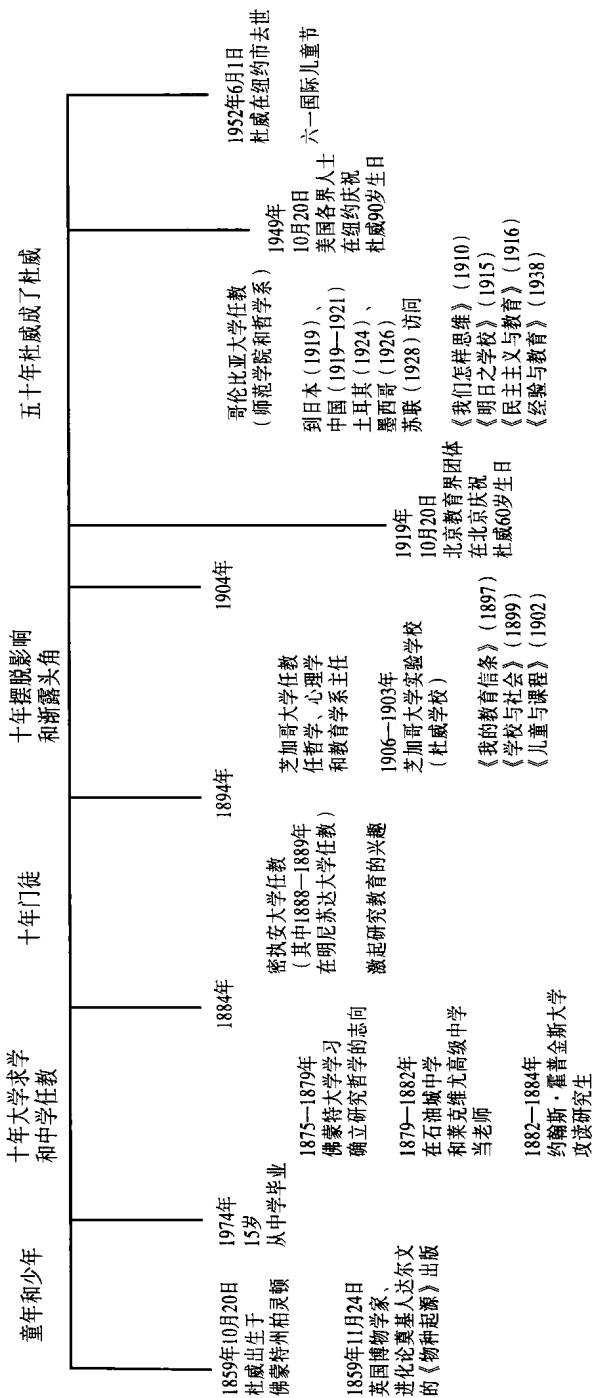
与阿瑟·F·本特利(Arthm F. Bentley)合著的《认知与所知》出版。

1952 年

杜威的最后一篇教育论文:《〈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的引言》发表。

6月1日,约翰·杜威在纽约市第五大道1158号他的住宅里去世,终年93岁。

约翰·杜威生平示意图 (1859.10.20—1952.6.1)



附录二 约翰·杜威在华活动年表^①

(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

黎洁华

1919年

4月30日 午后,杜威偕其夫人艾丽丝(Alice)与女儿罗茜(Lucy)抵上海。(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日)

先是,二三月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胡适与蔡元培、陶行知等商定,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几个团体^②的

① 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3期,略有删节。

② 尚志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的简介:

尚志学会:是范源廉、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在1919年组织的一个团体。他们曾邀请西方学界名流如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他们还主持出版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的译本。

新学会:是梁启超、张君勱、蒋百里(方震)、张东荪等发起组织的团体,该会的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关于该会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新学会宣言书》(《解放与改造》第1卷1号,1919年)。

中国公学:是姚洪生(字剑生)1905—1906年创办的,1920年曾由梁启超接手承办。

名义,邀请正在日本游历讲演的杜威来中国讲学。^①杜威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是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滞在中国住一年作演讲的事。这个意思狠[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杜威结束在日本的游历讲演后,就到中国来了。(《杜威博士致胡适授函》,《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

该日下午,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等人在码头欢迎杜威夫妇。胡适在5月3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杜威博士夫妇于30日午到上海,蒋、陶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州旅店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胡适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4月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电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1919年4月14日《每周大事记》(上海)]

① 关于邀请杜威来中国讲学的是哪些团体,有种种说法,例如:

1. 杜威1921年6月30日在将离开中国时曾说:“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是最初请我讲演的。”(《晨报》1921年7月1日第3版)

2. 1919年5月29日的《晨报》曾报道,杜威“此次来华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各专门学校、浙江教育会公聘”。

3. (1)《教育潮》第一卷第2期(浙江省教育会1919年6月出版)里的《杜威博士来华讲演纪闻》一文讲到“我国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暨两省教育会,特电请其来华讲演”。

(2)在胡适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一书中,其中讲到,是胡适和蒋梦麟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北京一个基金会叫做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胡适的自传)第1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11月]

4. 认为杜威来华是由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联名聘请的。(见丁守和股彝合著的《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34页)

5. 认为杜威来华讲学是东南大学(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评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十分册第80页,[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

6. 认为是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等五个文教团体邀请来的。(见“中国华民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五辑第9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5月3日 下午2时,杜威偕其夫人到江苏省教育会演讲。由蒋梦麟翻译,讲演的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晨报》1919年5月9日)

5月4日 这天在北京爆发了闻名于世的五四运动。杜威下午2时正在江苏省教育会继续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在这两次讲演中,杜威其中说到“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同风起云涌。这是什么缘故呢?寻根到底,就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不觉有乐趣只觉有劳苦,一旦横决起来,自然是不可收拾了。”“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在增加工资,也不在减短工作时间,实在普及平民教育,使得一般工人于用力之余有机会去用脑,方才发生一种精神上的乐趣。”他还认为,“中国将来的幸福……完全是靠傍你们一般教育家的。”(《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新教育》第1卷第3期)有文报道此次演讲,“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周由廬:《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下午4时散会,晚间由教育会设席款待杜威。(《晨报》1919年5月9日)

5月5日 “到杭州游玩,由蒋梦麟陪去。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先生昨日来迎,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胡适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5月7日 到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由郑宗海(教育硕士)任翻译。(《杜威博士来华讲演纪闻》,《教育潮》第1卷第2期)杜威说:“教育之精神何在,曰在民主,在共和。”“共和主义的教育,其宗旨在使人人有被教育之机会,其方法则在尊重个性。”(《教育潮》第1卷第2期)

5月18—21日、24—26日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由陶知行等翻译。有文报道,杜威自来到中国后,每次讲演时,“听讲者非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教育潮》第1卷第2期)

5月29日 杜威夫妇到天津。胡适在天津迎候。

此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为反对北京政府正进行着联盟总罢课。杜威在五四运动期间到达北京。下午“6时抵京,寓北京饭店34号。下车时踏足不稳腿部微受跌伤。博士拟于一礼拜内遍游近畿各名胜之地,并欲亲往万里长城观矣,游览后即于学术讲演会等团体开始讲演云”。(《晨报》1919年5月31日)

5月 哥伦比亚大学复电来,批准杜威请假一年在华讲学。(《晨报》1919

年5月29日)

6月5日 杜威夫妇到达北京后,看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在6月初达到了新的高潮的景象。6月3日、4日,北京学生为了达到罢免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卖国贼及拒绝和约签字的要求,上街头讲演,遭到镇压。军警在两个月内竟拘捕学生近千人,他们把学生拘禁在被用作临时监狱的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理学院。杜威夫妇写信给家里的女儿说:“现在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有一千多名学生前天被捕了,他们住满了[被用作临时‘监狱’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并且开始住到理学院去。”“到了黄昏时分,来了一次电话,说大学楼房四周囚禁学生的那些[士兵们的]帐篷已经拆除,士兵们正在离去。”信中解释说,政府这次不光彩的屈服,是由于这个事实:上海的商人前一天曾经用罢市来表示抗议当局逮捕那一千名学生。杜威夫妇发表意见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共和政体,是一个笑话……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却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撇开妇女不说,他们有完全的社会平等。而且一方面立法机关完全莫名其妙,但是另一方面,当舆论像目前这样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却有显著的影响。”(胡适:《杜威在中国》,《哲学译丛》1964年第3期)

6月8、10、12日 6月8日是杜威首次登上北京学术讲演会讲坛,开始他在京的第一次讲演。这三天每日上午9时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由胡适翻译。他说:“现在文化的新问题”,“是东西的文化怎样互相接近,怎样互相影响的问题。”“美国的民治观念就是自由平等两个观念结合起来的”,“美国的趋向要把民治主义和教育合在一块,民治就是教育,教育也是民治。凡是教育都是为民治设的,必须有这种政治,才可以让教育格外发展,也必须有这种教育,可以让政治格外改良。我很盼望中国将来也能做到这个地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18—21日,6月23—26日)当时有记者报道了这几次讲演的情况,这三次讲演,听众一次比一次多,到者“踊跃”、“座为之满后到者咸环立两旁”,“且均先期而至”,讲演时听众“肃然静听”。(《晨报》1919年6月9日、11日、13日)

8日夜间,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人三百余名。席间杜威讲到,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

(《晨报》1919年6月10日)

6月17、10、21日这三日应京师学务局邀请到北京美术学校对中小学教职员讲演《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翻译。杜威在讲演中说：“现代教育的新趋势，就是注重个人本能 instinct 的趋势。”“教育一方面是拿不学而不知不教而能的本能做主体，一方面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做目的。”他提出，中国的教育家应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又要参考西方的教育学说，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27日、28日、30日，7月5日)

8月10日 应新学会的请求，下午2时在北京化石桥尚志学校讲演《学问的新问题》。由胡适担任翻译。他讲，中国几千年的经验中，“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西洋文明的大缺点是物质科学进步太速，而社会科学、人生科学不能同时并进。”他“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救济，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裨，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晨报》，1919年8月10日、11日、12日)。

8月 《理科教育之目的》一文发表。这是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讲演。文中认为，“真正之理科教育，当以生徒之实验为基础，使其自行发动科学的动机，对于事物间之因果关系及其底里之原理法则，兴起一种理科的研究之兴味也。”(姜琦译，《新教育》第1卷第5期)

9月20日 上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参加本校欢迎蔡元培校长回校大会暨开学典礼大会。在大会上，蔡元培向师生介绍杜威将在该校讲授哲学。杜威在会上作了发言，略谓，“大学之职务，为做媒”，使新旧文化结合，“产生自由的进步的昌盛的儿子”。由胡适任翻译。(《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从本日开始，逢星期六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个题目的讲演是胡适向杜威建议的，胡适后来曾特别作了说明，“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独有政治学一方面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了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新青年》第7卷第1号121页)该讲演由胡适担任翻译。在此讲演中，杜威认为，“人类三十万年以来，没

有一处不受思想知识、习惯、信仰、文化制度等等教权的支配。”(《新青年》第8卷1号13页)他认为,“社会是群与群的结合”,(《新青年》第7卷第2号164页)群的划分是根据宗教、教育、家庭区域种种因素。社会所以纷扰不安,是因为群的冲突。(《新青年》第7卷第2号164页)“对于现行制度”,应该“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从各个方面各个体进步的,是拿人力补救他,修正他,帮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解决”、“这种笼统的推翻真是最不经济的事”。为了避免发生暴动,“应该因势利导”。(《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17—18页)他还认为,“中国本有古代孟子以来的保民政策的学说可以做根基”,“故很可以把从前父母式的皇帝的保民政策,变为民主的保民政策。”(《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6页)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第二年3月6日结束。(《晨报》1920年3月29日)

9月21日 自本日开始,逢星期日上午9时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由胡适翻译。这次讲演共有16次。杜威讲演中,强调教育即是生活,学校即是社会,学校不仅为预备将来的社会生活,他的自身就要为社会生活。(《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5日)他认为,本能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就是“要使课本中所教的都是儿童本性中能领会的,能在将来应用到实际的”。(《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日)他还说:“学校不但要使儿童有新的环境,还要养成他更大的经验,把各种环境联络起来,组成社会的世界的观念和经验。”(《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6日)他还谈到了五四运动,他承认“这次运动于我做讲演文稿时的观念很有影响。因为在我看来,这次运动,就是表一种觉悟,知道学校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学校确要对社会负一种责任”。但他认为,这个运动有“三种短处”:(一)是偶然的事实,不是预定的计划;(二)感情的行为,愤极而出之的;(三)消极的禁止某种政策的实现。”因此,他希望学生们做中国的革新事业,必须“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去”。(《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8日)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第二年2月20日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26日)

10月3日 晚上8时,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在本校新大楼第三十六课室开会欢迎杜威,并请他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9日)

10月6日 杜威夫妇一行赴山西太原考察教育并参加第五届“全国教育

联合会会议”。胡适和万元甫陪同前往。（《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9日 在太原讲演《世界大战与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0日 在太原讲演《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1日 在太原作《教育上的自动》的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2日 下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讲演《教育上的试验精神》。（《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3日 在太原作《高等教育的职务》的演讲。杜威在太原的演讲均由胡适翻译。（《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4日 离开太原。（《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4日）

10月15日 晨，从太原抵京。（《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从本日起，《伦理讲演纪略》开始陆续发表在《晨报》上。该演讲由胡适任翻译。杜威在讲演时说：“道德本应环境而起，某种道德对于某种环境为善，对于他种环境又不然。”并认为“道德无止境”，道德“应该求新经验、新观念的生长来应付时势，不应该盲从旧法”。关于道德的原则，他认为不是当代圣人的德行或习惯，而在原理，由原理“规定他生长的趋势，依原理进行”。他认为中国的“五伦是不平等的，是严尊卑，定上下，蔑视个人利权的”，“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是平等的”。他还认为，“大抵一种改革，一定要拿旧文明做根据，渐渐的吸收溶化新文明，使老的发展成新的”。他在谈到人性的问题时认为，“同情怜悯慈悲互助才是天性”。他还谈到了社会历史的发生和发展，认为“家庭、政府、宗教和财产私有”以及“种种制度都是从欲望发生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是很难变更的，与其废除财产私有，违反人性，不如均分财产，使人人满足”。他还认为，“爱是改良社会最重要的原动力”，“文明进化的历史，是特立独行之英雄的历史。”

在讲演中，杜威还经常谈到五四运动，认为“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教育一定要瓦解了”。爱国“也要情智互用才好”，“不必感情用事，徒然排外”，要发展“博爱精神”，“应该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即推广教育，

改良教育,发达实业,提倡国货,或增进平民的生产和消费力。”(《伦理讲演纪略》,《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版)

10月19日 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为庆祝杜威六十岁生日特于下午7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晚餐会,以表庆贺。晚餐后,蔡元培先生致词,称杜威为“西洋文明的代表”,并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也讲了话,由胡适任翻译。他说:“我到中国的时候……正遇着学生界的一种新运动。从此天天有新变化……我也不免受了些影响……”他建议中国多讲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害处。”晚餐会11时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2日)

10月 除外出时间,逢星期六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继续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日)逢星期日上午9时在教育部会场继续讲演《教育哲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日)

11月14日 下午,参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纪念日活动。被邀请在大会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4日)

晚上8时—10时,在北京大学讲演《思想之派别》。本拟在文科第三十六课堂讲演,因要求听讲者过多故改在法科大礼堂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4日)这个题目的讲演自本日起逢星期五晚上8时开讲。杜威在演说中介绍了西洋哲学史的四派,即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系统派,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派,以及实验派的思想,并分析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及缺点。他在谈到实验派的方法时,认为总括有两句:(一)实验要使知识学问学理,格外切于实用,不是空的无用的知识。(二)使人生的行为,格外根据有意识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作无意识盲从。他还认为,“古来多少学理,都是些纸上空谈,又多少行为,都是些茫无意识……所以实验的方法,是世间人类幸福唯一的保障”。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1920年1月30日结束。(《思想之派别》,《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版)

11月22日 《自治演说》稿发表。由胡适翻译。(《平民教育》第7号,1919年11月22日)

11月 逢星期日上午9时,在教育部会场继续作《教育哲学》的演说。因

天气寒冷,从11月30日开始,推迟半小时开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6日)逢星期六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继续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6日)继续作伦理演讲。(见当月《晨报》)

12月17日 北京大学举行二十二周年纪念会,应蔡元培校长之请作《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的演说。由胡适翻译。他讲:“一国的教育制度不得不有政治的作用,大学更不能不有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责任。”(《晨报》1919年12月20日)

12月24日 从北京动身往济南去。当日,“北京接到张树元督军的电报,拒绝他去。杜威到了山东之后,督军省长派代表欢迎”,并说,“请他们来讲演,我自然不赞成,但既然已来到,我就欢迎”。(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晨报》1920年1月23日)

12月29日 在济南作末次讲演,题目是《新人生观》。报上的广告,为了避掉“新”字,只写“人生观”三个字,讲演时当场才添上一个“新”字。该讲演由胡适翻译。大意是,人要应付环境、征服自然而生活的。环境不同了,时势变迁了,我们应付的方法,征服他们的工具,也要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是动的,不是死的,是时时刻刻地进化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创造的,不要仅是保守的。世时原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世而皆可的道理。新的人生观便是德谟克拉西的道德观,就是人类同立在道德的、学问的、生活的平等地位。

当晚,济南中小学教职员开茶话会招待杜威。山东教育厅长袁道冲在发言中颇不满意《新人生观》的讲演。其中认为,旧的不尽可废,办教育的应该教学生效法,学生的行动才不至于出轨;否则一味鼓吹让他们新,那还了得吗?袁道冲这番话遭到胡适的驳斥。胡适认为,“国故”内要分“国粹”、“国渣”,袁讲话中提到的“学之为言效”就是“国渣”,当应去掉。教育学生是要教他创造,不是要教他效法。(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晨报》1920年1月23—24日)

12月 除外出时间,逢星期五晚上继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作《思想之派别》的演讲。逢星期六下午4时在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逢星期日上午9时半在教育部会场作《教育哲学》的演说。此外,还继续

作伦理演讲。(见当月《晨报》)

1920年

1月中旬 外出讲演回京。自本月16日起,继续在京进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等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13日)

1月20日 在中国大学讲演《西方思想中之权利》。由胡适任翻译。他说,“照权利观念的进化说,即权利无论什么人不能侵犯,无论什么人不能收回,是人人所应有的。不管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年岁大小,及什么男女,什么宗教的区别。”(《晨报》1920年1月24日)

1月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设了一个教育研究科,以造就专门教育人才为宗旨,请杜威主讲,所授功课是用《思维术》(How We Think)为课本。(《晨报》1919年11月26日)

2月 逢星期六下午4时仍继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月21日(星期六)因是阴历新年,故提前于2月18日(星期三)在第三院大礼堂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17日)逢星期日上午9时半仍继续在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并在当月2日结束此题目的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31日,2月18日、27日)

3月5日 晚上8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开始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由胡适翻译。这个讲演是他应特别请求而作的,为的是在罗素1920年到达中国讲学以前介绍罗素。在此题目的演讲中,杜威介绍了詹姆士、柏格森、罗素三位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特点。最后指出,他们三人在哲学上的贡献,詹姆士的贡献是“提倡那靠得住的将来。这个将来是可以生存的,可以由我人任意创造的”。柏格森的贡献是“顿觉的观念”。罗素的贡献在于“可以矫正前者的坏处,提倡广大公道不偏于个人的知识,以此帮助顿觉望前,指导我人创造的进步”。此演讲逢星期二、五晚上8时继续讲演。此演讲在当月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1、16、19、20、22、23、26、29、30日,4月13、16、19、26—30日)

3月6日 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第16次讲

演,即该题的最后一次讲演。(《晨报》1920年3月20日)

4月 由新教育共进社^①公请南下讲演,时间从1920年4月1日—6月30日。行程安排是,4月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专设讲席两个半月,讲演《教育哲学》、《哲学史》、《试验伦理学》。由该校学监主任刘伯明担任翻译。同时还在南京进行其他的一般讲演。5月后到各地讲演,“由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和刘伯明轮流任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22日)

在《试验伦理学》的讲演里,杜威认为,伦理学是思想的科学,是求真理求正确知识的工具,伦理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创造人生的智慧,用于指导、改造人生。他还论述了归纳法,演绎和证实的历程,介绍了试验伦理学的要义与试验方法在逻辑上的位置和重要。最后认为,物质科学虽然已善应用试验方法,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人生社会问题,似尚未能及此。他希望以后人生问题,亦能利用试验,并期望其效果亦如今日之科学,或能驾而上之。(《晨报》1920年9月20日—10月10日)较早是在《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见《学灯》1920年4月19、22、25日,5月21、20日,6月2、9—11、19日)

秋至1921年夏一年间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即用所著《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为教科书。(上海《教育丛刊》2卷1集)

4月22日 先是北京大学打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该校批准杜威留校再任哲学教授一年。杜威夫人该日得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博士复电,允杜威续假一年。(《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4日)

5月7—8日 应江苏省教育厅邀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社会进化之标准。(2)近代教育之趋势。(3)普通教育。(4)教育者之天职。由刘伯明任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5日)

5月12日 《教育之要素》的讲演稿发表。(《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1920年5月12日)

5月17日 结束在南京的讲演活动,出发至各地讲演。当日到达镇江。

^① 新教育共进社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个单位共同组成的。它编辑丛书和月刊,宣传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试图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改革中国社会。

住金山江天寺。(上海《民国报》1920年5月20日)

5月18日 上午9时,由镇江劝学所“请至西大街镇舞台演讲。张县知事及各学校教员学生,均到场听讲,各界人士,到者尤众。该地几有容积不下之势……刘伯明君译述,演题为《学生自动之真义》及《教育家之天职》”。(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1日)

散会后,省立第六中学,“复邀杜博士及刘伯明君等,至该校叙餐。扬州方面,特另备小轮一只,来镇迎请……5时许即一同赴扬……抵埠已7时。当赴天成旅馆休息。是日晚餐假座公园。”(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1日)

5月10日 游览扬州瘦西湖风景。(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1日)

5月20日 在扬州大舞台讲演《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与《“自动”底真义》。由刘伯明翻译。在《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的演讲中,认为,“必须社会一般的人民身体健康,一般的人民经济充裕,一般的人民确能自治,然后社会自然进化,自然日新。所以要预料他日社会底情形,且看今日所施的教育。”(《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23日)在《“自动”底真义》的演讲中,指出自动的要素有三:(一)发展精神,遇事要作周密的规划经营。(二)临机应变,遇事要能通权变达,以取成功。(三)集中力,做事必百折不挠,一步一步做去。以这三个要素,“做自动的标准,再同向社会方面做去,在个人一定成功,在社会就会有进步,自动的真意义即是如此”。(《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5月25日)

5月21日 赴清江。(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0日)

5月23日 晚,从清江赴镇江。(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0日)

5月24日 从镇江乘特别快车到常州。下榻常州青年社新屋。其夫人及女儿已由镇江返南京。(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2日)

5月25日 上午,由留美毕业生钱逸章引杜威游舫舟亭、文笔塔诸名胜,并参观工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6日)

下午,假教会恺乐堂为会场,演讲《学校与环境》。由刘伯明翻译。“大旨谓欲求学校发达须注意社会环境,其说为三项:(一)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不可隔膜;(二)学校提倡公共卫生;(三)学校与地方实业之关系。”“到场者有武进姚知事,霍约翰教士,胡稼农牧师,本地教育行政人员,各校校长教员、第五中学、县立师范、女师范全体学生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晨报》1920年5

月30日)

5月26日 上午,讲演《学生自治之真义》。由刘伯明翻译。大意谓,要从“自”与“治”两意着想。主持学校者当知管理是一种方法,非一种目的。学校中应使学生对管理有切实的了解,一方面发挥其能力及责任人,诱掖鼓励俾真能自治。

下午,讲演《新人生观》。由刘伯明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8日)

25日和26日演讲,“绅学两界前往听演讲人数极众,各乡小学校教员俱远道赴会听讲。”(《晨报》1920年5月30日)“两日听讲者各有三千余人”。(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8日)

5月27日 上午8时,在常州青年会演讲《青年道德之修养》。听讲者仅限于社员。讲毕即乘10时34分车赴沪。学界及教会中之代表到车站欢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8日)

中午,乘车抵上海,同行者有夫人、女儿及刘伯明、杨贤江。寓沧州旅店。杜威等人到上海时,黄炎培、沈恩孚、刘汝梅等人到车站欢迎。(《晨报》1920年5月30日)

5月29日 上午10时,在上海第二师范讲演《教育者之天职》。由刘伯明翻译。(《晨报》1920年5月30日)

下午2时,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请到中华职业学校,在该社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演讲《职业教育之精义》。由刘伯明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6日)他认为,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即使家庭的或店铺的小工艺,也要和学校发生关系。旧的工艺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改良。此外,职业教育要打破知识界和劳动界的阶级制度,铲除劳心劳力的观念。还要从社会国家方面着想,增加社会一般人的生产力。(《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5月27日)

晚上7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借座一品香聚餐,并公宴杜威夫人及女儿。(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9日)

5月30日 上午10时半,杜威夫妇偕其女儿及刘伯明到中华职业学校参观。参观毕,即在校午餐。(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31日)

下午2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讲演《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由刘伯明翻

译。《晨报》1920年5月30日)大意是,要解决劳动问题,应当在教育上倍下工夫,就是要增进资产阶级的程度,增进劳动者方面的教育,使工人身心的幸福有尽量发展,这才是免除劳动问题的最稳妥的办法。《《觉悟》,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31日)

5月31日 上午10时,在吴淞同济学校讲演《专门教育之社会观》。由刘伯明翻译。他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在乎用科学方法,提高一国的经济状况与国民生活。”职业教育是“一种公益有利的事业”。还认为,“现在新教育方法,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劳心的人,亦当兼具劳力的本领。将这二种昔相歧异的要素,熔冶一炉,这不能不归功平民主义的影响。”(《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8日)

下午6时,在圣约翰大学讲演《科学与人生》。(《晨报》1920年5月30日)

6月1日 下午4时半,应江苏省教育会所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新人生观》。由刘伯明翻译。“下午3时后,听讲者已陆续到会。至4时后竟至坐无隙地。后至者均旁立而听。约有一千三百余人。”(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日)

晚上8时,在南洋公学讲演《工艺与文化之关系》。由刘伯明翻译。(《晨报》1920年5月30日)他认为,“人类的进化,无非是工业的进步”,没有物质的进步,“文化就失去了根据”,工业对人的精神影响很大,“有了工业的发展,然后能解放人的精神”,而“工业的发达,全靠科学的应用;但科学如不应用到工业上,也是没用的”。(《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6日)

6月2日 上午10时,在沪江大学讲演《国家与学生》。

下午7时半,在上海青年会讲演《社会进化》。由刘伯明翻译。(《晨报》1920年6月30日)他认为,判断社会进化的标准有几个方面:(一)体育,国民注意体育,身体健康;(二)经济,平民的生产力与生活程度提高;(三)交际方面,打破自私自利的旧习惯,培养互助的精神;(四)品性方面,有自治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另外,还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它是以上四种标准的核心。世界的进化,是由教育提倡的,促进了教育事业,以上四个方面也可以促进了。(《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7日)

6月3日 上午10时,在浦东中学作《公民教育》的演讲。由刘伯明翻译。(《晨报》1920年5月30日)大意是,要培养出良好的公民:(一)要“从学

校组织及管理方面做起”。“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学生就是社会里的公民，学生在学校里边受公民的训练，那就是公民教育”。(二)教师教授时要培养学生公共的精神和互助的精神。(三)“把现行的学科，根本改组，改用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学科。”(《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4日)

下午4时半，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德谟克拉西之意义》。由刘伯明翻译。(《晨报》1920年5月30日)

6月4日 上午11时，乘大德轮船赴南通演讲。夫人、女儿及刘伯明同行。(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7日)

6月5日 上午8时，乘轮抵天生港。9时入城。住高诚身牧师家。(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9日)

同日 在沪江大学所作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之讲演稿在《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由刘伯明翻译。大意是，“教育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总要学说与实验同时举行”，“就是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生关系，普通教育要有职业教育去帮助他，职业教育也要有普通教育去救济他。”“职业教育有社会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而生的。”(1920年6月6日)

6月6日 上午8时，至更俗剧场演讲《教育者之责任》。由刘伯明翻译。听众“注意静听，毫无嚣气”。“实到两千人，以各校教职员学生居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9日)

6月8日 赴上海。(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0日)

6月9日 《教育与社会之关系》之讲演稿在《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徐守五翻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1920年6月9日)

6月10日 上午10时半，乘车抵杭州。夫人、女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郑晓沧及杭州赴沪代表二人同行。下榻于清泰第二旅馆。(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0日，6月10日、13日)

下午1时，乘车至运动场讲演厅讲演《小学教育之新趋势》。由郑晓沧翻译。教职员及学生达三千余人。他认为，教育的新趋势就是打破了教育为少数人所享的权力的状况。又说：“国家有(共和制度)，而教育亦必欲有(共和制度)，西方相辅而行。则国家基础可固矣。”“10年或20年后中国之强与不强，全视小学方面之趋向如何。”“故欲谋多数人的福利，非增设小学不可。尤非先养成多数良师不可。”(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3日)

6月11日 在马坡巷杭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进步》。(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0日)

6月12日 上午,浙江省教育会假律师公会,开会欢迎杜威。“各校校长及学务各机关人员到者,约有六十余人。会上由教职员联合会提出四种问题”,“与杜威讨论至12时方毕,并摄影留念。”(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5日)

下午4时,借杭州青年会屋顶花园讲演《德谟克拉西之真义》。“至3时已坐满难容。后至者竟无立足之地。”由郑晓沧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5日)他认为,德谟克拉西主义的定义,就如林肯所讲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这定义包含有三种要素:(一)“德谟克拉西底目的,专为人民底幸福、不是为私人的一部分的幸福的”;(二)“由民的”就是民意的重要;(三)“政治的组织”,这个政治底组织,从人民选出底代议士所组织的。(《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16日)

6月13日 上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讲演《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由郑宗海翻译。此演讲主要是谈在德谟克拉西社会里所需要的态度。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虚心,在各方面有可以得到一种知识或技能的地方,总得想法子去学习他。第二是有目的,“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做事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秩序的计划。”第三是责任心,必须在“人格上养成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前途怎样艰难”,“总要努力的向前去负责”。(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6日)。

6月14日 应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所请,在西湖凤舞台演讲《科学与人生之关系》。由郑宗海翻译。到会者一千余人。他认为,科学对于人生改良之方法有二:(一)人类自省能力勿使其处于被动力。(二)观念上之改良。并认为科学非由物质而来。乃溯源于精神方法之状态,理想方面之原素。(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0日)

在杭州期间,还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作了题为《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教育》的演讲。他认为,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方法有下列三种:第一是“注重游戏运动,游戏运动,能够使一个被动的静穆的无生命的人一变而为活动的、有生气的、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是“注重手的活动”,手工活动“给我们以表现思想的机会”;第三是“注重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如果能够切实地奉行这几

种方法,变化社会、改造社会,都易如反掌的。”(《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17日)

6月15日 乘车返沪。(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0日)

6月16日 赴徐州。(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0日)

6月17日—19日 在徐州作演讲。(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0日)讲演的题目有《教育的新趋势》和《教材底组织》。由刘伯明翻译。在《教育的新趋势》的演讲中,他认为,最近教育底新趋,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身的动作及能力发展,并要注重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底联络,补足旧式教育底漏缺。(《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6月30日)在《教材底组织》的演讲里,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改组教材,以促进儿童底自动。第一,是游戏。游戏就是运动,运动能发展精神,活动身体。第二,是手工。能够使学学生独出心裁,发表意匠,养成创造的能力。第三,是科学。能使儿童用耳、目、脑筋,去自己观察,发明、实验。(《觉悟》,上海《民国月报》1920年7月1日)

6月21日—26日 21日抵达无锡。“县署第三科主任、劝学所长暨县市教育会正副会长等,均到车站迎接”。下车后,即同至行素别墅。经本邑各绅董迎接入内。茶点后,同赴第三师范欢迎会。当日“作短时演讲”。22日至25日为演讲期间。演讲问题:(一)试验主义。(二)学生自治。(三)学校与社会。(四)近今世界与教育思潮。(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3日)他在《试验主义》中认为,“如今要调和新旧的意见,非取折中的方法不可,所谓折中方法,就是‘试验主义’了”。他提出“试验主义”结论的三个要点是:(一)教育行政方面,组织学校,应该考察英美日本等国的教育制度,参酌国内的习性,然后规定教育方针,不可盲从欧美学制。(二)地方办教育的人,不可照了中央规定的教育制,依样葫芦,应该参酌各处风俗人情,变通办理。(三)科学的精神必定要及于全社会,教育为解决各方面种种问题的中心点,注意教育,其他种种问题也因此而解决了。(《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7月16日)

6月27日 赴苏州。(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7月27日)

6月28日 在苏州讲演《教育者底责任》。由郑晓沧任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8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7月3日)

6月29日 在苏州讲演《教育与实业》。由郑晓沧翻译。他提出:“教育与实业,应当双方并进,不能偏重一方面。”(《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1920年7月2日)

在苏州期间还作了《学校与社会》的演讲。由郑晓沧任翻译。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提出，在教育上应注意三个要点：第一，“谋教育的普及”，“要注重女子教育”。第二，学校“应当做成一个社会的缩影”。第三，“各科教材的内容，须选取能够代表时代的生活状态的，不当专门选取古代的现象的。”（《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7月11日）

7月9日 《教育行政之目的》演讲稿在《觉悟》上发表。由郑晓沧翻译。他提出，“对于组织学校教育行政的人，都应该有学者的态度，如照着机械的行政做去，乃是机械的、呆板的、对于大的目的不看见了。”“行政界中所当研究的：是世界上的情形，以及社会上的情形，怎样可以使社会进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7月9日）

7月 北京大学请杜威下学期专任哲学及教育学教授。请杜威的女儿罗茜女士专任史学教授。（《晨报》1920年7月11日）

8月1日 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三大哲学家》、《伦理学》）。（《晨报》1920年8月28日）

9月16日 《学生自治的组织》讲演稿发表。由郑晓沧翻译。他认为，“自治的意义‘不是绝对不许外界插入干涉，乃自己练习管束自己的意思’，学生组织这一种机关……不是去管教习、校务、及学校以外的一切事的。”（《晨报》1920年9月16—19日）

10月17日 北京大学举行第二次授予名誉博士典礼，授杜威以哲学博士。（《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26页）

10月25日 湖南省教育会于10月25日—11月4日举行盛大的讲演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胡适、张东荪、李石岑、吴稚晖、杨端六等人到湘讲演。胡适因病没有应邀南下。杜威夫妇25日上午10时乘火车抵长沙。下车后，杜威夫妇下榻颜克卿医生家。在颜宅午餐。午后，拜访谭延闿省长。（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5日、26日）

10月26日 湖南省省教育会会长陈凤荒与朱剑凡、舒新城同往颜宅拜访杜威。（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6日）

下午2时半—4时半,在长沙遵道会开始讲演《教育哲学》。由明德学校教员刘树梅任翻译。谭延闿省长亲临会场,并任该日会议主席。听众约有80多人,会场座为之满。(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7日)

10月27日 下午2时—4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讲演《学生自治》。由刘树梅任翻译。听讲者为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千余人。他认为,现在的学生自治,就是将来的国民自治,所以学生自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治的目的,不是与管理员争夺权力,乃在自由思想,乃在养成自立性,乃在将来成一个健全的国民。(长沙《大公报》增刊1920年10月28—29日)

午后6时,湖南省教育会在该会西偏楼上公宴各讲演名人,尚有军政两界高级官员参加。杜威在宴席上作了简短演讲,略谓,湖南现在适为中国之瑞典,以后甚望注意教育方面,以求真正幸福。杜威夫人也发表讲话,主张男女同校,甚望湖南政府及各教育家赶急推行。(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8日)

10月28日 上午8时,往岳云中学参加北大同学举行的欢迎会。

上午9时,赴长沙遵道会讲演《教育哲学》。由曾约农任翻译。

下午2时半—4时半,在长沙遵道会继续讲演《教育哲学》。(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0日)

10月29日 下午2时半—4时半,在长沙遵道会场讲演《教育哲学》。

10月30日 上午9时半在长沙第一师范讲演《教员是领袖或指导员》。由曾约农任翻译。听讲者为各师范学生。(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9、31日)

下午2时半—4时半,在遵道会讲演《科学与近世文化之关系》。由曾约农任翻译。(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1日)

下午6时,赴省农会、总商会、长沙县教育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实业协会、中华公会八团体在总商会举行的欢迎各演讲名人的宴会。到会者八十余人。在宴会上,杜威作了简短讲话。由赵运文翻译。他讲:“自来中国,一年有余,多蒙各处欢迎,但不如今日之盛,尤为感谢。”并表示,“来华美人不论何界,不仅为自己利益计,俱愿为中国人民尽辅助之力。”其夫人也表示,“来湘受有八次之欢迎,今日又承八团体欢迎,印象甚深,以后甚希望送八倍、八十倍、八百倍学生到美为幸。”(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1日)

11月1日 上午8时—9时,参加湖南省议会举行的欢迎会。

上午11时,到长沙遵道会参加中华工会举行的欢迎会。军警政绅商学各

界到者不下五百余人。

下午2时,讲演《教育哲学》。此为在湘最后一次讲演。

下午4时—6时,到长沙总商会参加湖南报界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座谈会。谭延闿省长等人士出席作陪。会上,杜威就关于制宪问题作了简短讲话。由曾约农翻译。他认为,在美国,各下级自治机关,组织完备,故制宪较易,中国则较为困难。宜先注重教育实业,与民休养。可定一临时宪法,暂行若干年,再正式制定。

晚上8时—9时,军警学三界在湖南省教育会设席为杜威夫妇饯行。(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2日)

在湘期间,曾在雅礼大学作《讨论学生毁偶像事》的演讲。他认为,长沙师范学生毁城隍神像,表示出学生有破除迷信、改良社会的决心,此行动受百姓的反对,诚是可叹!并认为,学生所行的办法,不是一个积极的创造的政策,所以结果失败。建议学生以后对于改良社会应用极稳当的方法去做,才不至于失败。(长沙《大公报》增刊1920年11月2日)

11月2日 下午4时,乘沙市轮船往湖北汉口。

在湘演讲期间,湖北王督军特派外交顾问刘明钊往湘邀请杜威、蔡元培诸氏赴鄂演讲,杜威允便道过鄂讲演数日。其他人一律谢却。

离湘时,湖南省教育会给杜威送致菊花石岩及湘绣等各种礼物。

杜威预备在鄂演讲4天。

1921年

3月6日 在北京高师美术讲演会所作的《论中国美术》的讲演在《晨报》发表。在此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要占一个很重要、很荣誉的地位,中国研究美术的人应注意保存古代的美术品,并要唤起学生及一般人保护美术的注意,还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进步改良之道。他还认为,美术本身有价值,此外,还有实用上的价值。(《晨报》1921年3月6日)

4月12日 应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之邀请南下福建。该日偕其夫人、女儿由厦门安抵福州。住于福州城内乌石山石师姑宅。是日下午往访李督军后,即赴西湖公园参加各界为他而举行的欢迎会。(《晨报》1921年4月23

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1921 年 6 月 22 日)

杜威到福州后,各界请求杜威讲演者甚多,北京大学学生有电到闽,请求保全杜威健康,谓每日只可讲演 2 小时。故福州教育界人士特为杜威限制讲演时间,每日日夜只限 2 次,每次 1 或 2 小时为限。(《晨报》1921 年 4 月 30 日)

4 月 13 日 下午 2 时至 5 时,在福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演《教育者为社会领袖》。由王淦和(青年会干事)翻译。(《晨报》1921 年 4 月 30 日、5 月 2 日)

4 月 14 日 上午,在福州青年会讲演《自动的研究》。他说:“解剖自动之内容,实不出于定目的求实验之二作用也”,“欲与社会自动力之强弱,唯视游戏场自动游戏之程度而定之。”“中国今日急务,应于各地方建设公共游戏场”,“学校中手工一门,尤宜多制自动的玩具,是亦养成儿童自动之一道也。”(《晨报》1921 年 4 月 23 日、6 月 22 日)

晚上,赴协和大学欢迎宴会,在宴会上作短篇讲演。(《晨报》1921 年 4 月 23 日)

4 月 15 日 上午,在福州青年会讲演。(《晨报》1921 年 4 月 23 日)

下午在尚友堂讲演《民治的意义》。何谓民治? 他举例说:“就此尚友堂中所办理慈善卫生教育各项事业推之,即办民治。”又指出,“事事待助于人,则我之力量日益减少……民国成立,十年于兹,人民咸抱缺望,顾所以致此者,不在政府,实在人民之有倚赖性……诸君诚能祛此积弊,力谋互助,人人知互助,则民治日进,国本日巩矣。”(《晨报》1921 年 7 月 8 日)

4 月 17—18 日 偕夫人、女儿前往福州名胜鼓山游览,当地教育科长等人陪同前往。(《晨报》1921 年 4 月 30 日)

4 月 20 日 在福州青年会讲演《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主张“新教育,宜在培养多数人才,是为国民教育为必要”。反对中国的旧教育,只注重培养官吏人才。认为“有良好之国民教育,斯有良好之中等以上教育”。国民教育的普及,可避免少数有教育之人专恣横暴,可得多数之领袖人才,才可强国。(《晨报》1921 年 6 月 20 日、21 日)

4 月 20—22 日 在福建省第一中学讲演《自动与自治》。谓:“学校自治,非徒以维持校内秩序,并将以协助社会,使合于共和的。”在谈到自动的问题时,他认为,教育者应“启发儿童之好奇心,而授以适当之材料”。4 月 22 日是杜威在福建的最后的讲演之日。(《晨报》1921 年 5 月 3、5、6 日)

4月21日 在福建省教育会作《美国教育会之组织及其影响于社会》的演讲。他介绍说,在美国无一国立学校,教育在中央不设专部,特附属于内务部。全国之学校,无得中央之补助,遂亦不受中央之干涉,各州之组织教育行政,虽有独立机关,其内容不统一,权限亦甚小。教育行政长官,乃由普通人民或议会选出,筹措经费,由各州教育行政组织解决,或由税中抽出若干,或另行捐募。(《晨报》1921年5月7日)

4月 在厦门大学曾作《大学的旨趣》的讲演。他认为,中国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就是无教育的缘故。中国根本的解决,除教育普及外,再没有办法了。中国从前培养人才,多半用奴隶教育,如八股策论等。无非养成国家的玩物。故以前的科举,可为一般旧人物的代表;现在的大学,可为一般新人物的代表。现在中国的大学,应培养工商业的领袖,政治和社会的领导,自然取代腐败的旧官僚。他建议学生不但要用功读书,而且要注意课外自治方面,养成互助的精神,并在将来把这种精神发挥开去。(《晨报》1921年4月25、26日)

4月 在福州青年会还曾作过《教育与实业》、《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和《习惯与思想》等几种演讲。

在福建私立法政学校曾讲演《民本政治之基本》。他指出,人权分为身体自由、财产自由与思想自由,三大自由具备,然后可言平民政治。认为“中国自易民国迄今,已十年矣。三大自由权及选举权,名义上似已获得。然以实际言之,尚在若有若无之间”。中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争回此权。(《晨报》1921年6月23日)

4月22日 晚上,福州各界人士设宴欢送杜威离闽赴粤演讲。在闽期间,广东教育界人士曾邀请他赴粤讲演,后粤教育会会长汪精卫电闽教育厅,请为代请杜威迅速赴粤,并派代表前往香港迎接,故定于4月23日晚自马尾搭海澄轮船前往广东。(《晨报》1921年5月2日)

4月23日 晚,闽教育厅派科长等三人护送杜威夫妇及女儿登轮。并送以闽产之沈绍安漆器及女子职业学校之刺绣鼓山全境一幅等物。杜威预备途中在厦门、汕头两埠登陆游览。(《晨报》1921年5月2日)

4月28日 杜威偕其夫人和女儿抵广州。下榻亚洲酒店四楼111、115号。到后即偕美国领事入谒陈炯明省长。当日男女来宾多人前来拜访作陪。

4月29日 下午2时—4时,在小南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

演。首先由陈独秀将杜威的历史略为介绍,然后介绍杜威登坛演讲。由韦珏君任翻译,讲题是《自动道德之重要原因》。听众是高等师范职员学生及各专门学校职员学生,共约千余人,座无隙地。(《晨报》1921年5月15日)

4月30日 下午2时—4时,在九曜坊广东省教育会礼堂讲演《学校与社会》。听讲者为全省中学校职员学生。

5月2日 下午2时—4时,在广东省教育会礼堂讲演。首先由汪精卫介绍演讲。此次演讲题目为《西洋人对于东洋人之贡献》。听众为各界来宾,其中有不少妇女与外国人,共约千余人。

5月 因须迅速北上,不能久滞广东,不久离粤。当时报纸报道讲:“百粤人士甚为快憾,百般设法阻止其行,大有扳辕挡路之慨。”(《晨报》1921年5月15日)

杜威此次来粤演讲正是粤军陈炯明赶走桂军占领广东时期。此时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非常国会重在广州集会,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于1921年5月初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揭起护法的旗帜。杜威在广州时“和许多新运动当中之政治的、官吏的、知识阶级的领袖们谈话”,他觉得“他们对于那些事件仿佛很有一个公正的见解。一切的事情和谈话,完全给我一个不同的印象,与我初到广东去的时候心中所有的完全两样”。他认为,广东政府“着实干了许多关于中国进步的事情”,“是中国唯一的政治,真为人民的福利,不为官吏的权力和私囊,而且受制于大多数人,不但只有一点好意,而且也有关于政治的近世眼光和知识上的训练的”。并表示:“我对于北方政府用军阀的势力去压人,未免要皱眉了。”对于孙中山的政府,他主张“让他去,看他将来怎么样”。(《晨报》1921年6月16—18日)

5月10日 在北京女子高师所作的《教授青年教育原理》的讲演在《晨报》上发表。他提出,“教授的原理,就是使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教育,成为一致。”(《晨报》1921年5月10日、11日)

6月22日 上午9时,应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之请,在北京厂甸高等师范礼堂作归国之前的最后讲演,讲题是《教师职业的现在机会》。此演讲是谈教师职业精神的增进。谓:“这职业精神的社会方面,即在于他们工作的时候,与社会服务的时候,有统一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互赖的精神,与互助的精神。”“职业的精神,就是受知识,受艺术的意思。有了知识和艺术,职业就可进步。”他批

评一些教师把教育事业作为暂时栖身之所,把主要的目的与兴趣放在别处,而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改良进步的态度。并就如何提高教师的职业精神提出了一些建议。(《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1年6月26日、27日)

6月22日《南游心影》的讲演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此讲演是应北京高师自治会所请在该校而讲的。此次演讲是谈他南游闽粤各地的感想。他南游的第一感想是中国的交通不便。交通的不便,对政治、工业、知识有很大的影响。南游感想中最深而又最大的是教育费受军费影响,时时裁减,以至教育事业不能发达。他说:“中国现在有两个不能并立的大势力。是什么,一个是教育——知识界,一个是军人。这两个势力相反的程度,已达到有彼则无此,有此则无彼的地步。”他赞扬“广州军政府底教育事……但却有很可喜的现象。换句话说,广东底行政机关要是能延长下去,中国教育前途或者有点希望。因为广州底地方官现在已经画出一个区域,调查该区届入学年龄底儿童底确数,将要实行强迫教育,做他处底模范”。“广东政府的一切设施,都是极诚恳地想着为人民造幸福的”。(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6月22日)

5月以后—离京回国之前 偕夫人第二次到山东济南讲演。^①杜威在济南作了《教育者的工作》、《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教育心理的要素》和《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演讲。

在《教育者的工作》的演讲中,他认为,教育有社会的、知识的、个人的三个方面的要素,教育是无阶级的,各国教育的制度可以决定各国的强弱。学校要适应社会的需要,良好的教育者必须要按民主主义造成民主的国家。(《晨报》1921年7月22—23日)

在《教育之社会的因素》的演讲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工业革命,普通人民要参与国家政权,重视个人的判断、发明、选举这三种潮流对于教育影响很大,教育应适应潮流去改良,要注意工业商业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学校要适应

^① 杜威夫人在济南的讲演中曾提到:“我这回第二次来到山东,非常荣幸……于回国之前,得与诸位话别,更是我最喜欢的事”。(《晨报》1921年9月25—27日,《女子教育提高的必要》)她在济南的另一次讲演中,在谈到男女合校问题时说:“今年(注:即1921年4月11日底)我到广东去的时候,见那里也有这样的计划”。所以,可以断定他们第二次赴济南的时间大约在1921年5月—7月间。(编译者注:杜威第二次赴济南的时间应是1921年7月11日—7月14日)

人们对自由的要求,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晨报》1921年7月24—27日)

在《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的演讲中,他指出,学科与社会的转变很有关系,如自然科学能陶冶人的思想、锻炼人的理解,使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趋势两相顺应。他反对学校教授修身这门功课,主张让学生去实地考察社会政治、生活的情况,学生自然会受得道德上的教育。(《晨报》1921年8月3—4日、7日)

在《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的演讲中,他主张,对小学教育应较高等教育特别注意,普及小学教育能使一般人了解国内外的事情,对国家能产生良好的结果,能扩充高等教育的基础;要使小学自己能完成,使学生即使不升学,他所学的也能于实际生活有利益;教育制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晨报》1921年8月8日)

在《教育之心理的要素》的演讲中,他提出,学校的设置第一要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第二要和儿童天性相适应。近代民主社会的精义就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去作充分的发展,要人得充分的发展,必须适合他的本性。手工、游戏是利用儿童天性的最好的办法。(《晨报》1921年9月19—22日)

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的演讲中,他认为,学校是社会的单位,像一个小社会。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人人没有团结力、组织力和互助力的习惯和能力。应让学生在学校的接受自治的训练,养成他们的责任心和组织力,然后到大社会方能适应。(《晨报》1921年9月22—23日)

6月30日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于午间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公饯杜威夫妇及女儿,到会者约八十人。席间,五团体各代表范源廉、梁启超、胡适等人均致词,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了话。杜威希望中国的青年人与年长的人,既要有渴望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精神。(《晨报》1921年7月1日)

7月11日 上午10时离京回国。^①(《晨报》1921年7月11日)

① 据王剑的“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3期),杜威一家于7月11日上午离开北京,应邀再次莅临山东。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王卓然的陪同下,杜威游泰山、谒孔陵,并从18日起在济南作了6场演讲。7月25日,杜威一家离开济南并于当日抵达青岛。在青岛期间,杜威与当地各界人士交谈,并参观风景名胜。8月2日,杜威一家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因此,杜威的在华活动,开始于1919年4月30日,结束于1921年8月2日。——编译者注

编译后记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对出版学术著作的大力支持下,本人编译的《杜威传》1987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杜威传》一书出版后,一直被我国哲学界和教育界众多学者所引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1982秋至1984年春,本人作为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进修,师从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院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是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曾经任教过的学术殿堂,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众多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推动者曾经学习过的高等学府。正是在这所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学留学进修期间,本人开始对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编译《杜威传》收集了相关的资料。

从编译和出版《杜威传》一书起,本人把杜威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在不断收集与杜威相关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本人除发表与杜威相关的论文外,还出版了《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令人高兴的是,该书曾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2003)、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教育理论创新类)一等奖(2005)、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和教育界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评价杜威,使得杜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杜威研究领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发表了许多有关杜威研究的学术成果。从整体上说,杜威研究在我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和更加理性的思考。

随着我国学术界对杜威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版已22年前的《杜威传》一书

确实有修订再版的必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本人在20多年收集的资料基础上开始了《杜威传》的修订工作。在修订中,除保留杜威女儿简·M·杜威的《约翰·杜威传》和杜威本人的自传性提纲《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等主体资料外,本人力图从传记的视角收入更多有关杜威的人生和学术活动的资料,旨在使《杜威传》一书的修订版在内容上比1987年的版本更加丰富和更加充实。本人期盼,《杜威传(修订版)》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杜威研究的深入。

在《杜威传(修订版)》中,收入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成果,本人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在修订的过程中,我的学生高惠蓉(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原青林(广东肇庆学院教育系副教授、博士)以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徐来群、周雁、姚羽、勾月等协助我做了一些翻译工作,谨以致谢。

在《杜威传(修订版)》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本人特别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对他们热忱支持学术成果的出版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还要真诚感谢该社教育理论编辑部主任杨多文编审的具体指导和辛勤劳动。

2009年10月20日,将是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约翰·杜威诞辰150周年。谨将本书作为对这位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的一个纪念。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单中惠
2009年4月